黄绍竑回忆录

黄绍竑回忆录

广西文史研究馆编

主编　唐侬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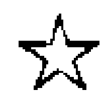
编委　唐侬麟　陆君田

赵大冠　叶春生

广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九一年 南宁

黄绍竑回忆录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南宁市社会福利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22.5印张 插页3 580千字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内部发行）印数1—5000册
ISBN 7-219-01830-4 /I·513 定价：10.60元

出 版 说 明

《黄绍竑回忆录》包括二部分：第一，1945年黄先生五十岁时所撰《五十回忆》原文；第二，建国后黄先生所写1945年至1949年的亲身经历。另有附录：黄绍竑年谱及《黄绍竑追悼会在京举行》。

《回忆录》全书共五十八万多字，记述了黄先生从军从政、历任国民政府军政要职和参加和谈、宣布起义，为新中国成立所作的宝贵贡献以及建国后的工作情况。通过这些史实，反映了新桂系的兴起、发展、统一广西、出师北伐和黄绍竑投蒋反蒋、与中共合作又反对中共，最后走上革命道路及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一部研究民国史和新桂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黄绍竑先生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社会主义事业和祖国的统一大业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这些，现在都已获得公正的评价。但解放前所撰写的《五十回忆》，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其观点总的来说是拥蒋反共的。对诸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及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运动等历史事件的评述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对此他本人在建国后也作了深刻的反思。对于书中所涉及的材料，所阐述的观点，应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用作民国史研究的参考。在本书奉献诸君之际，我们谨作此说明。

今年是黄绍竑先生诞生95周年，我们特出版此书，以资纪念。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11月

《黄绍竑回忆录》序

程思远

国民党在两广统一时期，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号称广西三杰。

时孙中山先生在统率粤军驱逐盘据广东五年之久的桂系陆荣廷以后，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重建革命根据地。不意陈炯明谋叛，占领东江，而广西又为陆荣廷、沈鸿英割据，不时威胁广州，革命形势，危如累卵。

适黄绍竑在沈鸿英手下任旅长，特通过在广州治疗足疾的白崇禧穿针引线，谒见孙中山先生，请命讨沈。孙大元帅特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总指挥，并令驻在肇庆的粤军第一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随时予以策应。

及时机成熟，黄绍竑毅然倒戈反沈，占领梧州，又派白崇禧去玉林与李宗仁会商合作，肃清邕江下游。随即商定先倒陆后击沈的作战计划，由李宗仁、白崇禧分两路攻下南宁，之后又由白崇禧北上桂林击败沈鸿英，此役得李济深派陈济棠旅支援，广西遂告统一。

1926年春，广州国民政府派汪精卫、谭延闿去梧州会晤李宗仁、黄绍竑，商两广统一计划。白崇禧衔命赴粤，续商具体步骤。北伐军兴，李宗仁率第七军远征，黄绍竑为第七军党代表兼领后方部队，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为北伐军副总参谋长，随军北上。

广西北伐的部队在前方发展得很迅速，到1928年春，国民党

军已成为蒋、冯、阎、桂四个集团，蒋为全军统帅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后者且为率领广西军队入北京的第一人。

常言道，爬得高，跌得也快。功高震主，鲜能幸免。不久蒋桂战争爆发，李、白在前方的部队全军覆没。仅以身免，逃回广西。后蒋介石令黄绍竑扣押李宗仁、白崇禧解京究办。黄绍竑为形势所迫，同白崇禧联翩攻粤，白泥一役，全军尽墨，蒋介石是时又命在前方投蒋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返桂靖乱。至是，李、黄、白相率亡命海外。

后来俞作柏、李明瑞又在广西反蒋，但因不能掌握部队，酝酿不到一月而事败。时汪精卫在香港建立国民党"地下中央"反蒋，因促李、黄、白返桂统率桂军，使与张发奎从鄂经湘返桂的第四军合作攻粤，不幸师次广州外围，一战而败。

1930年，黄绍竑一败于北流，再败于衡阳，备受桂张军将领指责，因而顿萌退志，八月在桂林发出"马电"，自请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次年春黄去南京投蒋，先后被任为内政部长，一任湖北省主席，两任浙江省主席。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蒋曾要他回来收拾广西局面，后因蒋桂妥协，黄仍回到浙江任所。

黄在投蒋以后，因与张群、杨永泰、熊式辉交往密切，被人称政学系"四大金刚"之一。抗战后期，他被CC排挤，退任监察院副院长，实明升暗降，自此郁郁不得志。

1948年春，李宗仁在一届"国大"竞选"副总统"，黄任参谋团主席，主张与于右任、程潜成立"攻守同盟"，此一策略十分成功，终使李宗仁竞选得胜。后蒋介石采取报复措施，把白崇禧从国防部长外放为华中"剿总"主帅。白初不愿就，后黄绍竑告以可藉此制造形势，迫蒋下台，白始欣然成行。

1949年，李宗仁上台主政，倡仪国共和谈。黄绍竑为和平使

节北行。4月16日黄偕屈武带和平协议南归，李宗仁外受制于蒋介石，内受制于白崇禧，不敢接纳和议。黄与李自此分道扬镳。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在香港同龙云、刘斐等发表拥共反蒋宣言。自此束装北上，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任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后改任第一届人大常委，及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委员。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广西文史研究馆将黄绍竑早年所写的《五十回忆》及其在以后所撰的史料文章辑为一书发表，这不仅使吾人充分了解黄绍竑个人的毕生经历，并且对研究中国现代史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乐为之介绍。

序

黄语扬

知名爱国人士黄绍竑先生，广西容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解放前，历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浙江、湖北省政府主席、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

1949年4月，黄绍竑先生为国民党当局和谈代表到北京参与和谈。后因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和平协定”，遂使和谈破裂，为此，他到香港，联合44位国民党人士，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号召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党权政权决绝，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这个声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在港的许多国民党人士相继发表声明，响应和拥护黄绍竑先生等的政治主张，形成了一个广泛脱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黄绍竑先生因此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和“下令通缉”。

1949年9月，黄绍竑先生在中共驻港负责人的安排下，从香港赴北京，参加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建国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一、二、三、四届委员，一届人大常委、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黄绍竑先生是新桂系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政治上、军事上有影响的人物。但他在历史上也走过一段弯路，做过对不起共产党和人民的事情，最主要的是参与蒋介石“4·12”清党会议及部署广西的“清党”工作。建国后，黄先生对上述事件深感内疚，并作了自我揭露和批判。

新中国成立后，黄绍竑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事业和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贡献了力量。他生前时常关心广西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

今年，是黄绍竑先生诞辰95周年。广西文史研究馆的诸位同志，经过辛勤的劳动，编辑出版了这本《黄绍竑回忆录》，这是一部研究民国史和新桂系史较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我有感于此，特写下几句，是为序。

1990年10月

黄绍竑词

玉楼春 别香港

笙歌未许画朱户，淡仪深红灯下树。清秋将半未生凉，端隔斜阳山外雨。留声弄断香江路，帆影白鸥漂泊处。海天明月信关情，夜半无人烟里去。

绍竑

目　录

一 童年生活

我的故乡 我的故乡容县，系广西旧梧州府属的一个县。在唐代即已设治，名容州，置经略使。县城名胜镇武阁，又名经略台，为唐代建筑物，至今尚坚固完好。县境位于西江支流，北流江之上游，亦即北流江之主要发源地，环境多山，勾漏山脉由西而东，为粤桂两省之分水岭。县境之南，与广东信宜县交界。我家住容县一里的山咀村（本县分十里，山咀村属于一里），到广东的边界，不足十里。

祖籍溯源 自始祖释养公至今，已十有六世矣。照族谱所记，我先祖源出中原，因满清入关，明社不保，乃避乱南迁，至广东之珠玑巷，由珠玑巷再迁入广西。始祖释养公兄弟二人，长兄道真公落籍广西博白县之车田圩，人口亦甚繁衍。释养公则落籍容县，至今彼此尚有往来。

珠玑巷在小梅关南麓（梅关即梅岭上之关隘，土人称小梅关），是南雄县极北的小镇市，实为北人南来渡梅岭后的第一宿站。过此则分往各地，故两粤客来之民，问其始居之地，多以珠玑巷对，因为在他们祖先入粤以前，迁徙的经过，多难记忆了。我于民国三十三年夏经过其地，曾下车访问吾族故事，虽市井依然，而三百年前之事，已不知沧桑几变矣！因偶成鹧鸪天一阕，以志感慨：

五十江湖作漫游，珠玑巷里溯源流。沾身粤海丝丝雨，极目中原点点愁。 寻旧迹。几荒坵，老鸦啼彻

破墙头。欲知数百年前事，梅岭花开几度秋。

我族初到容县时，当地人口，极为稀少，邻村各族姓可考的仅有数家，亦大都自异地迁来。康熙、乾隆以后，人口渐增，读书之风颇盛。我族世有科名，因而开府作宰，亦代不乏人，我黄氏遂蔚为县中之望族。

先祖印川公，讳金韶，生子五人，女一人。先父少颠公讳玉梁，为先祖父之第三子。吾母出同里钟姓，生我兄弟五人，绍端、绍彦、绍琦、绍竦和我，及姊二人，妹三人。我生于前清光绪二十一年，时正甲午中日战争的后一年。吾父颖悟过人，幼年为邑秀才，光绪丁酉年（二十三年）举孝廉不仕。家居除孝亲教子外，则博览群书，并习农工百艺以自娱。盖愤异族之侵凌，仕途之污浊也，故号少颠。又悔误拾科名也，别署中变，都是表示不入仕途的意思。吾父精医理，尝说："良医之功，媲于良相，为用虽殊，其救人济世之义则一也。"对于求医的人，人不分贫富，时不分昼夜，无不随请随往，且不受诊金，贫苦无力的，并赠以药品。应诊数十年，活人甚众。曾有乡人和吾父过去有些怨隙，患病甚重，许多医生都束手谢绝，请吾父前往诊治。当时有人说："此人对君无情意，可以不必理他。"父怫然曰："是何言也？医乃仁术，未有仁而见危不救者，彼虽对我有小怨，我决不能在他病时，存报怨的心思。而且行医的人，对于人家的病，和自己的病一样，自己生病，能不急急求治么？"随即迅速前往，诊察安慰，倍加用心。这人病愈后，感激涕零，前隙尽泯。其在乡间行事，大都如是，至今乡人犹怀念不忘。

庚子国变后容县兴学情形 光绪二十七年，吾父游广州，适值庚子八国联军入京，辛丑辱国条约签定的时候。当时舆情愤激，维新图强之议，又嚣然而起。清廷亦痛定思痛，于是年秋下诏兴学，稍改戊戌政变后的复古风气。吾父知科举将废，新学必兴，乃在粤聘教师二人，回乡教学，设馆于故居之万松山房，而自为馆长，以谭师荔垣课国文，罗师子岳课英文、算学。谭罗两师在

粤颇负时誉，常作革新的言论，设馆后，邑中风气，为之丕变。不仅吾族子弟受其薰陶，就是阖邑后进，闻风向往的，亦踵趾相接，实为吾邑兴学之嚆矢。后该馆改为学校，梧州府守某曾题"容莞先声"之匾额致赠，现还悬在校中。

越年，乡间鼠疫流行，谭、罗两师的家属也间有死亡，乃解馆回粤。谭师后任两广高等师范教员，罗师后任美洲某国公使馆参赞。抗战后，广州失守，罗师曾偕其家属避居吾乡，这时他年已七十余岁。每述及吾父，颇深知己之感，而于其生平行事，有为我们所不详知或知不甚确的，得其补正不少。后以老病，卒于吾乡。及今思之，实不胜其今昔之感也！

吾族当每代祖先死后，必为立祠置产，以供每年祭扫及分恤族中贫苦孤独之用，在宗法社会中，实在是一种良好的风俗。吾父则为预防养成子孙倚赖祠产而乏独立进取之精神，又虑因此而酿成族间子弟争分祠产之恶习。爰于光绪二十九年向族中父老建议，划祠产大部分办理学校，定名私立珊粹学堂。吾父自任校长，担任教务的，多为前在万松山房曾受中、英、算教育的学生，或转送到广州、日本再受短期教育的优秀分子。"山咀"和"珊粹"同音，吾父因为山咀两字太俗，乃改用"珊粹"二字。珊粹的意义，至今我还不得其解，殆为山咀之谐音，而暗示其属地意义与族姓意义乎。后又改为珊粹高等小学，随办初级中学及高级中学，已成为乡间教育的中心。但因学校扩充，而学校经费，则日益困难。近年由三兄仲庵（绍琦）主持其事，提议尽将各代祠产，拨归学校，祖祠祭扫，则由学校主办。以前因学校为黄氏私立，学生仅收黄氏子弟，或其姻戚子弟，今则无分族姓，无分省县，皆一律招收。本来是祠堂管学校，今则学校管祠堂，以前为私立，今则为公立。这种演变，亦化私为公之别开生面者，吾父有灵，亦当含笑九泉呢！

先君对于儿童教育的见解 吾父对于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尤独具见解。当我兄长辈在万松山房读英文、算学的时候，我虽

六七岁，尚未启蒙，每天但跟随父侧，咿哑认字。吾父常说："儿童读书，不可开始过早，尤不可督教过严。过早过严，皆易伤身心，丧个性，长大必无所成。应等他年龄稍长，智识稍开，然后随其所喜，而善加诱导，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启蒙时，所聘塾师，皆宽厚和平，吾父并劝他们不可轻施夏楚。所选课本，都是极浅近而易于记忆的。我启蒙后一两年间，仅读了几篇三字经和一本史鉴节要，其余的经书，吾父皆认为无用，尤其不适于儿童心理，并不强我诵读。所以在岁数相仿的兄弟辈中，我是读经书最少的一个，亦为受鞭挞最少的一个，至今思之，实为幸事！

我幼时，很会淘气，有一次，将先生的小花瓶里放些水，再用纸团堵塞瓶口，放入火笼（乡下人冬天取暖之用）烧热，水沸气涨，砰然一声，纸团飞跃而出，离瓶甚远。同学多拍手嘻笑。于是把水加多，并将纸团严密堵塞，而置之于烈火之上，料想必有更大的响声，与更远的飞射。不意火烈水沸，瓶子爆炸。先生闻声前来，见而大怒，拿了一根粗绳，对我重重的鞭挞，我痛不能忍，先还希图闪避，后来便抵抗还击。先生恨极了，立刻报告我父，并说要辞馆回去。在尊师重道的当时，我本人也感觉得当前情势的严重，还不晓得我父要作怎样严酷的惩罚，忧惧之至，甚至暗暗打算自杀的计划。我父察知其事，便对先生说："童子无知，痛极反抗，亦人情之常，既然畏罪而图自杀，即是他悔过的表现。而且儿童无隔宿之仇恨，先生不必动怒，请放假三天，让我作些好菜与他吃吃，让他自己去玩玩，三天之后，自然一切旧事都忘记了。先生再慢慢的教导他罢。"先生如言，三天后，仍教读如初。此事留给我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使我终身不能忘怀！至今体验当年的情景，方觉我父对于儿童教育方法的成功，及其精神的伟大，同时亦非常记念我那位勇于受劝真诚教诲的先生。

先君对于儿童心理与生理之认识　我父对于儿童的个性与生

理，至为了解，一任他们作正规的发展，毫不加以阻碍，其见解亦多与世俗不同。尝谓饮食男女，皆生理所必需，男子成年不娶，必自求其爱而恋之，为父母者宜及时为之嫁娶，否则或有逾越礼教之情事发生，父母应负其责也。我有一个兄长，已将成年，尚未结婚，不免发生恋爱的行为。我父知道了，并不加以责备，但很迅速的在一两月内，就替他完婚。在旧礼教束缚很严的当时，竟有这样开明的作风，这使我们回想起来，是多么的难得啊！我父富于常识，对农工百艺，都感兴趣，晚年并借此消遣。我也常常跟着学习，往往弄得汗泥满身，斧伤累累，吾父并不稍禁，但随时加以指导。我又喜游泳、打猎及攀高树采果实，登树顶探鸟窠等，视为无上之乐。虽屡遭危险，我父亦仅仅予以指示，使知所提防，绝不因偶遇危险，而永加禁止。彼认为危险乃是旁观者的一种主观揣测，而未必即是主观者（即当事者）的必然事实。有一次，我潜伏水底用手去摸石罅里的鱼，偶不小心，身体为水所浮起，手却被石隙轧住，不能脱出，不由自主的饮了许多水。在这一刹那间，急中生智，竭力使身体下沉，然后将手拔出，虽幸脱险，手背上已伤了好几处。后来为我父所见，问悉原由，仅谓下次要小心，遇到意外，尤宜更加镇定，并无其他呵责。诸如此类危险之事，在我的童年时代，遇到很多，亦从未因此为我父责罚与禁止。盖儿童敢于作某种冒险，即是他对于某种行动，具有若干把握，既有把握，则危险自不易发生，彼自身亦不感觉到有若何危险。我父对于我幼年之冒险行为，不加以过分之拘束，自有其正确之见解。这对于我以后之做事，得到极大之裨益。

在乡下的儿童群众里面，无论是在这一村里的，或者是那一村里的，都各有他们的希望和目的。为达到这希望和目的，自然会发生个人的或群众的竞争或斗争，因而无形中产生了组织和秩序的行动。同时也就产生了一个领导者。我在乡下的儿童群众里面，不论年纪比我小，或比我大一些的，我都可算是一个领导者。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乡下儿童的领导权，完全由于我有一些技术，和敢

冒险，肯努力。当秋天以后，山上野生的果实如野柿、野栗之类，都已经成熟，当然那些易于摘取的，已经为人摘尽，剩下来的，只是生存高树，不易采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食品，虽然儿童们很垂涎，若是没有人能登高攀摘，亦只有望洋兴叹而已。我因为能攀登很高的树，所以这些主要任务，大都是由我包办，而他们只是在地面上作那拾果或剥壳等轻松工作。此外孩子们想吃到一个痛快的野餐，须要把小河里的鱼捉上来，或是把树上的鸟打下来，或是把田地里蕃薯、芋头烧熟来吃，都要有人能够将这些目的物取到手里，才有办法。我会潜水捉鱼，我会用枪打鸟，我也会砌焙烧薯芋的窑灶。这些困难工作，都是我自告奋勇努力地担任。他们只是做些拾柴取水等辅助工作。因此，我有极大的权威，不但可以支配他们的工作，而且可以支配各人应得的收获物。还有这一村的孩子，与那一村的孩子，并不一定是很和睦的。时常因为小事争执，而发生很大的冲实，甚至互相殴斗，我也很勇敢地以身率先，带领和指挥他们去斗争。所以现在我的脸上，还有很多处打伤跌伤的痕迹，左手上面还有上十处被刀斧砍伤的疤痕，这更是我取得小孩们领导权的代价。我现在想想，在小孩子群众里的行动，从大人们看来，也许认为是顽皮，是胡闹，而在小孩子们，确实有他天然的意识和秩序。可是大人、老人们，往往不能了解孩子们、青年们的运动。也可以说大人、老人们忘记了他自己孩子时代和青年时代的一切。

我在万松山房读书的时候，正值地方不靖，盗贼四起，不但较远的地方有明火打劫的强盗，就是我们村庄附近，偷窃的事，也不断发生，那些无业为生的人，不是偷人家的牛，就是偷砍人家的树木出卖，所以弄得附近一带，都变成童山濯濯。这等偷牛偷树的贼，如果被人拿着，就要受游村的刑罚。此种私刑，比官刑惨毒得多。事主将窃犯捆绑起来，满村牵着走，执行的人，手里还拿着一面铜锣，一条藤鞭，敲一声锣，就要那窃犯将自己的姓名及偷某家的某物，高声报告一次。如果不肯报告的话，那藤

鞭就在他背上无情的打下去，打到他报告为止。那时乡村里除了人命官司，或的抗粮造反之外，官府的法令人员，是不容易到达的。一切的权威，都操在有钱有势的绅士手里。这种作法，也不知相传了多少年代，也许以前要比那时更为惨酷。有一日，我们听了锣响，跑出去看，看见那被判游村的窃犯，就是我们远房的伯父，已经六十岁了，他的身上已是一条青，一条紫，被打得狼狈不堪。他的儿子正在我家里帮工。我们对他说："你还不去救救你的父亲么？"他说："偷是真偷的，我无钱代他赔，又没有力量和他讲人情，叫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实在为那老者抱不平，恨他儿子太无用，于是同他到我父亲面前，要求向事主方面讲情，才把他解救下来。后来我父亲邀集里中人士，订立一个保护森林的公约，有主的林木，是禁止偷窃砍伐的，但是只限于砍伐树木，至于斩攀树枝及掘取已经砍伐的树根，不在禁止之列，不能作为盗窃的行为。一方面是顾到贫穷的邻人，不至绝了他们生活的路径，一方面那些树枝树根，横竖都要斩伐掘去的，山主的损失，极为有限。自此以后，附近的森林都茂盛起来了，偷盗的事件也就不再发生。十七年，我回乡下去，山上合抱的树很多，青葱可爱，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又一次，我自己的木山起火，燃及邻山，乡公所判处我家受罚。管家的人对我讲，我说："岂有此理，自己受了损失，还要处罚，我一定不服这个公断！"管家人说："如果因为我们有势力，就不受乡约的公断，这乡约就要破坏了，以后谁还肯服从呢？而且这是老太爷手里订下来的。"听他说的理由很充足，使我不能答复，只好照公断受罚。我现在想想：乡间自己订立的公约，比省政府颁下的"放火烧山者枪毙"的命令要有效得多！这就是地方自治的真谛，自治的基础工作。此事虽然很细，扩而充之，即是民主自治的精神。

初进学堂 光绪二十九年，我到族立珊粹小学读书，由初小而高小，在同辈的孩子中，我是旧书根底最差的一个。他们以前请的是旧式塾师，对于四书五经，多半背诵得很熟。很多人为我

担心，恐怕功课跟不上。但是幸运得很，学校里的课程，刚巧改变。课目虽不完全，而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等都有了，读经也有一科，我的经书（书经、孝经）还是在入了学校后才读的，比较赶不上人家。但其他功课都很不错，时时考到第一名。我想这是我不受鞭挞，不读死书的好处。而他们呢，却没有象我这样活泼灵敏，也许是受了旧式教育的影响吧！在那一两年内，族中的长辈，有的是从日本或其他各处留学回来，有的还在留学，因乘暑假之暇，回到家乡来。他们受了文明的洗礼，唯一的特征，是将那垂在背后的辫子剪去。但其中亦有少数保留着的。他们或者我们的心目中，对于这些留学回来还留着辫子的少数人，都认为是顽固的分子。他们对我们说："辫发就是满清奴隶我汉族唯一的象征，也就是外国人贱视中国人的唯一原因，在外国，只有兽类中的猪狗牛马，才拖着一条长尾巴！"这些话，对正在学堂里读书的小朋友讲，是太动听了。于是他们问我们："愿意不愿意剪去这条尾巴？"自然多数都是赞成的了，即有少数不赞成的，也都不敢提出反对的表示。于是他们在口袋里取出剪刀，把十几个小朋友的辫子，都剪去了。有一二个内心不赞成的，也被强迫剪去，追伸手一摸，辫子没有了，不觉放声大哭起来！我因为恐怕父母知道了，要不答应，当夜是偷偷的捏着已经剪断的辫子睡觉，心里盘算着：明天如何去见父亲和母亲，如何答复他们的盘问？当然，这是没法遮掩的事情，也没有话可以分辩。次日一早，这事已传遍了全村，动手替我们剪辫子的兄弟，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我母亲急得哭起来，她说："没有辫子，便不能下科场，入学、中举、中进士，一世的功名就算完了！"她一定要找到那位剪辫子的人负责续回来，就是续不回来，也要照原来蓄辫子的样子，把余发理成前边短后边长的样子，等他长起来，仍旧可以梳回一条辫子。正在难以解决的时候，父亲过来了，他并不发怒，但也不见得很赞成。只是对母亲说："既已剪断，续是续不回了，剪了也省得你朝朝为他们梳头而伤气。顽皮的孩子，梳头是一件苦事，

第一是费事费时，不能忍耐。第二是头发隔三几日不梳，结子很多，勉强把他梳通，有些头发就得硬生生的把它拔下来，使孩子们感到痛苦。男子的梳头，与女子的缠足，都是男女孩子们不愿意的事，而做母亲的必要认为这件是她对子女的日常工作，结果弄得双方都感觉麻烦，实在也是无谓。”这一席话，把这场剪发的风波，就解决了。

故乡鼠疫流行与大哥之死 光绪三十二年，我的大哥患鼠疫死了，这是我父母晚年最伤心的事。大哥名绍端，字佩方，聪明极了，十五岁即考取秀才。后来在万松山房读书，英文、算术，亦为同辈之冠。当年父亲即送其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即在家族小学当教员。他是我父亲唯一的爱子，亦是我父亲唯一的助手。他患病时，父亲用了全付精神替他医治，结果是没有效力。那时候，鼠疫尚无特效药品，真正染到者，无不迅速死亡。但是在我父亲的脑筋里头，总以为是自己用错了药，所以不能治愈。他对于这事，特别的痛心，令他精神失常，甚至忽然晕倒过去。他后来常常说：“良巫之子，多死于鬼，良医之子，多死于病！”不知是他自慰的意思呢？还是他自怨的说法？

当时防治鼠疫的方法 乡间的鼠疫是太可怕了！前后继续发生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国十年之后，才告绝迹，当时蔓延甚广，每一个乡村，都被波及，究竟死了多少人，在那时人口生命尚无统计，自不知道确实的数字。不过据我所知，数目是相当的大，有些是全家人都染疫死亡，致令邻近的村坊，都失去繁荣兴盛的气象！据说：“其时广州正有鼠疫发生，或者有人传染了回来，或者是老鼠疫蚤随货物过来，而由容县城间接传到了乡间。”乡下人对于鼠疫，没有近代的科学知识，从事防避，多半借鬼神以驱疫，所以死亡特别的多。但鬼神的说法，若以科学的眼光来分析，亦有很多地方与近时防疫方法相近似。譬如说：“疫鬼是怕白色的，家中如发现鼠疫，必须满地洒石灰，疫鬼即不敢到来。”又说：“疫鬼是不敢上楼的，有疫人家必须楼居，晚上要

把楼梯抽去，最好在屋柱上捆以有刺之树叶，则疫鬼更不敢近。”这是现时防疫防蚤之最好方法。其所谓疫鬼者，实即今日所知的疫鼠疫蚤也，凡发现鼠疫的人家，必须立刻搬迁，及至无死鼠发现后，始能搬回。故当时乡间空旷之地，临时住屋甚多，皆为避鼠疫而造者，富有之家，甚至有二三处者，以便再次迁避。至乡间旧例，死人必须停尸三日候亲属到临举哀，但对于患鼠疫死者，在重病时，即须隔离，死后即殓即葬，并不等候亲属到来。举凡种种防疫办法，虽皆以鬼神为对象，而实多合乎科学的道理。想神道设教之用意，无非为使无知愚民易知易行耳。但不知此种方法，为何时何人所发明，而当时更无人能以科学的道理解释而充实之，这实在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投考陆军小学　光绪三十四年，我已十三岁，那年桂林陆军小学招生，父亲的意思，是叫四兄天择（绍竦）去考，他年龄比我长一岁多，身体也比我壮健，颇合应考的条件。我对陆军也极感兴趣，要求父亲准许我同去，父亲因我年龄不足，身体太小，未即允许，而我去志甚坚，为此哭了一日，饮食也不进。父亲见我意志坚决，不忍过于遏抑，也就答应下来。但我兄弟二人，刚到容县城，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相继崩逝之耗，即传至乡间。父亲因恐有事变发生，派人到城，追我兄弟回去。旋溥仪继统，父亲知时局已安定了，乃于宣统元年春，命次兄永邦（绍彦）携我兄弟同赴桂林。以上所述，为我的家世及我幼年时代可以回忆的种种事实。

二　离家求学及随军北伐

初到桂林　由容县去桂林，在我童年时代，走的都是水路。从县城坐北流江的民船，顺流经藤县，入西江，而到梧州。再换桂江民船，逆流而上，大约需要二十余日，方可到达桂林。沿西江一带人士到桂林，都叫做上省，到广州都叫做落省，盖一则顺流而下，一则逆流而上也。

桂林是广西的省会，为全省政治的中心。但是，广西的经济中心，却在梧州。因此，梧州一带的人，在前清时代，除了赶科举的秀才及考学堂的学生之外，很少有人到桂林去。我们去桂林的时候，正是宣统元年的春天。桂林山水甲天下，是一般人都知道的，尤其是在春天，桂江碧绿的水，与两岸秀拔的山，交相辉映，而更觉其美丽。二十多日的逆水行舟，应该越久越觉得气闷，可是在桂林的江上，是越到最后越觉得有趣。所以在桂林江上坐民船，时间虽然长一些，也并不见厌烦。船到了阳朔，奇峰起伏，江水萦回，舟子指东说西，滔滔不绝，使你耳目应接不暇。想起"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话，是相当正确的。我们到了桂林，陆军小学新生考期已过。其他的学堂尚未招考。日中无事，就去游山。独秀峰是首先登临的目标，这里可对桂林的轮廓，先得到一个印象。其余如风洞山、七星岩、象鼻山、伏波岩、月牙山、老君洞、天子田等，都是初到桂林的人，半月里就要游遍的。那时桂林的客寓，约分为客栈与试馆两种。客栈是按日计费的，住者多半为临时过往的客人。试馆是按月计

费的，住者多半是比较久留的客人。试馆的意义，是为来省考试的秀才童生而设的。后来科举废了，试馆便成为通学学生的宿舍，因此，就有改用学生寄宿舍的新名词，以广招徕的。我们一到，便租试馆来住。那时生活程度极低。普通的试馆，每月食宿仅费毫洋二元七角，最贵的不过三元六角，就很讲究了。一个学生一年全部的费用六、七十元，已很充裕。较之今日桂林生活费之昂贵，真有天渊之别。

考取兑泽高等小学 到桂林不久，天择四兄考取了桂林中学，我考取了兑泽高等小学。桂林学校，办理较迟，光绪三十年，两等小学只有三所。临桂两等为县办的。蒙泉高小，在城南蒙泉书院；兑泽高小，在北门之铁佛寺。这两校系由提学使直接办理，似属于省办者。但课程设备，比到我们族中的珊粹高等小学，似乎还赶不上。全校仅有教师二人，为莫师如清、如达兄弟。后来铁佛寺改为模范监狱，该校又迁至后贡街之大佛寺。盖当时桂林除陆军小学外，还没有一所新建的小学校舍，大概皆由庙宇临时改用的。我进兑泽小学半年许，兑泽与蒙泉两校合并为广西模范小学，校址设于皇城内，系将旧贡院全部拆去，而重新建筑者。除中间留作广西咨议局外，右边为模范小学，即现时广西绥靖公署地址，左边为初级师范，即现时广西省政府地址。规模之大，为全省冠，亦可见当时地方当局废科举兴学校之热心也。

永邦二兄送我们去考学校，等我们考取之后，他就回去了。临行时，只交下毫洋三十元。他说："要用到暑假，家里才有钱寄来，你们要节省点使用。"在以前，一切的用费，都是由他经理，每月要用多少钱，我们一些也不知道，现在离开了家乡，变换了环境，当然更不晓得每月开支的数字，对于他的吩咐，只好接受下来。于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子，就单独的开始学生的异乡生活。同我一齐考入兑泽小学的，还有我一个堂兄次轩，他仅比我大几个月。到了学校里，认识两个藤县的同学，一个叫

蒙圣球，一个叫何强，全个学校里，除了我们四人是说白话的下府人，其余的都是说官话的桂林人或湖南人。语言是人类的界限，我们少数孤立的，就往往被多数的欺弄奚落。但我在两 三 个 月内，已经迅速地学得很好的桂林话，打破了语言的界限，情形也就好转起来了。那时都是走读，我住的地方，离学校还有两里多路。朝去晚回，在晴天虽不觉得怎样，但在春天，桂林的雨特别多，连日不断的下来，我只有一件蓝布的长褂子，算是当时的制服（那时不准穿短衣上学）每天都得穿出去，弄得泥浆满身。当晚那来洗涤功夫，次早带湿，也得穿去上学。我们住的自然是那三等的试馆，公共伙食，比之现在抗战期内的公务员虽好得多，但是，刻板的几样菜，吃久了，也要生厌。一个礼拜内，拿一角钱加炒一大盘酸菜牛肉，或两三角钱买一只鸡吃吃，也是不可少的。那时桂林尚未有戏园，有两个桂林戏班，一个叫人和班，一个叫瑞祥班。唱戏都在各省的会馆内，这些戏班都是供各省在桂的官员或商人宴会时之用（即堂会），但却是开放的，任由老百姓前去看戏。遇到礼拜日，我也常常去看，有钱时，就拿一个铜板买一个高凳位子（系私人出租的）坐着看；没钱时，便在人丛里挤来挤去。看戏虽然不用钱，但看见西厢上戴着 缨 帽 穿着袍褂的官，坐着吃着的看，心中却有些不平与 难 过！ 到了宣统二年，桂林最早成立的景福戏院开幕了。（在凤凰街的横巷内）这些班子都归到那里去唱，出钱买票，才有戏看。从此这种平民的利益，就完全被剥夺了。那时候瑞祥班有一个花旦，叫做“鸭蛋”，我总以为他的面孔生得象鸭蛋一样，所以叫做“鸭蛋”。前几年到桂林，与马君武等看桂戏，说起“鸭蛋”的事。他说：“因为他唱得最好，长得最漂亮，能压倒一切的花旦，所 以 叫 做‘压旦’。‘鸭蛋’与‘压旦’同音，你听错了！”我不觉大笑。他说：“这人姓林，已六十多岁，还健在。”有人提议要他出唱一次与我看看。我说：“人老珠黄不值钱，而且要一个六十老翁在台上男扮女装，作那扭捏的姿态，来娱我们的耳目，不但不雅，亦且

不忍。”这个提议，就打消了。

我们的三十块钱，不到暑假，早就用光了！还欠一个多月的房饭钱。试馆老板对我们说：“再不交钱，就要停公食了。”这个最后的警告，迫得我们走头无路。幸亏堂兄次轩他还有两件绸缎的衣服，只好请老板带他去上一上当铺，渡过这个难关。距暑假还有两个多月，家里又没有钱寄来，怎样办呢？不得已找一个同乡，在另外一个小学教书的梁朝辅先生处，借了二十元，这是我生平向人借钱的第一次。在未开口之前，心里非常难过，总怕人家不肯，即使肯了，又怕家中不认帐。但是事情出我意料之外，一说就肯了。他并且说：“你们的钱，的确不够用，应该早些写信回家，说明详情，一定会寄来的。”他为我们解释了心中的疑虑，解决了当前的困难，直到后来，我还时刻记得他。因为那时候，我对于这事的印象，是太深了！

广西咨议局系于宣统二年成立，这是满清实行立宪的初步准备。地址设在皇城正中，建筑极为庄严，实足象征民意之光明正大。各县皆举有议员一人，容县议员为黄用溥先生，新学非常渊博，极为青年所信仰，亦最为顽固派所反对。他与藤县议员蒙民伟先生所提之迁省南宁案，在当时曾发生重要争辩。议长为岑溪陈太史竹铭，我于民国廿九年回桂，参加广西省临时参议会，开幕时，陈太史犹任副议长，与民元后之省议会议长姚健生、张一气两先生，同为参议员。聚清末及民国二十余年之历届议长、议员于一堂，亦议坛之佳话也。

广西兴学的两大纪念　广西创办最早之学校，要算桂林文昌门外体用学堂，又名大学堂，顾名思义，当系采取维新初期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当时内容，颇为简单，制度亦未确定，宣统后，乃改为优级师范。在广西兴学初期的教师，多为该校所养成，对广西教育贡献颇大。此系光绪二十四年桂抚黄槐森氏所创办。其次则为二十五年梧州中西学堂，胡汉民先生曾在该校任教席，实为广西兴学之两大纪念也。海丰张鸣岐氏，

于光绪三十二年抚桂，彼曾任两广学务处督办，对于广西学务，进行甚为积极，提学使李翰芬氏，对办学亦有计划。计先后由其完成及创办者，有法政学堂、警察学堂及警察教练所、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模范小学、陆军小学、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等，都在光绪末年及宣统元、二、三年，相继开办，规模皆颇宏伟。尤能于省外国外，延致名师，担任教授。对广西教育基础之建立，自具相当功绩。正在兴学高潮膨胀之际，忽有恢复科举之传说，其原因为宣统元年举行最后之拔贡考试。一时热中科名者，无不弹冠相庆，实为兴学期之一桩趣闻。

容县学风兴盛的地理原因 容县在桂林读书的学生很多，所以有“无容不成校”之语，不但省内如此，即在省外、国外，桂籍之留学生，亦以容县人为多。究其原因，为容县兴学得风气之先，光绪三十二年，已成立六十余校；其次则因地少人多，（据最近清丈，全县耕地仅二十四万亩，人口则有三十二万。）谋生不易，不能不向外以求发展。当光绪中叶时候，有许多穷困的人，因迫于生计，流为盗匪，地方发生纷乱。清廷派酷吏鲍某茹某，前后来宰是邑，皆以嗜杀著名。因而稍涉嫌疑之贫穷丁壮，则流走南洋，以谋生路。留县之小地主、自耕农，鉴于耕种之不能温饱，乃多变产令子弟外出求学，以图发展。父兄对此，必先估计子弟求学时用费若干，毕业后每年收入若干，多少年后可以将所变之产业赎回，皆有预定计划，按步实施。所以容县学生贫苦者占多数，而成功者亦以清寒子弟为多。但当时在桂林，容县之学生虽多，而在衙门做事的极少。据我所知、仅封励吾，封濯吾，叶君闿三人，彼等皆留学日本，在提学使司充当类似督学之职务。后来封励吾先生派充模范小学校长，我隶其门下者约半年。

考取陆军小学 宣统二年春，陆军小学第四期招生，我去应考，侥幸录取了。以前我痛哭绝食，要求父母到桂林的唯一目的，终于达到了。当时我是如何的快活呵！但是临入校的时候，忽又起了徘徊不定的念头，和莫名其妙的悲感。好象入了陆军学

堂就与父母永远不易会面的样子！后来经好多人劝导，我才入校。这是我一生事业起点的学校，地址在文昌门外，一切建筑，都是有计划而很宏伟的。可惜学校停办以后，这座庄严的黉舍，却逐渐崩坏了。我时常恋念着，前几年曾向李德邻（宗仁）、白健生（崇禧）①诸兄建议，应就学校旧址，建筑忠烈祠，为我们军事的母校留一个永远的纪念。

满清的陆军教育制度 满清的陆军建设，极有步骤。单就培养陆军干部而言，能从基本着手。陆军小学即是培养军官的基础，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中学，又两年毕业后，再入伍半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开始分科教育，一年半毕业，合计由陆军小学至军官学校毕业需要整整七年的时间。中间几经选拔和淘汰，最后才造成一个下级军官，自然健全可用了。这种制度，不但满清承数千年积弱之后，应该如此，就是现在，我也主张如此。因为外国的陆军，无不有其百数十年的久远历史。再加以近代国民的教育，与国民体格之健全，自无须再由陆军小学入手。中国陆军基础尚未建立，而又加三十余年的内外战争，无论在国民教育方面，国民体格方面，都受了极大的阻碍，影响于军事干部之基础甚深。故今后建军工作，仍须在深培基础上注意也。

我在陆军小学一年多当中，除了精神生活习惯，日渐军事化之外，军事学术，是很简单而肤浅的。而普通的课程却居于主要的地位，其程度约等于普通的旧制中学。原来设立陆军小学，有两个目的：第一是锻炼学生的军人体格精神与生活习惯。第二是培养学生将来在军事学术上必须具有之自然科学基础。此两种目的，由陆军小学直到陆军中学，都是一贯不变的。

广西初期革命情形和建军历史 在学校期间，我平日耳所闻与目所见的，无非当时在桂林之新军人物。除了本校的长官之

---

① 白崇禧，字剑生，1921年与夏威、陈雄率部自百色至黔南板坝时，因夜巡堕岩，髀骨跌断，此后将剑生改为健生。（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第42页）

外，如兵备处、督练公所、干部学堂、学兵营等，都是这些新军人会集的机关，而彼此接触的机会也很多，所以对于这班新军人物，无形之中，起了两种感想。第一是他们外表上都很有精神，富有朝气，与旧军防营的腐败军官比较，自然要敬此而恶彼。第二是认为他们都是革命党，到广西来，是阴谋革命推倒满清的，自然更合青年学生的口味。因而许多青年人物，都在不知不觉间，和这班新军人物，融合同化起来，终于成为广西革命的导火线。在这里，我得回溯一段广西革命初期的情形，和新军建立的历史。张鸣岐氏年少有为，引用的新人物中，如胡铭盘治警政，朱文劭任司法，都是当时知名之士。尤其注重的是广西军事的改革，以庄蕴宽为兵备处总办，钮永建为帮办，拟定建立新军的计划。庄、钮二氏复派王勇公招致许多军事人才。属于士官派的，有孙孟戟、陈之骥、赵炎午、覃鎏鑫、田稼轩、雷寿荣、杨曾蔚、唐之道、孔庚、尹昌衡等。属于国内派的有吕公望、冷御秋、刘建藩、耿毅、何遂、钱谟、林之渊、杨明远等，共计二十余人，皆少年新进勇于任事之辈，实为广西革命最初发动之人物。但这班人到了桂林，庄、钮二人，因和张鸣岐意见不洽，先后去职。继其任者为按察使王芝祥兼兵备总办，而会办一席，则由新到的杨曾蔚接任。他们对于建军计划，先办干部学校①，以陈之骥任校长。继又成立学兵营，任孙孟戟为营长。其余和杨、陈同来的人，分配学校及营部，担任教职员。

张鸣岐虽具革新政治之心，对革命排满，却无此大志。但彼时革命思潮，日渐高涨。庄、钮虽去，他们所招致的一班新人物，大都和九龙、香港一带的革命党人黄兴、赵声等，暗通声气，秘密进行革命工作。原定俟干部学校举行毕业，正式成立新军时，开始发动革命。不料在此期内，接连发生几桩事情。第一是办报被封，尹昌衡、覃鎏鑫、吕公望和先时随钮永建同来的赵正平

① 清时称学堂，民国后始称学校。

等，出版指南月刊，为广西最早的定期刊物。覃、尹、赵等分任编辑撰述，吕为经理，第一期出版，销三千余份。因言论激烈被巡警道胡铭盘封闭。又改出南风报，亦只出了一期。因刊载石达开“扬鞭慷慨莅中原，不为仇雠不为恩，只觉苍天方愦愦，莫凭赤手拯元元，三年揽辔悲羸马，万众栖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到处有啼痕”的诗，尹昌衡并在封面插画的竹子叶里，暗暗画成“民族革命”四字，旁边还有一只公鸡，象在啼叫的样子，题为“雄鸡一鸣，天下震动”，又被胡氏觉察，仍行封闭。他们又改出南报。胡氏见他们这样崛强，因自己是嘉兴人，吕公望是永康人，乃以浙江同乡之谊，邀吕前去晤谈，饷以盛餐，劝他们自动停版，不必以脑袋相拼。吕再三要求，乃以先送检查，然后付印为条件，准许他们出版。言论既不自由，办报问题，已实际等于失败。第二是何遂任干部学堂队长，在操场演说革命，一时情绪热烈，群众欢呼。何忽举手指场中天桥，高呼：“有志革命者，可跳此天桥，以示勇敢！”一个学生因跳桥不慎，伤及腿部，事遂外泄。而干部学校，亦便成为政府监视的目标。第三是张氏宴请尹、杨、孙、覃等，席间，张自言：“革命并不是一件奇怪或可怕的事情，本人有志革命，刷新军政，即是广西革命领袖。”说毕，又拿出他新置的手枪，给大家传观，说是革命武器。尹昌衡接枪在手，连放三响，将窗上玻璃击碎。这等举动，原没什么意义，但从假革命的张氏看来，多少有点刺目。当时微笑不语，散席后，每人还致送安南刀一把，以示联欢之意。一班青年人，感情本易冲动，得此异数，还以为张氏真能赞助他们革命，情绪愈加激昂。不料张已暗约龙州讲武堂堂长蔡松坡（锷），及前任陆小校长被学生轰走的蒋伯器（尊簋）秘密到桂林，派蔡为干部校长兼学兵营营长，以去陈之骥、孙孟戟，派蔡任兵备处总办，代王芝祥。并以随蒋同来的董吉生（绍箕）为陆小监督，斯夔磬（烈）为提调，而将原任陆小监督的雷寿荣和兵备处经理科长孔庚，先后拘捕扣押起来。一班青年志士始知上了张的大当，一时大为不平。王勇

公时任干部学校教员，竟赴兵备处，与蒋力争。蒋至抚署谒张请示，不得要领。张并言，明日当开军法会审。此言传出，群情愈加愤激，吕公望备夜见蒋，长跪两小时，力求转圜。蒋说："大帅已吩咐下来，明天砍几个脑袋给大家看看，恐怕不易挽回。"吕涕泣陈词说："我辈在浙江时，闻秋瑾女士说总办是革命同志，所以全体热诚拥护总办。现同志们有杀身之祸，无论如何，要请总办援救。"蒋沉思良久，乃言："我实没有办法，你可去求求王芝祥。他的资格比我老，或者可以说话。"吕复同王勇公、孙孟戟、陈之骥三人，连夜谒王，苦求设法，王先有难色，后来见他们恳切情形，心为之动，即毅然说："难得你们有这样义气，好好，拼我老面子不要，替你们去碰一碰看。"漏夜赴抚署，和张氏磋商良久，议定条件：限这班青年人于两月内全部离桂。特别指定陈之骥，杨曾蔚、王勇公、孙孟戟四人，在三天内先行离开桂林。王将此意转达，并劝他们服从，一场风波，也就此消弭。但广西革命经这班人的鼓动提倡，一般青年，尤其是学兵营及干校学生，脑海中已注满了革命思潮，都在磨拳擦掌，等待时机的到来。

一个革命的小团体　辛亥宣统三年，首有温生才之炸广州将军凤山，继而有三月廿九日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的成仁。消息频传，益发震动了桂林每一个青年学生的脑筋。在陆军小学学生里，由于平时言论意志之相同，进而为团体之结合。我与胡驰冀，夏威、黄镇远、黄克绥、冯镇邦、陆受祺、栗镇国等八人在近松园小酒馆内，经过了一次歃血式的痛饮，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后在城北荒僻的园中租了一个小房子，作为一个聚会处所，每星期大家都要到那里去集会一次。一班小孩子，既无凭藉，又鲜经验，除了酒酣耳热，作一些慷慨激昂的言论外，也想不出好办法，但这也算得我等未来献身国家致力革命的一个起点。这年的暑假，我约同夏威君同去广州湾一行。目的是广州湾可以运军火，且由容县经高州、化州到广州湾，路近我等家乡，而又偏僻，不易为人

注意也。回到家里，支支吾吾的对父亲说要去广州湾的话。经父亲一再盘诘，遂以实告。父亲说："革命革命，不要把自己的头先革去了！十几岁的小孩子，就讲革命，究竟懂得什么叫革命。"其时三兄仲庵正从日本回来，从旁说："听说凡是从日本回来的士官学生，都加入了革命党，革命是一定要爆发的。"父亲不再说什么，我要到广州湾的意思，亦无形中取消了，仍旧回桂林去，照常上课。

广西宣布独立 中秋后，武昌起义了。首义的是第八镇的新军和陆军中学的学生。这消息传来，自然全个桂林都震动了。在以前社会上本来都把新军及陆军学生一概认作革命党。由于武昌首义的参加者，更证明以前的估计非常正确。而新军及陆军学生，亦多以此自命。其时桂林的革命行动，大有山雨欲来之势。武昌方面，有陆军中学同学代表任道方、李作励两人，秘密回到桂林，报告武昌起义情形，人心更为浮动。这时张鸣岐已升任两广总督，继任桂抚沈秉堃，和藩台王芝祥及广西咨议局议长等，见大势所趋，合议响应，乃于九月十七日（农历）宣布广西独立。由咨议局推举沈秉堃为广西都督，王芝祥、陆荣廷为副都督，定期举行庆祝大会。

广西自创办新军后，旧军非常嫉视，宣布独立，旧军多有不赞成者。其中一部分，计划乘庆祝大会的机会，攻击新军和陆军学生。天将拂晓，陆军小学学生整队入城，参加庆祝典礼。行至文昌门，突遭城防的旧军开枪袭击，乃退集于李家村，联合新军与叛军对峙。结果，叛军是被解决了。但从此新旧军意见日深，无法泯除。适湖北方面告急，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希望独立各省，派军赴援。而沈秉堃、王芝祥等亦以新军若出，则旧军易安，因此力主北伐。同时在新军方面，本多革命青年分子，群以参加北伐为荣。乃任命赵炎午为广西北伐军统领，率广西混成军入湘，直趋武汉。其实当时广西混成协仅有步兵三营，骑、炮、工、辎等营队，实力并不充实。

参加学生军随军北伐　自广西宣布独立后，陆军小学已无形陷于停顿状态。我们学生当中有主张请军政府继续办理者。我等则主张全体组织学生军，随军北伐。结果，各行其是。愿意留校的，任其留校，后来加招新生，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愿意北伐者，则组织学生军北伐敢死队。除陆小一部分同学外，其他中学、师范、法政各学校之学生参加者，极为涌跃。因经费及枪械所限，仅组织一队，共一百二十八人，由梁润轩先生任队长，马英武、马子骏、封高英、邓绍伊任排长，黎福桢任特务长。彼等皆系在陆军小学时任学长、助教等职，而为学生所信仰者。陆小同学分任班长，我亦为班长之一。我兄天择以及平时友好，大都参加这个组织。在队员当中，我今日尚可记忆的为胡驰冀、白健生、吕演新，伍展空（廷飏）、夏威、黄星垣、俞作柏、梁瀚嵩、黄晋、庞海鲲、李雅斋、黄镇远、李伟英、吕焕炎、余志芳、梁朝玑、李普生、李少渔、李造时、秦镜、秦益厚、翟宗保、陆受祺、甘象贤、宋豫章、李朝芳、蒙志、黄薰、白书亮、刘崇、黄庠达、黄良、唐瑞菁、郑昌瑢、邱锦源、叶青、梁希斗、罗传英、尹振、陈寿昌、莫奎、林荫鸿、封传璧、冯晓霞、吴于等数十人，其余多不及记忆矣！当我兄弟参加学生敢死队时，族兄曾秘密电知我家。我母非常着急，主张电追我兄弟回家。我父则曰："彼平日已大谈革命，这时何能再阻止其参加，听其自去可也。"

学生军成立后，经过一个星期的训练，即随军出发，并归赵统领炎午指挥。当出发时，桂林各学校排队欢送，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概。乘民船经祁阳、衡阳、湘潭而至长沙，换乘轮船，至洞庭湖，入长江，至湖北省会武昌西南六十里之金口镇登陆。时清兵已据汉口汉阳，与武昌革命军隔江相峙。广西北伐军奉令担负左翼军的任务，由金口渡江，经大集镇蔡甸，威胁清军侧后。旋清军向孝感撤退，我军更渡过襄河左岸，经汉川县茅神渡，折而向东，直趋孝感县。至时，清军已退至武胜关以北矣。这时，南北议和，我军停止于孝感附近。和议

告成，民国成立，军事行动乃告一段落。

计自十月初旬，由桂林出发，沿途都没有停滞。在不满两月的时候，军行三千余里。其赴援之急，士气之旺，可以想见。尤以学生军系临时组合，半数为普通学生，事前皆未训练，沿途稍得休息时间，即为补助训练机会，比到同行的新军，其装具武器之负荷，行军程途之远近，及一切任务之担任，各事都是一律，并无些微差别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我学生军无一落后者，即生病者亦绝少。此皆由于革命精神所驱使，而不由自主者也。这次，广西北伐军在左翼，除了前哨一二次小接触外，未有大规模的战斗，自无若何战绩可言，大家都认为非常可惜。在军纪方面，比之其他军队，一般都好。所以沿途民众对广西北伐军都很欢迎。不过在当时军队方面，尚无政治工作人员的组织，所以民众对于军队，仅是一种消极的好感表现，而不是积极的援助。也许是民众在满清数百年积威之下，对于革命尚未完全醒觉的缘故。

和议告成由武汉转赴南京　南北和议告成，湖北方面的广西北伐军，及我们学生军，奉令调到南京。在民国元年的一月里，由孝感县乘火车到汉口，我们这些广西的孩子们，都是第一次见火车，第一次乘火车，大家都感觉得非常惊奇与快乐。武汉是革命首义的地方，而又为中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以前都深印在每一个人的脑中，一旦到来，自然都要多方的瞻仰。其时租界尚不许带武器（即带刺刀）士兵进去，我们仅能在中国地界里行走。又因作战时，房屋多为清兵所焚烧，除了很少的一部分外，其余都是残砖破壁，满目苍凉。劫后的市民，正在瓦砾堆中，搭起临时的家屋，以重建他们的生活基地。在他们的心中，对于清兵固然痛恨，而对于革命军，亦不见得很欢迎。因为他们的财产，是由打仗而牺牲的呀！我们过江，到武昌城，第一个游览的目标就是黄鹤楼。这是武汉在历史上富有诗意的名胜，在小时读诗的时候，就留有一个深刻的印象。登楼四顾，“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诗境，毕现眼前，胸襟为之一开。尤其对于

武汉三镇烟囱林立的工厂，望得出神，听说这些工厂，多半是南皮张之洞所手创，无形中就对他起了衷心的景仰。第二个目标，就是起义门。这是由湖南方面第八镇新军及陆军中学生首先进入武昌的城门。在其右侧的楚望台上，曾经架炮轰击两湖总督衙门，掩护步兵进攻。致使两湖总督瑞澂仓皇逃走，完成武昌城的占领。这种历时不久的革命史迹，是多么令我们注意与怀念啊！在汉口停留三日，乃坐长江的民船，用轮船拖带下南京。沿途浩浩荡荡，每经过一个名胜地点，如田家镇、湖口、小孤山、采石矶等处，都使我们发生一种历史的回想。到了南京，这种感想，就更加兴奋了。南京是前明及洪杨时代民族革命的首都，今日又为民国民族革命的首都，其意义之重大，与名胜古迹之多，又远非武汉所能及。我队初到，驻在小营，即陆军小学旧址。后又迁至鼓楼南小桃园之端方公馆。一个满清显宦的安乐窝，忽然变作我们小兵的驻所，真是革命军人最得意的报酬了。日常无事，则结队遍游城里城外之胜迹。明故宫、明孝陵、灵谷寺、雨花台、莫愁湖、鸡鸣寺、秦淮河、清凉山等，都为我们初到时首先畅游之地。

广西北伐军随后出发者，尚有两部：一为陈裕时统率之邕龙两标（每标约等一团），此部系蔡松坡在桂时，以旧防营改为新军者，龙觐光、陈炳焜曾任标统。因分驻于南宁、龙州两地，故以邕龙标称之。这两标系由西江乘船至广州，再乘海轮北上。到达南京，在我们之前。曾参加天宝城之攻击，以勇敢善战，为当时所称许。另一部为藩台王芝祥统率防营六大队（每大队约五百人），系由湖南、湖北沿江而下者，到达南京，在我等之后。因纪律不佳，在小营被全部缴械。其后以各部桂军合编为陆军第八师，由陈之骥任师长，赵炎午、陈裕时分任旅长，此即民国二年二次革命时死守南京驰誉全国之八桂子弟也。

度过流浪生活后再进陆军预备学校 广西学生军敢死队以任务完毕，宣告解散。全体队员转送入南京入伍生队，以为升入军

官学校造成军官之准备。但队员中有许多普通学生，不愿从军而仍愿继续其未来学业者，故在南京入伍者仅半数有余耳。南京入伍生队为各省学生军合并而成，共约一千数百人。沈静氏（靖侯）为总队长。分步、骑、炮、工、辎各科。我分在骑兵科，入骑兵队。不久，因队中官长多为他省陆军小学的同学，学识与我差不多，而且又没有部队之实际经验。全部仅有马数匹，设备多不完全，所以我对前途，非常失望。乃请求退出广西学生军队员，同时请求退出者甚多，四兄天择亦其中之一也。

我自退出入伍生队，一个十六七岁的青年既无书可读，又不能做事。而我又不愿在一无成就之时，回到老家去，致愧对我的父母。甚至我所需用的旅费，亦不敢在家信中提及。在南京流浪了两三个月，情绪至为无聊。其时我族兄剑鸣及陆军中学同学朱良祺、李孟庸等，同在湖北都督府当参谋。我毫无目的地，又跑到武昌去，同他们住在蛇山南麓的两广会馆，仍旧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一个月只有二十串钱的薪水，而且是一月拖一月的，才能够领下来，自己已经够苦，再加上供应我的食用，自然更困难了。是以常常弄到朝不保夕，有饭无菜的过着艰苦的日子。到了秋天，南京入伍生队奉令改为陆军第二预备学校，设在武昌南湖。以前湖北、南京、清河各陆军中学未毕业学生，改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设在清河（北平北四十里）。南京入伍生都到武昌集合，剑鸣兄亦准备北上入学。我这时才追悔当时不应该孟浪请退，以至弄到进退维谷。后来由剑鸣兄设法，并得李抱冰先生的帮忙，乃得复学。数月来流浪生活，始告结束。而我在流浪期间所受之教训，亦最深刻。所以我入学之后，就抱定宗旨，不闹风潮，不参加政治活动。一直到军官学校，我这宗旨，都未变过。因为我曾经受过深刻的生活教训，自己学业未成，不特不能遂行自己的主张，即生活亦要受种种压迫也。

陆军预备学校即以前陆军中学之变相，课程有国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辩学、图画、几何、三角、代数、步兵操

典、外国文（分英、德、日、法、俄五种，任择一种），其程度约等于今日高中及大学的一年级，两年毕业。因入伍生队的学生程度参差不齐，有陆军小学未毕业，或仅高等小学程度者，乃加三个月的补习课程，并举行甄别考试，始正式上课。一切设备，皆极完全，教员亦多饱学之士，所以在短短的两年当中，将全部课程教完毕业。考试时，全般的成绩，亦都不坏。这不能不归功于师长之热心教导，和军事管理的严密了。

我在陆军小学时，学的是英文。到了陆军预备学校，因羡慕德国的陆军，乃改学德文。起初教我们的是一个德国人格拉氏先生，当我二十六年主政湖北时，他尚侨居武昌，曾来看我，已是七十余岁的老翁了。以前陆军学堂对外国文非常重视，由小学中学，一直到军官学校，外国文都占很多的钟点，用意是在养成能通达国际形势的国防干部。可惜同学中精深的很少，而我更是中途弃置，及今思之，尚深悔憾！

国文也是学校里很重视的一科，但是课本的取材与教授的方法，是太不合理了。我记得在陆军小学的时候，开讲头一篇国文，就是太史公的《项羽本纪》。到了陆军预备学校，头一篇是庄子的《秋水》，其余都是唐宋各大家的古文。教授这种文字的意义如何，现在想起来还是莫明其妙。当时教授国文，大约是明理第一，文法还在其次。我对于古文，也曾下过苦功去揣摸简练，想仿效某一家某一篇的作法，但是画虎不成，反而类狗，白费许多脑筋，总不能有所进益。后来随便读些散文，随着自己意思，自由写作，倒反觉得易于进步。那时候新文化运动尚未发生，一切的记述，都要带些古文意味，才可入眼。有一个同学名叫黄良，他把校长金永炎先生的训话，用湘北的语调，或北京调，描写出来，里头有很多"咱们"、"你家"、"要不得"、"么子"等字样，这篇详尽而很生动的日记，呈上去，教官打了很多的叉叉，同学们当作一个笑话来讲。现在想起来，实在倒是语体文字的先锋。

人类的意识，多是后天环境形成，而不是先天所具备的。我之

所以反对旧学，信仰新学，是因为我自小就未读过旧学，而接近新学的缘故。有些人已经读了旧学，因为受到一种新的实际的刺激，而感觉到旧学的空虚无用，而从事于革新运动。但是他受的损失与困难，就太大了，即就新学中各种科目而言，学生对于某一科的兴趣与认识，都是先由于环境的被动，而转变为内心的主动。我在陆军预备学校的时候，因为听见很多人说国文、历史、地理、化学、物理的重要，所以对于这几门功课，多用一些功夫。到了军官学校，对各种兵的分科，也是听见人说步兵的范围广大重要，所以就志愿学习步兵科。这并不是我不宜于其他各兵科，而是被动的走入步兵科里面去，并认为其他的兵科，都没有很大价值的缘故。所以，我以为国家社会及学术界的先觉者，必须造成一个进步的正确的环境及事实，使后学者有认识，有遵循，而后才可大量发展他们的天才。天才不过是事后的比较的表现而已，决不是先天注定某一个人宜于某一种学科，而不宜于其他学科的。

在陆军预备学校的两年当中，校长换了四位。第一任为金永炎先生，第二任为应龙翔先生，第三任为史国钧先生，第四任是解朝东先生。学生对于学校，总是不满的，总以为换了校长，就可以满足所望，但是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伙食是愈换愈坏，教育用品是愈换愈少，弄到最后，大家都不希望改善，只是希望能够早一些毕业就算了。后来到了军官学校，亦是同一现象。这种情形到处皆然，我不知是中国办事的必然趋势呢？还是学生观念的错误？这真是建国前途的极大障碍！

武汉为革命首义之区，亦为事变最多之地，我在那里住了两年多，中间经过好几次纷扰。武昌长街楼鼓洞时时见到血淋淋的人头，挂在那里示众。有一次，一个湖南人姓蒋的同学，也因为谋乱而被拿去杀了！几几乎危害到全校。在我当时，因为抱定宗旨要把学业修读完毕，所以对于这种变乱的前后因果，一些也不过问，一些也不知道。好在这等变故，结果总是政府当局胜利。所以学校也就平平安安的过去，我也得顺利的读完二年的功课，

而至毕业，真是大幸！

心神不安与回籍奔丧 民国三年的夏天，学校考期已毕，就要放暑假。我忽然感得心神十分不安，同时非常想回家去一趟。而暑假的日期，只有二十日，计算来回的时间，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又恐怕逾期，就要受开除学籍的严厉处分。但是这种顾虑，终遏止不住我的归心，弄得我好似发狂的样子，遂不顾一切，而自行南回。及回到了容县城，方知我父已于半月前逝世了！我得到这个噩耗，痛不欲生。自从我出门求学之后，只回去两次。每次见我父亲，时间都是很短。不料这次短别，竟成永诀，罔极之恩，遂无从报答矣！诸兄因我毕业在即，假期有限，不欲我回来，故不电知我。我亦不自知得何暗示，而毅然遄归，获尽丧葬之礼，亦事之不可解者也。留家仅数日，告窆礼成，即行起程返校，由我家到武林口乘轮船，约三百余里，费两日时间，就赶到了。沿途不停的由香港到了上海。其时正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战争爆发，协约国在黄浦江之海军兵舰，戒备甚严，即行旅者，亦有感觉。到武昌时已逾假数日，学校因战争延长假期，我遂未被开除，可谓不幸之幸！

毕业后的入伍生活 民国三年冬，我毕业于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成绩仅属平平，奉令由汉口乘火车到北平入伍。一个岭南山国的人，初次走进中原的地域，在一望无垠的大地上，驰驱了两千多里，处处都感觉得胸怀的舒服。到了北平，我分发在北苑的陆军第十师入伍，师长是卢永祥，后来他调到上海任淞沪镇守使，不久，又做了浙江省的督军。有些同学，则分发在南苑的陆军第八师，或者是在保定。在各师入伍的同学，并不是集合在一起，而是每一连内，分插数人，与连内的士兵共同生活。但陆军部对入伍的教育，并没有整个的计划，只是任各师官长随便规定，甚至是毫无规定，只是随队出操上讲堂。而当时各师长官，尤其下级官，大多数是行伍出身，根本就不能教育或认真管理我们。各下级官对我们的态度：第一种是客气。因为我们入伍是暂时

的，犯不着认真。第二是妒忌。以为我们将来毕业后，就要争夺他们的饭碗。第三是轻视。他们自己以为有了许多平时、战时的阅历经验就够了，学堂里的科学，在军队里，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入伍，得不到什么良好的效果，仅仅对当时军队里好坏的情形，知道一些，就算挨过了半年入伍的阶段。

那时的北洋陆军，多半是袁氏小站练兵时候将旧军改变而成，在编制与形式上，倒是很整齐划一的。但是内容与技术上，却是很陈旧腐败。高级的将官固然大多数是短期改造的旧军官，中下级干部亦都是随营学习或行伍升充的。我们在队伍里所最恐怖的，就是每一个营连部门口，挂着半截红半截黑的两条军棍（又叫火棍）和两个虎牌，差不多每日都有人要尝着军棍的滋味。视罪过的轻重，定打数的多寡，有的打得要死，大半个月不能将养复元。我们那连的连长，也时常挨打，他被打之后，还笑嘻嘻的对我们说："今天又领了二百。"在他们的心目中对于挨军棍是很平常的事情，好象每月领饷一样，习为惯常，行若无事。有些甚至对我们及士兵说："那一个大官不是由军棍打出来的？"我们想："这种不知羞耻的军官，怎能为国效死力呢？"但是这种刑罚，也有因人而施的模样。学校出身的人，受到的极少。曾听见说："有一个学生出身的军官，因被打军棍而自杀！"想这就是由于学生能够自尊自爱的缘故。

袁世凯要做皇帝，在北洋的军队内，很早就做了政治工作。我们在队伍里，每星期必有一两次的讲道。讲道时候，把袁氏的大照片摆在讲台上；讲道的人，都是穿长袍马褂的文人。讲的内容，都是袁氏已往的功业及在高丽被人炸击不死，可信天命攸归等神话，以及对民国创造的功绩。这种讲演的用意，在我们心里，自然明白。而一般头脑简单的北洋官兵，则不免受他的麻醉。此外还编有一些鼓词歌曲专门诋毁国父及南方反抗他的革命党人。我们听了，不但生气，而且感到肉麻！但就此种办法而论，实开

军队治政工作之先河。在袁氏则叛国称帝，倒行逆施，终无补于失败耳！

民国四年五月九日，我们几个同学正在闲谈，忽然同学尹作翰哭丧着脸，跑来告诉我们说："政府对日本所提二十一条款，已经承认签字了！"好些人听了这话，跟着痛哭起来。我很严正的对他们说："哭有什么用处？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国家的命运。"于是我们这班同学，就开始对袁世凯起了痛根的心理。等到他改元称帝，反对就更加坚决了。

升入保定军官学校 我们在四年六月间，入伍期满了，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的第三期。我们学的是步兵科，这时的校长为曲同丰先生，教育长是杨善德先生，他是老办教育的，相当得到我们学生的信仰。那时在校的学生，有第二第三两期。大多数都是南方人，而且大多数都参加过辛亥革命军事的行动，因此袁政府非常不信任。遂借故将曲校长更换，而调派他的亲信军官模范团团附王汝贤先生来继任校长。军官模范团团长，则由袁氏自兼。团附及干部，皆为其亲信之高级军官，学兵皆由北洋部队保送，或在北方招考者。其目的在养成帝制之陆军干部，以替代军官学校。袁氏死后，始解散。一部改为保定军官学校之后期生。

王校长不学无术，而具有十足官派。初到校，想讨好学生，对于伙食，十分注意，稍有不好，即行棍责厨司。在那时饭食一项，真可是说"空前绝后"的好，是值得我们赞美的。后来因为一位同学偷看顺天时报，被他查出了，便引起一场很大的风波。原来顺天时报是日本人在北平所办的报纸。日本政府暗地里怂恿袁氏称帝，而他们所办的顺天时报，却明显的反对帝制，用种种方法，挑动中国的内战，以遂他吞并的阴谋。王校长以为看顺天时报的人，便是反对帝制的革命党，于是集合全校学生，将那看顺天时报的学生，大打军棍。同学大愤，哄然喊打。王校长见势不佳，退入校本部，并用电话调附近的陆军，将全校包围，所有的枪枝，都缴去了，大炮亦缴去炮栓。每一班都派兵一排，武装监

视，情形严重已极。一直监视了一个星期，见我们没有什么举动，才把兵撤退。从此我们学校就成为一个无武器的军官学校，一直到袁氏死了，才把武器发还。

袁氏死后，王校长也随着调开。继任的校长是由教育长杨善德升充。自从学校缴械风潮发生，有好些同学跑到天津，从事反对帝制的运动，我虽然知道，也有人邀我去，但是我立志要待毕业后，才参加各种工作，都一一婉言辞绝了。袁氏死后，跑到天津的同学，也陆续回来。有的因为旷课过久，而被延期毕业。

求学时代得失的检讨 民国五年的冬天，学校举行毕业考试，我也侥幸得到一张毕业文凭。从此，我的学校生活，便告终结。若讲到学问方面，真是惭愧极了！原来我在陆军预备学校，就没有好好将各种自然科学的基础打好，及到军官学校，更怀了一种错误的观念，以为一个将领，只要勇敢不怕死，战略战术运用得确当，便可以克敌制胜，而忽略了科学技术，与工业物质，乃是国防军事的基本条件。不但我们学生多数如此，即我们的教官先生，也都只见到一科的一方面的技术问题，而缺乏全般的综合的基本指导，这真是数十年来中国国防军事不能进步的主要原因。所以我在军官学校的时候，对于含有自然科学性的几门功课，都非常疏忽。比如兵器学，只认为是学炮兵科的专门技术，而不了解武器在军事上有决定胜败的意义，凡是每一个军官，尤其是高级将领所必须注意研究的；单就一门兵器学它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就包含物理、化学、数学、气象学、地形学等许多基本的学识。若更推想及兵器制造及其来源，则科学的范围，更是广大而重要了。

如前所述，我的观念虽不免有错误的地方，但是对于战略战术，确曾用过一番苦功。不但对学校所定课程，精心研究，即当时出版之此类书籍，我都浏览殆遍。我对战术战略课程，不是分数主义，而是问难主义。有时教官被我弄得很为难，这对我后来应用上得到很多的益处，至于其他的课程，就完全是分数主义了。

必定到了临考试的时候，才拿来翻一翻，把他的要点，加以强记，来应付考试。有些教官，甚至说："只要你不交白卷，总可给你及格的分数。"可以想见我们的乖谬。而担任本课程的教官，亦陷于同样不重视其所授课程的毛病。其实他们的目的，只谋课程纸面上成绩的好看，对于学生真正的学业，根本是不负责任的。

先生授课的热情与学生的学业，关系是很大的。我回想由陆军小学而陆军预备学校而军官学校，许多的教官与先生，除了他所担任课程的基本学问之外，还要有丰富的热情。如果没有丰富的热情，即使有很好的学问，也不容易使学生领受。记得在预备学校的时候，有一位教代数的崔朝庆先生，他的数学，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但是他已经六十多岁，热情是很低落了。一口扬州话，不易听得懂，面貌又怪可怕的。结果，学生都不愿听他的课，自然得不到很好的成绩。反之，另有一位先生，他的学问并不见得很高明，但富于教授的热情与方法，学生都十分愿意听他授课，而收到极好的成绩。因此，我觉得一个好学者，并不一定是一个好先生，学校所需要者，乃是好先生，并不一定是好学者。这种情形，在高中以下学校，尤为显著。

学成回里 毕业后，照例要发到各省各部队去当见习官。虽说由各人志愿，而大部分发回本省。因当时陆军部对于造就之陆军学生，尚未有一个如何使用的计划，而且北洋政府对于军官学生，根本上就不信任，所以分发到各省去，任由各省当局，自由录用。亦即任由这班学生自寻出路的意思。

我于民国五年的年底，乘津浦铁路南下。此路通车不久，一切都很简陋，行车时，颠簸颇为厉害。以与后来行车设备比较，真是差得太远了！到南京，转车上海，完成了一次新的陆路旅行。到了上海，改乘轮船，直驶广州。这时的广东督军为陆荣廷氏，是不久以前从拥护帝制的龙济光手内夺来的，曾经过大半年的战事，战争停止，尚未很久，是即所谓讨龙之役。我到家时，已经腊尽。远方游子，千里归来，天伦之乐，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我

自宣统元年负笈远游，至是整整八年，中间虽经过不少的困难波折，而在学业上，总算告了一个段落。这不仅是我个人稍可自慰，而我泉下的父亲，及堂上的慈母，更给予莫大的安慰啊！

三　在陆谭部下当下级军官

晋省报到　我在家逗留不久，就动身到南宁去报到。南宁是广西新迁的省会，古称邕州，在邕江的北岸。有小汽船，东通梧州，西通龙州与百色，交通颇为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去新省会。由我家乡到南宁，多半先到梧州，再搭轮船西上，经过藤县、平南、桂平、贵县、横县、永淳等县，全程约五百公里，为西江上游最长的航线。可是沿途风景，比之桂江，觉得太平凡了。河道亦平畅易行，只有横县下的伏波滩，最称峻险，破舟伤生之事，时有所闻，行旅至此，多有戒心。滩下常设救生公所，我在十四年时，亦曾于此遇险，其救护至为得力。岸上有马伏波庙，上下船只过滩后，必鸣号以致敬意。马伏波将军在广西之伟绩，仅在一个河滩上，为旅行人所景仰，亦可谓徒见其小耳！

广西迁移省治之事，在宣统三年，咨议局已有人提议。其理由是桂林太偏东北，交通不便，军事政治都难顾及。全省赞成者，多为大河一带的（即梧州、浔州、玉林、南宁、龙州、百色等府属）议员，此为当时咨议局一个重要的争辩案。后因政局改革，遂无结果。民国二年后，陆干卿（荣廷）主政，乃将此案重提。陆氏是南宁武缘县（后改为武鸣）人，主张迁省最力，省会乃随其人而迁至南宁。迨二十五年，又迁回桂林。桂林失去其省会资格者二十三年，至是始又恢复其地位，亦一历史故实也。

陆荣廷在两广势力的发展　在未述我在陆谭部下充当下级干部的情形之前，先得将当时广西的军事政治，作简单的说明。陆

干卿在民元未改革以前，已至提镇地位。当民族革命高潮澎湃的时候，思想上多少要受到一些影响。广西之宣布独立，他自然是一个重要脚色。鼎革之后，各省对于望风使舵宣布独立的满清大吏，多不满其所为，而攻之使去。彼辈亦甚愿趁此下台，作保存生命财产之计。故沈秉堃、王芝祥之离桂，实势所必然（沈以湘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领军出发，至湘，即逗留原籍。王率兵至南京后辞职）。而陆氏以副都督之地位，又为本省人，其受桂林人之拥护而得任都督，亦为非常顺利之事，而无待强求者。同时，广西内部情形，原极单纯。辛亥后，新军及各省之新旧人物多已离桂，陆氏以旧军之领袖，经民国元、二、三、四年之经营，自可成立一个完整之力量。不但为本省所拥护，亦为外间所重视。

袁氏帝制发生，龙济光盘踞广东，逞兵残暴，效忠袁氏。当时唯有陆氏之力量，足以讨龙。唯有广西地位，易于攻粤。所以胡展堂、梁任公诸氏，不惜风尘仆仆，远道入桂，无非要利用陆氏力量与地位，以讨袁讨龙，遂启陆氏军队入粤之始。龙氏既去，陆氏势力，乃更伸张，而至掌握全粤。及护法军兴，力量更发展到湖南。此为陆氏之黄金时代，亦为粤桂战事之开始时期。我认为此种历史之演变，不是出于陆氏等某一个人之本身，而是环境和机会造成之事实，古人所谓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陆、谭（浩明）部下当下级官，由他全盛时期一直到他崩溃时期，虽然处在一个很微末的地位，不能全盘明瞭当时之内幕，但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对于他们命运，都有相当的关系。

其时广西督军为陈炳焜氏，省长为李静诚氏。陆氏于是年春间，入北京觐见黎大总统。出京后，即奉令为两广巡阅使。在表面上虽为酬其讨龙及拥护共和之功绩，其实两广区域，尽在其个人势力范围之下，亦等于顺水人情耳！陆氏回粤后，乃以谭浩明氏为广西督军，陈炳焜则调广东督军，旋又调两广护军使，而以莫荣新氏为广东督军。

陆氏等都是旧军出身的人物，他们的部队自然以旧军为主。

旧军的编制，即系前清所遗下的巡防队的组织。统领统辖两营至六营，帮统统辖两营至五营，督带统辖两营至三营，管带统辖一营，每营分前、后、中、左、右五哨，每哨官兵一百名，设正副哨官，下设哨长，每哨八棚，正哨四棚，副哨四棚，五哨为大营，三哨为小营，边防用大营，内地用小营。以后复将统领等名称改为正司令、副司令。民国初年编为陆军混成旅，嗣后又增编为两个师，皆系将原有巡防营改换名目而已。第一师师长陈炳焜，后改陆裕光（陆氏长子），第二师师长谭浩明。因为编制复杂，即在同队部中，其官兵多寡，亦有不同。所以陆氏当时有多少实力，确数很难知道。不过据估计，民五以前，全部至多不过两万人，民五以后，在粤逐渐扩充，共计不过五万人。这是陆氏兵力的概况。

陆氏时代的政治情形，更无足称述。民元，陆氏以督军兼摄民政，民二至民五之巡按使或省长，如张鸣岐、田承斌、王祖同，皆为袁氏北洋政府所任命，仅张鸣岐任期超过一年。张氏为陆之旧上司，陆氏对之，尚相当敬服。其余任期，皆为数月，且多承陆氏之意旨，以为去留。民五以后，如陈炳焜、刘承恩、李静诚，皆为陆之私人，去留动作，皆唯陆氏之命是听，真如告朔之饩羊耳！

我在桂军第一师见习 我们第三期的毕业同学，都分发在广西陆军第一师见习。当时广西的军队，以防营占大多数。陆裕光的陆军第一师虽号称新军，亦甚腐旧。旅、团长及许多干部，都是旧军翻新的。而且组织不健全，人数不充足，不但第三期新毕业回来的军官学生，无可工作。就是毕业了许久的第一第二期的同学，亦仍在那里充当见习官。所以大家对于前途，非常失望。

一个刚由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总是自视很高，时常抱着一种学校万能课程万能的观念，及到了部队里去，无论是好部队坏部队，都有许多实际问题，与实际生活，是学校里所没有的，非得细心去学习不可，部队长官亦有领导教育的责任，见习的意义就在于此。可是你到一个不健全的部队里去见习，部队长官总是

采用放任的态度，听由你自己去摸索。结果，弄得有些人仅是学得一些军队实际生活，甚至是一种恶生活，而反把学校里所学的基本学术，都荒废了。这种情形，不但是我们那时所感觉到的，就是现在，亦是如此。真是国家与个人的极大损失，以后应当如何去设法补救才好。

和盘珠祁谈治学 我在见习期间，因为空闲无事，常到我同乡盘珠祁先生处谈天。他是前清的秀才，后来到美国去留学回来的。一个秀才，又是一个西洋留学生，很引起我的崇拜。我曾请教他对于修习学问的方法，并介绍一些增长学问的书籍来看看。他答复我说："学问的范围太广泛了。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一不包含有极大之学问。你不要以为我留学回来，便有什么了不得的学问。其实我仅仅是学了一些农业的专门知识，其他学问，种类繁多，不论泥水木匠，和一切农工商矿人等，都各有其专门经验，不是一个人可统统学得了的。正如你在军官学校毕业，在我看来，你就是一个军事专家。但是我相信你在军事范围之内，就未必学得完全，何况其他部门。我以为研究学问，切切不可把学问当成一个神灵，一个偶像，对他迷信，向他膜拜，而只是向很平凡的生活中去追求。能够体察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道理，便是很高深的学问了。你更不要以为我是一个秀才，便有很多中国的旧学问。秀才不过会做两篇八股文章，根本谈不上什么旧学。但即使旧学精通，而此等学问，亦只是在伦理上有一些当时的时代价值。但是到了现代，还有价值的是太少了。你说要介绍学问的书籍，我实在不能指定某一种书可以介绍给你。归根一句话，你所需要的学问，是要你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去追求。"我听了他这一番理论，细细体味，觉得颇有至理。这于我以后为学做事，有极大的裨益。

陆军模范营成立我开始带兵 是年夏间，当局拟创办陆军模范营，为改造旧军之基础。同时因尚有陆大及保定军官学生，也借此设法安置，适马晓军先生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来，颇

为当局所重视，令他负责主持其事。当时广西士官学生，仅彼一人。彼尝以唐人诗句“万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自誉，盖旧军多绿林出身也。

后来模范营对于广西之军事改革，贡献颇多。而陆谭政权最后之消灭，多出当日陆军学生及模范营分子之手。与满清建新军而覆亡于新军者，如出一辙。则又非办理时始虑所及，殆亦为新陈代谢自然之理欤！

陆军模范营成立，即任马晓军为营长，马子骏为营附，罗经为副官，朱为珍、曾志沂、黄旭初、苏端为连长，我与白健生、徐启明、余志芳、郑昌熔、许汉深、夏威、周已任、张守义（即张淦）、阳鉴、况永、阳应照、李先复、潘启坚、杜柏、阳干、况淑、廖光、梁朝玑、黄中聪、徐耀祖、冯毅刚、黄骏等为连附。这种不按编制的许多连附，完全为安置无工作的学生而设的。招考学兵六百余人，多为高小毕业生。并由第一师抽调优秀士兵，先期加以训练，派充班长。故干部士兵程度，水准颇为整齐，实不愧为当时之模范也。

我在第三连充当连附，连长为黄旭初。李先复、潘启坚、杜柏、况永、杨干、况淑①也都充当连附，同在一连，这是我带兵生活之开始。那时我无论在管理方面，训练方面，都很用心去研究学习，经验学术，增进不少。所以在短短的三个月中，颇能把握士兵心理，而得到其信仰。同时由于自己肯勇于负责，故亦颇得同事们的敬佩。

模范营参加护法战争　是年的秋天，模范营奉命出发湖南，由南宁乘汽船到平南、藤县间之蒙江圩登陆，经蒙山、荔浦、阳朔而到达桂林，在桂稍事休息，再经灵川、兴安、全州而到达湖南之零陵。本营因成立未久，训练未完。而学兵皆为学生，

---

①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况淑当时任第四连连附。冯璜当时为学兵。

年轻体弱，官长经验亦少，在长途之强行军中，自然暴露很多的弱点，而以士兵落伍为甚。到达零陵后，奉令留驻永州，继续训练。在永训练期中，营内增编机关枪一队，我与白健生、夏煦苍（威）自己请求调为该队队附。因队长无适当人选，遂不设置，凡事皆由我们三人商量办理。我们因历年同学，而又见解相同，办事颇为顺利，实开部队无首长之先例，亦为奠定此后统一桂局合作精神之基础。不久，三、四两连调祁阳，我乃离队，仍回第三连服务。

护法之役，原起于北洋政府之毁法。一部分国会议员南下，以护法名义，在广州组织军政府。而出兵湖南，则由于湘军之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湘军力薄，屡战不利，被迫退到宝庆及湘南一带，乃联合两广桂军，即利用护法名义，出师北伐。两广桂军亦恐北洋势力南下危及两广之根本，同时亦可再向湖南发展其势力，所以愿意和他们合作，双方真意所在，固不关护法与毁法也。湘军得两广桂军之增援，将北洋军队及汤芗铭驱逐，收复长沙，挺进岳阳以北。谭浩明以广西督军之地位，率两粤桂军入湘，一切均由其支配。到零陵后，被推为护法军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实由其本身力量所造成也。

谭氏抵长沙后，因原有卫队皆为防营旧军，难免贻笑大方。其左右献议，联军总司令部应有训练成熟纪律良好之部队，作为卫队，以壮观瞻。乃令模范营开赴长沙，改为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卫队第一营。升任马晓军为副司令，兼该营营长。陆军模范营名目至是取消。我营到长沙，除担任警卫之外，就是纠察市区之军风纪，颇得市民好评。

我在长沙不久，湘、粤、桂联军就在岳阳羊楼司附近溃败了。溃败的原因，据说第一是吴佩孚部队的增援。吴氏原驻长江上游，对湖南地盘，早思染指，因碍于汤芗铭，而不能下手，汤既被逐，即乘机南下。吴氏所部，号称能战，粤桂联军，自难抵御。第二是由于内部意见不和。盖谭氏不学无术，徒以桂军势

力，遽臻联军统帅地位，自难得湘军之拥戴。加以内幕人才缺乏，对于政治军事，多属外行。因而入湘后种种措施，每为湘人所不满。联军战线，遂形瓦解。自岳阳溃退，直至衡山，方能收拾队伍，略事抵抗。吴军节节进迫，占领衡阳后，复追至祁阳与零陵间之黄姑岭，始行停止。

我营因系卫队，皆未参加战斗。由长沙经湘潭、衡山、衡阳、祁县，退驻零陵之东湘桥。桂军自经此次失败，始渐感旧军之不能作战，对新军观念，稍为改善。因而由我营调去很多学兵，到旧军去充当教练，并调若干官长到部队去当参谋。于是我营人事，颇多更动，黄旭初升为营附，白健生升为第一连连长，张守义升为第二连连长，我升为第三连连长，廖光升为第四连连长，夏煦苍升机关枪队队长，营长仍为马晓军。此民国七年四五月间事也。

东湘桥为零陵、全州间之一小镇，我们在那里驻防训练的时间甚久，也就是我们在军事上建立基础的时期。军民相处，犹如家人，毫无隔阂。民国二十七年，我与白健生由南岳回桂，同到该处，访问士绅徐敬安等，相隔二十年，琐事犹可记忆，彼此皆不胜今昔之感也！

民国八年①的三月间，据说吴佩孚和陆荣廷彼此获得了谅解。吴军退出衡阳，桂军退回桂境。一场护法战争，无声无息中，就算结束了。我营亦于五月间回桂林，旋又开回南宁。我们平日无他嗜好，唯爱马成癖，视马匹无异良友。当排长时，我与白健生、夏煦苍等，人各一骑，互相竞赛。照陆军规则，步兵下级军官，本不准乘马。马营长因此取缔乘马，甚至说要拿刀来斩我们的马脚。但是我们仍多方设法，得以保留。其后在柳州附近，我复以重价购得骏马一匹。由柳州至南宁，沿途多系丘陵波

---

①据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第102页，护法运动于1918年即民国七年结束。

状地，道路宽广，甚合驰骋。我和白健生并辔前驱，行至牛岩圩附近，适值大雨，山洪爆发，路被水淹，有如湖沼一般。我们仍涉水前进，愈进愈深，竟至没顶。健生先我出险，我本能泅，但因全身武装，无由用力，浮沉者再，乃大呼求援。健生喘息之余，亦为武装所累，不能下水。岸上牧人见我求救，反而逃避。我见救援无望，忽生急智，乃闭气下沉，幸足可到地，将武装解除，游至对岸，始得脱险。现在回想，岸上的人见我呼救，反而走避，真是怪事。那里的人对于见义勇为舍身赴难的精神，实在太少了。

进剿左江土匪 当时左江土匪猖獗，同正、扶南、左县、崇善、绥渌等县情势甚急，乃派马晓军率队进剿。初到时，因谍报布置未妥，地形不明，无从着手，土匪劫掠如故。地方人士对于陆军学生所训练之新军，多认为不能剿匪，而横加讥笑。同时各县土匪，总数虽仅有数百，而分帮十余，日散夜聚，最不易找到攻击目标。尤其是在驻有军队附近的匪帮，早已散而归农，无从分别谁是匪，谁是民。我们费了一个月的工夫，将匪情弄清楚，并想出最有效的剿匪方法，是夜间远袭。因为日间进兵，匪皆闻风避去也。第一次夜袭，就选择离我们驻地四十余里从未有军队到过之匪窟㟖午、㟖邓为目标。队伍在夜里十一时出发，经过许多崎岖危险之山隘，到达目的地时，已将拂晓，数十名土匪正在梦中，无法抵抗，而被我们攻破。匪众都匿于附近山地，及黄昏以后，复集合起来，向我驻地袭击。幸警戒严密，不致为其所乘。在很短时间内，就将其击退。但是土匪仅有数十人，而我们使用的兵力，却有三连之多，虽胜不武。次日，在匪村内搜得破枪数枝，并捕获庇匪的村甲长数人。而我们长官与当地的县长，乃多方渲染，向军政当局报捷，竟邀嘉奖。我心中不免暗自叫声惭愧。从此，也就清楚地方政府及防军剿匪，是怎样的以虚伪的情节，向上峰邀功的办法了。不过经此役后，我们知道这种夜间远袭的方法，对剿匪确属有效。土匪根本不能与官军作正式的抵抗，从此乃更

不敢与我队伍对战。以后土匪愈避愈远，我们的部队，遂以连为单位，分开使用，范围亦愈袭愈远。记得有一次，我亲率本连，在一夜之间，行军九十里，远袭匪窠，将其匪首拿获。次日仍回到驻地。所以各连在驻地周围六七十里半径之内，只要侦实股匪踪迹，皆用此法袭击，使股匪不能防备，不能逃避。在两个月之间，就把五属的土匪全部肃清。我们纪律很严，第一是不准烧房屋，第二是不准乱开枪，第三是不准掳财物，当军队入屋搜查时，必要保甲长随同监视。待任务完毕，在未离村之前，必将队伍集合，召集村民，公开检查后，方率队回防。所以人民对于我们部队，非常信任。一有匪踪，无不立刻报告，亦无不立刻派队围捕。统计是役，我营未烧过一间房屋，未妄杀过一个人民，未掳过一分财物。而所有土匪头目，除了两个远走之外，都擒获正法，五属自此以后，平静数年。当我们部队开回南宁时，五属人民皆派代表到营，举行盛大之欢送。甚且有为马营长建生祠者。亦可见人民对我部队印象之佳且深矣！

新军不能剿土匪，为当时社会上之误解。盖旧军军官及士兵多有绿林出身者，对于匪情自然熟悉而易于办理。新军军官皆为学生出身，士兵皆为安分良民，不能稔习匪情，当然不易着手。甚至如武建营（前清光绪年间湖北军队调广西剿游勇）之进剿陆亚发，几至全军覆没。其实，旧军剿匪多与匪通声气，兵来匪去，兵去匪来，为彼此会心的作法。官军则借此邀功，人民乃因此更受其害。最后的办法，则为招安。所以匪愈剿愈多，从来未有过彻底肃清之事实。我们亦深知此次为新军剿匪之尝试，若不努力得到良好之成绩，则新军名誉，更难建立。故在奉命之初，无不兢兢业业，慎重将事。初期亦颇感困难，及后地方情形，日渐熟悉，股匪情报，日渐明瞭，工作亦日渐开展，竟收到良好之效果，亦为此后肃清广西全省匪患之基本实验也。我营自此次剿匪成功后，颇得当局信任，乃升马晓军为陆军第一师第二团团长，与该团原来之两营，共编为三营。仍由马兼任我营营长，开

赴柳州，驻防训练。此民国八年冬间事也。

当时桂军一般的风纪　我们在柳州驻训不到两个月，又奉命开赴广东的肇庆。原因是桂军在粤，时遭粤人与粤军之反对。自陈炯明被迫率部赴闽边后，继任省长为李耀汉氏，亦因种种关系，和桂军不睦。因此，桂军乃派军队向李氏之家乡新兴县进攻。东江方面亦步步增兵，防陈氏之率粤军回粤。我们调肇庆，就是接替林虎所部的防务。我到肇庆的时候，派去新兴天堂打李耀汉的军队，已经胜利回来。他们每队都掳了很多的战利品，衣服布匹，家私用具，猪牛鸡犬等，莫不应有尽有。我曾听见第二军（林虎所部称第二军）一个军官说："从前讨龙之战，有护国军的名义，入湘之战，有护法军的名义，师出有名，所以官兵都很勇敢，纪律亦易维持。这次作战，没有什么名义可言，只有准许他们'发洋财'（即是任意掳掠）才可以鼓励士兵的勇气。"我当时听了他这番理论，对于军队要师出有名，士兵才能勇敢作战，军纪才能确切维持，这一点，甚表同意。至于要以"发洋财"来鼓励士气的办法，未免太矛盾了。我不免为在粤的桂军起了一种忧虑。虽然李耀汉的问题，表面上是解决了，但照这样的作风，如不急加纠正，怕的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也要发生问题出来。这位军官的见解，真可代表当时驻粤桂军的风气。后来东江之役，也因同样的作风，引起东江人民之强烈反抗，而与粤军联合为敌，以致全局失败。所以我认为桂军在粤的失败，不是在兵力的不足，而是在军纪的太坏。不过我得声明，当时桂军亦有一部分军纪是好的。我在广州撤退途中，第一军的士兵，因为掘取人民的番薯，而为军长马济氏所枪决。这等军纪，的确算得严明。不过坏的军队太多，即有少数好军队，亦被反对者一笔抹杀了。

桂军在粤失败的情形　当时桂军在粤共有三个军，第一军马济，驻省城附近，第二军林隐青（虎）驻肇庆西江一带，第三军沈鸿英，驻东江一带。此外尚有刘志陆、申葆藩粤籍桂军。粤军回粤，沈鸿英首受打击，其余各军亦都开赴东江增援。

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氏，于民国九年秋，率师自漳州回粤，倡言粤人治粤。粤人久处桂军积威之下，皆起而响应，桂军中之粤籍部队，大都脱离陆、莫之关系，而倒戈相向。莫荣新氏自动去职，桂军在粤之势力，遂告瓦解。

我们在肇庆住了大半年，约莫中秋节的左右，忽然奉命开赴广州。这是我第二次到广州，与前数年的景况，是大不同了。路面宽阔，交通便利，市面也骤然繁荣了许多，这都是杨畅卿（永泰）、魏邦平等不顾一切阻挠开辟马路的功绩。中国历史上许多奇绩，都是在不顾一切困难的努力中得来的呀！在广州市内住了一夜，第二日的夜里，我连又奉令开赴东郊的农林试验场已取消的军政府内，向瘦狗岭石牌方面，担任警戒。盖当时东江方面桂军着着败退，广州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矣。我在广东大约半个月的时间，东江溃败的桂军，已退到广州附近。将帅意见分岐，兵无斗志，已不能再战，乃分路向北江、西江撤退。我们沿粤汉铁路，经军田银盏坳过四会，向肇庆退却。不意在四会、肇庆间之莲塘坳附近，即遭遇粤军之截击。但旋即为我前方友军击退。我军退至肇庆附近，该处有林隐青所建之洋灰铁筋坚固工程，原拟凭险固守，因粤军尚有一部，从四会经石狗出禄步圩，包抄肇庆之后路。于是又奉令向梧州撤退。此时各高级军官皆乘船先走，各军队伍混乱已极，但我营纪律，仍旧很好。到肇庆峡附近时，住在一个鹅棚内，该处人民，以养鹅业者很多。一棚之内，养鹅数百。后奉令移去，我们第四连一个士兵，将一个活鹅包在军毡内，希图果腹。为廖连长所察觉，而大打军棍。但随后到来之友军，则将鹅棚的鹅，全数掳杀。鹅飞枪响，成为奇观。两军相距不远，相形之下，真使我们啼笑皆非也。入夜友军驻地火光熊熊，到处都是，不稍隐蔽。我对团附黄旭初说："这算是什么？"他说："这就叫做露营火(阵中要务令术语)。"大家相顾而笑。行至禄步圩附近，已有粤军占领禄步圩东南端高地，阻断我们退却路线。未能通过者，尚有万余人，多系由下级

官长统率的队伍。我营除第二连及机枪队外，第一连、第三连、第四连皆未通过，我们三个连长（白、黄、廖）商量结果，决意由右翼向敌侧后进攻，协同正面攻击之韩彩凤、李宗仁等友军作战。激战至黄昏时候，始将敌击退，全部安全通过。这次战事是模范营成立后之首次作战。除第一连因作战时间较长，略有伤亡外，其余皆全师而退。当日间作战之时，闻空际有嗡嗡之声，沿江而上及近，始知为粤军之飞机。飞行甚低，速度甚慢。机上既无机关枪，亦无炸弹，仅用木壳枪向我们疏落的射击。因此，我们不受一些损害，亦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的威力。这是我见到军用飞机的第一次。后来飞到德庆附近，为桂军散兵用步枪击落。可见当日飞机在构造方面，技术方面，尚在幼稚时期，决料想不到今日军事上，会有如此重大的价值。

我们进到禄步圩时，已是黑夜。敌人虽然退去，而大火正在燃烧着，把街市的道路阻塞了，成千成万没有队伍没有官长的兵夫都混做一团。老百姓一个也看不见。打门破扉的声音与枪声火声交响着。我当时觉得通过这屋焚人乱的火线，比通过敌人的火线，还要困难。万一敌人夜里反攻，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这时我连与同营的第一、第四两连，都已失去联络，于是我整顿自己的队伍，官兵手拉手的，紧挨着前进。在我前面的大部队伍，虽已勉强通过了，但队尾及我，终于被大火所隔断，不能不绕道圩后，以致与队伍脱了一节。当我深夜重复回到所取之道路时，在路旁找到了自己的部队。他们正以整齐的队伍，在那里等待着。我问他们："为什么还停留在这里不前进？"他们说："在连长未曾找到之前，我们不能丢开连长而擅自退却！"我在这次退却中，得到很多宝贵的经验，而且很知道我的队伍可用，自信平时的统御训练，是相当成功的。

次日，我们退到悦城圩。这里有座龙母庙，是广东第一个迷信的淫祠。每年阴历五月间的龙母节，东、西、北三江，以及广州、香港的善男信女，都要到这里来进香。相传最灵验是求子

嗣。无子的人，饮了一碗龙母水，就会生子。无论男女，皆有效验。所以龙母庙井水，每碗要卖一毛钱。这年的龙母节，我正在肇庆，在那三数天内，把东、西、北三江的轮船拖渡，不下二百余艘，都集中到那里去。轮拖上满载进香的人，省港澳的大轮船公司，也加开进香专轮，船上鼓乐喧天，笙歌聒耳，把一片广阔的江面，拥挤得水泄不透。真是我所见的空前热闹。他的号召力之大，恐怕超过抗战后的总动员！据说那几天进香的人，总在三十万左右。他们直接间接的费用，也就难以计算。尤其庙祝们收入的数目，更当非常可观。据说：这个赚钱的好差使，必须出很多的钱去奔走钻营，才可以得到呢！

我们那时觉得非常诧异，因为沿途的市镇，都遭受了兵劫，独有悦城是例外。不但那个龙母庙未受士兵糟塌，就是镇上亦丝毫没有损失。那些散乱无纪律的士兵，到了那里，也就自动的拘束起来了。当地的老百姓，更是神态怡然，一点没有惊慌的现象。他们以为这是洞天福地，龙母会保护他们。因此，我深深感觉到中国神道设教的力量，要比政治的力量强大得多。政治的革命，要从迷信的改革着手。换言之，欲完成国家建设，若不在教育和科学的根本上加紧努力，则一切均落空谈，而无裨于实际也。

调驻百色　我们沿西江撤退，到了粤边的都城，精神上才脱离了粤军的威胁。其实当时粤军亦没有能力追至禄步圩以上。其他入粤各军，在是年年底，都退回广西边境，重新部署改编。我们第二团起初调驻桂平。不久，调驻百色。百色是广西西北方面一个冲要的地方，为通云南、贵州两省商业上的重要口岸，亦是滇黔两省烟土及货物入口的集中地点。我们揣度当局调这部新军到百色去，其用意有二：第一、当时贩运鸦片，表面上仍是禁止的，或者需要新军去作禁烟的工作。但是当局绝无彻底禁烟的意思。第二、当局怀疑部分新军人员，会与粤军勾结，所以把他们调至滇黔边境，使与粤边隔绝。这个用意，后来证实了。当民国十年粤桂战事吃紧的时候，只把原来第二团的两营调去作战，而把一

个马团长及原来之模范营，仍留百色，并派蒙仁潜的旧军，同驻一地，形同监视。

当时的百色，是一个最污浊最黑暗的地方，无论什么队伍到来，驻防不久，即有许多商家或商会会长、士绅等相与应酬。在应酬场中，花酒烟赌，是必不可少的。其目的是要得到军队的允许，或协助他们贩运烟土，他们可以给与很大的报酬，甚至可以答应你在运出大批烟土之后，以一小部分作为公开的缉获，使你在公事上讲得过去。百色有句民谣："无烟不成商，无商不是烟。"的确，右江好多条小河轮船，由南宁到百色，终年都载满了各种外来品入口。但是由百色出口时却都是空船，其实并不是空船，而是将烟土秘密装在船的夹层里。所以百色这个地方，从表面上看，一般商业情形，简直是难以维持的，但是他的情形特殊，永久是这样维持下去。无论商人及水陆运输的工人，靠烟土生活的太多了。烟帮有他的组织，有他的自卫武装。由百色出发至云南或贵州时，都是大批棉纱布匹及其他工业品，浩浩荡荡，在白天公开的作合法的行动。由云南或贵州回来，就带了大批烟土，偷偷摸摸，在黑夜里秘密的作违法勾当。他们在途中，如遇到小的阻力，即以武装强行通过，碰到大的阻力，则用贿买疏通的手段，或绕道通过。有时还会勾引士兵盗窃枪械，来加入他的集团。我们的第一连，就发生过这种事情。我同白健生费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力量，才把逃兵的枪枝，追了回来。

百色的瘴气，也非常厉害。滇黔的商人，都要等到秋末才敢到来，春末就要回去。据说：从前有一个镇台，带了两三千湖南兵，来驻百色。一两年后，调防他处，仅仅剩了几个吹号撑旗子的人。不但百色如此，即龙州方面，亦是如此。记得我前一年在左江剿匪，第四连廖连长头一日通报我说："士兵病了三分之一以上！"过了数日，接到他的第二次通报说："病了三分之二！"不久，又来第三次通报说："全部都病了！"请我派兵帮他警戒。随后我第三连的士兵，病的死的，也就不少。于是不能不将

队伍撤退。那次我们在左江剿匪，没有一个士兵阵亡，而病亡的，却在百人以上。我们因为左江有了经验，抵抗力已增强了许多，所以到了百色，染病固仍不免，而死亡率就大为减低。其实这不是瘴气，而完全是恶性疟疾。各地疟蚊，非常之多，一到夏天，即行繁殖。所以滇黔商人，春末回去，原为逃避疟蚊。冬初再来，则疟蚊已绝迹也。（恶性疟疾对于外来的人，特别容易感染，其死亡率也特高。本地人因天然之抵抗力较强，为害较轻）。

革命军西征陆谭政权崩溃 自桂军由粤败退，除了一部分粤籍军官所统率的部队，投降粤军外，其余撤回桂境的，尚有数万人。以广西之贫乏，当然养不起这许多军队。而且战事虽一时停止，政治上根本的矛盾，无法解决，甚至日益增加其程度，潜伏下次战争之机。本来陆氏对北洋政府，早有默契。自此以后，乃更投入北洋政府之怀抱，以自促其最后之崩溃与消灭！

民国九年的冬天，国父开府广州。欲率兵北伐，因桂军与北洋政府勾结，恐其乘机进袭广东根据地。为免除后患计，乃檄调粤、黔、滇之兵，先行讨桂。桂军方面亦积极部署，以陈炳焜出驻梧州，当西江方面。谭浩明出驻玉林，当南路方面。以沈鸿英驻贺县，当北江方面。各路共计尚有四万余人。双方厉兵秣马，一触即发，粤方以革命为号召，师锐气旺，桂方则师出无名，意志消沉，识者早知其不敌也。

民国十年四、五月间，陈炯明亲率粤军第一军，附以江防舰队及飞机数架，溯江西上，集于都城（粤境，梧州下九十里），首破大坡山桂军防线，直趋戎圩（梧州上游十里）。陈炳焜因梧州腹背受敌，无险可守，不能再战，仓皇逃遁。所部韦荣昌等，稍抗即退。刘震寰率数百人响附，梧州遂为粤军占领，为时仅十余日耳。北江方面，许崇智率粤军第二军及滇军一部，向富、贺西进。沈鸿英首鼠两端，通电请陆荣廷下野，盖欲取而自代，以周旋于粤桂之间。但内无应者，而外又受粤军之压迫，乃率部逃

入湖南，依附吴佩孚。粤军遂进驻平乐、桂林。南路方面，桂军虽一度攻至高州、化州，后亦挫败，退回桂边，粤军遂乘机渗入。陈炯明既占梧州，复挥军西上。只在藤县稍遇抵抗，遂直迫桂平、贵县。陆氏见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乃放弃南宁，率其亲信，退保龙州，其余则听其各自为谋。桂局至是，遂形瓦解。驻南宁桂军将领韦荣昌、黄培桂等见大势已去，为维持地方计，遣使行成。粤军乃不费一弹，不伤一卒，从容入驻南宁，委韦、黄分任善后督办、会办。但后来又将他们所部，包围缴械。他们还有许多部队，散处各地，见韦、黄缴械，乃益走极端，遂至无法收拾矣。

我们脱离陆谭走上新的坦途 我们当时远在百色，对于这次的战争，仅知其大概。及至南宁陷落，马君武充任省长，刘震寰充当桂军总司令，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将我们原日的部队，及由南宁退来平日意气相投的工兵营韦云淞，水警队管带陈秉文，及陈济桓等部合编为三营。我当第一营营长，白健生为第二营营长，夏煦苍为第三营营长，陈杰夫为机关枪连连长。此外复收许炳章一营，共约五营多的兵力，驻扎百色城及附近各县。自此之后，我们便脱离陆谭的部属关系，而转入一个新的前途。

陆谭的政权，虽然是崩溃了。而我对于他这一段历史，因为知道较详，就纯客观的看法，其盛衰兴亡，都是很自然的。他们能使广西的老百姓，很平稳的过了九年。虽然没有什么建树可言，在历史的观点上，却不无可原谅的地方。尤其对于帝制之反对，共和之拥护，亦有不可淹没的功绩。至于因入粤之演变，而致全局溃败，八桂同遭浩劫，这是他们本身知识水准问题，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全国各省，都无例外，自不能单独对他们有所苛责。这是我写完这段经过后的一种感想。

四　百色失败与新军合流

黔军东窥百色　我们在百色易帜后，所有的部队，都集中城区附近，对于各方面的情形，多不很明瞭。在这年的六七月间，突然有贵州的队伍，由南龙、八渡、罗里、凌云，向百色开进，计三团，共约三四千人，由旅长胡瑛率领。据说是奉令入桂，讨伐陆谭者。但我们事前并未得到南宁方面的通知。其实当桂局溃乱之际，邻省军队欲乘机向桂省发展者，实不乏人。而且百色为滇黔烟土出口要地，极易引起军队之垂涎。讨伐陆谭，只是一种表面文章，借以对外标榜而已。当其到达时，陆谭已经下野，我们亦已易帜。虽无所借口，而彼我戒备，非常之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后因黔军两团长陆西川、刘莘园，皆为保定军官同学，彼此因学谊关系，感情日渐融洽。同时粤军苏廷有所部，同驻百色，互为排解。且陆谭旧部，纷纷向百色方面集中，双方同感威胁。乃将相并之意，化为相倚之势。黔军在百色，适值夏秋之间，病死半数，所余者亦皆病兵，已不能行军作战。乃奉令由水路乘船开柳州，转回贵州。在途复遭陆谭余部袭击，打死病死者甚多。闻到柳州时，仅余八百余人，亦云惨矣！

进剿陆谭残部　自南宁陷落，陆谭残部都向龙州及南宁以北之思恩府属退窜。有一部数百人，窜至东兰县，散兵无饷无食，劫掠自所难免。东兰属田南警备范围，我奉令率本营及新收许炳章一营，驰往剿办。当地人民因久受散兵之蹂躏，对于进剿部队，非常帮忙，夫役饮食，尽力供应，情绪之热烈，实为我带

兵以来所仅见！我在中途坠马，受伤甚重，然仍扶伤进剿，盖不负人民之渴望也。在东兰附近经过数小时之激战，卒将散军驱逐。因尚有其他方面散军，多向百色集中，复奉令回驻百色，以固根本。撤回时，人民恐慌万状，盖深恐以前欢迎热烈之程度，即为散军复来报复之借口。人民在无政府保障状态之下，其啼笑皆非的情形，真堪令人浩叹！

我们在百色的失败 我率队回驻百色以前，驻百色之粤军，已退回下游。而散军之聚集百色附近者，约五、六千人。有由南宁、思恩方面窜来者，有由龙州、靖西方面窜来者。因粤军正从两路进攻，使他们不能立足也。散军首领为刘日福、陆云桂、马玉成等，初到时，因彼此同属桂人，尚觉相安。但新旧之见极深，尤以我军易帜，为彼所最恨。而南宁方面，亦派代表前来接洽收编。彼等原无诚意，起初则虚与委蛇，后来散军愈集愈多，我军更形孤立，而且我新收各部，及临时补充的新兵，大多倾向旧军。刘日福见有机可乘，乃将我军包围缴械。当时我军数量，相差太远。加以内部军心不固，竟至不能抵抗而瓦解，这是我们带兵的最大之失败与耻辱！考其原因：第一、对彼我之力量，毫不顾及，既不能以力取胜，又不肯退避以保存实力。第二、一般心理不明瞭。陆谭虽下野，但多年历史感情关系，不但旧军怀念故主，憎恨粤军。即我们自己的部队，在平日既不能作公开之反对，改编后，亦未有新的认识。一旦形势转变，自难把握得住。第三、刘日福以旧军宿将，欲强其在新进之下，收编就范，实系妄想。有此三大错误，因而招致失败受辱，亦可谓咎有应得，非偶然也。

广西自治军之产生 刘、陆等既将我军缴械，并将南宁代表驱逐，自称为“广西自治军”。由各散军首领公推刘日福为自治军总司令，组织总司令部，进兵平马（恩隆）。与思恩方面林俊廷、陆福祥、陆云高、蒙仁潜等相呼应，势力颇为浩大。

桂军虽屡次战败，除了刘震寰所部及我们所部接受新政府编

制之外，其余皆散处各地，数量并未减少。复因粤军在桂，纪律极坏，烧杀极惨，致使人民愤恨。广西民枪极多，一经团结，立可起事。广西自治军之名义与组织，亦遂应时产生。所资以号召者，即为反对客军入境，共图自卫自治。当时发展非常迅速，数月之内，遍及全省。粤军无法收拾，被迫撤退广西。在这种混乱局面之下，复经过数年之久。

自治军的敌对目标 所谓自治军者，虽以自卫自治相号召，实际不过地方强烈仇恨意识的表现，并无真正自治主张与计划。他们第一个敌对目标为客军，粤军、滇军、黔军等，皆无妥协余地。其次则为受革命政府任命之人物及改编之队伍。马省长君武为当时一省人望，亦几遭不测。余如刘震寰、马晓军等及其所部，皆为彼等欲得而甘心者。其他如唐绍慧（伯山）、谭元翰（伯章）、甘尚贤、甘振贤、黄彤阶、何其多、梁培、谭葆谟等，皆与陆谭有乡土的私谊，与多年部属的关系，因陆谭已溃，不忍地方糜烂，与新政府接近，而有意收拾改革者，竟皆为谭浩清等所杀。彼等对这班人统名曰："反骨仔"（即反叛的分子），得之即行杀戮。我与白健生亦曾为彼等所获，竟能脱险，真是万分侥幸的事！

我们脱险与会师百色 我军除大部驻在百色城之外，尚有工兵营及第二营①之一连，分驻百色通贵州的各路。当城中部队被缴械时，白健生、夏煦苍、陈杰夫皆先后脱险，奔聚于工兵营韦云淞驻所，并率残部移向黔南之坂坝②镇暂避其锋，刘日福亦派队至西旧州一带追堵。我为自治军所获，监视极严。陆云桂本有将我枪毙的意思，后来想尽种种方法，始得只身逃往离百色百余里的黄兰乡下。身边仅有士兵二人，木壳枪一枝。此时黄兰上下

①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为第三营。

②据《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42页载，应是"坡脚"而非"坂坝"。

皆有自治军把守，不能再进与白、夏等会合。就在黄兰附近纠合凌云、西林绅士岑学三、黄炳暄等，将民团编为队伍，不久即集合了二三百人。事为自治军所闻，乃派人四出缉拿，我夜行昼伏，艰苦备尝，幸未再为所获。同时西隆方面，发现自治军与白、夏所领部队作战，亦幸将其击退。白健生因夜里巡查步哨失足堕岩，竟将胯骨跌断，不良于行。这时粤军因刘日福自治军麇集百色，并进驻平马与林俊廷等部相呼应，乃派熊略为总指挥，率兵向平马、百色进攻。并令马司令晓军随往，率领我军，会师百色。我军奉令向凌云县附近集中，计旧有与新收，不过八九百人。乃分为两个统领，每人领三营。我为第一统领，辖冯春霖、黄炳煊、岑润博三营。白健生为第二统领，辖夏威、陆炎、韦云淞三营。我们以新军的典型，一变而为民军的作风，至今回想，觉得多少有点滑稽。

当我军在凌云集合时，适唐继尧率兵回云南，驱逐顾品珍，亦路过凌云。我军派代表和他连络，因得知其概况。原来顾品珍倒唐后，唐部将领郑成勋率部由川经贵而入柳州，沿途集合流散，为数尚属不少。唐氏到柳州后，即誓师回滇。由柳州经庆远、都安、东兰、凤山等县，而至凌云，人数号称数万，但至多亦不过万余人。除一部尚称精练，枪械亦较为整齐外，其余多为附近纠合之众，武器亦甚窳劣。然而入滇后，卒将顾氏驱逐，其中原因甚多，颇难尽述。

由百色退至南宁 我军开抵百色时，刘日福自治军已为熊部击溃，分向各边地逃窜。我军进驻百色城，并另委莫某为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亦奉委为第五路司令，调驻平马。我军到平马后，白健生因足伤，乘船赴邕，转广州医治，途中为自治军所获，几遭不测。所部皆为我一人统率。在平马驻扎不久，粤军复全部撤回南宁，左江①方面，交由马司令与莫司令负责。莫司令全无基本队伍，所收部队，时在动荡之中。马司令所部我军，亦甚

① 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应是“右江”。

残缺。所以粤军退后,各处自治军，复纷纷起来,希图重占百色、平马两地。其一部且迫近平马北面的七里圩。我率冯春霖营将其击退，但上至百色，下至南宁的道路，皆被他们断绝，粮饷无着，形势非常危急。当时曾有人建议马司令改换自治军旗帜，反击莫司令，而占领百色，既可见谅于旧军，复可得一饷源充足的地盘，为我所反对而未实现。这时全省各地自治军风起云涌，普及全面，粤军仅能在一点驻守，各方交通，全被梗阻，应付非常困难。复以陈炯明阻挠北伐不遂，称兵背叛。粤军内部问题发生，势不能不全部撤退。（此时马省长亦早乘船回粤，中途为自治军伏击，死其爱妾，他本人亦仅以身免。）南宁方面，仅留刘总司令震寰所部驻守。兵力单薄，乃调我军及龙州方面之黄明堂所部回邕。我军自平马沿江东下，经果化、果德、隆安，沿途为自治军拦截，非作战不能通过。到达隆安县时，自治军据城阻塞，士兵积数日之怨愤，于攻入县城时，大肆劫掠，我未能即予制止，实为当时唯一憾事，亦为我此后决心整饬军纪之主因。隆安县以下，一日须经二三次战斗，始能到达目的地。我军一方面须掩护船上之行李眷属，一方面又要作战，行程甚缓。退至三江口时（左右二江会合处,离南宁六十里）,两岸皆有敌人，又无船只可渡，而后面自治军仍紧追不舍。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情形危险已极。我乃下令全部反攻，将追兵击退。然后退集两江间的狭小正面，扼险防守，等待行李船只的到来。入夜后，抽选精干官兵，由我亲自率领，乘行李船只，秘密渡过右江左岸，将士兵一字排开，齐上刺刀并禁止开枪，向敌人所占之山岭进扑。自治军本乌合之众，警戒毫无，当我军到达时，彼辈尚在梦中。除擒获击毙者外，余皆乘夜潜逃。我军乃确实占领该山，掩护其余各部渡江，渡完天方黎明。

我军既渡过右江，即向南宁进发，沿途尚有小接触。到达西乡塘附近，（距南宁西南十里）停止候命。马司令同我入城，谒刘总司令震寰请示。这时自治军林俊廷、陆福祥、陆云高、蒙

仁潜等，自武鸣方面进攻南宁，刘部节节败退。敌军先头已抵三塘，城内可以听到枪声，各方面皆开始准备撤退，秩序非常混乱。我们此来未得要领，并见大势已去，急急归队，下令征集船只，由西乡塘渡过邕江南岸。那时随队的高级官长只有我同韦云淞、冯春霖、陆华甫四人，其余皆因事因病，不能相随。这是我由百色退至南宁的经过，时民国十一年三四月间事也。

我军放弃南宁与冯营长阵亡　我军退过邕江南岸后，刘总司令所部及黄明堂、李荫轩所部，亦同时撤退，南宁遂重为自治军占领。次日，我军本拟同刘部向钦州、廉州前进，但行至绵羊、吴村圩以后，我见队伍混乱，纪律毫无，人民逃避。而且饷项全无，沿途伙食，亦成问题。乃决心转而东行，经那马圩、那楼圩、太平圩、陆屋圩而至灵山县城暂住，稍为整顿休息。可是行至那马圩时，自治军之追兵已到，前面为水所阻，适雨后山洪爆发，涉渡甚为困难。乃令冯营长春霖率其所部，拒止敌人，掩护渡河。全部将次完毕，冯营长于最后渡过时，为敌狙击，覆舟阵亡！

冯营长为广西横县人，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旋至桂军唐伯山部下，充当下级官，以骁勇善战闻。桂军溃败后，辗转退至右江一带。因不欲与旧军合流，率部投我为营长。相从患难流离之际，不以挫折而稍变其志。自平马回邕，沿途作战，多赖其力。中途成仁，至堪悼敬。而我军卒赖以脱险，其功尤不可没也。他的干部如刘剑奇等，后来对于统一广西，亦各有建树。

我军经粤境赴玉林途中　我军渡过那水①后进入粤境，自治军亦不再越境追击。是夜宿于粤边之那楼圩。虽去敌军之威胁，又增饷食之忧思。盖孤军退入异省，既无负责之长官，亦无从依赖政府设法筹措，其穷迫之情形，与新败的凄楚，大有石达开所谓"万众栖山似病猿"之感。实非我今日笔墨所能形容也！我

---

① 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应是"浮马江"。

乃不顾一切，仍向灵山前进。每日到宿营地时，必整肃军容，申明纪律，并严为戒备，使人民不恐怖，不逃避，然后派代表向商会或士绅说明原因，请其资助。要求数目不多，仅以官兵两日所需伙食为限，一次乞作两日食。军队食用有着，纪律甚佳，人民负担不重，故乐于相助。计自南宁退出，直至玉林为止，军行数百里，历时一月以上，皆用此种方法来维持。途次陆屋圩，我派陈杰夫去钦州见刘总司令，请示以后行动，及补助饷项。据告，彼部即开梧州，希望我部亦同行。至于饷项，则谓自顾不暇，爱莫能助。我见彼既不肯切实负责，只好自己打算。我对于回梧州，甚有决心，因离我家乡很近，多少可以想点办法。不过我决定单独行动，以防彼吞并我的部队。我们许多同志，五六年心血之积聚，数千里颠沛流离，仅剩下这一点的基本，我不能不尽力负责保持也。

队伍到了灵山县，在那里休息整顿了半个月。然后经由北塞圩、武利圩、张黄圩、公馆圩、白沙圩、山口圩、青坪圩而到江城①。本拟再经高州、信宜县城，而折入桂境边界之黎村圩，这是我的家乡。再沿桂边经岑溪而达梧州。到廉江城附近，忽然碰见四兄天择。我觉得非常诧异，不知他无缘无故到廉江来干什么，当众又不好问他。到了晚上，他才悄悄对我说，是受了李德邻的委托，来这里等候我。他在李处不负任何职务名义，（此后一直到现在都未受过政府任何职务和名义）为了朋友之谊，和手足之情，特地秘密来此等我。又因不能确实知道我行程的缘故，已在这里等了好多日子。他又告诉我玉林方面的情形，与那些朋友盼望我回去的好意，使我非常的感动。我于是召集我重要干部会议，将情形告诉他们，都一致赞成。议决之后，秘而不宣，次日，仍不动声色的向信宜方面前进。那晚在石角圩宿营，第二

---

① 据《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45页，应是“廉江城”。

日，我忽又下令向广西博白县的车田圩前进。变更路线的原因，不能不向部队扯一个谎说："粤军对我不怀好意，要缴我们的械。"的确，我到廉江城时，驻军不许我进城，只准我们驻在城外，而且戒备很严。自然这是对付溃败下来的军队应有的办法。经我说明要到广西境内暂避的理由，他们也很相信。于是在很紧张情形之下，渡过了正在涨大水之石角河。不久，就到了广西境。是晚，宿营于车田圩，那里附近人民多是姓黄的，就是我始祖释养公同胞兄弟的后人。四兄与族中叔伯兄弟都认识，他将我到来的经过，告诉他们。他们极表欢迎，予我种种的帮助。并且陪了我去祭祠堂，拜祖坟。在离乱飘泊之中，不期而然的到了祖宗庐墓所在的老家，使我格外增加了游子天涯之感！

我接受了李德邻的委任 李德邻继续派夏煦苍送伙食来接济，并且委我为第三支队司令。此事除了几个重要干部知道大概之外，其余尚未清楚其中内幕。至是我不能向大众公开宣布。内中有与我部同时退出南宁的陆统领清，是广东钦州人，亦革命老同志。我们在粤境回桂途中，得其助力不少。我事前既不能将实情告知，此时他自然有些不满，说我骗卖他。我在当时情势之下，为防万一起见，不能不将该部百余人缴械。又有冯营一个班长，带兵数人，自由行动去了。我派人追去劝他，他说："如果要在广西当自治军，就不必退出南宁，行乞到这里了。"这事，我至今犹耿耿不忘。因为他们的见解，是有相当理由的啊！

李德邻为我陆军小学同学，由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一向在林隐青部下工作，以勇敢善战闻，身受两伤。于民国八年，已经升当营长。原来在旧军里面，非有特别的关系，就须有超越代价的功劳，才可以得到营长的地位。所以他在我们一班同学中，也算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了。民九桂军由粤回桂，又升为帮统。想系报酬他历次的战功，以及在禄步圩之战，击退粤军，掩护许多友军安全通过的缘故。民国十年，桂局瓦解，彼率残部回驻玉林。粤军委他为粤桂边防第三路司令，已经接受委令，后来粤军知道他部

内有山炮两门，视为至宝，一定要他缴出。他知道粤军对他并不信任，一味敷衍拖延。同时请马君武省长维持。及至粤军退出广西，他也与自治军联络，并被举为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后来因见自治军各将领争权夺利，全无政治头脑，复与脱离关系。所以，那时既不是自治军名义，亦不是服从粤军，而只是一个地方性的司令。所部分两个支队：第一支队李石愚，辖二个统领，第一统领为俞作柏，辖两营，李明瑞、林竹舫。第二统领钟祖培，辖两营，刘志忠一营、自兼一营。第二支队系何武，第一统领为伍展空，辖尹承纲一营，自兼一营。第二统领为陆超，亦辖二营。及我回去，遂编为第三支队，不设统领，直辖三营。第一营夏煦苍，第二营陆华甫，第三营韦云淞。这是民国十一年六、七月间的事。后来德邻统率的部队，又改编为独立第五旅。三个支队改为三个团，我是第三团。这是番号的由来，连我也弄不清楚。

六年艰苦的收获 计自民国六年陆军模范营成立，我厕身军旅，随军征伐，北至长沙，西至滇黔，南尽海隅。地经数省，跋涉数千里，在六年的时间当中，历观军政局势之转变，亲尝种种艰难困苦，牺牲不少忠勇同志，所收获者，则为残破不全之部队与官兵之宝贵经验耳！由各处陆军干部学校毕业之广西学生，在陆谭时代，因遭旧军嫉视，极难发展。全省部队中陆军学生稍为集中，而能直接带兵，略有实力者，只有模范营，及林隐青所部之一部。民十桂局崩溃，虽经困败，尚能掌握一部分实力。更能于流离颠沛之中，合而为一。正似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殆造物者将以统一广西之大任降于其身，故折磨之，困惫之，使其有动于心，能忍其性，以完成其伟大之使命，非偶然之故也。

驻防容县 我部自陆川改编后，即开至容县①驻防。容县为

---

① 据《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第46页，还应有“岑溪县”。

我的家乡，我一到来，地方父老首以剿匪为请。盖本县自民九以后，股匪蜂起，县城东北，很多乡镇，为股匪所占据。劫掠财物，坐收行水（土匪设卡收税谓之行水），到处皆是。我无论在公的方面，私的方面，都义不容辞。首先对于力量最大之吴亚龙一股，我亲率韦云淞营，将其围困谷底孤立之家屋内。照我在左江剿匪之经验，自可一网全擒。但该匪沉着异常，歌唱自若，当我军接近其屋时，始开枪还击，伤亡官兵颇多，无法攻破，及取久困办法，使其坐毙，但在夜间，仍被突围逃窜。经此役后，始知以前在左江剿匪的方法与经验多不适合于容县。盖各乡富户从前多筑碉楼以自卫，民十以后，私人之防卫力量，多为土匪所击破，土匪反得占领此等碉楼，与我军顽抗。我仅凭步枪火力，实无法击破。后虽用土炮轰击，命中亦属不易。此时军队中尚未有手榴弹，我用毛竹筒在两节中间，实以火药，插入一条很长的药引，燃着后，投入匪屋，不久，轰然作响，尚有相当威力。这是我因为剿匪而对于武器研究之开始。但这种毛竹弹，对于坚固的高楼大屋，极少作用。相持甚久，仍不能攻破，后来调来军中仅有的两门山炮去轰击，始将其击溃。但所得效果，仅是将容县部分，驱逐出境，而岑溪、苍梧之匪，以后还费了很大的力量与很长的时间，才得肃清。我们各部自经多次战斗，枪枝损失，子弹消耗甚多，补充至成问题。当时在容县、玉林各处都有单响步枪制造厂，所出的单响步枪，都是用极简单的土法制成，子弹系用旧壳翻造，火药起初用黑土药，后来由广东方面运入一种白色的硝化棉来充用，弹头由铅质或铜质，只要似一枝枪，似一颗子弹，能够打得响，就视为至宝。至于他的效能与其安全的程度，都不计及了！这种困难情形与这种幼稚的方法，都是后来我们自己设厂制造枪弹的动机。

中立的玉林集团　当我回到玉林之后，除了梧州仍为粤军驻守，其余都是自治军的旗帜。表面上是林俊廷当自治军总司令，其实仅仅名目相同，内容都各自为政，各不相下。大家争夺着割

据地方，鱼肉善良，对于广西之政治、军事，并无全盘的打算。尤其是沈鸿英所部，分布桂林、平乐一带，已公然反对陆谭之系统，而欲自露头角。他对于桂方自认桂人，对粤又自认粤人，此种骑墙作风，无非想同时取得粤、桂地方主义者的拥护。同样也派代表到吴佩孚处，希望得到北洋政府的援助。玉林方面这时介于自治军与粤军之间，无形中成为保境安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中立者。故对两方面都敷衍，两方都派人来联络，大有举足轻重之势。我记得陈炯明派某君代表持函到玉林，希望我们出兵打滇军，并答应在梧州给我们十万发子弹，并不谈名义和隶属问题，只是利用广西反对客军的心理，帮他牵制滇军。我方则以得到子弹为目的，也不管他什么作用和企图。于是派陆统领超带兵出岑溪去接护子弹，不意空跑一趟，毫无所获，真是失望极了。

滇军是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范石生、蒋光亮五部合成，由杨希闵统率。当时称为三杨范蒋，人数约有两万左右。于民国十一年的秋天，由贵州方面，转入柳州。他们入桂的原因，大约是唐继尧回云南后，被迫而出走的。到柳州后，奉孙大元帅之命，入粤讨伐陈炯明。经过桂境时，广西自治军不明真相，以为又是客军侵略，一路皆有无组织之战斗。即玉林方面亦派俞作柏参加，后来交涉明白，始行停止。滇军力量颇强，自非自治军所能击败，但沿途作战，亦不免饱尝痛苦矣！

我在玉林方面的时间，约为八九个月。在这个团体里的人，都希望做好，不要钱，不怕死，有血性，富进取，是他们的长处。至于政治、军事方面，除了努力剿匪，使人民得以安居，财政公开，使部曲苦乐平均之外，其余一切，或限于时间，或困于环境，并没有多大成绩可言。但仅仅这一点，也就树立了以后成功的基础。

五　出兵梧州奉命讨贼

出兵梧州的动机　梧州处于西江上游，是两粤交通之咽喉，是广西全省经济之吐纳口。在军事上，无论桂图粤，或以粤图桂，梧州都是必争之地。当我离开南宁，即决心退至梧州。并不是我那时便有掌握梧州经营八桂的企图，因我回玉林后，虽然将以前的名义改变，但是我的主张，并未改变。在容县驻了八九个月，起了很多的感想：第一、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虽然可以勉强养活我们的部队，但是，要发展则很难。尤其是枪械子弹，无法补充。第二、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终久不是个办法。我们必须有光明的途径，崭新的作风，才能展开。第三、我受自治军的耻辱，亟思打倒他们。认定梧州是有为的地方，广东方面，也总比自治军好些。必须出梧州，方可以接近广东，才可以打开新的局面。但是，我怀着这些念头，并不敢贸然表示，贸然行动。我必须待粤方的联络成熟，并且要等候时机的到临。

白健生去年就到广州养病。陈杰夫后来也到广州去。当时大家虽没有若何约定，但我相信他们必定能为团体而努力，并且是朝着新的方向努力，我必须等候他们的信息与意见。因为这个团体，历来都是我们几个人支持的，而且是相当民主的。不久，他果然有信来。对于我暂时率部回玉林是赞成的，同时希望有机会同李德邻全部出梧州。广东方面，由他担任联络，并取得名义。这阶段经过，我是否向李德邻表示过，现在已记不清楚。但是我曾对伍展空、俞作柏谈过，他们都很赞成。

伪投沈鸿英 这时，适值沈鸿英勾结吴佩孚，出兵窥粤。沈鸿英由西江，方本仁、邓琢如军由北江，会攻广州。梧州为沈之后方基地，派师长邓瑞征驻镇。但主力总在前方作战，梧州极为空虚。沈氏不特志在广东，对于广西，亦时刻不能忘情，故极力拉拢广西部队，以图扩充实力。其时我族兄绍憲在沈幕内作秘书。他知道我有些力量，由他介绍于沈，委我为第八旅旅长，希望我带部队到梧州。

我当时判断沈军攻粤，迟早必败。当战争紧急之时，梧州部队必尽调前方，我若于此时进驻梧州，乘其败而袭之，不但可占领梧州，并且可获得许多械弹辎重。同时，我对于革命工作，亦可有所表现也。待时机相当成熟，我才将此中经过，及我的判断决心，向李德邻详细商谈。他的意思，以为任何人赋予名义均可受，惟有沈鸿英赋予的名义，万不可受。因沈反复无义，人所共弃，一旦受了他的委任，则沾上了终身污辱，不易洗磨得去。其次，沈鸿英未必即败，我之如意算盘，未必打得很准。万一事机不密，沈多疑好杀，反遭其害。他以仁厚长者的性格，发为正义诚挚的理解，使我非常感激。但我的见解，以为任何人给我的名义，均须考虑，才可接受。沈鸿英赋予的名义，我竟要毫不考虑的接受下来，因为我根本是要借他的名义，来打击他呀！至于我的判断，能否正确，必须事后才可以证明。军事上的行动，也只好就判断来决定。虽有“计出万全”的古话，其实哪里有一定万全之计。至于个人危险一层，更非我所顾及，有谋人之心，而先虑人之害我，必致气馁胆寒，而无事可为。他对于我的解释，仍旧怀疑。我最后表示坚强的决心，并请求他两点：（一）我如果失败时，设法收容我的部下。（二）在我未曾得到着落时，一切的给养，仍照常拨给。均蒙他答应。

我与白陈的密议 我辞他回到容县，就准备出发，只带了一个营去，暂留两营在容县，这时由容县经岑溪、藤县到苍梧境内，股匪多如牛毛，每天都要开火，才能通过。到了离梧州五十里的新地圩，土匪将我包围于圩内，希图缴械。我营皆久经战斗的官兵，沉着紧守，绝不随便开枪。候匪十分接近，众枪齐发，击

毙甚多。随即向外追击，将其冲散。自此之后，股匪闻风逃避，不敢同我对战。首先树立我的军威。次日，到达戎圩，将队伍严密布置，以防万一。我则单身赴梧州，由族兄介绍见邓瑞征，邓希望我迅速全部开往梧州。这真是我求之不得之事，遂满口应承。他也十分满意，盛筵款待。席间称扬我如何忠实，如何勇敢善战，我心里非常好笑，于无可如何之下，亦惟有尽情作虚伪之应付而已。驻梧有冯旅长葆初，据他自称，他的枪械非常精利。他希望与我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其实他换帖的兄弟，不知多少，他专以这种办法来拉拢一班人，作为他的党羽。我心里想："换帖换帖，不久你的枪枝，我就要来收接！"我在梧州住了数日，白健生、陈杰夫由广州到来，在我族兄的公馆内，秘密将广州的情形告诉我，并说大元帅委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原来是委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手令已经下了，后来白健生觉得不妥，又到石龙去见大元帅，改为总指挥①，并希望我们迅速占领梧州（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的手令，广州沦陷后，散失民间，为广西银行重价购得，民三十三年我到桂林才见到。现在由广西银行保管，此系国父遗墨，拟献呈党史委员会保存）。关防委状，都由他们随身带来，我当时非常着急，觉得太危险了！万一泄漏，不但全盘计划都要失败，大家的性命，也要难保！那日正是端午节，在族兄家里，很匆忙的吃了饭，我们便搭船回戎圩。族兄还要留看龙船，不知我们心内怀着鬼胎，那里还有这种闲情呢？原来我内心的计划，总没有向族兄表露过。事后，他很埋怨我，以为是我骗

---

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公报选编》（1981年版）一书，附有1923年至1924年4月大本营人员任免表，其中：孙中山于1923年8月16日任黄绍竑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第444页）；1924年4月的《大元帅训令第一四二号》中，孙中山称黄绍竑为"西路讨贼军第五师师长"（第400页。无关于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及"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的记载。

卖他，使他几乎陷于致命的危险。其实这种阴谋反叛的事，那里可以随便告诉一个不同意志的人。况且他是信仰吴佩孚、沈鸿英的呢！幸而在相当的时机内，他也离开梧州，不致发生意外之事。

我同白健生仍回容县去，陈杰夫是否同行抑或仍回广州，就记不清了。我回到容县，一切的经过，都由白健生向李德邻陈述。但是我约同俞作柏、伍展空两位的队伍出梧州的事，并未得他同意，这点曾引起很大的误会，其实这事也确难报告，并也确实难以得到谅解。后来经了很长的时间，这种误会，才算消除。

我的队伍全部出发，俞作柏的两营，伍展空的一营，也先后跟着出发。俞部出发的情形怎样，我已记不清楚。伍部在出发前，是公开向李德邻报告过。但也仅仅是报告，而没有奉到他的命令。这种自由行动的行为，就军纪上讲，实在有些不大合理，李德邻身为长官，当然是不允许，不愿意的。但是事实已经如此，亦就无从阻止。好在我们的结合，都是在患难之中，在感情上，道义上，都不致剑拔弩张，武装相见。李德邻并派李司令石愚随同出发，负联络调处的任务。其宽厚大度，有非人所能及者，真使我感佩万分！

我的计划，是先将部队秘密集结在戎圩(梧州上游十里)、新地圩附近，等候时机。一方面使人与邓瑞征敷衍，并要求他补给弹药饷项。在那时候，"走民军揽"(从事民军活动收编之谓)的习惯，凡来就编的人，总说自己的人数如何的众多，枪械如何的犀利，战斗力如何坚强。等到真正点起来，人数、枪枝都要大大打折扣。自然邓瑞征未必十足相信我族兄及我说的那样好法。我为坚定他的信念起见，特别挑选一连最精锐的官兵，下梧州去，请领饷弹，并且请他检阅。这连人，不但在我部是精锐，就是在整个广西军队里，也要算是极出色的了。他见到了，自然很喜欢，并且哄动了梧州城，都欢迎我的部队到来驻防。因此就接到许多饷项子弹。他希望我立刻通电就职，并将队伍开往梧州的前方。我始终以后面部队尚未到齐，万一通电就职，必使玉林方面怀疑而不能行动这些鬼话相推托。他也颇为相信。其实我的队伍早就到齐，正在那里等待发动的时机呢！

乘机解决沈部 沈鸿英在广东，终于不出我的所料，被革命军打败了。他的部队分由西北及广宁、怀集两路退却。在梧州方面，已有好些辎重船只退到。我们认为机不可失，即时发动。当时在戎圩同驻的，尚有沈军旅长黄炳勋所部约五、六百人。在一天拂晓，将他全部缴械，无一漏网。于是我们将梧州上游的水路交通断绝，凡是经过的船只，一律扣留。由梧州上来的船只，多半是沈军的行李辎重，一并为我们所获。并且派俞作柏率兵一部由陆路进至抚河（桂江）右岸，将沈军向平乐、桂林退却之水路截断。邓瑞征知我军有变，一面通知沈鸿英及其部队，不可向梧州退却，他自己也就向贺县、八步连夜逃走。我的部队沿江而下，到达三角咀（苍梧城抚河对岸），遥见下游方面的粤军兵舰，及运输军队的船只，正沿江上溯至鸡笼洲矣（梧州下游七、八里之小洲）。

以梧州为中心的革命势力 是时我先行派员前往联络，随后亲自晋谒魏指挥邦平于永翔兵舰（即中山姐妹舰）。陈杰夫亦随军同来。我与魏以前虽未相识，但颇闻其名。相见之下，其亢爽的性格，与活泼的风度，为我初次与革命军方面人物接触时，发生与旧军不同的感觉。其参谋长为保定战术教官杨言昌先生，经其介绍，彼此即俨如一家，不因初次见面而稍存客气与隔阂。其后续部队与长官，亦陆续到达。计有陆军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第三师师长郑润琦。而陈铭枢、陈济棠、张发奎、邓演达、戴戟、缪培南、黄镇球、薛岳、徐景唐、蒋光鼐、李扬敬、李汉魂、严重、钱大钧、陈诚、黄琪翔、何彤、李文钦、邓世增、冯竹万、冯竹贤、香翰屏、蔡廷锴、陈劲节等，皆为当时革命军重要干部，因到梧州会师而相见者。海军方面则有陈策、金彦文、孙祥夫等。彼此皆以除旧革新为目的，故相见之下，备极诚挚。又因多数系前后同学而更加亲密。此于后来两广局面之发展，有极大之关系。

这时广东滇军虽驱逐陈炯明，击败沈鸿英、方本仁、邓琢如，然而革命军之基础，尚未稳固。一般革命军人认为广州之局面，尚须改造而苦于实力未充，时机未到，必须有适当地方补充整理，

方能发展。在西江方面之部队，实粤中之精华。他们最后目的，为广东全省之革新。故对于梧州之进驻，仅为暂时，而非对于广西有何野心。同时对广西必须得到一个可靠有为的朋友，乃无后顾之忧，并可收彼此相助之效果。在我们方面的目的，是在广西之改造。我们必须以梧州为根据，逐步向西发展，以完成革命政府所赋予之讨贼任务。我们对广东，决不求敌而须求友。同时我们的力量太单薄，亦必须求得有力之朋友，予我们有力之帮助，方能使我们的工作顺利进行，而有恃无恐。双方在此种共同意志与各别的情形之下，遂无形中成为以梧州为中心，彼此背靠背而不可分之团结。故在梧州的广东同志，随处皆以客体自居，凡事予我助力。而我们亦能尽地主之谊，礼遇宾客。此种情形，完全基于革命同志间之互信共信而分工合作。此为历史的际会，于以后革命进展，关系非常重大。三十二年我赴重庆开会时，以前在西江共事过的同志，多为今日之显要，曾举行一次大聚会，彼此相见之下，实不胜其今昔之感也！

组织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　我军到梧州后，乃实行组织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我任总指挥。白健生自回队后，虽然未曾露面，而一切参谋规划，都由他主持。至是乃推他为参谋长，黄玉培为秘书长，龚杰元为参谋处长，吕竞秋为副官处长，白搏九为军法处长，黄维为军需处长，胡宗铎为参议①，陈杰夫为驻广州代表。部队则编为三团，俞作柏为第一团团长，伍展空为第二团团长，夏煦苍为第三团团长。这是我军初出梧州时之主要阵容。

我们这时的名义是讨贼。我们的任务，亦是讨贼。所谓贼者，自然是指一班反对革命之自治军，与杀人越货的土匪。我们只知秉承大元帅与革命政府的意旨，作军事上之努力。对于政治

---

① 黄绍竑在解放后所撰《新桂系的崛起》一文中谓胡宗铎为“总参议”。（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6页）。

的理解，还很幼稚，更谈不到有什么主张。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条，就是力反陆、谭、沈及自治军之所为，创立我们的新作风：第一，是整肃军风纪。我们的部队，一向都是依附在旧军里面生活的，自然会传染一些不好的习惯。自从脱离旧军的关系，在一个大大的变动中，一切的纪律，自会发生废弛的现象。在百色南宁转进的中间，我自己的军队，曾经发现过很大的劫掠行为，我不能及时制止，是我治军一个最大污点。由玉林参加的部队，多为前桂军第二军所改编，中间也不免有败坏纪律的地方。所以到梧州后，我们对于纪律的整顿，认为急先之务，决定作为治军建军的中心工作。一次有个人，犯了军法，这人的哥哥，是我们重要的干部，我防他来说情，立刻将这人枪毙。从此以后，纪律日渐严肃。我们更不断的在训练方面，执法方面，继续努力，才将十数年来沿习的坏风气，转移过来。第二，是重质不重量。我们对于散军土匪，不主张收编，而实行剿办缴械。即使一时收编的部队，如果他的质不合我们要求，亦不因顾全小信而不加改编改造。所以量的发展非常缓慢，而质的方面，则渐见充实。尤其是高级干部，不务虚名，不作大官，俞作柏、伍展空、夏煦苍等除了临时赋予指挥其他部队名义之外，一直到广西统一，他们都是当团长。这三个基干团，负担一切的重要任务，形成了我们中坚的力量。后来虽然增加几个团，仍旧是本着这种作风去建立。所以到广西的统一成功，我们建军的基础，亦就巩固了。第三，是武器弹药的制造。我们认为战争之胜败，人的因素，占一半，物的因素，也占一半。数年以来，饱受弹械缺乏之痛苦，虽然我们一向都以“拿前方补充，向敌人夺取”的口号来作鼓励，而收到相当的效果，但是亦须要自己有充分的力量，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在玉林、容县，虽然有土造枪、土造弹的设备，但是技术上、质料上，都不合要求。到梧州后，对于制药制弹造枪种种条件，都相当具备，而须努力进行，以为长久补给计划。第四，是官兵共同甘苦。我们对于历史上的名将，如吴

起、岳武穆之与士兵同甘苦，至为景慕。对于旧军高级长官之穷奢极欲，不恤士兵的情形，深表痛恶。而我们当时以经费的困难，更无多余的款项，作为军官的薪俸。所以我们规定士兵的伙食饷项为毫洋二角，官长不分等级，每日饷项伙食为毫洋四角。这种生活，自到玉林之后起，一直到广西统一止，足足维持三年多而未变更。第五，是培育干部。“干部决定一切”的理论，当时我们已有深刻的了解。而旧军的失败，多半是由于干部腐败。这种事实的教训，更加深了我们对于干部重要的认识。我们的干部，虽然有许多的陆军学生，以及一些受过新军教育而富有作战经验的行伍军官，然犹认为未足，此后跟着局势的开展，更须大量的补充。除了设法招致陆军学生外，更创办干部之训练机关，不断的培育训练。我们对于支配干部的工作，及阶级之升迁，一概都以人才为标准，而不稍存私意。平时干部的选拔，都采纳最高级干部的共同意见，及一般的评论。第六，是财政公开。财政不公开，是使团体离心离德的重要因素。我们所有的部门，都是采用公开的投标商办制度。因为在陆谭时代一切税收机关，都作调剂私人之用，任其中饱，不加厘整。在人的信用尚未建立，监察制度未臻完善以前，投标商办，一则可予各人有竞争参加之机会，而免个人支配之嫌疑。一则可以由私人屡次竞争，而使公家得到较大之收入。这种办法，在当时确有相当之价值。至于支出方面，则各高级干部，皆本其良心，不敢克扣中饱。第七，对陆谭不作谩骂攻击，对自治军不作全体之敌视。因广西军民对陆谭九年来之过去，尚多怀恋，若谩骂攻击，易引起粤军入桂时同样的反感。假以时日，使彼秕政的害处暴露愈多，人心的厌恶愈甚，可不攻而自破。当时我军之力量有限，旧军之势力十数倍于我，若全体为敌，不但难以制胜，且易招致极大之危险。惟远交近攻之方法，最适合当时之形势。记得当初起草讨陆谭的宣言，总不免蹈以前檄文捏造事实，信口谩骂的陈套。我将文字改了又改，始成定稿。原稿是我的秘书长撰拟的。这位秘书长，

是我的叔叔，旧学根底是相当好的。他对人说："我的文章，他（指我）也要一改再改。"意思表示我这年轻的老粗，不配改他的文章似的。我转告诉他："因为我是总指挥。"第八，对广东方面之友军，除形式上很明显的站在同一阵线之外，并力求彼此之衷心谅解，而达到互信互让互助之目的。盖我军既属有限，地盘亦仅双方共有之梧州，互信不坚，则互相猜忌，而不能对外。稍不相让，则互起争论，而自相火并。尤其在我们必须得到友军之帮助，方能发展。第九，是养成各人自尊的人格，各尽各人应尽的责任。我们是各方集合而成的团体，在表面上虽有阶级之分，而实际上许多重大的问题，大家都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但是到了决定之后，大家都能就自己范围之内，尽其最大之努力。所以在整个过程中，绝少用过很严厉的命令。大家都是本着自尊的心理，发挥自动自觉的精神，任何决策，无不贯彻实施，收到完满之效果。以上所述各种方针与措施，虽未明定成文之政策，建立具体之制度，而在当时情形，必须如此，则为我等所深刻了解。故此种方针与措施，一直到统一广西的时候，未尝改变。亦可以说这是广西统一成功的主要因素。

初见李任潮 当梧州会师之后，我方与粤方彼此的感情上虽极融洽，但军政号令，尚未有统一的规定。此时魏邦平总指挥已回广州，其他部队，亦多东下。大本营乃任命李任潮（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设督办署于梧州，并留第一师之大部驻梧州。李督办为梧州人，在粤革命军中，有悠久之历史。我们素不相知，更未曾谋面。我心里想，在那粤桂交哄的时代，一个广西人，怎能在粤军中取得领导的地位。待会面之后，才觉得他的人格伟大，钦慕之心油然而生。我现在回想，假使当时驻梧州的粤军首脑，不是他而是别人的话，广西统一的局面，未必能如此顺利发展，甚至还要影响到整个革命的进展。他虽然没有参加广西统一的工作，而实是幕外最关重要的人物。因为他和第一师重要干部，对于广西之改革皆非常关切，得其助力特多。更难得的，他除了帮

助之外，一切都尊重我们的意见，任由我们去进行，不稍加干预与掣肘。这是广西改革史中的重要关键，而使我对于他这种伟大精神，永难忘记的。

计擒冯葆初 当粤我两军会师的时候，原驻梧州之沈军旅长冯葆初，因不能撤退，而且不愿放弃梧州的地盘，不得已向粤方投诚。冯为人善于取巧拉拢，此次投诚，非其本意。其所部数量相当的多，而纪律甚坏，留之必为后患。我乃密请李任潮，将其缴械。冯部多驻城市，又恐战事发生，市民遭受损失，遂用诱擒之法，迫其下令所部缴械，以免发生战事，惊扰市民。当时共同密议者，仅李任潮、冯竹万、邓演达、黄镇球及我数人而已。其时邓演达为广东陆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率其所部，担任梧州军警督察处的任务。乃假传命令，将邓团调回广州，而以我部代其任务，进驻梧市。盖我部以前尚驻于三角咀及我戎圩附近，特设此烟幕，以掩饰其行动，不使冯部见疑也。部队布置就绪，于花舫中设宴，为邓饯行，并邀冯及陆海军将领商界领袖作陪。梧州花舫皆集中于抚河里面，为当时一般商人及军政人员游宴应酬之所。入夜，水碧灯红，笙歌聒耳，实为黑暗世界中别一天地。两军将领虽抱革新之志，而对于数千年遗传之酒色英雄的旧观念，尚极浓厚。故当时上而将帅，下而绅商，一切公私应酬，多在此中举行，而恬不为怪。我前年与黄琪翔兄谈及此事，彼深觉以前这种生活的腐化。我说："这也许在当时是一种正当的娱乐，因为这是封建社会必然产生的畸形现象。封建社会里的旧礼教，对于男女授受不亲，讲究太严，所以就有娼妓的出现。而一般人反以为娼妓是正当的、合法的，对男女的自由恋爱，反认为不道德的行为。又如前清北平官僚，法律禁止他们玩娼妓，但又允许他们玩相公。实际是越防闲，越横决。所以必须在道德的根本上有了合理的解决，这些腐化生活，才可革除，否则在那一个阶段里，他就算是正当的了。"花舫的宴会，皆在午夜举行，有至通宵达旦者。我们原拟将冯葆初羁縻到拂晓，等我们部队布署就绪，再

行宣布，将其扣留，并迫他令饬所部，自行缴械。不意事机不密，正在饮酒的时候，他已得到报告，决意兴辞离席。经多方解释挽留，都属无效。我见时机已迫，即起立拔枪相向，要他将随身武器缴下，并欲将李督办扣留之命令宣布。彼竟毫不畏惧，向我力扑，夺我手枪。我这时既无宣布命令之机会，又不能开枪将其射杀。盖原意乃在生擒，不欲致之死命。而当时陆军将领等随从之武装士兵很多，布满左右。我若开枪，彼等不知原委，必至互相射击，而同归于尽。同席诸人除邓演达外，其余的人，又皆不知内容，疑为酒醉互殴，均来劝解。后经邓演达说明，并率同卫士，将冯擒住，加以捆绑。一时城内我军进攻，与冯部抵抗的枪声，亦若断若续的响着。幸冯已被擒，所部指挥无人，至拂晓，已全部为我军所解决。我与邓演达巡视城内，见商民尚未受到若何损失，颇为欢慰。事后同席的人，很埋怨我不事先告知他们，几至酿成极大的危险！也有人说："这种措置，太过冒险，身当一部主将，万一危及本身，则全部将受挫折。"我对于前者的责备，自愿接受，而颇觉抱歉。但我当时确有不能预先告知的苦衷。对于后者的说法，我认为一个人做事，先顾虑本身的安全，固然是应该的。但这只是在某一种限度内的说法。若是超过了这个限度，则变成了自私畏缩的行为。所以我对于他们此种见解，并不完全同意。而我以前经过的事实，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对于本身安全，均未尝顾虑。因此而得到很多人的敬仰，尤其是干部与士兵。这就是我成功的一个因素。

邓演达无论当时在梧州粤军将领中，在以后的革命过程中，都是一个令人注意的人物。他有魁梧的体格，饱满的精神，处处表现勇敢负责革新迈进的气概。自从同我擒拿冯葆初之后，更增加了友谊的深切。后来他离开了第一师，到苏联去。在出国之前，曾有一封很长的信给我。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谈到中国的改革。他不但不满意国家现状，并且不满意广州，及他自己。所以他要到苏联去，充实自己，然后回来改革中国。很多的理论，虽

也有独到的地方，但总有点过火，或不切实际。

攻占藤县　自从冯葆初解决后，梧州已成为很纯粹的革命策源地。广东第一师的重心，向肇庆移动，其目的在广东之改革。至于我军目光，则向梧州上游移转，而展开军事行动。这时藤县城（离梧州九十里）附近有自治军旅长卢得洋及司令黄超武驻扎，而平南、桂平、贵县沿江，更有陆云高之主力。我第一期作战目标，必须将这些部队解决，占领沿江富饶的县份，以充裕我的饷源，并且可与玉林李德邻方面水陆打成一片，然后再作第二期的打算。于是我们首先作进攻藤县之计划。

藤县城在大河（西江梧州以上之总称）与北流河之合口处，依山滨水，形势至为险要。卢得洋、黄超武等部进驻该城，即为扼守大河水道，阻止梧州方面之进攻。故由水路正面进兵，殊觉不易。若陆路进攻，则须渡过大河、北流河，亦非易事。且远道行军，敌军将先为准备。我们再三筹议，用陆军由水道并进。这时正值仲夏，河水大涨，即较大之轮船，亦畅行无阻。我方汽船及拖轮甚多，乃将全部军队用船运送，并请粤方派小兵舰两艘为掩护。先在戎圩附近集中，于次日半夜，顺一三团之次序出发，期于黎明到达藤县江。我与白健生、俞作柏、夏煦苍等，皆随队出发指挥。船队到达县城下游附近，乃下令将船靠江之左岸，开足马力，向敌人火线冲过。军舰两艘则列于船队左侧，实行掩护，并发炮向岸上守军轰击。时尚拂晓，多数敌军，尚在梦中。先时我军顾虑船队通过火线时，若受敌军密集射击，必多损害。盖以当时火力非常薄弱，且水涨江阔，步机枪火，全无效力，不易抵抗也。可是因为时机适当，乘隙进袭，不为敌军发觉，竟能毫无伤亡，就在敌人火线正面，安然通过。船队超过藤县城五里附近，已进入敌阵后方，令各靠岸部队，一涌登陆，占领城后一带高地，背水为阵。士怀必死，勇气倍增。城内敌军见后路为我所断，卢得洋率部出城，向我迎击，为我击败，卢亦阵亡。残部希图夺路向上游逃走，为溪水所阻，被我部队追及，将其全部缴械。

乃将城里敌军黄超武所部围困，准备攻城。黄超武与我有一面之交，且属青年，有志上进。当派代表出城，表示愿意收编。我见其颇具诚意，准其投诚，编为广西讨贼军第四团。此役自午前八时开始，至午后四时结束，将自治军二千余人，全部解决。除收编者外，逃脱者仅数十人。缴获枪枝及战利品甚多，战果非常完满。其原因：第一，为敌人对我企图行动，不甚明瞭，且太恃正面江河之险阻，而疏忽侧后陆上之警戒。我军反利用多数船舶运输，冲过正面火线，在其侧后登陆，殊出彼等意料之外。第二，我军蓄锐既久，官兵初战，皆如出林猛虎，远非散漫无纪律者所能抗拒也。

赴广州谒见总理　占领藤县后，我将各种事务处理完毕，仍回梧州。溯我军在梧州举义两三月间，初解决冯葆初，继解决卢得洋、黄超武，占领藤县，颇为各方所重视。陈杰夫任驻粤代表，由广州来，建议我到广州去见孙总理，及中枢各要人，并请接济械弹饷项，以为第二步讨贼工作之准备。我对于他这种意见，甚表赞同。而在梧陆海军将领，亦多主张我去广州，向总理报告讨贼经过。乃乘海军差遣舰东下，同船有海军代表孙祥夫，总参议胡今予及陈杰夫等数人。时正夏秋之间，江水陡涨，黑夜行船，方向难辨。行至东西马宁附近，忽然轰声大作，船身震动，将我等摔移数尺，船上灯火尽皆熄灭，继而枪声突起。我等出舱查问，始知系与另一差轮相遇，因各不相让，以致误撞。此处为匪船出没地点，往往黑夜袭劫商船。双方又皆误为匪轮，开枪互击。追问明原故，始行停止。我轮船坚力猛，尚无大碍，彼轮则船破人伤，搁浅江边矣！

我到广州，首先去见廖仲恺先生。他当时为财政厅长，我们以前很多事情，都是向他交涉。他对于我们，也非常关切。随后由他介绍去见孙总理于河南士敏土厂。总理身着中山装，态度和蔼严肃，令人一见，即为其伟大精神所感召，自然起景仰之诚。我将过去奉命讨贼之经过，作概要报告，并请求接济与指示。仲

恺先生并从旁加以补充。总理听完我的报告，颇为欣慰，并加指示："革命党是不要一切凭借的，一切都要自家去创造，自家去发展。革命主义、革命精神、革命党员就是本党一切力量的源泉。你们决心参加革命，首先要明白这道理，其余的问题，可与廖先生去商量。"我听了这伟大的指示，就同廖先生兴辞退出。这就是我第一次看见总理的情形，也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总理的情形。因为自是年的冬天，总理北上，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北平逝世，就永无见面的机会了！在过海电船中，廖先生曾告诉我广东财政困难的情形，言外之意，财政并不在财政厅手里，而是在滇、桂军队的手里。在这种困难情形之下，廖先生仍然拨助我两万元，并另外设法，拨我两万发子弹，盛意真可感谢。前年（三十二年）我在重庆，与罗翼群先生谈起往事，他问我："还记得民国十二年在广州拨你两万元的事吧！你不要以现在眼光，看这两万元。当年我们不知费了多少方法，才能筹到这笔款子。当时的价值，恐怕比现在二千万还要大呢！"那时罗先生协同廖先生办理财政，参与此事，故知之颇详。我在广州，曾经会见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湘军总司令谭延闿、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及大本营秘书长杨沧白、军政部长程潜，无非是照例的应酬。不久，就回到梧州去。

与李氏合力解决陆云高部 这时在平南、桂平、贵县、宾阳、横县等地之陆云高所部，大有进犯梧州之势，而且扼守全省交通重要的地区，实为我们当前的最大阻碍。陆氏为以前广西第一师的旅长，他的部下，有兵三团约五六千人。而且枪械相当的充足整齐，且有若干经过训练的队伍，实力自非卢得洋、黄超武等可比。我们自度力量不能单独取胜，乃有联合玉林方面，协助进行的计划。我军自出梧州，迭获进展。但对玉林李德邻处，尚未正式派人报告解释，此时我便派伍展空到玉林，向他说明过去的一切，并商量合力解决陆云高问题，获得他的谅解和同意，并派钟祖培与伍展空同到梧州报请联络，顺便观察实际情形。两

方合作的形势既成，对解决陆云高的计划，亦经商定。当时陆的部队，东至平南之大安圩，西至宾阳、横县，沿江数百里，尽为其所霸占。我们乃决计将贵县以东，先行解决。因其主力在桂平江口之间也。玉林方面由兴业县进兵贵县，然后顺流东下，直捣桂平。梧州方面，则沿江而上，会师桂平。分为两路：一由夏煦苍指挥第三、第四两团及机炮连，由藤县循陆路，直趋大安圩，扑灭当前之敌，然后向平南前进。一由白健生指挥第一、第二两团，乘轮溯江而上，在白马附近登陆，向平南进攻。夏部到大安，敌军不多，稍战即退。遂亦渡江，与白部会合，向平南搜索前进。到平南后，侦知陆部全部集中江口，希图与我作孤注之一掷。我乃乘其部署未定，急行强袭。陆军初由桂平到达，猝未及备，仓皇应战，不久即行溃败。这时李军已占领贵县，袭取桂平。陆进退失据，乃引残部向蒙山方面逃窜，复遭我第一团俞作柏在马练圩附近阻击。陆与旅长张春如，转入鹏化，据险顽抗。两军乃会师攻击，将其击溃。陆率少数残部，向瑶山逃永安，往依沈鸿英。此役我俘获大炮九门，大鹏兵舰一艘，陆部营长蒙志、王赞斌、王飞虎皆率部向我军来归。军队伤亡逃散者，共约半数以上，从此遂一蹶不振矣！

鹏化在桂平、平南两县的交界处，距江口、平南、桂平皆数十里。洪、杨起义的金田村，即鹏化附近的一个村庄。该处教堂拥有教徒甚多，传系洪秀全在此传教所致，至今父老尚有能道述当年遗事者。我们此次战事，颇与金田起义时情形相似，陆云高、张春如的地位，犹如洪、杨，我们的地位，犹如乌兰泰。然而时异势殊，师有曲直，胜负之数，遂亦不同矣。

我军自这两次胜利之后，声威大振。大河一带的散军，纷纷请我收编。我们对于这些善意来归的人，自然不能完全拒绝。于是将他们编为游击部队，以示与基本的团部有区别，计有第一游击司令马夏军、第二游击司令何正明、第三游击司令封辅年、第四游击司令蔡振云、第五游击司令黄桂丹、第六游击司令陈锦华、第

七游击司令卢文驹、第八游击司令陈济桓。这些人都是以前的老军官，或是当地有武力的士绅，乘时崛起，聚众以附者。其人数或千余人或数百人，多寡不一，枪枝亦参差不齐。就此可见当时民军名目之众多，与情形的复杂。但在战事进行时，若善于运用，亦能摇旗呐喊，帮助声势不少。此外尚有游击司令罗经，为初到梧州时所收编者，罗为模范营的营副官，系我们的老同事，不幸在容潭剿匪，（藤县附近）中弹阵亡。这是我们高级干部中最先阵亡的一个。

解决陈天太部 这时广西在粤部队，除总司令刘震寰之外，还有直属于大本营的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他也是广西革命的老同志。所部师长陈天太者，实力颇为充足，以在粤不能发展，久怀回桂之心。尤其梧州是其主要目标，志在夺取，苦无名目进行。乃假借开赴南路为名（粤之高、雷、钦、廉），暗将部队集中梧州下游的都城（粤境市镇，距梧州九十里），并约自治军陈先觉等为内应，既无大元帅府的命令，都城又不是他们南下必经的地点，我们及粤军第一师，先已接得情报，至是更明瞭其阴谋。李督办与我商量，决心会同将其全部解决。粤军第一师及海军由都城下游登陆进攻，我军由梧州向都城进攻。我于是将梧州上游部队，尽数调回戎圩集中，并请李德邻派得力部队，到梧州增援。我军除以伍展空第二团驻守梧州，防陈先觉外，其余皆向大坡山（戎圩都城间圩市）集结，随分三路，向都城进击。以俞作柏所部第一团担任右路，夏煦苍所部第三团担任中路，白健生指挥黄超武所部第四团及蔡司令振云所部担任左路，我在中路指挥。次日黎明各部皆到达都城以上地区。中路因路程较近，接触最早，节节进展，已迫近都城，左右翼未能赶到。陈天太见我中路突出，乃集中兵力，三面向中路猛烈反攻。我前头部队兵力既单，立脚未稳，遂被击退，伤亡极大，一直退至我指挥所在地位。这时我仅有预备队一连，乃就地展开抵抗，以掩护由前头退下之部队。陈天太率队紧追，距离不过一二百米远，彼此面貌，皆可辨认清楚。若再退却，敌将中央突破，转而绕攻左右两路之侧后，必

至全军溃败。其时右路已在相持，左路及粤军第一师，尚未到达。我既认清当前情势，且断定白健生一定可以依预定时间到达，相去只一小时。在此一小时内，无论如何困难危险，必须尽力支持，方能等待左路及粤军赶到，发挥分进合击之效，故决心与敌作最后之搏斗。于是令卫士廿余人展开，我自己亦加入火线。敌方人数众多，攻势猛烈，向我阵地之鞍部隘路，屡次冲锋，皆为我军遏止。我当年枪法极准，射杀甚多。手枪损坏，乃执士兵步枪，继续射击，敌人攻势顿挫，遂成相持状态。此时遥见左路我军已到，并分向敌后挺进。敌军乃不得不抽调主力，向左路迎击，且料我伤亡重大，决无反攻能力，仅留一部与我相持。我见敌人动摇，乃亲率未伤亡之官兵竭力反扑。随同我最先前进者，仅连长李耀宗、冯璜及卫士长牛得才，卫士莫世才、廖正光五人而已。夏煦苍将收容余部，及右路我军，亦随我跟着反攻。敌军不能支持，向都城方面溃退。此时粤军第一师亦由下游迫近都城，陈部及其官兵多为桂人，陈天太乃率残部突围，向梧州方面逃窜。

我占领都城后，查点卫士伤亡十余人，第三团亦死伤过半，战斗可称激烈。中路之挫折由于攻击时机过早，致使敌人得集中全力反攻，而粤军又因为溪水所阻，不能及时由后侧夹攻，各方失却联络，几致全军溃败。然始终信任友军，以少敌众，拼命支持，等待友军到达，反败为胜，亦云幸矣！

敌军既向梧州方向逃窜，我亦急由都城赶回梧州主持。但因连日作战，体力疲惫。第三团伤亡过重，须加顿理。于是先率第三团乘船回梧州，而以白健生任追击指挥，率左右两路，及粤军第一师一部，跟踪追击。敌窜至大洲圩附近，饥疲不堪，复为我民团所阻，我追击部队，亦随后追到，乃全部缴械。陈天太及其剩余全体官兵二千余人，尽为我俘获，解至梧州。除士兵分发各部补充外，对陈天太及其高级官长，特别优待，并发给川资，放回广州。我次年到广州，在东亚酒店，复遭其袭击，几至丧命，

可谓以怨报德，小人之尤！此时尚有一事值得纪念者：当事机紧急时，我团兵力单薄，电请李德邻协助，蒙派钟统领祖培，率部星夜驰援。在途中得知陈部已完全解决，即折回桂平。玉林与梧州两方，表面虽是分立，但患难之际，则互相援应，实为合作统一之先声也。

肃清大河一带土匪 这时大河一带，自贵县以下，虽尽入玉林及梧州方面之掌握。而散兵土匪，横行各县，民不聊生。梧州至藤县，水程不过九十里，土匪收行水的关卡，亦有数处之多。有一次，我与孙祥夫乘海军内河兵舰由藤县下来，亦为土匪所射击。经船上开炮，始将其击退。其他商轮，不纳“行水”者，无不遭其轰击。伤人劫货，殆为常事。我与李督办商量，趁军事稍暇，实行全面进剿。苍梧境内，由粤军第一师之一部担任。藤县江至岑溪一带，由我第三团担任。藤县以下至梧州水道，由第二团担任。藤县以上至平南，由第四团及蔡司令担任。匪帮占据坚固民房，顽强抗拒，非逐屋进攻，不能将其扫除。步枪火力不及，则继以手榴弹火炮。往往匪在炮楼之内，将其顶楼轰毁，则退守二楼，二楼再毁，则在地上掘壕，在墙脚开炮眼，仍行抵抗。被困甚久，既不远窜，亦不投降。火攻不可，乃用救火水龙，以水注射，始得逐出。尤以藤县之波塘村有碉楼十余座，房屋至为坚固，围困竟达八十余日。后由韦营长云淞用各类障碍物，将其封锁，然后掘坑道至碉楼下面，用火药轰炸，土匪数百人，尽行歼灭。自此之后，匪乃不敢固守，而终被肃清。总之，当时土匪竭尽其防守之能事，而我军之攻击，亦用尽各种方法。在这剿匪期间，工作之困难，与官兵伤亡之大，实较以前各次战事为甚。卒使土匪认识官兵之不可抗，土匪之不可为，实为奠定以后治安之最大收获。同时我军亦获得实地之演习，与战斗之经验，裨益以后作战，更属不少。

枪械弹药补给的来源 在这一年中，因作战而损耗弹药极多，无法补充。我们虽然以“在前方补充”的口号来鼓励士兵，

但是以前广西并无制造弹药之厂场。陆谭时期，积聚一些子弹，都在历年的战争中散失或消耗。与我们对战的军队，弹药缺乏，比我们还要利害。前方补充，既不可能，只得向后方请领。而广州方面情形，也复如此。不得已只好自己设厂制造。中国内战时代，本来就是外国的军火市场。在国际条约上，虽然是禁运品，但只是表面文章，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自有方法逃避国际条约的约束，而做成他们的交易。拿子弹来说，他们可以把子弹头、弹壳、火药三样拆开，将弹壳的底火除去，以弹头弹壳作废铜铁发卖，大量的公然运载入口。无烟火药，亦可用其他方法运进来。据说，这是外国已过保管年龄的废品，照例是要销毁的。他们却卖给我们，换取我们的金钱。而我们原视为至宝，作为利器。我们得到这些现成制品，只将底火重新配好，火药弹头重新装上，就是一颗可用的子弹。后来我觉得无烟火药购运比较困难，而且往往霉坏，于是自己设厂制造，由王应榆兄主持其事。因制造弹药的缘故，继续设立了硫酸厂、硝酸厂，以为自制弹药的原料，从此枪弹补充，遂不感困难。

我研究枪榴筒的开始 我们因作战剿匪，极需要炮弹与手榴弹。我们在敌人手里，夺获好多门旧式药包山炮，但是炮弹极少。炮兵营长詹乾能将碰炸炮弹，制出试用，颇为满意。但炸药又成问题，无烟药虽有，不能作爆炸之用，黑色炸药亦感威力不大。遂聘请三个德国人，一个叫雪倍，他曾在石井兵工厂做过工程师，其他两个名字不能记忆。这三个德国人，都是化学的专门人才，由他们担任制造高级炸药皮克林酸（即黄色炸药）。有一个因失慎，炸断右手，成为残废！我们有了炸药，不但炮弹有法补充，并能制造手榴弹。不过当时并无新的式样，只是在铁壳内充满炸药，并插入慢燃导火索。用时，将火索燃着，然后投掷。这虽是很简单很拙劣的方法，然而在当时内战及剿匪，都收很大的功效。后来还试验过从手榴弹后面加一条尾巴，插入枪管内，用子弹射出，有时射得很远，比手榴弹效力好，但是往往把枪管

炸坏，并炸伤射手，以后就废止了。这是我研究枪榴筒的起点。

至于枪枝之补充，亦同样困难。广东石井兵工厂虽有枪枝出产，但是不易领到，我们用了很多人情，出了很高价格，才买到很少数目。此外还向中国军火商设法向外国购买。但是骗局太多，我们很困难的节下来十万元港币，被一个姓彭名竞武的一骗就骗去了。此事系白健生的侄儿某经手。他的确被骗，而当时纪律很严，军法官竟将他处了三年的徒刑。后来我们便自己购置机器，设法制造。以上所述，为我们当时枪械弹药补给情形，随时都在艰难困苦中经营创造。虽规模简陋，出品未精，而在军事上之收获则颇大。亦为广西军事工业之萌芽也。

我们的五项财源 当时我们的财源，大概可分为五种：第一为防务经费。两广人民好赌成性，民元以后，赌风大开，城市乡镇赌馆林立。有番摊馆、宝馆、山票、花会等等名目，不论输赢，皆抽征什一。美其名为防务经费，实则赌捐也。此为历来收入之大宗，我们亦不能即时禁绝。此种赌饷，皆系招商承包，按期缴送。第二为保护费。即系对商船商帮，派兵保护其运输，不致为土匪劫掠，其征收方法则为按货收费。当时土匪横行，肆意打劫，勒收“行水”。保护费的办法，颇与行水相似。不过商人仅缴纳一次，即可免土匪之劫掠与缴多次之“行水”，故亦乐于输纳也。此种收入，多由军队直接办理，缴呈公家。第三为禁烟督察经费。民元以后，烟禁已弛，虽表面上仍维持禁烟名目，实则借以筹饷。广西为云贵两省烟土出口必经之地，除在就地销售一部分外，大多数皆向广东方面运销。禁烟经费，分为两种：一为烟土过境费，就运输过境之烟土，每两收费若干。一为烟灯捐，即本地吸食者，按月纳捐若干。此项收入，为数极巨。广西统一后，全省统计年达千余万元，可知云贵烟土运销于两广者，年达数千余万两之多。为害之烈，自不待言。而饮鸩止渴，亦属不得已也。第四为厘金。援满清前例，设关收税。我到梧州后，改为商包，收数增至三四倍，而包商仍有利可图。商

货受其苛抽，则自所不免。第五为各县粮赋。广西田赋额甚轻，而当时所辖者仅梧属五县，故为数不多。以上所述，各种收入，为全部军费之来源。皆由各收入机关，直接解缴指挥部军需处，随收随用。收支既无一定预算，会计审计，亦无制度可言，仅凭人的信用而已。斯亦草创时期之必然现象欤！

陈天太的暗算 自从我到梧州不满一年，前后几次战事，皆获全胜。力量日增，各方皆极注意。而在广州之桂军，制造谣言，谓我与北洋政府联络，反对革命；或谓我为一个地方主义者，只知有广西，有个人，而不知有革命政府。这种谣言，皆为陈天太所散播，意图中伤我们的。这时我尚未入党，尤为攻击的主要理由。粤军第一师许多朋友，都劝我到广州去解释，即在广州入党。我服从总理出兵讨贼，已有半年，入党自不成问题。但我顾虑陈天太在广州，尚有武力，即其他桂军对我亦无好感。他们都以为自己是广西革命先进，广西的事，应该由他们来包办，而今反由我这年青的后辈，占有广西富庶冲要的地盘，骎骎有统一广西之势。因妒生恨，自属意中之事。我如赴广州，只能带少数人员同往，对于个人安全问题，实不能不顾虑及之。许多朋友中，陈伯南主张我赴粤最力，并谓第一师第三团驻广州，其他粤军，为数更多。他本人并陪同我同往，安全问题，绝对负责。我虽知必有危险，而众议难却，遂毅然起程，用小火轮拖带花舫东下。同行者有陈伯南、黄剑灵（镇球）、陈杰夫、叶洁如诸人。行至德庆附近，天黑风大，航线难认，所拖花舫，误触礁石之上，黑夜沉船，方向不辨。伯南、剑灵、杰夫、洁如虽幸获救登陆，然均饱尝水中滋味。我本会游泳，但黑夜中不敢下水，乃坚踞船顶，船未尽沉，我亦安坐无恙。次日，改乘他船至三水，搭车到广州，由陈真如伴我到各方行动。午后，真如有事，又由伯南伴我到胡展堂先生公馆。其时，总理已经北上，由其代理大元帅职务。同座谈话者，有许汝为、廖仲恺两先生。我除将经过陈述外，对广西以后问题，亦经谈及。彼等对以往一

切，甚为了解。希望我此后对广西问题，多负责任，以巩固两广革命基础。廖、许并答应为我入党之介绍人，定次日同到中央党部填表宣誓入党。谈话完毕，我与陈伯南同回东亚酒店二百零五号房间寓所。盖在梧州时，彼答应担负我的安全责任，故日夜皆与我同伴，以防不测。此种诚意，真使我永难忘却！我随身仅带卫士六人，皆久经战事，而忠实勇敢者，住于我之前房。这时已是十二点钟，我回房后，甫卸衣袜，忽闻枪声大作，向我房射击。卫士长牛得才腿部中弹，尚卧地还击。其余卫士亦仍相继开枪，幸不为所冲入。我这时已知为陈天太所暗算，情势危迫中，惟有督率卫士，坚决抵抗。而对方人数甚多（事后查知为三十人左右，附近各面俱已布满），攻击猛烈。在狭隘的地方，卫士仅能死守房门，无法回旋。幸我当时极为镇定，虽变起仓卒，仍能沉着应付，毫不惊慌。并知旅馆房屋，皆钢骨水泥所造成，冲之不破，火之不能，即剩我一人一枪，亦尚可与之相持，若能支撑到天明，则粤军必来救援。如此激战达数十分钟，伯南已侦知从后窗可以翻过先施公司后楼，并谓："既有路可避，死拼实为不智。"遂相偕翻越铁棚，进入先施后楼，适为公司职员高君义安夫妇之卧室，彼等先闻枪声，已极惊惶。继见我两人持枪闯入，以为行劫，战栗不能出声！我等乃将事由说明，请其带路，至潮音街警察区署。这时我两人身着睡衣，无鞋无袜，至为狼狈。经以数十元向工友购得便衣鞋袜，化装步出。夜深人静，彼辈仅向前方进攻，后方并无拦阻。我们到达区署后，伯南即打电话报告粤军总部，旋即派汽车来接我等到旧省议会内粤军总部，至是乃告脱险。我等行后，卫士等尚继续抵抗，但敌人太多，前仆后继，仍然围攻。卫士见我已出险，遂亦由后楼退出。卫士长牛得才身中十余枪，当场阵亡。卫士覃立佳，身负重伤，仍能跑至高第街办事处报告，随即倒地身死，忠勇殉职，至堪悼念！其余皆人枪无恙。后查悉凶徒三十余人，伤亡十三人，并误伤茶役李牛一人。战斗自十二点钟开始，至三点多钟才停止。这可算得广州市内的一场小激战。

宣誓入党 我到粤军总部，次日，军政要人皆到来慰问。刘震寰面见时，握手大笑道："我早防到有此事，好在你已脱险，事情你也明白。不然，这个膏药，又要贴在我身上。"范石生说："广州太不成样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不止一次。我们已司空见惯，所以昨夜的枪声，大家并不觉得惊奇。"许、廖并问入党是否举行？我含笑答道："只要我尚未死，一定入党，决不因此而稍有犹豫。"彼大加赞许，谓这样才是革命者的态度！于是填写入党表及志愿书，由许、廖签名介绍，在大礼堂举行宣誓仪式，由胡展堂先生监誓，并拍照留为纪念。是晚，胡、许、廖为我设宴，招待、洗尘、压惊、欢迎的意义，兼而有之。同席的除各军政要人外，还有苏联的总顾问加伦将军。这次的菜肴中，有蛇肉一味。加伦将军大概是初次尝食蛇味，食后，许汝为先生问他："好不好？"他说："很好！"然后告诉他这是蛇肉。他很惊讶！加伦将军并出示蒋先生致许先生一封很长的信，内容怎样，我不知道，只听得他们说："介石的理论，自然是不错，但是事实上，恐怕一时做不到！"这时蒋先生正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并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函内所说，想系军事改革问题。

在黄埔初见蒋先生 次日，我起程回梧州，许总司令派龙骧兵舰送我回去，由粤军总部至东山码头，皆由我军特别戒严。许先生同我乘汽车登舰，并陪我到黄埔，在一个陈设很简单的房屋内，会见蒋先生。这是我同他初次会面，当时感觉他的态度严肃而刚毅，与其他的军事长官，颇有不同的地方。他将办理黄埔及建立革命军的意义，很简略的告诉我。我因急于回梧州，不及参观，乃兴辞而出。自己乘舰到肇庆，改乘他轮，回抵梧州。此事经过，我虽处之泰然，而部属真相不明，焦急万状。我回来后，彼等始觉放心。我这次赴粤，性命几遭不测，承粤军将领，患难与共，并得其种种关顾，不仅私交上成为莫逆，在公谊上亦更增密切关系。而当我加盟入党之时，竟遭逢此种险恶风波，在我个人历史上，亦为值得纪念之事件也。

六　统一广西各战役

玉林与梧州之合作　玉林与梧州两方，因已往出兵梧州问题，彼此总不免存有多少芥蒂，后来双方屡经派人疏通，因而有解决陆云高、陈天太两役之合作，不但前嫌尽释，而且充分表示患难与共的精神。双方根本上之主张与敌对目标，亦益趋一致。不过在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上，彼此略有不同而已。

民十粤军入桂，因纪律太差，遭桂人的全体反对，和民九桂军入粤，遭粤人全体反对，如出一辙。因此凡接近广东方面者，无一不受桂人及自治军之盲目攻击，刘震寰的不能在桂立足，马晓军及我等亦几为众矢之的，都是这个缘故。

玉林方面对于自治军，尚无若何的恶感，若用粤方名义，则必增加他们的反对。双方为求工作进行之顺利，名义虽异，而相约互为表里。对广东，由梧方出面负责，对自治军，则由玉方出面敷衍。在实力未充，时机未到的时候，用这种手段，分途并进，目前既可减少反对之目标，事后仍可收统一之效果。故玉林方面自称"定桂军"，以示与梧州方面之受命讨贼者有别，李德邻自为定桂军总指挥，并以黄旭初为参谋长，黄子敬为秘书长，李石愚、何武分任支队司令。两军既名义各异，所用旗帜，亦各不同，讨贼军用白边红心的方形旗帜，中书白地"黄"字。定桂军用黑边红心的方形旗帜，中书一黑地"李"字。这是沿用旧军的封建习惯，各以主官的姓字，代表其所领率之队伍也。

两军各有其防地，定桂军为玉林、北流、陆川、博白、兴

业、贵县、桂平等七县，讨贼军则为苍梧、藤县、容县、岑溪、平南、信都等六县。两军在自己防地内，不论军事上、政治上，凡用人行政，各有其系统，各有其作风，而不相统属。但彼此在此阶段中，对于共同之主张，和共同之目标，皆本其团结精神，为最大努力。其在军事上所表现之合作的事实，比到同名义同系统者，无稍逊色，或更过之。此为当时之特点，实为以后统一之基础。

我们的政略与战略 我们估计自己的实力与陆荣廷、沈鸿英两大旧势力相比，所差甚远。我们对于整个政略战略原则之决定，为先陆后沈，各个击破。第一个阶段为联陆制沈，第二阶段为联沈灭陆，第三个阶段为灭沈。所以当我们出兵梧州袭击沈军时，陆氏方面并不作任何攻击，且由玉林方面，对他们竭力敷衍。陆氏当时亦当引以为快！

民国十三年春，陆氏受北洋政府任命为广西善后督办，由湖南回驻桂林①。沈氏自民九以后，早欲脱离陆氏，而自树一帜。这次陆氏重行回桂，有久驻桂林之意，沈军防地被占，遂发生利害上之冲突。沈乃率兵围攻桂林，彼此以城为战，几及半载，桂林人民，乃饱受其荼毒。而在我们方面，则认为各个击破他们之大好机会，并计及陆若得势，他在省内之号召力量，比沈氏大得多。如前所述，我们在政略上，必须制止陆氏之复起，而在战略上，则须联沈以败陆。沈氏对我，虽恨之切骨，今既目标相同，自然极表欢迎。故我之联沈败陆计划，自有其最后之目的，而在表面上，则做得颇为自然，使人家看不出我用意所在。因此社会上有一些人深为诧异，对我与沈氏合作的举动，颇有非议。

我在政治立场上，对陆氏已往，并不采取文字谩骂的攻击，而是对于其新受北洋任命，自毁其辛亥首义与反对帝制的历史，深为惋惜，劝其勿再作冯妇，而见机勇退。在陆氏能否感动接受，固不可知，在我们则不欲落捏造对方罪状抹杀事实的檄文陈

①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陆氏当时是由上海经越南入龙州，从南宁过柳州到桂林。

套，而予其余众以反感。我们在军事上之计划，是先占南宁，把握全省政治中心，使陆氏不能再借此以为号召。盖陆氏在桂。一般人民对他并无十分恶感，若果重到南宁，号召力自必更大。故须趁其与沈军在桂林相持不下之时，先发制人，将南宁占领，使其陷于进退维谷境地，然后方易将旧势力分别扫除。我们当时的"讨陆宣言"，仅是轻描淡写，很简单的几句话：

> 各县知事转地方团体父老公鉴：我桂受兵祸十三年于兹矣！往昔客军入境，几同竭泽而渔，因之群盗满山，直尔安巢无鸟！补疮孰从剜内，同室忍再操戈？乃者，百色重镇，大劫扬灰，八桂旧都，无端流血。摘瓜岂将抱蔓，折枝宁不伤心？某某早鉴覆车，力图保境。觉迷途其未远，冀省治之重光。何其人面不同，鲁难未已！侨将被压，虢虑先亡，民其何辜，咎将谁属？用是会师邕莞，谋庇本根。杜彼政参，归诸民治。所愿邦人厌乱，多福原在自求！须知天道祸淫，恶力终归自杀。即时大觉，还我太平。谨掬苦衷，敬祈亮察！总指挥黄梗印。

我军驱陆和会师南宁 自陆氏在桂林与沈鸿英发生冲突，相持不下，陆氏向北洋政府请援，北洋政府派湘军一旅入桂。旅长桂人叶琪，是我们同学，彼亦不愿卷入陆沈旋涡。师次全州，即不复前进，陆氏所部，乃不得不向柳州方面集中，欲与沈氏争一日之短长，而不虞吾等袭其后也。当时，他们的军队，如谭浩明、韩彩凤驻柳州，陆福祥驻迁江、宾阳，林俊廷、蒙仁潜驻南宁，刘日福驻百色，谭浩澄、谭浩清驻龙州，总数不下三万人。但分驻各处，每处皆系数千人。而当时我们讨贼、定桂两军，合计可用的兵力，不过八千余人，故必须集中使用，先将南宁方面击破，然后再分向柳州桂林进击。

战略既定，乃于民国十三年五月间，将两军主力在贵县附近集中，随分为左右两路：左路军由李德邻指挥讨贼军伍展空、夏煦苍、蔡振云所部及定桂军李石愚所部沿江而上，直攻南宁。

右路军由白健生指挥定桂军何武、钟祖培所部及讨贼军俞作柏所部等攻击宾阳、迁江之敌，占领宾阳、迁江、上林之后，乃转向武鸣、南宁，与左路军会师。我则指挥其余各部作为策应，兼顾后方，仍驻梧州。左路军于六月四占领南宁，击毙蒙仁潜①。林俊廷率残部逃往那马、都安，省长张其锽亦弃职潜逃。南宁自民国十一年五月间为自治军盘据后，已整整两年，至今乃获解放。右路军方面战事，虽较激烈，但进展亦极顺利。攻占迁江、宾阳、上林各县后，陆福祥率其残部与由南宁北溃之林、蒙残部，退据武鸣以北之都安县一带，与柳庆方面之谭浩明、韩彩凤仍连成一起，与我对峙。

我军会师南宁，能如此迅速顺利，一则由于自治军之散漫颓丧，各自为谋。陆谭虽回桂号召领导，仍不能团结振奋。二则由于陆沈相持，彼所注意者，为当面之沈军，对我们并不十分重视。不料我异军突起，竟覆其根本，使其进退失据。三则由于我们用兵秘密而神速，集结而锐利，使其战前不知预防，战时不能援应。这是我们与陆谭正面冲突的开始，而即获此重大之胜利，对未来桂局关系的巨大，自不待言。

以情感作用造成军政统一　当定桂、讨贼两军会师南宁之后，许多复杂问题，亦随而发生。第一、关于政治的，南宁是全省政治中心，对于政治应如何处理，不仅有关整个对外的号召力量，亦为自己内部极容易引起磨擦纠纷的原因。而事实上，我们内部因财政和税收机关问题，各级干部已发生权利冲突，几置当面之敌人于不顾，而剑拔弩张的在那里拼命争夺。这是我们到南宁后，急待解决的事件。第二、关于军事的，以前一时的局部的合作办法，已难应付此后复杂而扩大之局面，故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机构，才能集中意志，集中力量，进行全省的统一工作，而且

①据黄绍竑解放后所撰写的《新桂系的崛起》一文中说：“蒙仁潜当时兼任省长，退走不及，被我军俘获枪毙了。”此说准确。（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

两军干部以前的芥蒂，亦须由指挥机构之统一，方可达到彻底泯除之目的。李德邻身当其冲，非常焦急，乃电我前去商量。我赶到南宁，一切问题都尚无头绪，而敌军与我正在相持状态之下对峙着，情形颇为严重。于是先商讨军事统一指挥问题，决定组织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由李德邻与我召集两军重要将领会餐，席间，我起立说明必须组织联军总指挥部之理由，并推戴李德邻为总指挥，我自愿为副指挥。并说："我原是李德邻部下，因为出兵梧州，权宜自树一帜，今既会师南宁，正宜乘机回复旧时组织，以期统一指挥，进一步而统一广西。要是彼此不能相下，必至自相火拼，而与旧军阀无异。我们今日幸乘陆、沈相持，占领南宁，获得胜利。陆、沈前车之辙，是不可再蹈的。故我们无论在任何状况之下，亦只得服从李总指挥，方为合情合理。我的部下，如有不服从李总指挥者，即等于不服从我一样，必为团体所共弃。"我并且沥酒为誓，表示诚意。大家见我如此，自然一致感动，毫无异议。继由李德邻起立致训，勉以精诚团结，共成统一广西之大业。次日即于当年的督军府，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并任白健生为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黄旭初为副参谋长，胡宗铎为总参议，俞作柏、夏煦苍、伍展空、蔡振云、李石愚、何武、钟祖培等为纵队司令，而继续进兵，展开以后的各战役。这件事实为玉林、梧州两方由合而分，由分而合的经过。其间并没有什么命令法律的依据，而完全由于我等之情感作用。我现在回想此种举动，好象梁山泊里众义士推尊晁盖的情形一样，自吹自擂，滑稽好笑！但在当时，亦确非如此做法不可。这就是统一广西的一个最重要关键。

至于政治问题，我们以为在这阶段内，尚是军事时期。一切政治的建设，尚谈不到，第一是我们对于政治无经验，无兴趣。第二，我们都要亲自指挥部队，与敌人拼死拼活，那有工夫分身去管理政务？倒不如在省内物色较有名望的文人去当省长，以避免所谓军人干预政治之指摘。那时广西尚有一个省参议会存

在，议长张一气氏，声望尚孚，于是由省参议会推选他担任广西省长，负行政上的责任。实则广西省长，在陆谭时代，已如告朔饩羊，无一不在军人支配之下。此时未脱军人割据时期，张氏虽坐上这把交椅，实际他的政令所及，真限于极小的区域而已。

决定第二步作战计划——先联沈讨陆 自军政机构组织在南宁成立后，省内人士，观感为之大变，我们在军事政治上的地位与声望，也自然增高了许多。同时自治军内部的心理，日渐动摇，我们必须趁此时机，加速进击以促其瓦解，而收拾亦比较容易。随即决定第二步作战计划，将军队分为三路：右路军由白健生指挥夏煦苍、何武、钟祖培、韦肇隆等部，并与沈军联络，进攻柳州。这时陆沈正在桂林相持，陆氏主力，大部在桂林附近，柳州守兵不多，我军遂于八月十一日占领柳州，敌向庆远逃窜。次日即向柳城、庆远追击前进，迨师次柳城，侦悉陆系健将韩彩凤率谭占荣、黄日高、邓定邦等数千人，由桂林，希图袭取柳州夹击我军，已经到达中渡、东泉附近。白健生乃停止西进，转而向东迎击。韩军知我回师，乃占领上雷、大茂桥一带阵地。因韩氏为上雷附近人，既占地利，又得人和，所部本极耐战，我军攻击至为艰苦。最后，白健生亲率卫士，加入火线，始将其击退。彼此伤亡，皆甚重大，其激烈情形，实与都城之役相仿佛。韩军虽败，仍退集于大浦、沙浦之附近，扼险固守，以待由庆远方面来援的部队到达，再行反攻。此时我军在柳城附近，处于前后受敌之形势，不得已遂撤回柳州。

陆系健将韩彩凤之败 沈军师长杨子德、旅长沈锡刚，驻军鹿寨附近，持观望态度。一因沈军对我本无好感，此次因一时利害关系，联合作战，实欲收渔人之利。其次为沈军对韩军颇怀畏惧。三则韩沈两军所部，多为柳城人，皆有乡土的关系，不肯轻于破面。且沈军志在占领柳州，现柳州已为我军所有，大失所望。我军当时，以大敌当前，沈军又居心难测，形势至为不利，故必须使沈军积极参加作战，方能化险为夷。我们的计划，首先

须使其知道韩军已为我所败，以减除其畏惧心理。但正面通告，难以取信，白健生乃使彼此电话线接在一起，使他们从偷听中得到实况，并且答应解决韩军之后，以柳州归其管辖。彼见有机可乘，有利可得，遂接受指挥，进兵中渡，向大浦，沙浦攻击韩军的侧翼，我军同时由正面猛烈进攻。韩部受创实重，乃向庆远溃窜；我军跟踪追击，将其围困于庆远城，旋即攻破，俘获甚多。陆氏在柳庆势力，至是完全崩溃。韩彩凤治军颇严，能与士兵同甘苦。民国九年，桂军由肇庆撤退，高级将领不脱离队伍者，仅韩氏一人。且沿途作战，皆极尽力，各军卒赖以安全退回梧州。及陆氏完全失败，乃率残部退入湘境，始终不肯投降改编，其忠贞亮节，在对人的旧观点上，是值得赞美的。十六年以后，解甲为农，安贫守法，不因私怨而稍有越轨行动，公私分明，恩怨不苟，诚为旧军人中之楷模。我于三十三年路过沙浦，见其墓木已拱，追思往事，弥深景仰！

收编刘日福部　中路方面，由俞作柏率其所部讨贼军第一纵队，及讨贼军第四纵队蔡振云等部，由武鸣出发，向那马、都安进攻，肃清当地之敌后，再转向果化、恩隆，肃清右江之敌。这时，林俊廷及陆氏心腹健将陆福祥，与蒙仁潜残部四五千人，盘据都安、那马一带，常有乘隙窥伺南宁的企图。右江方面，刘日福亦拥众数千人，占据百色，态度模棱不定。南宁为我政治中心，右江为我饷源要道，故必须将他们歼灭，以解除南宁的威胁，保护右江的饷源。八月初旬，俞指挥亲率所部，向那马进攻，陆福祥亦亲临督战，凭险顽抗，战事极为激烈，双方伤亡，皆颇重大。后陆福祥腿部受伤，卒至溃败。我军乘势追击，再战于都安，又将其击败。林俊廷率残部退都安以北，贵州边界一带，我军乃舍而不追。陆福祥率残部经果德渡过右江逃镇结、靖西，而只身入安南，不复再出。我军尾追陆福祥，占领右江沿岸果化、隆安两县，转向上游的恩隆进逼。刘日福见大势已去，乃向定桂军投诚。刘为人颇诚实，无野心，颇得百色一带商民爱戴。我亦不欲再向

西深进，即将其收编，仍令其负右江一带的治安责任。于是中路军旋师南宁，右江军事，遂告结束。

两谭溃败逃入安南 左路方面，由胡宗铎指挥讨贼军吕焕炎所部，及定桂军刘权中所部两纵队，溯江而上，直捣龙州，并与进入右江方面的蔡振云纵队，取得密切联络，由果德、镇结向都安，以切断其向靖西逃走的道路。这时，盘据龙州一带的陆谭残部，为谭浩清、谭浩澄所率领，二人都是前督军谭浩明的昆弟，花花公子，全不知兵，而且暴戾残忍。唐绍慧、甘尚贤、谭元翰等比较进步的人物，皆被他惨杀。在地方上更是任意妄为，无恶不作。所以我军一到，除了崇善县附近稍有战斗之外，皆望风逃窜，或投诚收编，两潭皆只身逃入安南。他们早在那里备有退避之所。胡指挥遂于八月中旬，进驻龙州。右江军事，至是亦告结束。当委胡为边防对汛督办。这个名义是前清以来就有的。除督办之外，并在重要的地方设对汛员，系专管广西安南边境人民往来之查验与治安的责任，似有国际警察的性质。

陆氏二度下野 我们第二步的军事行动，自五月间发动，至九月间全部结束。十月，陆氏在湘①发表下野电文。在这短短的五月中间，我们以八千多人的兵力，扫荡三万余的优势敌军，虽然尚不能算根本肃清，但已使其从此不能作有组织的抗拒。这样，便底定了广西四分之三的土地(桂、柳、平三属外)，奠定了广西统一的基础。这不能不归功于政略、战略的配合适宜；而两军在名目各殊系统各别的情形之下，能够精诚团结，同仇敌忾，两军将士亦能戮力齐心，勇敢牺牲，皆为成功的最大因素，亦为广西统一上的奇迹。

陆氏在桂林既为沈军所困，南宁及左右江各地，又为我联军所占领，知事无可为，乃再作第二次之下野；仍由湖南退走沪上

---

①据陆君田、苏书选著《陆荣廷传》第397页为“陆氏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

作寓公，以终其余生。其所部除马济率领一部入湘之外，留桂者遂日渐解体，不复有组织之行动矣！

陆氏在桂的行政实况 陆氏之政治生命，既告终结，他的生平事迹，自有其时代的背景与价值。我在当时，虽处敌对地位，但未尝谩骂诋毁，今日回忆往事，亦雅不欲多所论列。然而对于当日他们的行政实况，则须略为叙述，以供后人之参考。总括一句话：在陆氏主持桂政的一个时期中，虽谈不上如何建设，而广西人民却得到八九年的安定生活，考其原因，约有三端。

第一是用人行政问题。当民国元、二、三、四年间，全国统一局面，尚未打破，袁氏的中央政权力量尚能到达各省。除拥有兵权的督军任免稍有顾虑外，各省省长(先称巡按使)皆由中央任命，且定军民分治之制，以防武人干涉行政。民二、三、四年之广西省长张鸣岐、王祖同两氏，皆前清疆吏出身，对陆氏有部属与旧谊关系，不致过分干涉其职权。张氏在宣统元、二年间，对广西锐意兴革，已稍具规模。到他再度来广西的时候，虽当鼎革之后，权力财力皆不能运用自如，然犹能维持现状，不致过越常轨。即以县知事的任用而论，对于资格与政绩，均尚相当注意。并确定署理期间为一年，期满按成绩之优劣，再定实授与否，仍循前清之旧例。民国五年后，省长李静诚氏，此时中央权力，国家制度，已不是省长所能凭藉和运用，而但凭陆谭两氏个人之意志为从违，最重要的县知事任用，其署理期间，虽仍为一年，但极少由署理而获实授的。因他们都把县知事一缺，作人事上应酬的工具；知事的任期愈短，更动愈快，则应酬之机会亦愈多。（这在当时，固不免引起多少的物议，然犹有一年的确定时间，较之以后的一年数换者，又胜一筹矣！）我在当时，听到一般当过县知事的谈论，多认为这是上官予他们生活的调剂，而不是做事的机会。的确，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一县长官是不能有什么成绩做出来的。所以我主张县官要久任，但也要有个任期，到期严予考绩，以决定其连任与否，此即古人所谓“三载考绩”之意。

第二是金融货币问题，广西原无本省铸造的货币，以前社会上所流通者，都是广东所铸的毫洋。陆氏时期创办的广西银行（系以前清之官钱局所改组者）曾发行一元、五元的纸币。当时信用颇为坚固，不但在桂境内通行，而且随着他们军事势力流通到广东、湖南。广西原为贫穷省份，清代皆向广东协饷，财政始能维持。民元以后，协饷来源断绝，省内支出，固赖银行纸币以为补助，即陆氏的入粤援湘，亦全赖纸币的运用。民国十年的冬季，陆氏势力崩溃，广西银行发行的纸币，即随而破产。后来粤军在桂，曾发行军用钞票，亦因粤军势力的动摇而不能通用。最后沈鸿英、林俊廷相继发行军用票，同因军事失败而失其价值。人民痛遭损失，对于纸币毫无信用，相反的，对于硬币信用日好，于是各方皆减少成色，私铸银毫。初则广西伪毫与广东银毫价格相去颇远，继则广东伪毫亦充斥市面，商民无法辨别，于是相率拒用。此为广西金融混乱时期。陆氏在民元以后，虽屡次对外用兵，而广西人民的负担，并不加重，颇为人民所怀念。陆氏死后，章太炎替他作传，有“不加税而费用足”之语，即是指陆氏发行纸币之功。然而民十后，纸币破产之损失，则为桂人重大之负担，陆氏仍不能不负大部分的责任也。

第三为地方治安问题。广西素称多匪之区，但民十以前，全省人民皆能安居乐业，并不是当局对于地方治安有何贤明的设施，最大原因，还在收抚土匪。民五以后，陆氏势力正向外发展，其兵源之补给，除招募无业壮丁之外，即为收抚土匪，编成军队而开出省外，因而省内受土匪之骚扰较少。然而为匪者，既不以匪为可耻，亦不以法为可畏，反而视此为进身之终南捷径。民十以后，此种份子随陆氏之失败而重回广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仍旧在广西各地，干他本来的勾当。自民十以至民十四，所谓自治军者，无非是此辈借自治名目，作为害地方之行动。我们之统一革新运动即完全以他们为对象，艰辛剿办，一直到民十五年，才将其肃清。不特地方得以安全，而社会观念，

亦赖以纠正。

以上所述，用人行政、货币金融及地方治安三项为陆氏政治方面颇足称道的成绩，而比较有利于地方者。但皆仅为一时的，而非永久的。同时利之所在，弊亦随之，为功为过，正复难定。要之，身历其境的广西人民，当必有正确的认识耳。

沈军三路反攻与我方对策 自陆氏再度下野，桂林、柳州、平乐各地，遂尽为沈军所独占。陆氏余部，亦多为其吸收，势力日益强大。沈氏明知与我势不两立，而且梧州为全省经济中心，民十二年为我袭取。一段旧恨，时刻不能忘怀。此时见我军西越南宁，认为夺回梧州的最好机会，乃秘密将军队分向贺县及柳州、蒙山三处集中。贺县一路，出信都攻击梧州，由其子沈荣光指挥。柳州一路，出武宣攻击浔州，由邓瑞征、邓右文指挥。蒙山一路，出蒙江截击平南、藤县水道，由陆云高、陈春光指挥。我等对于沈军的计划，早在意料中，而其军队之行动，亦不断得有报告，便用最敏捷之战术攻占南宁，肃清左右两江。除以一小部驻守南宁及各要点外，其余主力，皆调回梧州、浔州。盖我们早料沈军必有此一着险棋，而预为布置也。

联军总部取销后的统一新阵容 自民十三年九月间，陆氏在湖南通电下野①，军事暂告结束，我们在广西的声势，甚为各方所注意。各方面都有代表，同我们联络，我们也不能不派代表和他们敷衍。这在那时环境，是不得不如此的。因为讨贼定桂两军的名目不同，联军总指挥部的组织，亦是权宜的办法，特别引起广东方面许多谣言与误会。十一月间，胡展堂、许汝为两先生曾有电邀我同李德邻赴广州，有所商洽，当时由我代表前往。同时，大本营方面，对于我们的发展，极表欣慰，并希望我们在革命政府之下统一起来，将联军总指挥部及定桂讨贼军的名义取销，由大本营另给名义以示统一。商量的结果，委李德邻为广西全省绥靖督

---

①见本书第90页注①。

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我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于十二月一日在南宁宣誓就职，随即将以前定桂军的队伍，改为第一军，以前讨贼军的队伍，改为第二军。一幕梁山泊式的趣剧，至此改易面目，另换一个新局面。下表所列即为我们那时的阵容。而真正实力，每军不过七八千人。表列各番号，亦有大小强弱的不同。

职务	姓名
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①	李宗仁
广西全省绥靖处会办	黄绍竑
参谋长	白崇禧
警卫第一团团长	郭凤冈
警卫第二团团长	陶　钧
第一军　军长	李宗仁（兼）
参谋长	黄旭初
第一纵队长	李石愚
第二纵队长	陆　超
第三纵队长	钟祖培
第四纵队长	刘权中
第五纵队长	何中权
第六纵队长	韦肇隆
统领	封高英
司令	刘日福
第二军　军长	黄绍竑（兼）
参谋长	白崇禧（兼）
第一纵队长	俞作柏
第二纵队长	伍廷飏
第三纵队长	夏　威
第四纵队长	蔡振云

①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宗仁回忆录》第153页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督办李宗仁，会办黄绍竑"。

第五纵队长	吕焕炎
第六纵队长	罗浩忠
边防第一司令	徐启明
边防第二司令	龙得云
游击司令	马夏军
游击司令	何正明
游击司令	陈秀华
游击司令	卢文枢
游击司令	余志芳
游击司令	封辅军
游击司令	陈先觉
统领	黄桂丹
统领	岑孟达
支队司令	陈济桓

联合粤军消灭沈部 我们两军的兵力，合计起来，还不及沈军的半数，如果要和沈军开火，获胜的把握，是很少的。这时粤军第一师尚有一部留驻梧州，沈军若将我军击败，粤军亦难立足，并且影响广东甚大。我乃商准李任潮增援，共同出兵。以粤军第一师第二旅及我第二军夏煦苍所部为右路军，向贺县、八步之敌攻击，由陈伯南担任指挥。第一军主力及第二军吕焕炎所部，为左路军，向武宣、柳州之敌攻击，由李石愚担任指挥。第二军俞作柏、黄超武等部为中路军，向蒙山之敌攻击，由俞作柏担任指挥。李德邻、白健生皆亲赴浔州，指挥中、左两路，我则率领其余部队，担任各路策应。沈军对我仇恨既深，蓄力亦久，来势至为凶猛。而我方将士，都知此役为生死存亡关键所系，无不勇敢奋斗。在几度艰苦危难之情势下，卒将各路敌军击败，节节进展。

右路军方面，占贺县、八步之后，随向平乐进攻。中路军占领蒙山后，随向荔浦进攻。敌军希图在荔浦附近，再作抵抗，我

中右两路会合，将其击败，敌遂向桂林方面溃退。粤军第一师抵达平乐后，即班师回梧州。此役得他们助力不少，公谊私情，至今犹难忘怀也！

左路军自武宣附近激战，续向石龙、柳州城追击。敌军因主将邓右文阵亡，兵无斗志，便放弃柳州，分向桂林及长安方面溃退。我乃重新部署，以白健生为前敌总指挥，率第二军之主力及第一军之一部，向桂林攻击。在桂林城附近，复将其击败，乘机占领桂林城，沈氏乃率残部向全州、湖南边境溃退。我们为彻底解决起见，由白健生率兵直追至湖南境内之城步附近，再将其击散，沈氏仅率其少数亲信逃入湖南，投依吴佩孚。这一段工作，完全由白健生负责，中间还经过不少的艰苦斗争。因我未尝在前方亲自参加，现在也无从详细追记了。我们另以李石愚率领一部追击向长安逃窜的沈军，直到贵州边境。自此以后，沈氏在广西之军事势力，亦继陆氏而宣告终结！

击败自治军残部 当我、沈两军正在激战的时候，南宁一带自治军林俊廷等残部，由都安、武鸣方面向南宁进迫。我守军伍展空所部，人数无多，竟被他们围困。当时我、沈两军相持甚苦，胜负未决，不能抽兵前往增援，只好令其固守待援，迨我军各路已获胜利，我乃亲率徐启明、何正明两部，乘船到贵县，由陆路向宾阳、南宁前进。林俊廷知我援兵将到，乃解围退去。我回到南宁的时候，大约是十四年二月下旬。不久，又回梧州，因桂柳方面的军事尚未结束也。

对沈军的战事，发生于十四年一月下旬，我们到处都是采取主动的攻击，所以很快就将其击败。到了二月中旬，他的主力已经完全崩溃，虽然残部还待肃清，但已经不能为我们大碍了。我们所以要那么迅速的作战，固然是用兵的原则，应该如此。同时也为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更大的战役，紧随在后，不容我们稍有犹豫。这敌人，就是唐继尧及其派入广西的滇军。

唐继尧派人游说 十三年冬天，我在梧州，忽然由云南方面

来了一个姓文的同学，并带有唐继尧的信件，信内无非是应酬联络的话，并没有什么重要的表示。但我却料定他此来用意，志在窥察两广方面的情形，当时也只好同他敷衍一番。不久，又派一个姓高的同学，带有川滇黔联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拟委德邻同我为他的部属，并且同我商量，共同出兵入粤，解决在广东的滇军。同时还带着煽惑恐吓的口气说："沈军和在粤的滇军桂军内部，都已有秘密的联络。"态度非常傲慢，令人难堪。而且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好象我们已经是他部下似的。我们那时因对沈的军事，正待发动，也只好隐忍在心，和他鬼混。同时密电广州方面，预筹对策。等到对沈军事发动，那姓高的知事无可望，乃悄然溜往香港，而滇军亦由滇黔各地分途向广西进发了。

粤方派范石生部协助讨唐 广州方面接得我的报告，亦认为情形非常严重，若待滇军迫近广东始行派兵堵击，则内部问题必多，反难着手。即徇我们的请求，派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率部援桂。盖范氏主张滇军回滇最力，反唐亦最坚决，若能在桂将唐军击败，自可长驱回滇，以遂其愿，故以范军援桂驱唐，实在是最妥当合理的办法。

原来唐氏自四川失败之后，为顾品珍反对一度下野。民国十一年，谋刺顾品珍成功，重获云南地盘，但对四川已不敢再事问津。同时贵州方面，也和他处于敌对地位，而且地方贫瘠，不能发展。他虽然自称为川滇黔三省联帅，实际仅只有云南一省归他统辖，当然不能满足他的野心。正值国父孙总理逝世后，两广局势混乱，不觉动了染指之心。以为失之川、黔者，若能得之粤、桂，未尝不可稍偿其愿。便以解决入粤滇军为名(三杨、范、蒋皆为顾品珍所部，因反唐而入粤者)，定假道桂省，进取广东之计。同时夜郎自大，料我慑于联帅威名，必能受其委任，就彼范围。并以为陆、沈余部，尚有很多力量，即不能兼收并蓄，总可得一方之用。殊不知广西军民，对客军入境，已深恶痛绝。我等负责本省军事，岂容他窜入。况陆、沈残部已为我解决，能为其利用

者，仅零星之杂色部队，发生不出什么力量。这是唐氏始料所不及的。

唐师东犯与我方部署 唐氏侵粤入桂的部队，用建国滇军的名义，分为两路：唐继虞为第一路总指挥，约三万人，号称五万，由贵州之榕江，向桂边桂林进发。第二路总指挥龙云，约三万五千人，亦号称五万，分由百色、龙州向南宁进发，声势甚为浩大。第二路军在十四年春天进迫南宁时，南宁守军，仍为伍展空所部，仅二三千人。我军主力则在湘桂、黔桂边境，追击沈军，正当九仞一篑之际，抽调尚须相当时间，乃用省参议会及民众团体名义，去电拒止。唐氏复电，有“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不便中止”等语。那时形势，至为危急！我等仍竭力隐忍，除暗中积极准备外，一面暗示民众团体和他敷衍。一面令伍展空保持实力待彼军迫近时，即行退出南宁，向宾阳方面逐步后撤，不必和他破裂。务使他们不明我的态度，以长其不战而定广西的骄志，要是破裂太早，彼必积极进攻，我军部署未妥，自难和他应战。同时，并令俞作柏部由桂林方面，星夜向迁江集中和伍部取得联络，一面电大本营，促范军迅速西上。唐军见我撤退，仍步步进逼，前锋直抵宾阳附近。此时俞部已在迁江附近和伍部取得联络。范军亦由梧乘船西上，至贵县集中。我率罗浩忠、邓竹林等部与范石生同抵贵县，会商作战计划，并发表讨唐通电，时十四年五月九日也，原电录下：

(衔略）去岁曹吴未灭，我大元帅孙公，以北伐讨贼为职志，东撤惠博之围，予陈炯明以自新；西颁副元帅之命，予唐继尧以振拔。陈既负固东江，不自悔悟；唐复按兵滇境，严拒宠命。及至曹吴覆灭，我大元帅简从北上，号召和平，为国忧劳，以致薨逝。正举国地裂山崩，痛悼哀毁之际，唐继尧乃敢妄冀非分，擅自称尊，出兵邕龙，图占桂粤，希冀颠覆我革命政府，捣乱我西南和平。凡有人心，莫不发指眥裂！本月佳日，奉读

谭、杨、许、程诸公江日通电，殷殷于继续大元帅遗志，努力革命工作，并力辟唐假借名义，祸国叛党。足征整饬纪纲，义正词严。宗仁等不敏，誓当督饬滇、桂子弟，力从诸公之后，为拥护我党主义，先驱杀贼。海枯石烂，此志不渝！仅布区区，诸维亮察！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范石生、杨蓁同叩。（按此电为范石生亲拟，彼固好弄笔墨，常以“军中一范”之图书示人，亦可见其抱负也。）

我军围攻南宁失败 我军由宾阳以北，范军由宾阳以南，向唐军包围攻击。彼方知我两军兵力，仅五六千人，乃向宾阳以西之山地撤退，在高田圩附近，据险扼守。我伍部亦跟踪前进，于高田圩附近，展开激战。我到前线视察，认为正面山高地险，不易进展，即令俞作柏率一、四两团，由右翼绕攻古漏关，直捣昆仑关，深入其侧背，敌军乃仓皇撤退。我军衔尾直追，至八塘，又与其增援部队展开激烈战斗，虽又将其击败，但双方伤亡，均极惨重。同时接得李德邻电报，谓唐继虞、吴学显等滇军三万余人，已由贵州开动，向广西边境前进。沈军残部，复由贵州边界回窜。柳州兵力单薄，嘱我抽兵回柳。此时范石生及其所部，亦陆续到达，我即同他商量，希望他接替我军，继续向南宁攻击。范部久未经战，骄气逼人，彼见我部兵力不强，枪械又非犀利，亦能获得胜利，可见唐军战斗之力薄弱。以彼军人数众多（四个旅约万五千人），械弹充足，自不难一鼓而下南宁。因此对我之要求，并无难色。并谓桂军只要留少数到南宁，足能够维持治安的兵力即可，其余尽可抽调。我即时下令俞作柏所部，开回柳州，仅留伍展空、罗浩忠、邓竹林等部，作为第二线，协同作战。唐军由八塘撤退，至二塘附近，与南宁部队会合，重新部署，扼险防御。范军自晨至申，尚未能将其击破，驰文通报，希望我部参加攻击。至翌日午后四时，始将敌人驱入南宁，据城固守待援。我与范军追抵城下。南宁城南北狭长，南端面临邕江，北端与长罡

岭上之镇宁炮台衔接，城之周围，皆有壕堑，敌军据守镇宁炮台，我向城垣攻击，至为不易。范军担任东门、北门及镇宁炮台之攻击，我军担任南门及水闸门之攻击。围攻半月有余，因缺乏大炮，仅赖步兵进攻，虽屡薄城边，终于无法攻破。而且伤亡极大，相持日久，唐军援兵胡若愚部万余人，已进入桂境，向南宁前进。我得报后，急电李德邻，仍将俞作柏部，由柳州调回。俞部尚在途中，胡若愚的军队，已先到达南宁。守城唐军得到援兵，乃由镇宁炮台及北门方面突然出击，将范军击败，旅长杨荫阵亡，官兵伤亡惨重。长罡岭一带高地，皆为其占领，将我、范两军压迫至邕宾路以南及邕江以北地区。范军队伍，非常混乱，情形颇为险恶。沿江河港甚多，退却极为困难，幸当日唐军因激战之后，不敢猛追，因此我军尚有整理布置之机会。否则，全师溃散，不堪收拾了！

再度围攻邕城唐军 当时，我退到离南宁七八十里之蒲庙圩对岸，和范石生及其总指挥杨蓁会商，认为我军应即渡过邕江，到南岸稍为休息整理。因我控制轮船极多，渡河极易。万一追到，彼无涉水工具，亦唯有望河兴叹而已。范杨对我计划，极表赞成，乃分配船只，分别渡河。我的部队在黑暗里，很静肃迅捷地退到南岸。范军则灯火烛天，扰攘终夜，直至次早方能渡完。我对范军，当初颇信其能作战，自经二塘之战，邕城溃退，蒲庙渡河，乃深知其将骄卒惰，军纪废弛。而且高级将领以至士兵，多染有烟瘾。我从前看佛山人所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描写满清时代绿营的腐化，说是一个兵有两枝枪，是大枪、烟枪。当时以为必无此事，不料十四年所见的滇军，也竟有这等同样情形，而且滇军每一士兵，还带着一盏烟灯，在黑夜行军的时候，活象一个提灯队，行列漫长，煞是好看。这是当时滇军的“特色”。由此亦可测知他们的前途。

唐军知我、范两军已渡到南岸，沿河船只，又尽为我控制，尾追无益，乃退回南宁城。复由城南架浮桥渡江，沿江南岸向蒲庙

猛追。我们本拟在蒲庙附近，布置阵地，再行迎击。经我和杨蓁同到前方视察的结果，见敌军先头部队，已渐逼近，而范军布置尚未完毕，要是轻率从事，贸然接触，必至队伍散乱，难期良好的战果。于是我复提议：两军连夜渡至邕江北岸，并由我部轻装连夜进袭南宁城，范军跟随前进。因唐军主力已离南宁城，由南岸向我前进，城内必然空虚。我由北岸偷袭，沿途皆无阻碍，若能偷袭成功，则可反客为主，我即固守南宁城，将敌逼退。即使偷袭不成，彼主力必须回救，也难再向我追逼了。计划既定，我军由伍展空亲率袭击队，星夜进行，于次日黎明，到达城门附近。城内敌兵虽少，但闭门防守，一时亦不能冲进，遂在城郊附近，再展开攻城战。范军亦接续赶到，重将南宁城包围。敌军进扑蒲庙，空无所有，及知我军围攻邕城，亦遂急由南岸救援。数日之间，我军在邕江两岸，旋进旋退，使唐军往返追逐，捉摸不定，好象迷藏儿戏一般。而唐军反因此不敢再行离城追击，一直相持到中秋后撤退为止。其实，我范两军久战疲劳，伤亡亦大。攻城既不可能，又须抑止其顺流东下的企图。乃采用这种避实击虚的战法，使敌不能判明我的实力和企图，攻势便因而顿挫。此种战术，固极巧妙，而危险程度亦很大。不是我熟悉地形，情报确实，亦不敢出此险着的。

正当我军再围南宁的时候，俞部亦由柳州赶回，但仍未能将南宁攻破。我们恐屯兵坚城之下，仍蹈上次失败的覆辙。乃采用杨蓁的计划，将南宁城东南之围撤去，转移所有兵力于城之西北方面高峰隘至甘圩一带高地，择险扼守，并遮断唐军对百色、龙州之交通路线。此计划之特点：第一、我将正面开放，唐军若不顾我而东下，则我攻南宁而蹑其后，成为前后夹击之姿态。第二、唐军若向我攻击，即使能将我击退，甚至向我追击，我军可向西北撤退，则唐军反因追我而趋向西北，与其东下之目的相反。第三、地形险要，兵少易守，可以休息整顿，维持一个相持的局面，而使我军在其他方面有回旋转动之余暇。这个计划，可说是相当妥

善的。

范石生因上次的失败，深知自已部队的不能作战，乃竭力整顿军纪，先作戒烟运动，范杨等高级官长，以身作则，首先戒除，然后及于下级官长与士兵，收效颇大。其次，为整训工作。范杨等亲自朝夕督率，极为认真。可惜积习太深，改变不易。而杨蓁尤操之过急，处罚不当，致结众怨，为其部下所刺杀，深堪惋惜！

柳州解围 这时我因身体不好，回梧州休养，由李德邻亲率钟祖培前来换替。回梧不久，柳州又告吃紧，唐继虞、吴学显两部，先后由贵州进入桂边，李司令石愚率部在边境阻拒，因众寡不敌，节节败退。我急电白健生率部由湘桂边境赶回柳州，并电李德邻将伍展空、钟祖培所部由南宁调柳州，电李石愚缩短防线，固守柳州待援。不幸李石愚中弹阵亡①，仅有张任民、石化龙、石楚琛等一班幕僚，在柳主持。而白健生所部，又仅有吕焕炎纵队赶到，主力尚在途中。我因柳州指挥无人，兵力单薄，情势已危险万分，不得已力疾从戎，由梧州乘轮赶赴柳州，此时吴学显部七八千人，已围攻柳州数日。我并侦知唐继虞主力已到达长安附近，距离柳州不过四五日行程，形势愈加险恶。幸伍、钟两部，已由南宁赶到，我遂决定计划，不待白健生所部到来，先将吴学显敌军击破，以解柳州之围。这样，我的兵力始能活动。若迟延时日，唐军主力到达，即使白部到齐，胜利仍无把握。我本南宁攻城失败之教训，料定敌军攻城日久，兵心已懈，且不知我援军到达，必无准备。乃不稍犹豫，当晚即下令出击，以一部由柳江南岸，绕至马厂附近渡河，向他们侧后进攻。其余主力，于拂晓时分两路突围而出。敌军猝不及防，仓皇退走，为我击毙甚多。后经我马厂附近之部队包围伏击，遂溃不成军，向沙塘、沙浦逃窜，与唐继虞主力混合。是役我以迅速之时间，密集之兵

①据广西区政协冯璜委员回忆，李石愚负重伤后，在梧州留医病故。

力，突破敌阵地之一点，收获极大之战果。敌军伤亡被俘者达半数以上。

沙浦大捷　我判断败退之敌军与其主力会合后，必来再攻柳州。爰以一部仍固守城防工事，其余伍展空、钟祖培、林竹舫、吕焕炎等部，由我亲自指挥，向沙浦追击。进至上雷附近，知唐继虞主力已过长安，向柳州前进。因留一小部分军队，向沙浦方面警戒，与敌保持接触，同时以主力转向东泉推进。因当时我与白健生尚未取得联络，若再向沙浦前进，和敌人接触过早，敌我兵力悬殊，不免被他各个击破。故暂停追击，而以主力转向东泉，期与白部靠拢。如果敌人不发觉我主力所在，而直下柳州，我城防守军，定能和他抵抗相当时间。我以主力后面夹击，自可将其消灭。要是敌人不向柳州，而向东泉进攻，我与其支持若干时间，白健生所部，定可赶到，亦可两面夹攻，将其击破。战略既定，开始动作。到达东泉的第二日，白健生才率部赶到中渡县，敌人先头亦将到达沙浦附近，当天晚上，我走了三十余里的黑路，与白健生在电话中商量。他的意见，是要把他所部由中途迂回至沙浦的后面，作大包围的态势。这个意见，未尝没有理由。但我以为敌人力量，远过于我，且我军屡经作战，伤亡亦多，万一正面先被突破，此种迂回战术，不独无效，反要遭受危险。彼此争执甚久，最后我要他尊重我的意见，以主力向沙浦前进，以一小部作小迂回，向沙浦后方配合正面攻击。

这次我与白健生在作战上意见的争执，恰如我们两人平日下围棋一样。他一向用的是包围战术，总是喜欢把对方包围歼灭。我是惯用突破战术，看准对方的弱点，突破后而反包围之。自然这两种战法是没有绝对的利害的，所以我同他下棋，总是相互的大胜大败。不是我被他包围得水泄不通，便是他被我突破得零落不堪，从来就不易得到平手。但是用包围战术要有优势的兵力，而我们当时却是劣势。所以我同他争执得很厉害。

当晚回来东泉，已是午夜一点多钟，即下令向沙浦攻击，以钟

祖培担任左翼，林竹舫担任中央，伍展空担任右翼，吕焕炎为总预备队。自次早七八时起，即在沙浦以南地区接触，战斗非常激烈。中央林竹舫部为敌人抑制于小河沟之下，情形颇为不利。右翼伍部与敌人争夺白马山，五得五失。自晨激战至午后两点钟，总预备队亦使用净尽，情况未有进展。敌仍不断渡过沙浦河，向前增加。午后三时，白健生之先头部队夏煦苍两团已赶到，即令其增加右翼，始得确实占领白马山。此时我炮兵亦已赶到，在白马山上放列。我与白健生皆亲至炮兵阵地指挥，即下令全线进攻，并令左翼钟祖培分兵一部，由沙浦下游渡河，绕攻沙 浦 之 后。同时发炮将敌人所架之浮桥击断，并轰击其增援部队，炮弹皆极准确。敌见左右侧后皆为我包围，正面攻击又非常猛烈，遂不支溃退。及至河边，浮桥已断，被迫下水，淹毙者二千余人。缴械被俘者二千五百余人，死伤于阵地者亦千余人。我军伤亡亦极惨重。此实为广西统一战史中最激烈之战斗，亦为俘获最多之战斗。唐吴残部乃向长安沿路逃窜，因时已入夜，亦不便追击。这时，南宁范军，因气候不宜，病死甚多，亟欲得云南子弟补充。我打电话告诉他，俘获二千五百云南兵，送他补充。他当时颇不相信，还以为我是哄他的呢！

柳州地形，易守难攻，因为柳江由北向南，至此忽作一百八十度的弯曲，转而由南向北流去。流域中间，形成一个狭长半岛，柳州城就在这半岛的尖端上面。城北两江间之距离，不过两三公里，是最适宜于少数兵力防守的地方。我们将他从沈军手里夺过来的时候，就知道这里是桂林、南宁间的枢纽，在军事上有重大的价值。所以早把防御工事，建筑起来，除内外战壕之外，并在四周地面深插尖锐的竹签，作为副防御工事。这是我们历年用以围困土匪有效的障碍物，现在利用作为自己的防御工具，亦同样奏效。南方部队向来都穿草鞋，对于埋在草地内之竹签，既无从认辨，又无从躲避，随时有被戳破脚底的可能。唐军首先吃了这种苦头，便被我们阻挡，而不得进展。但是后来我军出击，也费

了很多的方法，才得通过（系由木板敷在上面，由板上通过）这个障碍地带。有很多粗心的士兵，脚底也吃了这等竹钉的亏。

沙浦胜利，真使我兴奋极了！拼命苦战，数昼夜不得眠息，仍不觉疲倦。大家手舞足蹈，儿把平时下棋的姿态，都能尽情流露出来。我对白健生说：“看谁的棋子厉害？”大家狂笑，以鸣得意。甚至老百姓更是成群结队，不远数十里，跑来看俘虏。因为他们也知道这是决定广西命运的战役，而他们是首先得到解放者，从此可不受客军蹂躏的痛苦了！当初，他们还不相信有这样大批俘虏。有的人说：“就是虾蟆（即青蛙）也不能一下活捉这许多！”

柳州沙浦之战，为当时广西全局胜败存亡之关键。我很自负地说：“这是我指挥的敏捷和谨慎，未尝发生若何错误，有以致此。”然而不是我军官兵之勇敢牺牲，将领之协同无间，亦不能收此伟大的效果。民国三十三年，我与黄旭初、伍展空两兄同到沙浦视察水利工程，战场凭吊，感慨滋多！二十年前将士之碧血，今竟化为人民生产之甘泉，亦差可告慰我泉下之英灵矣！我并提议在白马山水闸处，立一沙浦战役纪念碑，以垂永久。并题《破阵子》词一阕，以寄兴云：

> 二十年前戏战，追怀往事堪惊。白马岭挥兵督阵，沙浦河掩唐氏兵，虫沙白骨撑。　　放马归牛及早，从未梦幻功名。莫再任光阴浪掷，五十犹余人半生，芜田正待耕。

唐军残部回窜云南　唐吴所部滇军，自经此次失败之后，死伤失踪和俘虏，约在半数以上，但残部尚近万人。他们退到长安附近，因为贵州的周西城对他们素表反对，不敢向贵州境内退去，而转向庆远西窜。我们忖度他的企图：第一、向南宁与龙、胡所部会合。第二、由河池、东兰、凤山、凌云窜回云南。最可虑的，是他向南宁与龙、胡会合。所以我们不再尾追，将主力撤回柳城，在其南侧并行西进，以截阻其窜往南宁之路。我到达

柳城，旧病复发，将前方指挥任务，交由白健生负责。白健生对我说："敌人虽然败了，但是剩下的力量，尚不可轻视。必须再有一二次激烈的战斗，才可将他歼灭。我不是推卸责任，恐怕你回去之后．士气要受影响呢！不如你带病在前方，由我负实际指挥的责任。"可见我们对滇军并未一刻轻视。后来，果然在庆远、怀远等处，尚有两次激战，我们复将其击败。敌人残部不过五六千人，由东兰、凤山、凌云逃回云南去了。

十四年七八月间，我由柳州乘船回梧州，固然是因病，但粮饷械弹，也得我回去筹划。途中腹部疼痛不堪，又不知是什么病，应吃什么药，只有不断注射吗啡针，麻醉自己的知觉神经，以减少痛苦而已。到梧州入思达医院检查，才知道是盲肠炎。经医治调养，不久即告健复。

这时，庆远方面，仍继续作战，南宁方面敌军又死守不退，而饷糈浩繁，罗掘俱穷。各处请饷之电急如星火，真是"韩信前方叫，急得萧何要上吊"。我们数年以来，一向保持不向人民借钱、借米，不向商家摊派款项的宗旨。除了一些各地捐税来源之外，真是一筹莫展。我正极度困难的时候，恰好南宁滇军偷运出一大批烟土，约有二十余万两，为我截获，得以渡过困难关，岂非天助？

以前由云南向外省出发的部队，军中都带有大宗的鸦片烟土，不但是随军事的进展而获得极大的利益，并且就以烟土为粮船①，发给士兵，叫做"黑粮"。我想南宁的滇军，也许是因为我们把东南正面的围撤去，所以趁此机会将随军带来的"黑粮"运出变买，以充饷项。战争时期，作战部队的武装走私，今昔中外，似乎都是一样的。

桂境客军的肃清　固守南宁的滇军，自从我们改变围困的方

①应为"饷粮"。黄绍竑解放后所撰《滇桂战争》一文中有"当作饷银发给士兵，叫做'黑银'"（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2页）可作参照。

法，既不敢东下，又不敢向我新阵地攻击。猜度他的用意，大约先是期待柳州方面唐吴军的胜利，再行发动。等到唐吴在柳失败，又想等待唐吴残部来南宁会合。不料唐吴又被我军败于庆远，残部已向滇边逃窜。而且广西西部气候恶劣，至不适于滇、黔两省士兵的生活。我们移军作久困的计划，而不急于攻城，也就是要等候恶劣季节的到来，使他们为病魔所困，而日渐死亡，自己消灭。我们军中盛行的一句话："等到吃黄瓜，送你回老家。"就是说：夏天时候，黄瓜旺盛，夏秋之交，恶性疟疾，便流行了。滇军爱吃黄瓜，食后便为病死。其实并不是黄瓜会害人，而是黄瓜旺产的季节，便是恶性疟疾最猖獗的时候。在六七月间，我们就接得报告，滇军在南宁病死的很多，商会代为埋葬的尸体，已有四千多具。后来染病的人越多，病死的人也越多。到了八月间，情势更为危险，若再坐困下去，必至死亡净尽而后已。于是不能不弃城狼狈逃回云南。我们遂于十四年的八月中旬收复南宁。一面派兵分途追击。这时，他们在右江方面的退路早为我所遮断，而驻在百色、平马的自治军刘日福所部，亦为我所收编，刘亦做了我军的旅长。所以滇军仅有龙州一路可以退走，龙、胡所部三万余人，经先后战死及病死，退走时，不到半数，亦云惨矣！

范军分由龙州、百色两路尾追龙、胡残部。我方亦派刘日福等部协同追击，直至逼离桂境而还。至是侵入广西之客军，始完全逐出境外，而内部之自治军及沈军等残部，亦解决者解决，改编者改编，仅余极少部分，乃逃入湘境。不久以后，亦相率就范。广西自民十以后，整整的混乱了五年。我们以微弱的力量，崛起于玉林、梧州，经五年之艰苦奋斗，卒将客军、自治军、沈军陆续驱逐和消灭，广西统一，始告完成。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

两个巧合的趣事　当十四年春，我正要出发攻击南宁滇军时，曾找一占牙牌的人，预卜前途胜败。其卜语曰："倒退如牵

上濑舟，黄杨厄闰苦虔刘；须知柳暗花明处，乃在山穷水尽头。”我当时具有胜利的自信心，对这种卦语，仅以一笑置之。谁知始而南宁失守，再而围攻南宁不下，继而柳州告急，真如倒退之上濑舟也。而是年旧历，适有闰五月，我们所遭遇的艰苦战役，皆在这一个月内进行着。黄杨树逢闰而厄，战事亦竟逢闰而苦于虔刘。我们那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忽而反败为胜，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造成统一广西的新境界。真所谓“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这种占卦或扶乩所得的迷信诗句，都含有正反两面的意义，而模棱其词，使适合于任何事件。人们事后推详，往往断章取义，以彰其灵异。即就上面的卦辞而论，前两句是正面的意思，后两句是反面的意思。不过这次战事的经过，恰巧与这个诗意差不多，故事后颇觉其灵验。其实任何一次战事，何尝不是先难后胜呢！此外尚有一个故事，在我未出发以前，那个卜卦的人同我看相。我问他前途胜败如何，他说：“胜是胜的，总要到八月以后。”我大不以为然，因为我们每一次战争胜败，都是三四个月就解决了。所以对滇军的战事，也是同样打算。他见我不以为然，就说：“我等到八月中秋以后去南宁领赏，但是要加十倍的赏钱。”我也有口无心的回答：“好！好！”他就回去了。等到克复南宁，他果然来了。我只好补给他五百元的赏金。其实这些走江湖的人，他看事也有些眼光，而且当时我最多给他五十元，如果他的话灵验了，就可收到十倍的利益。这种放长江钓的办法，何乐而不为呢？这都是在那次战争时期的趣事。

拒绝川军假道 当我军驱逐滇唐部队出境之后，境内战争，已告结束，本来可以很多的力量，帮助范石生回滇，将唐氏根本铲除。可是八月间，就接得情报，说是驻湘、黔边境的川军熊克武部，已向湘、黔、桂三省边区移动。我们对于这个态度不明，向我边界移动的部队，自不能不加注意，而妥为防范。所以当南宁克复之后，即将所有部队调回柳桂方面，对于助范回滇这一个道义的任务，只能责成驻在百色的刘日福去担任。而当时范军见唐军残

败，尾追不停，亦似不甚需要我们帮助，即可单独入滇。可是，后来在滇境复为唐氏所败，重行退回桂境，因此对于我们不无怨怼情形。其实我们亦是屡战之余，疲惫无力，本来也不能越境作战。加以川军压境，自顾不暇，确无余力助人。这种苦衷，当时亦正难得人谅解呀！

熊克武系国民党的老前辈，自十三年在四川失败后，率部寄驻于湘西黔东边境，十四年八月间，就将部队向湘、黔、桂边境移动，并派代表来桂洽商假道入粤。据说系奉中央命令。其内幕究竟如何，我们亦不甚明了。拍电请示广州的大本营，亦未得到确切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只有一面作军事上的布置，同时以滇军初退，地方疮痍未复为词，拒其入境。熊军见我防备甚严，亦未敢作过分之要求与深入，而只是由桂北之三江、全县、兴安、灌阳转入湘南之道州、蓝山，而入驻粤北之连县、阳山。我们对于过境的客军，一面尽地主之谊，一面尽防卫之力，这一个川军过境问题，总算很顺利的结束了。

广西统一后首次越境驱逐川军 这时，广东方面，情形极为复杂。外面则陈炯明在东江之势力未消，内部则杨、刘正酝酿着事变。川军驻在粤北，对各方影响非常之大。熊氏在广州，忽然被大本营扣留起来。其中原因，我到此时还不很明白。他的部队由汤子模、罗观光统率，复向湘、桂边界回窜。大本营派军由北江追击，并电广西方面出兵截击。我们奉令后，即派夏煦苍、钟祖培、蔡振云三纵队及陶钧、郭凤冈两警卫团，由白健生指挥，分为两路，一由贺县出桂岭连山，一由富川出江华，向其退路截击。熊军亦颇能作战，在二三次接触之下，彼此都很有伤亡，但熊军以避战为主，我军亦不欲深入湘境。熊军远遁后，我军亦班师回桂。这是我们在统一广西时期中，第一次的越境作战。这一次战役，虽然是奉令进行，但我们军队的作战精神，就不如在省内各战役那样自动的牺牲了。可见战争要有自动自觉的内在要求，才能发挥高度的战斗能力，这是一定不易之理。

奉令协助粤军肃清粤境叛军 十四年冬天，大本营以广东东江的叛军已次第肃清，而南路的钦廉、高雷、两阳、三罗，尚为陈炯明余部及由广西窜入之陆谭余部所盘据，其将领邓本殷（总指挥）、申葆藩（副总指挥）尚拥众两万余人，为革命军的障碍。乃任李任潮为粤桂军联军总指挥，分四路进剿。以陈章甫为第一路，自肇庆向三罗进攻。以陈真如为第二路，由新会向两阳进攻。俞作柏为第三路，由陆川向高雷进攻。以胡宗铎为第四路，由上思向钦廉进攻。第一第二两路为粤军，第三第四路为桂军。

此次战役，除俞作柏进攻高州城较为激烈外，其余皆顺利进行。盖此种残余军队，无组积，无团结，械弹又极缺乏，一经接触，即行败退，纷纷请求收编。故经过时间甚为短促，至此，两广旧军之残余，乃告完全肃清。这是我们在统一广西战役中的第二次出省作战，亦为陆谭残余势力的最后消灭。盖邓本殷、申葆藩等，那时虽为粤军粤人，而以前皆与陆谭有甚深厚之关系也。我们的部队，自军事结束后，立刻班师回桂，地方政府问题，皆由粤方处理，丝毫不加干预。一则不欲留给粤人一个不好的印象，二则本身亦急待整理也。

统一广西后的感想 我自民国十二年六月间出兵梧州起，至民国十四年年底止，不但把在广西省内的陆沈势力及散兵、土匪肃清，同时将包藏野心据桂窥粤的强大唐军击败，驱逐出境，完成广西的统一。并且协同广东驱逐川军，底定南路。在这短短的两年半中，经过了五次的大战，差不多平均每半年便碰到一次。而零星小战，则多至不可胜计。我们在这个时期内，不论是高级的长官，或下级的士兵，无一不是时刻过着单纯而紧张的战斗生活。也可以说："这紧张而单纯的战斗生活，便是完成广西统一工作的一个潜在而伟大的力量。"

一个正在衰退着腐化着的旧势力或旧组织，其当局者也许知道他本身已到处都是弱点，到处都在腐烂。也许完全不感觉到他自

己有弱点，自己在腐烂，而依然泄泄沓沓的过日子。此种旧组织或旧势力，往往以其一贯的旧方法，来挽救其垂危的命运，其结果一定是愈弄愈糟，终至一败涂地！所以我们在中国四五千年里的历史中，所见到的“中兴事业”，真是凤毛麟角。这便是一般都逃不了前面所说历史公例的缘故。即使我们的历史上有汉光武、唐肃宗那些辉煌的中兴事迹，而其中兴的主角与其所用的方法，必与旧的完全不同。昔人所谓“拨乱世而反之正”。此种拨乱反正的工作，非新的人物与新的方法，决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这也只可以说某一旧朝代的中兴，而不是某个旧人物的中兴。汉光唐肃都是承前代之弊，当衰乱之后，困心衡虑，举贤授能，研求前代所以衰敝乱亡的原因，一反其道而行之。政治循轨，民心归顺，师行所至，无不壶浆以迎，所谓“以至仁伐至不仁”，才能收拨乱反正之效果，亦所以造成一代中兴的伟业。陆唐两氏，欲以其正在崩溃腐烂中的旧基础，与曾经失败过了的旧方法，妄冀东山再起，纵然给他一度的重张旗鼓，结果只等于回光返照，仍逃避不了败亡的劫运，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道理。再从反面说来，一个面对着正在崩溃腐烂的旧组织旧势力之新的集团，其结果所获，恰恰与此相反。凡是旧的方面认为没有办法的地方，正是新的方面最有办法的事情。如果新的方面时常针对着旧的方面的弱点，去追求新的方法，来健全自己，并对着敌人的弱点进攻，这就是革命成功最有效的手段。

我们这一群，当初不过是几个二十七八岁尉官阶级的陆军学生，行动即无组织，社会上也没有甚么地位与威望。各人只是具备一副纯洁的胸怀，热烈的情绪与锐敏远大的眼光而已。我们在极端腐败的旧环境中，不曾为它所融化，而是深邃的审察环境，不断的陶炼自己，使自己不断的获得进步。我们的结合，是偶然的，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那时由于各方面的压迫，使我们不得不结合在一起，以求自存。其中虽因出兵梧州问题，而发生类似分裂的现象，然终于在会师南宁的时候，把它弥缝过来，成为更雄厚更

坚固的团结。这是双方共同一致的密切联合，而不是一方面的单独企求。回忆我们在初期复杂的结合，与复杂的环境之下，不免有少数人发生自私的权利意念和行为，我们都是以善意的自然方法，逐渐予以革除，随时予以纠正。所以在这一个阶段里，虽然淘汰了很多人，但均系自然的落伍，而不是勉强的牺牲。所以我们一方面得到人事上的调和，同时亦不妨碍我们顺利的进行。而尤其使我们念念不忘的，乃是李德邻的仁厚坦白，公正诚恳，不念以往之瑕疵，力求事后之改进。当两军复合之后，对于自己所部之陈旧落伍分子，尽力淘汰，丝毫不存私意，使彼此成为崭新的进步的整体。这真是他最伟大的地方，值得我们钦佩的！

讲到我们那时的力量，实在是太渺小了。当初，我在梧州带出来的部队，不过一千人，枪枝又不齐全。即使和玉林方面联合起来，亦不过二千多人，不足二千枝枪。而这时，我们敌对方面的力量，多至二十余倍。可是我们并不自馁，且具有“自反而缩”的勇气。我们对于庞大的敌人，真是庄子所谓“目无全牛”的精神。照我们所定的计划和步骤，一块一块的把他支解下来。虽然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心思与很多的时间，终于把众多的敌人，完全歼灭。而我们的锋刃，不仅不使其稍挫，并且不断的锻炼，不断的磨砺，以加强我锋利的程度。我们是一面打仗，一面整军。整军一次，打仗一次；打完一次仗，又整一次军。到了战事终了，我们的整军工作，也大致完成了！总计近十万名的敌人，到了我们掌握最后胜利的时候，加以整编，连我们原有的力量，合计起来，也不过四万人左右。我们的不需多兵，和屡次的以少克多，都是因我们的力量是整个的、团结的。在任何一个场合里面，固然是各人各尽其当前所负的责任，然而并不只顾自己，坐观胜败。遇到友军危急的时候，便不等上级的命令，而自动的去协力援助，尽其最善最大的努力。我们上自总指挥，下至士兵，没有一个不是战斗员。每当危急的关头，我与德邻、健生，都免不了手执火器，同士兵一样的在火线上作最后的搏斗，决不稍存顾

惜自己的打算。这都是我们优于敌人的地方，也即是我们获得胜利的主因。

我们在用兵方面，决不单靠精神的力量，对于物质亦非常重视。在这短短的两年半时间之内，建立规模相当完备的制弹厂、造枪厂、制药厂、炸弹厂，是以我们的枪械弹药，虽因不断的作战，而大量消耗，但仍得不断的补充，不断的杀敌。当时，我方弹药的储备，比任何一支敌人都来得充足。这也是我们以少胜众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我国地理上看，重要河流的发展，都是由西向东。而翻开中国近百年来的社会进化史来看，文化的发展，则是由东而西的。广东处于珠江下游，也就是广西的东面，首先接受了西洋的物质文明。陆氏虽以一时的武力，侵入广东，可是因为不能顺应世界潮流，求其本身的进步，以之改造广西，遂陷于败亡的结局。这是我们所亲见的。假使我在当年不出兵梧州，就不能接受向上流发展的新文化，也就不能发生革命的新力量。可是我们在当时已正确的认识，不再象陆氏那样只求武力的向东发展，与文化革命的潮流相背逆，而必须顺应文化革命的潮流向西挺进，以求广西的改造。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当革命的初期，在封建的落伍的旧眼光看去，虽然有许多不习惯不顺眼的地方，因而引起若干不良的批评，或足以引起各方指摘的不良事实。然而革命的前途，始终是光明的，革命的工作，毕竟是进步的。那些不正确的批评，和若干必有的瑕疵，是掩蔽不了它的光芒，阻碍不了革命的进步的呵！当我出兵梧州接受了革命的使命，不但广西那些旧军人，要责备我出卖本省，就是玉林方面，在当时也未必能完全谅解。处在这新旧潮流汇合的箭头的尖端上面，虽然我的箭头是正确的向西进指，但是在某一时期，与某种场合之下，就不能不作适当的回旋，借以减少可能避免的障碍。否则不顾一切，迳直冲去，也许要因各方的不认识，不谅解，受到极大的挫折，而不能顺利的到达目的。而这种回旋的手腕，无论是对旧的方面，或新的

方面，都是一种极困难的工作。革命的力量，实在是太伟大了！他赋予了我百折不磨任劳任怨的勇气和精神。不论物质的，精神的，有形的，无形的，一切困难，都为我所克服，一切胜利，都为我所掌握。我始终不忘在梧与粤军将领的合作，得到他们很多的助力。尤其是李任潮的宽厚明察，他对广西没有私心，他不拘束我，不干涉我，任由我自己的发展，比之用实力帮助，尤为伟大。固然在私人情感上，是值得纪念的事，而处在潮流顺逆革命成败的关键上，尤为值得记载和称颂的事实。此外，我们那些干部，始终是追随我们，奋斗到底，中间只有来归的人，而没有离异的人。无论任何一个战役，他们无一不尽其最大的努力，而继之以牺牲。中间没有那一个人，从战事中发了财，或得到了侥幸的际遇，都是由同甘苦共奋斗而造成他必然的地位。后来虽因清党及外界的诱惑，一时有极少数几个人离异了，但不久仍又团结回来。这不仅是一段完全的历史，他们亦都不愧是明大义全始终的人物。这都是使我最难忘怀的啊！

总之，广西统一运动之能迅速成功，固不仅限于上述的几点意思。而上述的道理，亦不止是广西统一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实为整个革命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在写完统一广西各战役之后，特将这几点重要的意义叙述出来，亦兼作这个重要阶段的结论。我想人们一定不会批评我有所诗饰罢！

七　两广革命的统一与出师北伐

李任潮等由粤来邕的两重使命　当我军克复南宁，广西全境军事政治已告统一的时候，广西革命政权的本身，正在酝酿着重大的变化。而广西的统一，又在广东之先，自邀得各方非常之重视。大本营特派西江善后督办李任潮同冯竹万、邓世增、李民欽等到南宁。这大约是十四年九十月间的事。他们此行的意义，公谊私交，实兼而有之。私交方面，为访问慰劳性质。公谊方面，则含有两项使命：第一，因为广西的高级将领，除了我之外，其余大都尚未加入中国国民党。而当时在广东方面的桂军，如刘震寰、刘玉山等部，以及干党务工作的桂籍人士，两三年来，随着我们势力的发展，散播了很多的空气。不是说我们是联省自治派，就说我与段祺瑞等北洋派有勾结。并指我同李德邻分别用着讨贼军、定桂军的旗帜番号，表面是分道扬镳，实际却都是狼狈为奸的做法。在羽毛尚未满的时候，就用我来接近革命政府，现在广西统一，力量已经充实，不久一定要背叛革命的。这些说话，历年以来，我们听得很多。因为要拼死拼活不断的与很多的敌人打仗，那里有空闲工夫去理会他们。至于革命政府当局是否会听信这种谣言而怀疑我们，就无从知道。在这等环境之下，我们只有竭尽自己的力量，为革命尽其最大的贡献，所谓“知我罪我，在所不计”。不过他们所放的空气，也有一部分很易使人信以为真。即如我们为应付起初艰难的局面起见，梧州与玉林，确曾采用两面不同的作风。不但是对省内如此，就是对省外亦是如此。因为在

那个纵横捭阖的时候，自己的力量，又那么薄弱，稍一不慎，必将招致极大之挫败。到那时又有谁来同情我们，援助我们呢？而我对于那时在粤的桂军，及吃党饭的桂人，也确是太冷淡了，使他们的面子过不去。他们因为这个关系，便播弄出许多是非来中伤我们。其实我们在那时，对他们既难敷衍，也不愿敷衍。因此彼此利害的冲突，好象敌人一样，他们事事中伤我们，破坏我们，甚至我的性命，也几乎伤在他们的手里，那里还谈得上敷衍两字呢。

李任潮及粤军第一师的将领，是我们最相得的朋友。他们不但在军事上以实力帮助我们，而且还替我们向各方解释许多误会。可是万一我有了什么相反的转变，他们对于革命上所负的责任，也就太重了。所以李任潮在公谊私交都得来南宁一行。他们是希望我们将整个的广西统一在革命政府的旗帜之下，改变以前两面不同的作法。其实我们自广西内部肃清后，对于那种作法，已成过去，对统一原则，一致表示赞同，入党则更不成问题。

李任潮来邕第二项使命，则为商量共同出兵解决盘据广东南路的邓本殷、申葆藩的军事问题，邓、申原为旧粤桂的残余势力，盘据粤省的三罗、两阳、高雷、钦廉、琼崖各地，合起来也有近两万人，他们在那里苟延残喘，等候卷土重来的机会。在广西未统一以前，由广东出兵南路，有很多不便的地方。现在广西已经统一，自然是解决南路最好的时机。这种义务，是我们最愿意履行的。因为南路的粤桂籍旧军势力一日不清，则广西边界，一日不安。而且粤军第一师以前给予我们的帮助，我们还时刻不忘，出兵南路，正是我们报答他们的最好机会。我们本来要派白健生赴粤报聘，并作具体商量。所以李任潮等此来，我们至表欢迎。可是不幸的廖案发生，他们又奉命匆匆回去了。继之又有出兵东江及杨、刘事变，以致统一及其他许多问题，又延搁相当的时候。

中央军政制度的革新 十四年年底，广东方面讨伐东江南路

及杨、刘、川军等军事行动，皆已结束，胡展堂、许汝为同时出国，中央对党政军制度，大为改革。在军事方面，旧日之粤、桂、湘、滇、鄂等地方性之军队番号，一律取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计六军，何应钦为第一军军长，谭延闿为第二军军长，朱培德为第三军军长，李济深为第四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五军军长，程潜为第六军军长。此外复设置党代表及政治工作人员，各师皆采用三团制，将旅的一级废除。盖采取苏联之编制也。政治方面，则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但对于地方的政治制度，尚未有明确的规定。汪精卫以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主席，实为当时唯一之军政首脑。

汪、谭、甘来梧的任务　十五年一月间，中央派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三委员到梧州来。他们屈驾降临，使我们非常惶恐。于此亦可见中央对于广西的重视。我同李德邻等，由南宁赶到梧州欢迎，他们乘坐的是江防舰队的江防兵舰，当兵舰入口时，岸上排立着很多的行列，及看热闹的民众。数年来梧州因受军事的影响，景况非常惨淡，至是才充满和谐活跃的革命新空气。这一个欢迎，也就是梧州空前未有的盛会了。他们这次来梧，表面上虽然未曾明白表示衔有什么使命，似乎是一种访问巡视的性质，其实他们此来的主要目的，是欲促成广西对于革命统一的表面化、具体化。其次是商谈出师北伐的根本问题。这都是我们正在准备着期待着的几件大事。当时尚有唐孟潇的代表叶琪，及贵州方面的代表庞汉章，在那里一起见面，于以后革命的进展，有很大的关系。

在梧州并不举行何种正式会议，而是分别的商谈。我们对于统一与北伐，都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意旨。可以说他们的目的，已完全达到了。他们在梧州逗留了两日，除了商谈宴会之外，大部的时间，都用在宣传式的演讲上面。这时梧州人民团体的组织，已相当发达，工会、农会、商会、妇女会，无不应有尽有。此外还有军政机关的职员，无一处不开会欢迎他们去讲演，他们

也无不应邀出席。讲演的内容，无非是三民主义与当时本党的三大政策（联俄、容共、农工）①以及本党的革命历史，国民革命的前途等。这些题材在现在看来，好象已成为刻板的革命八股，无足希罕。但在那时候，却是非常新颖，极受民众欢迎与拥护的。

汪精卫先生之名，我已久闻。这次来梧，初次晤面，见他魁伟的丰采，委婉的言辞，热烈的表情，再加上那一幕亲自拿炸弹去炸摄政王的动人的革命史剧，自然能博得许多人，尤其是一般青年的钦仰。谁也想不到后来当全民族抗战的严重关头，汪精卫突于二十八年十二月间，背叛党国，出走河内。使我想起了这一段历史，不禁于感慨之余，同时觉得有些滑稽好笑！

谭组庵先生以前在广州的时候，我曾见过几次。这次更多接谈的机会。他为人幽默圆到，使人很愿意和他亲近。有一次，在宴会席上，他问我："你这个大名的'竑'字，为什么不用英雄的'雄'字呢？"我说："这是我父亲命名，取任重致远意思。"他又问我父亲在前清有没有功名？我告诉他，是丁酉科举人。他哈哈笑道："我也是丁酉科举人呀！我现在同你，不但是革命的同志，还与你令尊是满清的同年呢！我一见你用这很冷僻的'竑'字为名，就猜想这位命名的先生，对于旧文学，一定有很深的修养，现在果然不出我所料。"有一日，在一个小花园里，叫做同园的地方宴会，汪、谭两人的酒量均宏，但在那次狂欢痛饮之下，都醉了。席散出门时，汪问我向左还是向右？我说"向右边走。"他说："你认错路了。革命那里会向右走的呢？"结果，他向左边走去，但是向左的路是走不通的，引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甘乃光先生是广西岑溪人，一向在广东读书，在广东做事，彼此都不甚熟悉。而同我还是初见面，大家好象有些陌生的样子。他这次回来，对于党务方面所负的责任比较多一些。因为广

①据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8页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西当时的党务，尚未展开，需要他来指导。他们本来还想到南宁去，因为冬天水浅，舟行往返，需要近十日的时间。汪、谭因职务上的关系，不能久留，就回广州去了。留下甘乃光一人，同我们到南宁。甘乃光到了南宁，也同在梧州一样，开会演讲，几无虚日，直到他害了肺炎，口哑声嘶，才停止。总之：他们这次来桂，就各方面来看，都是很成功的。尤其是一般民众，自民国十年饱受粤军的痛苦以后，以为那时候的粤军就是革命，而革命党的言论行动，就如洪水猛兽的可怕。这次汪、谭、甘等到来，民众见了才知道所谓革命党，也不过和普通人一样。革命的理论，很合乎人情，切乎需要，不特使无知的人民，感情改变，而于此后广西党务的展开，亦有极大的关系。

他们三位到梧州来，虽然是半公半私的询问性质，但他们都是中央特派大员，汪氏又是国民政府的主席，中央党部政治会议主席，自然算是国家元首的地位了。那时我们对于此种接待元首的仪节并没有正式的规定，但是我们却是衷心表示得非常隆重。在宴会席上，我们的军乐队奏起以前袁世凯时代“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国歌来。汪对我说：“这国歌是旧的！”好似表示不相宜不接受的意思。可是他又说不出一个新国歌来。因为当时不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尚未制定，即在广州最流行的“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革命歌，在梧州也尚不很通行，只好将旧的拿来应付应付。现在回想起那个“卿云烂兮……”的国歌，的确内容没有什么意思，但是那个调调儿，却颇有些悦耳的地方。

白健生赴粤报聘并商谈统一　汪、谭、甘回粤之后，我们在南宁召集重要的干部会议，对统一问题，加以讨论，并推白健生前往报聘，同时商量一切具体联合的态度，于是他便提出了彻底统一的意见，中央亦因此专设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并将经过情形，电告我与李德邻云：“吾省军政前途，今后亟须上革命轨道，前电经已略陈，谅为钧座所明悉。欲负担革命

工作，完成革命任务，在理论与事实上，均非将军民财三政与广东镕成一片，直受中央支配不为功。政治关系省内，抑亦关系全国，自成风气，实不可能。军队更改编制，尤与财政关系密切，即以军队而论，广东革命军确实注重改良士兵生活，月饷十元至十二元，吾省若将财政自理，对于士兵生活问题，必难解决。结果必有貌合神离之象，而于政治建设方面，结果亦将演成闭门造车之情境，将来必为革命之阻碍，而吾国家之命运，亦必因而延滞。连日与中央诸公磋商，若吾省能将军队依照广东编制，政治能接受中央策略，财政交中央支配，则一切问题，当能与中央合辙，由中央统同筹划，互相调剂。此后对于革命任务，因属共同负担，而于补助接济方面，亦已痛痒相关，不能秦越相视矣！禧知两公对于革命重要，早具深刻认识！对于革命工作，已有坚确决心，历年奋斗，其目的在救中国，非救区区之广西也。禧抵粤以来，见中央对广西，仅抱联合的态度，一切设施，规模太小，目光在粤省，不似统一全国机关，于将来革命政府之发展，诸多妨碍，已对汪、蒋、谭诸公自动提出，先将两广确实统一。此种主张，驻粤各方，极端赞许，想两公必然赞同。现因体念上级官长，以图节省电报来往时间起见，由汪先生发议，组织一中央特别委员会，讨论两广统一办法。先将军事财政统一，次再及其他各件，议决案由禧带回南宁，交两公核夺认可后，交中央军事政治委员会议决，由国民政府执行。巧日开始讨论，两公有何意见，请速电示为祷。白禧崇叩皓印。”我们当时复电同意，但是问题尚不能很痛快地解决，于是他就回来了。他在这个皓电上所述的主张，在粤不但不能彻底的解决，反而生出若干的误会。其主要的原因，就是财政的统一，与军饷的提高问题。因为广西是一个穷省，满清时代素来是受外省协饷的省份。那时广西的士兵月饷只有六元六角，官长不论阶级，一律十三元二角。如果要士兵提高到十元至十二元，差不多要增加三分之一以上的开支。官长的薪俸增加数目更巨，在广西当日的收入，自然负担不起。而广东

当日的财政，比广西还要困难，自顾尚且不暇，何能再有力量来负担广西的军费呢？因此就有人误会我们的目的，在要求增加广西的军费。所以到后来财政统一军饷划一的问题，就根本不谈了。北伐军出发，广西军队（第七军）的军饷，完全由广西负责，士兵的饷项，亦与各军不同，就是这个原因。

统一前提下广西方面的五个问题 白健生回南宁后，我们再从长讨论那许多问题。关于统一的原则，我们早已同意，不必再去考虑。但是尚有几件重要事项，亟待研商：第一是全省军事机构的名义问题。自杨、刘事变之后，粤军、桂军、湘军、滇军总司令等含有地方性的军事机关名义，已一律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四、五、六等军，直属于军事委员会。广东既没有全省性的军事机关，广西能否单独设置，殊成问题。李德邻的意见，广东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在地，各种问题可由军事委员会负责处理，广西情形不同，如果没有全省性的军事机关负责办理，则全省治安，以及军队整理，都有许多困难。故竭力主张设置广西全省善后督办，来担负这种责任，理由是充足的。第二是军队编制问题。我们的部队原来由定桂、讨贼两军组成，后来又改为广西陆军第一军、第二军。我们仍希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八军。第三为行政机构问题。广西民政长公署本来是我们自己设置的，只要中央行政制度确立，即可取消。在中央行政制度未确立前，暂仍其旧。第四是财政统一，军饷划一问题。财政统一，军饷划一这个原则，我们十分赞成，如果中央对此尚有顾虑时，则仍由广西自行负责统筹统支。第五是党务问题。此后广西的党务，自然要竭力的展开。我们所顾虑者，是以前在广西没有信用的人回来把持，不但党务无从展开，而且还要引起内部军事上、政治上的许多纠纷。总之，在一个大的转变之下，一切枝节问题，自所难免。好在我们大前提已经决定，那些枝节，亦只好随后陆续设法解决。于是改由我负责代表到广州去，进行这个革命统一的工作。

我赴广州续商统一问题　我于民国十五年的三月里，偕同内子蔡凤珍及秘书黄华表，由梧州乘轮赴三水，再乘广三铁路火车，到了广州。我自十三年在东亚酒店被陈天太袭击之后，差不多两年没有到这个地方，现在那里的风气，是大大改变了。自从驻粤的滇军、桂军，相继解决之后，所有以前市内各省各色各样的队号、旗帜，已没有了。武装拥护驰驱过市的要人汽车，亦很少看见。这种风气的改变，恐怕不单是广州市民的心理上，要觉得轻松一些，就是我也感到非常愉快！相反的闹市通衢上，增加了许多游行民众的行列。因为自十三年之后，各种民众团体组织，非常发达。加以这时香港大罢工风潮，尚未解决，市内的工人特别多，真可算是劳工神圣的黄金时代。在游行的群众里，手里拿着五颜六色写着标语的纸旗，口唱着"农工兵学，农工兵学，要团结，要团结，大家坚持到底，大家坚持到底，必成功，必成功"的歌声，与高彻云霄的口号声，相间而作。而且随处都可以听到，又使我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刺激。

我们住在长堤的广西会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里面。第四军由粤军第一师所扩编，李任潮担任军长。他要我住在军部里面的原因，不但是尽他招待的厚意，还含有为我戒备的作用，恐怕住在旅馆里，又会演出十三年东亚酒店的故事。

五项问题顺利解决　在初到广州的两三日内，都是和各方面口头接洽，或是参加会议。中央对于广西统一的问题，以前白健生来粤时曾有一个特别会议来研究解决，但迄未作最后的决定。我到来之后，继续参加这个会议。第一、对于设置广西全省善后督办问题，颇多纷议，因为中央方面认为善后督办这个名字，是北洋军阀用的，革命政府不宜采用。十三年中央所委任的广西全省绥靖督办的名义，当时我也费了很多的唇舌，才核许的。这次提出这个名义，其中"善后"两字，又与正在从事革新的当时情形不甚相符，自然更难适用了。后来经我婉曲的陈说，才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以李德邻任督办，我任会办。第二、对编

成两个军问题，更觉为难，他们虽然未说出不能编为两军的理由，但我很明白他们的意思，如果广西编成两军的话，即无异占有国民革命军全部四分之一的数量。后来汪精卫这样说："第七军的番号，已经决定了，自然无问题。若再编一军，因第八军的番号已决定给唐孟潇，此外又不好再编。"这个理由，实在勉强得很。而我们确拥有两军的实力，原来已有两军番号，如果要并为一军，也有我们的困难。而且这一军的军长，由李德邻担任，抑由我担任，也颇难安排。我见他们内心为难情形，就自动的提议请编为一军（但军器共编六个师）。以李德邻任军长，我自愿担任党代表的职务。谭组庵听了我的提议，拍手赞成。说："这才是真正革命者的态度啊！"我之所以自动提出编为一军，一来固然为解决当前会议席上困难。同时我鉴于已往两军间，总不免有彼此的界限，不如趁此机会，混编一起，不特前隙尽除，此后必可更加团结。我自已虽不任军长，但以我过去的历史，同德邻私人的关系，担任党代表，还不是同军长一样的么。第三、对于行政机构问题，因为中央整个行政制度，尚未确立，目前只要中央加以委任，就算了事，等到制度确立以后再行改组。第四、对于财政统一，军饷划一问题，那时的财政当局，只要求接受中央的法令统一，在中央财政系统之下就算了，因为他们明知统一以后，于中央是没有好处的。如果财政统一，军饷划一，还要使他们增加负担，这正如一个穷人要同有钱的人，平均家产一样，有钱的人，一定是不肯答应的。我体念到对方的困难，也就不再勉强要求。仍由我们自收自支，以免引起中央的误会。第五、对党务问题自然完全统一，照中央规定办理。而中央亦允许时时顾虑地方情形，并尊重我们的意见。各种问题，于此便获得顺利的解决。

出席中央纪念周的报告 我们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既获有相当结果，中央便指定我出席下星期一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报告统一的经过情形。那次纪念周到场的人，特别众多。由汪精卫

主席，行礼如仪后，汪即介绍我登台报告。我首先将奉总理任命讨贼起，与李德邻合作，肃清陆沈，驱逐唐军川军，出兵南路至统一广西，保障革命策源地，作一个简要叙述。其次，说明我这次来广州的使命，是要求革命的统一，加强革命的力量，以求革命的成功。以前广西一般工作同志，在广西与旧势力苦斗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把革命的障碍铲除，完成广西全省的统一。这不是为个人占领地盘，作军阀式的割据，亦不是仅仅为了广西，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省份。而是想将广西的一切力量，整个的贡献给中国国民党的革命政权。在广西革命障碍未完全扫除以前，我们不愿作夸大的不现实的表示。现在广西已经统一了，所以我们才敢对中央切实的报告，对社会作公开的宣布。接着将统一内容，作概要陈述，并表示我们只是磋商事实的解决，并不作为相对的条件之要求。自今日以后，广西的党务政治军事，均唯中国国民党及革命政府的命令是从，李某黄某只是奉行党及政府命令的人员云云。报告完毕，博得热烈的掌声。汪并作补充的说明，才告礼成。广西统一问题，至此就成为具体化了。我回到广西会馆，接着就有许多报馆记者与民众团体代表，到来访问。我又将在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的大意，作成一个书面的谈话，交各报馆发表。这段经过的事实，就成为那时候新闻的最重要资料。

第二日，蒋先生从黄埔到广西会馆来看我。这次我到广州，因为头几天事情很忙，尚未得暇去拜望蒋先生，而蒋先生却先枉驾过访了。我将这次商谈统一的经过，向他陈述。他表示这次广西统一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是主义信仰的结果，不是革命武力的结果。以主义的力量收服人心，比之用武力去征服一省两省的地盘，价值伟大得多。他又问起我未回广西做事前，求学时期的情形，我将在陆军小学参加辛亥革命学生军敢死队的故事，说了一遍。蒋先生即告别而去。他这时已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的职务，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的要职。这个名义，不很公开，而且时间也很短，所以知道的人是很少的。

汪谭对我留须的趣谈　我在广州的那一段时间，应酬很多。不是这里开会欢迎，就是那里请客。记得某一次大宴会上，大家都有了一些酒意，我对汪、谭都非常敬重，称之曰汪先生、谭先生，他俩说："此后大家都是同志，不要太客气了，你就叫我们精卫、组庵吧。"那时我的胡须很长，汪问我多少年纪？我回答他是三十一岁。他笑着对我说："我以为你快到五十了。"他又问我，为什么这样年轻，要留起胡子来？我说："因为民国十年被自治军缴械，是我莫大的耻辱，我立誓要把自治军肃清，才剃胡子。现在已经五年了，未曾剃过。"他说："你现在可以剃去了。"我揣测他的意思，必以为革命是要青年的，他比我年龄大得多，还没有一根胡须，我那满面长须，看起来，确实有些碍眼。谭先生很幽默地说："留起来，也很美，你须知道有些人是爱好这样的美呢。"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中国国民党自十三年改组，即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选举第一届执监委员。十五年一月，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同李德邻都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参加北伐会议　我这次到广州，也是首次参加中央党部的会议。此外并参加最重要的北伐会议，系在大东路体育场对面汪精卫公馆举行。会议厅的两端，相对地挂着两幅大照片，一边是总理遗像，一边是列宁的遗像。这好象是联俄容共①政策之下必然的格式。到会的人员，除汪精卫外，有蒋先生，苏联军事总顾问奇山加将军，此外则为重要的中央委员及各军军长，由汪主席主持。在讨论的时候，虽然也有人认为时机太早，力量太薄，希望慎重将事的。但经蒋先生及奇山加分别说明后，这一出师北伐的大题目，终于决定了。汪随后问我："广西可以出多少兵？"我回说："当时可以编成三个师的一军，即系全省部队的半数。若稍假时间，将地方治安办好，部队整编完毕，尚可陆续增加。但

---

①参看本书第118页注①。

对于云南方面，不能不留多一些队伍，以为防备。”大家亦甚以为然。

邓演达的最后会面 这时邓演达已由苏联回来了。在黄埔军校任教育长，好象还兼任了其他的重要职务。他邀我去参观黄埔军官学校，到了学校门口，最触目的是“真革命的站拢来，不革命的滚开去”这两条好象大门联对式的大标语。回来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艘很快的小汽艇上，看见前面同方向去广州的车船（系民船，无桨橹，在尾后装有拍击式的车叶，用数十人轮班踏转，鼓荡前进。乃广州附近介乎轮船、民船中间的特种船只，每小时可行十五六里)，一步一步的落后了。他说：“中国与外国相比，就好象这船和那艘车船一样，真是落伍得太远了。许多人在那里出了死力，流了臭汗，结果还是赶不上人家一付小引擎。”他畅谈苏联革命建设的情形，语意中似乎主张中国革命，也非采行苏联那样的方法不可。我回广西的时候，他还很恳挚的走来送我，这就是我和他最后的一次会面了。

回到广西 我在广州逗留了两个多星期，才回广西。来的时候，随带人员很少。回去时候却多了，内中有苏联的军事顾问，政治工作人员，及党务人员，男男女女，差不多坐满了一个内河电船。这些男女青年的工作同志，都是那个时代的革命者解放者。在船上谈谈笑笑，歌歌唱唱，在长途的水程上，打破了旅行的寂寞。把我几年来战事紧张的孤独生活，也改变了许多。我回到南宁，将在广州所决定的情形向李德邻及重要的干部报告，他们当然都是同意的，而且表示非常的高兴。

我们的新的努力 我们的精神和工作，立刻又向新的方面活跃起来了！的确，自从统一广西的军事结束之后，我们的敌人已消灭了，目的已达到了。此后无论团体方面，个人方面都失去了目标，如果不能迅速地找新的共同方向，新的共同目标，就会弄到各走各的路线，而把团体的力量渐渐分散起来。到那时候，就极容易发生不幸的事件。这种情形，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所以要求

一件事业成功，在每一个阶段内，都得要详细的考虑，谨慎的安排，继续的努力，不断的前进，才可以顺利的得到最后的成功。我们对广西统一，虽已达成任务。如果没有革命的统一与出师北伐两个大目标，那么我们的后果，是否会发生不幸的变化，就很难逆料。

出师北伐前的军事部署 我们在军事上首先着手的工作，就是改换名义，改组部队。以前我们是在全省绥靖督办之下，分置第一第二两军，现在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改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只换了两个字，再把以前定桂，讨贼两个总指挥部的老班底充实到军务督办公署里面去，机关改组，就算完事。此外复另行编组一个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部，准备于出师北伐时，负指挥的责任。在后方，概以军务督办公署来处理全省的军务（十六年后全省军务督办名义取销，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部），这个易名改组的工作，很迅速地完成了。至于我们的部队，在统一战事结束之后，差不多已整编完成，一共为九个旅，二十一个团，及炮、工等营。第一旅旅长俞作柏，后来改任李明瑞。第二旅旅长白崇禧兼，第三旅旅长刘日福，第四旅旅长黄旭初，第五旅旅长伍廷飏，第六旅旅长夏威，第七旅旅长胡宗铎，第八旅旅长钟祖培，第九旅旅长吕焕炎。第一团团长李明瑞，第二团团长龚寿仪，第三团团长陈恩元，第四团团长蒙志，第五团团长张国柱，第六团团长许宗武，第七团团长叶丛华，第八团团长李孟蓉，第九团团长陆受祺，第十团团长梁朝玑，第十一团长韦云淞，第十二团长李朝芳，第十三团长陶钧，第十四团长杨腾辉，第十五团长周祖晃，第十六团长尹承纲，第十七团长杨义，第十八团长林竹舫，独立一团长陈济恒，独立二团长罗浩忠，入伍生团长吕竞存，炮兵营长罗传英，工兵营长马典符。这就是我们在三四年间将广西所有的旧军，与入境的客军十几万人，或予以消灭，或予击溃，经几次淘汰整理，所剩下来的精锐。这些干部，除了二三人外，都是正式军官学校出身。全部官兵，约在四万人左右。

当我们的部队接到中央命令出师北伐的时候，因时间短促，未及照新编制编组就绪。即调第一、第二(后改韦云淞为旅长)、第六、第七、第八等五个旅长，率领第一、第三、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及独立第二等十一个团参加北伐，其余各旅、团，仍留广西。后来前方各旅，改编为三个师，以夏威、胡宗铎、钟祖培为师长。后方各旅，亦改为三个师，以伍廷飏、黄旭初、吕焕炎为师长。这是军队编配的情形。

党代表制度 在军党代表之下，设政治部，各师亦设政治部，团设政治指导员。党代表及政治部为当时新创设的制度。党代表与军长，处于同等之地位。对于部队，代表中央党部，有督察的责任，军长所下的一切命令，都要党代表副署，才发生效力，可说这完全采苏联的办法。这个制度，在若干部队里，部队长官与党代表，往往会发生严重的冲突和磨擦，而在第七军里面，德邻和我，却精诚相见，毫无隔阂。从全军的官兵看起来，名义上虽有不同，实际上也是一样的服从。他在前方，可以带着我的图章，代我行使党代表的职权，我在后方，也能够带着他的图章，代他行使军长的职权，一点没有窒碍或发生阻力的地方。这种和谐的精神，完全是公私历史造成，而不是其他所能做到的啊！政治部主任，系由总政治部派充。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同志，很坦白，一见我，就说，他戴的是红帽子，他只是干他责任以内的工作，绝对服从我的意旨。的确，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工作者。自从政治部成立之后，各部队的精神生活，表现得非常活泼，北伐之所以顺利的成功，部队政治工作的成功，占很重要的因素。苏联顾问也是国民革命军改组后必须设置的条件，第七军的苏联顾问，叫做马迈也夫。原是一个打铁工人，后来投入红军，经过军官的训练。据说当过一任旅长，在克里米亚作战时，曾经受伤。这人头脑简单，在军事上也不见得有何特长，不过在当时只要能够把一些很肤浅的技术，或新式的编制，介绍给我们，也就算无忝

职守了。记得他初到的时候，只和我谈过三三制师的编制问题，以后并无若何的建议，在军队里面，仿佛是一个备员而已。

出师北伐　我们军队布署完毕以后，接着就要商量由何人率领的问题。北伐是一个新工作目标，有远大的前途，各级干部，都是争先恐后的要求参加，不愿意留在后方，几经斟酌，才决定了前面所述的这个安排。至于领导的高级将领呢？白健生因为蒋先生要他去担任副参谋总长的任务，必然的要离开我们的部队。我因为要主持广西全省行政事务，事实上也很难离开广西，所以领导广西军队出师北伐这个任务，只有请李德邻担任了。李德邻自民十以后，从未到过广州。这次出兵北伐的大题目，虽然是决定了，但是关于军事上还有许多枝节问题，非他自己去与中央方面详细商量不可。于是在四月间，就同白健生前赴广州。当然又有一番热闹的场面，这里不便细述。他不久也就回来了。七月九日，广州举行北伐誓师的隆重典礼，蒋先生担任国民革命军的统帅，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等六个军，进行北伐。在青天白日的革命旗帜下的军队，除了第四军之一部（李任潮奉命留守巩固革命根据地）、第五军（好似亦有一小部参加）及第七军之一半，留在广东及广西，保障革命的大后方，其余全部出发了。这是中国国民党革命过程中一个最大关键，不仅是震动两广社会的霹雳，也就是北洋军阀的丧钟啊！那天，我们在梧州，也开了个极大的出师北伐大会，由李德邻亲自主持，到会的人，非常拥挤，一般民众对北伐的官兵，寄予无限的期望，与欢送的热情。广西的社会，从此又改换了一付新的面目，发皇着一种新的空气！我们的部队，早就准备好了，集中桂林，陆续北上，展开了广西部队光明灿烂的革命历史的新页！

前方的进展，与后方息息相关，参加北伐的部队，固然负荷着非常重大的使命，而后方的工作，亦极度紧张。第七军北伐的部队，所需要的粮饷被服械弹等，都由广西自行筹划接济，飞刍挽粟，人马补充，工作繁重，概可想见。广西自民十以后，祸乱

频仍，地方元气大伤，但对于革命的贡献，不敢稍落人后。一直等到革命军进展至武汉南京之后，这种负担，才得减轻。但因前方的胜利，使后方的民气，更加发扬。同时主持的人，亦愈觉易于推动。革命初期的军队与民众，是真正的打成一片。所谓军民合作的精神，在那时候，可说是达到最高度了！

八　广西政治设施概况

民选省长　我自民国十二年六七月间出兵梧州，至民国十四年九月间，统一广西全省，为时二年又两个多月。在这一阶段内，每天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不断的从事战斗的工作。除此以外，实在也没有时间去过问政治，与研究行政上的种种问题。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只是提出一些有关军事的肤浅的政治主张，与配合军事需要的行政要求，其他则并没有什么政治或行政上的成绩表现出来。至于各人防区之内的各县行政工作，也只是剿办土匪，筹措军饷和协助军事这三个简单的项目。在我们的机关组织上，既未设有管理行政的机构，一切全凭我们的意旨，由各县知事负责办理，县级行政官署与我们之间，并不发生组织上的关系。而那时的县知事，亦大都是没有什么政治素养与行政经验的。到了十三年夏天，占领南宁之后，这是广西全省政治的中心，于是不能不有行政机构的设立。但是我们仍专心致力于以后军事方面的发展，不愿意过问政治。所以把地位崇高的省长，弃而不做，而由省议会选举当时的议长张一气来担任。我们对于这位民选的省长，很尊重他，凡是省长分内的事，都不加干涉。但是在那个时期，政治离不了军事，所以我们虽竭力尊重省长地位，而省长却不能不倚赖我们的武力。张一气对于我们，固不至如李静诚等当省长时那样完全仰陆谭的鼻息。但事实上他如果不得我们的辅助，一切政令，便也无法推行。

广西省政机构的崩溃与再建　十四年一月间，滇唐军队侵入

桂境，进据南宁，张省长杳然离去，不知所往。他在职的时间，不过五个多月。十四年一月以后至九月以前，广西又陷于无政府的状态中。十四年九月，我军克复南宁，统一广西，一省的最高行政机构，又不能不重新组织起来，以担负主持全省行政的责任。那时我还在梧州，李德邻来电，邀我到南宁商量这件事。大家的意思，都希望我出来担当这个重任。我虽竭力推辞，终以没有相当人选，而不能不勉任其难。其实我在当时，对于政治工作，那里有什么研究与经验呢？

我开始主持广西政务 一个全省行政长官的重任，出乎意料的，落到我的身上来。"初生之犊不怕虎"，我是大胆地接受了。但是这等于法无据的任务，并且在无法可据（那时还没有被我们认为一种合法的法令）的时候，我这个全省政治舞台的主角，应该以何种方式出场，以何种名义出演，又成为麻烦问题。北洋政府我们是不承认的。他们固然不会委任我，我也万不能接受他们的委任。由省议会推举吧，虽有前例，亦颇困难：第一，当时省议会的议员已星散各地，一时不能召集。第二，张省长是由议会推举的，他既未曾向议会辞职，似不便要议会另选。第三，省议会的议员，可说已是"三朝元老"，不能代表革命的民意。而且这个时候广州正在多事之秋，刘、杨事变后，又发生廖仲恺被刺案。革命的中枢，尚未能建立政治制度，地方政府自更无从遵循。因此我主张不称省长，而以"广西民政长"名义，暂负广西全省行政的责任。既免当时各方的指摘，以后如有什么更改，亦较有回旋的余地。大家都以我的意见为然。于是我即用白银铸造了"广西民政长"的印信，于民国十四年九月十五日宣布就职，开印视事。一切的组织都由我自行拟定：民政公署里面，设政务会议，下设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所有人员，均由我任命：以粟威为内务厅厅长，苏绍章为财政厅厅长，甘浩泽为建设厅厅长，盘珠祁为教育厅厅长，朱朝森为政务会议秘书主任。这个"自立为王"的政治机构，一直到次年六月两广统一，国

民政府正式任命省政府委员组织省政府之后才结束。那颗自铸的"广西民政长"银质大印，亦由我自己保管起来，它倒不愧是广西政治史上一件"替天行道"式的纪念物。可惜历年奔迁，不知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过渡时期的行政设施 在这一个过渡时期内，行政上自然还谈不到如何的设施，而只是从事那种过渡的统一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政与财政的统一。以前在讨贼、定桂两军的防地内，民、财两项政务各有各的系统，到了联军总指挥部与绥靖督办公署的时期，随着军事的进展，而逐渐统一起来。所以在十四年一月以后九月以前，虽然没有全省的政治机构，凡是我们的力量所到达的地方，各项行政已统一在军事机构之下。因此民政公署应行掌理事项，只要向督办公署方面接收过来就是了。不过行政系统中断已久，好多法令规章已不适用，而当时中央又无法令颁行，足资遵循，于是订颁了一个行政会议条例。这个条例的本身，固然也没有法律的根据，但是没有这个无根据的根据，则其他的法令规章，更将无所依据，而一切不能运用。所以这个行政会议条例，在当时就算是我们自行创制的母法，其他法律规章，都从这里产生出来。这是我们大胆的创作，以现在的目光看起来，自然是很可笑的，不合法的。但在草创的时期，除了这样便宜行事，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原来革命就是破坏陈腐的现状，建立适应时代潮流的新秩序。这种创制，正是我们革命过程中的一种主要的工具。

财政厅长辞职的两个原因 民政公署成立不久，财政厅长苏绍章呈请辞职，由我自己接替兼任。苏厅长辞职的原因：第一、因为军费需用孔亟，支应困难。同时全省税务机关，虽已由督办公署方面接收过来，而其下级机关，仍多为有力者所把持，而不易控制得住。所以苏厅长辞职后，非由我亲自兼理，期难彻底的统一与整理。第二、为了祭孔问题。自从民十以后，本省军事，扰攘不定，祭孔典礼，停顿已久。全省统一后，好多人提议恢复祭孔，其中以苏厅长主张最力，他并且要由我主祭。我对此事，本是无可无不可。等到祭

孔完毕之后，南宁民国日报乃大肆讥评，认为这是复古的举动，不是革命的行为。苏厅长为前清的拔贡，是我的父执辈，对于尊师重道，非常认真。他看了报纸上批评孔子，认为是大逆不道的事。他说："办报的都是读书人，我不料读书人首先把自己的祖师反对起来，这简直是忘本！人心变得这样坏，还成个什么世界？"说时慷慨激昂，形于词色，并要求我立即惩办那报馆的主笔陈勉恕。我对于祭孔，也是初次参加，着了长袍马褂，必恭必敬的行完了三献礼，足足费了两三小时，这种繁文褥节，感觉非常麻烦。如果年年这样行下去，我也不耐烦参加了。所以我对他的要求，并不十分赞同，只是答应告诫报馆，此后不再作类此的批评。他大不以为然，带着责备的口气，说道："你父亲也是一个读书人，有过前清的功名，你虽然是一个武人，也曾读过孔子的书，你纵然不礼重先师，难道就不体念你先人礼重先师的意思么？"其实，我父亲并不是礼重先师孔孟的人，我更不知道那一套。我听了他这番教训式的话，又好笑、又好气，不过他总是我的前辈，在旧的观点上看，他的确也是一时的人望，不愿使他难堪。但也不能因此而改变我的主张，迁就他的意见。于是他就愤而辞职，我也只好由他自己离去。这一点小问题，在那时竟会酿成一个很大的风波，可见政治革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从此以后，祭孔这件事，也就无形废止。而且后来还把庄严的孔庙改为中山公园。然而时至今日，全国对于孔子，还是那样的重视。国家特设官阶很高的奉祀官，由孔子的后裔世袭其位，每年在国库中支出一笔可观的经费。而担任奉祀官的及在奉祀官府有职司的，大多是年轻学浅的人，连孔子的学说是怎样的，不知弄得清楚弄不清楚。我在浙江见到孔子南宗后人，完全是一个蠢无所知的平庸百姓，可是他却懂得遇到变乱，可以向中央请发应变费，逢到灾歉，可以向中央请发赈济费，要求的数目，不是十万，就是五万，保守着一尊孔子的楷木像，当作他的吃饭家伙，视为传家宝，轻易不肯给人一看。偏偏还有许多人亦视为传国至宝，威仪肃穆的前去瞻

仰。这等崇拜偶像的举动，实在有些可笑！因此我对于绍兴的大禹后裔，及龙虎山张道陵的“第几世祖师”，颇替他们有些不平。

整理广西金融 广西自陆谭崩溃之后，以前所发行的纸币，已成废纸，无法维持。加以民十后，两广各地私铸银毫甚多，成色低劣，价格混乱，我以为非立加彻底整理不可。于是在梧州设立造币厂，铸造两角的广西嘉禾银币，统一形式，划一成色。一面将以前各种形式不同成色参差的杂币，按其成色，分别收回改铸，共计铸造了六百万元。并于十五年五月间，在梧州成立广西银行总行，委黄维、廖乔松为正副行长，发行五元、一元、五角、二角的纸币，即以所铸银毫为发行准备金。数年以来人民既苦于陆、谭纸币之贬值，复苦于伪铸私毫之充斥，自经此次整理之后，广西境内流通之货币，遂有划一之价格。货币在民间之信用，亦重复建立起来。广西货币之整理与广西银行之建立，对于以后广西的各种政治建设，帮助极大。而货币之信用卓著，一直到十八年事变，才大受打击。在这一段整理货币的经过中，尚有一件趣事可以叙述的：我既决定了整理广西金融的政策，便开始铸造银币，成立银行。可是又从那里去筹措这笔必需的资本呢？原来在那个时候，广西境内的鸦片烟，是公运私禁的。当军事初定的时候，私运鸦片，在所难免。但是一经缉获，即予充公。驻在百色的旅长刘日福，恰在那时候缉获了一大批私烟，约有一百多万两①。刘氏以前为自治军领袖，曾经缴过我的枪，我还做了他的俘虏。他归编我军之后，对我们非常恭谨，缉获了这大宗私货，丝毫不敢截留，全部缴解政府。我除了照例犒赏他的部队之外，即予变卖，得价二百多万元②，全数作为造币及通货发行基金。以黑货变成白银，作为银行的资本，使广西金融基础奠定下来。

①②黄绍竑在解放后所撰《新桂系与鸦片烟》一文中谓“七十万两”和“七十万元(毫洋)”。（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第21页）

饮水思源，刘氏是大有功绩在里面。我于此就想起现在的某大银行，好象也有过性质类似的事情，这也算得“无独有偶”的趣事。

我们任用县知事的标准 我们自出兵梧州到统一全省这个阶段中，对于各县的吏治，始终未曾注意。一县政治的良窳，完全系于县知事个人的身上。当时我们遴选县知事，有两个条件：第一要他在地方上有声望，最好还具有相当的经济基础，能在我们军需孔急的时候设法周转或筹垫。第二是要在地方上拥有相当的武力，而且还要有胆量，与地方的民团要有良好的关系。并能随时呼应，遇到匪警，或有军事行动的时候，能协助军队，剿办土匪，不致闻风胆落，弃城先逃。因为要求具备这两项条件，首先便打破了规避本籍的惯例。固然我们并不一定要遴派本籍的人充当知事，但在这种要求之下，在半封建的社会里面，不豪爽则不能领导群流，非缙绅则不能孚洽众望，所以豪绅在某阶段内，是有他存在的地位与必要的。后来革命的口号是要打倒“土豪”、“劣绅”，好象是“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样子。这种看法实在有欠公道，即就我们那时候的县知事人选来说，自然有好些是要不得的，但是也有若干是良好的。在那时候，贵县的知事刘晋臣，就是一个很好的豪绅，也是一个很好的知事！他一面能达到我们的要求，一面又能顾到老百姓的利益。而他自己呢，不但没有贪污的行为，并且把一份很大的家当，都赔光了。所以不仅我们要派他主持一县的行政，连老百姓也一致希望他当县知事啊！

当时的县制 到了全省统一，上述的作风便改变了好多。首先规定县知事人选，要回避本籍，非万不得已，不用本县人。但是机关编制与人事铨叙的制度，都未建立。县以下各级干部的任用，及用人的多少，都由县知事作主，上级官署，并不过问。县知事以下人员，大都是世代相传的书吏房科，一部分是县知事随任来去的师爷官亲。可以说由前清而至民国，由陆谭而直到我初任时期，都是陈陈相因，尚谈不到制度的改革与建立。县公署的

经费是采用包办制度的，那时规定每月大县五百元，中县四百元，小县三百元。在各县应行解省的税款项下，每月照县的等级，扣除这个数目。县公署的费用，不论薪俸公费，都由县知事全权支配。此外县里自己征收的杂捐，及其用途，只要经县参议会通过，即可动支，省里亦不去过问。至于各县征收田赋，县知事照例坐支八厘征收费，有的提出一部分补助机关的经费，有的是完全放入私人的宦囊去。我现在想想：这种旧时代的县政，虽然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在上的监督机关，既可执简驭繁，在下的县知事，亦可自由的发挥其才能。只要县议会健全的话，一切的弊窦，亦不致发生。现在的县制度，对于县政府是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但省要管，中央亦要管，将来县参议会成立之后，民意机关再要管，县政府就要成为一个三管的机关。县是一个自治的单位，抑是一个多治的机关，就有些费解了。

我是一个对于政治毫无研究与经验的人，一旦肩负起这个重大的责任，只好一面做，一面学，有时自己在暗地里摸索，有时请教请教自己的僚属。在那时候，自己只有负责的勇气与毅力，并不顾虑自己身体的辛苦，与责任重大的危险。现在回想起来，将一省政治的重责放在一个毫无政治素养与行政经验的青年军人的两肩，由他去摸索试探，是何等不合理而危险的事情啊！固然，这在那一阶段里，是无法避免的事实，而在今后，我们须要从事现代的国家建设，若政府不注重保育政治人材，个人自己不注意政治修养，国家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这是我“过了桥才知道过桥危险”的说法，不知道未曾“过桥”的人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广西省政府成立 十五年六月，广西省政府正式成立，就将过去“自立为王”的民政长时代结束了。省政府设省务会议，为全省行政最高权力机关，下设秘书处、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国民政府任命我为广西省务会议主席兼财政厅长，粟威为民政厅长，甘浩泽为教育厅长，盘珠祁为建设厅长，朱朝森为秘书长，这是国民政府首次公布的省制度。而广西省政府又是

国民政府统治下，最先成立的省政府（那时广东省政府因种种关系尚未成立），当然我就是国民政府最先任命的省政府主席。我们以前在军事时期，对于省内各项大事的处理，都通过合议制的形式。民政公署成立后，设立政务会议，已具合议制的雏形。现在省政府的组织，也采取合议制，我们施行起来，自然感觉得很顺利。不过一切重大问题，都由主席决定，会议不过是集思广益采纳大众意见的集议机构而已。

破除迷信运动 这时政治改革的洪流，已渗透了全省各地。在各种政治建设尚未开始之前，首先对于迷信的破除，下了一番极大的工夫。是年七月，我通令全省各县捣毁寺庙偶像以祛除社会迷信。除孔庙、关、岳之外一律不准保存。这个破除迷信的社会运动，系白健生所首创。他在一月间驱逐川军出境之后，驻军桂林，便下令给各部队官兵，将桂林城郊附近的寺庙会馆所有的佛像，一概捣毁。他曾对我说过一段趣话：当捣毁城隍菩萨的时候，那些士兵，都有些畏怯，但迫于命令，又不敢不打。当执行之前，有些士兵上了香，磕了头，口里喃喃自语："城隍爷爷不要怪我，我是奉了军令，身不由主的啊！"这可见军令的威严，亦可见迷信的力量了。

然而迷信的力量，毕竟敌不过军令的威严，城隍爷爷终于被打倒了。自从省政府通令破除迷信之后，全省各地，除了偏僻地方仍有未能彻底执行外，大多数寺庙里的偶像，尤其是在城市的都已不存在了。记得那年回到乡间，我母亲对我说："你连年在刀枪炮火里过日子，我非常担忧，曾在关帝菩萨面前，许了好多福(即许愿)，保佑你逢凶化吉，身体平安，现在你平安得胜回来，我已烧全猪，为你还福，你可同去叩谢菩萨。"我听了她的话，为难极了。要想向她解释这是迷信吧，她已这样年迈，那里会听信我的话。如果违拗她吧，心里又实在不忍。只好含糊答应说："我心到就是了，菩萨我不要拜，陪你到那里去玩玩吧！"她心里也许不很喜欢，但也并不十分勉强我一定要拜。到

了那一天，陪同她到邻近的关庙去，见那关帝神像的身上，已换上了一套华丽的新衣，神龛上面，张着一幅极大的彩缎横额，题着："佑我平安"四个大字，下款写的是"黄门钟氏敬献"等字样。我母上了香烛之后，不管我拜不拜，自己恭恭敬敬的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口里喃喃的念着听不清楚的话。我在旁边忍不住的笑，但是又不敢笑。等她向各处一一叩拜完了，才陪她回来。那时我心里想：好在是关帝庙，不然我对于自己所发布的命令，简直要成为立法犯法的罪人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好些过去我们所颁行的事，以至现在一般军政机关所颁行军令、政令，在伦理上或心理上，不免要遭遇到多少的障碍或阻难。上述趣事，即是一个例子。

出巡龙州 自从李德邻、白健生他们出师北伐之后，省内的党政军一切的工作，都由我个人负责。平日除了处理猬集的经常事务之外，忙于应付的，就是开会演讲。那时的民众团体及机关，常常召开大会或举行会议。每一个机关团体的集会，都得要我去主席或演讲，我自己也以为非亲自出席不可，好象一切的革命工作，都须透过开会演讲这些程序，否则就象没有尽到革命者应尽之责任一般。如此日积月累，我的身体渐渐的支持不下了，患了高度的神经衰弱症。医生劝我少做事，每日学打网球两小时来调节精神与肌肉。我之打网球，就是在那时开始学习的。医生又劝我到外县巡视以转变生活的环境。

巡视龙州的三项工作 于是我就决定在八月间出巡龙州。我之所以选择龙州为首次巡视的目标：第一、因为龙州是陆谭系多数人物的家乡，自他们失败以后，多半避居安南，并不时在中法边界上滋扰，须亲去察看情形，以定应付方针。其次，广西各重要地区，都有我的足迹，只剩下龙州，尚未去过。第三、龙州系中法交界之区①，自从我们统一广西之后，安南政府尚未彻底的了解。尤其是本党的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②，是帝国主义的殖民

①当时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故有此种说法。
②参看本书第118页注①。

地政府，所最表不满亦最畏惧的。所以我去巡视龙州，确实含有政治、军事、外交各种的意义。所谓游历地方，转变生活环境，反成无足轻重的问题。同行的除少数行政干部之外，大都是党务宣传人员。他们都视龙州为广西神秘的地方，男男女女一大群，都争着要去。到了龙州，第一项工作就是召开民众大会。我在大会里报告统一广西的经过，与参加革命的必要，并宣布此后的行政方针。那些同行担任宣传的工作同志，便分头的在各种民众团体里活动宣传，使龙州人民的见闻大开，并引导他们的思想走上新的大道。其次，招待法国领事、龙州海关税务司及外国商人。这个宴会，在对汛督办公署内举行。这时的对汛督办是吕焕炎。那位法国领事和那些外国商人，对于我们初到龙州那两日的举动，似乎颇有怀疑与害怕的样子。我对他们解释，中国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在打倒军阀。广西统一之后，中越的邦交，必比以前更加亲睦。他们提出当时所唱的革命歌里"打倒列强"这一句话来问道："列强是不是都要打倒？中国能不能够打倒列强？"我只是很勉强的回答："所谓打列强。是要打倒侵略中国的列强，而不是世界上的列强都要打倒的意思，至于侵略中国的列强，能不能打倒，你只要看我们打倒广西军阀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当初陆谭的势力很大，为什么终被我们这小小的力量所打倒呢？革命的势力，是不可以寻常的方法来计量的啊！"我虽然这样的解释，而他们的心里，总是怀疑着。过了几年，仍未了解。民国十九年，李明瑞、俞作豫在左江宣布实行共产，因此安南政府就将边界完全封锁起来，断绝桂越的交通至几个月之久，这是以后的话。在当时他们的心里虽存怀疑，但在宴会席上，总是很快乐的样子。他们说："在龙州住了好多年，从来没有和中国的小姐太太同过席，今天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法国交际的宴会上，没有女人，简直是罪过。中国的革命，能使男女社交公开，真是极大的进步。"法国的白兰地、葡萄酒、香槟酒喝得太多了，大家都有了醉意，法国领事起来要求同席的几位女同志跳舞，那几位女同志

都未曾学过这一套，亦居然有勇气，不成步法的跟他们跳舞起来，这可算是广西省内国际社交的新记录了。

我在龙州的第三项工作，就是视察镇南关要塞防务情形。广西省与安南接壤之区，约有四百余公里。中间犬牙交错，关隘甚多，自东南至西北，有镇南关、平而关、水口关、岽汤隘、岽洞隘、平孟隘、白怀隘、枯柴卡、弄江卡，每关或隘卡，因交通的重要设有对汛员或对汛兵把守，属于广西边防督办署管辖，专司两国人民在边界上之往来交通稽查治安事宜，近似边防警察的性质。在中法战争前后，各关隘皆驻有军队，执行国防的责任。各重要关隘，皆建有要塞炮台。以目前的形势来说，自然以镇南关为最重要。因法国的铁路(狭轨)已筑至镇南关五里外之同登，由同登入关，有汽车路直通龙州。于是镇南关便成交通上、商业上、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地区。镇南关离龙州约五十余公里，汽车一小时可达。我们到了那边，先登大连城小连城两要塞，这是各个要塞之中心，控制关的南北两侧，形势至为险要。要塞上面有很多坚固的工事兵房，但是年代久远，多已崩坏。还有好多门德国克虏伯厂一八八八年制造的要塞大炮，其口径有二十一生的，有十五生的，但皆锈废不适于用，亦无人管理，至堪叹惜！清末中法战役，提督冯子材，即以大小连城为反攻谅山的据点。当战事初起的时候，我军先受挫折，冯氏持枪佩刀，在此督战，终于反败为胜，在我国边防史上，留下极光荣的一页。其后提督苏元春，锐意经营，购炮筑垒，完成沿边各要塞。到了今日，这种要塞，固已陈旧得不堪使用，但在五十余年前，则确有其重大之价值。苏氏筑固边陲之功，亦至值得后人称道。虽然他后来为奸佞所参，死于天牢。然而他留在边塞之遗迹，是永久不会湮没的啊！

害盲肠炎赴粤就医 我由龙州回到南宁，这时国民革命的北伐义师，已由长沙、岳州，进占武汉。捷报传来，群情欢忭！便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祝捷大会。在一个庆祝宴会席上，同席的范军长石生，前由云南败退回来，残部驻在平马，这时特来南宁，与我

商量接济善后种种问题。他触景伤情，想起我不能全力助其回滇，中心非常愤懑。虽没有说出对我不满意的话，但我可以从他的表情上体察出来。而我呢，又不便向他诉说我的苦衷，求其谅解。在饮酒的时候，他一定要和我对饮一大玻璃杯的茅台酒，那时我尚有相当的酒量，本来可以应付。但这一天我已喝得差不多了，如果再来这一大杯，颇觉无此勇气。我便要他先说明必须对饮的理由，并希望减少一些。他激昂的说："我和你同过战场，共过患难，难道这一杯水酒，就不能同饮下去！你若不饮，就够不上朋友了！"我知道他心中正在烦闷，要将这一杯烈酒，来浇他胸中抑郁，便不再推辞，也就借这一杯烈酒向他表示歉意，希望将彼此不能以言语形容的芥蒂，都溶浸到酒杯里去，乃各举杯一饮而尽。真是"入口如醇，入肠如火"，当场就支持不住，扶醉回到家里，肠痛大作，体温亦突然增高。次日请小乐园的美国医师来诊治，毫不见效，病势有增无减。我问那位医师："是否盲肠炎？"他说："是的，而且快要化脓了！"我又问他："能不能在南宁开刀？"他很坦白的回答：他是一个见习医师，不敢施行这种大手术，而且他的医院里，也没有大手术的设备。他力劝我赶快离开南宁，到广州或梧州去，才有办法。我很感谢他诚恳的态度，不象一般江湖医生，一点本领都没有，却不顾人家的死活，专夸包医疑难杂症。其人格之相去，真不可以道里计了。我于是在两点钟之内，就乘了最快的江凤轮船动身。巧值江水大涨，不过卅二小时，就到了三水，转坐火车到广州，暂住亚洲酒店的楼上。即请德国医生卢美林过来诊视，后来又入颐养院医治。那时我的体温到了四十一度，夜里神经已发生错乱，乱说话，乱打人。我的妻子蔡凤珍亦正在那里就医，医生对她说："病已万分危险，一时不能开刀，因患处业已化脓，开刀更属危险。只好用水袋及退热药剂，希望将热度降低，才有办法。万一肠脓一溃，当立刻开刀，以尽我最后的人事，但愿上帝保佑！"到了第三日，热度渐渐降低，神志也清醒过来了。医生很是开心，但说还要过很

久的时间，精神恢复一些，然后再开刀去脓，作根本的治疗。所以我在广州颐养院，住了四个多月，直到年底方回南宁。当我在广州养病的时候，有许多人来慰问我。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苏俄政治顾问鲍罗庭，他在我病房中，大谈广西社会的经济情形，尤其注意资本家大地主。我说："广西根本没有资本家，一般都是小商人。最大的地主，每年的收入，至多亦不过一两千担租谷，而且这样的地主为数极少。"他很不以为然，驳复我的话道："广西一共有多少家当铺？那些都是剥夺农民利益的组合。大地主虽然没有广东那么多，但是广西的耕地，也比广东少得多，那些拥有一两千担租谷的人家，已可算是大地主了。"我很为诧异，他对于广西一般的情形，都很明瞭，也许比我所知道的还多一些。末了他请我注意农工的利益，与农工的政策。此外还有政治部代表许绍棣等来慰问我，那时我正在病中，印象非常模糊，到了浙江之后，我与许君闲谈之间，提起以往的情形，他说我的外表与以前完全两样了，从前身体很弱，胡须很长，不多说话。那时我的确是这个样子，因为正在大病之后，精神体力，自然都要差一些。害病本是一桩极痛苦极危险的事，又因在广东养病，而卷入广东军事政治的旋涡，以后不断发生比害病更危险更痛苦的问题。真是料想不到的啊！

省政府改组　自从十五年六月，广西省政府成立后，至十六年五月又重行改组。中央任命李德邻、白健生、粟威、黄蓟、伍展空、俞作柏、雷沛鸿、朱朝森和我等九人为广西省政府委员，我和粟、朱二人为常务委员，我任主席兼军事厅厅长，粟威兼民政厅厅长，黄蓟兼财政厅厅长，雷沛鸿兼教育厅厅长，伍展空兼建设厅厅长，俞作柏兼农工厅厅长，朱朝森兼司法厅厅长并兼省政府秘书长，这是国民政府在省制上一个重大的改革。把军事行政、司法行政，皆统属于省政府之内（但高等法院、地方法院之诉讼判决，仍是独立的，不受行政的拘束），使全省政治、军事、司法皆为省政府组织之一部，而形成类似中央政府之形式（此时

中央五院制尚未成立）。我以为这种省政府组织法比较合理，因既名省政府，就是整个国家组织中之第二级政府，其内部的机构，应为中央政府的具体而微。后来省政府组织，几次演变，成为今日之状态，称行政院分部，尚且不可，而仍名之曰省政府，未免名实不符。现在若干政论家或政治家，对于省政府之名实问题发生很多议论，而终不能获得满意的结论。因此回忆往事，认为颇可作为我们的参考。十六年公布的省政府组织法，并未持久的彻底实行，军事厅、司法厅不久就撤销，农工厅在清党之后亦撤销，其业务归并民政、建设两厅办理。若干省份还设立土地厅，但不久亦都撤销。广西省政府的人事方面，不久亦有更动，教育厅长雷沛鸿辞职，出洋考察，由黄华表继任，农工厅长俞作柏辞职，由苏民代理，旋即撤销。雷、俞等皆因十六年清党之后意见不合，而自行引退的。

举办县长考试 广西的省政机构，经过三度改革后，规模已甚完备，各项政务之推行，亦极顺利。民政方面，于十五年八月间，成立课吏馆。但规模简陋，并不招收固定的学员，而是将那些类似候补县长的失业人员，每月命一两课题，责成他们自己去用功研究，既无一定之授课时间，亦无一定的讲师指导，只就他们所呈之课艺，作文字上的考核，或口头的询问而已。究竟他们的课艺是否自做，抑或请人捉刀，当然无从查考，也没有人去查考，所以谈不上什么效果。遂于十六年三月间改为广西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我自兼所长，招收学员，集中管教。规模虽稍完备，但所收的学员，教育水准很低，大多只能充任县以下各级干部，其中才能卓异，堪任县长者，殊不多觏。办了两期之后，亦即停办。省政府为慎选县长人才，决定办理县长考试，于十六年十月成立县长考试委员会。我为委员长，各厅长为委员，考试于十七年春间举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后最先实行国父遗教的一次县长考试。但是考试的结果，令我非常的失望。应考的虽有一百多名，录取的仅十五名（广西大事记上记载录取六十五名，想系讹误，

尚待查考补正)。考其原因：第一，有资历有学识的人，大都已有固定工作，而不愿参加考试，或学殖荒疏，而不敢应考。第二，那时正当新旧交替之际，新的人才，尚未培养起来，旧的人才，多已落伍。而那些应考的人则多半是落伍份子，希望于此中侥幸博取资格，以为进身的阶梯。察阅试卷内容，多是些光怪陆离不合时代的陈腐滥调，实在无法录取。那个考第一名的是陆川人，姓罗，他的名字，我已记不起来了。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语体文很好，近代知识亦颇丰富。其余的也都是富有新知识的青年，榜发之后，那些落第的旧人物，见录取的都是几个“黄口小儿”，忽视了他们的“真才实学”，认为有失公平，这也只好由他们去。但平心而论，考试制度，不过是比较客观的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并不是绝对能选取真正人才。尤其是单凭几篇一问一答的文字，来决定优劣，与前清科举时的八股考试，也相差无几。我以为要彻底推行考试制度，必须经常的举行各种测验，以鼓舞一般有志从政青年治学的兴趣，好象清代士子应考那般的狂热起来。同时在考试的方法上，应加以改造，使学识、才能、品德各方面的高下，都能衡量出来，而不仅凭书面文字的优劣为标准。能够如此，考试制度庶可成为选拔真才最有效的方法。那次考试录取的十五人，并不即以县长任用，而是先分发他们到各县去见习。见习期满，考核他们的心得，再分别予以实际的工作。现在这几位考试及格的人员，还在广西服务，听说那姓罗的榜首，尚著有相当的政绩呢！

改土设县 广西境内，还有许多未曾设县的地方。这些地方，都由土司官在那里治理，有的于土司官之外，复由省另派一种土司弹压委员，相当于各省设治局的性质。土司官完全是封建时代的遗制。相传宋朝时候，狄武襄征服侬智高，那时南宁的西北两方，多半尚未设县，狄武襄即划土分封，给随征有功的将士，以为酬庸之具。在划封的地域内，由受封人全权治理，这便是他的封邑。此后凡是他所需要的，无论公用私用，皆向区域内的土民

摊征。对于上级疆吏，除年终贡献一些土仪之外，没有其他的关系。所有人民生杀予夺之权，皆操之土司官之手，其黑暗自不待言。世代相传，以至于今。好多人以为土司都是土人，其实土司之祖先，皆为北方人之随军南来者，但因年湮代远，都已土化了。“改土归流”为历朝治边的一贯政策，由满清末季而至陆谭时代，都向着这个目标进行。到我任里，尚有好几个土司区域，未曾改县。考其原因，不外两种：第一、因地广人稀，改县后经费入不敷出，不免要加重省方的负担。第二、以前省之权力，尚未能达到那些偏僻的地方，而土司官世袭迄今，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恶势力。如果治理不当，极易引起反抗，所以历来对于改土归流的工作皆采渐进的政策，而不敢孟浪将事。我主政后深知这种残余的封建势力，已到了没落时期，决无兴复的可能。而且在革命政府之下，更宜及早革除，使得被土司官压迫着的人民，早日获得解放。目前虽加重了省府负担，但事关施政大计，亦不必多所顾虑也。于是将忻城土司改设忻城县，太平、安平、下雷三土司，并置雷平县，上龙及金龙峒两土司，并置上金县。这都是十七年上半年的事。

办理瑶民教育 广西尚有两种原始的民族，即瑶民和苗民。这些原始的民族都是散居山僻高地或边鄙小县的高山上，而以平南、桂平、武宣、象县、修仁、蒙山六县之大瑶山，为瑶人最集中之地区。在广西地图上，特别用空白来表示瑶山的区域。就是因为山高地僻，瑶民与外间往来极少，外人无从详悉其内幕，所以不但外省人以为这是一块神秘的地方，就是本省人也有些莫明其妙。苗瑶大都住在高山的上面，度其极艰苦的原始生活。有人说：“他们因为受不了平原上的热气，所以要住在高山上，那里的气温，比较凉爽，才能适应他们的生存。”这种说法，是不成理由的，我以为往昔他们都是平原旷野的主人翁，后来汉人南下，他们在经济上、文化上都不能相与竞争，于是不能不退到贫瘠的高山上以图苟延残喘，后来便成为山居的习惯。这总逃不了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天演公例，想起来是很可怕的啊！据刘介氏(著有《广西特种民族的研究》)的调查：广西境内的瑶民苗民，约莫有二十余万人。这些可怜的原始民族，在民族平等的原则之下，政府自应设法教育他们，开化他们，使均能进步，成为中华民国的一员。所以广西省政府于十七年五月间，通令全省有瑶苗县份的县长，参照前清平乐知府欧阳中鹄创办瑶学计划，办理瑶民学校，即由刘介氏主持其事。现这个学校，尚继续办理。我于卅三年回桂时问及刘氏，据云："瑶民受教，成绩颇佳。"可见"有教无类"的道理，是十分正确的。

广西语言的分析 广西的人民，除了上述的瑶、苗之外，如果要详细的分析起来，还可以由语言及其居住的区域，而得到许多显明的区别。广西的语言，可以分为土话（即壮话）、官话(即普通话)、白话（即广东白话）、挨话(即客家话）四大类。土话为土著原有的话，这种人是住在广西最早的人，后来由东北的湖南方面，及东南的广东方面，到来许多外省人。时代愈久，移来愈多，这些外来的人，文化水准自比土人为高，而且还有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力量为其后盾，昔日的土人，自难和他们竞争，只好向西北方面败退。侬智高与狄武襄的战争即是土著人民反抗外来人民的武装冲突。南宁、龙州一带姓农的极多，原系有人旁之"侬"。据传即侬智高之后裔。不幸侬智高失败了，因为更受压迫，千余年来在中原的政治、文化统治之下，表面上虽称同化，但仍保存着固有的语言。此种土著言语，又可分为两种：一是平话，是土话白话混合而成的，通行于南宁附近的乡下，及左右两江的沿岸地带。一是纯粹的土话，仅留存在更边僻的地方。官话是湖南以北传来各省不同的方言，在桂林省会地方，起了一种中和的作用，经历代演变，而成为桂林官话，亦即为南方官话的正宗，腔调平和，字音正确，很容易懂，亦很容易学。由桂林为中心，一方面沿漓江（即桂江）向平乐发展，南至荔浦、修仁、蒙山、昭平之间，东至贺县、钟山、富川，在这个言语交界的区域内的人民都是官

话、白话并用，甚至与挨话并用。一方面向柳州发展，南至武宣，西至南宁，都是官话、白话两用的地方。白话的发展，完全以西江为主流，由下游而渐及上游，以梧州为起点沿江两岸的区域，如苍梧、藤县、容县、岑溪、怀集、平南、桂平、贵县、北流、兴业、横县、永淳、宾阳，以及沿江的各县，都有一大部或一小部是说白话的地方。它一面是溯江而上，一面是沿江的两岸向两侧深入。此种白话，是广东原来的语言，年代最早。其向广西进展，自较官话为先，而且西江水道交通方便，故“白话佬”向广西移民，要比说官话的人来得早来得多。挨话又名客家话，客家话的意思，无论在广东或广西，都是表示由外省迁来不久的客人的言语。据传客家话本发源于河南，后来逐渐向东南方发展，如江西的赣南、福建的闽西、广东的北江、东江都是客家话盛行的地方，并循海转到南路的钦州、廉州、化州等处，再由江北的连县、阳山而转入广西的贺县、信都、昭平、蒙山、平南的北部、桂平的北部、武宣的南部，此为客家话进展的北路。更由此而渗入柳庆各属之一部，另一方面由钦州、廉州、化州向北至广西之博白、陆川两县的全部、北流、玉林、兴业、永淳、横县、南宁、上思、绥渌各县的一部，皆为客家话的区域。“客家佬”入广西的时期，比较的迟，所以纯粹客家话的区域，都在边境的地方，或是官话白话交界的地区。但是客家人刻苦勤劳，富于冒险精神，竟有少数渗入，直至云南、贵州边界上面。他们的生殖力与进取力，亦极为迅速。

我虽以语言的不同，来区别广西人民的来源的差异，但是并没有什么种族的观念，或种族间的问题。只是借此说明广西人民在历史上地理上变动与分布，和语言生活习惯上差别的情形。我们在这里，可确实知道，两个或数个语言习惯不同的人民，因经济交通关系，彼此会逐渐溶冶而形成另一种混合的产物。所以现在广西，有好些地方，通行着二种或三种言语。这些地方，必将产生出另一种混合产品的语言。今后交通日益方便，经济关

系，日益密切，则此种变化的更迅速、更复杂，不似以前那样的单纯而易于辨别，殆为必然之事。

禁止公娼与解放婢女 十六年五月，通令全省，废娼及解放奴婢。本省原有花捐收入，全年达二十余万，我不稍顾虑而全面放弃，另筹抵补办法。娼妓是肉体的买卖，奴婢是人的买卖，在人类平等与道德的观点上说，都是非及早废止不可的。政府更不应该以那种钱，来充行政经费。我们在那个革命高潮澎湃的时候，首先实行了这个主张。但是效果并不十分圆满，事后反引起许多的批评，所以民二十年以后，就局部的恢复起来了。一般对于废娼的批评，主要的理由，是公娼虽然废了，私娼却盛行起来。政府对于公娼，可以集中管理，而私娼的管理，则更为困难。因为良贱不分，花柳病的传染，更加厉害。而公娼废止后，娼妓的生活问题与嫖客的性欲需要问题，未得适当解决，仍非合理的办法。这种说法，表面上虽未尝没有若干理由，殊不知有公娼的时候，私娼也是一样的盛行。如禁了公娼，而不禁私娼，那是关大门、开后门的办法。不在进一步禁止私娼方面着眼，而徒谓公娼之不应禁，是无异提倡设娼，而不是主张禁娼。至于私娼能不能禁，那是方法的问题，而非是与否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的。就方法来说：男女生活和性的需要，都是必要的条件。政府对人民，尤其是女子职业，要有解决的办法，同时对男女的性生活，要使他们得到正确的观念，然后禁娼问题，方可迎刃而解。中国的娼妓，可说完全由失业造成。因失业而生活困难，不得不出卖妇女们的皮肉，以维持必需的生活。所以人民，尤其是妇女职业的解决，实在是根绝娼妓的基本办法。单言禁娼而不从这等基本问题着眼，当然不能达到彻底禁绝的目的。但因职业的问题一时不能解决，而讳言禁娼，则近于因噎废食，必致流弊更甚，为害社会亦愈大。我那时见解如此，现在的认识仍如此。如果职业问题解决了，男女双方本着性的需要，自可以正当的途径，求得共同的解决。关于解决这一问题，本来比较容易，但在中国旧社会的

观念，还有必需加以纠正之点。原来男女双方为求满足性欲的正当行为，不能与买卖式的玩娼嫖妓相提并论。可是社会上一般的观念，却认为娼妓是正当的营业，而对于男女为满足彼此性生活的自由恋爱，无论为临时的或由临时而变为永久的，都是不道德的行为。记得在民国十五年的时候，有两个青年男女工作同志，在梧州北山公园有些恋爱行为，为人发现，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因为这个男的青年，是做工人运动的，那些有钱的老板及绅士，平日都非常忌恨他。现在发生了这个事实，便认为这是败坏社会风气的大逆不道，全体联名要求政府惩戒他们，以维持社会道德。而我驻梧州的高级军官，与劳资两方，素无关系，也加入了老板绅士的一方，一致主张帮同绅商们出气。可见旧的道德观念，对于男女自由恋爱是认为不当的行为，而对于一般人进抚河里的烟花馆，与娼妓公开的饮，公开的唱，公开的嫖，反觉得是正当的，道德的，而且他们自己也大都在那里度这荒淫的生活。如果这种基本观念不改变，反对废娼者，自得有所借口，提出很多似是而非的理由，以阻挠废娼工作的进行，这实在是不揣本而齐末的胡闹举动。

解放婢女亦与废娼的情形差不多 记得小时候，我家里也养了好多婢女。尤其是某一个大荒年，卖女作婢的特别多，只要六七千文钱或两担谷子，就可以买到一个七八岁的婢女，有的还只有四五岁。这样小的年纪，不易找到买主，他的父母，情愿白白地送给人家作奴婢。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往往对人这样说："不卖她无力养活，终要饿死。卖了她，不但她得活，连我们也得活了。"出卖女儿的人，除了因女儿生离，天性上受了一些痛苦之外，只是自怨命苦，决不会怨收买的人，甚至反而感谢他们。所以收买婢女的人，亦都自命是一种慈善的行为，并不是不道德的事情。因而有人对于政府的解放婢女，认为无异是一种虐政。的确，如果政府没有善后的办法，这事要彻底实行，是不容易的。因为一方愿卖，一方愿买，不会有人来报告，也没有人愿意检举。政

府自然不能派许多人去稽查，即使不顾一切的强制执行，也决不会得到良好的结果。但是政府如果知道买儿鬻女的，仅是少数人，而他们所欲得的，只是维持一家性命的人肉代价，为数并不很大，那末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救济，也并不是一桩很困难的事。如果政府能指导人民，在农业或工业的技术方面，加以科学的改良，以增加生产，使人民生活得以充裕，就根本不会发生这种悲惨的问题。这都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啊！香港政府执行婢女解放，非常认真，家庭查出有婢女的一定要吃官司。婢女如向香港政府控告，官司一定是赢的。所以居住香港的中国人，对于婢女，都以义女的名义养着，不敢过于虐待。香港政府解放婢女的政策，虽不能彻底实行，但是住在香港的婢女，已经得到很大的恩惠。因此我常时感到一个政府，如果不能解决人民的职业，不能保障人民的生活，一切冠冕堂皇的政令政策，都是纸面文章，无裨实益。岂仅废除娼妓与解放婢女两事为然？我检讨本人以往的行政设施，所以事倍功半，或未著成效者，其主要原因，亦在于此。

禁止赌博 许多人以为赌博是两广人的特殊嗜好。的确，两广社会的赌风，是比他省为盛。我自孩提粗识事务以来，就知道我们很偏僻的乡下，风行着各式各样的赌博：如花会呀，播三方呀(系以五个铜钱，由一定的高度掷下，看其正面与反面，取三胜二负制)，打天九呀（即打骨牌），开肉飞呀（系以不知重量的猪肉一方，悬于当众，赌者纳票底后，即猜其重量，以数目最接近之前数名为胜利而摊分其票底之所入)，番摊宝馆，闱姓山票，以至斗鸡，斗蟋蟀，斗画眉，莫不应有尽有。麻雀牌还是光绪三十年才传来的。本省的禁赌，我记得以前曾厉行过二三次，但所禁的只是杂赌。闱姓山票、番摊等一般认为是“正当的赌博”，不在禁止之列。而且禁止时候，也很短促，至多不过一年或几个月就开放了。禁令也不严厉，在城市里不过徒具形式，乡间仍和不禁一样。民国以来，这种赌博的规费，竟视为正当的饷源，而

且是极确实极容易筹集的饷款，乃美其名曰“防务经费”，公开征收，全省每年约有三百万元之巨。就是到了我们的军事时期，亦是以这种收入为军饷的重要来源。十六年我曾订定分区禁赌的办法，于十七年元旦，通令全省施行，除在梧州、南宁、桂林、柳州、平乐、玉林、龙州、百色这八个城市中划定区域，准许开设番摊、宝馆两种赌场外，其余各县以及上述八县的乡间，无论何种赌博，都在禁绝之列。这种办法，在当时，就表面上观察，自有其特点：第一、赌的范围及区域缩小了，易于管理，而“赌税”收入，并不减少。第二、其余大多数的城市乡村，不致再蒙赌博的害处。所以我离开广西之后，这个办法，还是继续实施，直到抗战之后，才行废止。我现在回想起来，这并不是一个根本解决的好办法，而无异于承认一个正当的赌区，与合法的赌博。比到以前的情形，只能说此善于彼而已。

十七年的大饥荒 十七年广西大旱，灾区约占全省之半，尤以毗连贵州边界一带为甚。以前虽连年遭罹水灾旱灾，但灾区都没有这次的广大，而且在那兵马倥偬之际，实在没有机会与款项去设法赈济。省会各界特组织筹赈会向各方募捐。省府并通令全省公务人员减薪助赈，但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庆远、河池、南丹一带米粮没有了，继以草根树皮，最后把农民赖为生产动力的牛只，都吃光了，而仍不免于死亡。有些偏僻的山村，直到好久，才发现村子里的人，全都死光。一个房屋里或帐子里都是饿死的尸骸。我们驻在那里的部队，都要到柳州以下来运粮补给。粮船到了饥荒区，那些饥民，有的手里执着板刀，有的是徒手，蜂涌着要来抢粮。官兵告诉他们：“我们手里有步枪、机关枪，你们这个样子，可以抢得到粮么？”饥民说：“希望你们开枪，把我们击毙，否则就要把粮给我们吃。我们宁愿枪毙，不愿饿死！”人类是有同情心的，官兵在战阵上无论如何的勇敢，但对于这手无寸铁的饥民，是不肯忍心将他们击毙的，结果是分了一半给饥民，安慰他们回去。这个官长的处置，我认为很得当。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对

我说过："在大饥荒的时候，饥民聚众开仓（即将富有者的仓廪打开抢食），是不能算做犯罪的。"我当时不能了解这个道理，自经此次大饥荒之后，才恍然明白。在现代法律上，因正当防卫而至杀人，是没有死罪的。这等法意，实在很合理。多数的人，因为要救自己的性命，被迫而强取一些食物，确是一种正当的防卫。而且保障人民生命，是政府的最大责任，政府既不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还要以法律去惩治他，理论上也觉得说不过去。回忆我父亲这个启示，使我在政治上了解不少的真理。

创立村政学院 县政基层组织的重要，我在那时也已经注意到了。为培植县政基层干部起见，于十七年的九月，创设村政学院于桂林良丰，聘刘仁航为院长，这是广西村政建设之开始。在此以前，乡村组织及干部，都是沿用旧的方式与旧的人员，自然不会有若何进展。以后又因不久即发生十八年的变动，以致村政学院仅成为一个始基，而未著宏效。而且就我的观察，刘仁航一流人的学问道德，虽然很好，但所讲述的理论，未免近乎迂阔，更谈不上实际的经验。他们是纯粹的村治主义者，将上级的关系看得很轻，似乎近于"无政府"的主张，所以即使有机会实行起来，收效如何，也是一件没有把握的事情。

组训民团 十九年因军事的挫败，亟思统一组训全省的民团，以为军事的补助。四月间成立全省民团总指挥部于南宁，我任总指挥，白健生任副总指挥。全省划分为十二区，设区指挥官、副指挥官各一人。各县置民团司令部，设司令、副司令各一员，以县长兼司令，这是广西办民团之始。经以后多年的改进，成为以民团为中心的广西县乡镇组织。但是我担任总指挥的时间甚短，而且并不切实负责，以后的改进工作，都是白健生、黄旭初、雷殷三氏董成其事，与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创设行政督察委员制度 广西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加以那时除了几条勉强通行的河道之外，陆路交通，十分艰困。省会南宁，地位偏处南隅，省政府对于全省九十余个县单位的指挥监督，

自感困难，尤以桂林、柳江、田南(即百色)、镇南（即龙州）各区为最甚。陆谭时代的道尹制度，于民国十年的时候取销了，要把他恢复过来，固有困难。而且距离省府较近，及交通便利的地方，也无须乎要加多这个中间的行政组织。所以我那时为暂时权宜计，特于距离省会辽远而交通困难之区，设置行政督察委员。因为我觉得前清的府道及民初的道尹，都是固定的官制，未免呆板了些。既经撤废，自不必再行恢复。而广西若干地区，在那时候，又确属需要一个中间组织，以补省政府耳目所不及。经再三研究的结果，乃改用行政督察委员的名义，为监督考察边远地区各县行政的负责者.这实在为现时各省行政督察专员制度的嚆矢.不过那时的组织很简单，只是一个在特定区域设有机构的视察员而已。不料由我创立的制度，今日竟通行于全国。这个制度决定以后，即委张任民为桂林行政督察委员，辖桂林、平乐各县。黄勉为柳州行政督察委员，辖柳州、庆远各县。郑承典为镇南行政督察委员，辖龙州、太平各县。冯冠伦为田南行政督察委员，辖百色、思恩各县。直到十八年全省的交通网大致完成后，始行撤销。

整理财政 广西是素号贫瘠的省份，前清一代，均赖广东协饷以维持广西的行政支出。民十以后，全省分崩离析，财政更混乱不堪，非经彻底整理，决不能平衡收支。尤其非税收合理，不能减轻人民负担，清除人民毒害。在十五年的时候，第一件重大工作，就是整理货币。第二件重要工作，就是统一全省收支，大致已如前述。但这不过是初期的基本工作，尚谈不到财政本身的整理。到了十六年，我才决定广西财政整理的方针。第一、采用量出为入与量入为出的平衡原则，就是说政府为进行各种新建设，不能不有新支出，而这种新支出的来源，同时亦须顾到人民负担的能力与收入最高的限度。第二、实行全省一次征税，裁撤重复的税卡，停止重复征税.第三、废除不正当不名誉而害民之收入。第四、实行专卖及保护税。第五、废除包商及比较额，实行

实收实解。第六、收入一律改用大洋，以毫洋加二五伸算。第七、颁定新税则，采用从价征税。这几个重要方针，虽然决定了，但是在准备上、执行上尚有很多的工作。于是首先成立整理税务委员会，以财政厅长黄蓟为主任委员，指定对税收有成绩有研究之税务人员数人及地方公正士绅商数人为委员。于十六年春在梧州举行税务会议，研究讨论、决定各种进行办法，于七月一日逐步实行。在实行以前，先由政府提出支出之需要数字，然后由各重要税务机关之负责人，如白博九、黄子敬、蒙飞鸿、李德辅、黄仲庵等，就当时之税则，加以整理，以测定收入之最高限度。如果尚不能适合政府之要求时，则按其差额，以为加税之标准。同时将全省原有三十个征收机关，应征之数目，并裁于十六个机关征收。这十六个税务机关，皆置于全省货物进出之重要口岸，凡出入口之商品货物，完纳一次税捐之后，即可通行全省，无稍苛扰，实为省境统税之滥觞。此办法实行后，税收增加一倍有余，而人民负担，并未加重，商民则皆称便。在前清，各种税卡征收额均有规定，能征收足额者，实所罕见，能征解七八成者，已认为达到要求。其实真正的收入，要比规定额高很多，超过定额之数，皆为征收官吏所中饱，为数极为可观。陆谭时代，仍缘此例办理，所以许多税收机关，皆为其亲信独占，或作为一二特别权要者之酬劳。所以那时候，一任收税官吏，莫不夏屋渠渠，腰缠累累。我们在军事时期，曾改为投标商包，收入较以前比较额，超出一两倍，因比较额皆为前清光绪年间所规定，现时商业发展，其应收数目，自不止此也。那些税务的包商，大都是与我们的干部有关的人，他们的盈亏，我是很清楚的。盈收的数目，有的比缴解政府的数目还要大很多，真正亏负的是绝少的。我见如此情形，乃决定废除包商，实行实收实解，严其人选，密其监督。在那整理的时期，曾经枪毙一个人，监禁了好几人，然后始获良好的效果。我记得有一位素为我敬仰的先生对我说："水清则无鱼，官清则无人，你如此办法，恐怕无人肯为你办税务了！"我说：

“我情愿水清无鱼，决不任他们混水摸鱼”。亦可知那时一般人对于办税的观念是怎样了。但是这个说话的人，他却是善意的。

创办卷烟专卖与保护税 其次，是实行专卖保护税。这件事举办以后，就牵涉到外国商人的身上。我们办理专卖事业，先由纸烟做起，将所有入口的纸烟，一律交由政府贴从价百分之七十的专卖印花，再交烟商分销出去。那时广西的入口纸烟，以英美烟草公司的出品，占大多数。而华商的出品，如华成烟草公司、南洋烟草公司仅占一小部分。这个办法，一经施行，英美烟草公司就派代表来质问。我回答他说：“卷烟专卖，各国都有此办法，即使没有前例，我认为这是财政的合理措施，也要如此做。”他说：“我的烟已在上海纳了统税，不能再纳第二重税。”我说：“你纳的是上海税，我收的是广西税。”他对于我这种强词夺理的态度，竟毫无办法。最后带着要挟的口气说：“我的公司要撤退了，听候帝国同你中央去交涉吧！”并送我一大箱三炮台香烟，因为我好吸此烟，好象表示英美公司撤退之后，我就没有三炮台可吸了。我说：“谢谢你！你们如果真的撤退，我就自己开厂，自己制烟，不再需要你的出品了。”结果英美烟草公司自动撤退了，华商屈服了，我自己的烟厂，也开设起来了。委苏汝荃为厂长，出了两三个牌子的香烟。后来因为专卖也等于收税，反而要贴许多印花，费多少手续，索性改收保护税，值百抽七十的税率，比以前增加十倍有奇。这是在税收上首先战胜外国人的一件事。但是外来烟税收得那样重，而我们自己的烟厂，并不因此发达起来，也不能大量赚钱，这完全是管理与技术及原料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要求自己工业的发展，对于保护税的实行，固然是要紧的事，而讲求科学技术与工厂管理，实为最基本的条件啊！

火油征税 再次，则为火油纳税。我在梧州的军事时期，对于各种货物通过，都要收保护费。因为各处的土匪，沿途设“卡”，商人付了“行水”，才可以通过。我之要收保护费，就是用武力保护商货安全通过，不许土匪勒收“行水”。但不许土匪收“行

水”，而自已反收起保护费来，似乎是换汤不换药的做法。其实我收的费很轻，而且是有规律的，负责任的，因此商民都很愿意缴纳。即当时的外商火油公司，如亚细亚、美孚、德士古起初亦对我抗议。我说：“问题并不是一定要收保护费，而是你们要不要平平安安的做生意？”他们听了我的话，也都乐意缴纳，历年都无异议。可是到了政局统一整理财政的时候，我要正式征税，他们就不愿意了。又向我提出抗议，我说：“你们以前不是一样的缴纳么？为什么现在又要反悔？”他们说：“以前因为有土匪才收费保护，现在时局太平，为什么还要收费，而且保护费是临时的，税是永久的，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我说：“假使你们坚持不肯纳税，时局马上就会不太平。无论那一个国家，商民纳税的主要目的，都是希望时局太平，惟有时局太平才可以赚钱呀！”随后我又说：“假使你们不愿意用保护费或税的名目，最好是将全省经销火油的代理权，交我政府办理，我可以在那里加价，抵补这笔数目。”他们一想，这样更不合算，便要求国府命令制止，我仍不予理会。争执到最后，他们是屈服了。我不过在税率上减轻一半，终于获得了胜利。

卷烟专卖和火油征税 两次对外国商人交涉的胜利，固然由于我蛮干的结果，同时也因为那时候香港发生罢工风潮，汉口发生交还英租界的问题，大英帝国对中国革命政府让步了。所以我才能“见风使舵”，给他们一个硬干，毕竟得到了胜利。可见一个国家的外交，确是需要民气和国力做后盾的。

禁烟收入为广西大宗财源 那时广西财政的最大来源，要算禁烟的收入了。所谓禁烟，仍是军阀时代寓禁于征的办法。鸦片来源，并不在广西境内，因广西土壤气候，不适宜于种植鸦片。在西南方面，烟土产地，都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它的出路，一是由长江销行下游各省。一路出广西，销行珠江流域，甚至港澳南洋各地，所以百色、龙州、柳庆都是云南烟土必经的要口。全年通过各路线的，总在二千万两左右。历年加以整理，收入

达一千万元以上。这两千万两的烟土，如以两广四千多万人口来分配，平均每人可得半两，为害之大，可想而知！“饮鸩止渴”，虽知其害，而竟乐为之，其造因固不自今日始也。鸦片战争为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侵略之开始，而提倡种植鸦片则为中国民族自戕之开始。以林文忠公则徐之卓识远见，竟不能挽黑祸之横流，岂独满清政府应首负其责，即民国纪元后中央及各地方政府，亦不能辞其咎也。叙述至此，不禁悚然自愧！

田赋之清理 在前清时代，广西的田赋收入，不过五十万两。及民国四年六月，举行全省清赋，以财政厅长田承斌为总办，朱新模为驻局总办，各道尹为会办。取销以丁折米旧制，改两为元，厘定产谷百斤，征银一角，杂粮百斤，征银六分(旋将杂粮免税)，实为广西田赋改革之开始。经此次改革之后，每年增税一百五十余万元，至十五年全省田赋收入，全年亦不过二百余万元。此种改革，不过征收方法之简化，尚谈不到地籍之整理，田亩之清丈，而历年来因人口之增加，新辟之土地，亦不在少数。我任内，鉴于各项不正当之捐税，将来必须废除，不得不在田赋方面加以彻底之整理。乃于十七年八月间，成立清理田赋总局，以财政厅长黄蓟任局长，全省清亩所需经费预算，约在二千二百万余元，系用实地丈量法，预计三年内完成。不幸十八年政局变动，清丈工作亦就中辍。但在南宁局部清丈所得的结果，并不十分正确，盖创始办理，技术与经验，皆尚欠缺也。就我现时所知，全国各省对于土地之清理，皆以财政为目的。所用之方法，如土地陈报，土地编查，皆系速成办法，而非科学的根本办法。一面要省经费，一面又要省时间，既不储备人才，又无精密机械，草草从事，错误至多。照此办法，不知何年何月，全国才有正确的地籍呢？

广西财政，自经十六年后之不断整理，已日上轨道。至十八年，我离职以前，都能维持必要之支出，而使各种建设，得以齐头并进。二十年后，仍本此基础，维持迄今，使广西建设得更进

一步之发展。饮水思源，实不能不归功于当时的财政厅厅长黄蓟氏呀！

增筹教育经费 广西教育，素称落后。在民十以前的陆谭时代，既不重视教育，民十以后，又经过五个整年的军事扰乱，匪特不能进步，反多所摧残。到十四年省政统一，乃于十五年召开全省第一次教育会议。这个会议，开创了广西教育的新纪元，除了讨论恢复原有的学校之外，即为力求扩展与充实。因此宽筹教育经费，便成为会议中的重要问题。当经决定在全省田赋内，附加一部分充作教育经费，这个主张，出席人员，自然一致赞成。而在政府方面，因为这是国家的百年大计，也就毫不考虑的核准了。广西的田赋额，本来很轻，加了一倍，也并不觉重，所以在人民方面，亦认为这是应有的负担。会议闭幕以后，接着举办教育行政人员养成所，将各县教育局长召集训练，期由教育行政基层干部的健全，以促进地方教育的发展。

创办广西大学 十六年的冬天，我在省府会议提议创办广西大学。当时虽有人以广西的中等教育尚未发达，似不宜办大学为言。但我觉得一省里面，没有一所大学，以领导促进文化的责任，总是一个缺憾。而且广西学生要进大学，非到广东或北平、上海不可，也就太不经济，太不体面了。所以我不顾他们的议论，而径行决定，先成立广西大学筹备委员会，我自任委员长，教育、财政、建设各厅长及省内外的桂籍有名望的人士为委员。由省政府即拨一百万元为建筑费，五十万元为设备费，一切建筑都是新的，丝毫没有利用旧物。校址勘定在梧州三角咀的蝴蝶山，取其交通便利，本省学生皆可顺流而下，外籍的教授亦可溯西江而直达。同时因为那里是我进兵梧州的登陆地点，可作为广西改革之纪念也。十六年三月间，我亲到梧州，举行奠基典礼。经之营之，不日成之。是年九月间，大部建筑已完成。乃聘马君武博士为校长，盘珠祁硕士为副校长，于九月十三日举行开学典礼。第一期招收学生二百八十余人，内分农学院、理工学院及矿冶专科，文

法学院则付缺如。因广西贫瘠，亟欲由农工矿之发展，以救济其穷也。学校虽系初创，然以建筑之新颖，设备之完全，加以马校长之学术名望，不特可招致省外之教授，且可吸引外省之学生。抗战后，校舍一部分被敌机炸毁，乃分迁桂林、柳州，并由省立改为国立矣！我每到桂林，校中必请我讲话，我亦乐前往。三十二年到桂林，马校长已逝世数月。我到良丰，伫立于他巍巍的墓碑之下，默念这广西第一个出洋留学生，第一位德国工科博士，第一任广西大学校长，他为革命而努力，为学术而努力，为“西大”而努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念之余，实不知涕泪之何从也！而“西大”已由婴儿而少壮而成长，育成之材，亦已数百千人，为地方为国家，必能继马校长之遗志而努力。马校长九泉有知，亦可以瞑目矣！培育后生，本为前人应有之责任，我不敢以此居功，但回忆往事，亦有足以自慰者。

几项重要的教育文化活动 是年夏间，省政府在桂林举行夏令讲习会，聘请省内外学术名流，前往讲演，并令全省中等学校校长、教职员，各县市教育局长，前往听讲，各界民众亦可自由参加。“桂林山水甲天下”，广西又是正在革新的省份，所以到来讲学的名流学者很多，如马君武、邱大年、黄宾虹、丘景尼、唐庆增、陈钦仁、陈定模、陈钟凡、陈柱、姜琦、白鹏飞，郑彰成等，皆不远千里而来，实开桂林文化运动之新纪元。他们对于草莱初开的广西，寄予无穷之希望。秋间，又在梧州举行第一次全省运动大会，到各县运动选手千余人，广东及驻在梧州之外兵，亦派选手参加表演，情形至为热烈。

以上所述，都是广西革新初期的教育、文化活动。中间虽经十八、十九、二十三年的军事行动，而稍有停顿，但风气已开，基础稍立。民二十年以后的广西当局，更加努力进展，尤其是提出“寓将于学”的口号，实施中等以上的学生军训，实开全国国民军事教育之先河。但广西现时的教育，量的方面，尚可步武各先进省份之后，而在质的方面，则相差尚远。据我所知，即以“西

大”而论，每次招考新生，外省学生录取者日多，本省学生考取者日少，这就是表示广西省中等教育的缺点。又闻各级中学招考时，投考的学生非常之多，而可能录取者则甚少。这也足以表示广西小学教育的缺点，而有待于今后努力改进者。

公路建设的开始 广西的河水，都是由西北向东南流的。广西全境面积六十余万方里，地面上的水流，都是经梧州出口，甚至贵州南部，云南东部的水，也都是经由梧州出海的。所以梧州水位的涨落，相差甚巨。最高纪录为民国二年之七十三英呎，其余五六十英呎，三四十英呎，也都是常见的。这样巨大的水位差，不但使农田人畜酿成极大的灾害，即在交通方面，水涸则船只难行，水涨则覆舟伤命，予行旅及货物运输，以极大的困难与威胁。且因河流方向，都由西北而东南，所以由西北至东南的交通，尚称便利，而东北至西南的交通，就十分困难了。我对广西的建设，首从发展交通着手，关于全省公路网计划之决定，一方面是根据省内河道交通的分布，另一方面是根据邻境之需要。如上述省内河流情形，对广东方面的交通，暂且利用西江，尚称便利。而对于湖南、贵州、云南、安南则非开发陆路交通不可。在陆谭时代，全省公路，仅有南宁至武鸣之五十余公里，及龙州至镇南关之五十余公里。这两段短短的公路，与我们当时的需要，相差很远。因省会在南宁，就以南宁为起点，决定建筑四条大干线：（一）东北干线，自南宁起经宾阳、迁江、柳州、荔浦、桂林、全县，直达边境黄沙河与湖南衔接。中间以柳州为中心，一经宜山、河池、南丹直达桂边之六寨与贵州相衔接。一经沙浦而至长安。一至石龙，达柳江之下流。一以荔浦为中心，经蒙山至濛江与西江水运相接(此路现尚未通)。一经平乐而至贺县、八步，再一方面接至广东之连县、阳山（此系抗战后才修通），一方面经信都而至梧州（此路兴工不久即停止，尚现未通）。（二）东南干线，由宾阳经贵县、玉林、容县而至梧州。中间一以玉林为中心经陆川而达广州湾，一由玉林至博白。一以容县为中心，经六陈、大安至

武林，以沟通西江水路。（三）西南干线，由南宁经绥渌、上思、思乐、宁明、太平而至龙州。（四）西北干线，由南宁经武鸣、都安、果德、思隆而至百色，再由百色接至贵州之坡脚，云南之富州，与云贵两省衔接。此路在我任内，并未动工。民二十年后，由现政府筑至百色，但尚未至云南边界。

以上所述的计划，除西北干线外，其余皆在十七年底十八年初完成通车，约共长五千多里。除一小部分系由人民自办者外，其余皆系政府拨款办理，由建设厅长伍展空主持其事。记得有一次，我在广州政治分会报告广西筑路情形后，戴季陶先生说："古称有道之邦，广西现在真可算得是有道之邦了。"的确，那时候广西的公路，要比同时期的任何省份为多。又有一次，一个美国驻华的商务参赞安德森氏至南宁考察，他对于广西公路之迅速发展，除了表示惊讶之外，还发表了许多关于交通建设的意见。他不赞成我再发展公路交通，而主张建筑铁路。他说："陆地的交通，一定要以铁路为主，必须铁路交通有了基础，公路交通才能发生它的补助效能。铁路是一条大动脉，公路好比许多细血管，假使只有公路而无铁路，是不合理的。因为公路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消费，尤其是中国，既没有汽油和橡胶的生产，又不能自己制汽车，现在公路上所用的一切，除了泥土砖石木材之外，无一不是需要外国的东西。如果五千多里的公路，充分利用起来，数年之后，它的消费就可筑成一条很长的铁路了。广西现在还没有一寸铁路，而公路却有五千多里。这是一个很不经济的办法。"我那时听了他的话颇不以为然。我总觉得修筑公路轻而易举，而且就当时广西的商业交通情形，有了公路交通已尽够用了。同时建筑铁路，需费大，需时久，那里有公路这样迅速而省费呢？可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他的意见，非常正确。他并不是为汽车公司、煤油公司、钢铁公司推销的广告宣传，而完全是就理论上说话。假如我那时候采纳他的意见，竭我的全力，未尝不可以完成数百公里的铁路，决不致增加后来浩大的消费了。中国初期的建设，多

半是犯了避重就轻的毛病，固不止我一个人为然。这个失败的经验，真可作为前车之鉴啊！

市政建设概况 广西的都市建设，实起始于梧州。十三年的冬天，大火烧去了梧州全市精华的十分之五六。燃烧得这样炽烈，固然由于风高物燥之故，而街道狭窄，施救不便，亦是一个很大的原因。事后我就提议要把街道放宽，被火区域的重建，固然要如此，就是完好区域，也一律要重新改造。赞成者均自动照办，不愿者，就派兵强制执行。为办理这件事情，乃成立梧州市商埠局，主持其事。十六年五月，又改为梧州市政委员会，以蒙民伟为委员长。十二月成立梧州市政府，蒙民伟接任市长，下设公安、卫生、工务、财务等局，凌鸿勋、赵祖康诸氏，均曾在工务局工作。街市的规模，皆仿照广州市。十七年年底，自来水电灯等工程，统已完成。昔日卑湿黑暗污秽混浊之旧梧州，至是完全改变其原来面目，以崭新之姿态出现矣！继梧州之后，则为南宁、柳州，这两地的市政建设，皆于十六年九月开始，先成立市政工程处，开筑马路。十七年冬柳州发生大火，烧去市屋十分之七，男女居民，烧死三百余人，乃将全市彻底改造。省府因南宁过偏桂南，遂兴迁治柳州之议，以其地点适中，水陆交通又极便利，因而对柳州之市政建设，特别注意。除将旧城方面之灾区重新建筑外，并在对河荒郊外建筑一百尺宽之马路，为将来新市区之基干道路。并建筑规模宏大之物品展览会，全部建筑费共八十万元，拟俟展览会闭幕后，省会即行迁移柳州。展览会全部房屋，即作为省政府办公之用。旋因十八年事变，始告中止，展览会房屋的建筑计划，未能完成。但其余的市政建设，则于民国二十年后，仍由伍展空继续完成其工作。至于桂林及其县城，及大的圩市，在民二十年后，广西政府当局，差不多全部督导改造竣事。街道宽阔整齐，平直亢爽，实为广西市政建设之一大特色，而非目下他省所能及者也。

广西的矿藏 广西因为革命统一成功较早，政府的权力集中，

社会关系简单，所以在十五六年的时候，已着手各种建设。此时其他各省，或在军阀手中，或正在军事扰攘未定之际。所以国内很多专家，如地质学及矿学家丁文江、李四光，农业经济专家邹秉文、莫定森、邓植仪、赵俊声、辛树帜，工程工业专家凌鸿勋、赵祖康、陈琮、张季熙、邢士廉均于十八年一月间，应广西建设厅之聘，参加在柳州召开之全省建设会议。他们有的是来广西考察的，有的是在广西工作。此外更有许多华侨团体不时回来考察，想从事实业的开发。我们特在梧州设立一个华侨招待所，来招待他们。但是这些专家和华侨到来之后，大多感觉有些失望的地方。这不是政府的礼貌不好，招待不周，而是他们认为广西的先天条件与后天条件均感缺乏，恐怕不能有很大的发展。我还记得丁文江氏曾在南宁以东地区普遍考察，据我派去随从他的人回来说："丁先生正象一头穿山甲，无论走到一个矿陇，或见到一个山洞，他都要亲自进去探视，弄得一身污泥才出来。就是没有洞的地方，他也要找人掘一个深洞下去，看个明白。遇到一个地面的断崖，他就徘徊不舍的在那里察看，终日不是拾石子，就是捡泥巴，好象一个乡间顽皮的孩子，又好象一个地理先生。他平时那付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样子完全变了。"我听了也觉得有些好笑。丁先生考察回来，我和他作过一次详谈。他说："广西的地下，各种矿苗都有一些，可是样样都不很丰富，尤其是没有丰富的好煤，也没有丰富的好铁，而且分布得非常散漫。这于将来工业的发展，不免受到阻碍。金矿虽有很多地方发现，但粒小脉微，还不能用机器大量生产。而且金矿在世界上并不占重要的地位。锑的藏量，仅次于湖南，但用途小，价格低，目前尚无开采的价值。只有锡的藏量，虽不算很丰富，但集中易采，是目前广西最有价值的矿产。"他还说："广西一定要修筑几条铁路。一条由桂全至湖南。因为长江以南的煤田，以湖南宝庆为最有价值，可用火车运到广西来应用，或者销到广东、香港去。另一条北由柳州经河池、南丹而至贵州、四川，南经贵县、玉林而至广州

湾。四川出海的铁路，以此线为最近，全程不过二千多公里，而且工程上比任何一线为容易。四川的农产都好，贵州的矿产亦有希望，如果这条铁路成功，对于广西经济上有很大的益处。”我听了这番宏论，总觉得有些近乎迂阔而玄妙。我心里想：“你这样在地面看一看，难道就可知道一切了么？你的眼睛难道可以看透地层？”我问他：“会不会在很深的地层下面，发现同煤矿一样多的金矿，或其他重要丰富的矿苗？”他笑着回答道：“也许会有，但是世界上尚未有过这个例子，也许现在的地质学，尚未研究到最深的地层里面去。但是目前的地质学，在一般原则的应用上，是可以作为开矿的指针，当不致使人民乱投资本而得不到效果。”我对于地质学自然是一个门外汉，他也知道我是一个老粗，不愿多争执，只是婉转的对我解说，使我领悟。最后他说：“我不过勘察了一个概况，而且南宁以西的地域，还没有看过。那里的山脉，来自云南和安南，安南与广西交界不远的地方，有很好的煤矿，可能的在南宁以西，留有很大的希望。最好组织一个地质调查所，从事详细的调查，便能明瞭一切。”现在我回想起来，很佩服他的学问见解与儒雅的风度。可惜他早已死了，真是国家的大损失！

初步的建设事业 在农业方面，那些专家也提出了两点重要的意见：第一、广西的地层多半是石灰岩构成的，(尤其是柳桂一带）下面渗漏的太厉害。广西的雨量，本来并不算多，所以土地很容易受到旱灾的威胁，而且所施肥料，都被渗漏而不得积聚，不但不能变换土壤，反而一年年的枯瘠下去，所以广西的农产品，大多数是不很丰厚的。第二、柳桂的土壤多半是石山的风化层，酸性太重，有些植物不能长成。而且害虫甚多，不易治理。要补救这个毛病，惟有人工储水与大量的制造化学肥料，因为天然肥料很缺少，不够土壤的消耗也。当时我们本想利用梧州的硫酸厂的硫酸，作为制造化学肥料的基础，但是省内又无磷酸矿石，终于不能实现。这都是一般学者所谓广西先天不足的原因。

至于那些回国考察的华侨，论调可不同了。他们本来都是不学无术，勤俭起家的人，所希望的是马上可以赚钱。而一个将要开辟的局面，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多的顾虑，当然也不愿他们辛苦得来的一些资本虚掷下去。他们在以前，都是只身冒险到南洋去谋生活，好容易从猪仔（被卖身的华工名曰卖猪仔）苦力的地位，挣扎起来，变成一个小资本家。自然是小心谨慎的，不再象以前一无所有的时候具有冒险精神了。他们认为那时候的广西，尚不够投资开发实业的条件，便都惘惘然回去了。我们站在政府立场，不管先天不足也好，后天失调也好，并不因此灰心，而仍旧是勇往直前的做去，希望人定可以胜天。所以对于他们的种种说法，均当他是不正确的批评，而不自馁意志。在那短短的时间内，工业方面，完成了三酸厂、酒精厂、机械厂、制革厂、机器厂、砖厂、纸厂。农业方面，成立了全省农务处，各区设置垦荒局及兵农委员会，实行兵农政策。以伍展空氏担任兵垦工作，并提倡植桐，通令全省每人每年植桐十株，列为县长的考成。全省的公务员，均须身体力行，首由省级公务员做起，我亲自率领垦地植桐，在南宁辟有一个广大的公务人员桐场。全省上下，热烈进行经济建设的工作。但事有出人意料外者，正当我们兴高采烈的时候，突于十八年春，接到广东方面的电报，说是李任潮在南京被扣，要我立刻到广州去。当时我正率同成千以上的公务员，挥锄掘地，立刻抛下了锄头，踏上了汽车，放弃一切的工作，重复走入政治战争的旋涡。广西建设的工作，便从此停顿下来，又受了几年磨折。这不知是广西的损失呢，抑或是国家的损失？是一方面的罪过，还是多方面的责任？这问题就难以解答了。

所幸这种初步的经建基础，尚未摧残净尽。二十年以后，仍由现在的广西当局继续举办起来，并有许多的扩展。在生产上，无论是公是私，都得到了利益。三十三年我与黄旭初、伍展空到柳桂一带去视察，"西大"的农学院师生要我讲演。我说："一个人无论读书或做事，都不是单纯为了自己，为了目前，而是要为

了众人，为了将来，这样才有伟大的成就。现在假使我是附近的老百姓，来批评今日在座的人，我一定首先拥护伍厅长，惟有他是最成功的一个。因为沿公路几十里的大树，几百万株林，几万亩农田的水利，都是他十几年前垦辟种植经营的成就呀！但是在当时，政府说他用钱多而不见速效，老百姓说他霸占牧地，垄断水源，几乎弄得他无处容身，而苦求摆脱。现在呢，绿树成荫，沃野阡陌，这个地方，不但成为很好的农业区，而且成为一个幽静的文化区。这不是他伟大的成就么？现在他虽然不在本省作事，我想好多人一定在怀念他。古人说：'前人种树，后人遮荫'，我们何必一定为了自己要遮荫，才去种树？我想凡是学农的人，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那末将来他的事业，才有所成就。"

主桂四年的三个感想 自十四年的九月到十八年的五月，我主持广西政治，一共三年九个月。以一个年青而又无政治经验的军人，来负担全省的政治责任，这是何等不合理的事情？纵然自己有勇气来负责，但从老百姓及旁观的人看来，一定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冒险，不但为我个人担忧，更为他切身的利益而害怕。而我呢，只是一面学，一面做，战战兢兢，小心谨慎地干着。还算侥幸，在这三年零九月的时间，不但没有陨越，还勉强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这些成就，只可以说我在政治实验学校所得的一点试验品，而不是一个正式技师的制造品，其粗糙拙劣，不美观，不合用，自然可想而知。但是以一省的大地方，一千多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来作一个武人的试验场，真是太危险太不经济了！古人说："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我们既是马上得之，而更是马上治之，其不致颠覆者，亦幸矣！这等情形，在革命初期，固属必有的事实，而今后之建国工作，其艰巨必十百倍于往昔，国家固然要培植保育健全的政治人材，个人亦更须力求本身之充实健全，珍惜其用重大代价所获得之经验，而配合国家之需要。否则革命时代之损失，就无从补偿了。这是我写完本章的第一个感想。

在革命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来破坏，一方面是用革命的方法来创造。创造的力，超过了破坏的程度，革命才能成功。中国国民革命的破坏工作，我觉得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旧的观念方面，未曾彻底扫除而竟致妥协了事，因而创造的力量，亦无由发挥尽致，使以后的建设工作，受到极大的障碍。广西在革命初期，虽将旧的人物完全铲除了，但是社会上一般的旧观念，依然存在，新的创造的观念，事前既未培养成熟，脆弱的革命锐气，一经旧思想的冲击，便渐渐的衰退下去，而仍旧卷入循环内战的漩涡，不能坚持创造的意向。纵然在一时期内有若干的进展，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而在那一时期的进展，的确是革命力量所推动的涛浪，可惜这涛浪没有继续的力量去推动他，反而变成一个相反的方向，在那里不断的波动。中国历史上，每次鼎革之后，都有一番安定的工作。这个所谓“安定”，并不是进步的，而是消极的。并不是利用破坏力量来领导进行更大的创造工作，而是想要求这般力量，停止不动，大家坐享太平。结果不是消极的无为颓废，就是不幸的渐渐的走上新的破坏过程。这种传统的旧观念，今天还深印在人们的脑海中，成为中国国民革命不能迅速成功的主因。这是我写完本章的第二个感想。

广西本来是一个经济贫瘠、文化落后的省份，要以自己的财力，自己的人力，来完成革命的建设，本来是不很容易的。因而在创造财产，培养人财方面，必须特别注意。在那天下未定广西先定的时期，国内有很多技术、学术的人才，来到广西，愿意参加我们的建设工作，这是广西建设最好的机会。可惜我们只延纳了一部分，不能尽量聘请。而这一部分的人才，又因十八年的事变而星散了。至于培植本省人才，虽然仍在努力，但是这努力的程度还不够。广西人不免有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既不能很迅速的接纳人家的长处，也不能很迅速求自身的进步。在革命初期，人家尚未着手建设的时期，正可以借用外才，尽一时的努力，以完成初步的建设。若到了人家同样进行建设的时候，就无

人可用，而日见落后，这正是很可惜的事情。至于先天不足，生产不丰，既不可心存失望而自馁，自应加倍的自奋自励，尽其在我的力量。同时追求他人之所长，补救自身之不足。能如此，则再经若干时期之努力，未始不可与他省作进步的角逐。我虽然离开了广西的工作岗位，但就我往昔在广西工作的许多实际经验，加以体会，和现在从旁观地位，清晰观察，认为本省还要十年以上的艰苦工夫，才可以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我写完本章的第三个感想。

九　十五年的党务及当时民运情形

梧州初期的党务　我出兵到梧州，除了受命孙总理的讨贼军总指挥名义之外，对于党务尚未发生一些直接的关系。以前广西的老党员如马君武、刘玉山、刘震寰、刘崛、杨愿公等，不是在广州担任军政的要职，就是住在广州或其他的地方，也未曾直接办过广西的党务。后来梧州一带，入了革命军的掌握，同时当十三年春天，中国国民党改组之后，那些老党员也好象是有些落伍的样子，而代以一班不见经传的新进青年，首先成立的梧州市党部，是中央直接派人办理的。因为当时广西尚未有省党部，这就算是广西最早的党部了。他们不但与我不发生什么关系，即在粤军第一师方面，也不见得有若何的关系。当时在梧州办党的人现在可以记忆的，男的有周济、甘立申、龙启炎、李血泪、李家骥、黄昌佐、粟丰，女的有李立群、李联群、李爱群、黄若珊等，是社会上活动的分子。同时并办理一个梧州民国日报，亦要算在广西最早的党报。在当时联俄、容共、农工三大政策之下，一切的工作人员，还都是很亲爱的同志。虽然知道其中很多都是红色朋友，但一时亦不感觉得有若何不安地方，而在工作方面，自以尽力发展农工的组织为中心，而尤以工会的组织发展更为迅速，所以要求加增工资与罢工的问题，就不断的发生。这都是由广州而传播到各方的运动，并不是梧州独有的事件。

收回梧州英领署　在十四年的"五三"惨案纪念日，很多的群众，对驻梧英国领事署，作了一个示威大运动，所有在英领署

工作的华人，一律都辞退出来，弄得英国领事很惊慌地逃下兵舰，退回香港，以后一直不敢回来！英政府因此常川派有两艘小兵舰，驻在梧州，保护他的侨民。十五年六月间，驻梧州英国海军司令费志杰，因为要派兵舰搭拉士拉号到南宁游弋，须雇用带水（即内河的领江人），我们工会禁止工友去受雇，因此不能开行。费志杰大怒，乃用武力将梧州港口封锁，断绝交通二十四小时，后来经双方协议：以后带水工人，要由工会派定，兵舰不能自由私雇，价钱亦由工会规定，这事才算解决。自此以后，梧州以上的领江权，就操在我们的手里，而外国兵舰到内地游弋的机会，也就少了。因为工会派出的带水，他们不很相信，防到这等带水的人，万一有意将他的兵舰向暗礁岩石上撞去，可以使他们发生很大危险的缘故。我为此事，曾把费志杰武力封锁梧州的经过，亲自撰稿在一张搭拉士拉号的照片上面，分发全省机关团体，作为一个国耻的纪念，以资策励。但此事梧州虽然遭了英人一个极短时期的武力封锁，对方也并不见得有甚么便宜，可见民众组织的力量，作非武力的抵抗，在某一时期，是有效力的。英国领事署的案件，英政府虽屡次向我交涉，但是理由总说不过我们。因为我们的民众，并没有直接侵害他们的行动，而只是在外面示威，在领署工作的中国人，也是自动的退出，并没有什么胁迫的情形。那时的英国领事，一方面因为害怕，一方面因为没有中国人的帮助，尤其是住在那相当高的山顶上，食饭挑水，都成问题，即使不退出，也无法在那山上生活，所以两年多都不敢回来，房屋园林，没有人管理，一日日的崩败荒芜起来。到了十七年年底，广州的英国总领事，到我广州葵园公馆，同我交涉，愿意将梧州领事馆交还中国，但是要广西省政府贴回建筑费港币二万五千元。并说："这都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价值，有当时单据为凭，没有一点浮报。"我因事件总有一日要解决，英方既愿意让步，即等于英国的政治势力退出了广西，岂不是外交上一件很有体面的事么？随即命随从人员当面点交港币二万五千元，中间有

五百元的、一百元的、十元的、五元的包了一大包。他觉得很难为情，要我改用支票，我说：“钞票和支票，不是一样么？而且这都是汇丰银行发行的钞票，不会有假的，你也省得到银行去支取，岂不更便利些？”其实，我那时的确还没有款项存在外国银行，那里开得出支票呢？他很忸怩的收下了，于是大家签了字，我并收回了地契。他临行时对我说：“平生交涉的案件，这是最痛快的一次。当场现货成交，好似一场买卖。”他这些话是讥讽我呢，还是的确的事实，那也用不着研究了。我打开地契一看系当时一个痞棍所写，仅得二十四千铜钱的地价，就把三个山头一大块土地卖给外国人了。我想这等事情，岂但广西如此，就是全国各省，何尝没有同样情形？那些教会洋行，都是利用当地的痞棍，来偷买土地，所费的价值甚少，而得到的地面很大，当时的政府，还蒙在鼓里呢？唉！以往中国的政府，办理对外交涉，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

广西省党部的成立　到了民国十四年，中央对于广西的党务，才有具体的办法，派李德邻和我为广西省党务特派员，指导广西全省的党务进行，并派覃超、梁六度、周锡桓、黄家直、陈立亚、刘百揆、石楚琛、覃时宜、陈勉恕等为筹备委员，分别组织党部，指导民众运动，宣传三民主义。并在梧州办了一个宣传工作人员养成所，以杨文炤为所长，招收青年学生，加以党的训练，作为党的基层干部。毕业后，分派到各县，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到了十六年，又改为党务学校。我自兼校长，李天和、张少杰先后担任教育长。

十五年一月，召开全省代表大会，会中最重要的决议案，为撤销省议会、县议会，而以省党部、县党部代行其职权。理由是：这些议会，都是陆谭时代遗留下来的机关，内容太腐败了，既不足以代表民意，还不如干干脆脆代之以省县党部，也比较顺利一些。这事，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大约是根据本党总章，“省代表大会即为省的最高权力机关”那一条产生出来的。虽然解释

得很勉强，但为迁就事实起见，也没有人提出反对。省、县党部成立之后，就将以前省、县议会的经费，会址，移转过去，不用另外筹划，一切都很利便。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我和陈立亚、陈协五、黄家直、覃超、梁六度、陈勉恕、刘百揆、周锡桓等九人当选为广西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李宗仁、黄植溪、张任民，麦焕章、陈锡光、雷沛涛为广西省党部第一届监察委员，并由执行委员互选我为组织部部长、兼宣传部部长，陈勉恕为青年部部长、陈协五为农民部部长、黄家直为工人部部长、陈立亚为商民部部长、刘百揆为妇女部部长。但刘氏却并不是一个女人。

初期广西党务的复杂 在当时，广西省县党部的干部和党员，多半是杂凑起来。一部分是以前曾经与党（同盟时代）发生过关系，但是后来又脱离或中断了的。一部分是省、县议会的议员，临时投过来的。一部分是十三年广州方面派下的。我们在以前终年都是打仗，对于党务根本就不很注意。到了那时，虽然形式上是我在领导，但是内部意见，非常分岐。大凡曾经与同盟会发生过关系的老党员，就倚老卖老的，在那里讲资格，称前辈。与中央接近的，就以中央为后盾，在那里谈革命。议会派的，倚仗地方士绅势力的背景，专讲法律问题。彼此之间，已显然有了很深严的壁垒。我记得在梧州会议时，谭组庵私自对我说过："广西好象一张白纸，你们要写什么文章，画什么花草，都由你们自已作主，要是弄得复杂，将来问题就多了！"盖有感于广州党务的复杂情形而发的。但他却那里会知道广西当时的情形，已复杂得和广州差不多呢！

当时的工农运动 那时候的党务，自以宣传与组织两项工作为首要。宣传工作，在表面上固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但是在当时真正了解三民主义的，是没有几个人。中央党部对于主义的宣传，亦没有系统的指示。而且在中央方面的情形，比广西还要复杂得多。派到广西指导视察党务的人，各有各的说法，使得我们实有无所适从之概，所以在广西各地的宣传工作，也就极不统一

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言论更为歪曲。譬如对劳工的宣传，就以劳工神圣为他们唯一的宣传口号，认为其他各界都不及劳工地位的高贵。我记得在某次民众大会里，一个女同志出来演讲，她说："工字是不出头的。工人一向吃人家的亏。现在是工人世界，工字要出头了。以前是资本家说话，现在轮到工人说话了。"我站在旁边听了很好笑，我想："工"字如果写出了头，不是成了一个"土"字了么？其幼稚的情形，概可想见。在农民方面，自然以"耕者有其田"为最重要的口号，好象一切土地的所有权，全应属于耕田的农民。于是打倒地主、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和行动，就随而发生，弄得社会上很不安起来。在十五年七月间，因为北伐军急于出发，需要的伕子很多，军队一时雇不及，在南宁附近，就发生拉夫的问题。（按：广西军队，在省内作战时期，拉伕是极少的事。）有个工运同志，名叫陆儿沉的，奔走骇汗的来报告说："因为军队拉伕，工友非常愤恨，就要罢工暴动，请立刻设法制止。"我说："你们没有尽到雇伕的责任，使工友很踊跃的担任革命北伐军的运输。我现在就派你负责办理这件事情，如果你不能尽到这个责任，就不能禁止军队拉夫。因为他们是为了革命北伐，而急于出发，为完成革命工作，而勉强少数人去担任运输工作，那是应该的事情啊！"他说："他们要暴动怎么办呢？"我说："暴动！这恐是你说的话，或者是你要他们暴动，你不要以党的立场来打击党的最重大的革命工作，更不要拿这些话来恐吓我，我不是这些话可以恐吓得倒的呀！"自此以后，工人的气焰（其实是那些工运人员的气焰）低了许多。在农运方面，就更成问题了。广西、贵州边界上的东兰县，有一个名叫韦拔群的，一向在广州中学读书，受过农运的训练，他并不经过广西省党部、省政府的许可，暗地回到东兰，组织农民协会，并且是有武装的组织，于十五年一月七日、将东兰县城攻破、放走监犯、县署被劫一空，并且惨杀地主，实行土地农有的办法。那时广西军事，刚才平定，这种突起的异军，我只好派兵

进剿。由驻百色的刘旅长派团长龚受仪与县长黄守先将县城收复。韦拔群退入武篆山内，仍旧在那里煽动农民，等到军队撤退，重复集合千余人，再陷东兰县城。并以东兰农民协会名义，电国民政府，说是：土豪劣绅勾结县长，压迫农民，枪杀党员，要求中央电令广西省政府查办。其实那里的土豪劣绅，已被他们杀的杀了，赶的赶了，县城也被他们占领了。在当时容共农工两大政策，正在实行的时候，不但广州方面对他们这种举动很为重视，就是在本省的党部里面，也有很多人与他们表示同情的。我为审慎处理起见，乃由省政府、省党部、第七军军部各派员组织调查委员会，前往调查，共同处理。并定出解决东兰农民协会韦拔群等之农绅斗争办法八条，这八条办法的全文，现在虽然记不清楚，但总是迁就农民方面利益的居多。这等办法，无非为息事宁人，不愿事体扩大，求得一时相安而已。自从东兰农协问题解决之后，其他各县的农民协会组织，乃日加扩展，尤其是特别武装组织，着着进行。南宁附近的农协，是直接受省党部农民部指导的，常时几百几千人，肩着刀矛锄头，到南宁来开会。农民部长陈协五，是前清末科的一个举人，已经四五十岁了，终日背着一顶篛帽，穿着一双草鞋，扮成农民模样，同他们混在一起，他对我说："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你有洋号，我有螺角；你有洋枪，我有刀矛，不但地主土豪劣绅奈我不得，就是一万几千军队，我们也不怕！"他这种说话，好象是对我一种示威和恐吓。我心里想，你怎会变得这样快，又怎会有这样的幼稚？我有六、七年来的斗争经验，难道就被你吓倒了么？因为他是一个乡党的前辈，他正染着了民众万能的狂热病，我只好笑笑，不和他分辩什么。

宣传斗争的激烈 党的宣传工作，都以民众为对象，而事实上无论口头的宣传，文字的宣传，各人有各人的说法，却是彼此针锋相对地，在那里争论。民众听了宣传者的讲演，有没有了解所讲的意义和发生什么感想，演讲的人也未必知道。但是民众都

是一样的拍掌，一样的呐喊。有人说："民众的意识和行动，多是被动的、盲从的，宣传的效果，就是从这里发生出来。"这话不无相当理由。梧州的民国日报是中共分子龙启炎、周滑主持的。对于农工政策，自然竭力宣传。后来省党部宣传部又办了一张农民日报，好象是专门以农民为宣传对象的报纸，但是大家就打起笔墨官司来了。大家都以宣传农工政策为中心，而说法却完全两样。南宁的民国日报，起初是中共分子陈勉恕主持，因为祭孔的风潮辞职了。省党部改派毛飞去当社长，他的太太唐竹村及现在东南日报的社长刘湘女，都在那报馆里担任工作。宣传理论的冲突，是国共分裂的先声。我记得有一次，何民魂写了一个宣传的小册子，封面的标题上侧，作了一个这样符号的"+"图案，在省党部委员会议里，陈立亚委员就提出质问，说这是右倾的宣传表示。我那时正担任宣传部长，对他说："是不是它的内容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说："不管内容怎样，那东西向右，就是表示右倾，广州方面出版的册子，那东西'+'都是向左的，"他要宣传部将封面式样改过。我说："你立在正面上看，不是向左的么？"我不管他怎样，把它发行出去，弄得他们很不高兴。其实我心中并没有左和右的问题存在，写的人也未必有左右的意思存在，而他们就在这小问题上着眼，好象汪精卫醉后要我向左边走，走到路不通行一样的有趣，这就可见那时斗争的尖锐化了。

新旧思想的冲突 青年运动，也是那时候的一种社会狂潮。不过知识青年毕竟是理智的，他们虽然是力求思想的解放，但是除了少数地方发生罢课风潮之外，都没有很大的问题，而且解除礼教束缚的运动，已不自那时始，在社会上也不觉得怎样希奇。不过一班男女青年工作同志，对于恋爱问题，要比以前更解放些。记得在梧州北山公园，有两个青年男女同志，因恋爱行为，被人撞见，起了一次很大的风潮。老一辈的人，尤其是反对本党及各种民众运动的人，都起来抨击。甚至驻在梧州的军事重要干部，也卷入纠纷的漩涡，这本是一个私人的平常问题，但是广西的风

气，比不得他省的开通，更比不得外国的开通，男女双方，公然在公园里发生恋爱的行为，总不免有些惊世骇俗，难怪会闹出很大的风潮来！自从这个问题发生之后，无论工农和青年，都有一个新旧对峙的壁垒。尤其是农民、地主、士绅来得更厉害。他们不但有势力，而且有武力，政府若不善为处置，则象东兰那样流血的事件，就可以到处发生。我处在这种环境当中，应付颇为困难，费了许久的考虑，认为应先就领导的人事上，予以调整，则下层的纠纷，自可减少。于是不动声色的选择那些最易引起问题的人，组织一个北伐军的慰劳队，不论其背景如何，一起放在里面。由第七军政治部主任黄日葵率领他们出发，到武汉去慰劳，顺便就留他们在前方工作。这样，在本省境内便少了许多事情。但是仍有许多不肯出去的，出他们是没有什么名义，而仍是隐藏在工农的群众里，更积极地继续干他们的秘密工作。

我对于中共分子的态度 那时，广东方面的情形，比广西更为复杂。北伐军虽然占领了武汉，而国共的裂痕，更因此加深，已经成为公开的事实了。我在广西方面的态度，对人，无论国民党的同志也好，共产党的同志也好，我都是一样亲近。除了他自己公开承认之外，根本不去研究他的背景。对事，只要是合理而做得通的，我也不论谁的建议，都一样的采纳。所以中共分子，有许多关于他们内幕的话，也肯对我说，也许是有拉拢和利用我的企图，存乎其间。当武汉闹得最厉害，国共分裂以前不久的时候，有一个中共分子秘密对我说："你想不想比蒋介石享受更大的名誉，得到更多人的拥护？"我听了，愕然不知所谓。他说："现在具有完全统治一省能力的人，只你一个，广西内部的的问题，一切都由你主宰。你要如何做，就如何做，只要你下一个命令，实行孙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则广西极大多数的人，都要真诚的拥护你。你简直同苏联的列宁一样的伟大。而且广西是一个贫穷的省份，现在一切经费的来源，以烟赌捐的收入为大宗，这在革命政府的财政上，是不应该的。如果不要这种收入，

又无其他的抵补，则广西建设，即绝无发展的可能。如果能够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由农民手里征收百分之三十的生产税，农民一定很愿意的。广西全年土地的生产额，照人口推算，约为五千万担至六千万担。则政府每年至少可收一千五百万担谷子，每担以三元计算可得四千五百万元，比你现在的收入要增加两倍，岂不是一切建设的财政问题都解决了么？”他这番话，乍然听了，不无相当理由，并且是相当动听的。我并不立刻回绝他，只是拿事实问题来反问他。我说：“广西全省有几多地主，有几多自耕农，有几多佃农，你可知道？”他说：“不很详细，但据估计，总是佃农最多，自耕农亦不少，地主最少。”我说：“地主要反抗这个政策，是不必说了。就是自耕农，也不会服从的。因为过去的租税，至多不过十一之征，现在忽然要征到十分之三，他们愿意么？这班自耕农，多是与地主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他们的力量，也是不可轻视的啊！”他说：“各地农民协会，多已组织了，为他们本身的利益，一定能够受我们的指导，而拚命奋斗。此外，还有政府的军队，作他们的后盾。那些士兵，都是佃农的子弟，也一定要为他本身利益而努力。所以这种政策的推行，是没有问题的。”我说：“据我所知，广西的自耕农很多，要是和地主联合起来，总要占全农民的半数，而且他们本身的势力武力，比到佃农，不知要强到多少倍。士兵当中，也不能说完全是佃农子弟，还有很多自耕农的子弟。同时，士兵们对于阶级斗争是毫无认识。历史养成的服从长官命令的德性，一下子那里就会得改变过来。至于官长呢？十分之九是家里有几亩田的小地主子弟，其余十分之一没有土地的长官，既然当了官长，也想置几亩田，作他下半世的生活基础。必不会盲目服从我的命令，去毁灭他们既有的生活基础与生活的希望。甚至因防我剥削他们的权利，而仇视我，反抗我，到那时候，我又怎样办呢？我本来也是一个小地主，纵然我能超阶级的不顾成败的做法，他们就肯跟着这样做么？恐怕于事无济，反要弄到遍地流血，全省纷扰，比民十至民

十五间的情形，还要混乱得多呢！你要知道，我们经过五年的苦斗，才得到今日这个局面。万一因此而再闹出四分五裂的惨祸，这个责任，我能负得起吗？”这番话，说得他无话可说。但我对此事，只当作一番有价值有兴趣的辩论。对他本人，根本谈不上什么善意恶意的。

与李任潮秘密赴上海 到了十六年的二三月间，情形更恶化了！东兰韦拔群的案件，虽定了八项的处理办法，只能够苟安一时。至是他更露骨的宣传共产主义，实行共产主义。本县及邻县未曾参加的人，都纷纷电请剿办。我仍令县查办，得到许多事实的证据，与他们电控的事实完全不同，而我们的党内意见，更为纷歧。无论那一个民众团体，与政府机关都暗地形成两个战线。我个人站在两条阵线的上面，可以说那时候双方都拥护我，双方都怀疑我。因为他们都不能透彻明白我的最后态度。大约是十六年四月一二日吧，李任潮有一个急电给我，要我立刻到广州去。我不知发生什么急变，亦不能查问甚么理由，便立刻专轮到达广州。那时，我的妻子正是生产大儿德芳不久，住在珠江颐养园。所以我到广州，并不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到后与李任潮见面，他很秘密的出示蒋先生由南昌来的电报，要我们到上海和他见面，商量重要问题。电文内虽不说明什么问题，但问题的轮廓，我们都已知道了。李任潮问我的意见，我将广西内部现时的情形告诉他。他说：“到香港上海的船票，都准备好了，下午就要动身，”并关照我行迹要非常秘密。我回家对我妻子说明要立刻秘密去上海的话，她说：“你那满面的长须，那一个不认识你？挂一个招牌在面上，还说什么秘密的行动呢？不如就将胡须剃去吧！”我听了她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匆匆忙忙的将胡须剃去。这六年多相随不舍的东西，至是不能不割弃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我对妻子说：“把它保存起来，作为一个纪念物。”她说：“还保存什么，投到江中就是了。”她的心中好象同我是另外一个想法啊！

在上海举行清党会议 我上了省港轮船的泰山号，李任潮已

在船上了。同行的似乎有冯竹万、陈孚木两人，此外还有一两个随从，开船后，夜里十点多钟就到了香港，当时就船过船的搬到比亚士总统号船上。我自民国四年冬天南回时，经过了香港，已经是十二个年头，没有再到此地，不知它现在有了什么进步？又不知在大罢工风潮之后，受到什么影响？可惜没有机会去玩玩，只能站在九龙码头船上甲板，远望香岛的山光水色而已。船在第二日十点多钟开行了。我当学生时代，来往港沪，坐的都是太古仔（粤语太古一二千吨的小船）。一出鲤鱼门，就感觉颠簸不堪，现在坐在一二万吨的总统号船，比较平稳舒服得多。一方面是物质的进步，一方面是生活的变化，就觉得前后完全两样了。船上的侍役告诉我们："洪兆麟就是在这船上被刺死的，这行刺的烈士，叫做韦德，他刺洪之后，就舍枪自尽。他刺洪的动机，有的说是激于义愤，有的说为报私仇，究竟为的什么，他已身死，也就无从确定了。"他的同行们（侍役）都非常敬重他，在他们公共集会的场所，还悬着他的小照。轮船到了上海，大约是四月的七、八号①，船尚未靠码头，就有上海市长张伯璇（定璠）乘了一个小火轮，并有好些武装兵到来接我们。我们过了小火轮，他说："现在情势非常紧张，不可到租界里去住，以免发生意外！"即将小火轮一直开到高昌庙的码头，然后乘汽车到兵工厂内北伐军东路军白健生的前线总指挥部里面。李德邻也住在那里，大家见面之后，自有一番欢叙。那时蒋先生亦已由南昌秘密到达上海，驻在什么极秘密的地方，没有人知道。不久，蒋先生也到东路前敌指挥部会面。当时，除了我们报告一些两广的情形之外，对于清党问题还未有如何的决定。约莫是第二日或第三日吧，就在离法租界不远的旧市政府内，举行清党会议，由吴稚

---

①据黄绍竑解放后所撰《"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一文中说："大约是四月一、二号的上午，船到了黄浦江"（见《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第17页）。

晖、蔡孑民、张静江、李石曾等四监委，提出一个对共产党破坏两党团结的弹劾书，作为法律上的根据，决定举行清党运动。并否认武汉的中央，另在南京召集中央全体会议，组织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当日参加这个会议的人，除蒋先生外，可以记忆的，中央委员是吴稚晖、蔡孑民、张静江、李石曾、陈果夫、李任潮、李德邻及我，不过十来个人，另外还有军事的首长、如白健生等数人。会议的形式很简单，也没有什么辩论，就很快的决定了。

广西首先实行清党 正在开会的那时间里，李任潮和我，接到邓演达由汉口发来的一封电报，大意是责备任潮同我，身膺革命后方疆圻重寄，未奉中央命令（指武汉中央）擅自参加非法的会议（指上海清党会议），要我们顾全革命的历史，不要违犯了党的纪律，含有责难和规劝的语气。我觉得他的用意，未尝不诚恳，但大局已经决定，以后的友情，已化为敌意了。我们亦不予答复。清党会议结束以后，我就打电报回广西去，将情形告知黄旭初、伍展空等。因为我离省后，一切的军事问题，都是他们在那里支持。他们接得电报之后，在四月十二日立刻就开始行动，将梁六度等十三人逮捕，并通缉黄家直等数人。所以广西的清党，比其他省份还早三天。在这十几个逮捕的人之中，照我平时的观察，除了少数几人之外，大多是投机分子。就他们的历史，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政治欲望，他们的生活行动来看，都不象是实行工农专政的人物，而是要借此造成他们的社会地位，进而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以遂其私图。因为他们过去同军政方面对峙得太尖锐化了，自然是首先被注意的目标，所以在军部方面，不等到我回来，就将他们处决了。也许怕我回来之后，其中有好几个人，我会把他们释放了的。在一个时代方向大转变的时候，往往有许多无辜的人被牺牲的。这是他们的不幸，也可以说是他们的幸运，因为替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名字了。同时上海方面、南京方面，都开始行动，一时那些叫嚣市上的乌合组织，好似蝇群一样，一赶就散，并不要费很大的力气。

赴芜湖军次处理第七军政治工作 大约是四月十六、七号，蒋先生邀我们同车到南京。这时，南京克复未久，劫后离乱痕迹，随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由下关一直乘汽车到前清总督衙门(即以后的国民政府)，沿途狭隘的街道，还与我十二年以前见到的一样。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就设在那里，连普通的陈设都没有。我和朱一民参谋长住在一个空阔的大楼上，除了两张床铺及两张办公桌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实在寂寞得很。这时，第七军驻在芜湖附近，蒋先生与李德邻都希望我到部队去说说话。因为我是七军的党代表，一切政治工作人员，直接间接，均与我发生关系。而那时候军队的政治工作，的确是部队的潜力发动机，在一个重大变革之际，官兵心理，总不免有所动摇或迷惑的地方。所以要我去对他们说话，正是希望使军心安定的意思。我乘专轮到了芜湖，同夏煦苍、胡宗铎、钟祖培、李明瑞等团营长以上的人，都见面了。我除了对他们慰劳之外，并将清党的意思向他们说明，他们对我说："在未听到党代表报告以前，一切情形都不很明白。军长（即李德邻）又不在军中，突然接到清党的命令，大家都很怀疑，现在才明白了。我们对两公都是一样服从的。现在两公的意见一样，我们就放心了。"他们又说："自从这个问题发生之后，部队的军风纪都涣散了许多，真是可惜！"我随后将政治部应留应去的人员决定了，应留的叫他们安心工作，应去的亦不为难他们，使自由离开。在人情上，这些能努力共患难的人，一旦将他们无情的抛弃，不免感到难受，这样的处置，总算是一个公私两全的办法。我在芜湖工作完毕，仍旧回到南京，将一切情形，向蒋先生及李德邻报告，他们都觉得很放心。

风雨中驱车游西湖 我在南京，既没有什么名义，又没有什么工作，颇感苦闷。便要求回到上海走走，但说明仍回南京来的。到了上海，住在东亚酒店。我于十二年前经过上海的时候，大马路的三大公司，正在打地桩，开始建筑，不料现在已经是楼接云霄，游人群集，成为上海或中国那时最大的建筑物了。其他

的地方，也正在积极的进展中，与以前已多不同。在那时候，广西屡次来电促我回去，我就发电报告蒋先生，不再回南京去。蒋先生命王世和同志带了一封亲笔的信给我，信内大意说："革命正在危险的关头，万一不幸，则国族沦亡，吾等胥负其责。"无非要我急回南京的意思，我当时也的确困难，我负有广西一省党政军的全部责任，在这个大变动之下，不知广西变成如何的状态，心中颇为忧念。于是我将必须回去的理由，呈复蒋先生。趁着未起程前，抽空赴杭一游。在沪杭路南站上车，买的是头等票。车厢上沙发椅，不知是那方面的军队，将那皮面扯去了，只剩下一个铁架子。窗子上的玻璃，也打碎了。在风风雨雨中，到了杭州。车中遇见杭州市的公安局长章烈，是我的同学，我清楚的认识他，他好象也有些认识我，但是我因为行动的秘密，时间的短促，不与他打招呼，恐怕引起无谓的应酬。到杭后正值大雨，雇了一辆汽车，沿西湖各处，作了一个极迅速的巡视，并到街上买了些绸缎，在铺子里吃了一顿饭，就乘下午的火车回上海去了。雨中坐汽车游西湖，它是怎样一副面目，实在弄不清楚，也算是我平生一个有趣的故事！

广西二全大会的三项重要决议 我匆匆赶回南宁，大约已是四月下旬，所有事务，他们都处理得很妥当。除了十几个人遭遇不幸之外，其余都不加追究了。自此之后，广西的党务政治，在人事和组织方面，都有些更动。省党部因为第一届执监委员会任期已满，依照本党总章的规定，三月间召集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检讨过去党务工作，并选举第二届执监委员。因为两党时有斗争问题发生，所以人事必须调整，亦可以说就是清党的先声。

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选举的结果，我和黄旭初、伍展空、盘珠祁、黄华表、叶光璽、俞作柏、李岱年、黄同仇、曾象贤、冯冠伦等十一人，当选为执行委员，苏民、刘嘉彤、叶怀青等三人为候补执行委员，黄蓟、朱朝森、陈锡珖、蒙民伟、黄崐山等五人为监察委员。执行委员会除第一届分设各部之外，并加设训练

部，专负训练党员之责任。当时互推我为训练部长、黄华表为宣传部长、盘珠祁为青年部长、俞作柏为农民部长(俞不久辞职，以伍展空继任）、黄旭初为工人部长、冯冠伦为商民部长、刘嘉彤为妇女部长、苏民为组织部长。在这一次代表大会里，有三个重要的决议案：第一，是将全省的田赋附加一倍，作为教育经费，这是全省人民非常拥护的。因为广西教育，素称落后，若不宽筹经费，将无从发展，而且当时广西的赋额很轻，附加一倍，并不为重，这是广西教育的奠基石。第二，是彻底的整理党务，将所有跨党分子，并那些投机分子土豪劣绅一并清除出去，整理的结果，全省的党员，减少了一半，大约不到两万人。此后党的纠纷，以及党政的纠纷，就大大的减少了。第三，是彻底实行本党的二五减租政策，此事当时无论在党政方面，或社会方面，都有些人会替地主说话的。以为清党之后，是不必再为农民做这个工夫。我对于这种意见，很不以为然。因为清党运动，仅是对共党的制裁问题，我们二五减租的政策，并不因而改变，更唯有使农民能获得真正的利益，然后可以安定社会人心，免致中共借口。所以我对于这个意见，非常坚持，绝对不肯放松。我并曾另定一种办法，另由一个委员会去处理，并为顾虑梧州、浔州、玉林各属，地主多，租额过重，纠纷必更多，特派李岱年同志主持其事，务必彻底解决。地方上见我如此坚决，也就很顺利的进行。所以我很顾虑会发生问题的那个地方，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这是我衷心引为快慰的一件事。不久，省党部的执监委员奉中央派赴各区任指导的工作，政府方面亦因党的问题而局部改组。俞作柏辞农工厅长职，出洋考察，由苏民代理，旋将农工厅撤销，关于农工行政，归并于民、建两厅办理。雷沛鸿辞教育厅长职，出洋考察，由黄华表代理。

东兰的韦拔群，自清党之后，又大为活动，政府虽屡经派兵镇压，仍未能杜绝根株。到了十八年以后，广西政局变动，遂与李明瑞、俞作豫等连为一气，在左右江一带，组织苏维埃政府，

完全揭露其真面目，然而此反而大失各地民众的同情。后被省军压迫，不能立足，而挺走江西，与中共合流。这股广西的“土共”卒为江西的中央所解决，这是后话。

赴南京参加中央特别会议 大约是那年的五月底，我又到南京去参加中央的一个特别会议，及徐州军事会议。因为自四月十二日清党之后，南京方面，仅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与武汉形成军事的对峙形势，中央党部及中央政府的重大问题，尚未解决。在政治方面，武汉仍旧拥有多数的中央委员与中央的名号。在军队方面，宁方有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十军及两广后方之四、五、七等军的实力，汉方则有第四军、第八军、第九军、第十一军的实力。冯焕章（玉祥）的西北军自参加革命之后，虽然出兵到了洛阳、郑州，但是对于清党问题及宁、汉两方，尚未有显明的表示，情形还是很混沌。经过了一段的时间，有好多在武汉的中央委员，也就回到南京来。究竟到了多少，是否过了半数，我就记不清了。于是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并奠都南京，与武汉方面形成政治上的对立。但军事上仍未至破裂冲突。这时孙传芳在山东，张作霖在郑州以北，兵力尚很雄厚，大敌既当前面，内部又是纠纷重重，情势颇为险恶。于是遂有人提议，宁、汉双方，同时出兵北伐，南京沿津浦路出兵，武汉沿平汉路出兵，先解决了当面的敌人，然后再解决内部的纠纷。因此乃有徐州的军事会议。蒋先生及许多与军事有关的人都到了徐州，希望冯焕章亲来参加，而冯氏并未亲到，结果并不十分圆满。尤其武汉方面的谣言很多，说宁方已与孙传芳勾结，借口派兵向长江下流压迫。孙传芳部亦着着向南进迫，遂无结果而散。以后遂有南京龙潭之大战，与西征之战事。这都是徐州会议所演变后的结果。

我回到广州，害了很厉害的肺膜炎症，留在广州养病。那时广州的兵力不敷分配，李任潮要调兵到广东。不久武汉清党，四军分裂，叶贺回粤，我又奉命率兵迎击叶贺，而连续不断的作

战，直至民国二十年，我方跳出了这个漩涡。这都是国共分裂的前因后果，回忆起来真是国家历史上一个大惨剧呵！

回忆办理党务经过的感想 我自入党而当选中央委员，而办理党务，到现在已经廿二年了！我在宣统二、三年至民国十二年这一个阶段里，虽有革命的意志与行动，但都是本着个人的良知良能，并未参加党的组织，与接受党的训练，直到十二年，才加盟入党。不久，就被选中央委员，可以说不是先有个党的意识，参加党的组织，而后才有革命的行动。而是我个人先有革命的行动表现，然后才加入了党的组织。关于这，不但我个人如此，就是现在党里很多高级干部同志，也大都如此。但因此，就很容易使个人的意志行动，影响党的意志行动。这种情形，虽然在一时事实上不可避免，而在事后必须设法予以补救。照我办党的经验来说，本党所吸收的党员，仅仅是注重他入党前对党的倾向和认识如何，而不注重入党后之改造与训练，所以一个党员在未入党之前与既入党之后，他的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分别，这便是缺乏训练的缘故。尤其没有统一的进步的指导和训练。在清党运动之后，虽然各省党部有训练部的组织，但不久又撤销了。在广西曾经开设过党务学校，训练党的干部，但并没有训练过党员。姑不论党校的内容怎，样而就表面上观察，确已收到了若干效果，现在广西好些党的干部，都是那时候训练出来的，这可证明训练的效果，也可反证没有训练的缺点。

党是一个政治团体，要求她能不断的进步，党的成员，必须不断的发生新陈代谢的作用，甚至要不断鼓舞其斗争的精神。古人所谓广收、慎选、勤教、严绳四个用人的原则，党的人事方面，是同样适用的。党员的广收，我们是做到了，慎选却未能做到。我记得汪精卫在梧州宣传工作人员养成所讲演，曾举洪兆麟的笑话。他说："总理要陈炯明部下军官入党，有一日，洪兆麟向总理报告，说是全师都入党了。当将党员名册呈上，就是他全师官兵的名册。到后来，背叛总理袭击总统府的，也就是洪兆麟这一

师的官兵。”可见广收而不慎选，已不是良好的办法，若不能勤教、严绳，就是慎选得来的，也要发生问题。过去本党对于党员未能做倒慎选、勤教、严绳的工夫，不能不算是组训工作上一个极大的缺点。

十六年的清党运动，固然是本党的不幸！亦是国家的大不幸，如果一面清除共党，同时复将本党里的腐化落伍份子逐步淘汰了去，则党的进步，必非浅鲜。可惜结果并不如此。因为清除共党的缘故，反将许多腐化落伍份子吸收进来。这样的做法，虽然亦曾得到一时之利，同样的也受了不少的害。因为这样兼容并包的结果，政治上、经济上便不能显明坚定的政策来策励党员，推进革命，而含含糊糊的过了十八个年头。党在这种状态之下，表面上虽然很平静，未曾发生什么纠纷，然而暗潮仍是到处潜伏着，为顾虑党的纠纷发生，凡事都是迁就敷衍，不敢积极进行，连党的本身应行的干部选举，或是工作批评，都停顿了好久。现在可说是只有党部而无党员，只有上级党部的意志而无党员的意志，我总觉民主选举制，不但可以促起下级的进步，亦可以促起上级的进步。可惜这十几年内都未彻底实施，进步二字，又从那里谈起呢？

十五、十六、十七这几年间，省党部对于各级政府之执行党的政策，都是处于监督的地位的。政府对于党部的地位，也相当的尊重。在这种新的关系之下，彼此各尽其应尽的责任，政治便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自此以后，党政关系，逐渐改变，这不是说政府漠视党部，亦不是说党部不与政府合作，而是成为彼此相对的回旋，[illegible]是平行的激进，在这种状态之下，不但政治无进步，党务的前途，更不可乐观。我们必须在党的实质上及推动的方法上，急[illegible]改进，然后方可挽救当前所伏的危机。

总理的三民主义，及其他遗教，不能视同耶稣的圣经，而是进步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些遗教，产生到现在，虽仅仅廿多年的时间，但在变动剧烈的现代，这许多指示与现实情形，已经有了很

多出入的地方，本党党员，应该本着总理指示的原则，悉心研究，在实施的方法上，尤应随时加以补正，使其随时代的演进而产生新的政策与办法。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党员对主义的认识，与时代的认识，一方面并可刷新社会之观听，获得大众的拥护，而能迅求实现。可惜二十多年来，我们都是拿它作引证的典据，不是拿它作更进步的基础。

以上所述，是我写完我办理党务工作的回忆以后的第一个感想，并不是我对于任何方面的批评和不满。

自从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将共产党容纳在国民党的里面，而国民革命同时有了很大的进展，许多人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展的迅速，是容共的效果。"我认为并不如此简单，而是有其他的因素存在里面。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时代演变，迫使军阀自趋于崩溃。我们检讨民元以后，至十三年以前，北洋以及各省军阀的崩溃，都并不是受某一个政党直接攻击的影响。广西陆谭的崩溃，时在十三年国民党改组之前，陆谭的消灭，也不是全靠党的力量。打击陆谭的主力，是在那个时代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新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是应乎时代潮流而起，随时可以接受某一个政党或某一个政治集团的正确领导，完成其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并不是一件很希奇的事。所以我对国共的分裂，以国家的立场看，好象是一件值得惋惜的事情，但在时代潮流上看，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因为本来是两个政党，两个主义。除非某一个党将它的组织取销，将它的主义取销，或可作比较永久的合作。否则，总是很快就要破裂的。在容共时代，共产党中人，对于革命的工作，不能说是不努力，然而国民党的同志，又何尝不努力？不过各有各的主张，各为各的目标而努力，中间有一时，虽然努力的目标，是完全趋于一致，但过了那个阶段，便又各干各的。好象一艘沿途搭客的船，同船的乘客，在某一段行程上，路线相同，但是过此之后，就分道扬镳，能够共同到达终点的人，却没有几个。不但两个政党如此，就是同属一党之内，又何尝没有这种情

形呢？晚近各民主国家的各党合作，仅是政治上一时的各党协议的分工，而不是各党彻底的溶合，各党政治上的协议，是临时的，而各党组织的存在，却是永久的。

国共的合作，并不是两党有政治上的协议，而是两党组织上的混合，其间谁想占便宜，谁不想占便宜，谁含有恶意，谁不含有恶意，我都不去追论他，广西早在十五年的一月，就有韦拔群的占领县城，反对政府，以后更不断的扩大起来。当时虽有党、政、军三方派员调解，而终无结果。平心而论，韦拔群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也许不能不有此种作风，但与我们的政治体系互相抵触，无论如何，不能容许他这样的胡干。我对于好些中共的同志，在未破裂前，都是很好的朋友，到了两党真正冲突的时候，彼此的友谊，就无法维持了！黄日葵同志（第七军政治部主任）临死的时候，对人说："假使不是党的关系，必不致和我分离，而真诚的愿意为我始终努力的。"在我又何尝不是这样的感想呢！可见在感情上讲政治，往往会陷于不幸的悲痛。流血的悲惨，与感情上的痛苦，都是同样的不幸啊！现在正值国家危难的时候，团结是必要的，合作是必要的。以前的痛苦与不幸，已经饱尝过了。我想要团结合作，定要抱定不破坏统一的目标，在避免流血不重感情上去讲求，才有希望。这就是民主精神的真谛，亦是全国人士所朝夕祈求者也。这是我写完以前办理党务经过后的第二个感想。

十　新粤桂战事

标题的诠释　这里所谓“新粤桂战事”自然是因为以前曾经有过旧的粤桂战事，所以特别标出一个“新”字，以示区别。盖自民国五年以后，一直到民国十二年，这七八年间，不是广西的军队去打广东，便是广东的军队来打广西。在这种循环的内乱当中，我们如果站在老百姓的地位，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是分不出甚么正统与叛逆，是非与曲直，而只是历史事实的蜕变，社会现象的反映而已。关于以往的事实，因为我没有主动的参加，只能在前面作概略的叙述，为使写作界限明显起见，名之曰“旧粤桂战事”自民国十六年至十九年，两广的战事，仍旧继续的循环的发生，虽然作战的地点不限两广，而扩及于湖南、江西，但考其战事发生的原因，总由于两广问题而引起。作战的双方，亦是两广的部队。因此我仍本着前面所说的立场与观点，名之曰“新粤桂战事”。这是我在追述这一段事实的经过以前，要首先声明的。

两广自民国十五年革命之后，似乎不应该再有战事发生，而事实上战争又延长四五年之久。这不但是局外人不易了解的谜，就是我们局内人，亦只是莫名其妙的打来打去，现在追想当时所谓原因与理由，不过是一种正面的直觉的感触，此外还有很重要与很微妙的因素存在里面。此种因素的发酵，正好成功那些正面的直觉的剧本演出的原因与理由。

歼灭叶贺之役的经过　民国十六年，革命军底定南京，因国

共分裂，发生了清党运动，但是共产党在广东方面的潜势力，还是很大。尤其是在东江方面的海丰、陆丰等地，在他们操纵之下，各处的农民组织，已普遍发展，继而发生了武装的暴动，这时广东方面的国民革命军，大多数已出发北伐，后方非常空虚，本党广州政治分会的主席李任潮，并负坐镇革命后方根据地的责任，我也是政治分会委员之一，因患肺膜炎，在广州养病，李任潮因为广东情形复杂，兵力不敷分布，在是年四、五月间，要我派兵一师到广东增防，当时广西内部，很是安定，除了李德邻率领第七军北伐之外；后方还留有伍展空、黄旭初、吕焕炎等三个师，及几个独立团，担负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自绰有余力，我在公谊上，私情上，都不能不接受李任潮的意见，于是派黄旭初一师到广东，驻在北江附近，这时武汉方面，汪精卫与共产党已经闹翻，第四军各师亦在九江、南昌附近分裂。张向华（发奎）、黄琪翔一派的部队，沿赣江由赣回粤，陈真如(铭枢)、蒋光鼐、蔡廷楷一派的部队，由赣东转入福建，叶挺、贺龙、周士棣一派的部队，与第三军之朱德部合流，公开共产旗帜，由抚河入雩都、瑞金、会昌、鄀经、寻邬、蕉岭、平远，下潮梅，进驻东江，与海丰、陆丰之农民军会合，进图广州。当时广州方面、对张向华之回粤、自然表示欢迎，而对叶贺等，则派队阻击。由钱慕尹（大钧）率领两师，进驻会昌，黄旭初一师继续向雩都前进。钱部在会昌挫败，退至信丰。黄师在雩都初战亦不利，转守会昌以南之筠门岭，与之再战。叶贺见我有备，乃由筠门岭转入福建之长汀、武平、上杭，有由大浦县折入潮梅之势。李任潮见前方失利，要我加兵向赣南增援，并要我担任第八路前敌总指挥名义，亲往指挥。那时我当大病之后，尚未完全恢复健康。但局势严重，亦只好勉强出发，亲率吕焕炎一师，续向赣南挺进。行至南雄，知叶、贺部队已转入闽境，于是我命黄旭初师退至寻邬附近集中，钱慕尹部经三南至梅县附近集中，我亲率吕焕炎师，经信丰，进驻寻邬，以防叶贺由蕉岭、平远折入梅县。同时广州方

面，亦令陈伯南、薛伯陵两师进驻兴宁、五华。我到寻邬后，继续进驻平远、蕉岭。因情况不明，乃派营长黄鹤龄率兵一营，昼夜兼程前往大浦，实行威力搜索。据报："叶贺全部皆由大浦三河坝，沿水路直下潮州、汕头。三河坝仅有朱德、周士棣等部留驻，该营并掳获彼政工人员男女数十人，讯问之下，情况至为明了。"我得此情报，即全部进驻梅县，计划除以钱慕尹部由梅县进至松口镇，牵制朱周在三河坝部队，并掩护我之侧背外，我率黄、吕两师，越过潮州与梅县间之高山鳄鱼嶂，直趋丰顺县，然后东进占领潮州与三河坝中间的留隍圩（距潮州六十里），将潮州、三河坝间水路交通线韩江截为两段，使叶贺前后不能呼应，同时并要任潮令陈、薛两师进驻汤坑、揭阳与我军会同，向汕头、潮州攻击。广州方面对于我这计划，认为太冒险；盖虑万一叶贺再有部队由三河坝向梅县进攻，则我腹背受敌，势难应付。并引以前战例，凡进入潮汕，不守梅县者，无不失败为言。殊不知我在前方，情况非常明了，叶、贺几乎全部由水路下潮汕，陆上必不注意，我乃围而袭之，必有致胜把握。几经争论，始照我的计划实行，果获全胜。此役成功，当以黄营情报准确为重要关键，由此可见情报与作战关系之密切！

我于计划商定后，即由梅县出发，这完全是一条山僻樵径，平时很少有人行走。由上罗衣至下罗衣中间四、五十里，都是崎岖险峻的山岭。加以风雨载途，人马拥挤，坠崖伤毙者，时有发现。由梅县到丰顺县城地图上的距离，虽为九十余里，直到次日黄昏，始得达到。当晚在岭上露宿了一夜，实为我生平作战行军最艰苦的一次。到丰顺后，次日，即东向进攻留隍圩。预料叶、贺对此要点，必留兵据守，不意到达时，阒无一人。我仍将水路阻绝，以断其交通。并悉叶、贺仅留全部兵力三分之一及政治人员辎重等在潮州作为后方补给根据，以防我军袭击。其主力则趋揭阳，希图先将陈伯南、薛伯陵两师击败，与海陆丰农军联为一气，然后回师再与我军作战，冀收各个击破之效。殊不料我方动作迅

速，反将彼各个击破也！

我军到达留隍圩，次日拂晓，即沿韩江右岸急进，于十二时左右，即到达潮州附近。敌军在潮城北方高地，筑壕固守。我以吕焕炎全部及黄旭初师之一部，向正面攻击。另由许副师长宗武率黄师一部，绕至潮州城西南火车站，以防其由汕头方面增援，于是展开激烈之争夺战。在这时候，适接陈伯南通报，谓已于前一日在汤坑、揭阳之间，与叶、贺主力接触，战况非常激烈，希望我派兵协助。我军亦因战斗正殷，势难分兵，唯有激励将士，猛烈进攻，早日攻下潮州，然后分兵向揭阳方面增援。几经冲杀，至黄昏时候，已将潮城完全占领。守城敌军除伤亡外，皆被缴械，并俘获其大批政治人员，及全部之械弹辎重。次日，即向揭阳方面前进，以夹击其主力。叶、贺等知前后受敌，军心动摇，亦已为陈伯南、薛伯陵所击败。并知潮州已失，不能退回，乃转向揭阳以南，沿海而西，向海陆丰溃窜，复为陈、薛等部追及包围，全部缴械。其在三河坝附近朱、周所部二千余人见大势已去，乃隐窜入湘，投依范石生。盖范朱皆为滇人也，此时所剩仅千余人耳。叶、贺自南昌出发南下，沿途胁迫民众相从，号称五万之众，而实际上不过两万余人。至是几全部消灭，这是歼灭叶、贺之役经过的概要。

汕头的社会风气 我到了汕头，有一种情形，使我至为惊异！当我们初到的时候，地方士绅都殷勤前来探问，要筹多少军饷？我说："我的部队，政府都有一定的饷项，无须在地方筹饷"。他们听了我的答复，好象爽然若有所失的样子，我当时莫明其妙，何以不就地筹饷，反使地方绅士不高兴呢？后来才知道其中内幕。原来汕头是广东富庶出名的地方，过去初来汕头的部队，多不携饷项，而是就地筹给。于是就地筹饷，就成为一种通例。此例一开，就有一般热心为军队筹饷的士绅，应运而起。他们并不是真心乐于帮助军队，而仍为他们自己的荷包打算。譬如军队要筹饷十万，他们就向商民摊派二十万，除了交给军队十万

之外，其余都是他们的好处。如果你责问他“何以要摊派二十万？”他就回复道：“筹饷是没有一定把握的，需要十万，必须加派十万，才可足数”。这种说法，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但是以此为业的人，就故意夸张其词，借此机会，混水摸鱼，收取他们的盈利，这种陋弊，不但那时候的就地筹饷如此，就是现在各县摊筹各种经费，何尝不是如此？公家所得者五，人民所出者十，中间人的好处，实在太多。难怪他们会推波助澜，欢迎机关部队，在地方摊派经费或实物了！

据说汕头是全国白兰地酒销数最多的地方，这话也许是就人口比例销售白兰地数量而言。因为在那里一切应酬宴会，白兰地是一种必需品，由此可见汕头的富庶与奢侈。所以从前的军队，都以得到这个防地为无上的幸运。但同时在这个地方驻防久了的部队，又没有一个不被消灭，也几乎成为一个定例。我到了这里，见地方环境如此恶劣，如果久住下去，不但军队本身要日渐腐化，而受天然的淘汰。就是对于友军之间，也要发生磨擦。况且事实上已经发生了一些磨擦的现象，于是我决心将部队调回。

回师广西　第四军自叶贺公开分裂之后，下层潜伏的共党分子，还是很多。他们不得志于军事，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希望内部发生问题，可以获得利于活动的机会。尤其因为我是消灭叶、贺的人，更仇视得厉害，种种问题，暗地里都集中到我身上。所有张、黄方面的人物，表面上虽然和我仍旧融洽，而心里已经发生极大的误会。我见此情形，心里私忖，若是我的军队长居广东，必定要发生不幸的冲突。而且我军入粤，原是奉李任潮命令而来，系属帮忙性质，对广东根本没有什么野心。现在客观的情势上，既无驻兵的必要，而又生出许多是非。为公为私，都不合算。于是决心将部队调回广西，首先令黄旭初师由西江调梧州，吕焕炎师亦陆续集中北江，准备调回，我自己于八月间回桂。当时以为如此处置，以前有些误会，纵然不能当面解释，事后亦必可得人原谅，孰知退让的结果，仍不能避免战事，诚出我意料之

外。

汪精卫的阴谋 我回广西后，大约是八九月间，汪精卫、陈公博等因为不容于宁（南京）汉（汉口），也就逃回广州。彼以北伐前在广州及北伐后在汉口政治会议主席的地位，广州的政治分会，自然要表示欢迎。第四军素来拥汪，支持更为积极。但是广州政治分会的权限，只限于两广区域，以汪精卫的野心，自然志不在此，而是要另开党国的全局场面，像民国十五年以前那样的开府广州，以与南京的中央政府相抗衡。但因李任潮与第四军有长远的历史关系，未便使用激烈的办法。故一面制造空气，说广州是太腐败了，太不革命了，要求革命的真正成功，必须改造广州的政治环境。一面与李任潮商量，要他自动的改革，也就是要他拥护自己在广州开府的意思。此种内幕的酝酿，我回广西后，一些也不知道。民国三十三年三月间，南岳会议后，我同李任潮、张向华、吴梧生（奇伟）同车回桂林，还谈起这回事。张向华说：“向任公说尽了话，继以流泪”。李任潮说：“我始终不知道你们对我所说的话，用意在什么地方？”我想李任潮不是不知道他们的用意，而是不赞成汪精卫再开府广州，以免破坏北伐的成功，破坏党国的统一。我又问吴梧生说：“假使我被你们拿到了，会怎样处置呢？”他说：“恐怕对不起！”我说：“为什么恨我到这样地步？”他说：“在我们看两广的问题，你是一个幕后人，所以要先对付你。”我说：“岂不冤哉枉也？现在你可明白了呢！”大家大笑起来。

十月上旬，我在广西忽然接到汪精卫的电报，说有种种问题要我到广州去面商。我在那时以前，对汪不仅毫无恶感，而且相当的敬仰。所以接到电报后，也就毫不怀虑他有什么恶意，立刻复电“等轮前来”。并买了很多广西的土产，如果子狸、海狗鱼、沙田柚之类，奉送他们，以表情意。十七日中午到达广州，汪精卫约我下午四点钟到大沙尾葵园的公馆里见面。我很诚意的依时到达，总以为见面后，一定有很多重大问题商谈。可是到了

他的公馆，见汪派许多人物都在座，只作见面的招呼，态度非常沉默，似含有极严重的心事。尤其是陈公博、何香凝的面部，表现出愤怒而张皇的样子。我觉得情势不好，又发现李任潮亦不在座，就开口问道："李任潮不到会吗？"汪回答说："任潮急于要赴上海，已乘飞鹰兵舰起程，我等方才送行回来。季宽先生初到，路上辛苦了，一切事情，待明日商量吧。"我只好兴辞退出。一路上暗自猜想："李任潮一定被他们用手段赶走了，又把我召来广州，看他们那种情形，说不定会玩出什么花样对付我呢？"当时我这样的想着，事变之后，才知道在葵园时，就有人主张把我扣留，也许汪精卫碍于情面，不便在他的公馆内动手，横直我到了广州，已成笼中之鸟，釜内之鱼，还能逃得出去吗？所以安心放我出门，事后回思，当时我如果被他们立刻扣留，那末除了束手待毙，还有什么办法？兴念及此，不觉毛骨悚然！

深夜的事变与脱险经过 我回吉祥路家中，就立刻想设法离开广州，但是省港轮已经开行，陆路更走不通，只好等待明早再说。那时内子蔡凤珍产后数月，仍在广州居住。我俩晚饭后在阳台上闲谈，忽见马路上不断有汽车环绕我的公馆游行，速度很慢，车中的人时常向我公馆顾盼。我对内子说："气候已很凉爽，为什么还有人游车啊？"(即乘汽车兜风)，说时，我心中已有些疑惑，恐怕是他们派来暗中监视我的。我俩谈至十一点钟，已经就睡，忽然冯竹万进来要求接见。侍从人告诉他，我已经入睡了，可否明早再见？他说："无论如何，要立刻叫醒一见！"我在楼上听他的口气，知道有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披衣下楼，两人在扶梯上相值，他不及上楼，就说："得到确实的消息，他们今天晚上将有举动，目标完全在你身上，不管确实与否，今晚一定要避开为妥。我深夜冒险到来，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两句话！"说完，便匆匆下楼回去。我平日对冯竹万颇为敬重，彼处世持重，不苟言笑，说的话自然使我相信。加以今天日间所见的情况，判断他报导的消息，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在晚上暗算我。

于是急急改装出门，连我的妻子都没有好好的安顿，使她们受到极大的恐怖与危险，也就想见我当时急迫的情形了！这时正是深夜十一时四十分钟。

个人走出公馆，茫无所之。后来才想起石秘书楚琛住在西关很僻静的地方，于是跑到他家里去，两人相对默坐，听候情况的变化。并时时打电话到我的公馆去探问，亦没有事情发生。到了两点钟，东北方的枪声，好象鞭炮一般的响了起来。我家的电话，再也摇不通了，就知道不幸的事件已经发生。我虽然一时脱了险，可是如何逃出广州，还成问题，而且在石寓也是一个危险地方，他们不难搜查我办事人员居住的地方。因此再行改装，成一个乡下人模样，预备黎明就逃走。正在那个时候，就有人来报告：我公馆的卫士，除死亡外，已全数被缴械，我的妻子尚被看守在楼上，办事处亦被攻击缴械。我得报后，心里盘算，必须向江北逃走。因为我尚有一师人驻防在那里，到了部队，才有办法。于是同石楚琛向西村车站走去。到站一问，据说：“今天火车停开。”也就知道他们对于北江方面已有防备，就是三水一路亦必是同样的情形，于无可奈何之下，便转到南澳（西村附近小镇)石楚琛友人姓胡的家内,耽搁了大半日，想想终不是个办法。必须转回长堤方面，看省港轮船的情形，设法逃到香港，才是生路。走到十八浦见有一班士兵，在那里警戒检查坐汽车通过的人，我一手夹雨伞，一手提一包药材，土头土脑的走过去，他们竟然毫不留意，被我扬长通过。但是离下午四点钟开船的时间，还很长，西堤地方，耳目众多，固然不宜久留，就是在任何地方停止等候，都易启人怀疑。只好在马路上低头缓步，一面察看他们对社会表示是怎样的。行经永汉路，见那些政工人员,正在那里张贴五颜六色的标语。第一条是“欢送李主席北上”第二条就是“打倒黄绍竑”。以下各条，无非是列举我种种罪状，非得驱除不可的意思。反正我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是不会也不可能抗辨的。我于是恍然明白他们所玩的，原来是这一套把戏，觉得好气

也好笑！想我在西南的政治舞台，本来不过是个次要的角色，现在倒弄得我名闻全国，这也算是他们在替我捧场吧！我看了之后，仍回转西堤，在离码头不远的一个水果摊上徘徊着等候船上开船的号令。就在要抽吊桥的时候，三步并作二步的跨上轮船。在船上，碰见熟人甘心卫，他已不认识我了，我以肘触他，大家才点头示意。轮船徐徐开动，离开了岸边，好像一条大鱼，摆脱了腮边的吊钩，脱险游入大海一样。而我呢！也正似一只笼中飞鸟，已破笼凌空，猎者又何从弋获呢？甘君秘密引我到一个房间里，我的妻子及家人面现着忧思，在那里默坐着。瞥见之下，真说不出是悲是喜！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居然演出这种离奇曲折的情事，是做梦呢。还是在做戏？真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了。

内人告诉我：昨晚自我离家后，大家非常不安，但又不敢外出。到了两点钟，枪声大作，向卫兵驻所及我卧室射击。她自己唯有紧抱着小孩，卧于床下，幸楼板系洋灰石子所造，不致穿透，得以保全性命。卫兵缴械后，枪声停止，即由官长上楼搜查，搜遍全屋，找不到我的影子，大失所望。乃向她查问我的行踪，她回答说："晚饭后出去，并未回来。"直至次日下午，她仍被监禁着，于是对那看守的连长讲革命应如何遵守纪律，这种政治斗争，不应涉及妇人稚子的身上。一面将她的金银首饰及箱内万余元的广西纸币，都交与那连长保管，要求准她与小孩自由外出。连长至此，心为之动，遂准她母子离宅。她带着孩子，狼狈的逃到船上，遇见了熟人，及那些家人，最后竟又和我团聚了。我听了她脱险的经过，对她那种镇定的态度，动人的言词，与微妙的方法，终能打动对方，脱离虎口，使我衷心起了很深的敬佩！

在港发表谈话，暴露事变真相　我逃到了香港，起初住在港商陈佐衡的家内，后来又搬到邓彦华家中（前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继又自赁房屋。在半月之间，迁移了四处地方。无非使行踪秘密，免再被他们暗算的意思。到港后三日内，广州政治分会

的委员，如戴季陶、邵元冲等，以及李任潮各亲信干部，都避到香港来。并有飞鹰舰长舒宗鎏乘舰武装冲出虎门等要塞。我于是将这次事变的前因后果，作了一篇很长的谈话，在香港各报发表。社会人士才知道事实的真相，各方面对汪精卫的反感，便日甚一日了。首先是吴稚晖先生撰文斥责汪精卫等受共产党的利用，并指他们是灰色的共产党，认为这次事变，完全是为叶、贺泄愤，以后必有更重要的演变，劝国人注意。

我在香港，见各方反应良好，急想回广西去。但西江已被封锁，检查非常严密，不易通过，乃绕道安南，由龙州回南宁，随下梧州，部署军事。这时驻在北江的我军，皆已退回梧州，彼此就在西江形成对峙之势。可是双方都没有什么名目，可以开始打仗，只是在那里磨拳擦掌，等候导火线的燃烧。

广州大暴动与汪派的离去　十一月中旬①，广州的大暴动发生了。系由共党领导第四军的教导团与广州市工人，乘着汪派部队向各方布防，广州市内空虚，发动了一个空前的大暴动。虽然由他们回师将暴动平定了，但广州已遭了空前的浩劫。社会上无论知道内容与否，把一切责任与罪过，都归到他们身上。于是在福建的陈真如军(十一军)，和南路的后方四军各师，及江西方面的我军，都有了打仗的题目，一齐向广州进发。南京中央政府并派李任潮回粤主持这一次的军事，汪精卫等首要见形势不佳，也都离开了广州。随后他们在军事方面，把广州也放弃了，全部向东江出发。据我的判断，他们见广州处于四方包围的地位，作战至为不利，想以全力击破东江方面的陈军，然后再回师击破我军，及南路部队，万一不利，折入江西，另谋出路。因此我军由西江直趋广州，而广州已是一个灾后的空城，这时正是民国十七年的元旦前后。

我军到达广州，不稍停留，即会合南路徐景唐的十三师，急

---

①应是“十二月中旬”，确切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一日”。（见档案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史辞典》第229页。）

向东江追蹑。这时四军已与陈真如军在五华岐岭等地接战，陈军为其所败。我军追至河源县谭下镇附近时，适与彼回军相遇，于是发生非常激烈的战斗。我军及十三师共有四个师的实力，对方亦有四个多师，全面展开大战，历时两昼夜，卒为我方及十三师击败，双方都死亡七，八千人，实为内战以来最激烈的一个场面！事后回想，在国民革命军中素以善战著名的四、七两军，自己火并起来，那种敌忾精神，比较对反革命的军队作战，一定卖力得多，真是一出可悲可痛而又可耻的武戏！四军方面的勇将许师长志锐，就在那次阵亡了，黄师长镇球受伤。我前年到曲江时，曾参观过规模宏大的许志锐的纪念学校，广东的将领，无论在当时为敌为友，都捐款为他建筑纪念馆。我心里想："如果张向华要我捐款的时候，想起了以前和现在的情形，内心是如何的矛盾呢？"我有一次，笑问黄镇球（前四军师长）："你腿上的子弹，是哪个送给你的？"彼此相顾大笑。这是儿戏呢？还是历史之神在那里导演呢？我欲问天！

这次战事结束了，我也由东江回到广州，广州又是一番新的气象了！我的军队除了一部之外，大部都开回广西，我也于四月间回广西，继续我那些饶有兴趣的建设工作。满以为这次是粤桂最后一次的内战了，从此好好的把广西建设起来，悔祸未晚，桑榆可收。谁又料及历史的主宰，还在那里导演第三第四幕的武戏，我们这些演员，又是不由自主的在幕后从事准备的动作，这真是不可逆料的惨剧！

全国编遣会议后的不幸事件 十八年一月间，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编遣会议。问题的核心，固然在长江、黄河一带，但是两广也不能例外的。而受到召集的李任潮，对应否出席会议，颇费考虑。他回到自己的家乡大坡山乡下，踌躇未决，要我前去商量。冯竹万、邓益能、李民钦、张文，都在他家里，参加商讨。有主张出席的，也有主张不出席的。我到后，竭力主张应去出席。我认为必须裁减兵员，国家才可谈建设，革命才可告成功。同时因为

我自己正在广西进行地方建设工作，也不愿发生意外的阻碍。李任潮采纳了我的意见，遂动身赴南京。这个难题解决之后，我也很愉快的回到南宁，安心致力我的工作。不料到了三月间，武汉、北平问题发生，第四集团军解体，李任潮在南京不能自由。问题的核心，一转就到了两广。广州方面电邀前去商量应付的办法，并派专轮到梧州迎候。我连夜赶到梧州，乘南强小轮，前赴三水。到三水时，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火车站守候，形色张皇，不似前来欢迎的样子。他一见到我，即拉我到一个僻静的处所，秘密对我说："广州局势已变，陈真如、陈伯南已就广东省政府主席及广东编遣主任的新职，白健生昨晨曾秘密到达广州，旋即遄反香港，请你赶紧搭商轮回梧州，切不要到广州去，自投罗网！"我见情形如此，自不能再前进，时值港梧大明轮进口，就搭船回梧。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船上，忽然发现白健生，他很秘密的躲藏在一个房间里，相见之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原来他是前数天从天津搭一艘日本的货轮，秘密的偷过上海。当船到上海时，南京方面派人上船严密搜查，他伏在船主房内的衣柜里，未被发觉。前天到达香港，当晚即乘船入广州，昨天早上到广州，而广州局面已变，由公安局长邓益能调渟，方得自由转回香港，即由香港乘这船回梧，适巧和我相值。在船上，除了谈一些武汉、北平的经过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决定。回到梧州，一两日内，李德邻亦秘密到来，数年以来的患难朋友，聚首一堂，虽然是在失意的局面之下，而大家都非常欢洽。此时广东的局面虽变，彼此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往返的电报，都以和平建设为言。我们在梧州逗留不久，即回到我家乡容县，召集重要的干部会议，广东方面并派香翰屏代表到来商量，表面上仍是息战宁人一套老调。他们除了答应我驻粤部队自由撤回之外，其他政治问题，实无从谈起，一切只有静候时机的演变。我对于内战，确已早生厌倦的心理，但是在一个团体里面，个人的意志，是很不容易表示出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因事到了离城

数十里的乡下，住了两日，就有很多电话，催我回去。但是回来之后，并未有若何重要问题等待解决。后来才知道我到乡下去，引起了德邻、健生的误会，以为我有意隐避。的确，在当时那种形势之下，本来有容易引起误会的可能。其实我虽有厌战的心理，却不愿违背团体的意志，因为不顾团体的个人行动，是会使团体陷于不幸的分裂的。在那时候，谭组庵、何敬之有一个电报给我，要我顾全大局，劝解息争。可惜措词不甚妥切，字里行间，并感觉有令人难堪和不够诚恳之处，我自然不能单独用我的意见去答复他们，而是要参酌大家的意见。商量的结果，认为首先要求恢复李任潮的自由，与德邻、健生的名义。复电的语气，亦不示弱。南京方面正在"六合统一千军解甲"的乐观时期，我们提出这种要求，与倔强的口气，当然不会得到结果。从此与南京往来断绝，成了一个僵局，无法再行转圜，而外间的谣言很多，不是说广东的军队集中肇庆，就是说湖南的军队集中永州，对广西将实行武力解决等话，空气日趋紧张。广西的民性，是不输最后一口气的，你迫得他愈厉害，他就不顾一切和你蛮干到底。洪杨末期，很多全军被杀，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到这时候，战争的主动，遂移到我们这一方面了。

战事失败，出走安南　李德邻因为要作政治上的活动而去香港，广西的内部，由我同白健生主持。这时也想不到出师的名义与理由（后来才起了一个护党救国的名义），就先发制人的指挥军队，由西江向广州攻击。在一个愤懑的情绪之下，会把打仗的问题，看得太容易，而不顾一切的向前冲去，希望以战事的胜利，来转变政治的环境。但是我们兵力究竟有限，一共只有十三、四个团，虽然在大塘、芦包，获得初期的胜利。可是到了白泥、银盏坳，就兵疲力竭，不堪再战，而向西江败退下来。此役，黄旭初在阵上受了重伤，几至丧命。后来到香港休养了很久，才始恢复。这时候湖南刘恢先（建绪）的军队，已由全州乘虚攻占桂林，逐步向柳州前进。于是赶忙把由广东败退梧州的残余部队，调到

柳州去抵御，将其击退至全州附近，双方对峙着。这时梧州无兵防守，门户洞开。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率领在武汉解体的第七军各师，及广东方面的部队，乘隙进占梧州。并沿江上达桂平，直攻南宁。我方已无兵可调，势难抵抗。我见情形如此，虽柳桂方面，一时获胜，究于全局无补。同时我更觉得俞、李、杨等所部皆数年来共患难同生死之袍泽，虽然在政治上一时意见相左，一时不致与我作正面的武力冲突，若能适可而止，善意处之，免致与省内力量相火并，则广西元气，尚不致受重大损伤，仍可保持整个的强大力量。而俞、李、杨等偏私躁进，必不能长久维持，待时局之演变而善为运用，仍可入我掌握。我乃决心退出广西，并电白健生回南宁。这时彼尚在柳桂处理各项未了军事，迟迟不能成行，我迭电催促，有云：“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何必多所留恋？”迨彼回南宁，而俞、李、杨等，亦已进迫贵县，我等将省内部队，交由师长梁朝玑、吕焕炎统辖，由其与对方妥协。这时南京方面，已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主任，杨腾辉为副主任。我留民政厅长粟威在南宁办理省政府交代，以示清白。随即与白健生乘轮经龙州，而入安南。此为当年陆谭出走的旧路，我们竟在数年之后步其后尘，诚不禁感慨系之！这是十八年六月间的事。

一个年富力强素喜做事的人，一旦置身国外，虽说一走则百事皆了，实则百感交集，积极的意念与消极的意念，同时在我的脑海里起伏着，消极的想法，是如何安排生计，消磨光阴，终老异域。积极的想法，是如何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以重握政权。这两种意念，除了年老力衰者外，最后总是积极的意念得到胜着。尤其是客居在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耳闻目见的耻辱，亲自经历的痛苦，都是激发革命情绪的酵母。所以暂时蛰居租界或殖民地的失意军人和政客，没有一个不是静极思动，在那里等待机会，策动变化。而这些机会与变化，在多乱的中国，是不断的发生的。这班在野人物，遂也乘时而动，兔起鹘落的在舞台上演出

种种悲欢离合的活剧，这就是中国数十年来循环不已的内乱发生的主要原因。

俞作柏的异动 我们在安南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去。因为香港是两广政治活动的后台，我们要求政治的出路，就不能不到那里去。俞作柏向来左倾，在十六年的时候，就同我们分离。他之所以服从中央，无非是想取得广西的地盘，掌握广西的军队。自从当省政府主席之后，其左右都是那些左倾或共党分子，终日包围着他，要他有所举动。就职不到两三个月，遂自称××××军总司令，公开反对中央，与广东对峙起来。他这一举动，不但我原来在广西的部队，接受我们的意旨，全体表示反对。即李、杨由武汉带回的部队，大多数也和我们站在一条阵线，一致反对。南京方面乃将俞、李免职，并任命吕焕炎为主席，兼编遣主任。俞作柏走香港，李明瑞、俞作豫率领少数部队，逃入右江，和共党韦拔群、黄飞虎等联合，张开赤色的旗帜。这一次的离奇变化，前后不到一个月，是历次政变中最短促的一页。经此次事变之后，广西的实力，无形中又在我们领导之下，互相团结，暗地里等待时机到来，续演以后的一幕。吕焕炎虽也有野心，欲自成局面，但他只能掌握一部，而不能领导全部，因此他虽受了南京的任命，实际上仍旧受我们的指挥。

第四军与我们言归于好 汪精卫自十六年在广州失败以后，对中国政治，始终不能忘情，尤其不能忘情于广东。俞作柏变动的内幕，我虽不能详悉底蕴，但与汪始终有很大的关系。俞既失败，广西的力量，又转回到我们手里。素来拥汪的第四军，又远在长江一带，虽挂着中央的旗帜，仍想同我们联合一致，由唐孟潇（生智）的介绍，进行协商。一日，在唐氏家里，我与汪氏再开始见面，对饮一瓶一百年陈的拿破仑白兰地酒，彼此言归于好。政治的活动，原来只计利害，不择手段的。昔日是雠仇，今日是朋友，在局外人看来，虽觉得难以为情，而在当局者，则视为势所必然，无足为怪。这时第四军张向华等因为移防改编的问

题，又与中央脱离关系，由宜昌经湘西、广西，希望再回广东。于是由政治的合作，进而为军事的合作。大家都主张我先回广西去，统一领导广西的部队，免与第四军冲突。再与四军合力攻取广东，广西内部亦派人来，愿与四军合作，要我回去领导。这时广东方面正增兵至平乐、荔浦，堵击四军，情形十分紧张，我对于回去，虽有决心，但并未商定何日动身。

离港返容　我在香港居住，本甚安适，忽然有警政司派人要我去谈话。我即派代表前往，据云："有人控告黄先生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碍及治安。"我的代表答辩，不得要领而回。越数日，警政司又来一件公文，限我三日内出境。处在帝国主义者势力之下，受到这种不可抵抗的压力，心中非常愤慨！我固然恨香港政府，尤其恨当时广州的当局，为什么要借外人的势力，来压迫我呢？我立刻下了决心，要吐这口怨气。我想："英人既不许我住香港，自然也不许我到他所属的其他殖民地去，上海是不敢去，安南及其他地方，我又不愿去。最合理的，还是回广西去，开辟我的自由天地。"于是我秘密准备了到广州湾的船票，除了同行的妹夫吴柱文外，连我的妻子与兄弟都不知道。在一天的下午，两点钟，法国的"网球四骑士"，在香港表演，我还去参观。广州方面的人物如陈策、黄骚都在场上碰见，彼此都是很熟的旧朋友，在不同的心情之下，彼此只作会心的微笑，不交一语。看完网球表演之后，急急改装，并告知我的妻子，要她在三日之后，才通知李德邻、白健生、汪精卫等。在倾盆大雨中，默然与我的妻子告别，跨上了法国的轮船，启程向广州湾进发。

到了广州湾，我化装一个汽车夫，吴柱文化装一个车行老板，两人随便买了一些汽车零件带着。次日，雇车经廉江、陆川而至玉林，沿途只同那车上司机攀谈，并帮他驾驶一段路的车。这种做法，无非是要他认我们是同行，以免沿途盘查时露出破绽。一路过去，平安无事。一直到达玉林，下车后，到一个小客栈里去找住宿地方，忽然后面一个士兵跟踪追问："你不是黄主席吗？几时

回来的？”我听了，大为惊奇！虽然此人对我，未必即有恶意，此地亦未必有多大危险。但这时候我还不能露出我的真面目，只好低头急行，假装与我无关的样子。可是他还在后面连声说道："真像啊！真像啊！”我进了小客栈，即上床下帐，朦头而睡，假装害病，查夜的军警盘查，一切都由吴柱文应付。次日，乘车回到容县，隐居在我的一个小房子内，绝对不与外人来往，然而熟人太多，形迹终于暴露出来。县长封镇南，首来求见。他是本县人，而又是老世交、旧同事，自属诚意。并且介绍他的族侄驻容县的旅长封克鲁来见，表示绝对听我的命令，我遂拍电到南宁，要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梁重熙、吕竞秋、张任民、蒙志、杨义、黄鹤龄、黄韬等到宾阳见面。第三日，我即乘车到宾阳，他们已先到达，不但我指名邀约的都到齐，就是不指名不邀约的，如梁式恒、周炳南等许多人，亦都来参加。我离省虽不到半年，大家相见之下，都觉非常难过，有的甚至感动得对我流下泪来。我将来意说明，希望自己团结一致，与四军合作，同下广东。他们一致赞成，无稍异议。当时即令各师秘密向平乐、梧州前进，与四军合击在平乐一带的广东军队。我虽然没有什么名义，但是我的命令已经发生效力，这可说是一种内心的效力，乃是心悦诚服的伟大表现。

慈亲之死 我因为尚在准备秘密行动期间，即日仍回容县，并下乡省视我垂老的慈亲。母子久别重逢，至情流露，当时彼此内心上的感触，自非笔墨所能形容。两日之后，我又向她叩别。她低声唤我的乳名，恋恋不舍地问我："你这样快又要出去了吗？”我那时真是没有一些理由可以答复她的问话，亦无一句可以安慰她的言语。临行，她送我出大门，望着我坐上轿子，还舍不得回去，我忍痛的走了。天呀！这便是我母子最后一面了！只此一面，竟成永别，我当时却那里预料得到呢？事后回想，她那龙钟的老态，盈盈的眼泪，无言地望着的情景，宛在眼前，在那时她的内心，是如何的痛苦啊！而且她是为我而死，因为事前我不能

将她安置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十九年粤军占领容县，派兵到我家乡搜查，她老人家几经搬迁躲避，只有我妹子普安在她身边照料。衰老的身体，怎禁得这样的恐怖，遂因惊悸过甚而昏迷，而很凄凉的死去！我兄弟无一人奉侍在侧，亲视含殓，事后闻报，真是遗恨终天，悲痛无极！古人说："忠孝不能两全"，我自问忠在那里？孝在那里？这一个极大的刺激，也是后来厌战的主因！

重组军政机构 我离家之后，匆匆赶到南宁，从事护党救国总司令部的组织。李德邻任总司令，我任副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白健生任前敌总指挥。八年以前的老调，又重新弹起来了！为与汪及四军易于联络起见，任用陈翰誉为参谋长。这本片子的序幕正式揭开。德邻、健生亦陆续由香港赶回，当我秘密回到广西，在宾阳召集会议的时候，粤方即已知道，赶忙将在平乐的部队，连夜撤退，并未受到若何的损失。我迫近梧州，彼亦放弃梧州，于是广西的全境，又重新归我掌握。我到梧州后，即赶赴黎木根（梧州东北六十里小镇）与张向华约会。新事正待合作，旧事自然再不提起。照我的意思，桂局转变，未到一月，诸事都要重新部署，俟四军在广西境内稍为休息整顿，再会师东下。但张向华的意见，则以为应乘其不备，一举东下，即可占领广州。否则对方准备完备，必难获胜。其实广州方面，早就准备很强固的工事。而四军师行四省，直下广州，已犯劳师远袭之戒，且自信过甚，认为对方不堪一击。同时暗示，即使广西军队不能协助，亦可单独获胜，则又蹈了骄兵之忌。广东方面，此时不但集有粤军力量，并且调了好多北方部队到来，所谓"乘其不备"云云，亦正与事实相反。但他决心甚坚，大有"灭此朝食"之概，我虽不赞同他的意见，亦无法将他阻止。同时又不能袖手旁观，听其自败。于是除留吕焕炎率其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余全数东下。四军由广宁、四会、清远，入花县、从化，担任左翼。七军、十五军由西江经肇庆，攻击军田粤汉铁路正面。并分兵一部，攻击三水。

四军在左翼作战，起初甚为顺利，将近广州的时候，粤方发动反攻，来势颇猛，乃向琶江败退。七军、十五军久攻正面不下，四军既退，左侧背即受极大威胁，故各军皆由四会、广宁、怀集，退往信都、贺县一带，本拟扼守梧州，再行作战，但梧州空虚，在我军未到信都前，已为粤方海军、陆军袭取。乃转向平乐、荔浦，集中整理。此次作战，前后不到一月，其进也锐，其退也速，除上述主因外，首为步调不一致。次为第七、第十五两军频经变动，战斗力已减。再次则为对方有空军参加作战，予我军以极大之威胁也。

再度出兵 我们退集平、荔后，同在患难之中，彼此乃谦抑反省，更加团结，力量反比以前加强许多。这时粤方分兵向平乐、荔浦进迫，而吕焕炎则叛变投敌，据南宁、玉林、桂平等处，绝我后方。敌之实力数倍于我，而我又兼有内忧，情势至为恶劣。我们会商决定以七军及十五军之一部，在荔浦附近，拒止当面之敌，由德邻、健生指挥。我同向华率四军及十五军之一部，回师解决吕焕炎，以固后方。由荔浦经修仁、象县下武宣。复分兵出贵县、桂平，衔枚疾走，每日行程皆在百里以上。出其不意袭取贵县、桂平，吕焕炎几为所擒，乃退守玉林。南宁方面吕部团长覃兴、杨俊昌反正，将吕氏亲信驱逐，于是后方敉平。我复以四军分略钦（州）廉（州）转进高（州）化（州），十五军以一部监视玉林，大部沿西江东下，袭取藤县，佯攻梧州，并再分兵转入抚河，断粤军之退路。粤军见情势危急，连夜撤守梧州、平乐方面，仅留北方调来朱一民所部，进攻荔浦，几经激战，卒为我军击败，逐出桂境之外。

北流战役的挫败 粤军退集梧州后，见我军兵力不多，且分散各处，同时我许宗武部久攻玉林，急切难下，敌方乃进占藤县，并以主力沿容苍公路前进，希解玉林之围，收内外夹击之效。我乃急调四军由高州进入容县杨梅附近，以阻其前进。但主力未到，敌已迫近，不得已退到北流附近，再行拒止，以免其与

玉林城内吕部会合。此时前有强敌，后有阻碍，情势已极不利，如任其汇合，则我军各处部队，更难集中应战。遂不得不在北流以北地区，进行决战。四军与十五军各部，不是由前方撤退，即系由桂平，高州、武林等处远道集合，兵力疲惫，络续参加，苦战四昼夜后，卒至败北，两方死伤，皆甚惨重，我乃退至贵县，凭江防守，粤军亦不积极追击。这是十九年一月间的事。

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要埋怨我指挥的失当。我自己检讨一下，也确有很多的错误。当我很顺利的袭取贵县、桂平，占领藤县，进兵抚河，威胁粤军，逼迫其仓皇退回梧州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部队是新败之余，实力不厚。同时指挥四军，分进钦、廉、高、雷，粤军见我兵力那样分散与单薄，并且玉林围而不下，遂大举进攻。我们要将散在数百里地区内的部队，迅速集合起来，又何等的困难？而粤方力量集中，占着优势，虽然李、白在平乐方面获得胜利，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能再进攻梧州，以牵制粤军的前进。我方处在前后受敌的情形之下，被迫而进行决战，自不能侥幸得到胜利的啊！我们遭遇了这一次和上次在广州附近的二度损失，各军的实力大减，四军的各师，每师剩下的实力，都不过一团。他们的师长都改为团长，团长都降为营长。十五军各师的情形亦是如此。可是官长的奋斗精神，仍和以前一样的旺盛，丝毫没有颓丧，这却是值得称道的事情。

自此之后，两方隔着邕江对峙，而从事整理与布置，等待战事的继续发展。这时退入右江的李明瑞见我军失败，即开始向南宁方向进迫，其前头部队，已到达离南宁二百余里的隆安县以南，我不得不转回南宁，部署抵抗。仍率领在南宁反正不久之覃兴、杨俊昌两团，向隆安进击。在隆安附近，经过了两次激战，将其逐退。我进驻平马(即恩隆县)，他们退入东兰附近的大山内。因为他们对当地民众，曾予以相当的组织和训练，所以我们要继续深入进攻，是有相当的困难。记得有一次，我集合平高附近的民众

讲话，在滂沱大雨之下，还是静肃整齐的，听我的话。这并不是因为我历年在广西的地位和威望使然，而是已受了李明瑞部组织训练的结果。我在平马住了一个多月，不能将李部彻底解决。他们则时以游击战术出扰，使我不得安宁。正在那里相持的时候，忽接我母亲逝世的恶耗，我不禁痛哭起来。想起不久以前临别时的景况，以及因我在政治上的关系，而使老人家受惊致死，不孝之罪，百身莫赎，真使我悲痛万分！甚至心灰意懒，不愿再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曾经有电报给德邻、健生、向华等，向他们引咎辞职。他们回电，给我恳切的安慰，四军将领并将北流战败的责任，负在自己身上，认为由于他们作战的不得力，以解慰我内心的不安，这也是值得我感激的事情。

进退湖南的经过 四、五月间，北方的扩大会议事件发生了，阎、冯一致参加，引起了更大的内战。李、白、张等在南宁举行会议，决定出兵湖南，要我放弃右江，率兵回南宁，一同出发。我虽然没有亲自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但是团体的决定，我必得服从。右江放弃之后，李明瑞仍旧恢复原来的态势，一直到了二十年之后，始将其逐出桂境。李明瑞率部千余人，由湘桂粤边界窜入赣南，与共党合流。但不久因共党内部李立三路线与毛泽东路线的斗争而被杀，所部亦完全消灭，这是以后的话。

我回到南宁的时候，部队已集中桂林，进入湖南境内。粤军因我军北进，乃乘虚进占桂平、贵县，并迫近贵县宾阳之间之黎塘圩，我在南宁匆匆布置，以韦云淞率领一部守备南宁，其余皆随同出发到柳州、桂林，除留置一小部队据守各个城池，以作最后的据点外，其余一概放弃，或以民团扼守。十五军的三师，除梁朝玑已出发外，许宗武、苏祖馨两师，由我与黄旭初最后率领出发，这时前方李德邻、白健生、张向华率领之四、七军及在湖南合作之唐生明第八军，已占领衡阳、长沙，大有直捣武汉之势。我军北上，粤军并不向广西深入尾追，却另行折回广东，由北江出衡阳。我与十五军到达零陵时，衡阳已为粤军占领，将我

军截为两段。我见兵力单薄，一时不能将衡阳夺回，即用电报与前方商量，回军击败衡阳粤军，再行北进。于是前方各军由长沙向耒阳撤退，我率十五军向常宁前进会合。到达常宁时，粤军占领耒阳常宁间之秧田圩，切断我的进路，乃展开激战。十五军稍受挫折，停顿于常宁附近，适前方各军已退至耒阳，粤军亦撤回衡阳固守不出。我亲到耒阳会议，侦得衡阳工事坚固，不易攻击，而且是年湖南岁荒大饥，军食极成问题。于是决心由常宁以北地区渡过湘江左岸，据守祁阳熊飞岭及宝庆、零陵各处休息整顿，度过荒年，再求进展。而衡阳粤军见我军撤退，遂向洪桥出击。我等在洪桥会议，共认乘势反攻，夺回衡阳，比较消极的撤退为有利。即下令翌日向后反攻，双方又展开大战，十五军置于右翼，左翼为四、七、八军主力。我回到驻地时，部队已逐步推进，情况颇为顺利。从第一日起，一直到次日下午四时，我的正面尚没有甚么变化。但是左翼方面，情况非常沉寂，自次日上午八、九时起，已听不见他们的枪炮声音，并和我们得不到联络。当时我深为诧异，不知是胜利的前进呢？还是失败的退走。但我深信白健生在作战时对联络工作，素来是非常注意，尤其当败退的时候，他必用尽种种方法，通知友军，以免受意外之损失。这次也许是急于前进追击，而不及通报。这样左猜右想，一直到下午四时以后，等我派出去的联络员回来报告，才知道他们在今早为敌人反攻，已经败退。敌人在上午十点钟通过与我并行的某地，正向洪桥前进。这次左翼退却所以不通知我们，到后来才知道是送信的人，中途遇见一个军官，送信人向他查问我的所在，他答复不知道，并且说："想早已退却了".以致耽误军机，这情况是多么危险啊！此时左翼的敌人已超过了我大半日的路程，而我们的右边，临着一条正在涨大水的湘江，不易过去。另一方面又得到报告：一部分追击我军的湘军刘恢先所部，已到达常宁白水市，向零陵方面急渡。万一左翼的敌军，先我到祁阳，遮断我的后路。或者知道我未能退出，由洪桥向左转来包围，则我将全

部被俘。于是火急下令，向大营市祁阳方面撤退，连夜向左翼敌人并行的后方转进。在一日夜之间，走了一百八十多里路，次日黄昏时候，到达祁阳城，而敌人也过了熊飞岭，离祁阳不过二十多里的地方，与我的后卫部队对峙着，祁阳自然又不能再留。早早的吃了一顿晚饭，当夜渡过湘江南岸，向零陵退却。连日连夜作战败退下来的队伍，未曾经过收容整顿，秩序极为紊乱。我除了身边一个卫士队之外，几乎都失了掌握。向来我遇到军事不利，必须退却的时候，自己一定是支持到最后才退去的。这一次我的身体实在太疲乏了，走一段，睡一息的，慢慢向后转进。团长周元很匆促的跑来，向我报告："后面已无自己队伍了，离敌人先头不过二十多里，请副总司令赶快走路吧，不然，敌人快要到了！"情势紧急，可以想见。次日午后三点钟，我到达零陵城，得悉由白水市向零陵城追击的湘军，离城已不过三四十里，如果继续前进的话，黄昏时候，也可到达城边。我进城的时候，看见我的部队，或在睡觉，或在觅食，在那么炎热的暑天，经过四日四夜长距离长时间作战溃退下来的部队，到了一个比较后方的城市以后，精神的疲劳，及秩序的混乱，是必然的现象。所以我无论怎样命令他们，督促他们，退到江对岸布防，都不能办到。他们好像是一群失了知觉神志昏迷的醉汉，这一个起来，那一个又睡下去，我着急极了，假如敌人在黄昏后，或明天拂晓时到达，这些部队的官兵，一个个都要变成俘虏，因为零陵是一个背水的城呀！我在万分困难之下，只有命令我的卫队长莫世才，将那百余个卫士，分布在六七个城门，紧紧的把守着。万一敌人攻城，一定要坚守到明天上午九时，掩护城里的部队退过对岸，才能撤退。当晚我也过河，到对岸宿营，同行的只有张伯璇、戴石浮几个人。次晨，仍向全州方面退却。起行不久，就听到零陵方面的枪声响起来了，我的卫士队，一直抵抗到九点多钟，城里的部队，全部退完了，才撤退。虽然牺牲了三分之一以上人枪，但他们能使很多的部队，脱离危险，确是一场值得称道的后卫战！

退集桂境后遭遇的危险　我到了全州，李德邻、白健生、张向华已先一日退集那里。他们是由湘江北岸，经东安退回来的，左翼的损失非常重大。第七军的师长梁伯霭，第四军的副师长李汉炯，都在五塘前线阵亡，士气颓丧极了。敌军还在后面紧追着，我军除留一部在全州布防外，主力仍向桂林撤退，俾能补充整顿。到了桂林，据报有些向来反对我们的分子，受了对方的任命，纠合土匪散兵，进扰柳州。同时得到滇军万余人围攻南宁，并与宾阳、贵县粤军联成一气的消息。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形之下，而我们仅保有桂、柳、平几处很小的地方，几面受敌，情形是危险极了！于是桂林方面，由健生等在那里布防久守，我率一部回防柳州，将那些反动的杂军肃清。湖南方面敌军到了全州，不再前进。因此我军的主力亦移柳州，筹划如何去解南宁的围。

决心离开广西　我到柳州后，因身体衰弱，又回到桂林去休养。在一个大劳动大刺激之下，得到一个静息的机会，自然会有许多感想发生。我觉得这几年的内战，是太无谓了！于国家有什么益处？于人民有什么益处？于自己又有什么益处？于是我决心退出这个内战的旋涡。本来我于退到全州的时候，一天晚上，在湘山寺内，已对白健生提出这个意见。他恐怕动摇军心，竭力劝止我，我也不再坚持。的确，那时候我若离开这一个集团，士气方面，是极易受到影响，我当然不能不顾念大局，而接受他的劝告，中止自己的企求。现在我去志复萌，并更坚决，于是不再征求他们的同意，即将辞退的电报发出，同时并有致南京方面的电报（马电）发出。他们见到这两个电报，非常惊异。不过除了复电劝阻之外，亦不能十分勉强，只有各行其是而已。自此以后，我虽然还未正式解除军事政治上的名义，但实际上已完全不负责任。不久，我又回到柳州，与他们相处一起，彼此的政见，固已分岐，但私交上仍是一样的纯笃。我那时因为不能出省，在柳州开辟了一个很大的林场，种植桐油，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工作。三十三年我到柳州，邀同黄旭初去参观这个农场，当年所种植

油桐幼苗，今日已乔木参天，十五年前好像是一个无聊极思的玩意儿，今日则成为社会上一宗很大的财产。比到十余年来你死我活，此起彼仆，那些“夺帅印”、“取成都”的活剧，意义深长得多，使我对于以往的一切，引起了无限的感想！

南宁之围，终于解开了。在优势的敌人四面包围之下，能以劣势的部队，从一个空隙中冲进去，完成里应外合的形势，将重围打开，并将敌人击败，真是战争上一个奇迹。这固然是守将黄旭初、韦云淞等能艰苦固守，亦确是白健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此后还在右江方面进行好几次的战斗，使广西的局面，得到一些回旋的余地，这都是值得称颂的事实。因为这些战役进行的时候，我均未曾亲自参加，其经过的详细情形，不叙述了。

南宁解围之后，滇军退出桂境，粤军亦退出贵县以下，南宁终于恢复了他原来省会的重要地位。一切军事，政治的重心，迅速的转移到那里去。我与李德邻亦由柳州回到南宁，在我的果园旧寓内，渡过了我三十七岁的生日。他们很热烈为我祝寿，胜利的情绪与诚挚的友谊，都融和在杯酒里，使得大家沉醉。不久，我提出决心离开广西的意思，这时他们也不再劝阻。在临行之前，和各重要干部还开了一个会议。他们希望我出省以后，仍为团体而努力，务使团体的精神，永生而不断的发展。白健生发言：“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坚固。”我在那时候，虽然仍是很消极，并未考虑到以后的行动，但是我已坚定我的决心：第一是不再破坏国家，第二是不再破坏团体，这是我以后行动的原则，可以说是我以后为人做事的最高准绳。在当时，彼此的言语间，或者有不甚愉快的地方，但在彼此的立场上，就不能不如此申明我的衷心。在那时虽未必为他们所完全谅解，但是到了廿五年统一以后，已得到事实的证明，这是一幕团体政见与私人友情矛盾冲突的表演，最后终于得到善美的结果。

在这一段内战史中，可真是一个特别的境头了。

写完这段事迹后的感想 我写完这一个事迹的经过，心中发生了很多的感想！我们在当时，对于北洋军阀的互相火并，尤其是近在目前的旧粤桂战争，自然有许多不良好的批评。但决料不到这个悲剧，竟由我们自己来重新表演一次。可是我们重演这个悲剧，决不是有意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表演的舞台，幕后自然有一个导演者，在那里指导我们的演出。这导演并不是那一个人，而是历史的和社会的背景，因为这一幕一幕的戏，是历史的社会的演进必然的过程！假使我不是害病，那会长期的留在广州，因此或者可不参加叶贺的战事。没有叶贺的战事，就不会有对第四军的战事，没有编遣会议，就没有十八年的粤桂战事，没有十八年的战事，就没有十九年二十年的战事。但是这不过是我事后的推想，即使这些事实都没有，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可以引起不幸的战争么？即使没有这些原因，也必有别的动机。因为战争的起因，往往当初都是很细微的，而这些细微的起因，又往往为人们所忽略，等到酝酿已久，形势日渐扩大，遂至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当局者，如果能注意这些细微的地方，而及时消灭其祸机，也许可以免却许多无谓的损失。但是这种防微杜渐的顾虑和办法，不是很容易的。譬如我在十八年，决然回香港，和潜回广西，召集旧部，参加战争，实由于对方欲借外人势力，压迫一个失意的人，使他不能安居，而加以侮辱。在主之者不过是接受了一个肤浅的建议，而在受之者，则认为是一个奇耻大辱，不得不挺而走险，以谋相当的报复。我们尝读吴梅村讥评吴三桂"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诗句，总觉得吴三桂因小愤而忘大节的可痛可恨。可是检讨中国近数十年来的内战，当事者虽然不是"一怒为红颜"，而一考其起因的价值，两两比较起来，往往相差无几。这是个人的悲剧，也就是国家社会一个极大的悲剧啊！

论这次新粤桂战争的悲剧，我虽然中途下场，而剧情的后半，

还是由其他角色继续表演下去，仍是一个极可悲伤的回忆。然而我读了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和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三个原则，觉得这种历史的演变，总是避免不了的惨劫。无论是分是合，是正是反，都是有一定的理由。任何一方面的道理，都有他的是处和非处，并不是绝对的是，和绝对的非。是和非冲突之下乃产生另外一个是非，这就是合的道理，也就是一个进化的道理。虽然一个历史的演变，要牺牲很多的生命和毁灭很多的物质，然而谁又有这样大力，能够挽回这种莫之为而为的定数呢？这在佛家的说法是"劫运"，用辩证的说法是"必然"。无论"劫运"也好，"必然"也好，事实既无法抗御，过去亦不必追悔。反正只是在历史的演变上，留下一个供后人参证的资料，和凭吊的痕迹罢了。

十一　海外的闲散生活

闲居香港　十九年的冬天，我在南宁，与他们分别，到了龙州，又到安南去。这是广西政治人物下台的一条好路径，我已经走过两次了。外国人在中国各地，为中国军事上、政治上的上台人物，安排了许多“逋逃薮”式的安乐窝。广西、云南的下台人物，可走安南；广东的下台人物，可走香港；在长江一带的可走上海；在华北各省的，可走天津；在东三省的可走大连，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你一个到外国的租界或殖民地，只要不妨碍当地的治安，当局者无不表示相当的欢迎，因为收容政治犯是国际法所允许的。所以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到了不得已时，也可拿国际法准予收容政治犯这个规定来作护身符。而某一种野心国家，即凭此规定，保护邻国的活动分子，使邻国的政局不安，以便乘人之危，图渔翁之利。

赴南京后一个小风潮　一个刚下台的军政要人，住在外国的殖民地或租界里，自然会引起许多方面的注意。他们是本着人弃我取的原则，用种种方法来拉拢，来酬酢，利用你剩余的力量，作为他们政治资本，以达成他们政治上的目的。我一到香港，已有人在那里等候，向我游说，劝我到南京去。南京，我是准备去的，但我虽然离开了我的团体，却不是因与团体内的中坚份子感情破裂、利害冲突，而失意出来的。我仍爱护我的团体，更没有破坏和利用的心理，而是想调和团体与国家的冲突。我之决意赴南京一行，是想实行我的和平统一的主张，并非受了一般说客的

耸动。换句话说：要去南京是主动而不是被动的。我在香港逗留不久，就动身赴上海，转赴南京。我自然不须什么介绍而迳自晋谒蒋先生。这次见面的情形，与十五、六年初见面时，并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使我最感动的是，蒋先生待遇我们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和以前是一样的诚恳，或者更密切一些。这种情形，想就是促成中国统一的因素吧！我将自动退出广西的原因，详细陈述，深得他的嘉许。他即以广西善后督办的名义，命我回去，收拾广西的局面，这好像是结束内战必有手续。但我之不愿再参加内战，和不肯作勾结破坏的工作，而只愿在整个方面为和平统一而努力的决心，是他所了解的。所以我在南京的短时间里，许多向来反对我的人，就在我所住的旅馆大贴标语，说我是“破坏统一的祸首”，“实行苦肉计”，“实行缓兵计”，要求中央惩办我，并要求出兵讨伐广西，我只好付之一笑。这个风潮，一时颇为激烈，经由警察弹压，才得平息。我在南京住了不久，就回到香港。广西内部知道了这个消息，也同样的起了一番骚动。有些不明真相的人，就对我加以攻击，并牵累及省内以前与我关系比较密切的干部。在那个时期，广西的干部，除了第四军之外，李、白以下的军事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曾为我的直属部下，其政治干部，更不必说了。要分又何从分起？要去又如何去法？后来李、白见内部情势不安，乃通电为我解释，说明我是厌战自动离桂，并未破坏团体的行动，更与那些干部无关。经过了这样的剖释以后，广西的局面始行安定下来，我在香港，也就很安闲的住了好多时候。

漫游海外的动机　二十年的春间，胡展堂先生在南京被扣留，孙哲生、邹海滨、古襄勤都离开了南京，秘密南下。有一日早上，我遇见陈真如，他很狼狈的由轮船码头下来，邀我到香港大酒店里密谈。说是广东的政局又变了，陈伯南联合广西，反抗南京，他只身逃来香港。变动的主要原因，自然是为了胡展堂被扣，我听了这个消息，觉得政海风波，真是不可逆料。不久以

前，他同我还是敌人，现在异地相逢，时势变换，又相亲密起来。而在另一方面呢，两广的军队，正是枪口互相对峙的时候，忽又团结起来了。不久，汪、胡、孙、古、李、白、陈、张诸人，相继在广州出现，彼此前嫌尽释，重新开府岭南。这一幕滑稽戏，我虽不曾参加，但在旁看得非常清楚，也特别感觉有趣。

我在香港闲住，预料他们必然的要来邀我参加。果然，不多几时，李德邻、白健生也到香港来玩，大家相见，作了很多时间的恳谈，丝毫没有隔膜。他们要我回广西去，我也颇想回去看看故乡的情形，他们又要我参加这次的活动，我只答应愿在地方经济建设上努力。我们到了南宁，起草了一个五年经济建设大纲。这一个大纲的内容，当然是很空泛的，即使实行起来，亦未见得会收到多少的效果，尤其是在那时“军事第一”的状态之下，又那里有从容的时间与大宗的款项，去进行这缓不济急的工作？只好作为我那时回到南宁的一点抒情表现吧了。过了些时，汪精卫、孙哲生等到了梧州，我与他们在梧会面。他们在中山纪念堂一个大会上，邀我讲话，我所讲的意思，与他们的口味，颇有不合之处，大家弄得很难为情。随后，他们示意要我担任广西的经济督办，并且希望我同他们同到广州一行，我答应回到香港后，再加考虑。于是我乘船直回香港，他们也回广州。我回到香港，想了一想：中央委我为广西善后督办，他们又要我当广西经济督办，我还是督办善后好呢？还是督办经济好呢？在香港再住下去，一定纠缠不清、难以应付，不如早日离开为宜。去上海、去安南，都觉不妥，还是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走走，使耳目更清静些。于是计划先到菲律宾，再到台湾，转赴日本、美国。在太平洋上作一次长途旅行，考察各地的风土情况，一则可以免除无谓的麻烦，再则可以增进自己的见闻，在这匆促的情况之下，办好入境手续与盘斗寅（珠祁）二人，匆匆离开了香港。

菲岛首都马尼拉　菲律宾首府马尼拉距离香港不过六百四十哩，大邮船航行三十六小时即可到达。人口六十多万，商务非常

繁盛，为亚、美两洲航线之起点。当轮船入口之后，首先就遭遇到国际间种族不平等的待遇，白种人很自由的就登陆了，剩下的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必须经过许多严格的检查手续，中国旅客被检查的次序，更挨到最后。我们登陆后，住在马尼拉旅馆，这是马尼拉最大的旅馆，建筑与设备都相当宏伟。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正是气候最炎热的季节，白天的温度，总在华氏九十几度以上。很多长期的旅客，就跑到碧瑶去避暑。所以旅居在那里的客人，并不很多。华侨在菲律宾有很长远的历史，并能刻苦耐劳，所以在经济上颇占势力，各种营业都有，尤以经营珠细店（即杂货店）者为最多。一九三〇年以前，有人曾估计全岛珠细业，由华侨经营者，约占总数百分之六十，可见他们经济力量的雄厚。华侨中以福建人最多，经济力量亦最强，广东人次之。近年来日本移民日多，经济势力亦日渐扩展，几有凌驾我侨胞之势。原因是侨胞经营之货物，除一部为国货外，多半为贩卖日货，并以航运吨位之限制，运销双方，都发生很大的困难。日人则是直接经营，又得航运之便利，与国家之保护，自可获优厚之利益也。

菲岛的商业管理制度　菲律宾政府对于捐税之征收，非常周密。那年正施行会计管理与机器计帐制度，华侨商店（其他商店想亦如此）必须雇用曾经政府训练，对于政府负责之会计人员为会计，一切薪给费用，皆由商店负担。税收机关不费一文，而对于各商号的营业收支与盈亏情形，社会经济状况，无不了如指掌。所有营业税、利得税等之征收，均甚便利，绝对不致有隐漏短少的弊病。凡较大之商店，必须置备计算机，每日收支，皆以机械记录为标准，以防会计人员通同作弊。自此种制度实施以后，政府税收大增。而侨商则多以为苦，盖华侨积习，皆认私人经营之帐目，为私人的、秘密的，如今被迫化为政府的、公开的，不但于习惯不便，亦不能作隐瞒政府逃避税捐的行为，自然认为不利的事。但是我们客观的为政府设想，此种商业管理的制度，极为完善，在中国尤有彻底仿行之必要。

菲政府的同化政策 菲律宾的法律规定，外国侨民，无不动产（如土地）的购置权，侨胞为购置不动产，大都与土女结婚。因为土女及土生子，皆有购置不动产的权利，故久居菲岛之侨胞，其家庭大多已为土人所同化。我在一个侨胞的宴会上，遇到一个菲政府的农林部长，据说他的祖父即为华侨，第二代为土生，第三代即完全土化了。不过此人对中国的印象尚好，自认为中华血统。其他类此者很多，皆认为菲律宾人，不愿说是中国人，对祖国的观念已淡忘无遗。我想此种法律，完全是一种同化政策，我国若不能积极设法挽救，则数十年后，在菲华侨，将尽为其所同化，而不复自认为中国人了。

马尼拉没有什么名胜古迹，唯有麦哲伦的坟墓，足供凭吊。这一位世界航海伟人，航行一三〇〇九海里，由西方到达东方，不但证实了地园的学说，而且将西班牙的势力，引到东方来。西班牙占领菲律宾三百六十余年，将西方的文明移殖到菲岛上面，可惜国力不振，于一八八九年割让于美。美国治理菲律宾，于今已五十余年矣。

马尼拉的社会情调 马尼拉社会的情调，非常复杂，乍看好像是全盘美国化的，但仔细分析起来，便知道并不是那么单纯。西班牙的流风余韵，在那里还占很重要的地位，西班牙语言，亦是重要方言的一种。古老而宏伟的教堂，都是西班牙神父在那里主持着。我曾参观过一个教堂，它对于当地的天文气象，贡献甚大。教堂内置有一种地震仪器，能够将地震的情形预先报告出来。据说："菲律宾是太平洋上大震源之一，亦是大风源之一．因为地震，以致气象的剧变而酿成大风，菲律宾上的大风，便著名于世界。"西班牙式的古旧桥梁，到处还可以见到，桥身弯得很高，两头宽，中间窄，有些象江浙桥梁的样子。汽车在上面经过，有一种不同的感觉，汽车伕就会告诉你："这是西班牙桥梁。"

菲岛上的华侨，大都还保持着中国的情调，什么"兴"什么"隆"，中国字与外国字并用的商店招牌，随处可以见到。会

馆与祠堂还保留着中国固有的建筑型态。华侨办的学堂，用的是中国课本，教师们讲的国语，也很好，可是一般侨胞子弟，认为学习国语和学习外国语是一样的难易。而生长异地，反以学习外国语为有兴趣，也许是比较适合实用的缘故。我在碧瑶，遇见了个姓陈的侨商，据说是当地木业的领袖，他同他夫人，都是中国古老的装束。他本人已经六十多岁了，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讲普通话，只懂得西班牙话和福建漳州的土话。我们同行的人，既没有会说西班牙话的，亦没有会说漳州土话的。大家相见，只是心会，彼此同是中国人，而竟无法用语言来沟通情愫，真是莫大的憾事，这位侨胞，可算是西班牙时代的华侨的典型了。

菲岛的社会风尚 菲律宾还有一种尚未开化的土人，无论男女，都有坚强的体格，全身除了一条小布遮蔽下体之外，是一丝不挂的。他们大部居于北部的山上，房屋的构造很特别，四条柱子架搭成一间小屋，屋顶用葵叶复盖，代替瓦片，远远望去，好象一个鸟窠似的，他们有一种原始的木刻玩具，是远处来游历的旅客所乐购的纪念物，也就是菲岛土人原始文化的代表作。土人的戏园斗鸡场，我都去参观过，完全是东方情调，没有一点西洋色彩。菲律宾各地，均有电映院，放映的片子，都是美国出品，终日开映一个片子，循环不已，不分场数，随时可以入场，随时可以离场；有的是从头看到尾，有的是从尾看到头，只要你愿意，接连看两次也没有问题，这是与我们国内电映院习惯上不同的地方。菲律宾人对于音乐，具有特别天才，不但国内以此为职业的很多，就是大邮船上以及上海、香港，随处皆可以见到菲人的乐队。菲律宾的民主政治，是美国化的。我到马尼拉的时候，适值议会选举，街道上到处可以看见竞选的宣传标语，五光十色，引人注意。投票期间，全国一律禁酒，预防酒后滋事，影响治安。那次选举的结果，奎松获得了最大的胜利。

菲岛的文化 美国人对于菲律宾的教育，可说是完全成功了。他们统治菲岛，不过五十余年，培成了美国式的菲律宾文化。

不论小学、中学、大学，在外表上说，都是美国式的建筑，就内容上说，那是美国的课本，美国的教法，大多数的菲人，都认识了英文。学会了英语，菲人本来只有极简单的文字与极复杂的语言，现在突飞猛进，几乎完全变成美国的文化了。有人认为这是菲律宾文化的灭亡，我则认为是菲律宾文化的改造。因为那些原始简陋文化，本来是不值得去保存的呀！

菲督府里的大油画 我们考察了马尼拉社会的外形与内幕，进一步还想去参观菲政府的许多重要建设，如海军基地、炮台、大水利工程、大水电厂、金矿等。但非得到菲督的许可与介绍，是不能达到目的的。于是我们到总督府去会见总督，在会客厅里看见一幅很大的油画，画的是西班牙政府时代用绞刑绞死土人的状态。被绞的人，肌张睛突，正在作垂死的挣扎，绞手也在那里竭其全力，以尽杀人的责任。两个人一为求己生而挣扎，一个为谋死而努力，这种矛盾的残酷的景象，表现得非常深刻。这幅酷刑挂图，布置在督府客厅之内，不知是要暴露以前西班牙政府之虐政呢？还是作为现政府施政之警惕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菲岛的避暑胜地——碧瑶 菲督已到碧瑶避暑去了，我们空跑了一趟，殊觉失望。菲岛地处热带，那时正是炎热的暑期，政府及海陆军的美国人员，大都到那里去消夏，衙署兵营，差不多都变成了一座空屋。我为达到我参观的希望，同时马尼拉的气候，实在热不可耐，也就到碧瑶去走一遭。由马尼拉到碧瑶，大约有一百多公里，先由马尼拉乘火车北行，至仁牙因港附近一个小站，约莫两小时的时间，沿途是很平坦的田地，都是甘蔗园及蕉麻园。糖是菲岛的名产，沿途见到很多规模宏大的糖厂。蕉麻亦是菲岛的特产，形似芭蕉，而不结果。蕉皮可制成韧长而洁白的麻线，菲律宾草帽与草席，都是这种麻制成的，并不是寻常的草类。浙江的余姚、黄岩、温岭一带制帽的原料，就是菲岛所产的蕉麻。我们在一个小站下了火车，换乘汽车，折向东行，约莫四十五分钟，就到达山颠。霎时间，宛如身出火坑，进入清凉境

界，心神为之一爽。

碧瑶原是一座荒凉的高山，并无什么名胜古迹，山上原始的松林，极其茂盛，拔海在三千尺以上，比之我国庐山的牯岭街，还要高些，它的气温，比马尼拉低得好几度，开辟的历史并未很久，当美国人初占菲岛，开始经营马尼拉的时候，气候炎热，恶性疟疾，流行甚剧，美国官兵病亡者颇多，于是用科学方法来扑灭疟疾，我在马尼拉曾参观过美国煤油大王以一百万美元捐筑之疟疾馆，那里有许多人在培养研究由野外采集来的各种各色的蚊虫，他们曾放映一张关于疟之研究的影片，由疟蚊卵子的孵化，幼虫之生长，疟蚊之长成，及疟蚊如何吮吸人血，疟菌如何传染人体，原虫如何发展，血球如何破坏，疾状如何变化，从头到尾，一目了然。在十数分钟内，将疟疾的原理，说得清清楚楚。科学之造福人类，真是伟大极了！但是科学能破灭疟疾，还不能改变气候，为求比较适应人类生活，还只在大自然的环境去找寻。碧瑶这个山地，正是理想的目标，既可避疟，开山辟路，经营建造，美国政府为完成这个崭新的美国型的避暑胜地，曾费了很多的金钱。丘陵起伏，地形颇为开阔，不似庐山、黄山那样的峻拔，而另有挺秀的风致。那里也有操旅馆业菜馆业及种地种菜的华侨，他们多半都是广东人。我住在一家华侨开的华威顿旅馆，据说在我到达不久以前，我国府主席林公，曾寄寓于此，可惜时机不巧，未能在此见面。

我在碧瑶，曾参观一所菲人办理的初级农业学校，拥有面积广大的农场。学生一进学校，即分组分授耕作地亩，教师一面授课，一面教以实作。并由学校供给种籽，贷与资本肥料，每年收获，即运至市场销售，所得之值，除归还学校资本外，即为学生所有。一个学年的收入，可得百余菲元，四年之后，学业既成，资本亦有着落，尽可以自谋生活。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完美，如有机会，很希望在国内试行一下。我住在碧瑶不久，即去会见菲督，请求备文介绍参观其他的重要地方。在他简单的别墅内，

亦是他办公的地方，作了二十分钟的晤谈，我们的谈话完毕，他的女书记已将各种介绍函件用打字机打好，经他签字之后，即封好交给我，完成了我的要求。外国人办事的简单迅速，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

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 我得到菲督的介绍信后，即下山回到马尼拉。首先去参观一个伟大的水利灌溉工程。这个工程的地点，离马尼拉城约四十多公里，系将一条很大的河截断了，设有利用水力自动升降的水闸。在河的左岸，开筑一个水门，总渠长二十多公里，支渠数目甚多，灌溉的面积，约有七万多赫特（一赫特约等于中国三亩）。据一个菲律宾工程师告诉我们："这完全是美政府投资建设的，一切的工程设计，都是美国人主持。建设完成后，则交由受灌溉田亩的居民，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保管，并逐年摊还政府的资本。现在这个工程的资本，已经还清，工程的所有权，已为地方人民所公有，美国人也不再顾问了。从前这个地区易遭旱荒，自从水利办好，不虞此等灾歉，因之生产日增，民间富力日强，土著对于美人，无不表示感激。"这位工程师并云："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在灌溉地区的水准测量之正确，因为一切水利工程设计，都要拿它做基础，往往因为水准测量不正确，以致工程完成后，有完全不能上水或局部不能上水的事情发生，或有水量不足之虞。那时再要修改，就费事了。所以他们在全部工程实施的过程中，水准测量的工作，占了大部分的时间，其他工程敷设的时间，则并不很长。"他并表示，如果中国要办水利工程，菲律宾有很多的专家，都愿意到中国来服务，而且保证技术的完善，我很感谢他的诚意。

参观水电厂 第二个参观的地方，是马尼拉市东北八十五公里，卡科来谷附近的伟大水电厂。这厂设在一个很大很高的深山谷底下，负责的是一个美国工程师，他曾在北平燕京大学担任教授，招待我们非常殷勤。我们在水头入口处他的临时住宅内，进了一顿午饭。据他说："这个水电厂，可发动七万多匹马力，是非

律宾最大的一个电厂，就是在整个亚洲，目前也要算数一数二的了。所发电力，除了供给马尼拉全市及沿线附近各村镇应用外，尚有余剩。”电厂的全部工程，是新近才完成的，现已开始放电。那个作为水源的小河，流量并不很大，而且山虽高，山水沟成的瀑布，一个个不相连接。我便问他：“这么小的水源，何以能利用它发生这么大的马力？”他笑指着那破旧的板屋说：“我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年多了，第一个工作，是测量雨量，第二个工作，是工程设计。这条河流的水源，虽不很长，但是这带山脉的雨量，是非常之多的，一日之间，总有一两次的大雨，或小雨。每年平均雨量，总在三千六百厘之间（按我国雨量，以福建西南部为最高，平均不过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厘），是菲律宾雨量最多的地方。河水每日至少要涨一次，你们今日很幸运，没有遇到大雨。”说到这里，他又手指对山的乌云说：“你们看，不久大雨就要来。”果然，不到一会儿的工夫，云雾满山，大雨倾盆而至。饭后，他领我到水头入口处参观，见一条直径三公尺的大钢管，将全溪的水，导入管内，大钢管系由山腰打通，直通至山侧的脚底下，成为一个人造的大水柱，并不须利用天然的瀑布。由入口处到谷底电厂，水位差为六百多呎。随后至一个升降站上，进入升降箱，系悬在两山间架设的钢缆循环轨上。用电力将升降箱移至电厂的上空，再徐徐下降，到达电厂的下面。要上来时，则徐徐上升，仍回到原来的地方，比上海国际饭店二十四层楼的升降机，要高出二三倍。发电厂在深山穷谷之下，汽车、火车都不能通行，一切机器及建筑器材人员等等，都赖这个升降机来运送，亦算是一个奇观了。机器日夜在那里转动着，电力不断在那里发生着，使百千万人得到了光明。我们不禁又想起爱迪生的伟大，科学的万能，我问他：“万一天时大旱，打破了你的雨量纪录，又怎么办呢？”他摇摇头，指着天空，对我笑笑。

美国驻菲的海军基地　第三个参观的地方，是小吕宋岛卡维特省的美国驻菲海军基地，距马尼拉市水路是十浬，陆路是二十

哩。我们同菲督的一位副官，乘坐小汽轮前去参观，那里有设备完全的海军医院，电力强大的无线电站，海军陆战队的营房，修理船舰的干船坞，与修理场、停泊场。我们均经一一参观，并在那里午餐。距此西北方十多海里处，有一个柯里几多岛，是控制马尼拉湾入口的要塞。柯里几多岛的北面二三里，即是巴丹半岛，亦为海陆军的重要根据地，为一九四二年麦克阿瑟将军最后抵抗的据点，亦可见形势的重要了。我所能参观的地方，可说是比较普通而可以许可外人参观的军事基地，觉得没有很大的价值。于是要求再到柯里几多岛的要塞上去参观，却被提督毕特婉言拒绝了。他说："时间恐怕来不及，而且风浪太大，小汽轮会发生危险。"自然，我也知道那个地方他不会允许外国人前去参观的，而他谢绝参观的言辞，却丝毫不露痕迹，使人感到很满意。他并且说："美国因为华盛顿条约限制，且菲律宾不久要独立，美国不便在菲律宾积极设防。"这也许是实在的情形，那时毕特提督已六十多岁了，将届退休的年龄。民国廿五年，他的后任提督到中国来游历，我在汉口接待，问起毕特的情况，那位提督回答说："他在纽约替一个寡妇管帐。"我听了，不胜惊讶！问他："一个地位高贵的提督，怎么会愿意屈就寡妇的帐房呢？"他说："退休的提督，能有机会替一个有钱的寡妇管帐，倒也不大容易，也可说是幸运的事。"这个回话，使我深深感觉到人生职业之可贵，宦海沉浮，又有什么价值呢？

美、英、法三国的殖民政策 我曾住过法国的殖民地——安南，英国的殖民地——香港，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这三个殖民地的宗主国比较起来，美国可说是开明的，他对于菲律宾的态度，是友爱的，善意的，用美国的教育方法，来提高菲人的知识，用美国的科学生产，来发展菲人的经济，以期逐渐达到平等解放的境地。我们可以说，美国对菲律宾，是父子兄弟的关系，不是主人奴隶的关系，这是美国伟大的地方，也是他成功的地方。英国对于香港就不同了，英人的秉性，富于保守，对殖民地的设施，

也是保守的。虽然在物质建设上很努力，而于教育文化之促进，及风俗习惯之改良，并不注意。固然不能说这完全是恶意，但英人之不愿殖民地有长足的进步，是无可讳饰的。法国对于安南，更不同了！她对于安南人，正以强大的控制力，阻碍他思想学术经济的进步。因为不如此，惟恐安南人不甘驯服，而起来革命。社会上一切恶习惯，随处暴露，毫不取缔而任其滋长。我们又可以这样说："法国人对安南是压制的，英国对香港是羁縻的，美国对菲律宾是解放的。所用的方法既不同，而所收的效果亦各异。安南的革命运动必有爆发之一日，目前的驯服，不能算是法国的成功，正是法国的隐患啊！"

闲住殖民地的感想 一个下台的军政人物，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做寓公，表面上好象很安闲，而实际上并不尽然。既不能讨好于这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人就会设法亲近你，拉拢你，甚至有许多人原来的立场各不相同的，因为大家都成了失意者，往往就在"失意"的这个相同点上，渐渐接近起来。另作新的利害结合。我与汪精卫方面，本来是敌对的，后来大家在政治上都不得志，因此逐渐接近，而大谈其团结。租界地、殖民地真是一个融化万流的大壑啊！租界、殖民地的士绅，对于失意的军人政客，应酬也特别殷勤，表面上好像是对你表同情，其实是"烧冷灶"，完全是为求日后往来亲密着想。至于军火商人，买办阶级，为预谋将来的利益，亦各献其殷勤，是以往来应酬、就几无虚日了。

日本对于邻邦政治失败者的阴谋 英法殖民政府，一向是采取"治安第一、睦邻第一"的方针，失意的军人政客，只要不煽动他的民众、妨碍他的治安，他也很放心很宽大的让你居住下去。他也不想利用这些人，来扰乱邻近的地方政府，他对于邻近的地方政府，只要不损害他的利益，便见神就拜，固不问其是哪一种偶像。但是日本人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驻在中国租界内的领事、特务武官，平时除了治理正面的工作之外，对于政治失败者的帮

助联络，是无微不至的。如军人政客逃亡时，他可无代价的尽保镖与收容的义务，只要你有求于他，无不尽力办到。在中国近代的内乱史上，不论是南方、北方，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这是日本一贯的政策，他保护这些分子，是要造成中国不断的内乱，以完遂其吞并中国灭亡中国的阴险企图。甚至想收买这些分子，为他日后的傀儡。现在伪组织的大小汉奸，在失意时，没有一个不与日本发生过关系的，这就是日本最后的收获。我要旅行日本的消息，被日本人知道了，于是广州的日本领事矢野真、香港的日本领事清水都来找我，替我办护照，写介绍信，打听船期，请酒饯行，说不尽的殷勤周到。日本艺妓的情趣，牛肉锅的滋味，我也都是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尝试到的。

香港人爱好运动之一斑　香港这一块“维多利亚王冠的宝石”她有明媚的山光水色，有清洁整齐的市街，有安定的秩序，有便利的交通，一切内地所没有的物质，一切内地所没有的自由，假使你有钱有闲的话，都可尽情的享受。香港人对于运动，有特别的兴趣，足球一项，独开我国风气之先，技术亦为全国之冠，球员终年在球场里踢球，市民们也终年在那里观看，而不觉有片时的厌倦。每当足球大赛的时候，人山人海，摇旗呐喊，各有壁垒，有如对敌作战的情势。赛马是大家公开的赌博，为买办阶级的高尚娱乐，马主高坐看台，密切注视人兽最后一刹那之胜负，胜者则视同拱璧，败者则弃如敝屣，此种运动，已失提倡尚武之初意矣。游泳在香港更为普遍，不但海水清洁，场所众多，而且设备完全，一到夏季，男男女女就以海滩作为他们的消遣地方。既可健身，又极经济，有人估计，香港的夏季，每天有五六万人浸在海水里，约占全港人口十分之一，可见香港人爱好游泳之一斑了。

有趣的香港政令　香港政府的行政，有好些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猎狩规则与禁止虐待动物的规定。猎狩规则里规定，某种鸟在某个季节里，才准猎取，到某个季节即行禁

猎，如果违犯了，就得受相当的处分。此外并且划出一个区域，作为禽类安全棲息的地方，任何季节，都禁止在那里打鸟雀。如果它们有知识的话，飞到那里，就是快乐的天堂，它可以大胆的立在猎人的面前，猎人亦只好对它望望，而无可如何！

香港人到菜市买来供膳食用的鸡、鸭等活东西，都得象抱婴儿一样，把它抱回，才可宰杀，禁止两脚朝天，倒吊着拿回。否则警察看见了，就要干涉或处罚，理由是这样：倒提着会使它难过，而成为虐待行为。我有一个朋友，打得一个受伤未死的鸟，警察看见了，要他立刻处死，据说："它已受伤，就不应使它多受痛苦。"那个朋友与他争辩，结果，被罚了一元，这是有法律根据的。因此我想起中国也有过"秋狝冬狩"，"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名言。但是实行的政令，却见诸外国。同时我又觉得帝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人类，受虐待的情形，恐怕比鸟类厉害的多，不知他们立法的时候，也曾想到及此否？

回籍安葬先母灵柩　我在非岛考察了一个多月，本想由那里转赴台湾，再到日本去。因为接到蒋先生的电报，要我不必远离。同时先母又定于八月间安葬，于是复经香港返籍，完成先母的丧葬之礼。先母自去年逝世，因我兄弟皆远在外乡，停柩在堂，已一年多了，而今两广军事已局部停顿，我乃得有回里奔丧的机会。人亡柩在，触目伤心，人子之痛，今犹未已！

"九一八"事变发生　葬事既毕，本拟在乡小住，忽阅报章刊载"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晴天霹雳，触目惊心！我虽闲居，而雪耻救国的责任，无容诿卸，乃匆匆离乡，先后在县城及梧州召集大、中学学生及当地机关人员，勉以放弃内争团结救国之大义。本着内心义愤，发为激烈言辞，不意反增各方之误会。乃赴香港，从事奔走陈说。冀作万一之补。

中国自华盛顿会议之后，朝野上下，多认为处列强均势局面之下，可以苟且偷安。于是内战循环，此仆彼起，几已不知有敌国外患矣。"九一八"事变发生，一时间，虽惊醒了国人的迷梦，而

倚赖国联的干涉，冀望事态不致扩大，得如十七年日军占领山东旋复撤回的故事，仍为一般同具的心理。故奔走呼号者，虽不乏人，终不易激发麻醉着的人心。大势既属如此，我只好蛰居香港，随俗沉浮，而内心的忧愤痛苦，固与时俱积也！

广西代表团赴沪共商和平统一 “统一团结，共御外侮”。这一个全国一致的呼声响彻海内，终于使分裂的局面，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两广方面，派了代表团，到上海去商量和平统一的问题。代表团以汪、孙为领袖，我既不是两广方面的代表，亦未负有中央方面赋予的使命，而是以私人资格从中奔走的一人。他们邀我趁昃臣总统号轮船一同北上，船在中途，遇我生平未见的大风浪。我对唐孟潇说笑话：“假使这只船沉没了，国家一定可以减少许多的纠纷，大家既不能‘同舟共济’，若能‘同舟共葬’亦是一桩好事”。船将近黄浦码头，就见到一艘小汽轮，张了一幅大黑布，上面写着：“上海各界欢迎各方代表”十个大字。“团结御侮”、“和平统一”，这一类的标语，更是五光十色的，布满了船的四舷。表面上看来，似乎非常庄严非常热烈的一回事，可是大家上了码头，便一哄而散，各走各的路了。

代表团在上海，与中央方面的代表，举行一度会议。双方商定，重行分配中委名额，由粤方就现有地区召开代表大会，加选中委。粤方中委选出后，再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实行统一。这次会议，我并没有参加，等到粤方中委选出后，我也随同赴南京，出席第四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关于中央政制上，有一个重要的决议，就是修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年高德劭的同志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兼其他官职，而另以行政院负实际行政责任。这个修正书的原则，也是上海会议时商定的，全会不过提出作成正式法案而已。本来此种修改，是不合于国难严重的时势之要求的。于法亦无依据。按照训政时约法的规定，国民政府主席是享有实权的元首，五院院长，均由主席提请国府任免，经过这次改制后之主席，则不负实际责任，无任免五院院长

之权，由实而虚，两法完全抵触，这完全是迁就当时情势的不得已的措置。根据这个决议，选任林子超先生为国府主席，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数年来分裂的局面，至此在表面上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和平是实现了，但是否真正统一，还是一个谜。

“一二八”事变期中的香港民众运动 我在于全会闭幕以后，又回到香港。不久“一二八”的淞沪炮声响起来了！在华南的人听到了，自然要比“九一八”的沈阳炮声惊心得多。十九路军及第五军的英勇抗战，引起华南人民极大的兴奋。但因实力相差太远，终不免于败退，使闸北成为废墟。香港人民因此更起了一次极大的冲动，对于住在香港的日本侨民，加以激烈的攻击，日本商店的玻璃窗，都被打个粉碎。数十个日侨，或受伤，或击毙。香港政府对中国虽表同情，但为了治安及外交责任，不得不出而弹压。一方面通知日本人居家不出，暂避群众的怒潮。一部分日本人便自动的回国去了，以往那种目空一切的傲慢态度，也改变了许多。这一次对外的民众暴动，虽然有几个中国人进了英国的监牢，但日本人的枪炮，始终不敢向我射击。被打死伤的日本人，也无法取得优越的赔偿，可说是中国对外的民众暴动最便宜的一次。不过暴动的地点，不在自己的国土，而在英领的香港，究竟算不了什么体面的事！

劫后淞沪一瞥 战事至三月初，因十九路军及第五军之退出闸北而告结束，中日双方签订一个淞沪停战协定。我既不出国，就不能长久闲住下去，国家正在统一的时候，也急于赶赴南京，担任一种工作。当港沪轮船进了吴淞口的时候，同船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党政军民，无不群集船舷，引领眺望，由吴淞口以至闸北一带地区，真有偌大的吸引力，吸住了我们的视线，那些断垣残壁，瓦砾废墟，至为刺目，比读《吊古战场》文，不知要伤心多少！这便是“一二八”战役所赐予的啊！我到了上海，曾偷闲驱车到闸北、吴淞一带，对这个新战场作了一番巡礼。昔日的繁华，于今尽成灰烬。而被难的灾民，又纷纷在废墟之上，重新建立其生活

的根据地。我试问那个车夫说：“假使十九路军不抵抗日本人，上海是不是可以不致弄到这步田地？”他说：“假使我们的军队不打，这些地方的房屋财产，自然可以完全保存。但是国家的体面，却要丧失光了。现在仅仅是这个地方损失，而国家的体面仍得保存。依我看来，还是打的好。”他的语气中，似乎对我的问话，表示一种惊讶的不满意的态度。可见国民的认识是正确的，尤其这些劳动阶级的认识，实在比有产阶级要清楚得多，因为他们没有自己利害的关系呀！

十二　内政部工作时期

中央统一后之国府新阵容　二十一年的春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在首都南京举行，两广方面所有原来和新添的中央委员，都到来参加，这是数年来分裂后统一的实现。国民政府也就在这时候实行改组，林公子超，以年高德劭，被选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孙科任立法院院长，居正任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任考试院院长，于右任任监察院院长。行政院各部的人事，亦随之变动：我任内政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宋子文以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朱家骅任教育部长，顾孟余任铁道部长，陈绍宽任海军部长，陈铭枢任交通部长，陈公博任实业部长。陈树人任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这是和平统一后，中央政府的新阵容。但胡展堂先生在广州，仍有他自己的作风，两广依旧和中央对峙着。可以说这次国民政府改组，只是中央表面上的统一，而尚未达到全国真正的统一。

这个中央统一的新阵容，基础并不十分坚固，在三四个月内，行政院内部首先发生裂痕：交通部部长陈真如(铭枢)提出辞职。他辞职的原因，非常微妙而复杂，当时我不很详细知道，现在更记不清楚，但知中央对他的辞职，既不好断然批准，又不好坚决的慰留，结果是给予出洋考察的名义而另行派人兼代，这个代理人必须得到三方面的同意，作为过渡的桥梁，等到两方面都上了岸，然后再将这桥梁拆除，中国政治上的人事问题，类多

如此解决。这次陈真如辞职，我是被认为适宜的桥梁，而代理他的职务，一直等到两方面的人事都安排好了，才解除了兼代的责任。

不久，汪精卫又向中央提出辞职，并且立即离开南京，回到上海。这次的风潮比陈真如的辞职大得多了！当时行政院的各部会首长，因为院长辞职，同时都向中央提出辞呈，表示责任内阁阁员共同进退的意思。这次的风潮，我又是从中奔走斡旋的一个。这个轩然大波，随后由林主席出面，对全体分别予以慰留，但同时解释行政院并不完全是责任内阁制，暗示即使院长辞职，各部会长也应继续负责，不能全体辞职，致陷国家于无政府状态。我记得蒋先生亦有电报分致各部会长回京继续供职，可是有的是立即回京，照常办公，有的仍逗留上海。汪精卫更由上海迁居莫干山休养，表示政治的病态。我被推到莫干山去向汪氏问候，并劝驾回京，这个任务，虽未完成，而我却无意中游览了浙江的一处名山——莫干山。这里是沪、杭富有人士避暑消闲的地方，山虽不高不秀，而建筑布置却充分表现出人工的技巧，尤其是万竿翠竹，绿叶生凉，为他处所不及。山上有著名的肺病疗养院，据说整个莫干山的气候，都适宜于肺病的疗养，但是汪精卫的病，却是肝脏病，是否适宜，就难说了！我去见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好象有很重的病。陈璧君一见我便说："汪先生病得很厉害，医生要他静养，你切不可同他多谈话，使他心里不安"！并且同坐房内，好象监视一般。我将来意陈述，并转达了南京方面的意思，请他早日回京主持政治。他手指着自己的肝部说："据医生诊断，肝脏已经肿胀了好多，病情非常不好，不但一时不能回京工作，而且要到外国去作长期的休养。如果病好了，一定还要回来与大家共同努力。"他不肯和我谈政治问题，只是说些病症及多谢南京方面同人关心的话，弄得我无从开口，而陈璧君又频频要我到外面客厅里去坐，只好告辞出去。本来要人病多，时时都有些不易根治的病症带在身上，政治上一不如意，就会发

作起来。我既不是医生，自然无从诊知他病的真假轻重。于是毫无结果的回到南京，他不久也就出国休养。一直到二十二年春长城的战事发生，才回来实践他“共赴国难”的口号。

军事时期的内政部是一个冷衙门 内政部是在粮道衙门的旧址，民国元年，我在那里入伍当小兵，不料二十年后，我又在那里主管一部的事务，实不胜今昔之感。衙门是旧建筑，破坏不堪，没有其他各部的堂皇美焕，一望而知它是一个冷衙门。但是内政部在行政院各部会排列的顺序上，居于首位，足见立法的初意，视内政是很重要的工作。古人所谓“作内政以寄军令”，可知内政自古就认为是建国的最基本工作。可是因连年战事频仍，为适应当前需要，自以军政，财政为急先之务。加以国家未统一，军事未停止，内政的工作，实也无从设施。所以历来内政部等于闲衙，部长好似院内的备员而已。自十七年四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四年又一个月的时间，已更迭了十个部长。第一任为薛笃弼，第二任为阎锡山(未到部，由次长赵戴文代理部务)，第三任为赵戴文，第四任为杨兆泰，第五任为钮永建，第六任为刘尚清，第七任为李文范，第八任为汪精卫(兼任)，第九任为冯玉祥（未到部由次长彭学沛代理部务)，我已是第十任了。在行政院中，这可算是最冷落最不令人注意的衙门。革命政府之下的机关，仍不免有些北洋政府时代的习惯，即是有钱的非常阔绰，无钱的穷苦万分。我记得有一年年尾，很多有钱的部，不是发双薪，就是给奖金。这些冷衙门的属员看了，自然很为难过，很为不平，我为感情所驱使，不能不向他人请求帮助，在当时固然觉得非常难为情，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难过，在革命政府之下同一的机关工作人员，为什么有这种不平的现象，而一直到现在还是如此？

当时虽说是困难时期，有钱的人或有钱的机关，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总免不了公私应酬，各乐其乐的。我们那个穷衙门，自然谈不上如何的阔绰，在二十一年过年的时候，那里同仁，大家凑集

一些钱，作一次聚餐。并且由擅长游艺的同志举行一次歌咏会，凡是同仁及其眷属都去参加，情形也相当热闹，也算是穷人过年苦中求乐的办法。而南京的某小报竟大肆讥评，以为在国难期间，是不应该如此。弦外之音，似乎想借此题目，有所发挥。事情闹到汪精卫那里，汪精卫说："共赴国难，并不是如丧考妣的痛哭悲号。卧薪尝胆，不过是后人的形容词，难道真是夜夜卧着薪，时时尝着胆么？"这话，我倒颇同意他。同时想起社会上私人及公共的娱乐，不知要比我们部里一年一度的聚餐及歌咏会要奢华得多少，为什么就没有人看见，就没有人说话？

内政部的涵义是太广泛了，几乎把全国的行政都纳在一部的范围之内，且组织法上规定构成内政部的单位，为民政司、警政司、土地司、礼俗司、统计司，还有卫生署、全国禁烟委员会。每一个司、署、会职掌的事项，都是全国普遍性的，必须全国统一，而且要很多的钱，很多的人，才可以将工作展开。在民国二十年以前，全国各省正忙于分裂的内战，即使中央有很多的钱，很多的人，也无法展开工作。所以那时一般人对于内政部看法，仅是中央组织上一个形式的点缀品，并不见得是行政工作上的急要部门，一直到现在，这种情形还没有完全改变，中国因内政的基础不稳固，而影响到其他的行政工作，都不能有条理的顺利的进行，真是革命建国期中的一个重大缺憾。蒋先生在《中国之命运》上说："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国的帝国主义之手；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就是操在我们全国国民自己的掌上。"就是这个意思。抗战胜利之后，建国工作，更为繁重。近年以来，内政部原来主管的卫生、地政、水利等，虽已分别独立，而剩余的工作如地方自治、户政、警政、礼俗、统计等，其在国家行政上的重要性，仍是非常显著，实有加强努力的必要。

我在内政部的作风　我到内政部后，虽说在那种情势之下，不能十分开展我所主管的业务，但我的工作兴趣，并未减少。每日按时到公，按时退值，将过去部员闲散的风气，改变了许多。

那些例行的文书工作，固然有很多是无补实际的，但许多实际问题，亦须从这些上面探讨出来。在我代理交通部的时候，汪精卫曾对我说过："不如你就真除交通部，而把内政部让出来"。我说："我仍旧喜欢做内政部，因为我不是交通人才，而且那边情形太复杂，恐怕应付不了。"其实，我又何尝是内政人才呢？汪精卫说："不料季宽先生对于内政部的工作倒觉得有兴趣"。他的意思是这种工作，于我过去工作的历史不甚接近，未必是我所愿意的。也可以表示那时各部的轻重，不是以事业为标准，而是以收入的多寡及人的关系为标准的。我随将内政的重要性对其陈述，望他以后加以注意。我对于用人方面，是取量才器使的宗旨。当时部内除了新调一个次长甘乃光、一个总务司长黄祖培，及几个庶务人员之外，其余都是原班人马，不但出乎当时那些部员意料之外，并且打破了当时"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风气。因为中国政界的陋习，往往一个长官更调，部属亦大部随而调动，所以到任的时候，各方介绍人员的八行书，比公文书还多，应付非常困难，有些长官在到任之后，多在报纸大登启事，以局面狭小，粥少僧多一类的话谢绝各方对于人员的介绍。我既不愿登报，而对于介绍书信，除了必须答复者外，只好投诸纸簏，因此可省去许多的麻烦，但是也得罪了很多人。我这种作法，不但在内政部时如此，即在交通部及各省也是如此。而我的收获，即是随处都可发现有能力有才具的干部，为国家效力，为个人分劳，比较吸引自己有关系或视为亲信者要得力得多。而我每当职务交卸的时候，又省却了为所谓有关系的亲信者善后安置的麻烦。我常说："一个长官如果认为某一个公务员是自己的人，无异是侮辱了这个公务员的人格。某一个公务员如果自己认为是某个长官的人，亦无异于自己侮辱自己的人格。一个公务员职位的保障，要在国家的制度上，自己的工作上去建立，不能在人的关系上去追求，这才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光明现象。

我在工作上所遭遇的两个阻碍 我对内政部的工作，除了整

顿内部之外，首先想明了各省实际情形。因为我觉得中央与地方的隔阂，必须沟通，往往中央立法，因不明各地方的实情，以致制颁的各种法令，地方无从奉行。因地方之不奉行中央法令，遂引起中央与地方意见之分歧，由彼此意见的固执与扩大，而演成中央与地方之对峙分裂的形势。很多不幸的重大问题，其起因都很轻微的，若能从这些地方着手注意，于国家之统一，政令之推行，未尝不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于是我在行政院会议上，提出增设内政部简任视察人员，派赴各省，视察政情，以沟通中央与地方的政情，但因这种工作，不是低级人员所能达成任务。于是会议席上有些人因为不明白这种作用，以为是增加高级人员太多，经费的支出太大，而不予通过，使我非常失望！我又鉴于全国水利机关，如华北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太湖水利委员会，有的是属于内政部，有的是属于其他部会，或者是无所隶属的。内政部组织法上既有掌管全国水利行政的明文，自宜设法统一，以便管理。我曾将这个意见，签呈蒋先生，蒙他采纳，准用他的名义叙案提出中央常会讨论。但是因为人事利害的冲突，虽然原则通过，而无形搁置，无法实行，这是我在内政部工作时期首先受到的两个阻碍。我才感到全国各省的真正统一，固然很不容易，就是在首都的范围里，要求各部门工作的意志与步调的统一，也很困难！

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　在二十一年的十一月间，内政部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全国各省的民政厅长，省、市警察局长，都来参加，即当时尚在对峙中的广东、广西的厅长、局长，亦都到来，情况空前热烈。不仅会议本身的收获良好，而会议以外的政治的收获，尤为伟大。中国的政治问题，是最复杂的，在统一中有矛盾，在矛盾中有统一。比如在分裂时期中，司法是统一的，邮政是统一的，海关是统一的，教育也有一部分是统一的。在陆军大学里，各方面的学生都在一个讲堂里面，一同学习各种作战的方法。毕业回去之后，就站在各人的立场上敌对作

战，好象战国的时候孙膑和庞涓同师鬼谷子，后来各事其主，而互相残杀。历史的事实真有遗传的么！这次的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也就充分表现矛盾中的统一。这种情形，真有些令人费解？

这一次会议的内容，虽然很复杂，我们是设法使它简化。比如民政、警政、土地、水利、礼俗、卫生、统计等，都是先由部里作成各种详细而具体的方案，在提案审查时，将各省的提案，研究其是否可行，而分别归并在某种方案之内，再提出大会讨论，使各方面的提案，均成为大会的提案。因为过去一般人对于各种会议的性质，尚未能认识清楚，不论任何会议，都以为同国会的性质一样，某人要争某人提案的通过，某地代表要争某地的提案通过，某党要争某党提案的通过。国会的会议，就是政治斗争的舞台，这种斗争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可是行政会议的性质就不同了，它是施政的方针与方法的决定，并不含有政治斗争的意义，并且应该设法避免含有政治性的斗争。如果在这种行政性的会议而含有政治性的斗争时，不但这个会议的本身得不到好的结果，而且要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统一问题。因为那时候国家的统一，尚在动荡之中，我之采取这种办法，固然是会议上的技术问题，亦顾虑到政治上的问题。所以第二次内政会议，不象其他会议，决议了几十百件的提案，或通过了某人或某地的提案，而是得到推进各种业务的几个完整的方案，可算是一种创作，也可算是这次内政会议的一种收获。我以后在各省任内所举行的行政会议，都是采取这种方式而逐步加以改良。现在各省各地举行各种业务会议，亦多采用这种方式了。

在内政部掌管的几项主要业务，我现在回想起来，尚有分别作比较探讨的必要。一方面固可明白当时内政不能进展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可为今后推进内政工作的参考。

县政建设问题 最重要的是县政建设问题。国父在建国大纲上规定县为自治的单位，也可以说，县为国家的基石，一切内政

设施都要透过县的组织，才能开花结果。县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但是自民元以来，县的制度是破碎了，各省有各省的作风，一地有一地的办法，还比不上满清时代在形式上——人事与组织——倒有一个统一的规模。各省的情形如何，我不知道，单就我所经历的广西来说，在民国十六年以前，就不知变了多少花样。这种变化，多半是根据主管人的意见，及当时财政的状况而决定的。在我的任上——民十四、五年间——曾行过县政包办的办法，即每个县政府，仅由省政府委了一个县长，规定其每月应用的钱，至于组织如何，人事如何，省政府就不再过问，省所要求于县的，亦仅是田赋的收入，治安的维持，其他的问题，就视为无足重轻了。所以在那个阶段里，当县长的，对上级政府仅是系统的关系，人和财的关系，而对地方的行政设施，可以凭着各人的良心与见地，为所欲为的做去。有若干人的确为地方上做了一些好事，但是贪污枉法，或是无所建树的人，也就太多了。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于十七年九月公布县组织法，十八年六月，修正重颁。这个组织法的内容，与各省实际的情形相差太远，实施的结果，成效不著，而且有很多显著的缺点，以致不能完成建立县政规模奠定自治基础的功能。

那时候政府对于建立县制的情形如此，在野的人士，却很有些人各就其理想，致力县乡建设的研究实验工作。他们的动机，也许是因为对于现行地方政制的失望，而想在县以下的的乡村，作为研究实验的对象，然后进而及于一县，以探求地方建设的途径。所以那时候是谈村政的人多，而谈县政的人少。如河北的定县、山东的邹平、河南的镇平，都是在野人士从事村政的实验基地，这对于以后县政的演进有很大的关系。我为了要明了各地实验研究的情形，以为改进县政的参考，特先去定县作实地的考察。

定县的实验工作，是晏阳初，陈筑山等领导的，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为领导的组织。他们认为目前中国人民所患的病症是

贫、弱、愚、私四个字，要医治这四个病症，必须从教育着手；以生计教育治其贫，以卫生教育治其弱，以文艺教育治其愚，以公民教育治其私。他们是完全站在教育的观点上来从事乡村的改造的。他们所用的经费，是美国煤油大王洛氏基金捐助的，并且还有一个美国人参加这个工作，因为煤油大王同情于中国无教育的人民，在他赚来无数的金钱中，拨一些出来作为一个慈善的试验。数目的多少，虽无从知道，但我想总不会比他在中国赚的钱百分之一还多吧！

我在定县参观了两日，城里乡下都到过了。站在教育的立场来说，确有好多地方是相当成功的。他们要我批评，我说："在现社会里，如果离开国家的行政系统，想从旁得到政治上的成功，是不可能或是极不容易的事。平教会的目的是政治的改革，所用的手段是教育的方法。想单独用教育的方法来达到政治的改革，就是有政权的关系，亦属不容易。若果离开了政权的关系，那就更困难了。"我希望他们要进一步的透过了政府的关系，以期收到更伟大的效果。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士，认为自己都是清高的，官吏都是污浊的，而不知道清高的人士不肯积极参加行政工作，担任政府官吏，可以使行政界中，愈加没有干净的人。同时这些所谓清高的人士，一旦作了官吏，是不是能够长久保持他的清高而不同流合污起来，也是一个问题。

邹平、镇平的研究工作，都是以乡村建设为基础的。我因时间的关系，未曾前往参观。他们的作法不同，收效各异，不能相提并论，却都引起了当时社会上的注意，因此产生了实验县的设置：定县方面，是霍六丁担任实验县的县长，广西方面亦设了一个实验县——宾阳实验县，由定县平教会聘去的汤茂如担任县长。山东的邹平、荷泽等都陆续改为实验县。以后他们所收到实验研究的效果怎样，不得而知。更进而有江宁实验县，兰谿实验县的设置。各省亦有相仿的设施，这就是当时县政演变的情形，也是我国县制改进史上的重要过程。

派员赴各省筹备地方自治　实施宪政，为本党革命建国的终极目标，地方自治的实行，又为实施宪政的前提，一个自治之县，必须完成建国大纲第八条所规定的条件。所以在训政时期的县政工作，就以完成地方自治必备的条件。但在当时（民国廿一、二年）有好些省份刚脱离军政时期，有好些省份还在军政时期。要整齐划一的同时实施起来，当然有很多的困难。而在内政部的职掌内，自治是首要的工作，若等待全国各地训政时期的完全到临，而再同时开始自治工作，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我以为不管怎样困难，准备的工作，总应该先着手进行。在全国第二次内政会议之后，我就决定由内政部委派各省自治筹备委员，协同各省政府筹备自治工作的进行。在当时部里要直接委派人员到各省去筹备自治，也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有些省行政当局，认为自治与官治是冲突的，至少认为自治时期尚未到来，所以在人选的方面，就大费斟酌。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找到各省可能接受的人。结果总算还好，选派去的人员，没有被挡驾回来。有的人到省以后，工作进行非常顺利，有的人在省里闲着没有事做，但在当时的情形，也只好任其如此。派到各省去的人，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派到浙江的是许蟠云。

自治与保甲　从廿一年至廿四年间，正是中共在作历史上大流血的时候。为对付他们，在地方行政组织上，恢复了古旧的保甲制度，表面上看起来，保甲与自治是冲突的。所以当时在南京，就有自卫与自治之争，好象保甲是自卫的组织，是官治的工具，与自治根本不相容。但事实上，保甲制度因为组织上的严密、与法令上的严厉，对于人的控制、事的进行，都发生很大的效力。所以当时又有先办自卫，后办自治的折衷论调。其实保甲组织与自治组织，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方法上一个是自上而下的要求，一个是自下而上的发展。而在当时的形势与需要，自下而上的发展的效率，是比不上自上而下的要求来得迅速有效。所以在那时候的环境与需要，实施保甲制是必要的。就在抗战的

期间，保甲制度亦发挥了伟大的效果，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当时持反对论调的人，一方面仅是在表面上立论，同时还受到另一方面的影响。因为这种严密控制的组织，是反对中央统一的人所最不利的。于是就在自治的理论方面借题发挥，做出他们别有用心的文章来。

报纸刊物等的审查问题 内政部的职掌，好多是被割裂的。如报纸、刊物的登记检查，图书、杂志的审查，电影戏剧的审查，依照规定都是内政部主管的。但这些事项，当时真正的管理权却不在内政部，而在党部及其他的部会里，内政部对于这种工作，就好象一个备员，并不十分过问。我到任后，觉得这个情形，不甚允当，总得认真去办理才是。纵然不能完全由内政部掌管，至少亦要与其他机关有同样的努力，才不负了应负的责权。我确定了这个工作态度，起初就不免有与其他机关发生争执的地方。最有趣的事，是电影检查，他们以为这是专门的技术，至少要懂得英文才行，内政部恐怕没有这种人材，所以就由他们作主了，但是内政部派出去的人，英文程度也还不错的。

礼俗问题 礼俗也是内政部主要的职掌，专设一司来主管其事。我对于礼俗，根本就没有研究和兴趣，尤其是这一司的主管人员，不易物色。老的一派人，他们所知道的是古礼旧俗，新的一派人，他所知道的是洋礼洋俗。我觉得在那时候或是现在，我国的古礼旧俗，是否值得维持或恢复，而洋礼洋俗是否适合中国的需要，都成为问题。在当时虽然并不成为社会上的争端，亦因为不成为社会上的争端，所以就这样的马马虎虎下去。不但内政部无改良与规定，就是中央最高当局，也未决定若何的原则。所谓礼俗司，就是一个极无作用的机构。礼俗原是社会上通行的一种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是自然演变的，而不是硬性的规定，更不能作永久的规定。在世界交通发达，国际关系密切的现代，必须在国际之间探求一种适合国情，适合世界的良好礼俗，我们若果还抛弃不了旧的东西，而“敝帚自珍”，那我们就跻不上国际之

林，而且要影响到种种思想物质的进步。

我在内政部的期间，是两年又八个月——二十一年五月至二十三年十二月。自国府设置内政部以至我卸任时止，我算是任期最长的一个。但是我觉得自己对于内政上的贡献太少了。这固然由于我个人没有内政的研究与经验，而当时环境的限制，亦是重大的因素，这个首席部直到现在，还是不怎样为人重视。我在这两年又八个月中，真正致力职掌内的事，实在太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东南西北的奔走中过去了(见另章长城战役、宣慰内蒙、筹备远征新疆)。这种奔走对于国家有没有益处，是另一问题，而我个人则增进了很多的认识。因此有人说我不是内政部长，而是内交部长。

每当我去奔走的时候，部里的工作，都由甘次长乃光主持，他是留学美国研究行政学的，他为提高行政效率，想将研究所得，从部里着手实施，而推及于各省。首先实施的是公文处理程序的改革。他曾费了很多心力，研究出普通机关处理一件公文，从收发文到印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并提出如何简化程序，以节省时间的改进办法。这于行政效率的增进，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内政部主管新闻杂志的登记、图书的审查事务，全国各地所出版的各种报章刊物图书，无一不须送到内政部备查的，以前各省的省志、县志存在部里的也不少，是以内政部实为全国出版品荟萃的中枢。可惜二十多年来没有人把它整理保管，而任其散失。甘次长对此却极为注意，亲自督导整理，成为一个拥有十余万册的图书馆。这件事于以后资料的保存及行政研究的参考，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内政年鉴也是我任内着手编纂的。我交代的时候，这些事物，也算是交代成绩的一个重要部门了。

我的后任是黄膺白先生，他是长城战役后北平政务委员会的主席。那时他曾邀我当政务委员会的委员，我因内政部长的身份不便应许而婉辞了。后来北京政委会改组，他奉命改任内政部长，内政部就好象内外大员停转的传舍，亦是一件有趣的事，可是他未到任就因病去世了。

十三 长城战役

国联调查团来华 自"九一八"之役，东北军事当局因不抵抗而丧失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土地，至"一二八"一役，上海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奋起抗战，予日军以相当的惩创。结果，虽仍是失败，但因此而使日人知道中国尚不可轻侮。同时他们也还顾忌到上海为世界各国在中国之最大市场，恐怕引起国际的干涉，不得不接受英美各国之调停，而成立了淞沪停战协定。经此二役之后，我政府及社会人士，既感不抵抗之足以亡国，又鉴于抵抗亦不能胜利，乃要求国际联盟，出而制裁。这样一来，却弄得国联左右为难。他们对于制裁日本，自觉无此力量，对中国合理合法的请求，又不能置之不理，乃以拖延敷衍之计，冀免拆穿"纸老虎"。他们的办法，是以调停为名，组织国联调查团，由英国李顿爵士率领，待淞沪战事风平浪静，才由欧州动身东来。先到日本，取得他们的同意，然后再到中国来。他们在上海，在南京以及在北平，都受到中国官方空前未有的盛大欢迎。一个被强盗劫掠的人家，强盗还盘据在他的屋角，正作继续洗劫的计划，事主亟向政府报告，请求缉办，而政府不马上派兵剿办，先派委员来调查实情，已属非常滑稽。而这被劫的人家，反要对这调查的委员作盛大欢迎，希望他能够秉公办理，驱逐匪徒，追回失物，那更可怜之极了。我那时虽在南京，有参加这种欢迎贵宾宴会的资格，但是由于内心的驱使，也不愿前去凑热闹，所以对于这种强颜欢笑心痛肉麻的一幕剧情，也就无从描摹和记述。后来我在津浦路的火车

上，同那些办铁路的朋友，偶而谈起。他们告诉我这么一段故事："因为欢迎国联调查团北上，把全国铁路上所有最漂亮的花车，都集中起来，加以整理消毒。唯恐外国委员发现臭虫，要笑我们铁路办得不好，而影响到调查工作，将会不利于我。由调查团北上到回来，只津浦、北宁两条铁路上的员工，真是小心翼翼，比之侍候前清的皇帝坐火车出关，还要周到哩！"即此一端，可见我们对于国联调查团的重视，与对国际联盟会的信赖。不错，他是解决国际纠纷的权威，也是收回东北的主宰。我们希望因不抵抗而失去者，仍从不打仗而收回。对于他们所派遣的调查团自然应该待之以上宾，敬之如神明。然而中国毕竟是失望了！调查团回来了之后，不但东三省收不回来，反多花了大笔招待费，所得到的，不过是一本不着边际模棱其词的李顿报告书。"赔了夫人又折兵"，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下台不得。自己没有国力，而一味依赖他人，结果总是靠不住的啊！

东北日军得寸进尺　日本人在东三省，一面是以酒食敷衍调查团，一面是用武力"肃清"马占山、苏炳文的义勇军，给调查团一个不好看的颜色，等到调查团离开辽宁之后，他们的"肃清工作"，也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并且渐渐迫近热河的边界，准备继续向关内进攻。中央见事态愈趋紧迫，一面令张学良所部，准备抵抗，并调集华北部队，准备应援。那时中央大多数军队，因受江西中共牵制，无法调动。至民国廿一年冬，蒋先生乃命我同训练总监部徐副监景唐南下，和广东当局商量。希望他们能出兵江西，担任剿共任务，好让中央的军队，抽调北上抗日。我们到了广东之后，与他们商量应酬了好多日，都得不到要领，有一天的早上广东当局邀我去谈话，很坦白的表示："不但现在的情形，广东方面，不能出兵。就是日后情形再恶化一些，广东也不能出兵"。我得到他这个答复，固然是很失望，很懊丧，但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很诚恳的。此公同我是多年的朋友，也可以说是同过生死患难的老朋友。他开头就说："我同你是老朋友，无话不

可以直说。如果我用假话来敷衍你，不但对不起老朋友，而且会贻误了中央的计划。我所以不能出兵的理由，想你也明白，不必我细说了。”我得了这个失望的确实答复，只好离开广州，匆匆回去复命。他派专车送我们到香港。我同徐景唐说笑：“二十块钱的头等特别快车不坐，要我们坐专车。”因为我们急要离开了这个失望的地方，恨不得立刻就走。坐专车要迟慢一小时多的时间，真感得太慢了。而且还要给侍役赏钱五百元，才不失坐专车大员的体面，这笔开支，由那一个出呢？岂不是太不合算了么？在车上，愁颜相对，作叶子戏消遣。说明谁负了，谁出赏钱。结果我是赢了，作了“大好佬”，钱却是他出的，这也是百无聊赖中的一件趣事。

奉命北上指挥长城战事 我回到南京，只好据实报告。这时热河的战事，已经发生。中央仍是调军北上。但数量不多，仅徐庭瑶一军第廿五师、第二师、第八十三师。而东北军及孙殿英的部队，都陆续的由热河边境，及赤峰方面败退回来，长城的情势，日紧一日，蒋先生命何部长敬之主持北平的军分会，指挥长城作战的军队，并且组织一个参谋团，要我担任参谋长。我对于这种对外战争的工作，无论任何名义，甚至没有名义，都是愿意担任的。就随同何部长北上，同行还有宋部长子文，他表面上好像是筹划北方作战的军饷，而实际上恐怕还有其他的秘密活动。我们是由南京乘津浦路火车到徐州，再转陇海路东段平汉路北段而达北平。这样绕道行进，是惟恐经过天津的时候，日本的驻屯军，会对我们发生不利的举动。我们到了北平，都住在南海的居仁堂内。这时候的北方军，都是张学良负责指挥，但东北军是节节的败退下来了。他虽然很告奋勇的要率领他驻北平附近尚未作战的部队，到前方去，与敌作最后的决战，以洗雪他不抵抗的声明。但是他的身体实在太坏了。我们曾在顺承王府见到他，差不多每隔一二小时，就要注射一次吗啡针。每日要在中午十二时以后，才能起床办公。这样的人，要上前线去作战，身体能否支持，

固然是一个疑问。此外新近调来的西北军、中央军，是否肯接受他的指挥，也成问题。所以张氏的下野出国，便成了长城战役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了。数天之后，蒋先生到了保定，何部长、张学良和我，都奉召赴保定。蒋先生除了指示军事的部署之外，并决定了张氏出国的问题。我们回到北平的次日，张氏即自动辞职，出洋考察，而且即时离开了北平。何部长才正式接收北平军分会，我也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

我们的军事部署 这时的敌人已经占领丰宁、承德（热河省会）、平泉、陵源、陵南各地，继续的向长城推进，分向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各要隘进攻。但榆关（即山海关）的正面敌人没有什么动作。第一个原因，是山海关的天险，比较难攻。其次喜峰口、冷口攻破之后，山海关的后路，已被切断，可以不攻自破。我方的战略，则在固守各要口，依据万里长城古代筑城的国防要塞，与天然的险要，拒止敌人进入关内。以徐庭瑶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以宋哲元军担任喜峰口方面，何柱国、王以哲军担任冷口及山海关方面，并调山西绥远方面的部队，由傅作义指挥，担任张家口一带防务。这种部署，可以说完全是被动的，并无积极的企图。因为这并不是全国整个性的有计划的战争，而只是局部的消极的应战。而在敌人方面呢，亦是秉着蚕食中国的大陆政策，希望完成首先占领东北四省的企图，并掌握长城各险要，以为日后继续侵占平津之准备。我们的部队，除东北军孙殿英一路由热河作战下来之外，其余都是由各方陆续调来，各部队到达长城各口的时候敌人也到达口外了。

各口的战争 在古北口方面，我们廿五师就和敌人在那里发生了遭遇战。关师长受了伤，他是此次中日战争中首先受到阵伤的将官。他回到北平协和医院来医治，不知有多少青年男女代表，以及机关代表，向他慰问致敬，几乎哄动了整个北平城，这真是他的光荣，也就是国家的光荣。古北口虽然失去了，但在口内的要地，仍旧支持了很长的时间，第二十五师有一连人在一个山头

上作战，大多阵亡，只剩下十多个人，敌人要他们投降缴械，那个最后率领的班长拒绝了，并且拼命搏斗，杀伤敌人一百多，结果是一个个都光荣的战死。敌人随后为他们立了一个碑，题曰："中国的勇士"。日本人的确做得出，他不但对于勇敢的敌人表示敬意，而因此给予自己的士兵，一个很大的鼓励。其实为保卫国家而勇敢光荣的战死，确是值得任何人敬仰的啊！此外可歌可泣的故事还很多，不一一记述。要之在这方面的战事，要比其他方面激烈得多，这是中央部队精神的表现。

在喜峰口方面，我们先占有地利，敌人进攻，比较困难。宋军（西北军）素来是以能守著名的。敌人攻击多次，均被击退。有一次，在夜里大举逆袭敌人，获得很大的成功。听说俘获了他们坦克车与大炮，及许多的战利品。西北军每个士兵，都佩有一把大刀，雪亮的锋刃，柄上缠着红绿相间的毛绒与红布，好像戏台上耍武把戏一样，确是鲜艳夺目。军中刀法操演与枪法的操演，同样重视。不知他那次逆袭的胜利，究竟得力于大刀呢，还是得力于枪炮呢？这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而全国的报纸上，尤其是上海各报，就为大刀队大吹大擂，写得活龙活现，说是敌人个个被大刀砍死，因而敌人望见大刀队，就害怕得发抖。上海妇女慰劳会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两女士，还特地到喜峰口去慰劳，并且手捧着大刀，摄了一个照片。她俩到北平来见我，同声的说："这把大刀，还有敌人的血，留在上面呢！"我听了实在有些好笑！她们好像只知道喜峰口的神秘大刀队，不知道其他各口的部队，同样的在那里作壮烈的牺牲，而不去慰劳。我说明了，她们还觉得惊异。停战后，我在上海与申报馆的老板史量才谈起报纸鼓吹大刀的问题。我说："新闻界不去鼓吹正规军的新式武器，而来鼓吹大刀队，不是又要演出义和团的老把戏了么！"他说："新的没有得吹，只好把旧的来吹吹。"我当时叹了一口气，我们的抗战如此，我们的新闻界也是如此。

处理孙殿英部 其他各处，也很激烈的战斗，但是比之古北

口与喜峰口，规模要小一些，所以也不为人所注意，我也不能十分记得清楚了。军分会的命令，本来是要孙殿英的部队固守多伦的，但是他退下来了。据说："只遭遇敌人的少数骑兵飞机轰炸，就溃退了，情况很不明白，军纪极坏。"何部长要我前往视察处理。我由北平乘火车到张家口，这时傅宜生（作义）驻张家口，我就同他坐汽车经张北县、沽源县，到达多伦西南约一百公里平地脑包，邀孙殿英来面谈。因为他的部队，都退到了那附近的地方。据孙氏说："多伦在地图上虽是一个大地名，但是人烟稀少，给养困难。而且四面都是荒漠平沙，无险可守，就是没有敌人到来，我这两三万人，也不能久居那里。既没有兵站，又没有积储，不待敌人来打死，也必饥死。所以说我军纪太坏，事实上我是不能不承认，因部队自开多伦之后，就没有接济，不由自己就地征发，那来得食呢？至于说不见敌人就溃退，请部长看看我那些伤兵，那里来的呢？务必请部长将我的实情，转报何部长，并且妥为处理，我一定服从命令，绝无二心。"我听了他的话，认为也是实情。在那个株树不生的平坦地形，正是飞机、坦克车，骑兵发挥威力的场所，不要说是孙殿英那种部队，就是极好的队伍，如果没有足以抵抗的装备，也是不能固守的。至于他没有二心，我也无法判断，在那时却不能不先整顿他的队伍。于是我答应拨给他四十万块钱，四万袋面粉，并指定他在沽源独石口对北对东布防，这事处理完毕，我就回到北平来。

游览古宫与古物南迁　北平是中国的古都。民国四年，我在北苑入伍的时候，虽也到过，但那时不过入城访访友，及听听京戏，吃吃小馆子，就渡过了一个星期的假日。而且北苑离城还有二十多里，一来一往，已经费了好多时间，又不是每星期都可以出来，所以好多地方，都未曾经历。而那时也还有好些地方，尚未开放。这次在军事稍暇的时间，就想到以前未曾到过及不能到的地方去游览游览。古物陈列所是内政部的附属机关，我当一个主管部长，自有前往视察一下的必要。那些古物名称、种类实在太多

了，那时我对于这些古董，根本不发生兴趣，不过问问他们保管的情形，也没有工夫去注意它，考究它。同时又去参观故宫博物院，这里的古物，比古物陈列所还多得多，并且更名贵些。除此之外，我还到各处宫殿去瞻仰瞻仰。在这次游览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中国最后一个洪宪皇帝的宝座，与他的仪仗。洪宪宝座是用紫檀木制成的，和广东最古老的酸枝木大椅差不多，但是四条腿很短，坐的地方很阔，虽有好多精致的花纹，如果没有人告诉你这是洪宪皇帝的宝座，你一定不会知道他的价值和用处。后来我才想起袁世凯的腿子最短，身子很胖，所以要做这个怪模怪样的东西才合他的身材。可惜他尚未坐上去，就倒下来了。我想："如果他真的坐上了这样一个笨家伙，究竟是否舒服，倒也是一个有趣的谜。"这几件东西，是不公开展览的。据说："是恐怕有失民国的体面。其实还是恐怕洪宪时代的旧人看到了，有些难为情，倒是真的啊。这次参观使我感得惊异的，就是古物陈列所所长问我："要不要带一两样东西回去？"我听了这话，非常难过。便责问他道："这里陈列的东西，可以任由你送人，任由长官来要的么？可见你们保管的不尽责任了。"他听了我这样的话，就转口说："并不是这里已经陈列的东西，而是有些比较次等，认为不必陈列，且没有登帐的东西。"这些保管人都是以前传下来的，中间的弊病很多。据我所知，可以拿假的东西，来换真的东西，所以陈列的东西，是真是假，外人无从分别。而那些保管人又是社会上所称"考古专家"，他们说是真，那一个同他辨别呢？不久，古宫博物院的盗宝案就发觉了，当北平军事最紧张的时候，南京方面要将这两处宝物南迁，而北平方面则以北平地方的繁荣，全靠这些宝物来镇压，纷纷起来反对。终以"国宝"应该由国家来保存，决定迁到上海的四行仓库去储藏。这是因为恐怕自己的国力保护不了，还要借租界外人势力来保护的意思。因内政部有保存古董的责任，为填重起见，对南迁的事，特地会同各方办理。派来办理的部员，到了北平，就向我来请示。那时候军事正

忙，我对他们说："整个河北、整个北平，就要丢了，它的代价，不知比宝物大得多少倍，我必须用全力去保护这些土地，那里还有心机去管宝物？我是重人重地不重物的，随你们怎样办去就是了。"这就是国宝南迁的经过。"八一三"之后，这些宝物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反正都是一些历史的残余，我觉得并没有很大的价值要保存它，还是积极充实国防建设，才是正当的办法。不然的话，国土丧失了，国家灭亡了，即使留得那些国宝，又有什么用处。而且国之不存，宝将焉附，东京柏林的博物院里，存着好多中国的古董，不是庚子年从北京搬去的么？

颐和园的天鹅 我有一次同何应钦逛西直门外的颐和园，这是北平最著名的名胜，那里的景物，的确是太美丽了！我最爱的是排云殿的雄伟，长廊的爽直，站在万寿山上，全园的美景，都收入眼帘，真是心旷神怡，几忘却长城边上的连天炮火！我们想到慈禧太后那时的国难情形，也和现在差不多。她居然有这样伟大的魄力，移巨大的海军经费，来建造颐和园。把整个国家的大海，筑成园内的小海，把整个国防巨舰，改建游玩的小轮，这个设计，真象征着当时幕燕釜鱼的朝政，这等苦中作乐的精神，千古能有几人？但未知这位太后以及后来游览的人，有没有受到这种象征的暗示，而发生和我们同样的感想咧！我们到了这小海岸边，看到成千论百的白色天鹅，正浮游于泮冰绿水之间，玩味那春天的乐趣。它们万不料在这洞天福地之内，会蒙到狙击的危险。何敬之与我，一向都好猎，随行都带猎枪。我们见了天鹅，猎兴大发，便动着射击的念头。事前曾有问过管园的人，可不可以射击？你想一个是军政部长兼北平军分会的委员长，一个是内政部长兼军分会的参谋长，要射杀一两只天鹅，那里会成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便开始射击。轰！轰！这是它从来未曾听过的枪声，于是惊飞满天，好似白云朵朵的盘旋在海子上面，徬徨着不知所往。等到枪声止后，它们又飞了下来，真象一群从未经过战事的民众，乍然听见警报，就惊慌万状，一到警报解除，又似燕雀处

堂，呢喃自得了！我们两人前后一共射杀了四个。天鹅是一种贞禽，它的伴侣，是终身不变的，万一雌雄中，有一方遭遇不幸，则另一方不能再有所欢，而永远过着它悲惨的孤独生活。所以当我们射杀这一只的时候，那一个就不避危险的宛转悲鸣，前来救护。有的是和它的伴侣，同归于尽。这种爱的勇敢，值得我们感动，于是就停止射击。次日，何应钦请客，就以天鹅肉作名贵的佳肴，所有那时华北的高级将领，及重要的政治人员，都尝到了天鹅肉的滋味。中国社会流传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其实天鹅肉非常不好吃，简直同老牛肉差不多，吃在口里，索然无味，不知为什么流传的俗谚，会形容得那样美法。也许当日我们那些人不是癞蛤蟆，所以就觉得不好吃了！这是我们在北平的时候一件趣事，但也是一件煞风景的事，到现在，我还是耿耿不忘。

北平的新价值　有人说："北平实在太好了！中西合璧，贫富咸宜，各安所安，各乐所乐，有很多为别处所找不到的特色。"其实这都是一种消闲享乐的看法。它没有一些蓬勃的生机，而只是深沉的暮气，笼罩着偌大的城垣，在历史上不知埋葬了多少的英雄豪杰，不知消磨了多少志士青年。它只是葬送历代皇朝的坟墓，而不是开基创业的源泉。雄伟的皇宫，虽值得景仰，而沦落的皇子皇孙，尤令人悲哀不已。煤山的柏树，是缢死崇祯的工具，南海的瀛台是困死光绪的监牢，历史上的悲剧，无一次不在那里演出，残渣剩滓，那里值得赞美和留恋。然而就中国地势讲，北平的重要性，是不能磨灭的。他是控制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外蒙古、对内对外军事、交通的枢纽，是我们国防上的重镇，同时河北省境内储藏有相当丰富的铁和煤，四邻各省，无论矿产与农产，都以这为集散地。故在经济上，亦为适宜于建设轻工业重工业的区域。因此我对于北平，不是重视它的陈旧静止的历史，而是重视它重新创造的将来，但不知这个希望，何时才可以达到呢？

德国军事顾问 同我在北平担任作战的指导工作的，还有德国的顾问团总顾问弗而采将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军官。据说：曾经担任少将级的职务，他们对于作战上的规划，并不见得有若何特别高超的见解，而都是我们可以见得到的战上略或战术上的一般原则。并且有好多地方，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军队的情形，而在计划上，就与我发生参差的意见。例如在同样大小的区域内，他认为用同等力量的若干个师就够了，而我认为这一个区域不够，那一个区域却够了，甚至还有多余。又如这一部分军队，他认为应该放在另一区域内，因为他不明白中国的军队在指挥系统上，有人的关系，在战斗力量上，编制的大小，武器的精劣，训练的久暂，干部能力的强弱，也各有不同，但他们以德国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军队，也同德国的军队一样，来拟定作战的计划，就不免发生种种的错误。但这不是他计划见地的错，而是我们军队内容的特殊，没有一定的标准的单位力量，可以用科学计算的方式，求得正确的结果。而是要计划者熟悉内幕一切的情形，用感情的神秘的方法，来指挥调度。我对他说明之后，他才恍然大悟。他说："为什么不把他们统一起来呢！"这话，我可难以答复了。他又对我说："要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增加，不但要充实武器，严格训练，同时还要在服装方面去改进，有很好的服装，才可以养成他们的自尊心，不但军风纪可以进步，战斗力量，也可以大大的增加。因为要发挥至高无上的战斗精神，一定要能自尊的人，才可以做得到的啊！"我觉得他这种见解和理论，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随后他回德国去了，中央又聘了一位德国鼎鼎大名的塞克特将军为总顾问，他在德国当了很久的国防部长，他是凡尔塞条约后保育德国陆军的慈母。有一次，在庐山蒋先生公馆内相会，蒋先生指出很多问题来问他，他的答复，我觉得是很谨慎，也很平凡。谈到对日的国防问题，他说："最危险的是这条扬子江，必须沿江建筑要塞，及设备很多的流动炮兵，否则一旦开战，日本的舰队部队，就可直捣汉口，打击到全国的心脏。"

这种意见，难道我们都不懂得，而要一个德国的国防部长来当我们的顾问么。所以我认为充实中国的国防建设，而聘请外国高级的理论顾问，实在有些不切实用。因为中国历史传统下来的战斗理论，战斗原则，如孙子兵法等，都是相当正确，也可以说世界上谈兵的理论和原则差不多都是同样，没有很大出入的。但是此等谈兵的理论，也仅仅是一个最高的空洞的原则。要实施起来，还需要极大的物质，极多的技术，与执行的坚强干部。现在我们所缺乏的不是最高的空洞的原则，而是物质技术与执行的干部。由民国十三年，以后聘请的苏联顾问、德国顾问、法国顾问、意国顾问，而又回到苏联顾问，恐怕都犯了这种的错误，得不到多大的好处。

战事失利北平告急 战争虽在长城各要口稳定了一时，但以我们劣势的装备，单凭官兵的勇敢牺牲精神，与那个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古老而颓废的万里长城，总经不起敌人飞机的轰炸，和坦克车大炮的冲击。到了四月间，各路部队，都渐渐的败下来了，最初是冷口方面的敌人，进占遵化，宋军乃不得已而退守玉田、丰润以北之线，古北口方面敌人，更逐步进占密云、怀柔，逼近顺义，离北平的地方，不过是四十多里远近，这时候虽已调到山西军队的一部，由昌平方面出击，亦不发生很大的效果。后方又无军队可抽调，而且远水不救近火，北平空虚已极，人心恐慌万状。同时接得情报，已有人在平津酝酿类似伪组织的活动，并且还有一些不愿再向南方撤退的部队，参与其事，形势恶化，已到极点。一天的下午十二点钟，军分会的机构已准备撤离北平，并在马厂的小站上，准备了火车，各人的行李，亦已包扎好了，等待命令一下，就要上车。何敬之、黄膺白、张岳军、王仑、李择一和我一共六个人，在那里作最后之会商及部署，据黄膺白报告："由日本驻北平武官方面所得消息，如果中国方面肯派军使向关东军要求停战，便可立即停止进攻北平，用外交方式，来结束此次战事。并希望在夜里二点钟以前，给他们答复。"我们会商了许久，有主张撤退以保存北平的，有主张先进攻东交民巷的日使

馆及驻军，而背城一战的，有主张派军使商量停战的。因为事体重大，那时北平的长途电话，与南京庐山，尚未通达，无法向蒋先生请示。因此不能立刻决定采用何种主张。最后我提出意见，调兵增援，既不可能，前方部队，又正在溃退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自难收获很好的战果。万一我们撤退，而敌人利用正在活动伪组织的人物，组织傀儡政权。即以他们作对手，而订立协定，作为这次战事的收场，将关东军撤回关外，并不占领平津，那时我国家的损失，更为重大。所以我主张一面布置北平的城防，一面派军使商量停战。万一停战不可能，我们再行退出，就在北平作最后的抗战，亦未始不可。这件事责任虽然很大，但蒋先生既要我们来负这很大的责任，在情势紧张而无法请示的时候，我们应当就当前的情况，作适当的处置。万一以后蒋先生不同意时，我们只好大家共同负责，听候国家的处分，万不能再迟误时间，而无所决定，使后果更不堪设想。我这番理论，多数都以为然。惟王仑愤愤地说："我就调炮兵上中华门，对东交民巷轰击，不管他日本人也好，英美人也好，一概把他轰死，横直也不过丢了一个北平，使英美旁观者，也受到影响。他们吃了这个亏，然后对日本方有所责难，谁叫他们同住在一起呢？"他这些话，自然是义愤的流露，终被我们劝止了。他就走上楼去睡觉，不再下来，这是当时一幕紧张沉痛而又带些滑稽的好戏。

在停战谈判之前，有一天，九架日机飞到北平的上空，飞得很低，机上的太阳徽及驾驶人的面目，都可清楚的望见。那时既没有防空警报，也没有防空设备，我和何部长听到了机声，才跑出居仁堂，到堂外的假山石下去躲避。我们的高射炮队曾格格格地放了几声，但敌机并未投弹，就飞回去了。似乎是示威性质。事后英美外交界方面，深不以我们的高射炮队的射击为然。他们说："日机不是来轰炸的，向它射击之后，倒会引起它的轰炸或扫射。"揣测他们的意思，好象这种无希望的抵抗与无代价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但敌机轰炸不轰炸，只有天晓得，也许只有他们外

交人员才先得了消息。

那时在北平的日本武官的居住和行动，都是无限制的。当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我们调了一部分部队到城里布防，入夜即戒严，有两个日本武官深夜在很僻静的地方，乱闯乱撞。我负警戒责任的士兵喊口令，行检查，本属寻常之事，可是因此却引起了对方严重抗议。说是我们士兵拿大刀来侮辱他们，迫他们下跪作杀头的样子。我想这一定是他们凭空捏造出来的，其目的无非要我们的部队撤出北平城。日本人的扯谎，真可说是不要本钱的，其中有一个武官，第二天带了两个武装的步兵一同进来要求见何部长，这种武装求见，在外交上是从来没有的事。他的理由，说是恐怕生命没有保障，所以要带了兵同来。经再三拒绝而不得，我们不欲多生枝节亦勉强答应了。这种情形，比鸿门宴还不如，实在有些难堪。这个武官的姓名，好象是酒井隆，真是一个坏蛋，何部长对他痛恨极了。那时候，日本的武官在北平耀武扬威，都好象犯了高度的疯狂症，失去了理智似的。

签订塘沽停战协定的经过 黄膺白得到何应钦的同意，就同李择一与北平日本武官商量，到了两点多钟的时候，才回来报告说："日本武官答应调停，并已电商关东军的同意，希望我方立刻派定军使，明日就同北平武官到顺义前线去商量停战。"这事虽然有了一个头绪，但是派谁去充军使，更比派谁单独去冲锋陷阵的人选，还要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忍辱负重的任务，无论办得好与不好，在个人方面，不免受社会重大打击，甚至有性命之忧。在中外的历史上，已有过不少的例子，而在人的条件方面，既要能忍耐，又要能折冲，无论言词仪表，学术地位，都要相当，才可胜任。于是选派参谋团的徐处长燕谋充任我方军使，起初他是极不愿意的，后来经大家再三劝勉，才啣命而去。由北平到顺义，汽车行程，不过一个钟头，他于次日一两点钟的时分，就回来了。据说："在顺义附近一个村庄内的日军司令部，举行了一个接待军使的仪式后，才开始谈判，谈判的内容很简单，由

双方决定，即时停战。中国军队撤退若干里，然后于三日内（时间与日数记得不清楚）双方再派正式代表，在塘沽举行停战协定会议，签订停战协定，由驻平日本武官作为见证。”这件事的第一阶段结束了。第二阶段，即须继续进行。我方以后的代表人选问题，要比以前的更费斟酌，最后决定派熊哲民氏充任，日方则派关东军副再谋长冈村宁次郎为代表。（即现在指挥华中、华南敌军最高指挥官）这是当时北平军分会处理长城战役及塘沽协定的经过。这种前方权宜的处置，虽不断有电报报告中央，但详细情形，非得有人回去面陈不可。而且对于数日后的塘沽停战的方针，亦要请示机宜，于是派我在那日的下午五时，专车南下。过天津时逗留了一个多钟头，在于少候主席处匆匆食了一餐晚饭。并将情形面告，即时开车南下，除在济南车站上与韩复渠主席作了一个短时间的谈话，告知停战的情形之外，沿途各大站，都准备有升火待发的火车头，所以连加煤上水的工夫都未耽搁。由北平到南京，仅费了廿二个钟头，真算是一个空前的快车记录。到了南京，蒋先生及各院院长都在庐山，本想即时乘飞机晋谒，但时间已来不及了。次日上午即乘军用机赴南昌。飞经黄山的上空，俯览群峰，宛如春笋，并不见有若何雄奇壮伟的地方，这也许是心境不同，观点各异的原因吧。到了南昌，在贺元敬家里，吃了一餐午饭。又乘南浔路专车到九江，赶到牯岭，已是午后四点多钟。在牯岭饭店的客厅内，晋见蒋先生。在座有各院院长及中央要人。我在这一星期中，都是过的非常紧张的生活，又加火车的颠簸，飞机的震荡，气候的酷热，精神疲倦，已达极点。一到庐山上面的清凉境界，愈觉昏昏欲睡起来。本来在蒋先生面前，虽不曾下过不准吸烟的命令，但是大家都不好意思吸烟，就等于受了命令禁止似的。我那时候的确是太疲倦了，好多的事，好多的话，都好像记不起来，说不出来似的。于是我要求蒋先生，准许我吸烟，并喝了一碗极浓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乃将这一段的经过，逐一的报告，报告完了之后，并请予我们越权的处分。可是蒋先生和各

院院长听完我的报告，除了各人补充的询问之外，并没有什么讨论与责备的地方。蒋先生并说："你们这个处置尚得当，事实上也不能不如此处置，以后的问题，我另有电报给何部长。"这个重大的集议，就算完结了。而我呢，喘了一口气，卸除了千钧的重担，好好的在山休息了几天，就回到南京，转返上海的家里。不久又回到北平。

日本的关东军和平津驻屯军 这次长城的战役，想起来，不但可痛，又有些滑稽好笑！与我军敌对的是日本的关东军，在热河及长城一带作战，而日本所谓华北的驻屯军，却驻在我们的战线后方——北平天津——同我们的高级指挥部驻在一起，彼此还保持着和平的态势。日本驻北平的武官如酒井柴山之流，还不断同我们互相往来，好象和关东军是两个国家的军队一般，一个同我们作战，一个在旁边守中立。其实彼此却在那里唱双簧。我们一方面要与关东军作战，一方面又要防备平津的驻屯军，即使他不在我们的后方发动武装的行动，我们也必须作万一的准备。平津是他们特务机关的大军营，他们数十年豢养的汉奸间谍，不知道有多少，所以我们无论军事上的一切情形，不但平津方面的日军，明明白白，同时关东军方面，也清清楚楚。关东军所有的况报，都是平津方面送给他们的呀。我记得因为冷口被敌人突破，不得不令何柱国在山海关的部队，退回滦河以西。那天夜里下的命令，第二天早上，平津的顺天时报，就把这种消息登载出来了。恐怕敌人得到这个消息，比我们军队接到这个命令还要早一些。这种仗，如何打得下去。至于平津一带的地形，驻平津的日军，比我们的军队还要熟悉得多。他的军队可以在附近一带演习，以前陆军大学(在北平时代)有许多日本的军事教官，现在都是部队里的旅团长了。陆大所有的参谋，旅行或演习，都在滦东北平一带举行的。这些日本教官率领中国的学生去研究实习，就是他们今日带了日本军队的攻击我们的准备。驻平津的日本武官亦无一不是时刻准备着这种工作。据说："土肥原贤二在平津的时候，曾

经数次徒涉过永定河，（即无定河，水势变化无定，极难徒涉）试验在何种水量之下，是何种的情形，居心叵测，概可想见。总之“七七”以后，侵华的日本将领，大抵是曾经在中国担任教官、顾问、使馆武官之流为基干的。松井、板垣、东条、冈村、矶谷、酒井等，就可作为此中的代表了。

日本是四重军事 世界人士都知道日本是两重外交——军部和外务部——却不知道日本是四重军事。陆军有陆军的做法，海军有海军的作法。而陆军方面又有关东军的作法，与平津驻屯军的作法。甚至军部的作法与派遣军的作法，亦有不同。简直可以说是：“五重的军事”。但是各个的作法说法，在表面上虽并不统一，而事实上则互相表里。只要与他国家有利，就各别的发展，变出各种花样来，作为烟幕，以欺骗我们。可怜我们许多日本通，及一般社会人士，还以为人家是不统一的。这个来走这个路线，那个又走那条路线，结果条条路线，都是人家有计划的布置，最后都是通到东京。我们不知上了多少的当，受了多少的骗。就拿长城战役来说吧，这是关东军发展的阶段，他的目的，是要把关东军的势力，完全掌握东北的四省，所以到了占领长城之后，他的计划，就算完成了。并不是他的力量，不能占领平津，而是要留一段文章与驻屯军做做。所以驻平武官一说，就可以停战，塘沽协定一成立，他就退到长城边上。显然的，他们是彼此分定界限，显然的，他们是做好圈套，让我们自己踏进去。廿四年的所谓何梅协定，廿六年的芦沟桥事变，就是驻屯军发展的阶段。由此演进为整个的向中国武力侵略的阶段，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么？唉！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早在三、四十年以前，我们却不知不觉的睡在鼓里，外交上那得不吃亏？军事上那得不失败？长城战役，只是整个悲剧中的一幕而已！

长城战役中的一个插曲 一个国家打了败仗，同敌国订立好像城下之盟的停战协定，不仅是国家的耻辱，而是每一个人民的耻辱。所以在历史上，一个国家灭亡了，一定有好多遗民义士，

不是自己殉国而死，便是号召忠义，作最后之抵抗，如田横的五百烈士入海自杀，以殉齐国。郑成功、唐景崧、刘永福的继续抵抗满清和日本，都是历史上昭人耳目的壮烈事迹。

冯焕章先生(玉祥)在革命的人物中，是我久仰大名的，但以前未曾会过面。自北平扩大会议之后，他就隐居泰山，不肯下来。以避风雨的侵蚀。“九一八”、“一二八”之后，国内大团结，他才到南京来。我和他初次相见，一身蓝色的棉袄裤，衬着他高大的身体，与紧张的面孔，响亮的口音，令人见了，就有一种不同凡响的感想。后来他又回泰山去了，不知在什么时候，才又迁住张家口。我有一次去拜望他，他请我吃了一顿粗豪的饭，虽然没有大碗的酒，却有大块的肉与很大的馒头，在长城战事正在紧张的时候，他在那里号召抗敌，所有以前西北军及国民军的将领，及其散在各地的部属，都到那里集结。此外并罗致好些抗敌的文人，成立了一个国民抗敌军总司令部，他自任总司令，方叔平（振武）孙殿英任副总司令。塘沽停战协定成立后，这个名目，还存在着。后来经了好多的商量，才取销了。他仍旧回到泰山去。当他车过北平的时候，好多新闻记者去见他，问他对于时局的意见。他说：“这个年头很难说话，请大家尝尝红果(即北方的花红果)的新鲜味道。”盖当时为二十六年的六月间，正是花红上市的时候，这又是长城战役中一个有趣的镜头。

南下访问两广旧友　塘沽协定成立了，北平的政务委员会也成立了，在打败仗之下，签订的协定，那里会得到满意的条款？那些不参加打仗的人，及不明了当时情形的人，对于政府，自然表示极大的不满，而加以抨击。尤其是两广及福建方面，离开平津更远，更不容易了解事实的真相，因而谣言纷起，似乎又要发动什么新花样了！因此中央又要我到香港去走一趟。这次的南行，并不指定什么商谈的范围，而是以私人资格，访问那方面的友好。把华北折冲情形，向他们解说，但是当谣言正炽的时候，新闻记者对于我的行动，非常注意。我为避免他们的麻烦，很秘密的就

上了船，并不是我懒讲话，实在是深愧没有话可以对他们说，但越是如此，而他们便越以为有重大的秘密的问题在里面，而越加增多了猜测和注意。我到了香港，很多的好友，都在那里。我很坦白的将塘沽协定的内容，及我们当时在北平的情形，向他们说明。自然他们在军事上都是谅解的，尤其是对我个人方面，不会发生什么误会。但是政治上的问题，许多不是表面上的原因，而是另有其他的文章，不能在表面上点出题目来。所以我这次南行，根本上就无所谓有结果与无结果。因为原来就是一个半私半公的行动，大家见见面，谈谈天，洗洗海水浴，吃吃馆子，就算是结果。

赴山西观光 我在香港逗留了半个月，仍旧回到北平去。因为我在军分会，还挂着一个名义，不能不回去结束一下。那时北平已经回复了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景象。三、四个月以前的紧张情形，和战时气氛，谁也不再放在脑海里。这时阎百川(锡山)先生正在山西进行他的三年计划。我就借此机会，到山西去观光。同时因为“兵工统一”与“同浦路轨”这两个问题，受了军政部、铁道部方面的委托，也要与阎百川(锡山)先生解释解释。因谈起山西的经济建设计划，大家都非常兴奋。山西人的头脑，素来以计算周密著称。省内所有一切的建设，都由阎氏亲身擘划，力求经济，而不稍浪费。我提到同浦路（大同至蒲城由山西省筹款建筑，太原至大同一段，已兴工甚久）的路轨问题，他说：“如果照标准轨道建筑，不但经费一项，山西省负担不起，而材料亦无法取给。时间方面，更不经济。照我的计算，建筑窄轨轻磅的铁路，每公里只需款一万余元，而建筑标准轨的铁道，每公里至少需要五万元。经费增加五倍，现时那里有这种财力。至于材料方面，除铁轨机车卡车要向外国采购外，其余的一切，均可就地取材，而无须仰给外国。如果要用标准轨道，则本地许多材料，都不能适用了。我原来预算，三年内就可全部完成，如果一定要用标准轨道，不知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通车。照现在山西地方经济情形，在运输上说，此种窄轨的运输力，至少还可以维持二三十年，正太路不是

一个很好的例子么？”他并指出日本的铁道建设，也是由轻轨窄轨而逐渐改成标准轨，确是最经济的办法，值得我们仿效的。他这种理论，单就山西地方情形着眼，自然有相当的理由。如果就全国的观点来看，就不见得合理了。但他已坚持那样做，而一切的计划，都是照轨窄来准备，怎能把他改变过来呢？在那里，我参观了他办理的许多工厂，有已成的，有未成的，而以太原兵工厂规模为最大。自民国元年经营起，直到那时，已经二十二年了。由他一手经营，逐渐扩充。据说中国的兵工厂，规模之大，首推奉天兵工厂，其次便是太原了。这里，一个月可以制造三千多枝步枪，若干枝机关枪，二十多门大炮（口径大至十公分半），数百万枪弹，数万炮弹。新近对于炮厂及药厂，还在那里扩充。据说药厂是最新式的，而且产量甚大，我曾经参观过汉阳兵工厂，但规模还不及此。那时中央提出“兵工统一”这一个口号的要求。第一是制式的统一，因为太原兵工厂造的是“三八”式的六五口径步枪，与中央的规定不合。第二是要由中央统一办理，不能由各省自办。并且要太原厂南迁。第一个问题，据说为机器所限制，不易办到。第二个问题，自然更有为难的地方。我因问题难以解决，只尽了转达部方意见的责任，一切由他们自己去解决，不愿多参加意见。

太原的古董商场 太原乃三晋的故都，在这新时代里，他仍保存着好多古旧的遗迹。榆次县太谷县就是古董的集散场，每年都有定期的市场。北平、天津以及上海、汉口的古董商人，都到那里去采贩。其实这些古董，一部分是山西本地古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是太谷等县破落富家拿出来拍卖的。在二十余年以前，全中国的金融，操在山西人经营的钱庄票号手里，太谷人就是经营钱庄票号的巨擘。他们不但把各省的现银赚回家里，铸成“没奈何”，使劫掠者望而兴叹。而且把各省名贵物品，赚了回来，以供家人之赏玩。所以在那里可以买到精致的广东象牙雕刻，红木家具，也可以买到福建的有名漆器，与江西的名贵瓷器，这都是那些富家的收藏物。民元年以后，山西的钱庄票号倒闭了。在整个

农村经济破产之下，他们也渐渐破落了，不能不拿这些东西来换钱糊口，看到太谷县城里，一望渠渠的破败大屋，便可想见他们当年全盛的景况。还有一部分古董，是就地仿造假充的，销路也很不差。这等山西古董大多数都是转到北平的外销市场，许多外国人，都到北平来购置中国的古董。据说每年古董出口的价值，总在数百万元以上。外国输入的是现代的机器产品，而中国输出的，乃是古代的手工产品，这个新旧时代生产技术的对比，是多么深刻而动人的感想啊！

大同的佛像 我在太原游览了十多天，就顺道由晋北转向绥远一游，汽车越过雁门关，这里好象是古代对北方的第二道国防线。(第一道在大同以北)雁门关在历史上更是有名的要隘，旧剧上表演杨家将的英勇故事，所指的地方，就在这里。这出名剧的流传，使得社会上的妇人孺子，无一个不知道这个地名。但自现代交通发展以后，这里的地形，便不见怎样险阻了。我同傅宜生，赵承绶在古代长城的废堡之下，进了一些粗糙的午餐，拍了一个照片，就向大同前进。当晚，宿在大同。大同为晋北重镇，不但在古代的军事上，有重大价值，即在现代，也是同样重要。二十六年日军对山西攻击的主力，就是由大同发动的。就经济的观点来说，大同也占着极重要的地位，列为平绥线上四大要镇之一(即张家口、大同、归绥、包头）自从同蒲铁路完成后，更成为现时中国西部纵贯线的枢纽，将平绥、陇海两大铁路连贯起来，他的地下，蕴藏着极好的煤。据云：“不但品质甲于全国，而且数量亦极丰富。”凡是游历过大同的人，一定会想到云岗的石刻佛像，在那里的居停，必然很兴奋的，引导你去游览。云岗石窟在大同城偏西三十里的云岗镇附近，乘汽车只要大半个钟头，就可以到达。是一带石炭岩的山岗，傍山开窟。这个石窟中的岩石，雕成一个极大的佛像，整个的石窟，就好像天然佛龛，以避风雨的侵蚀。在窟壁的各方，亦雕有无数的小佛像。此外尚有露天的大小佛像，系就山壁雕成的，佛像的数目，固然无暇计算，就是那个石窟和大佛像的

高度，也无暇丈量。约略估计，总在六、七丈以上。我们二十多个人，站在他的肘上，拍了一个相片。我们的身体，和佛像比较起来，真觉得太渺小了！我引用《水浒传》上潘金莲的两句话："拳头上立得住人，胳膊上走得了马"来形容他的伟大，实在有些确当。据说："这个大佛像的雕塑工程，经营了一百多年，才告成功。"此外大同城里寺庙的壁画，也很有名。尤其是那个健硕而美丽的半裸体女像，最为壮观，富有西洋艺术的风味，这是北魏的伟大遗迹。

在归绥凭吊昭君墓 我们离开大同，继续北上，经平地泉，转向西行，到了绥远的省会归绥。绥远自设省以来，进步甚速，在四个内蒙特别区所改设的省份（热河、察哈尔、绥远、宁夏）之中，要算是最进步的一个。考其原因，可以说一半是得之于天，它有相当肥沃的土地，与可以灌溉的河流，所以物产颇为丰富。一半是得诸于人，晋省当局在那里经之营之，不遗余力，所以他的教育文化政治，都有相当的基础。绥远的古迹也不少，最著名的青塚，即王昭君墓，亦在那边。我们震于昭君大名，也不能免俗的前往一游。讵知到了目的地，却大失所望。塚在黑河的旁边，只是一个大土堆，长着萋萋的荒草，除了一个碑记之外，别无其他的建筑物，想不到这位历史上不幸的女人，千载之下，竟有如此的吸引力，使到达绥远的游客，都会到她墓前去凭吊一番，我当时曾吟《忆江南》两阕，以纪其事，其一云：

来凭吊，正值塞锋高，野草年年烧不尽，夕阳红照一荒垞，情往水空流。

评汉史，千载有春秋，卫霍几人攘外患，红颜白骨付胡收，愧对女儿曹。

参观民生渠 绥远省肥沃地区，全在黄河的河套一带，所以北方人说："天下黄河富一套"。河套就是阴山以南黄河弯曲的地方。在西为临河、五原两县所辖，在东则为包头萨拉齐托克托所辖，都是便于灌溉生产丰富的地方。萨拉齐托克托境内，有新近由华洋义赈会所筑成的民生渠。我和傅宜生（作义）主席同往参观，先

乘火车到磴口，（磴口有两个，一个在绥远境内，一个在宁夏境内，按磴口是水入口的意思．这里是指绥远的磴口）。然后沿渠流而下行。此处原来有一个旧渠，已因年久而淤塞了。华洋义赈会乃以工代赈，捐资修筑。全渠长约五六十公里，灌溉的面积，估计总在五百平方公里左右，这渠既名为民生渠，所以那灌溉区，也叫做民生灌溉区，可惜工程设计，不十分精密，有些地方，不能上水。旧渠改了新渠，尚未见其利益。所以人民甚为怀疑。因此我想起了菲律宾参观水利工程时，那位专家的话："灌溉地的水准测量，是农田水利工程的最基本工作。"民生渠就是犯了忽略这个基本工作的错误。

一个以教会势力为中心的市镇　中午，我们在一个外国教士主持着的教堂里午膳。这个市镇，就是以教堂为中心，而形成的。他们初到的时候，仅有少数的人家，初来此地的传教士，亦只有几个人。因为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握有治外法权，不但可以保护他们自己，而且还滥用权力，来保护他的中国教友，中国政府不能奈何他。他有自卫的枪枝，可以保护村坊，土匪也不能奈何他，他有医药，可以施恩于平民，他有金钱，可以放高利贷，可以屯积居奇，可以高价购買很大的土地，他有学堂，可以施行奴化教育，自前清咸同年间，他们就到来了。拳匪之乱，亦未曾受到若何影响，反而更威风起来。所以信教的人，一日多于一日。不但这里如此，其他各县，亦多如此。据说萨拉齐一县之内，差不多有半数以上的人信教，其力量可想而知。这简直不是传教的行为，而是以政治、经济、文化力量殖民的方式。这种力量，从多方面渗入民间，比武力侵略，还来得狠毒而可怕。那时和我们同行的，还有清华大学刚毕业来此旅行参观的男女学生，他们也很注意这件事，一个姓蒋的女生问我："这是内政部应该管理的事，不知黄部长有何感想？"这话，使我窘于应付。我们回到归绥，就动身回北平，这就是我参加长城战役的尾声。从此之后，我就解除这方面的一切责任，而从事另一个工作。

十四　宣慰内蒙

内蒙改省改县后的情形　内蒙在中国地理上，现在已仅是一个历史的名词，昔日内蒙的区域，包含哲理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六盟。除哲理木盟原属东三省（辽、吉、黑）外，其余五盟，已于民国三年划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别区，各以都统总理其军民两政。迨民国十六年，本党奠都南京后，为遵奉总理"民族平等"之遗教，复将三特别区改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卓索图、昭乌达两盟，在热河境，锡林郭勒盟在察哈尔境，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均在绥远境。自东北四省沦陷后，内蒙的范围，仅余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三盟，及察哈尔十二旗群，（归察省府直辖）归化土默特旗左右翼两旗。（归绥省直辖）盟之下为旗，为内蒙行政的基本单位。各盟所辖之旗，多寡不等，盟设盟长、副盟长各一人，旗长称札萨克，是世袭的，为该旗之封建领主，如有过犯，仍得削其爵位，另择闲散王公之有功绩者继之。盟长副盟长由政府择其盟内扎萨克之贤明者任命之。这种盟旗组织，创自满清，是清代统治蒙古重要政策之一。自从改省之后，靠近南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的盟旗区域，已经改为县治，只剩极北荒漠人烟稀少的地方，尚未改县，仍以盟旗称呼。同时为安定蒙人起见，不但盟旗的王公、贝勒、贝子（内蒙札萨克之爵共分六等，一曰亲王二曰郡主三曰贝勒四曰贝子五曰镇国公六曰辅国公）等封建称号，依旧保留，就是地方行政的实权，也仍操在他们手里。又不仅盟旗如此，在

已设县治的地方，他们对于蒙古族人，尚有一部分之统治权。不过前者连满汉一并受辖，后者则仅是他们自己的蒙古族人。所以在设县治区的蒙古人，不啻是受到两重的统治，即省县政府与盟旗两重政治组织的统治。

最近汉蒙的恶感和德王的政治欲 本来改省改县，都是减削盟旗王公封建势力，及改善蒙民生活的政策，但结果，王公势力虽受到打击，而蒙民生活不仅未见改善，反而感受许多新的痛苦。（详见下文）于是气愤不平，而正好作为王公、贝勒、贝子辈煽动利用的机会。自革命政府奠都南京，对于五族共和民族平等的口号，竭力宣传。起初仅对于宗教的首领，如班禅活佛、章嘉活佛等加以罗致，后来对于内蒙的王公、贝勒、贝子等亦竭力拉拢。民国廿一、二年，如德王（锡林郭勒盟副盟长）等都到过南京，并列席过中央全会的会议。宗教领袖班禅活佛，只希望中央能援助他回藏，此外并无利害冲突的地方。可是盟旗王公，就不同了。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欢迎席上，德王曾发表演说，其大意如次：“我们到南京来，希望中央对内蒙问题，有一个解决的办法，不意到了南京，终日都是被邀参观赴宴，或是被请表演骑马，对于内蒙政治，一字不提，实在使我们感到失望。”他并陈述内蒙自改省县后，蒙民所受的种种痛苦。当时因为语言的隔阂，语意的简单，好多人都以为是一种应酬话，并不十分注意，而我内心上，就体验到德王是个政治欲望很高的人，内蒙不久就会发生问题，问题的核心，就是德王的强烈的政治欲。

内蒙要求自治的内幕 日本对于内蒙，早图染指。侵略内蒙准备工作，亦早已开始，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此种工作，更加积极。廿一年长城战事发生，其军事力量，已侵入冀、察两省的边上，这当然是内蒙王公所认为时不可失的抬头机会。果然，在廿二年六、七月间内蒙自治问题暴发了。当初，平津报纸所刊载的，不过是事实的表层，尚未知道他的内幕，是有强邻日

本为其背景，他们在表面上是要求自治与自卫，自治要组织自治政府，脱离省的关系，自卫要组织军队，独立抵抗日本，其时正当国军在长城新挫之余，许多人因不满于塘沽协定之成立，与北方政治上的缺点，对于内蒙之自治自卫运动，自然博得一时舆论之重视，而有些过份同情的地方，殊不知此种运动，是直接间接受了日本人的煽动与指使，而为一个脱离国家统治的独立运动，这可由此后反复的经过，与抗战后德王附敌的行动，作为确切的证明。

奉命宣慰内蒙 内蒙自治运动发生后，中央派我担任宣慰内蒙的工作，同时解决内蒙自治的问题，并派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次青先生襄助办理，我以内政部长的资格，而对北方的情形比较熟悉，赵为蒙藏会副委员长，而又系与晋省方面有关系之人，中央对此事人选，可谓郑重已极。我于奉命之后，即着手准备，并向中央及蒋先生请示方针，均以相机处理，随时报告，并须与晋绥方面阎百川（锡山）先生取得密切联络相嘱附，但未有具体的腹案指示。中央派员宣抚边疆，过去未有成例，我们此行，不过是代表中央对蒙民宣示中央德意，与慰问的意思。有人说："以前满清派大员至蒙、藏必须置备很多的礼物，馈赠当地的王公与贝勒贝子，如团龙花，古铜色或黄色的绸缎，银质的茶壶、酒壶、酒杯、筷子及手表之类，都是蒙人最喜欢的物品。"我们也都购备了些。各项工作办理完毕，随即动身北上，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同行除赵副委员长之外，有李松风、贺扬灵、杨君迈、杨文炤、谭惕吾、池中宽、林竞等十余人，均由中央各机关调派。到达北平后，中外新闻界都非常注意，尤其是外国记者对于我中央处理内蒙态度，访问十分详尽。这事在国内一部分开明人士，虽然感觉到这是一件边疆重事，究竟深切关心的，却不过几人，而国际方面，则认为是中国民族间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这时，正当东北沦陷，傀儡政府出现之后。而内蒙有类似独立之要求，实非其他单纯的内政问题可比。我当时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认为实

行地方自治，是中央一贯的主张。内蒙要求自治，只要不违反地方自治的原则，中央自然可以允许，不过内蒙王公所要求者，似已逾越地方自治之范围，中间经过及背景如何，须亲到内蒙巡视之后，方能明了，然后报请中央决定处理方案。天津大公报，为彻底明白内容起见，特派记者汪君松年同行，蒙方知道我们已到北平，特派代表吴鹤龄（蒙人改汉名者）到来欢迎。这时天气尚未很冷，但是南方人初到北方，精神上总有点冷的威胁，何况要到内蒙去。而且不能预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这种威胁，自然更大。于是我们全体人员在北平耽搁数日，准备寒装后，才乘平绥火车向归绥（绥远省会）出发，火车上了八达岭，地势渐高，气候渐寒，到张家口，已是口外，塞北风光，迎人随处，秋高万树，叶压严霜，益增羌笛春风之感。张家口为察哈尔省政府及察哈尔十二旗群总管公署所在地。我们在此停留一日，晤见察省府各委员及十二旗群总管尼玛鄂索尔等，百灵庙蒙古王公方面，派来欢迎之代表包悦卿（蒙人改汉姓的）等，是日亦抵此。我们一度聚谈，对内蒙各项问题，稍作询问后，次日即登车继续西行。经大同而至绥远，火车绕行长城两侧，古代国防之伟大遗迹，今日一变而为旅行中寂寞的伴侣，令人发生无限之感想。车到归绥，与傅主席宜生(作义)及党政军首长相聚，交换内蒙方面之情况与意见，对于蒙古自治问题之内幕，知之更详。

德王发动的自治运动 此次内蒙自治运动，发生于绥远境内之百灵庙。这是一个很大的喇嘛庙，地以庙名，位于归绥西北方的二百五十余公里，为北通库伦，西通宁夏、新疆，东通察哈尔北部之陆路交通要点，除了那个大喇嘛庙及数十家多为汉人所营的小商店外，其余都是临时集散的蒙古包，倡议内蒙自治运动的王公等，皆在此集合，小小一个镇市，因此成为内蒙政治运动的中心而闻名全国。在这班集合的王公中，有察哈尔省辖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德王，绥远省辖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代表副盟长阿王，宁夏省辖阿拉善霍硕特旗代表以及各旗的贝勒、

贝子数十人，其中以德王为主干，云王老耆庸弱，无所主张，阿王、沙王皆倾向中央，内心并不赞成这次的自治运动，不过格于历史上、名义上的关系，不能公开反对。德王当时不过三十多岁，有蒙人强健的体格，有汉人灵活的头脑，性情狡狯，政治欲望极大，尝以现代成吉思汗自命。他罗致了好些蒙古知识青年，其中有在中央军校受过军事教育的，也有在其他学校受过政治教育的。内蒙自治运动，虽由德王发动，而这般青年，也是其中推波助澜的重要分子。

自治运动症结所在和德王叛国情形 现在内蒙各盟旗，皆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即锡盟十旗、察哈尔旗中之东四旗及四牧群属于察哈尔境内；乌盟六旗，伊盟七旗，归化土默特旗及察哈尔八旗，其中之西四旗属于绥远，在这两省境内各盟旗的蒙古人口，正在锐减中。去年调查的人数，与今年的实际情形，有极显著的差别。况且历年又无正确的统计，所以欲指出内蒙人口数，极为困难。但据一般调查所得，最高的估计，不过三十五万人左右。在察绥两省人口总数内，仅占百分之八弱。其分布状况，在已设县的地方，十分之九均为汉人，在未设县的地方，汉人亦多前往经商者。这些十分之九的汉人，都是历年从外省移殖而来，尤其是平绥铁路通车后，外省移来的人口，更是迅速增加。这少数的蒙古人，自然感觉到生活与生存的威胁。他们一向以游牧为生，自改县之后，受到政治法律之束缚加多，这与他们的生活习惯，颇不相容。而且放垦的土地日多，他们游牧的范围，遂日形减少，这是蒙民感受威胁最重大的一端，加以蒙民不善经商，彼此货物的交换，必须假手汉人。商人惟利是图，对于他们不免施行种种之欺骗手段，使他们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以前有一家规模很大的商号，叫做“大盛魁”的，在北平、张家口、归绥库伦各地，都有他的分支行号，内蒙、外蒙的经济权，差不多都是操在他一家之手。内外蒙独立后，苏联尝以“大盛魁”为背景，作为一个剧本，到处演出他的把戏。由此可见蒙古人所受经

济上的痛苦，比政治上的痛苦，更为严重。所以他们之要求自治，其目的在解除经济之压迫，恢复游牧的生活，而在王公方面，于未改省改县以前，整个盟旗就是他们封建的势力范围，可以予取予求，不受什么限制。现在有了省政府、县政府，他们的权力与利益，就日渐减削了，虽然名号尚存，而实际所有，已不及过去十分之二三。所以王公之要求自治，其真正目的，乃在恢复其封建时代的权益，而恰好与一般蒙民，以不同之目的，作同样之要求。昔人有同床异梦之说，如今蒙古王公和这班蒙民，竟成了异梦同床了。

综上所述，种种复杂原因，不但蒙古本身有要求解决的需要，即中央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的痛苦，亦有应行从早解决之必要，因为蒙古人民生活，若能解决，则德王等决难利用机会以背叛国家，完遂其个人之政治企图也。可惜数年以来，我们仅仅在宗教领袖及王公方面，做了一些表面上的应酬工夫，而于蒙民之实际生活，未能注意改善，成为本党执政以来内政上一大缺憾。不过此次内蒙自治运动，主要的要求，是造成一个独立的政权，并且对于省、县制度竭力反对，主张将省县所辖的土地，并入盟旗，而于经济问题，却极少提及。在当时虽未必即有敌人之背景，而事实上不啻予蓄谋侵略之敌人以可乘之隙，试观廿四年后，德王曾赴长春见溥仪，并到东京去见日皇，抗战之后，华北沦陷，德王即受伪命，为内蒙政府主席，其造因未始非为廿二年之自治运动也。

斯文赫定博士对于我国边疆的研究和著作　我在归绥稍作逗留，先派李松风、贺扬灵等到百灵庙与对方洽商，然后再斟酌情形，亲自前去。我在归绥时，会到一位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博士，这人在帕米尔高原及西藏、青海、新疆一带，从事探险工作，已历三十年之多，因高原地带终年积雪，他在雪光反照之下工作。日久月深，神经异常，必须在白天里睡觉，黑夜里才是他工作与活动的时间。这个奇怪的客人，学术造诣很深，对于中国边疆上的特

殊知识，尤为丰富。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翁，但是精神体力还很饱满强健。外貌上处处表现出是一位经过风霜雨雪长期锻炼的老探险家，他把在新疆、青海、西藏的工作情形向我陈述，并希望中国政府对于这些地方，多加注意，临行他把所著的《我的探险生涯》与《万里长征记》二书签名赠我，并说这书已有十多国文字译本，在学术上、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很重要的价值。我送他们出门，随即把《我的探险生涯》翻阅，文字生动极了，虽然内容大多数是记述在雪山或是沙漠中极干枯寂寞的生活，却写得十分有趣，处处引人入胜，使读者不忍释手，好象自己亲历其境一般，并可由此得到很多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激发开疆辟土的勇气。我在两个晚上，将这两大本书读完，引起了许多感想。斯文赫定是一个外国人，他为什么肯费三十余年的精力，在中国的边境上，作这种探险的工作，中国的边疆，实在太伟大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这伟大的边疆，应如何注意加紧开发才是呀！我看完了这两部著作，在宣慰内蒙途中，不期突发远征新疆的念头，这可以说是斯文赫定博士的伟著，鼓起我的兴趣来的。

归绥百灵途中 三数日后，李、贺来电，报告商洽的情形，尚属顺利，请我早日到百灵庙去。我将他们接洽情形，告知傅主席，再与他一度磋商，密取联络，并将各种手续办妥后，即与赵次青先生、徐月祥军长等一同前往。由归绥到百灵庙，可通汽车，即绥新汽车路的首段路程，但要越过阴山山脉。在包头以东，土人叫做大青山，在包头以西，土人叫做狼山。阴山最高处，拔海二千五百公尺，山上产大角羊，又名青山羊，体重三百余斤，其角大而蜷曲，极为美观，外人多用为室内之装饰品。羊毛长三寸余，粗而硬直，但底绒极厚，御寒力极强，即貂、狐亦尚有不及。据闻："大角羊于大风大雪之时，必至山巅迎风而立，以为快意"。可见其皮毛抗寒力之强。且气候愈冷，愈觉温暖，弥可珍贵。自归绥行五十公里至武川县，与东边之陶林县，西边之固阳县，同在一线，为绥省山北之三县，亦是该省极北之县份。设治时

间，皆不甚久。过武川、绥沙拉毛林召、黑沙庙，即到百灵庙，自武川以后，沿途愈行愈荒凉，除一二召庙之外，人烟极少。数次经过小水沟，皆向北流，随地没入沙碛之小泊内，道路荒芜难行，历七八小时，方始到达，已灯火黄昏矣。

蒙古招待贵宾的礼节 蒙人习惯，遇有迎送大典，必于迎送站所，张设篷帐，为远客未到时自己休息之所，盖荒漠之地，风沙袭人，舍此别无可资坐立之处也。我到达时，各盟旗王公及庙内喇嘛、皆分别设帐等候，已有半日。德王、云王及各贝勒、贝子等，着满清朝服，红蓝顶戴，发辫后垂。庙内喇嘛，着大红袈裟白麾礼帽，秃头半露，两相辉映，另有风趣。我等宛如置身异国，已不复见汉家范度矣！彼等趋前向我表示欢迎之意后，即各回篷帐，我即依次到德王、云王等帐内答谢，稍作寒暄，至是宾主之礼乃成，各自撤帐归还寓所。我的行辕，即设在百灵庙内之别院，次日，彼等到来谒见，并献哈达（哈达，乃长五尺浅蓝色之薄绸，上有花纹，为蒙人见面时表示敬意之礼物。）我亦亲到各王寓所，照样回敬，并将所带之银器，绸缎、手表、茶叶等礼物，分赠各人。蒙人每早初见面时，开口即问："尔宁昨夜有没有着凉？"盖彼等以为南人畏寒，故以此相慰问也。是晚，各王公等设宴招待，用蒙俗全羊席。这是蒙人最原始最郑重的席面，必须有大典礼有贵宾方始举行。其制，就羊群中选取最肥最大之羊，宰杀后，整个用白水煮熟，各宾客盘腿环坐，于客厅四侧之炕上，主宾坐于正上方，主人抬全羊置于厅中，先由蒙民唱歌，伴以短笛及苏拉，其声高伉而苍凉，歌声一起，全场不禁严肃起来，歌的意义，据说系祈祝丰年，并为众人祝福，歌完，主人德王割羊头肉一块，用刀尖挑献给我，从人并献奶酒，我右手接肉，左手接杯，主人复依次献给其他客人，照例不能不受，并须随即食完，方为诚敬。我等皆为南方人，酒酸肉腥，极难下咽。我勉强尽了一献，以表诚意，几至呕吐，其余诸人，都不能着口，主人见此情形，亦不作二次之献，随将局面撤换，改用汉席，席间德王

语我："这是蒙古风俗必有之仪式，明知南方人不惯，故于举行仪式后，即改用汉席，否则，本为敬客者，反以困客矣。"民国二十六年，我在武昌招待英国大使许阁森氏，谈起蒙俗的全羊席，他也说一个南洋的故事给我听，他以前在南洋某部落工作，与酋长颇相得，有一次，他的生日，酋长很诚恳的奉送了一份祝寿的礼品，这礼品不是别的，而是二个血淋淋的人头。全世界各民族，各有其风俗习惯，如果主客两方习俗相距过远，往往主人是表示十分敬意，而客人反感到十分为难。上述情形，都是一个例子。

住在百灵庙的班禅活佛 班禅活佛，这时卓锡百灵庙；我到时他曾派代表欢迎，据说：佛是超人的，满清对于活佛，皆敬而不臣，所以他不亲自参加王公等有政治阶级性的欢迎会。次日，我去答谢他，他也来我的行辕回拜。这本属普通友谊上的礼节，当然是平等的。当我到他庙中的时候，其门前地上，放置一块大木板，有一蒙古人在那里朝拜，拜法与我们通常所见不同，跪下后，将胸部靠地，手足伸直，然后以头叩板打响。叩头后，再行起立，重复照前跪下叩头，想即是五体投地的意思，如此终日不息的拜，一直拜到活佛出见为止，才算达到目的，了却心愿，若活佛摩一摩他的头顶，就是无限荣幸的事。这人是由外蒙远道过来朝拜，已经拜了数日，班禅活佛送我出门时特别给他摩一摩顶，他就将身上带着的银子及其他贵重的物品，尽量献给活佛，据说有的只是与活佛见一见面，得不到摩顶的荣幸，也就尽献其所有了。朝拜活佛的人，所得的结果，各有不同，那就只能怪自己的诚心不诚心，不能怨佛缘的厚薄了。这里终年有人前来朝拜，所有献银收入，也就非常可观。据熟悉内幕者云：佛缘之厚薄，与献银的多少，颇有关系，献银的数目，至少是十两。班禅活佛的行辕，有一定编制的佛官，并拥有一个一二百人的卫队，还有一个军乐队，他的行辕规模之宏伟威风，比之南京的院部，有过之无不及，他的一切用度，中央都有额定之给予。但是他在盟旗里

面，无论是食的用的住的，无一不是毫无代价的取之于各盟旗，这也是蒙民极重大之负担。不过在这极端迷信的社 会 里，大 家却安之若素，并不认为是痛苦的事。活佛在盟旗请客的方式，也与普通不同，在一个客厅里摆着一张桌子，只有他和我二个人的座位，其余的客人，另在一个地方，也另有人相陪。我们到后，他举行扶轮金刚法会，为国家祈福，他请我去参加典礼，我当时颇费考虑，因为参拜法会，要行三跪九叩礼，这是一桩不甚习惯的事，因此我托故请赵次青先生代表，并邀各同事参加，而活佛临时将礼节变通，蒙人行三跪九叩，汉人行三鞠躬礼，在一个场合中用两种礼节，亦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活佛在内蒙，对于宗教上，固然拥有很高的权威。但在政治上，一般王公都不尊重他的意见，据说，这是政教分立的缘故。百灵庙内还有二个由外蒙逃过来的活佛。外蒙自依附苏联独立后，活佛的地位，已经没落，他只好求食内蒙，否则生活无法维持，不免有变成"古佛"的危险。我曾经问过由外蒙到来拜佛的人，据说对外蒙情形，多不甚清楚，也许是不肯对我实说，我问他们对于共产主义的认识如何？现在外蒙人民得到些什么好处？他们的回答，都是支吾其词。对于共产理论，可谓毫无所知，只是说他们的牛马羊等家畜，因为有了兽医的设备，不致再有因瘟疫而成群的死亡。这是因为牛马羊是他们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生命所寄，所以对这种兽医的设施，首先感到兴趣。其次，则为现在已不再受中间商人剥夺其应得的利益了。我想这也许就是外蒙政府的一点小恩小惠罢。就政治观点来说，此种恩惠仅仅是一点消极的作用，根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政绩，但从眼光短浅知识幼稚的老百姓看来，已经是不得了的德政了！如何施以更有效的方法，从积极方面，发挥政治力量，使蒙古人民的知识水准提高。同时发展经济建设，使他们得更大的实惠。这不仅是蒙古人民的幸福，对种族文化，国防经济，都有莫大的关系，而外蒙政治的煽诱伎俩，自更无从施展，这是政府当局最宜深切注意的问题！

蒙古人口锐减的原因 蒙古的人口衰退情形，至堪惊人。据我所知，外蒙的人口，不过九十多万人，内蒙也不过三四十万人，连各地的蒙古人统通计算在内，最多也不过二百万人左右。我们回想到成吉思汗及忽必烈大帝的蒙古全盛时代，他们以武力统一中国，纵横欧亚，必有极强盛的人口基础，照现在的蒙民人口数量，即使回复到十三世纪，任凭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是多么英勇强悍，恐怕也不一定能统治支配欧亚两洲广大的地域吧！照我的推想，当时蒙古人口，必比现在多出数倍以上，总数当在一千万左右，八百多年以来，何以减少到这个程度？其原因颇多：

第一、蒙古人以游牧为生，他们没有经济与文化的基础，无论在蒙古区域的内外，都容易被有经济文化基础的民族所同化。中国就同化他们最大的力量。

第二、是地理气候的压迫，使其不易生活，而向外迁徙。中国古来的外患，都在北方。不是北方民族特别好侵略，而是北方的地理气候压迫，他们不得不南进，以求生存。中国是他们认为生活最舒适的天堂，自然容易成为他们略取的目的地。我在斯文赫定所著《我的探险生涯》及《万里长征记》中，看出蒙古、新疆境内，以前很多很好的土地，后来因为沙漠南移，而变成现在的大戈壁，气候亦随而恶劣了。故沙漠南移，土地气候变化，是促成蒙古人外移的主因，外移之后，遂被同化。

第三、成吉思汗与忽必烈大帝的武力，不仅是军队的武力，而是民族的武力。据马哥孛罗的纪载，蒙古人的进军，前面是战斗的铁骑，后面跟随着乘马的男女老幼，所以蒙古兵到达的地方，亦是蒙古民族到达的地方。因为武装移民的结果，蒙古境内的人口，遂大量减少了。

第四、是满清统治政策的狠毒。清廷畏惧蒙古，而欲消灭蒙古人，除了战争的的屠杀外，特别提倡皇教(即喇嘛教)，清廷用敬而不臣的办法，来提高活佛及喇嘛的地位，设定种种优待。凡为喇嘛者，除免除一切徭役外，并给以种种特权。活佛与喇嘛，

一切所需，完全由蒙民供应，或给自府库，使其不劳而获，以引诱蒙民。并规定蒙古三男中，必送二人去当喇嘛，人民文化低落，易生迷信，经朝廷之恶意提倡，莫不以出家为无上光荣，是以蒙民为喇嘛者日众，几占内蒙人口之半数。喇嘛不许结婚，而准许其任意性交，以绝其后代，增加其花柳病之传染，从而人口繁殖力日渐衰弱。以上所述，皆为蒙古人口锐减之原因也。

内蒙自治问题的处理 我对内蒙自治问题的解决，不采用会议的形式，因为我的任务是巡视与宣慰，不是会议的代表。而且盟旗王公等知识甚低，根本上他们只有一个自治的希望，而不能作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办法和条款，来提出讨论，所以用会议方式来解决这个内蒙自治问题，是不会得到结果的。王公中间，主张内蒙自治的德王，便是一个中心人物，而且他幕后尚有若干激进分子在鼓动着，所以我就以德王为对象，进行问题的处理。先派李松风、贺扬灵与德王等代表包悦卿、苏鲁岱等举行磋商。彼方固执成见，谈判难得结果。蒙方要求的条件要点：（一）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其区域包括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各旗，直隶于中央，经费由中央拨补；(二)凡是蒙古人，不论住在已设治地方，或未设治地方，皆归内蒙自治政府统治，不受各省各县政府之统治；(三)内蒙自治政府得自行编练军队，由自治政府指挥调遣；（四）保证盟旗王公名义永远存在，并保证以后不再设县，永远不再开垦牧区；（五）内蒙自治政府得自行制定法律。

我对于蒙方要求，考虑结果，认为：第一、是破坏了现时省的行政区域，不但违背国家既定的政策，即当时各省的当局，亦难通过。第二、在未设县治区域之蒙人，自可归其统治，已设治区域，汉蒙杂处，一地区内之人民，决不能同受两个政府的统治。第三、自行编练军队不但易与各省发生冲突，而且与中央正在进行中之军事统一政策不符，更须顾虑其易受日本的利用。第四、盟旗及王公之名义，不适于现代政治。而游牧部落，尤不适于现代生活。第五、地方政府自可制定单行法，但以不与中央法令抵触

为原则。因此我即将所定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统方案，稍加增删，于原案第一条后增“蒙古原有各盟旗群之组织及制度仍应保存”一款，于原案第二条后，增“前项地方行政委员会之经费，由中央酌量补助之”一款。并将原案第七条改为“关于蒙古全体事项，及各地方行政委员会有互助关联之事务，每年得开联席会议一次，或由该会议召集全体蒙民代表会议讨论之，其议决案呈请中央核准施行。”又于第八条末段，应由“省政府委员会”之下，增“与地方行政委员会”字样。第十条原文删去，另改“蒙古地方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各省政府，应即停止设县或设治局”一条。我拟具了这个增删中央指定方案条文的意见之后，详电中央请示。次日，即奉复电照准，但与蒙方所要求者，仍相去甚远。中间几经磋商，几至破裂。蒙人最主要的目的，要在各省之外，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竭力反对各省分治。此与当时实际情形和国家政策，极不相容，如这一点能解决，则其余各点，皆易商量。续经数度磋商，允许其在百灵庙设立各省自治委员会联合办事处，俾资联络，其余各点，大致尚无问题，但他们的内心，自然尚不满意，而与各省政府之间，问题亦多。后来中央根据我们的报告，并经详细商酌，特设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直隶于行政院。办理盟旗地方自治事务，以示蒙事直隶于中央，同时亦可调处各省政府与内蒙自治委员会间的纠纷问题。

蒙古人的游戏和战斗生活　我在百灵庙，住有二十余日，除了处理各种问题之外，并观蒙人表演的各种特殊技能。最出色者为摔角，乃人与人之角力。蒙人身强力健，一般均在内地汉人之上，其技术之纯熟，亦极惊人。其次为套马，即以套马竿在野马群中捕捉所需要马匹之方法，竿长数尺，上端系极韧之索，索端系小木棒作成圈套。当日马群，约有马三百余匹，由我指定一匹，令其捕捉，表演者乘骏马，手持套马竿，驰马向指定目标追逐，相距数十尺，即挥竿掷索，将指定之马头套住牵来，百发百中，很少落空，堪称绝技。我前在北苑入伍时，据曾经参加征蒙的官兵对我

说：“蒙古骑兵除携带枪枝之外，还携带套马竿作为武器，迨两军冲锋接近时，即将套马竿套我士兵。为其活捉者不少。”此种游牧工具，竟利用为战争利器，亦属至可玩味之事。此外尚有徒手捕马之法，表演者不持套马竿，徒手驰马闯入马群突然下马，将一匹正在奔驰的马抱住，使其一步不能奔腾，其精神的勇敢与气力的强健，至可惊人！蒙人射击技术，亦甚精。一日，我与德王到野外游逛，忽在约莫二三百公尺之外发现一狼，正在奔走，德王的卫兵，持步枪连射三枪，将其击倒，经检查命中两枪，可谓准确已极。蒙古人本来是一个战斗的民族，他的生活与战斗条件是一致的。蒋百里先生说：“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这自然是指某一时代的战斗条件与某一时代的生活条件而言，蒙古人在数百年前，他的战斗条件与生活条件是一致的，所以他能纵横欧亚，所向无敌。现在蒙人的生活，还是数百年前的简单的战斗生活，即以饮食而论，他们的食量很小，而且很简单，每日只是饮食少量牛奶或羊奶马奶及干酪（工制的旨士）等而已。谷类仅有炒熟的小米，是与奶类伴食的，并不是主要的食品。食肉虽较内地人为多，但亦不如我们想象那样的多量，其食量虽然不大，而此种饮食品类之营养价值则甚高，取给携带亦甚方便，所以他们有强壮之体魄，与迅速之行动。马哥孛罗说：“元朝蒙古的骑兵，可以三日三夜在马上作战。”此于其生活之简单，与营养之丰富，自然有极大关系。我想蒙古人既是中国国民的一部，他的内部各种问题，今后必须迅求彻底解决，才能使蒙民人人能成为中国国防上坚强之分子。这次世界大战，苏联之胜利，不是得到西伯利亚军队很大的力量吗？

蒙古的草原 百灵庙附近地方的土壤，亦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我曾经在一个小山谷内发现很大的树木，其他农作物的繁殖，当然也很可能，蒙古人因过惯游牧生活，不很需要耕地，而是需要广大的草原，所以对于种植，就向不注意，不过蒙古草原，也快成为历史上的名词，现在草原上的草，已不甚适于马牛

羊的食料，原因是马牛羊都喜欢吃适口的草，在春夏时期，野草繁茂，自然可以得到充足的食料。一到秋冬，野草枯萎，畜类食料，便渐渐缺乏。蒙人又无储藏牧草的知识与设备，因此严冬季节，畜类就要忍饿耐寒，啮食覆在雪下的草根。草根既被啮食，草类的繁殖，便受影响，于是好草一年少一年，蒙古的草原，日渐不适于畜牧。蒙古的马与蒙古的羊，素著声名的，可是王公们送我的几十匹马，都是羸弱不堪，羊亦不肥美。其主要原因，即由于牧草不良，食料不足，可见专靠天然为生活的人类与兽类，终久是要被天然所淘汰的。

政治问题的初步解决 内蒙政治问题，磋商了许久，终未得到具体的解决。气候日渐寒冷，虽然没有下雪，小河里的水，却已完全结冰了，若到大雪之后，道路都被壅塞，必须等到第二年春暖雪溶之后，方能回来，而远道到来的王公，贝勒，贝子，亦都因未带来过冬的粮食与工具，亟愿早日散去，于是我通知他们，如果在三数日内不能遵照中央指示原则，商定解决办法，我们决定回京复命，不再等候了。他们遂不再坚持，将我所提的方案，稍加修改，予以承认。并由各王公通电中央表示拥护。至是内蒙自治问题，才算获得初步的解决，我们一行，即启程回归绥，口占一词云：

大阴山，朝夕跨，既牧牛羊限胡马。苏武留边十九年，我今匝月归华夏。（仄韵捣练子）

这时，已是十一月下旬矣，回到归绥，复举行汉蒙联欢大会，阅兵、表演技术、演戏，一连热闹了一星期之久。各王公及蒙人到者甚多，洵盛会也！各种事务处理完毕，即乘车南下。由大同乘汽车，绕道太原，向阎百川（锡山）先生说明这次处理内蒙自治问题的经过，再由太原转北平，向军分会何委员长敬之（应钦）报告经过情形后，返京作成详细报告，陈明中央，这一个宣慰内蒙的任务，才告毕事。

十五　筹备远征新疆

远征新疆的先声　民国十七年，北伐完成，全国正筹议编遣裁兵的时候，忽闻白健生将由北平率领国民革命军五万人赴新疆从事殖边工作的消息，我即去电表示赞佩之意。不料后来因种种关系，他这伟大的举动，未得实现。连年内战发生，这等事关国家边防的大计，也就无人顾问，这真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沦陷，国人懔于敌国外患之严重，急谋团结御侮的方策。但其目的多是指当前日寇而言，对于西北的边防问题，还是很少有人注意，廿二年我北上参加长城战役，深感新疆问题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及早措置，则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始不可补偿一点边疆的损失，同时新疆的军事政治，正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期，实在有赶紧收拾的必要。

新疆的耕地面积　新疆是太伟大了！它是中国最大的省份，拥有五百余万方里的土地，占全国土地总面积六分之一，比浙江省大十六倍以上。虽然境内有很多的大山脉，与广阔的戈壁沙漠，因而不能耕种的土地，要占到三百万方里之广，但剩下来的二百余万方里可耕地，仍远比其他任何一省可耕的面积为多，而新疆的人口，仅有四百万，每人平均可得到半方里的耕地（约为二百七十亩），这也是其他任何一省所不能及的。浙江全省的耕地，计田二千五百万亩，地七百万亩，山一千四百六十万亩，荡一百六十万亩，合计四千八百二十余万亩，以二千二百万人计算，平均每人得二亩二分，可是现在新疆已经垦辟的耕地，估计不过一千六百

余万亩，仅占全部可耕地千分之一五。如果二百万平方里之可耕面积，全部垦辟，可得十万万八千万亩，每平方里以五百四十亩计算，假如以每人占有耕地十亩计算，就可容纳一万万多的人口，所以开发新疆，真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唯一的要策呵！

新疆的畜牧 新疆是兼寒、温、热三带气候的大地，农业之外，最宜于畜牧，自古即以牧业著称。现在他的经济基础，仍建筑于农业牧业之上。先说牧业：因为这里有许多民族，如蒙古族、哈密族、索伦族、锡伯候族、克尔克孜族、塔吉克族，素来都以游牧为生。牧产以绵羊及山羊为最主要，全省约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头，以其繁殖快，而获利厚也。其次则为牛，全省约有一百万头。牛有黄牛与犁牛之分。犁牛为新疆与西藏、青海三省之特产，新疆所产者，其身躯比西藏、青海产者为小，登山度岭，任重致远，为他种牲畜所不及，实为多雪山区之重要交通工具。再次则为马，大宛良马已著名于汉代，现时则以伊犁、塔城、镇西、焉耆等地较多，伊犁所产尤为著名。伊犁的马体格高大，长颈修尾，耸耳怒睛，神彩骏秀，适于骑乘，较之蒙古马，优点尤多，全省约有二百万匹。再次为骆驼，即所称“瀚海之舟”者，是沙漠地带的主要交通工具，在汽车路未修通之前，更为新疆与内地各省的唯一长途旅行工具。直到现在，还不失他的重要性。明驼为骆驼的另一种，体格强大，耐久行速，胜于良马。《木兰辞》：“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似即指此也。

新疆的农产 新疆的农产，也兼有寒、温、热三带的作物。哈密的瓜果，及吐鲁番、鄯善的棉花、葡萄等，均为中外闻名的产品。南疆并产蚕丝，其他普通的作物，如小麦、高粱、稻米、包谷、青稞等，无一不因气候之不同，而异其种类。境内雨水稀少，水利尚未发达，各疆产量，颇受限制。而这种原始的生产，已属可观，若将来兴修水利，运用科学方法，予以改进，则新疆将成为我国西北农业仓库，实可比美于东北。

新疆的矿产 新疆的矿产，虽然因为远在边荒，未经地质学

家的实地详细调查，无从知道他蕴藏的种类与数量，但就已知者言，如阿尔泰、诺羌、于阗所产的金，和阗所产的玉，在历史上即已著名。新疆土话“阿尔泰”即是金子。阿尔泰山，即是金山的意义。又如迪化、乌苏、绥定、塔城所产的石油，多流于地面，而未经新式的开采与利用，这种现代工业与现代国防之必需品，多于天山及祈连山南北两麓随处发现，蕴藏的丰富，当可想见，这广漠无垠的大地下面，给予我们无限的希望，而有待于吾人运用科学的技术，努力开发，以应建立工业化的现代国防的需要。

新疆是中国的生命线　新疆西北，与苏联为邻，而南与阿富汗及印度为邻。帕米尔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称，实为中国、苏联、阿富汗、印度四国的天然国界。在过去数十年的边疆历史中，英、苏两国，对这世界的屋脊，起了不少的争执。今后国际航空日形发达，帕米尔必将成为欧洲和亚洲航空交通的中心，谁能占有这欧亚航空中心，谁就得到空中的优势。故今后的帕米尔，必将成为中、英、苏三国国防上纷争的焦点，而值得吾人及早注意的。新疆的种族，也非常复杂，在四百余万人之中，详细分析起来，有十四个种族之多，在中国数千年来，西域的外患，以及最近数十年来新疆问题，大都是由于种族间的冲突而发生出来，这种复杂的民族问题，如果不速谋合理解决，必将由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演变为国际的外交问题，这是吾人深为忧虑的一件事。综观新疆地理形势之重要，物产蕴藏的丰富，民族情形的复杂，不仅成为中国之生命线，亦为内政外交变乱之源泉。我之所以要远征新疆之理由，即在于此。我的志愿虽未酬，而其重要性，则任何人所不能否认也。

民元以来之新疆政局　新疆的政局，自民元以后，一直到民国二十年，都没有什么波动，考其原因：第一，是由于与关内相隔太远，在这廿年之中，虽然内战频仍，新疆仍能保持安定，未受若何影响。第二，近邻的帝俄，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由失败而崩

溃，苏联革命之后内部尚待整顿，而且常以和平不侵略为口号，故历来多事的中俄边界，亦得以相安无事。第三、光绪五年，回乱初平，全疆收复，国家声威尚在，即有好乱之徒，一时亦不敢遽尔窃发。谚语："新疆六十年一乱"，这正是将乱未乱之时也。

杨增新氏主持新政十有七年，因上述种种原因故政局极为安定。其唯一的政策，为保守新疆地盘，不被外来势力渗入。他自己亦无意过问关内的政治。新疆省府廨大堂内，有杨氏自撰一联："共和实草昧初开，羞称五霸七雄，纷争莫问中原事。边庭有桃源胜境，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杨氏一生的政治怀抱可于此联语中见之。唯民国十一年，杨氏以阿尔泰地当边要，且为新疆北方之屏蔽，力请划归新疆管辖。盖阿尔泰原属外蒙之科布多，自改辖新疆后，不致随外蒙而独立。则杨氏之功亦足多也。民国十七年七月七日，杨氏被刺身死，金树声继起秉政，率循杨氏政策，亦无新的建树。"九一八"后，外患正殷，内乱未已，由东北而影响西北，由中原而影响关外，于是回乱复作，外力乘机侵入，新疆政局，遂陷于长久混乱的状态矣。

新疆变乱的起因 近年新疆事变之剧烈，实为前清同治回乱后六十余年来所未有，其初则为哈密缠民之变乱，缠民历来皆受回王的统治。民国初年，因不堪回王的苛虐，曾经叛变一次。民国十九年，新疆省政府将哈密改设哈密、宜和、伊吾三县，在回王方面，因封建势力日削，常思恢复；在缠民方面，则因设县后，回民税课不公平，且耕地常被汉人侵占，积愤不平，回王复从中鼓动，缠民秉性驯良，平日甚畏政府，虽有怨愤，亦惟联名电省请愿，尚未敢遽然为乱也。而暴发之机，实由小铺守卡军官强要缠女结婚一事而起。缠民因宗教关系，素不与汉人通婚，今见卡官诱迫成亲，引为奇耻大辱，于是激起公愤，群谋反抗，乃于成亲之夜，乘其不备，将男女杀死，并尽杀卡兵，夺其枪械。缠民既得武器，公然倡乱。这是民国二十年二月间之事，同时，他处缠民，亦皆起而响应，杀官夺械，达十一处之多，并将附近

新由甘肃移来的汉族垦民百余家，尽行杀死，埋诸土中，以示占地的报复。

缠民声势既盛，复集众攻哈密旧城，城陷，汉人无幸免者。省为乃派大兵进剿，缠民见官兵势大，惧而请降，卒以省军诛求过甚，缠民无奈，誓死反抗，一方到处煽动，使省官疲于奔命，一面派员向马仲英请援。

马仲英为甘肃回教徒，这时为马步芳所败，正想另谋出路，遂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率所部四五百人，入新援助缠回，缠民以同教关系尊他为领袖，是为回乱之开始。马仲英与缠民进攻镇西，驻军开城投降，于是声势更壮，继续进攻七毫井，迫近迪化。金树仁派省军迎击，复为所败。后得白俄归化军二千余人增援，始将其击败，马仲英部退回甘肃之安西、玉门、敦煌等县，缠民亦逃匿东山中。本可及时抚辑，以省军处置过苛，仍四处散伏，与省军抗拒。马仲英亦派人联络，希图再举。省军既无训练又无纪律，时为缠众所败。于是南疆北疆各处缠军，又都纷起响应，进围迪化。幸经省军及归化军竭力合御，终于击退。

“四一二”政变　民国二十二年春，东北军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部，由苏联转入新疆，因不满金树仁之所为，乃与归化军联合，驱逐金树仁，而举盛世才（原为金氏参谋长兼总指挥）为边防督办，刘文龙（原任教育厅长）为主席，即所谓“四一二”政变是也。那个时期，也正是缠军与马仲英部第二次联合进攻迪化的时候，缠马部众，复进占哈密木垒河古城，俘获甚多，声势大振，省军欲议和，未成。

中央两次派员巡边　中央鉴于新疆连年兵劫，民不聊生，乃派黄次长慕松来新宣慰。黄氏适于此时飞抵迪化，满拟调和两方意见，劝导他们一致服从中央命令。但双方皆无和平诚意，战事仍然爆发，省方得归化军及东北义勇军之增援，复将缠马击败，马仲英率众退走南疆，形成南疆北疆对峙的局面。省方将领多有倾向中央者，盛世才以为于己不利，将省府秘书长陶明樾、参谋

长陈中、航空处长李笑天逮捕枪决，此即所谓“六二六”政变是也。黄宣慰使之行动通讯皆不自由，不得不飞回南京。黄氏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徒然加深中央与地方之误会而已。

中央复于二十二年九月间，派外交部罗部长文干氏巡视新疆，盖中央鉴于已往俄人每趁中国内乱，对边隅无暇顾及之时，即乘机侵占，深恐又蹈覆辙，所以特派罗氏以外交部长的地位，亲自巡边。表示中央十分重视新疆问题，籍以引起强邻的注意，无形中消弭其侵略之野心，故罗氏此行，虽不能达到安内目的，对外方面，却发生极大的影响。

伪回教国的兴灭 南疆之乱，自系受北疆之影响，而南疆缠回，又占绝大多数，乃以宗教为号召，戕杀汉官及汉人。除极少数官吏及汉人平日为缠民所爱护者外，很少能够幸免。祸害之惨，比到同治之乱，实有甚焉。时省军因内部不和，屡战不利，行政长马绍武，招致黑黑孜族为助，黑黑孜本系以劫掠为生的游牧民族。不久，复为缠民首领铁来耳所诱，与缠军联合，反击省军。于是南疆各城，卒为所陷。马绍武等困守喀什汉城，被攻达七月之久，回众推举和阗王为首领，于二十二年九月组织“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国旗白布中嵌半月及星，并书回教经典标语，这是南疆独立之经过。伪组织宗教色彩甚浓，不但反对中国，驱逐汉人，即由苏联回来之缠民，稍违教规者，亦处于死刑。故无形中成为反对中苏，亲近英国的独立组织，马仲英因回教的关系，起初和他们联合一致，后来见他们完全脱离祖国而独立，乃率所部，于民国二十三年二月间，进攻喀什回教伪政府。缠回首领和阗王萨彼得及其政府官员，逃往叶尔羌。回教国的成立，不及半年，即告消灭。马仲英氏此举，在国家民族立场言，实有极大之贡献。此段经过事实，在国内知之者甚少，而在国际方面，则载之甚详，可见国人对边疆问题之忽视也。马仲英既驱逐回教国，而省军复蹑其后，马氏乃逃入苏联境内，解除武装。至是，南疆变乱之局稍平靖。

新疆在国防史上的重要 内乱与外患，往往是连贯的，内乱易致外患，几成为中外历史上一定的法则。一个国家的内乱，大之足以招致整个国家的沦亡，小之足以招致边疆土地的损失，这也是一个不变的定例。

新疆自汉唐以后，疆土日辟，到清初康熙征服准葛尔之乱，天山北路之四卫拉特，全部尽入版图。而藩属之效顺者，有哈萨克、布鲁特、霍罕、安集延、塔什干、布哈尔、阿富汗，与都斯坦等十余国。当时西域范围之广大，南及坎巨提，西至阿富汗，北逾齐桑淖尔，其疆域几领有现在苏联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图克门斯坦各联邦。自汉唐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也。我国历代对边界土地，素不重视，加之疆吏愚昧，舆图不全，即在承平时代，强邻暗图侵占者，为数已属不少。咸同时候，内乱严重，俄国乃乘隙而入。咸丰十年，同治三年，中俄两次订立北京条约，于是阿尔泰山，后阿尔泰诸尔、乌梁海游牧地，科布多卡伦以西，以及齐桑淖尔东岸爱古斯各地，全被俄人侵占了去。同治九年，建立塔成界碑时，俄人又将察罕鄂博界碑移于中国境内，侵蚀百余里。光绪七年，中俄改变条约，而齐桑淖尔全湖与阿拉克别克河以西，蒙哈各游牧地，又被夺去，这是咸同年间内乱时期新疆北部失地的情形。

新疆西北之哈克萨部，乾隆时即入我版图。当时边陲之地，荒而不治。道光年间，俄人逐渐南下，迨咸同年间，东南乱起，俄人于伊犁卡伦外边之阿拉木图地方，设立商埠。又遣兵至阿拉木图以西的哈萨境内，建筑炮台。复于塔城东北设叙米省，继则夺取塔什干、阿拉木图，皆系乘我内乱的时机，或诱惑我藩属，归其统辖，或威迫我政府，订立条约。同治三年，塔城条约成立，西界一变。同治十年，全疆沦陷，俄人入据伊犁至十三年之久，后经左宗棠督师西征，收复全疆，始于光绪七年订立中俄条约，而西界再变。光绪八年，订立哈城条约，而西界三变。统计前后订约十余次，每次订约的结果，总是蹙国削土，此种损失，真所谓不可

道里计也。

新疆的西南，为帕米尔高原，乃葱岭之脊背，南北五百余里，东西八百余里，为中、俄、阿、印四国交通之枢纽，帕者为山脉，一纵四横，群山相间，分为数区，各异其名，总名为帕米尔。全地分为八帕，而有大帕米尔小帕米尔之称。上有乾隆纪功碑，其为中国属地，实毫无疑义。光绪五年，全疆收复，曾设卡于帕外，以防俄罗斯、阿富汗、坎巨提之入帕。日久防疏，遂不顾问。光绪十七年，俄兵进入帕境，扬言各帕均为俄属。英人闻之，亦侵入坎巨提，以固印度门户，我虽向英俄力争，英方说是防俄，俄人说是防英，实际都是觊觎这一座世界的屋脊。这是英俄争夺帕米尔之开始。当时我若处理得当，未尝不可作两国的缓冲，无如正值中日多事，无暇西顾，反将已设之卡伦撤退，遂致英俄私定帕界，订立帕米尔协约，公然置中国于事外，我国亦竟毫未与闻。今惟塔克敦巴什一帕，尚在蒲黎县境内，其余小帕米尔、大帕米尔等七帕，均为英俄私分而去。总计失地二十余万方里。

以上种种历史的追溯，实足供我们国民的警惕，并启发我个人对于经营新疆之雄心。

蓄志远征新疆一个人到了塞外，极目远望，一片无涯的国土，自然会引起远征的大志。入晚听到悲壮动地的胡笳声，更不禁勃然奋发，跃然欲起。我在绥远与斯文赫定晤谈新疆的情形，并读了他的著述，使我对于新疆的地理形势及经济价值，增加许多认识。又鉴于内蒙的民族问题之复杂，新疆的汉回纠纷，更加严重。所以我认为新疆问题，中央必须派员妥为处理，而我就愿意担任这种工作。晋绥当局对于我这个见解及决心，都非常赞成，并允竭力相助。于是我就作成报告及简单计划，派陶钧同志带赴南昌，面呈蒋先生，当蒙采纳。是年冬天，闽变发生，我尚在巡视内蒙途中，接蒋先生来电，命我赴建瓯。即将内蒙事件迅速处理完毕，遄返南京，转赴杭州。由航空学校校长徐培根兄派教员邢萨非君驾一架双座练习机，送我去建瓯，当时气候严寒，彤云密布，颇有雪意，

飞行到江山附近，已大雪迷空，不能前进，乃折回衢州机场降落。高空风雪，寒冷异常，下机时手足僵硬，几于不能行动。次日风雪更大，短时间内不能飞行，乃乘铁路回杭州（杭州铁路此时仅通至衢州）遄返南京。

远征新疆计划概要 回南京后，就将远征新疆问题，详加研究。我以为白健生兄带兵五万赴新疆的计划，事实上是不易办到的。这并不是说没有五万兵力可调，也不是五万兵力尚不够用，而是五万大兵在二千多公里的荒漠长途上进军，需要极大的设备与极长的时间。在那时候，通新疆的汽车路，尚未修筑，汽车输送，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能通汽车，五万兵员的输送设备，也太不容易，决非那时的财力物力所能办到。若徒步进军，则不知要费多少时间。时间过久，变化愈多，问题亦更复杂，而且沿途给养，如粮食、饮水、燃料等之补给，及宿营之设备，都是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我认为：

第一、必须估计新疆方面反对的兵力，然后决定使用的兵力。据我所知，当时盛马两方面的兵力，合起来不过两万人，但是总有一方站在中央方面的，假定各得半数，则与我为敌的，仅有一万人。而且械弹窳缺，训练不精，我若用精锐步兵一师，附炮兵一团，另附飞机若干架，及装甲汽车若干辆，即使双方合以抗我，亦可应付有余，何况奉有中央命令，事实必不致此，则兵力更绰有余裕也。

第二、须克服荒漠长途行军运输的困难，争取迅速的时间。二千公里的徒步行军，即使沿途人力物力的供给，都十分容易，且无对敌的行动，亦须一百余天（每日平均行廿五公里，每三日息一日）之久。左文襄经营新疆，费时数载，仅就进军设备而言，如沿途筹备宿站、水站、及长途粮食，就不知费了多少精力与时间。现在这种简陋之设备，仅能适用于少数旅客，若大军进行，自非计划增加不可，这样在时间上所费更多。所以我计划完全用汽车输送，则一切空间上的困难，可以克服，并可争取最迅速之时间也。

第一项筹备工作——购置车辆训练司机 廿三年一月间，我

将经营新疆理由，及计划概要，呈报蒋先生，并提出行政院会议，请拨款一千五百万元为筹备经费，皆蒙核准通过。为保守机密便利进行起见，并不发表何种名义，而是由我负责暗中进行。第一项筹备工作，为购置车辆及训练驾驶人员。依我初步计算，全部官兵，约为一万五千人。每人平均体重一百四十五磅，携带械弹装具四十五磅，共为一百九十磅。全部官兵重量，约共二百八十五万磅。如用三吨半的载重卡车，每辆平均载重量为七千磅，则用汽车四百另七辆，一次可以输送完毕。故我决定购置各种汽车六百五十辆，其用途分配如下：

指挥车四十辆，以小包车及三轮卡车为主，专供各高级官长指挥传达命令之用。

炊事车廿辆，每辆装置汽汀爨锅六个，每半小时可煮饭一次，足供八百人之食。二十辆一次炊爨，即可供全军之一饱。并用极少量之柴油为燃料，可解除沿途燃料之困难。

修理车廿辆，车上装置修理机械，专供汽车修理及枪械修理之用。

医疗车二十辆，专供收容运送病兵伤兵之用，亦即移动的医院。

装甲车五十辆，供警戒作战之用，平时亦可装运士兵。

运兵车四百辆，专供运载战斗兵员之用。

补给车一百辆，专供运输各种补给物品之用。

这种编制与数量，虽然尚不能达到现代摩托化师的要求。（现代摩托化师，官兵约一万六千余人，携带各种枪枝约一万五千余枝，各种大炮二百三十余门，所需各种汽车二千七百余辆。）但以那时中国一师的装备，尚属简单，尤以各种的大炮数量，相差太远，则所需车辆，自可大量减少。故就当时之部队装备，并与财力物力配合，这种编制与数量，已颇合于实际的要求。亦为中央筹备摩托化部队之嚆矢也。

各种车辆之购置，得财政部孔部长之帮助介绍，与厂家直接订购。故能于三个月内在上海全数交足，而且价格较市价便宜三

分之一。又因汽车的装置，必须适合于西北地带的长途行驶。特亲往上海参观美国兵营的军用车辆，并同若干专家详细讨论后，乃决定式样，在上海杨树浦设立汽车装备厂，派林荣恩同志主持其事。林同志曾留学美国，对汽车装造，学有专长，尤富于国家民族思想。廿六年"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奉命装造鱼雷，轰炸黄浦江内的敌舰，失慎被难，长才殉职，我至今犹为痛惜！

驾驶员的条件，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赴远投荒的勇敢精神，与严肃的纪律，坚强的体格。我认为现有的汽车司机，不但数量不够，质的方面，更难适合要求，自非特别训练不可。于是在北平及晋绥方面招考青年一千余人，在绥远设所训练，由萧仁源同志负责。

第二项筹备工作——储运油料 第二项筹备工作，为油料之储运。估计由绥远至新疆迪化，全程约长二千公里，最低限度，准备八千公里的油料，方可供来回两次之用。沙漠行军，至耗油料，每车每加仑汽油以行驶十公里计算，则每辆需准备八百加仑。全部汽车六百五十辆，共需汽油五十二万加仑。另附必需用之润滑油，这样大量的油料，决不宜用汽车运送，以加增消耗，而须事前用兽力或人力，将其继续运至沿途各站，先行储备，以便汽车行进时，随时补充。

五十余万加仑之汽油，已经购到廿多万加仑，不等购齐，即须陆续起运。运输路线，分为两条：北路由归绥循绥新汽车路西进，经宁夏之北部，运到甘肃之酒泉县。此路唯一的运输工具，则为骆驼，每头长途可负三百多斤，约等于五十加仑。运输十万加仑，就要二千多头骆驼，几乎把绥新路上的驼队，都雇用完了。用骆驼运货，每日至多需要装卸两次，普通五加仑的油箱，极容易因碰击而渗漏，故须将油箱改装厚铁桶，每桶容卅加仑，方便驼载，不致损耗。这种工作，均甚麻烦。南路系由西安经兰州至酒泉，这路可利用骡车牛车汽车，比较北路要容易一些。两路最后的积集地，都是酒泉附近，因为这里已是甘肃省的极西端，中央

的力量，尚可达到，过此则安全就有问题了。而且我的计划，是将所有军队以及各种物品，均须于事前用各种运输方法在酒泉集中完毕，酒泉以西始改用汽车输送。盖如此，可节省汽油之大量消耗也。此项工作，由陈劲节、程章玉两同志负责。

第三项筹备工作——侦察路线地形 第三项筹备工作，为路线地形之侦察。这时绥新汽车，虽勉可通行，但在军事上可能发生之障碍与应行补救之设备，仍非派有军事专门知识人员亲往侦察不可。至于地形气候与战略战术之价值与影响，尤非实地考察，不能作正确之计划。故由徐佛观同志率领参谋人员，乘车由归绥经百灵庙，向宁夏之居延海出发侦察，往返近月。归来将考察所得，作成很详细之报告。以前我对于车辆在沙漠地带长途行驶之各项技术问题，虽经详细研究，但一经实地试验，就有许多不合理想的地方。新绥公路，并不是人工作成很合理想的公路，而是利用天然的路线，稍加修理而成的。沙漠地带，大风之后，路线往往为尘沙所蔽。大雨之后，又往往为积水所淹，通过十分困难。常须绕道探进，因此常有方向迷失之事。沙土路面，极不坚固，除了结冰时外，汽车的载重量较普通为少。行驶速度，每小时平均不能超过十五公里。每日行程，至多一百六十余公里，油量消耗亦较预想者为多。每加仑汽油，仅能行驶八公里。大队汽车同时行驶，非常困难，因尘土飞扬，后面的驾驶者，往往为所障蔽而不能开眼。故对汽车行驶时，前后应保持适当的距离，及防尘必须的设备。这些车辆行驶的问题，皆须研究解决。此外沙漠地带，气候变化，非常厉害，往往日中气候升至九十余度，夜间降至零度，故在沙漠地带旅行的人，必须随带夏冬两季的服装，才能适应一日夜间气候的剧变。因此官兵的被服，亦须有充足之准备，从而增加汽车运输的负担。沿途饮水，因汽车行程可以超过普通的驿站，虽不致发生困难，但有些地方，仅有一口水井，水量不够供给大军使用，于是拟购新式掘井机，将所到的站上，加掘水井。此种计划，不仅足以满足我们行军一时的需要，即为便

利以后永久行旅计，亦是非常重要的工作。玉门关以西，沿途原有的水井，多半是左文襄行军时所开掘的。我们趁这个机会，多凿水井，为后人造福，亦是至有价值的事情。

我为办事方便，并与各方联络起见，特在北平设办事处，由陶钧同志负责。我自己并于廿三年四月间，前往北平主持。

通迪化的两条路线 由内地到新疆省会迪化，有南北两条路线。南路为以前的官道，由西安经兰州、肃州，出玉门关，经安西、哈密、七角井、鄯善、吐鲁番而达迪化，即左文襄西征时所取的路线。北路为绥新间之驼路，亦北方商业交通之要道，由归绥经武川、百灵庙，沿阴山北麓之草原地带，经三德庙转入宁夏省北路之阿拉善旗与额济纳旗间之草原地带，而至居延海。再经径税山口至哈密后，绕出天山以北，经镇西木垒河台奇，阜康，西达迪化。南北两路的比较，如就往昔普通旅行着眼，则南路人烟稠密，物资丰富，气候温和，北路人烟极少，物资缺乏，气候寒冷。我为军事着想，决定南北两路兼用。即于起初取北路，由归绥至居延海，转入酒泉，出玉门关，再沿南路西段，而至迪化。其理由有三：

第一、当时由西安至肃州之汽车路，尚未畅通，而绥新汽车路则通行无阻。

第二、在绥远方面，进行各种工作，易于保守秘密。陕甘方面，则耳目众多。

第三、玉门关以后，须以哈密、鄯善、吐鲁番等处为对迪化集结作战之基地也。

筹备竣事乘机飞兰 各项筹备工作布置竣事以后，最后的问题，则为部队之派拨与编成。当时我还担任内政部长，手下没有军队可供远征之用，事前曾请示蒋先生，奉谕俟筹备就绪后，由胡宗南军长处抽拨。这时，胡军正驻在兰州附近，派遣至为方便，所需炮兵，我曾商得阎百川先生同意，由其指拨山炮兵一团。当时晋省炮兵甚多，其所指拨之一团，在四月间即在绥远点

交，公谊私情，均应感谢。我在绥远、北平方面的各种布置就绪后，遂于四月中旬由北平乘机飞洛阳，再转机飞西安。西安为我前代故都，规模颇似北平，附近之名胜古迹甚多。邵主席力子、杨主任虎城，曾留我游玩。我因急于赴兰州，进行我的工作，不能应邀畅游，至今引为憾事。次日，乘机飞兰州。飞机升空后，鸟瞰地面，关中形势，尽入目下。渭河、泾河、洛河的流域，都系可耕沃壤，南西北三方，都有雄伟的大山，以为屏蔽。东有潼关依山界河，为其门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实为我中华民族东进之根据地。周秦汉建都于此，固然由于地理形势之险要，亦为我中华民族初期发展时所必然。唐代以后，民族向东南进展甚速，遂不复再有在关中建都者矣。现在形势虽已变迁，然在国防军事上，仍不失其重要之价值。飞机由长安至兰州，须越过六盘山，此山拔海三千余公尺，飞行高度，须在一万二千尺以上，空气渐渐稀薄，呼吸颇感困难。同行石楚琛同志等已觉疲惫不堪矣。

抵兰时，朱主席一民兄等，均在机场欢迎，并接至省府后花园居住。此时由绥远出发侦察道路之陈劲节同志，已由居延海经毛目、酒泉，回至兰州。由北平先期派来兰州联洛之黄剑鸣兄，亦于此见面，分别报告经过情形。

来兰的两个目的　我来兰州之目的，第一是与朱主席商谈新疆进行问题，并请其协助一切。因为我以后要在酒泉集中部队，并集积许多粮食，以及各种必需的物品。这里是甘肃省境，必须得他的同意协助，方能顺利进行。他对于此举，自然表示十分赞成。并检出省政府所珍藏的左文襄经营新疆的文卷资料，给我参考。可惜我没有时间，不能把这些宝贵资料，完全读过。其次，是与胡宗南军长商谈使用他的部队问题。此事虽尚未奉到正式命令，但我必须事前与他商量。一日，他集合在兰州的部队干部，在省府开座谈会，把我远征新疆的计划，逐一报告，希望大家奋勇参加，他们都一致赞成。同时因他们远处西北，对中央及各省情形，未能十分明了，纷纷提出询问。尤其关心长城的战事，与唐沽协

定问题，亦经我一一答复解释，使他们获得了解与安慰。

开发西北须先由国家投资　这时，国内舆论界对于开发西北的论调，唱得很高。宋子文先生及上海的实业界巨子多人，亦于我到兰后一星期来兰州，并飞赴青海视察。他们是以经济开发为目的，甘、青两省地方人士，久苦贫困，对于经济开发，特别欢迎。但就我个人观察，西北的经济价值，不是在目前，而是在将来。不是需要个人的投资，而是需要国家的投资。因为今日的西北，并不是遍地黄金，而是到处贫苦与黑暗，要解决这普遍的贫苦问题，非由国家用很大的资本，很长的时间，大规模兴修水利，开发矿产，改良畜牧不可。目前西北社会之经济条件太缺乏了，人民的生活程度与文化水准，若和东南各省比较，恐怕要相差五十年的时间。移东南的人民，去开发西北，实在是一种不合实际的理想。而且西北人民的现时生活，决非东南人民所能忍受。东北移民之所以成功，实有东北之生活条件，优于关内人民生活条件所致，二者决不能相提并论。故我以为开发西北，必须先由国家投资，然后再由个人投资，必须不顾目前微薄之利益，始能获得将来优厚的利益也。

奉电停止远征　我一到兰州，即患脚气病，左脚趾溃疡，疼痛不堪，郁居近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故兰州附近之名胜，未得一往游览。在闲住中，忽奉蒋先生来电，嘱将远征新疆计划，停止进行，并命我即回南京。我奉到这个电报，宛如晴天霹雳，突如其来，惶惑懊丧，莫可名状！此中原因如何，当时既不及知，亦无从探询，而事实已不容继续进行矣。西北气候较迟，时令虽已残春，园花却正灿烂争妍，自己心病足病，两难其行，于百无聊赖之中，偶吟《浪淘沙》一阕寄慨，词云：

行不得哥哥，徒唤奈何！残春况值客边过，隔院鸠啼庭院冷，愁比花多。

岁月苦蹉跎，万里奔波，不因阻隔便情疏。引领长空西北望，天际黄河。

离兰返京 那时，我已无留兰州之必要，即乘飞机经西安、洛阳而回北平。一个失望的人，对于一切自然现象的观感，随着心理的变化而发生很大的差别。当我去兰州的时候，兴致蓬勃，沿途景物，春意欣欣，怡心悦目，似予人以光明远大之启示。而归途则烟云惨淡，触目生愁，一切感触，都与以前相反。到了北平，精神疲倦不堪，几至成病。勉强将各项经手事务结束，乃乘车南下。抵京后始知停止进行的原因，系恐怕引起中苏外交上的冲突。因京中得悉苏联的志愿军队，已开抵新疆边界也。其实彼引狼入室者，早已与苏联有所勾结。照我的观察。盛马之战，乃是个人地方性的冲突，中央既不顾问，苏联遂与之勾结，而以志愿军入境援助。若中央断然出兵制止，则盛、马两方，必有一方听命中央。而苏联见我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师出无名，亦必有所顾忌，或不致与我发生国际的正面冲突。而新疆问题，却可因此获得彻底解决，对国防经济双方收获之大，当不可以数量计也。乃因顾虑太深，致放弃国家应有之权利，不予过问，任其演变，造成十年来纷扰变化之局面。这不仅是我个人毕生的恨事，亦国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

我以失望之余，对于政治颇觉消极，乃请假三月回广西。原拟不再出来，即在地方上办理实业，稍尽个人力量，为桑梓造福，在精神上亦可得到安慰。广西当局各同志亦极同情我的遭遇，而愿意协助。但当时两广尚未统一，谣言甚多。蒋先生电促我销假回京，乃仍携眷北上，在庐山住了两个多月，身间无事，终日徜徉于山水之间，宛如置身世外桃源，已忘人间丧乱矣！

十六　第一次主政浙江

奉命主持浙江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间，我尚寓庐山，忽奉蒋先生召见，命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征询我的同意。浙江是全国精华之区，西湖名胜，驰名中外。自古来守是邦者，如苏东坡、白居易等，都与湖山并垂不朽。奉命之余，深感欣幸，但又颇踌躇，因浙江毗连京畿，又是蒋先生的故乡，地位重要，恐怕不能胜任愉快。而当时，蒋先生的意见很坚决，似不能辞谢，乃决意受命。蒋先生对于浙江财政问题，颇为关切，嘱我同徐青甫先生详加研究改进办法。默察他的指示，似有以徐青甫担任财政厅长的意思。我随即将省政府改组名单呈核。省政府的委员为我与徐青甫、曾养甫，许绍棣、蒋介卿、朱孔阳、周象贤、庄崧甫、黄华表等九人，以黄华表兼秘书长，徐青甫兼财政厅长，许绍棣兼教育厅长，曾养甫兼建设厅长，宣铁吾任保安处长，我自兼民政厅长，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到杭州就职。后来徐青甫调长民厅，程远帆继长财厅，曾养甫调任中央，伍廷飏继长建厅。

整理财政　当时浙江最严重的问题为财政困难。过去已经是借款度日，负债累累。并且浙江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经过二十三年的空前大旱，不但灾民需要救济，而一般农民，亦自救不遑，对于政府的负担，自更困难。我认为必须发行公债，方能渡过这重难关。当前任鲁咏庵（涤平）主席时，已决定发行赈灾公债二千万元，正呈中央核示中。我在庐山受命时，即面请蒋先生予以支持。到任后，续向中央陈请，方由行政院核准照办，省

财政的困难，总算暂获解决，而根本问题，尚极严重。我到任后，与徐厅长再三研究，期作彻底整理，务使收支获得平衡。当时浙江财政支出，每年将近一千八九百万元，而收入年仅一千五六百万元，其中尚多虚列。田赋为收入之大宗，计列一千一百余万元，其次为营业税二百五十余万元，其他零星捐税一百余万元。而田赋一项，实际收入，往往不过六七百万元。原来浙江田赋以浙西杭嘉湖及浙东绍兴各属占大多数。这些地方的农民，大都以蚕桑为主要生产，自从蚕丝滞销，丝业衰落，农村经济，大受打击，赋税负担的能力，亦受严重影响。且地方风气，大户以不纳粮为荣，其实不仅大户不纳粮，即一般人民，对于纳税完粮，亦甚疲玩。所以田赋收数极低，历年积欠至巨。现在我们要整理财政，当然要从开源节流，双方并进。而开源的方法，最重要的，即是田赋的加紧催征，及清理旧欠。但那时地籍尚未整理，一切串册，都操在庄户手里。以前本省虽费了很大的人力财力。办过土地陈报，结果不能应用。因为承办的人尚未经过训练，经验毫无，大都是闭门造报，讹误至多。所以政府虽加紧催征，而收入仍无多大起色。迨廿五年积极推进清理旧欠工作之后，收数始渐增加。其次对于税收方面，除挤查营业税之外，则为公开包商承办。但承包商人，狡诈异常，所得亦属无多。政府财政在此种情形之下，真是库空如洗，朝不保夕。我记得有一次徐厅长报告省库存款仅有廿八元，窘况一至于此，令人失笑。至于节流方面，全部支出中，债务支出，占了几百万。政费的实际开支，并不很多，实已无流可节。政府对于债信的顾全，非常重视。盖以前皆以借债度日，今后仍不免于举债，一旦债信丧失，则借款必多困难。可以说在那个时期，政府的财政权，实操在少数的金融巨头手中，政府时时要仰他们的鼻息，不敢有所得罪，苦痛情形，可以想见。如上所述，开源既鲜把握，节流又无办法，除了勉强维持原有局面之外，实在谈不到新政建设问题。

改革县政　浙江的县政，以前可说都是师爷政治，一切工

作，为少数幕僚所包办。此辈对于经办事务，秘不告人，亦不知改进，大有清代师爷旧习。县长对于县政实际情形，不甚清楚，也无从着手整理。尤以田赋税捐为甚。当我到任之前，曾辟兰谿县为实验县，意在扫除县政黑幕，建立新政基础，用意至为重要。兰谿实验县的干部，几乎全部都是中央政治学校的师生，县长胡次威，系政校教援，秘书科长科员等，多是政校的毕业生，行新政，用新人，若辈可说是受过新训练，具有新精神的行政干部。我到任不久，即往兰谿巡视，并指定若干县长，参观他们的主要工作。如办理土地编查，整理田赋税捐，以求县财政的充裕。其次为调整基层人员，健全乡镇组织，以求政令的贯彻。推行合作，以发挥农村经济。而以先求机关内部组织的健全，实行科学的管理，为其实验工作的总纲。虽然因时间未久，尚无特殊成绩表现。且其中仍不免有若干幼稚和困难的地方。但规模已具，一切都在进步之中，对于浙江县政的改进，自有极良好的影响。

在民国廿三年以前，国内人士，对于县政，尚未重视。尤其是一般立身清高较有学问的人，视从政为腐化，以县长皆贪污而不屑为。县长以下的佐治人员，更无论矣。以前县政之不能改进，这也是一个重要原由。我在内政部时，因县政是主管业务，所以非常重视。这次到任之始，即邀部里同人，前来参加县政工作。王先强以民政司长的资格，首先来任嘉兴县长。以前中央各部会的主管人员，对于县政，多鲜实际经验，因此若干政令，往往杆格难行。王先强之出任县长，实有鉴于此种缺陷，希望作实地的考察，而亦开中央高级人员到县工作之先河。其余如贺扬灵、周俊甫、曹钟麟、陈言等，皆舍中央的职务，来任地方工作，对于浙江县政的改革，亦大有关系也。

推行保甲 地方组织应实行自治，抑办理保甲。当时中央各方，意见不一，争论甚多，至难决定。浙江办理自治甚早，且较有基础，一旦推行保甲制度，实为省政一个重大的改革。我到任

之初，正是本省共产党发展的时候，浙东的开化、遂安、昌化、分水及浙南与闽省交界的处属各县，或被他们占领，或发现他们的踪迹。甚至杭州市的西郊，亦满布铁丝网，构筑碉堡，以防他们窜袭。虽经前任保安处长俞济时将浙皖赣边境的方志敏击毙①，但余众仍散伏四处，其在浙南方面的发展，正方兴未艾。我巡视浙东到达兰豁时，共党部队正由遂昌、溪口（龙游县属）进扰汤溪武义等处，金华兰豁一带，无不恐慌万分，我即调随行卫队，赴前方堵击，随后去龙游等处视察。其时富有之家，多闻风远避，一般士绅，亦软弱无能。地方既没有组织，自卫力量又非常薄弱，无怪赤祸迷漫，闾阎不宁，并非共产党有如何强大之武力也。我既认清这种情势，就决心办理保甲，以增强地方自卫力量。盖保甲制度，组织严密，适合国情。蒋先生在江西之胜利，得力于此种制度者甚大，正是我们一个明显的榜样。于是呈请中央停办自治，而代以保甲。因事属创举，为集思广益起见，并电请江西熊主席选派办理保甲有经验人员，来浙襄助，这是本省停办自治推行保甲的经过，亦为当时县政的重要改革。

普设行政督察专员 民国以后，府道制度废止，改行省县两级制。浙江为全国最小的省份，交通亦称便利，但省府对于七十多个县市，监督指挥，已感困难。此外地区较大单位较多交通不便的省份，其困难情形，当必更甚。蒋先生有鉴于此，在江西时创行分区督察制度，设置行政督察专员，以督导考察各县政治。施行之后，成效大著。但这种制度，当时仅施行于特殊地区，尚未普及全国。若干政论家认为有违省县两级制的原则，使行政层级增加，效率发生影响，所以直到现在，尚未成为定制。行政督察专员只是临时遣派的职务，而非正式列入国家官制的官员。

---

①方志敏烈士1935年1月在江西省德兴县陇首村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因叛徒出卖被捕，狱中坚贞不屈，于该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参照档案出版社《中国革命史辞典》）。

我到浙江时，衢、温、宁三属已设有专员，其职权甚小，且侧重于军事方面。当时省府对于各县，深觉监督难周，认为有普设行政督察专员以为辅助之必要。于是呈准划吴兴、长兴、孝丰、临安、於潜、昌化、安吉、武康、德清、分水等县为第一行政督察区，以黄人望为专员，署址设吴兴。划嘉兴、嘉善、平湖、桐乡、崇德、海盐、海宁、杭县、富阳、新登等县为第二行政督察区，以王先强为专员，署址设嘉兴。划绍兴、萧山、诸暨、新昌、嵊县、上虞、余姚为第三行政督察区，以贺扬灵为专员，署址设绍兴。划金华、兰谿、汤溪、武义、永康、东阳、义乌，浦江、建德、桐庐为第四行政督察区，以胡次威为专员，署址设兰谿。划衢县、龙游、寿昌、江山、常山、开化、淳安、遂安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以鲁忠修为专员，署址设衢县。划鄞县、慈谿、镇海、奉化、象山、宁海、定海、南田为第六行政督察区，以赵次胜为专员，署址设鄞县。划临海、天台、仙居、黄岩、温岭为第七行政督察区，以庞镜塘为专员，署址设海门。划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泰顺、玉环为第八行政督察区，以许蟠云为专员，署址设永嘉。划丽水、松阳、缙云、青田、宣平、云和、遂昌、龙泉、庆元、景宁为第九行政督察区，以陈式正为专员，署址设丽水。均于廿四年九月间分别成立。这时中央对于行政督察专员制度没有订颁统一规程，各省设置情形，及职权大小，也很不一致。当时本省规定各区专员的权限比他省为小，专司县政的督察辅导责任，不使各自为区风气，致与省府权限政令，发生冲突。但各专员均兼任驻在县县长，专署与县府合署办公，所以节省经费人力，并含有中心县之示范意义，这是与各省不同的地方。

推行会计审计制度 中央创行各种制度，浙江均能率先奉行，如会计审计制度，本省已于廿四五年间，分别实施，并由省推行于各县。此种制度，在消极方面，固在防止行政人员的违法贪污，而在积极方面，则为减轻行政长官经济方面的责任，使节省精力，以谋其主管业务之发展，自应认真实施，以宏效果。但就制度本

身方面说来，也还有许多缺点，须待改进，如会计制度手续繁而效率少，其经管账目，亦多积压不清。一种新的制度，大有演变而成为旧式师爷政治的可能。审计制度则因用人少而审核迟，往往失去时效，案件积压过多，日久无从审计。总之一种新制度之施行，原意皆甚妥善，但如施行之后，本身不能时求改进，则新制度势将逐渐变为老腐败，随而发生种种流弊，此则近年来推行新政之通病也。

浙江教育概况 浙江教育素称发达，历代名人辈出。民国以来，新进的人才亦不少。当我们接任的时候，高等教育有省立浙江大学，私立之江大学，国立西湖艺术学院，省立医药专科学校等。职业教育有高级工业农业商业助产蚕桑水产及初级农业等。一般中学教育及师范教育。就学校数量上说，不论是省立县立或私立，均称完备。初等教育亦极有基础。社会教育方面，除省市县均设有民众教育馆及民众学校外，省立图书馆博物馆等内容，亦相当充实。虽然历任政府因经费困难，各项教育，仍未能针对社会实际需要，大量发展，但较之其他省份，并无逊色。且就质的方面说，各级学校设备，均相当完善，办理颇为认真，学生程度优秀，尤为其他省区所不及。此固由于浙人秉赋聪颖，地方勤学风气浓厚，而历届教育当局刻苦兴学之功，自亦不可淹没。可是因为接近上海的缘故，浙人在上海者为数极多，一般富有之家，多送其子弟赴上海或外洋求学，各处士绅对于省内地方教育，并未能十分注意，例如余姚一县，人口五十余万，地方素称富庶，竟无一所中学，即因该县豪富，多在沪经商，负有声望的人士，亦多外出服务，竟致无人过问地方教育事宜，此实为当时浙江教育的一大缺憾。

民国二十三年以前，各省地方教育的发展，多仗地方士绅及热心教育人士的倡导与努力。政府方面，则以连年内战，大宗经费多用于军事，对于国家民族盛衰兴亡有关的教育工作，未能予以切实之注意，更无整个的远大的计划，是以少数教育家虽苦心孤诣的提倡经营，而实际所收的效果，仍是有限。在北洋政府时

代，教育部虽已设立，但皆以闲衙视之，各省教育主管机关，组织多不健全，或竟尚未设立。国府奠都南京之后，虽设置教育厅，为构成省政府主要单位之一，而全国军事，尚未底定，政令尚未统一，推行教育，障碍仍多，自难求其普遍的发展。我到浙江后，亦只有维持现状，未有若何重大设施。此固由于省财政的困难，而传统观察的错误，与自己认识的欠缺，都有极大关系。叙述至此，实不胜其感慨与愧恧也。

浙江交通的发展 浙江的陆地交通，除了原有沪杭铁路之外，其余的铁路公路，都是革命政府成立后建设的。当我到任的时候，境内已有二千多公里的公路，全省的公路网，大致均已完成。而且在工程方面，多是适合标准的，平时的保养，亦甚注意。据我的观察，当时全国各省的公路工程的保养，湖南居第一，浙江可算第二位。浙南多山地区的公路，大半是就沿河栈道改筑的。据说若干段工程，每公里的建筑费，约需二万元，工程的浩大与困难，可想而知。这些公路，有的是政府修筑的，有的是人民修筑的。大致有营业价值的路线，多半是商办的，没有营业价值的路线，都是政府经营的。在我任内，仅增加了杭州至嘉善，开化至淳安，遂昌至碧湖，吴兴至嘉兴四线。我卸任的时候，已有公路三千余公里，似足适应当时之需要。杭江铁路是张主席静江任内以省款开始兴筑的。我到任的时候，已由杭州通车到江山。这条铁路，当初用的是轻轨，所费极省，工程进行甚速，在国内也算是首创纪录的工程。当然其中经过的困难也不少。这些交通建设，多是在曾养甫厅长任内，奠定基础，以后不过萧规曹随，酌予添补而已。曾氏在交通建设方面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浙江蚕丝业的改进 浙江的丝业，素占全国的首位。在极盛的时期，年产价值约达九千多万元。自从日本蚕丝改良，大量增产，出口倾销以来，华丝销路，一落千丈。首先受到影响的，就是浙江。政府为挽救丝业危机，在改良蚕种改进缫丝技术方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在省政府之下，特设置蚕丝统制委员会，综理其事。素以养育旧种为业的人民，对于政府的蚕种统制办法，极表不满。我到任不久，竟发生聚众焚烧政府所设蚕种改良场，而至派兵弹压的情事。蚕民对于曾养甫之责难甚苛，政府一本以往政策，坚定不变，并剀切晓喻利害，风潮始渐平息。蚕类改良与缫丝改良的结果，在品质方面，足与日本所产者相抗衡，外销市场，亦渐恢复，这在中国蚕桑史上是值得记载的。这种产业改良工作，虽经不少风波，而卒能成功，所谓"人民难与图始，可与乐成"这句古语，在人民狃于旧习而无新认识的情形之下，是相当正确的。

粮食增产与稻麦改良 浙江是缺粮的省份，据统计年缺粮食约计三百万担至五百万担。全省山多田少，人口密度仅次于江苏。耕地面积既无法增加，唯有改良耕种技术，以增加生产。浙东各县，特别是金衢各属的农民，耕作极为勤劳与精到。所有耕地，终年没有休息的时候。广阔的原野，几乎四季保持着碧绿的颜色。收了稻子，即种大豆，收了黄豆，又种麦子。一年三熟，而且收获量都很丰富。一亩中等的水田，普遍可收五百多斤稻子，上等的当在六七百斤以上。我常乘车来往安徽、江西、福建交界的地方，几乎不必望省的界牌，即可知道那处是浙江，那处是外省，因为在地面上的作物，就有显然的分别。

稻种的改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培育，才可获到一种新的优良品种，得以推广繁殖。而且因各处的气候土壤，多不相同，在此处是良种，到了别处，说不定变为劣种。所谓"橘逾淮为枳"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改良稻麦品种，必须实施分区试验。民国二十四、五年，本省的稻麦改良工作，已到了试验的最后阶段，直至二十八九年，推广工作，才扩大进行。据考查本省改良的稻种，平均每亩的收获量，比旧种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每个穗的稻麦，多至三百六十多粒，而且米质充实，苗的抵抗力甚强，不易受到各种病虫的侵害。这是专指稻种

而言，此外小麦和棉种的改良，也都有相当的收获。

浙江渔业 浙江沿海的渔业，在全国中，亦占极重要的地位。定海的沈家门，便是东南著名的渔业市场，每年的渔产数量，虽无精确的统计，而沿海各县以捕鱼为业的，据查有十余万人之多。假定平均每年每人收入三百元计算，一年的总收入，就有三千多万元。唯捕捞工具不精，储藏设备制造技术等，也都墨守成规，不知研究改进，所以每年收入，也只限于此数。但从反面设想，仅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尚有如此巨大收益，如果将渔捞工具、水产制造、储藏、运输等力加改良。并加强海上防御，以策渔民安全，则收获的利益，必十百倍于此。政府有鉴于此，曾设水产学校，培植人才，从事改良。可惜抗战军兴，沿海为军事冲要地带，皆为敌人控制，学校停办，渔民不易出海捕鱼，渔业一落千丈，非俟战事结束，不能恢复与发展也。

浙江保安团队 浙江的保安团队，装备枪械，都很完备，训练亦颇纯熟。在共产党侵入省境的时期，地方治安，依赖他们的力量维持，尤以击毙方志敏之役，战功最著。以后一部改编为国军第五十八师，由前保安处长俞济时率领，开赴汉口。省军改编国军，虽因其著有战绩，亦由于省方财政困难，借此可以减轻负担也。浙江保安处内部事务之处理，有一优点，即为经理制度之严密。此种优点，在当时的正规军，亦恐不及。直到现在，依然保持着昔日的规模，这是很值得称述的。

建筑国防线 自一二八淞沪战争以后，浙江在国防的地位，顿形重要。因上海为日冠既得之根据地，万一战事发生，敌人从上海登陆，分向京沪、沪杭两铁路沿线前进，首都重地，立刻受到威胁。所以中央对于苏浙国防，亟谋巩固，计划建筑永久国防工程。分为锡、澄线与乍平嘉线，乍平嘉线是由浙境之乍浦镇起，经平湖嘉兴两县，而至苏浙交界之王江泾镇，全长约八十余公里，此线由我负责建筑。当时中央拨款一百万元，我以经费太少，殊难建筑强固工事，即由省府拨款一百五十万元，以资补充。为保

全工作秘密起见，并不发表名义，和成立公开的机关。只是省政府内设一办公厅，秉承中央密旨，秘密进行。派徐景唐为参谋长，张谓文张少杰徐佛观等为参谋，负计划之责。派杨澍松为工程处长，杨长鑫为副处长，陈琮等为工程师，负建筑工程的责任。当时因为经费的关系，八十余公里长的防线，若照筑城学上规定的堡垒建筑，势必难期周密。于是着手研究改良之法，务使堡垒的强度不减，而能全线周密布置。我曾设计一种轻型的堡垒，几经试验，却很满意。某次实弹试验时，我几遭不测，这种堡垒，抗战后各处国防建筑皆多使用，差不多已成为一种定式了。据报日寇占领杭州之后，曾以大炮轰击，皆能抵御，彼亦认为此种轻型堡垒，在防御上有相当价值。当时我几以全力从事国防建筑，及各种军事准备计划，对于政治方面的本身责任，反多疏忽。办公厅的同仁，乃至一班建筑的工人，均极兴奋，工作异常努力，故全部工程，均能如期完成。可惜二十七年上海会战后，因战略关系，乍平嘉线弃而不守，未能作保障杭州一日之用。以致我及共事同仁年余之心血，与中央地方所费之大宗款项，均成为毫无价值之敝屣，至今思之，尚有余痛。

实施战时动员准备工作 因为加强国防的关系，随而展开了若干与国防有关的动员准备的工作，第一项是实施国民军事训练。首从办理省级公务人员入手，含有为民前锋的示范作用。特设训练机构，名曰省会公务人员训练团。我自任团长，许绍棣、宣铁吾、郑炳庚任团副。省会各机关公务员每日规定时间集合训练，为期三个月。训练后，一般精神，极为振奋，对于国防意识，普遍增强，行动迅速，形式整齐，纪律严肃，确实收到相当效果。各县皆遵行训练，一时蔚为风气。此为浙省公务员训练之先河，是值得纪念的一件事。其次则为民众训练，分为壮丁训练，与义勇警察训练。全省壮丁训练，省府设训练处，以总其事，郑炳庚任处长。各县设社训总队，县(市)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任副总队长，各县市人民均能踊跃参加。义勇警察系我在内政部时创议的制度，

到浙江来，首先实行。由周象贤，赵龙文总其事。各省亦随而实行，几已普遍全国。义勇警察的训练，以市区为对象，就市民中之壮丁，加以警察的训练，以备战时协助警察，负担市区紧急任务，参加者亦极踊跃。训练至为认真，并随时在市内实习，执行警察职务。廿五年双十节，召集杭州市及杭县附近已受训练之公务人员壮丁义勇警察，举行大检阅，参加者一万五千余人，实为民众空前大集合。杭州日本领事对此至为注意，听说事后多方调查我全省壮丁训练的情形，及受训人数，可见日人对我国民众组训及武装的重视。七七战端暴发，此亦为其原因之一也。第二项工作是举行军事有关的各种演习。杭州是中国航空的主要基地，亦是中国空军的摇篮。中央航空学校防空学校都设在那里。在军事上无疑的是敌军首先攻击的目标，故我国防空演习也首先在杭州举行。时为民国廿四年的冬天，地面上防空的工作，除了市区军警，一致参加之外，并动员了已经训练的义勇警察和壮丁，由航空防空两校共同负担指导，情况至为逼真。使民众对于防空，获得极深刻的认识。"八一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敌空军出动助战，杭州首被袭击，我英勇的空军，奋起应战，将来袭敌机全部歼灭，在我空军史上写下最光荣的一页。"八一四"遂成为我空军重要纪念日，由中央规定为空军节。

正在演习的时候，有一重要外交事件，值得附述。那时我忽奉蒋先生电话嘱立刻乘机飞京，时已傍晚，且风雨交加，飞机不能升空航行，乃作罢论。旋又奉电话，嘱我中止赴京。当时莫明底蕴，颇为惊愕。事后方知日寇在北平，向我提出了种种苛刻要求，中央派何部长敬之前往处理。因为民国廿二年我曾同何部长在北平担任过工作，便命我随同襄办。那天夜里，即须动身北上。因时间赶不上。改派熊天翼、陈公洽两位随往，这就是所谓何梅（梅津美治系日本驻天津陆军司令官）协定的序幕。

同时举行水陆运输演习 陆军的运输演习，正在那个时间，分别举行。有一次，将全省公商汽车大部征集起来，运输两团的

兵力，假想开赴前线参战。这个演习的目的，在获得战时汽车的征调指挥，道路的改良，与军队的乘车下车，军队的行进等等之实施知识。并由此发现其困难，以谋解决的方法。又有一次，举行水路运输的演习。以一师的军队，由萧山方面渡过钱塘江，再由湖墅乘船，沿运河而至嘉兴的前线。这些演习，都由我负责主持，中央派员参加指导，情况紧张，成绩也称不恶。而我亦因此得到很多实际经验，并认识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而知所改进。在那时我的全副精神，几乎都集中在这些事务上面，虽然增加了地方许多负担，同时行政方面，也不免受到若干损失。然而为了国家，为了国防的问题，也是出于无可如何啊。

中日航空协定中止签订之内幕 在廿四年的春天，日子已记不起来了，蒋先生住在溪口的家乡，忽来电话，嘱我立刻转知南京行政院汪院长停止对日签订沪冈航空协定（日本福冈至上海中日合资）。并指示必须停止的理由，即使日本对中国以武力压迫，亦不能签字。因为此项协定，一经成立，日本即可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并且必定继续援欧亚航空公司（中德合资），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合资）的前例，要求在内地航行，并建立基地，那时候就无法拒绝他们了。日本以武力占领一地，仅是一地的损失，如果日本飞机能在我领空自由航行，并在内地建立基地，则我所有的国防空防，彼必了如指掌，势将全部被彼破坏，所以这个协定必须停止签订。语气极为坚决，命我将这个意旨，一字不漏的，转知照办。我遵命立即照转，因为中日航空协定双方定于是日下午两点钟签字，这样拒绝外人要求的强硬态度，实开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先例。协定突然拒绝签订，日本方面极不愉快，因此酝酿出以后种种问题。中国方面也随而发生了政治风潮。

中日航空协定中止签订后的政治风潮 原来这时候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正在进行所谓中日外交调整工作。中日航空协定，即为其调整工作之一。临时停止签订，不仅予日本一个严重的警告，亦为给汪精卫政策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不久汪即以养病

为名，逃避青岛。陈公博、陈璧君及其亲信若干人，都离开了南京，到青岛去，中央政局，又起了一个轩然大波。南京方面，有好些人因汪氏之走，认为政治上失了重心，深恐因此引起日本武装的侵略行动。同时又恐怕再引起国内政治的重大纠纷。此时蒋先生正在成都，大众的意思，要我去成都见蒋先生，面陈种切，并请蒋先生指示对汪氏出走的态度。他们推我去的理由，想系因为上次汪氏托病出走莫干山养病，也是我去奔走的，似乎含有驾轻就熟的意思。我几乎成为汪氏政治病发生时一个代述病状领取药方买送药品的侍者。我这次赴成都，是由上海乘中国航空公司小型水上飞机专机前往，到万县上空，机件忽生故障，不敢高飞，乃降落扬子江的水面。在江面上飞行，既是最慢的飞机，又是最快的汽艇，实为生平难得的际遇。而富有诗意的三峡，竟坐飞机在水面上游览，亦算是一个古今未有的奇遇了。到了重庆，这架飞机已不能再飞，乃改乘他机到成都，即日偕杨畅卿晋见蒋先生，陈述来意。蒋先生说："如果日本因为航空协订签订不成，欲以武力压迫，我就立刻对他开战。以前因为中央力量，尚未深入四川，东南各省交通便利，距敌过近，不能作长久抗战的根据地。现在中央军队，已进驻四川，即使开战，一定可以持久，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因为使命的关系，不能不再三陈说。杨畅卿也补充我的意见。我们以为四川初定，西南方面，尚有问题。统一基础，未臻巩固。而且国防的准备，正待积极完成。万一对日开战，顾虑甚多。辩论了相当时间，最后蒋先生郑重指示说："你们的顾虑，都是就以前或目前的看法来讲。我可断言，中日一旦开战，这些问题，都要化为乌有，国内一定更加团结统一。至于国防的准备，也不能作万全的打算，一面作战，一面准备，要比平时迅速得多，而且日本对中国，即使没有航空协定问题，亦随时可以对我寻衅开战。你们以为航空协定不签字，将为引起中日武装冲突的主因，我则以为中央力量到了四川，将为他不敢即时对我开战的主因。"最后并坚决表示，航空协定问题，不必再谈。如果日本

不发动武力，仍可由汪先生与其敷衍。嘱我将这个意旨，转达南京及汪氏。这桩事情，蒋先生在民国三十二年本党五届十一次中央全会时尚提起，以证明今日的形势，与他当日所判断的，若合符节。蒋先生谋国的深远，见解的卓越，使我于追怀往事之余，不禁肃然起敬！

我奉了蒋先生的指示，随即乘飞机回南京。并再飞青岛，将意旨转达汪氏。同时劝他即回南京主持政务。政客的作风，总是扭扭捏捏，缺少直截爽快的风度。他还是装腔作势的说："等病好了再说"。不久，他病就好了，仍回南京，担任行政院长。一场由外交而引起的政潮，也就此告一段落。

由成都回京途中，飞机在高空飞行。我坐在机上，展望缥渺无垠的云海，才觉得天空的伟大，它把地面上坎坷不平的种种状态一概掩盖了。偶而俯首鸟瞰，忽见映在洁白的云海上面有一个飞机的影子、周围衬托着紫红的圆圈，随着机影而移动。因此我得到一个迷信的解释：我在峨眉山的时候，有人邀我去游山，他们说："山的最高处，有一个舍身崖，如果你与佛有缘的话，在那里向云海下望，可见到佛象，这佛象就坐在紫红的圆圈里面，有些人以为这便是仙境了，也就有人因迷恋这仙境而投身下去丧失其生命，舍身崖就因此得名的。"这种传说，与我在飞机上所见的云海机影，是一样的情形，不过在舍身崖所见的是自己的影子，而不是佛影。我在云海上飞行的次数很多，在别的地方都未尝遇见这种现象，也许因为四川的云海水分比较的多——四川是中国潮湿而多雨雾的地方，飞机在某一种高度及阳光在某一个角度映射之下，就有这种现象发生，而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见到的。

青岛是太美丽了，经过德国人的割据，日本人的占领，先后装上了若干德国与日本的风味，更增加了他各种不同的颜色。尤其是夏天，成为国际海军及一般有闲阶级消暑的胜地。我到青岛去的时候，正值暑期，就在那里逗留了一个多星期，领略那锦绣的山光水色，这可算得我这一次东奔西走最有价值的报酬。

两广异动的前因后果 廿五年三、四月间，两广当局，突以抗日的名义，出兵湖南。消息传来，深感诧异！两广处在中国的极南，要北上到上海汉口，或天津北平，才可以碰到作战对象的日本兵，但中间要经过中央权力完全到达的若干省份。中央与两广的关系，多年来均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中，两广当局以抗日为名，贸然向湖南进兵，既未得到中央的允许，而且抗日是国家整个的问题，决非一二省的力量可以达到胜利的目的。这种异乎寻常举动，真非局外人所能揣摩其理由。我数年来奔走于中央与两广之间，无非为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努力。亦可以说，这不仅是我个人的希望，而是全国人民所一致期望的事情，现在突然演变到这个恶化的程度，真似佛家所谓无可挽回的劫运，只有祈祷上天，不再扩大事态而已。然而事实的演变，又有出乎意料之外者。广东内部，忽然起了极大的变化。多数的陆军与全部空军，都表示服从中央，脱离广东的关系。广东的局面因此急转直下，迎刃而解。广西方面亦随而转变方针，言归于好。中央任命李德邻、白剑生为广西善后督办与会办，黄旭初为省政府主席，数年来悬而不决的两广问题，至是仍得和平的统一，这岂不是国家意外的幸事么。这两个突然发生的哑谜，后来我到广州，才知道清楚。原因是一个占卜星相的江湖术士，发痴一般的信口胡言，说某人应败，某人当兴，某方不利，某方兴旺。这种没凭没据的荒谬之谈，竟有人信以为真，而作为政治军事行动的指导。活象旧小说旧戏剧中一个卖卜测字的人，几句谰言，马上变成捏鹰毛扇的军师一般，说来真是可笑。但是一时的黑暗，终掩灭不了永远的光明，光明一定会把黑暗扫除，而回复他灿烂的景象。这就是这两次突变的前因后果。我到广州的时候，尚能看到这位术士神坛的遗跡，和听到好多神怪的奇谈，这也算是二十世纪科学世界中一桩怪事。

出人意外之奉调广西军务善后督办 五月间，蒋先生来电，要我到庐山去。我就乘浙赣铁路火车，到了南昌。浙赣铁路

是将杭江铁路延长而成，在廿四年的冬天举行杭南通车的典礼，我曾经同浙江省的党政绅商往南昌去访问。从前相隔千余里，交通困难的两个省会，现在可于一日一夜之间到达，这也是东南交通的一个大进步。这次，我奉召到了南昌，忽见报载国府任命我为广西军务善后督办，李德邻调军事委员会委员，白剑生调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消息。这一闷雷，打得我昏天黑地，几乎转不过气来。好多报馆的记者要求接见，问东问西，采访消息，简直使我无言可答。当日匆促赶上庐山，问明真相，想作请求收回成命的打算。因事实已经如此，只是如何设法补救而已。我曾对杨畅卿说："这无异于硬捉媒婆充新嫁娘，两方精神都要受到极大的痛苦。"他笑着说："横竖你已经嫁过，（指二十年曾充广西善后督办）再嫁一次，又有什么要紧，你还是准备上轿吧。"这时真弄得我啼笑皆非，进退维谷。因为我数年来奔走两广的问题，无非是想求内部的团结统一，加强对外力量。我对于广西如果有留恋，早就不应该退出了。现在要我再回广西去，不但违反了我过去的心愿，而且各方面都要对我发生误会，公私都没有什么好处。我于是把自己处境困难的理由，向蒋先生陈述，幸而得到谅解。随即由我致电李德邻、白剑生，说明这事不是我的本意，表示我决不回去就职，以明我的心迹，并且劝他们尊重中央的意旨，作妥善之解决。自然一时是不会得到谅解的，而且事情一定要更形恶化。我于是回到上海，不闻不问的过了好些安闲的日子。浙江省主席职务，因白未到任，由徐青甫代理，以下的人员，仍然照旧不动。

解决广西问题 我在上海住了不久，蒋先生又从广州连来电报，要我到广州去。我心忐忑不安，不知又要担任什么工作了。由上海坐船到香港时，一般与广西方面有关的人物，都到船上来接我。他们不是来欢迎新长官，而是来欢迎旧长官的。彼此相见之下，非常款洽，大家都有说不出的微妙意思，蕴藏在各人的内心。我自退出广西，对于他们，从来没有一些私意与恶意，

他们对我，也没有一些私意与恶意，这是我数年来衷心所引为最安慰的。我对他们表示，当本着一贯的主张，尽我的力量，不使广西糜烂，国家分裂，也希望他们对此共同努力。随后我到了广州，双方已在那里调兵遣将，积极准备作战。我晋谒蒋先生的时候，申明我的意见，仍望尽我的力量来担任调停工作。蒋先生也没有一定要使用武力的意思，对于我的意见，表示允可。我于是来往省港之间，从事接洽。同时也有很多电报给广西方面，但是都得不到什么要领，情势一天一天的恶化，好象有非用兵不可的样子。中央方面并要我担任讨伐军总司令的名义，逼得我非常为难。这时参谋总长程颂云（潜）先生亦在广州。我对他说："情形虽未能即刻好转，但并不是完全绝望。据我的观察，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善后问题，更属困难。如能迁延三个月，也许倒有和平解决的希望。顾虑事实与保存国家的元气，静候一些时间，要比立刻用兵合算得多，因为以往国内许多纠纷，起初无非是当事者一些面子上意气上的争持，彼此互相激荡，遂成为狂波而不可挽救。并不是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存在其间。而必须以武力来解决的。假使我们设身处地，为广西方面打算一下，自有其许多困难。如能假以时间，使其从各方面着想，亦必能自己寻求其解决之道也。"他对我的见解，很为赞同。于是我同程总长到黄埔去见蒋先生，我将意见陈述，幸蒙采纳。由我同程总长分别再电他们，作最后和平之斡旋。不久，得到他们的回电。并且提出若干解决条件，希望我同程总长到广西去商量。开价虽然很高，但并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又将来电呈核，后蒙蒋先生大度宽容，差不多都完全允许了。并且派我们到广西去。一个极严重的危机，终于又得挽救过来，内心是如何快乐啊！

我们到广西去磋商和平，当时有人以为有亏中央的体面，应该由他们先到广州来，方为合理。我觉得不必计算这些小节，唯其如此的豁达大度，更足以表示中央相忍为国的苦衷，而使今后国人更能精诚团结，共御外侮。我们飞到广西，李德邻、白剑生、

黄旭初都在武鸣机场等着欢迎，大家相见之下，并不象接待代表的例行仪式，而是充分表现出患难知己的真诚情意。除了照例的应酬之外，并没有形式的讨论，而是诚恳的商谈。我们并邀李德邻一同到广州，面见蒋先生，一切事实问题，都可顺利解决。他也坦白的答应了，我们三人遂同赴广州，在飞机上，深觉同舟共济的意义，就在那蔚蓝的天空上，充分表示出来。这件大事的完成，岂真有天意么？无非是几个人以诚相见的结果而已。到了广州，下机后，休息不久，预备一同晋见蒋先生，而蒋先生却先到来了。我想彼此握手相见之下，必有说不出的愉快与感慨。同时更觉得蒋先生的伟大与亲切。此后的问题，由他们当面去解决，我不愿再为参加了，一桩弥天的大事，至是烟消云散。我在广州香港，痛痛快快的过了几天，在那个情景之下，真是值得痛快的啊。数日之后，蒋先生又要我回到浙江的任上去。真是做戏一样，反串了两个多月，仍旧恢复了本来角色。我回到杭州复职，一切依旧，好象是预先安排仍要回来的样子。至今回想，的确有些可笑。

浙人的迷信 二十四年春间，蒋先生在家乡奉化溪口小住，有一日，我随他到甬江南岸的育王寺游览，这是浙东有名的寺庙，香火非常之盛。那住持的方丈说："前年育王宝殿被焚，估计要二十多万元才可修复。募捐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富商，愿个人独资重建，寺方认为这是万众的善缘，不能任他一人独占，而拒绝了他的好意。"这话是否确实，不去管他。但一般富有的人，往往对公益事业，一毛不拔，而看在菩萨面上，却偏能慷慨解囊，则确是事实。浙江各地的名山古寺，每年不知消耗多少金钱，单就绍兴的锡箔税而言，那时一年的收入，就有三百多万元，以十倍来伸算，锡箔的价值，即达三千万元以上，政府虽抽征三百多万元的税收来办理教育，破除迷信，但这真是扬汤止沸的笨法，于事毫无所补。那和尚又拿出装在一个小玻璃器具内的"舍利子"与我们看，他说："这是中国唯一真的舍利子，不但中国各

地，就是很多日本人，也要到这里来瞻仰。”说的十分郑重，好似育王寺香火的旺盛，就全仗这个佛宝一般。我看那黄豆大小的东西，是半透明的琥珀质，在各种不同方向的光线看过去，就发出各种不同的光彩，这就是他们认为无上至宝的地方，其实这有什么稀奇呢！三棱的玻璃和猫眼石，不是照样可以发出不同的光彩么？就科学观点说，总不过是很浅显的折光道理而已。据说：“这是某代高僧修炼得来的结晶。”不管这话是否可靠，即使真的是修炼得来，于他本人有什么益处？于众人又有什么益处？而值得那样去宝贵它呢？在千余年前，已出了一个反对迎佛骨的韩愈，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革除迷信的政府。如果任他自然的下去，不知还要多少年，才能使这种迷信举动自然的消灭。唉！中国还是在迷信的环境里面，先行发展科学教育，然后破除迷信好呢？还是用革命的方法，先扫除了迷信的环境，然后发展科学教育好呢？这真是今后行政上值得考虑的问题啊！

义务劳动与公墓制度 那次，蒋先生指示我两项工作：第一是人民劳动服务，第二是设立公墓制度，这两项新政，就全国言，浙江都是最先实行的。劳动服务，首先由省会的公务人员做起，在杭州市内，将那条污臭的运司河填平。我和省会各机关的同事，大家服务了三天，工作的效率，虽然很低，而工作的情绪，却非常热烈。这条马路，就叫做劳动路，作为义务劳动的纪念。各县对于这个运动，也很热烈的进行。如修筑道路，疏浚河塘，都有很好的成果。由杭州到嘉善的杭嘉公路，就是沿线各县人民义务劳动的结果。

浙江本是缺粮的省份，由于二十三年的大旱，人民饱尝饥饿的痛苦，我对开辟耕地，增加生产，自然认为是很重要的措施。而埋葬尸骨，多是良好的土地，却被死人永远占领着，并在日益扩大中。生人耕作的土地，则日渐感少，以致影响生产，这便是中国以迷信方式孝敬祖先所获的结果。浙江宁波镇海一带，这种情形，更为显著。那边的土地，恐怕要占可耕土地十分之二三。

宁波一带出外经商的人民，能不能赚钱回家，是不一定的。但是死了以后，一定可以赚得一副外面的棺材回来。因此宁波的口岸，客死他乡者的棺材，要占进口轮船很多的吨位。我尝驱车由宁波到镇海，沿途差不多都在丘坟间行驶，真是他处所未有的现象。自从迁移私坟设立公墓的命令颁行后，有些县份，因为不感觉土地的需要，未能踊跃实行。至于感觉土地需要的，如宁波镇海等，经努力执行之后，立刻发生很大的阻力：第一，公墓是新创的制度，社会上都没有送死人进公墓的观念和习惯。而且过去具有公墓形式的义塚，是那些贫苦无告者或路尸的埋葬之所。是以普通人家，都不愿意送死人到公墓去。第二，公墓设备太简单了，只有一块木制的墓碑，似乎不够体面。第三，社会上大多迷信风水，公墓是不考究这一套的。如果强制他们的先人遗骨离开了好风水的地方，而到公墓里去，是一件不可补偿的损失。而且公墓的建筑设备，本来是葬者公共的事业。一般人宁可个人花费数万以至数十万，去建筑私人的坟墓，要他们在公墓里花上一万八千，就没有人乐意了。在财政困难的时候，政府那里有这许多钱来从事公墓的建筑？公墓建筑不成功，私墓的迁移，就成问题。更有一些地方士绅，联名电请中央制止。电文大意有云："蒋委员长以孝治天下，对于生母坟墓，备极爱护，何以对人民父母之坟墓，则须勒令迁移，望本'孝思不匮永锡尔类'之心，立令省政府收回成命"等语。我接得这种电报，察阅他们的意思，好象迁移私坟，创立公墓，完全是省政府自己变出来的新花样，而以委员长的孝思作为阻止迁坟最有效的工具。真有些象民国十五年，我在广西通令全省捣毁偶像，我回到家里，我的母亲却要我去拜菩萨同样情景。想起来，真有啼笑皆非之慨！由这迁坟的问题，充分表现中国社会旧礼教束缚力量之强大，与政治上事实之矛盾。中国政治，并不是没有好的政策，但是这等束缚，不能解除，矛盾不能解决，对政策政令的推行，不免有很大的阻碍。上述迁坟问题和破除迷信两点，都是明显的例子。

调任湖北主席与西安事变 廿五年十一月的下旬，湖北省政府主席杨畅卿被刺殒命，蒋先生由西安来电，调我去湖北，我只得从命。我已与浙江新任朱主席骝先约定于十二月十六日交代，准备先到西安去请示，再赴湖北到任，已经定好机位，拟于次日由上海飞西安。那天晚上，许多朋友饯行，饮得大醉，第二天早上，竟误时上机，只好等到下次班机再去。在第三天的晚上，（十二月十三日）已知道蒋先生在西安被叛军劫持的消息。这真是震骇全国，轰动世界的不幸事件，我幸而醉后误班，不然，这时候亦正在西安，不知要遭如何的结果呢。当天晚上，何部长敬之来电话邀我到南京去，共商挽救大计。次早，即乘车到南京。中央方面有主张武力讨伐的，有主张和平营救的。结果是两者同时并进，一方面任命何部长为讨伐军总司令，一方面派人到各方营救。我被派往山西，与阎伯川先生商量，就近设法营救。同行有东北将领王亭午王维宙两君。乘机飞太原，到了合肥附近，上空飞机漏油，勉强飞至开封，强迫降落，已不能再飞，时已日落黄昏矣。在河南省政府商主席启予（震）处，匆匆吃了晚饭，连夜改乘火车，到达太原。除了传达中央方面的决议，及大众的属望外，只有请阎先生去电解救而已。但对方的回电，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在太原逗留了好多天，总得不到如何的好结果。虽然内心非常焦急，亦只好在那里忍耐等候。有一天晚上，忽然消息传来，说是蒋先生已安抵南京，不觉眉飞色舞，额手称庆，把压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轻松的放了下来。我想，这不仅是我个人如此，全国的人民，也都该如此吧。

我到浙江前后共计一年又十一个月，好多的时间与精神，都耗费在奔走国事与准备国防方面，行政本身的工作，反而无所建树。好在浙江政治，素来都是谨守成法，具有规模的，尚不至有若何贻误。而我不能完全尽我的力量，从事本位的工作，使浙江政治得到相当的进展，这是我内心上引为极大歉疚的事情。

十七　调主鄂政与庐山训练

赴湖北接事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变解决，蒋先生平安飞回南京，如山骇浪，倏归平静。因西安事变发生而齐集南京的人物，也就渐渐的散去，回复各人原来的岗位。我延至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才由上海飞赴武汉，接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这次省府改组，人事更动甚少，秘书长卢铸，民政厅长孟广彭，财政厅长贾士毅，教育厅长周天放，委员杨揆一、范熙绩、吴国桢均留任。他们都是杨前任的同僚，亦多是张前任的同僚，只有建设厅长李范一呈请辞职，改由伍展空继任。在杨前主席被刺，迄我到任之前，中间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主席，一切政务，都由他们维持，而未尝停顿。因此我到接事，各项都很有头绪，只是举行了一个交代仪式，并没有一般机关新旧交替的许多麻烦。我想：这是人事安定的好处。不然的话，“一朝天子一朝臣”，人生地不熟，不知要耽误多少时候，才能使各项政务重上轨道。其损失的重大，是不可计算的。这种情形，不但省政府如此，即省以下各级机关，又何尝不如此？真是值得我们在制度上应行研究改进的一个问题。

武汉的环境　湖北省武汉的社会环境，与浙江省会杭州相比较，有很大的区别。杭州是宁静的，幽美的，不但西湖的山光水色，清幽绮丽，即过往及居住的人，也都悠闲自得，与政治好象没有多大的关系。它虽然接近上海，但上海的繁杂并没有影响它的宁静。我们住在杭州，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好处，可是一旦离

去，就时常会想起它的风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人们在未到杭州以前，是多么的艳羡！离去以后，又多么的留恋！可是武汉就大不相同了，武汉是中国中部水陆交通的总枢，行旅来往是那样的频繁，社会环境是那样的复杂，山水是那样的平凡，气候是那样的窒闷，住在那里的人，在行动上心理上，到处都表现着忙碌而不安定的状态。尤其是省政府方面，既要应付各方的军事问题，又要应酬往来的军政宾客。而汉口租界的各国领事以及各国驻军，无一不是同上海一样的应有尽有，省政府都要同他们来往周旋。精神上的痛苦，时间上的浪费，是不必说了。还有一年一度的大水，无论成灾与否，政府与人民，都是提心吊胆的在恐怖中过日子。

武汉的工商业　武汉是中国中部商业中心，工商业的发达，在中国各大都市中，仅亚于上海。中外商人在那里所办的工业，固然很多，我们的民族工业，也有良好的基础。而南皮张文襄(之洞）实开武汉工业史之先页。由其手创者如汉冶萍钢铁厂、纺纱厂、织布厂、制麻厂、造币厂、兵工厂、造船厂、造纸厂、制革厂，都是在光绪年间就开办了。可惜现在或因机器陈旧，出品不良，或因管理不善，营业不振，或因资本不足，无法维持，大部都已停闭。能苟延残喘者只极少部分。工业本来是要继续不断的改进，才能扩展滋长。至于如何才可以改良进步而不断的发展下去，创办者仅负一部分的责任，而继承者却要负大部分的责任。我国工业，不是创办无人，而是继承者不能尽其责任。尤其是官办事业，几乎都成了官僚中饱自肥的渊薮，根本谈不到生产的改进，营业的发展，今后如不能将这等痼疾革除，非特不能用国家的资本，从事计划的经济建设，并将无以立国于世界，因为今后经济的建设，必须运用国家资本，由国家管理经营，方能迅速的有计划的成功。我们看到苏联的三个五年经济计划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而反观我国以前工业的失败的主因，大抵由于官办官营的不得法，这是多么值得我们政府与人民的反省啊？我

怀念张文襄创业的艰苦与伟大，同时也忧虑到今后官办官营事业的危机。

悼念杨畅卿 刺杨（畅卿）的案子，可算是国民政府成立后继廖（仲恺）案发生的第二件重大谋杀案。在案子初发生的时候，社会人士，固然是揣测纷纷，莫明真相。就是案子破获之后，很多人也不甚了了。主使的刘芦隐，虽判了徒刑，但是案情的内容，仍没有公布。杨氏是一位政治的能手，他辅佐蒋先生，有很多的贡献，他在湖北任内，虽仅有一年的时间，而凭他的毅力魄力，不顾一切阻挠，锐意进行，也就做成了几件重大的事情。要不是发生那次惨案，一定还有更多的建树表现出来。这种硬干苦干的精神，实在值得吾人钦佩！成就未宏，竟遭狙击，这又是何等可惜的事情！我到任的时候，曾到他的墓地奠吊，牛羊践踏，木石纵横，尸骨未寒，已经无人过问，这真是政治牺牲者的不幸的遭际，我于悼念之余，不禁感慨交集！

湖北省会设于武昌，这是我二十二年前负笈旧游之地。那时的街道狭隘污臭，每由南湖学校入城，宛如进入腐烂地狱。到我就任主席，已经完全改观了。杨畅卿氏以他前在广州办理市政的经验与魄力，终于将武昌腐旧的样子，改变为一个崭新的形态，不任汉口租界，专美于前。我到了武昌，同时也想到广州，这真算是杨氏生平一首一尾留在都市中的两个政绩，恰好摆在粤汉铁路的两端，亦是一个极有趣味的事迹。

省政府的办公处一向都在长街上，由前清的总督衙门改设。不知是那一任的主席，精于堪舆之术，因旧督署的地址，风水太坏，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据说："那里是武昌风水最好的地方，省府设在那里，可能使主席长久做下去，甚至可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可是他的任期，并不能如他所望的那样长久，廿二年张岳军继任主席，就职时，我代表行政院去监誓。见号为武昌风水地的湖北省政府，是在一个小横街百寿巷里面的一个旧衙门，局面极为狭隘，不是一个全省最高行政机关的气象。张岳

军还笑着对我说："衙门面前原有两条旗杆，亦因为有碍风水，而把它移到衙门的侧边。"我听了，联想起《西游记》孙猴子被二郎神赶得没处藏避，把身子变为一个庙，把尾巴变为一条旗杆，竖在庙的背后，而为二郎神识破了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省府合署办公制的研究 杨畅卿是主张省府合署办公最力的人。他到任后，见省府旧址太不合用了，即将旧督署重新建筑，把全府的各厅处合在一处办公，所以湖北省政府的合署办公，是最彻底的。不但办公厅的地点，同在一起，就是全府的公文，也是总收总发，集中处理。各厅处即等于省府的一个大科，除了本身的直属机关外，所有公文都是送由秘书处核阅后，用省府的名义行出去。比之浙江的分署办公，厅处承办府稿的办法，似乎要简单而便利得多。但我认为这种制度，并不是最好的办法，而尚有值得我们研讨的地方。合署办公的本旨，在节省时间人力物力以至地方与建筑物，借以提高行政效率。原是很切要很合理的办法，也可以说是实行科学管理应有的措施。我们知道美国是首先提倡科学管理运动的国家。他的陆军部的五角大厦，能容纳四万五千人在一处办公，指挥灵活，联系方便，工作效率极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要彻底实行科学管理，必须以进步的科学设备与技术为基础。如果不求机关的设备与技术的改进，而谋制度的改革，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况且省政府是国家行政的分支机构，地方行政的最高的机关，政务门类繁复，决不象部的业务那样性质单纯。省政府主席及秘书长应否成为总揽全局的中心，能否具有总揽万事的能力？颇成问题。就拿湖北合署办公的办法来说，各厅处成为省府的一科，厅处长成为一个科长，在某一个时期及某一个范围内，未尝不可。但他们所办理的事件，完全须经秘书长或秘书处的秘书科长核阅后，才能作最后的决定，而缮发出去，时间上未必见得经济。事务的处理，亦未见得就能妥善正确。而且现代行政事务日渐繁杂，分工日趋细密，以省府秘书长秘书科长少数的人手，综核全部的业务，未必能做到尽善尽美

的程度。因为他们决不是万能的人才，也不能有超人的精力。即使这两个条件都具备了，在组织上与工作上，也不免犯了重叠繁复之弊。所以我主张在事务尚未大量发展的时期，厅处可视同省府的一科，主办他应办的业务，厅处长对于主管业务，除了极重要或有关全体者，应提出省务会议或请示主席外，其余尽可迳行决定，用省府的名义发行，不必再加复核。关于两厅处以上有关的问题，亦由其本身妥商解决就是了。如此则各厅处主管的精神，既可以发挥，省务的统一性，不致于妨碍，时间人力物力，亦极经济，这便符合行政三联制中"分层负责"的旨趣。否则必减少主管的责任，增加秘书处的繁杂，工作效率，反而发生影响。如果省级行政业务的范围日渐扩充，各厅处的组织，必日渐扩大，在不妨碍统一，不发生矛盾的原则之下，更应予各厅处长以较大范围的决定权力，以处理其主管的业务，使他能成为对内对外主管的负责机关。从而减轻主席与秘书处事业上的负担，得以专心于各项重要问题的研究与应付。如此方能收执简驭繁之效果，而不致束缚制度的精神，阻碍各级机构能力的发展。所以省府合署办公制度的建立，应在发挥分层负责的精神及各主管机构的效能上着眼，而不能就事权集中，束缚次级应有职能的发展上着眼。杨氏对于合署办公的安排，在设备上技术上，固已相当顾及，但他的精神对于主管机构能力的发展，终不免有束缚之处，这是我事后客观的看法，顺便写出来，以供研究本问题者的参考。

汉冶萍公司的近况 湖北的矿产，以大冶的铁矿为最著名，在全国亦占极重要的地位。矿区在大冶县石灰窑附近的象鼻山一带。据专家说：矿石的成分虽好，但藏量并不十分丰富。他不是整片广大的山脉，而是聚集成窝的一大团，所以叫做"窝子铁矿"。经历年的开采，藏量已日见减少了。汉冶萍公司是前清官办的，包含了汉阳的炼钢厂，大冶的铁矿及冶铁厂，与萍乡的煤矿。即是采运萍乡的煤，将大冶铁砂，在石灰窑冶成生铁，再运至汉阳炼成钢铁，规模是非常宏大的。可惜管理不善，无形中

就变成了盛宣怀一家的私产。中国官办事业，往往如此，殊堪浩叹！我到任以后，汉阳钢厂石灰窑铁厂，都已停工了。而且在国内外负了很多的债务，尤其是日本的债，偿债的条件非常苛刻。所以只得将开采下来的矿石，全数交由日本抵偿债务，价格十分低廉。不但公司无利可图，而工人终日辛劳，亦难图一饱。因为大量的矿石，国内既无大规模可以冶炼（石灰窑铁厂每日可冶铁二百五十吨，已停工，仅大河沟铁厂每日可冶铁一百吨），即使能自己冶炼，这许多钢铁，亦非幼稚的中国工业界所能全数销纳的。并且在冶炼技术上，生产成本上，亦不能与外货相竞争，而债务又不得不偿还。故大冶的铁矿，就变成日本的专买品，稍不如意，就以停购追偿相威胁。这种“原料国”的痛苦，我们不知忍受几多年代了。日本将我铁石运回本国，由八幡钢铁厂加以冶炼，而成了他国防军事工业上的重要原料。中日战争爆发以来，日人屠杀我军民、占领我土地的武器，其中不知含有多少大冶铁矿的矿石成分在内，这不是大冶矿业史上最悲痛的一件事么？

石灰窑附近的矿产　石灰窑系大冶的一个市镇，与黄石港相毗连，在武昌的下游百多公里的岸上，大轮船终年可通。那里附近，除铁矿之外，还产大量的石灰矿，石灰窑想系因此而得名的。更有几处小煤矿、石灰石、煤铁，这些矿产，在工业上都是相依为用的原料。那里水路交通既便，又兼有这几种矿，就形成一个最适当的工业区域。除了冶铁厂外，还有一个很大的洋灰厂，（泗记象牌水泥）及其他的小工厂，因此石灰窑这个市镇，无论在目前及以后，在湖北省内，都要占工业上很重要的地位。

应城的石膏盐　应城县的石膏矿，亦闻名国内，附带生产一种石膏盐，每年产量，也有二三十万担。此种副产品系吸取石膏矿洞的水，熬煎而成者。据说：系洪杨时候，下游盐运不通，人多淡食，始发现此种膏盐，以供食用。近百年来，以此为业者，颇不乏人。其销行区域，都为附近各县，且多系私贩。历年以来，

中央盐务当局，欲禁止煎熬膏盐，与地方时常发生纠纷。在我赴任前，受盐务当局之托，请为设法禁止。到任后，地方又请愿设法解禁，但废除小产地，集中大产地，是中央的盐务政策，目前在管理便利，增加税收，如浙江之余姚黄岩等盐场，皆在废弃之列，膏盐、硝盐自然亦非禁止不可。而且还说膏盐、硝盐缺乏碘质，含有毒素，不合卫生，理由是很正当的，但因地方一部分人民生计所关，若只是禁止膏盐的产销，而不妥筹补救之法，则顾此失彼，困难仍多。所以历任主席对此问题，皆处于两难地位，而无法解决。

湖北的水患与金口的水利工程 湖北的大患，就是水灾。廿四年的大水，打破了历来的纪录。汉口的租界，武昌的城区，都用水泥筑起防水的围墙，每涨大水的时候，附近的人民，都在水平线底下生活。我虽然未到过荷兰，但想武汉的水灾情形，大概和荷兰相仿，那么武汉就可称为“中国的荷兰”了。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和武汉水利工程局，也可说是水害委员会和水害工程局。一年到头，都是忙于筑堤防水，水涨堤高，水和堤，每年在那里比赛，不知谁得到最后的胜利？近数年来，武汉的大水，固然由于雨量的增加。而主要的原因，实由于下游水道淤塞，雨水宣泄不及。如果不由中央作整个计划，从下游水道疏浚着手，只是在武汉年年作那加高培厚的工程，总不免有水溢堤崩尽成鱼鳖的一天！廿四年钟祥罗汉寺大堤溃决，汉口左岸，自钟祥县以下，尽成泽国，人民的损失，自难数计。杨畅卿主席，用了四百多万元法币，动员了二十多万民工，才把它修复起来，工程浩大，可想而知。我到任的时候，工程完成，特地亲到那里视察，对杨氏的勇于防患，深致钦佩，但此项工程能否作为永久保障，还是一个疑问。另外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则为金口闸，金口是我辛亥北伐时登陆的地点，抚今追昔，更觉有前往察看的必要。金口乃附近几个小湖的出口，每年江水倒灌，沿湖十数万亩的良田，都被淹没了。这闸筑好以后，不但原有的田，可以耕种，并且还可以新辟出许多

湖田来，价值是很大的。那时全部工程已经竣事，系用钢骨水泥建筑的机械，开闭水闸，在全国中也是数一数二的了。政府在那里，辟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仿照苏联集体农场的办法，土地是公有的，人民耕作的收获是各别的，政府贷予资本，并担任技术的指导，与行政的管理，用意未尝不善，可是人民狃于故常，对于这种集体耕耘的生活，不很习惯，所以参加者尚不多，尤其是在那里原有田地的人，在水淹田沉的时候，因无力抵抗而不得不放弃。现在水干田起，他们又要争回所有权。对于政府将他们财产尽划为公有的办法，均竭力反对，引起了大规模的暴动，将农场焚烧，戕杀农场职员。我到那里的时候，附近数百农民一路顶香长跪请愿，要求政府发还他们的田地。据查其中固然有若干失田的农民，但亦有很多豪绅在鼓动这个风潮。他们希望政府取消土地公有与集体耕作的计划。如果这个希望能实现，那末那些新涨出来的湖田，就为他们所占有了。我对于这事，正拟分别处理，而"七七"战事发生，就搁置下来。

湖北的财政　湖北省政府的财政，以往都很困难，收入不敷支出。自张岳军氏竭力紧缩支出，收支已可相抵。但是开源的工作，尚在开始着手办理。湖北全省田赋仅三百余万元，与浙江相比，相差甚远，若能切实整理，则其收入，自比浙江为多。因为湖北的土地面积，数倍于浙江也。前任拟仿行浙江土地编查办法，特调金华县长陈开泗到湖北去主持地政实验县。随后又设立土地局，由杨绰庵创办。杨去后，由汪浩继任。汪是中央政治学校地政学院教授，我主浙时，任平湖县长，以办理地政实验为县政中心，亦是秉承中央整理地政的意思办理的。一般对于湖北的土地整理工作，在技术方面有主张飞机测量者，有主张实地丈量者，前者因工具未备，经验毫无，后者则需时过久，难收速效。正徘徊于两者之间，而中日战争爆发，以致未能循序实施，收获若何的成绩。

湖北的税捐，以营业税为大宗，但全年收入，亦仅三百多万

元，与估计相差甚远。我到任后，派李立民负责整理，先由武汉三镇着手，虽然短短数月内，而收数比例，增加甚多。并且征收的范围已到达租界，这是以前湖北所未有的事。他如警察房捐，亦疲玩不堪，收入甚少。我将此项捐税交与警察局长蔡孟坚负责办理，按户催征，在武昌方面，收数增加数倍，然而与地方权势冲突的事情，就多了。有一次，警察局长因房捐问题，而受到驻军机关的极大侮辱。由此可知武汉情形的复杂，政令推行的困难了。

湖北的交通 湖北交通，素称便利，陆上有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直通南北。长江滚滚，横贯东西，汉水及各地湖港，亦为内地交通的补助。以前政府首要之交通机关为航政局。其轮只航行，东至九江，西至宜昌，北至襄樊，南至长沙，营业相当发达。武汉三镇隔江相对，皆设有轮渡。每日往来人民，将近十万人。民元以前，用小艇渡江，一有风波，即行停渡，而且大摆队小摆队，（帮会名称）往往在江中强横勒索，人民视为畏途，至是乃告绝迹。我到任后。与地方集议，建筑武汉三镇大铁桥，工程浩大，估计需款一千六百余万元，已有成议。并由钱江大桥工程处长茅以升设计，开始钻探。此桥完成，当为武汉生色不少，惜因战事停止，此后不知何日方能观成耳！公路交通无论量的方面，质的方面，都比各省落后，原因是他已有铁路和水路，交通相当发达，需要尚非迫切，而开办亦较迟。其次湖北公路路线所经，皆为沼泽地区，路基泞软，敷筑保养，亦颇不易也。

湖北的特产 农业方面，棉花每年出产三百余万担，占全国棉的生产量三分之一。此外，粮食和麻，都是生产的大宗。就是许多湖泊里所产的鱼，数量亦极可观，以渔捞为生的人，也不在少数。古人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不是武昌所产的鱼，滋味不好，而是食得太多了，就觉得腥臭的原故。这句话要久住武昌的人，方可了解的。我们对于这句成语，并可作为武昌多鱼的形容词看。

举行县长考试 我到湖北，最感到麻烦的，就是那些想当县长的人，他们好象前清的后补知县，终年在那里候差一样，时时上衙门来请求。好象当县长是他们终身的职业，他们失了业，政府就得设法维持他们一般。这班人似乎有组织有团体的，稍有机会，就拼命钻营，或挑拨是非，兴风作浪，以造成于他们有利的机会。我为解除这种麻烦起见，于是请准中央举行县长考试。这是我从政以来举办的第二次县长考试。但是所得的结果，也令我失望！

三月间国民政府主席林子超先生要到广州去祭黄花岗的革命先烈，路过武汉，我们举行了一个空前盛大的欢迎。各国驻在武汉的兵舰，都鸣炮致敬。林主席一向是轻车简从，不肯讲求这些仪节的，所以他的行动，社会上都不很注意。早前报纸上的记载，都是直呼其名的登着“林森至何处”，而不称“国府林主席”。我认为这是有渎国家元首的尊严，易启外人的轻视。尤其武汉乃中外观瞻所集的地方，对于礼敬元首的举动，在国家体制的尊严上，是极属必要的。林主席在武昌逗留了大半日，就乘粤汉路车南下到了广州。曾以国家元首的地位，致祭黄花岗的革命先烈，为中国统一史上值得记载的事件。

鄂粤铁路电讯交通的完成 粤汉铁路在二十五年两广统一之后，才能通车。二十六年春，广州至武昌的长途电话，亦接通了。我与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氏，首先通话，这是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交通史上的新纪元。我们在电话中，都用广东话接谈，好象在两广地区内闲谈一样，并没有觉到广东湖北之间，隔了三个省份，广州武昌之间，相距一千公里。那时他正在患病，不久就逝世了！这次的通话，成为我们在最长的距离作最后的谈话。反转来说，如果没有粤汉长途电话，我们连这一个最后谈话的机会也没有了，这是多么值得追忆和感慨的事情！

湖北的烟毒 这时湖北省的民众组织工作，如都市方面的义勇警察训练，各县的壮丁训练等，都在积极地推动。各种有关国

防的演习，亦相继举行。我也如在浙江一样，为这种工作而忙碌。在我的想象中，浙江人民的体格多是矮小而孱弱，湖北人民一定比较的高大而壮健，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所检阅的湖北壮丁，并不见得比浙江的强壮，反而表现出许多病态。最特殊的则为很多人面带烟容。因为当时湖北不是禁烟的省份，而且四川、陕西、甘肃、云南、贵州这几省所产的鸦片烟土，百十年来，大都以汉口为集散的市场，所以受毒极深。听说宜昌一带，比武汉附近各县，还要厉害得多。使我想起浙江的禁烟禁毒，由鲁主席而到我任内，虽然枪毙了好些人，但是浙江人民，因此不致受到经济上的无量损失，与身体上的重大戕害，这于保障国民经济与民族健康，实有极大的关系。林文忠公（则徐）在晚清时代，首先注意及此，真是具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啊！

武汉的国际应酬　武汉当水位最高的时候，一万吨的巡洋舰，都可直达，因此每值大水季节，就是湖北行政当局对各国海军应酬最多的时候。除了常驻武汉的司令舰长之外，英、美、日、法、意五国驻远东的海军总司令，必乘大巡洋舰到汉口来巡视一次。在他们的心目中，中国的领海内河，都是他们共有的势力范围。他们并不是友谊的来拜访或游历，而是任务上例行巡视。他们对于省主席市长等地方长官，表面上也很尊重的，一到武汉，即先来拜访，而我们亦不能不同他们应酬。可是这种带有示威性、侮辱性的交际，我心中总感觉得难过。那年到来的，就有英国远东海军提督李特，日本第三舰队（即驻中国舰队）总司令长谷川清，及美国远东海军提督等。他们访我之后，我也得照例前去回拜，他们并且在舰上设宴招待。我问美国提督说："你们这样大的船，驰入长江来，要不要中国领江？"他说："有时候要，有时候也可不要。"我说："如不要领江，会不会发生触礁及搁浅的危险？"他说："不会的。因为我们已发明一种仪器，在舰行的时候，水的深浅与有没有暗礁，在仪器里很清楚的表示出来。不过航行慢一些就是了。"他并且邀我参观那种仪器，我深

觉得天然的险阻，并不能限制外人航行，一切天然的困难，都被科学克服了。我又问他的夫人："是不是坐兵舰来的？"他说："不是的，她须坐飞机或坐商船到来，因为美国的法令，是不许可带着女人家眷在兵舰上行动，即使大总统也不能例外。"于此又使我想到民主国家的规律，实在要比不民主国家严格得多。民主不是个人的绝对自由，而是人人要共同遵守法律的规定，这等立法守法的精神，实在值得我们效法的。长谷川清的坐舰龙田号(三等巡洋舰)仅有三千多吨。他说："因为水浅，大舰不能进来，其实这种吨位，在长江已很合用了。"他的言外之音，使我听了，非常难受，很象他们这种兵舰，完全是为了对付中国而用的。据说："日本海军对于长江的航行，更为熟悉。不但他豢养了专用的领江，而他们的驾驶员，恐怕比中国的领江还要熟悉得多。"长谷川清是日本海军里最年轻的中将，他在日本海军俱乐部招待我，他说："一个宴会里，没有女人，是太寂寞了。在日本，不论最高级军政长官的宴会，都可以叫艺妓陪酒，这是不违犯纪律和亵渎尊严的。这次因为在中国宴请中国的地方长官，所以不好意思叫艺妓陪酒。"我以前也听人说过，日本军人也是同中国过去的军人一样，以酒色英雄自豪的。听了他的说话，更证实了以前所闻的不错。（按长谷川清即为"八一三"上海事变的主动者，后调台湾总督。）

在国际的应酬场合中，文官的服装是没有规定的。如果有好几个文官同在一起应酬，有的穿中山装，有的穿西装，有的穿长袍马褂，弄得参差不齐，形式非常难看。那年四五月间，英皇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我国除了派遣特使去庆贺之外，凡英国在中国有领事驻军商民的地方，都是很热烈的庆祝，邀请中国官民去参加。汉口的英侨很多，自然是更郑重热烈的举行。我国参加的文官，为求仪容整齐起见，都穿了长袍马褂，我并挂了一个大绶二等云麾勋章。那时天气已热，穿的都是纱马褂单长袍，再挂上那个大绶勋章，就觉得累赘不堪。后来弄得大汗满身，透过衣

表，更不雅观。我想，这种长袍马褂，在闲常无事的时候，偶一服用，也觉舒闲适意。若从事工作，或参加典礼的时候，实在是要不得的。我不知国家为什么要把这前清的遗式保留下来，并当它是正规的礼服呢！

武汉的气候　武汉夏季的酷热，我在学生时代已经饱尝过了。白天热气与水气交蒸，人好象住在蒸笼里一样。烟突上笔直的烟，一缕一缕冲入霄汉，湖沼里平静的水，一片一片躺在地面，没有一些风来搅动它，成为一个静寂而烦闷的景象。夜里仍旧是一样，温度并不能减低多少。据说武汉是中国气候最热的地方，比两广福建都厉害，真是热得怕人，所以住在武汉的要人，必须有个避暑的地方，来调剂他们的夏季生活。在平汉路上，河南、湖北交界的地方，有鸡公山，在九江附近有庐山。这两个避暑名山的开辟，主要的原因，便是为了要避躲武汉的炎热。抗战军兴的前几年，每到暑天，蒋先生多半住在庐山，所以庐山一变而为暑期中国军事政治的中心。以前历任的湖北主席，都在那里置备别墅，因此我也不能避免的准备了一些房子，以便不时到那里去居住。

庐山训练　庐山训练团成立于二十二年的夏天，二十三年仍继续办理。二十四年蒋先生入驻四川，就改在峨嵋山训练。廿五年夏天，两广事变发生，蒋先生赴广州，暂停了一年。到了廿六年，重新恢复。廿六年以前，我虽时常往来这些地方，但没有直接参加过训练工作。而且以前的训练，完全以军队重要的干部为对象，他的作用，是将过去曾互相攻击互相对抗的所谓中央军、西北军、东北军、晋绥军、四川军、两广军等等，会合一起，在蒋先生精神感召及恳切训导之下，加以国家民族意识的陶镕，惕以敌国外患侵凌的危险，使得他们把以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拼的夙隙前嫌，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同时更积极的造成了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新意识、新力量。所以训练的时期虽极短促，受训人员在学术上的收获，虽未必甚大，而就其作用和效

果言之，可以说是未来抗战建国的一种原动力。成功之伟大，可以想见！但因含有对外军事的作用，内容比较秘密，所以外间明白真相和意义的人，是很少数的。到了廿六年，训练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把全国中等学校的校长、训育主任以及办理童子军的干部，与党政的干部，都集合到庐山去受训。于是廿四年以前军事干部的团结训练，乃一变而为知识青年干部的团结训练，范围和意义自更重大。蒋先生自兼团长，陈辞修任教育长，孙方鲁任第一总队长，我任第二总队长，以下的大队长、分队长都是那时的军、师、团长挑选出来的。抗战以来，都在担任着战区副司令长官，集团总司令、军长、以及省政府主席等要职。群英毕集，济济一堂，真是一时的盛举。

第二总队的宿舍，在山上的图书馆，是庐山最伟大最新颖的建筑物，团员是全国高中与师范学校的校长，与训育主任，共有一千多人，分为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完全按军队编制，实行军事管理。这些久为人师的学生，一旦拘束起来，尝试军队的生活，自然有些不惯。当入队的时候，首先要将西装的长头发、古装的长胡须剪去，变成一个士兵的形式。有两个须长及腹道貌岸然的团员，对于此种规定，颇不愿遵守，而请求保留。他说："数十年相依为命的东西，一旦将它剃除，不但感情上有所不忍，在道义上亦有所不安！"他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迂腐。实在他的不愿剃除长须，不是所谓感情与道义的问题，而是一个习惯问题。满清入关，汉人为反抗雉发令，不知死了几多人，他们何尝个个都是凛于民族大义而誓死不屈的呢？可以说，大多数都是因狃于旧习不愿改变花样，致被满人疑为有意反抗而将他们杀死的啊。到后来这两位学员的长须，在发生了一些小麻烦之后，终于剪了下来，不知道他们现在回想起来，又是怎样一个情绪呢！有一天，举行开训典礼，全队开到海会寺第一总队的地点集合，并且当天要赶回来，山上的天气与山下的天气，完全两样。在大热的阳光下行军，路程虽不很远，（来回四五十余里）而山路崎岖难行，中途落伍的非常之

多，天大黑了，还在爬那险峻的太乙岭。有一个上海的学员，在暗地里说："我从来未离过上海，从来也未见过山，上过山，这个苦头我真吃不消了！为什么不把第一总队调到山上来，等他们歇歇凉，领略领略庐山的风味。偏偏要把我们调下去吃这个苦头？真是缺德。"我听了他的话，不禁笑了起来。

训练的管理与内容的批判 一个人即使到了六十岁，如果重度学生生活，那种天真无邪的学生习气，仍会很自然的表现出来。这许多当过先生的学生，自然也不能例外。入队以后，马上把先生的面目收起，表现出学生的姿态。所以队内的管理，是相当困难的。凡管理上每一个要求，必须将事理说明，并时常提起他们自尊的心理，才能使他们迅速接受，一致遵行。记得有一次，是饭厅内，非常的嘈杂，值星官无法制止，我只是温和的说了两句："你们应该自己尊重，不要长官来干涉。"说了，顿时静肃起来。因为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受了旁人的干涉，心内总有些不平的愤懑之气，而欲有所反抗，以争取体面。因此干涉愈厉害，反抗亦愈甚。纵然一时用强力制止了，他的内心总是不大舒服，遇有机会，还是要爆发出来的。倒不如提起他的自尊心，使他自己约束自己，来得有效。这种办法，不但对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应该如此，即是对普通的人，也应该如此。

如上所述，这种训练的意义和办法，的确具有伟大的价值。但是照我看来，还有需要改良的地方。第一训练的时间是那样短暂，需要灌输的科目，又那样繁多，弄得一天到晚，紧张不堪，连休息思索的时间都没有，这样的训练，以之锻炼劳动刻苦的生活则可，欲言改造精神，训练意志，恐怕还要启发学员在内心上多做一些自我反省自我检讨的工夫才行。其次一般讲演的课目也太多了，样样都要听取，弄得人脑筋里装不下去。结果，样样都未必有深刻的了解。倒不如课目简单一些，内容深刻一些，或者较易得益。不过我得声明，这是我对于庐山训练的回忆与感想，现在经过许多时期不断的改进，各地的干部训练，当已大大的不同

了。

“七七”事变发生了！有一天，集合了全队的官长学员，蒋先生登坛点将，命令总队里的李默庵、冯安邦、刘戡等军师长，率队北上，抵抗日寇的侵略。奉命出发的人员，站在将台上，与一班未曾出发的同学告别。真是人中英雄，气壮山河。同学景仰羡慕的心，与企望效死致胜的心，都同时表现出来！这是一个有历史价值的镜头，可惜那时没有将实际的影子照下来。但留在我的脑筋里的影子，是永远忘不了的！

武汉是我们抗战的中心，情形特殊而复杂。我因职务的关系，必须立刻回去照料准备。在距离本期结训还有十天的时候，就下山回去了。到了省里，除处理行政事务之外，也正如在浙江时候一样，忙着国防工事的布置与建筑。因为预料武汉是敌人必然进攻的目标，而须早为准备的。

主鄂余感　我自一月十六日到湖北接任视事，八月一日，调回南京，另有任务，中间又在庐山担任训练工作一个月。实际上完全致力省政的时间，不过五个多月。湖北是一个冲要而复杂的省份，单就稔悉全省的情形而言，也需要相当的时间，在这很短的任期内，决不能有所施展。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湖北的政情虽然很复杂，而可以发展可以成功的条件也很多。如果不是因地理上的关系，易受外来牵动，弄得人事上的不安定，那末它的进步，一定不会落于任何一省之后。除此之外，湖北的大患，一为洪灾，一为黑毒，这是损耗人民生命财产的两个主要原因，而须以全力根除的。如果洪灾黑毒能够根除，再能假以时日，利用各种优越条件，发展经济建设，则湖北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天上的天堂，决不仅限于地上的苏杭呵！

十八　抗战开始与山西之役

抗战开始奉命入京担任军职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我鉴于武汉是中国的心腹重地，华洋杂处，恐怕会发生问题，不待庐山训练团训练结业，就请准先回武昌。当时我曾考虑到万一芦沟桥的战事，发展为全面的战事，日本第二步攻击的主要目标，必定是武汉。而我国首都南京万一不守，第二个首都，也一定是武汉。所以武汉为将来军事上必争之地，必须趁这个时间作巩固武汉大后方的准备。于是建议中央拨发国防工事建筑费一百万元，以加强武汉的国防工事。这个建议为中央采纳了，不过只准先拨五十万元，其余五十万元，责成湖北省政府筹垫。这个国防工事建筑的责任，便无形之中交由我来担负。我一方面仿照在浙江的时候，先组织一个国防工程处，分头采购物料，开始建筑。另一方面到各方去视察过去湖北省境已有的国防工事，主要的是长江下游的田家镇至九江一带，与平汉路上的武胜关至信阳一带。先到田家镇一带，这是历史上屏障武汉的要塞，有新的国防建筑，也有旧的国防建筑。我见原有的工事，旧的是太陈旧了，新的是太简陋了，并有不合理的地方。有几个炮位竟看不见江面上的目标，控制不了整个的航线。那些炮位上的防守官兵，更是行所无事的在那里住家式的住着。我随便考问他们一些防守上的常识，竟没有一人能答得上来。其他必要的通讯、交通、设备与粮秣、弹药的储藏，更是谈不到，我觉得非常危险与失望，而急急想把它改善增强。随后又到武胜关及信阳附近视察，那里的情形，比田家镇更差得

多。我在五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处食了一顿晚饭，俞师长曾任浙江保安处长，也是旧同事，那师官兵都是浙江保安团改编的，所以相见之后，分外亲密。饭后接到程参谋总长颂云的电报，要我立刻到南京去，我只好停止了视察的工作，当夜赶回武昌。我已知道有新的任务，一时未必能够回来，便把省政府主席职务交由秘书长卢铸代理。而搭机飞到上海，大约是八月一日，观察当时情势，预料全面战争是免不了的，必须将家中稍为安顿，逗留了几天，于四日才到南京。六日那天，在国民政府开了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重要会议。蒋先生将“七七”事变的情形，以及敌人要灭亡中国的阴谋，与我们国家的决策宣布了，中日两国自此遂进入战争状态。当场除各军事主管长官或有关机关报告之外，即由蒋先生指定各人的任务，我担任第一部部长，系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的。此外，还有二、三、四、五、六等部，但后来有些部并未正式成立。我受到这个命令，非常惶恐，因为我这十多年来，一向都混在行政界中，对于军事只在中间干了几次打杂式的临时工作，对于这个老调，有点怕敢重弹起来！蒋先生要我担任这项工作，也许因为我曾于二十二年担任过北平军分会参谋长，参加过长城战役的原故。但那次战役是局部的，而现在却是全国性的战争，轻重大小，又有分别。同时因为离开军界久了，很多情形，不甚熟悉，干部亦成问题。踌躇至再，终因凛于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大义，与自己应尽的责任，便不顾一切的毅然肩负起来。在短短的数日间，东凑西凑的，将一个机构，组织成功。并拟具初期的作战计划，呈请蒋先生核示。好在在蒋先生直接指导之下，奉命进行，尚不致十分困难。

抗战后的国内大团结　自“七七”芦沟桥事变而至“八一三”上海事变发生期间，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大的转变！这一事变，惊醒了国人的迷梦，结束了国内的战争，使中国内部团结起来。“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语，那时才得到事实的证明。党内久未到南京的人物，如阎伯川（锡山）、龙至舟(云)、

李任潮、李德邻、白健生、陈真如（铭枢）、刘辅臣（湘）、方叔平（振武），不论是在国内，或在海外，都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互相集结。就是方在对垒中的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叶剑英等，也停止战火，在南京互相握起手来。这时南京住民，已经命令疏散，潮水似的涌向各地去，而各方的要人及开赴前线的部队，却相反的涌到南京来。恐怕这是南京有史以来最热闹最紧张的一个场面了。

抗战初期敌我外交的奇迹　“八一三”上海的炮声响了，一切都进入战时状态。“八一四”南京受到第一次的空袭，来袭的敌机，被我们击落好几架，这是中国空军开始同敌人作战的第一日，就收到极好的战果。“八一四”也就成为中国空军的永久纪念日——空军节。上海的战事，由于我军之英勇抗战与主动攻击，几乎将敌人多年来处心积虑所造成的军事根据，完全摧毁。但终以我海空军的劣势，不能阻止敌人由海上源源的增援。同时我们的援军也陆续由各地开到上海来，战场逐步扩大，战事至为激烈，比之战争最先发生的华北，规模要大得多。这里现出一点奇迹：华北同上海虽然开战了好些日子，但都是不宣而战，一面在那里打仗，一面还在那里讲道理，并不按照宣战的国际惯例执行。在汉口的日侨，我们并不当作敌人看待，将他们俘虏起来。那时江阴下游江面已封锁了，我们准许这些日侨，乘轮到浦口，再乘津浦火车到济南，转青岛回国。好象这些路线及青岛还是中立地带似的。我在南京住在钟鼓楼日本大使馆的隔壁，日本大使馆的人员走了，丢下好多汽车，不能带走。部里正缺交通工具，要征发那些车辆来使用，我们的外交人员大打官话，说“未经宣战，征用对方器材，不但日本以后要说话，就是中立国也要说话！”我不愿同他们过于争执，也就罢了。但不知他们会不会想到日本在华北和上海作战地区，是怎样的行动？土地都被占领了，我们还要很慎重的替他们保存一些小东西。后来南京市政府复将日本大使馆的门，用砖墙封闭，并派警察严密的保护，深恐有人进去偷东

西。我不知道十二月十四日日军占领南京，看到那种慎重的保护措施，有没有一些谢意，或其他的感想？

最高统帅的英明决策 在未叙述以后的种种之前，我得将最高统帅英明的决策，先为提明。日本侵略中国，一贯的采用蚕食政策，由朝鲜之夺取而侵占东北，而进入长城，而发动芦沟桥事变，均属“蚕食政策”的逐步实施。他们发动“七七”事变之目的，实在占领平津或察绥，并未有对中国全面作战之计划。蒋先生早已洞悉其奸，在“七七”事变发生后，曾在庐山某次集会中训话，内有：“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之语，又记得有一次，蒋先生曾对我们解释“最后关头”四个字的内涵，他说：“平津的存亡，就是中国最后的关头，因为平津一被占领，则华北全局必至瓦解，我们以后就没有一处可为华北国防锁匙的地区，更无时间以从事国防的建设了。日本如果决心占平津，则中国必全力对日本作战。”等到日本占领平津已成事实，一面仍希望象以前一样作地方性事件，为局部之解决，他的目的既在占领平津，其用兵数量及作战计划，亦以占领平津为度。却不料我最高统帅，却严正指出最后关头已到，而领导全国军民奋起作全面的殊死战。是以我们的作战计划，就不限于平津而争取主动的地位，以展开全面的战斗。

上海虽为日本在中国东南的侵略根据地，但因为碍于国际关系，并未准备在淞沪作战。“八一三”事变的发生，是出乎日本意料之外的，亦可以说日本是被动的，而我国是主动的。最高统帅的决策，是要以主动的姿态，先把上海的敌军根据地摧毁，然后再主动的向华北作战，即使不能将敌人根据地铲除，亦须吸引其兵力到这方面，以搅乱其既定的计划。果然淞沪会战范围，一日一日的扩大，敌人以前所准备在华北方面使用之兵力，亦被吸引到淞沪来。最先发动战事的平汉线，反而暂告安静，否则敌人如用重兵沿平汉铁路向武汉进攻，则其进展之迅速，决非淞沪，

可比，而我方之应付，必招致非常之困难。此种英明决策，实为抗战八年而终于得到最后胜利之最重要关键，述叙至此，不禁起衷心之崇敬！

抗战初期的华北军事形势 华北方面，刘经扶(峙)、孙方鲁(连仲)两部在平汉线良乡一带，拒止敌军的南下，汤恩伯部在平绥路南口一带，蹑其后方。故敌军必须以主力攻击平绥路方面之汤军及晋绥军，始能南下。这样彼方战事，便非常激烈起来，我军凭据险要，予敌以极大之损害。而我方牺牲之壮烈，亦为战争初期所仅见。大本营为欲解救汤军之危急，乃令卫俊如(立煌)率李默庵等军师，由涿州间道出北平西方之东斋堂西斋堂，与汤军夹击该方之敌军。惜山道崎岖，又为雨水所阻，不能如期赶到。而这时候汤军已不能支持，向张家口方面撤退，卫李部队遂单独在东西斋堂附近与敌人作战，仍予敌人以重大的牵制。

敌人攻占南口一带要地，并汇合由热河方面的另一支日军攻占张家口，然后再分向山西的大同及河北的保定进攻。晋北重镇的大同，很迅速的就陷敌了！山西是华北数省的脊背，表里山河，素称天险。在古代的战争中，固为用兵的要地，在现代的战争，仍是同样的重要。大本营的作战计划，必须确保山西，方可阻止敌军沿平汉路平原南下，而大同尤为晋绥两省军事之枢纽，大同的陷落，不但影响华北军事的全部计划，并且要影响全国的战局。蒋先生接到这个消息，非常焦急，命我亲自到山西去视察，并与阎伯川氏洽商以后的处置。我匆匆离开南京，由津浦而陇海，而平汉，而正太，乘车赶赴太原。这时，平绥线上之我军，已退守雁门关、平型关、杨方口一带。敌人也积极部署，准备进攻。我到太原，阎氏已赴雁门关督师，我在太原逗留了一日，会见了第十八集团军的许多将领。他们的部队，亦正在赶赴平型关方面作战，自从国共分裂，而至武装冲突，战火燃烧了将十年，战血洒遍了十余省，这战争的最后一幕在山西境内（晋西南）结束了，随着一幕最初的对外战争，亦在山西境内展开，岂不是

历史上一个奇突的转变么？我想不到彼此在不久以前正在对打的朋友，忽然变为同一战线上对外的袍泽，见面时候，彼此应作如何的感想？就是久已脱离内战漩涡的我，追想到以前的种种，更是不胜其慨叹与愧悔！如果将中国以往一切内战的损失，都用之于对外，日本能不能这样的猖獗，历史家自有一定的评判。事已过去，不必再谈，只是希望以后能永久的团结，永久是一致对外，使国家民族能够渡过这生死存亡的难关。这不仅是那时个人的感想，也许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热烈盼望着！

赴雁门关会见阎伯川 那时，太原白天整日都是空袭的警报，我要到雁门关去见阎伯川，必须等到黄昏时候才能动身。同行有十八集团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北方的月色，秋后分外的皎洁，残照在天，星光四照，与白天也差不多。日本的飞机照常活动，我们曾在中途一家小饭铺内躲避空袭，并在那里吃了一碗粗面，挡挡深夜的寒气。在那静寂的小铺子内，我与彭氏作初次的闲谈。他滔滔不绝的讲他们已往的经过，我也随时插问我们未知道的情形，使寂寞的旅途，增加了不少的兴趣。空袭解除了，东西也吃饱了，大家仍旧分车前进。本来由太原到雁门关，在白天，四五个钟头就可到达，但我们却差不多行了一整夜，到达阎氏驻地时，已是村鸡唱晓、东方渐渐发白了。我在一个招待所休息了片时，等到天大亮了，才去见阎氏，商量一切。

阎氏驻在雁门关后依山的一个小村，村后有许多窑洞，他们就在那里设立指挥作战的处所。原来山西（陕甘及豫西一带都如此）的乡村，差不多每家后面都有好多窑洞，或是用来储藏物品，或是用来居住。因为西北一带，土层厚而坚实，并且干燥而不会潮湿，所以储物不易霉坏，住人则冬暖夏凉，至为适宜。富有人家的窑洞很高敞，陈设亦相当精致洁净。我们以前以为住窑洞的人，一定是很贫苦的，同南方住在破瓦窑的化子一样，其实并不如此。旧戏中薛平贵回窑的故事，所指的寒窑，就是山西乡间的窑洞，而不是南方的破瓦窑。我到山西才明白，这可算是

我对于山西窑洞的真正认识。

平型关战役的实际情形 阎伯川同赵次龙（山西省政府主席）梅军法总监（名字我记不起了，与伯川、次龙皆系辛亥革命的老同志，归田很久了），朱参谋长（兰生），住在一起。阎氏到南京时，对于抗战将领，主张大赏大罚，他们以为非大赏不能奖有功，非大罚不能惩有罪。那位梅军法总监亦是同一主张，所以他在战争一起，就毅然出山担任这个工作。当大同陷落后，就首将守将李服膺枪决了。这是此次中日战争中首先被军法判处极刑的军长。在这种严刑之下，加以阎氏等亲临前线督师，军心为之一振，雁门关的正面，因此才得巩固下来。但是敌人对于雁门关正面并不十分攻击，而是以主力由平型关方面迂迴，希图楔入雁门关的侧后。阎氏认为单靠那时晋境的兵力，决不能达到确保山西的任务，非大本营赶速增加兵力不可，我亦同样有这种见解。于是会电大本营核示，并要我回去面陈最高统帅。临行，我向阎氏建议，无论目前形势如何，必须在忻口附近准备第二线的防守计划，因忻口在太原以北五六十里，正面甚为狭小，极适宜防御也。我见无久留的必要，乃于当日仍回太原，转返南京。到石家庄时，接得太原的电话，说是十八集团军在平型关打了一个大胜仗，把敌人歼灭了好多。其实是宣传过甚①，是役所击败者，仅是敌人的先头部队。十八集团军以很优势的兵力，用他密集猛冲的战法，将敌人压迫在一个山沟里面，虽然是将敌人打死了许多，但是敌人低地的防御战术，也甚高明，等待主力到来，仍旧解围前进。此后虽续有战斗，也只能稍为迟滞敌人前进之速度，而不能将其完全阻止。这就是平型关战事的大概情形。

我由石家庄乘车回武昌，因为我还兼着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任务，虽有秘书长代理，仍想顺便回去望望，才能放心。我到武昌

①黄绍竑在解放后所撰《娘子关战役前后》已纠正了这个提法。（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十九册第3页。）

住了一夜，将一切应注意及办理的事情料理料理。次日复专轮回南京，将山西情形，向最高统帅报告。

我回经石家庄的时候，遇到刘经扶、徐永昌、林蔚文、知道敌人已迫近保定之线，战事正在进行。大家都觉得在这种平坦的地区作战，没有多大的把握。同时并遇到平汉铁路局局长陈地球（延炯），他正率一班工程人员抢修保定以南一度炸毁的大桥。据他说："自开战以来，敌机对于铁道桥梁及车站，不断的加以轰炸，但总是随毁随复，从没有发生过二十四小时以上的交通障碍，因为这座大桥毁坏太厉害，所以得亲自上来督修，亦于三日内修复了。"的确，那时候铁道交通的修复很快，不但平汉路如此，其他的各路亦是如此。这不仅是铁道管理及工程人员——由局长以至员工——能尽他们应尽的责任，而那时物质材料储备的丰富，亦有以致之。

奉令襄助阎氏指挥山西战事 大本营对于确保山西的战略，自然是一贯不变的。但当时上海的会战，正在积极展开中，并希冀能在上海方面得到相当的胜利，或者能支持到十一月一日九国公约签字国的开会，促起国际形势的转变，使中国战局亦随而变化。并且希望国际制裁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所以中央的主力部队，以及广东、广西、四川新加入的部队，都使用在上海方面，而对于山西仅是决定以由平汉路正面撤退下来的孙、卫、冯（钦哉）、曾（万钟）等部转移到山西正面，而以刘、汤等部担任平汉正面。蒋先生并命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再往山西去襄助阎伯川。我奉到这个命令，心里很踌躇，但是亦不容我再犹豫，因为战事已很吃紧，古人云："见危授命"。我在这个时候，还能推卸责任么？大约是九月下旬，正是秋风萧萧微雨霏霏的时候，我又离开了南京。几个知好送我到浦口上车，大家都怀有是否得在南京再见的意思。一方面是地的转变，一方面是人的不测，在战争的时期，谁都不能预料明日的事阿！

我再行经石家庄，其情况与上次经过时大不相同了，这时保

定已失守，敌人继续南下，石家庄，就成为敌机轰炸之主要目标。火车站炸得破破烂烂，已不是廿日前那样富丽堂皇了。一般老百姓，都知道他们的危难快要到临，各人都有自己打算与自己的行动。从各人面部紧张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石家庄是绾毂南北，西通三晋的铁道交通要点，也就是军事上的要塞。敌若据此，可以西叩娘子关，南饮黄河水，其重要可以想见。战前也许是战事发生之后，我们在那里开始准备建筑一条国防线，但是直到那个时候，这条国防线的工事尚未完成，听说好多水泥钢骨的防御工程，尚未乾燥坚硬，所以毫无抵抗大炮轰击的能力。我在那里逗留了两三日，一方面是传达大本营的意旨，一方面是想看看部队调动的情形。一日，我正在孙方鲁的总部吃饭，敌人的炮击已经开始了，而我们的部队正在布置，好多还未进入指定的位置。听那声音是重炮，而且数量也相当的多。我问孙方鲁："你看这正面能够支持多少日子？"他说："如果挨得过这阵炮击，就有相当的时间可支持，否则就难说了。因为敌人作战开始，就是用炮火作猛烈的轰击，往往有些部队忍受不住，不待敌人步兵的攻击，已经败退下来了。"这是他经验之谈，并不是批评哪个部队。这时他的部队已经奉令到太原去，在正面的是另一个部队，而且兵力也很单薄。

雁门关陷后的山西战事 我到太原，阎伯川已经由雁门关回来了。敌人由平型关突破，楔入雁门关的右侧后方，威胁整个的正面，同时正面的敌人也加紧进攻。号称晋北天险的雁门关，遂告陷落！往昔晋人有"鸟飞不过雁门关"的谚语，以形容雁门关的险阻。但是敌人却不由正面飞过来，而是由侧面绕过来，也许是受了历史上传说的影响。其实雁门关的形势，并没有传说那样的险峻。公路铁路都通得过去，何况是两脚步行的步兵呢？以现在的目光及情况看起来，并算不了什么。雁门关战役，我方损失虽不大，但撤退的情形，是相当的狼狈，影响到以后的计划与部署！

在太原，我住在绥靖公署内，以便随时与阎伯川商量问题。

同住在一起的，还有李任潮、李民欣、张文等数人。李任潮当时未有什么职务，他们由南京到山西来，想是作战时的游览，大约他以前未曾到过山西。空袭是每日都有的，每当警报发出的时候，阎伯川总是派员催促我们同下他的防空洞里。有一日，我们在防空洞里，炸弹下来了，整个的洞发生剧烈的震荡。我的心里想："难道就这样完了么？"警报解除，急忙去勘察，一个五百磅的炸弹，落在隔院里，与防空洞相距不过三五十步，把李任潮所住的那幢房屋，整个炸毁了。落在其他院里的还有好几个，假使不是阎伯川照料得周到，李任潮等或者还在屋里睡午觉，因为他从来对此是满不在乎的。住屋炸毁了，行李也没有了，他们就此离开太原。

石家庄失陷娘子关吃紧　忻口的战役，正在布署着，而石家庄的战事，我军却已败退了。我方的计划，是想以少数的部队据守石家庄，牵制平汉路正面的敌人，使他不能转向山西，而以主力转移太原，从事忻口的会战。因雁门关、平型关已失，敌人已进入山西之腹地，若能在太原以北，忻口附近将敌人歼灭，则太原尚可确保，晋局尚可控制。否则，形势必相反的突变。但是敌人何尝不预料及此。而且我们部队的行动，无一不在敌机侦察之中，他必针对我们的计划而确立他的对策。他们以很迅速而有力的攻击，将石家庄的防线突破后，仅以少数的步兵，配合较多的骑兵及机械化部队，向平汉路沿线的平原地区追击，而以主力转向娘子关会攻山西，并不受我正面的牵制。反而因我正面不能确保，将整个的太行山脉的侧面暴露出来，变成一个绵长而单薄的防线。

约莫是十月三、四日吧，石家庄情况已经不明，娘子关方面应该如何布置，亦未有确定的计划。而且因为情况的突变，以前的计划也未必适用。这里是一二两个战区的分界点，毛病就要出在这个地方。十月七日，阎伯川要我到娘子关外去视察。我带了几个幕僚人员，乘车到了关外的井陉县，这是关外的要点，我在

那里找到当时娘子关方面的指挥官冯总指挥钦哉，问他前方的敌情及我军布置的情形。根据他的报告，觉得情形十分不佳。因为敌人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获鹿县附近地方，离我们不过三十里，在我们会谈的地点，卫士就捉获了敌方的便衣侦探，这是由敌人队伍中的朝鲜人化装的，经审讯属实，把他枪毙了。就此判明敌人距离我们更近，我认为我们的部署太不适宜，娘子关的正面仅布置了赵寿山的一个师，冯总指挥本有的两师，却放在龙泉关以南——娘子关左翼，曾万钟的三个师，则放在和顺县马岭关方面——娘子关右翼。以这样少的兵力，布置这样广的正面（一百七八十里）处处显出薄弱，处处都是空隙，尤其是娘子关正面是太单薄了。我当时与冯总指挥商量，要把左右两翼的部队向中央靠拢，但是部队已经移动，能不能赶得回来，又是问题。那时井陉秩序已是相当紊乱，火车站上还有许多要开往太原的孙方鲁部队正在候车。我于黄昏离开那里的时候，已听见远远的枪声。

我负起指挥娘子关战事的任务　赶回太原后，向阎伯川建议，迅速改变娘子关方面的部署，并且要留孙方鲁的部队担任娘子关的正面。在当时只有指派孙部担任这个任务，时间上才来得及，因为他尚有一部分官兵在井陉候车而未开动的。伯川问我："何人去担任指挥呢？好不好你去负这个责任？"我当时并未考虑我本身的困难而推托，只觉得无论怎样的困难，我都得去担任。因为在那时候，不允许我考虑本身的困难问题呀！负责担负起来了，九日晚上，就得出发到前方去，但是我由南京带去的幕僚人员，仅有陶钧、裘时杰、徐佛观等数人，即使临时有干部，要把这指挥机构组织起来，在时间上亦做不到，只好在绥靖公署调了几个参谋副官，并带了一架无线电报机，连夜赶到娘子关去。这正是二十六年的双十节。

我在离娘子关车站十多里的磨河滩设立指挥所，这是以前国防计划中所定的指挥地点。但除了依山作了三个防空洞之外、其余一无所有。初到的时候，连打电话都得要借用正太路或乡村的

电话线。所谓娘子关的国防工程，仅是那一带的山上凿一些洞，既不是炮兵的炮位，又不是步兵的战壕，而且整个阵地上，除了太原通石家庄的一条长途电话线，及几处乡村电话线之外，阵地的通讯设备，完全没有。军队在这样的既设阵地作战，简直与临时遭遇战的情形差不多。而敌人已迫近关门，并且占领旧关（又名固关）了。要临时准备，又那里来得及呢？这是娘子关作战以前的国防布置情形，至少可以说是还未准备完成的国防情形，而不是局外人所能知道的。

原来敌人自突破石家庄我防线之后，就以主力——川岸二十师团——附属特种兵及一部分战车转向山西进攻。他到达了井陉的前方，并不即向井陉、娘子关正面进攻，而以主力斜出井陉的右侧，绕攻旧关。这是曾军与赵师中间的空隙，没有部队防守。我到娘子关那天的早晨，旧关已经为敌人占领了。旧关在娘子关的右侧后，敌人如果再前进，就要切断娘子关的后路。在那情况非常紧急的时候，只得一面命令在车站候车的孙部某旅，去阻止旧关的敌人，他们虽然还没有奉到他直属长官的命令，而对于我的命令也接受了。我说我对他们负责。正面的赵师见情形如此，也很敏捷的向井陉右侧出击，以阻止敌人的继续向旧关前进。但是结果不好，反而将关外的要点雪花山丢了，而退守于关的正面，关外就毫无控制地点。于是敌人的行动，更为自由。我急电曾军向旧关之敌进攻，但不能如期赶到。旧关之敌，又向左翼进攻，离我指挥所仅有数里，一时又无生力部队来阻止他，形势真是危急万分。这是恰好陕西绥靖公署的特务团开到了，立刻上去堵截。这个团约近三千人，装备很完全，而且都是年青学生。团长李登西，尤为勇敢。由上午八九时起接触，战斗到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总算把敌人堵住了。而这团人呢，仅剩下四五百人，李团长亦身受重伤，战斗之惨烈，概可想见！随后孙部的一师赶到了，参加上去，把这股敌人——约一个加强大队——困在一个谷底而完全消灭了。我们这方面，除了那个李团蒙了重大的损失之

外，孙部的一师，亦损伤不少。

两次悬赏的收获 自孙部及曾军陆续赶到，战局乃告稳定。遂调整部署，以孙部及赵师担任旧关以左娘子关的正面，以曾军担任旧关以右，冯部两师担任娘子关以左之任务。对于楔入旧关之敌，由孙部及曾军加以攻击。孙部的正面，颇有进展，予敌军以很大的打击，并将正在增援之敌炮兵加以击溃。但敌军亦陆续增援，阵地屡有得失，渐渐成为胶着状态。有时敌军被我军压迫于山谷下村落内，仍顽强的抵抗，不容易将其逐出或歼灭之。要俘虏他更不容易，我乃悬赏，俘虏一个敌兵，赏洋二百元。在当时二百元，是一个很重的赏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定了这个赏格，猜想一定可以得到很多俘虏，但结果解上来的，仅有两个。据部队报告，俘虏敌兵，确不容易。即使俘获了，一不小心，他就会自杀。那一次俘获敌兵原有十多个，结果仅剩了两个解上来，其余的都自杀了。因为敌兵平时受到他长官的欺骗宣传，说是万一做了中国军队的俘虏，一定要杀头的。敌人非常迷信，说是杀了头的人，下世不能转为人，是以最怕杀头，他们的长官就以此作为哄骗逃亡或投降的唯一方法。这便是具有所谓“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不肯作俘虏的主要原因。那两个俘虏，一个腿部受了伤，不能行动了，另一个便到处背负他，服侍他，丝毫不觉得有一些勉强或厌烦的样子。在这种场合里，表现出高尚的互助精神，真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又有一次为争夺一个要点，悬赏五万元，孙方鲁指定二十七师的某营去担任，并说明悬赏的意义。那营长慷慨激昂的说：“赏么，我们不知用得着用不着，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们总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与最后的牺牲，以报效国家，希望战后能在那儿立一个碑，来纪念我们这一群为国牺牲的人，就满足了！”结果，那营长及一营人大部都牺牲了，剩下来的不到几十个人，可惜这营长的姓名，我不曾记下来而遗忘了。在一个长期的国际战争中，无名英雄真不知有多少，而无名英雄的精神，实在比有名英雄更为伟大，他们埋没了

姓名，不一定是他们的不幸呀！我对于悬赏得来的俘虏与不受赏而牺牲的官兵，同样敬佩。同时又想到悬赏是中国军队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办法，这种办法，是否合理，且留待后人去批评吧！

娘子关放弃后阳泉接着沦陷 敌人仍是继续的增加，而且向我们的右翼延伸，希图包围曾军的侧翼，我商得阎伯川同意，把十八集团军刘伯承的一师调到东边来，掩护我们的右侧背。刘部在阳泉集结，向平定方面推进，行军迅速，纪律亦佳。刘伯承绰号刘单眼，在十八集团军中号称能打硬仗的，他有一股猛冲的蛮劲，这是周恩来向我介绍的话。但是到了这方面作战，他不愿担任固定任务，而只肯进出敌人的侧翼，以游击敌人。在当时情况之下，亦只好任其如此。如果他确能在敌人的侧翼游击敌人，亦未尝不可以阻止敌人向我侧翼包围。刘部到达指定的位置后，的确打了一两次相当激烈的仗，将敌人滞止了相当时候，但是敌人以一部与他支持，主力仍向平定前进。而且他们打游击打惯了，遇到这种顽强的敌人，也就无可如何而任其通过，从此也就不知道他们游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时我将前方交与孙方鲁指挥，自己回到阳泉来，以便指挥后面到来的部队。而敌人已进到平定附近，威胁曾军的侧背。这时川军邓晋康（锡候）所部有一旅到达阳泉，我命令他去确保平定，以掩护曾军的侧背。那旅长姓曾，很勇敢，但是对外作战，尚欠经验。而且川军枪械，也实在太差了，轻重机枪固然缺乏，就是步枪也是川造的，往往打了二三十发子弹，不是枪机打不开，就是膛炸了。他们到了平定，也许是警戒疏忽了，为敌人所袭击而不知所终！敌人并不径向阳泉前进，而仍向曾军的侧翼包围。本来我们的阵线，是与正太铁路成直角的。到那时，就渐渐变成与正太铁路平行了。而阳泉的侧翼，更是空虚。敌人仍向阳泉方面移动，万一阳泉被敌人占领，则我军所有的部队，都被隔在阳泉以东，而受到敌人的包围。敌人并可由阳泉直趋太原，那时后方更没有即刻可以增援的有力部队，虽然有些川军陆续到来，但

是他们的装备太差，而且时间已来不及了。

我处在这个情形之下，乃决心将在娘子关正面的孙方鲁所部，转移到阳泉方面来。我把这个处置向长官部报告，他们总以为不应该就把娘子关放弃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敌人并不向娘子关的正面攻击。双十节那天，敌人已经占领了娘子关侧后的旧关，以后更是不断的向我侧后进攻。娘子关的险要性已失，若坚持固守此关，不但虚耗我军的兵力，而且有使这部分守军被包围歼灭的危险。

孙方鲁到了阳泉，我便转到寿阳。原来希望在阳泉的正面可以拒止敌人多少时间，但是敌机终日活动，我们的行动，他们是清清楚楚的。白天行动，固然困难，晚上行动，更是混乱，我军到达阳泉的时候，敌人也到阳泉了，于是就在阳泉附近作了一次的混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军自不易得到适当的部署，确实阻止敌人的进攻。阳泉失陷了，以后的情况更是混乱，孙方鲁也转移到寿阳来。这时在忻口以北地区担任敌后作战的十八集团军全部都转移到寿阳。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并到我所驻的半月村里会面，同吃了一顿晚饭。据谈是奉令转移到正太路的侧面，昔阳县与和顺县中间的地区，与刘伯承师会合，以全力作战，阻止敌人向太原前进。我听到这个计划，自然是兴奋的，因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部队增加我们的正面，的确难以维持。但是他们过去了三、四日，计算时间早达到了，而他们的消息一些都没有，亦未曾从其他方面得到他们在哪方面作战的消息。我那时还想不到他们会信口开河，不践诺言，而置友军于不顾的。到现在才想起他们的全部转移，是有他们的打算，奉命不过是虚饰的话，他们要脱离晋北的战场，而移转到晋东南来，亦即是要脱离整个山西会战的场合，而自已在太行山脉上建立单独的基地与活动。所谓要在昔阳、和顺中间地区阻止敌人，不过是对外标榜的一句话而已。

我在寿阳，久等不到十八集团军的消息，一天晚上，在孙方鲁总部接到冯师长安邦——后来升军长在襄阳附近殉职——的报

告，说是敌人离寿阳仅有二十五里。孙方鲁对他说，要他竭力的抵抗，否则先将他枪毙。他的回答是："我当尽我最大的努力，但是我手上仅有一连人，其余的部队都脱离了掌握。"其他的友军更是联络不上，而敌人亦渐渐的迫近。我们的意见，对于这些溃散的部队，总须有收容整理的地点与时间，才能指挥再战，否则以后更难设想。收容整理的地点，最好在榆次县——正太路与同蒲路的相交点——附近，于是就决定再由寿阳向榆次转进。在途中忽奉阎伯川的命令，要将这方面的部队都向太原集中，而且要我们回到太原去会议，我们就只好遵命而行。

忻口会战概况 忻口会战情形，我虽未亲自参加，也有叙述的必要。原来的计划是对于由雁门关、平型关突入太原以北之敌人——一个师团。一个酒井兵团（相当于一混成旅），及特种兵坦克车等，在忻口以北予以歼灭。而当时欲使用在那方面的部队，除晋绥军十几个师，十八集团军三个师之外，中央军如卫俊如、刘茂恩、高桂滋等亦有十几个师，一共有二十几个师的单位，并有十多个炮兵团。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敌人处在我优势兵力与炮火之下，曾遭受极大的损失。敌人的炮弹用完，不能不停止射击，等候飞机的接济。步兵亦被迫改取守势，以待后援。而阎伯川更令他的炮兵，不惜炮弹，尽量轰击，我官兵亦极勇敢，郝军长梦麟，就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他是中日战争中首先阵亡的一位军长。起初是不料石家庄的阵地被突破得那样快，即使被突破了，敌人也未必能以平汉路上的主力转移到娘子关来。所以娘子关的守军不很多，而且是不很坚强的部队。等到娘子关危急，乃将已调到太原的孙方鲁部调回娘子关，即使娘子关没有问题，孙部能参加忻口的会战，亦未必即能将那方面的敌人歼灭。因为敌人作战计划是整个的，难道就让这部分队伍任我们歼灭么？所以石家庄、娘子关的情势突变，对我总是要发生很大的影响的。

深夜退出太原 敌人在忻口方面虽一度为我所抑止而陷于危殆，但仍能由陆空方面得到补充与增援。十八集团军在敌后阻止

敌人增援的工作，并未完全收效，我们转移到寿阳的时候，忻口方面的我军也就支持不住而撤退了。我把指挥部的人员留在榆次县附近的鸣李村，而自己轻装回到太原。忻口、娘子关两方面的高级将领，都已赶到，阎伯川及主持作战计划的参谋人员，将改变的作战计划，向大家说明。这个计划，是固守太原近郊的既设阵地，太原城及以北以东附近十余里的地带，以前都构筑有国防工事。廿五年我到太原曾参观过，时间又经过了一年，想必是更加增强了。原定的计划，是以忻口方面的部队退守太原以北的工事，娘子关方面的部队，退守太原以东的工事，而以傅宜生所部固守太原城，因为他是以前以久守涿州而著名的人物。在会议的时候，我提出意见，不很赞成这个计划。并不是我对于太原附近的国防工事，认为不应固守，而是恐怕两方面正在败退的部队，还没有占领阵地的机会，就被敌人压迫到太原的城边来！同时此种工事是否适用，亦还是一个谜。这是我在娘子关方面所得到的印象。万一占领不住，就被敌人压迫下来，这三十多个师，麇集在一个锅底里，其危险情形，就不堪设想了！我们都是战败下来的部队，若果没有生力军掩护，使这些部队有收容整理的余暇，决不能作战，就以娘子关方面的部队来说，自第一次撤退后，中间虽严令他们在阳泉、寿阳等处占领阵地，节节抵抗，但何曾收到一些效果——退到太原附近部队，更是混乱，所以我认为固守太原附近，有许多的困难问题，并且要招致极不好的后果。我的主张，是将娘子关方面的部队，撤退至正太铁路以南的榆次，太谷之线上，对由东西进的敌人作侧面阵地，以削弱敌人对于太原的压力。将忻口方面的部队向汾河以西的山地撤退，隔河依山，占领侧面阵地，监视由北向南之敌，以免其直攻太原，而太原则以傅宜生所部固守。这种布置，虽未必能收到积极歼敌之利，至少可以延长太原防守的时间，并得避免集中受困彼此混乱之危险。但这种主张，未蒙采纳。事实上军队已经行动，要改变方向，也有困难。到会的那些人，尤其是前方的将领，都是连

日作战，疲劳已极，好多人就倚在席上，呼呼睡去了。会议到深夜十一时，仍决定照原定计划实施，并且决定长官部当晚撤退——其实大部早已撤退，仅留几个高级人员。太原的防守，交由傅宜生负责，大家分途的散了。但我得打一个电话回南京，将这个情形报告统帅部。等到我打了电话出来，全城的电灯都熄灭了，一个偌大的绥靖公署，黑黝黝的静寂得可怕。我走出大门外、一辆汽车都没有了，连原来指定给我乘坐的那辆汽车，也不知驶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散了，向谁去追问呢？我想找傅宜生去设法，但他的司令部又不知设在什么地方？黑幕笼罩着的太原城，又何从去找他呢？只得带着随从六个卫士，同他们步行出了南门、本想向榆次前进，回到指挥部里去，但据报榆次已发现敌人，我们的指挥部想来也一定移动了。于是决定步行向西退出，这就是我廿六年十一月四、五日狼狈退出太原的情形。

我走到汾河南桥——城北是铁桥，城南是旧式的木桥——好多的车辆堵塞在桥面上，有的是汽车，有的是大车，有的是太原撤退的，有的是要回到太原去的。桥面狭窄，仅能容一辆汽车通过，大家都不肯相让，大家都无法通过，而在那里斗嘴，有些人已在车上睡着了，一点也不觉得着急。我见了这个情形，觉得非常危险。因为一到天亮，如果敌机飞来发现这个轰炸目标，随便丢下几个炸弹，大家都完了。我把车辆逐一检查的结果，知道是回来的的占少数，出去的占多数。我就要那些回太原的车辆向后退出，让出去的车子过完了，再准回来的车子过去，连劝带骂费了一点多钟，才把桥上的车辆疏通。我也附搭在一辆卡车上，开到太原西南五、六十里的开栅村停下来。在车上默思：为什么这些人连过桥的常识都没有？只有一条单行的桥，彼此都对堵着而不肯相让。好象不知大祸的将临似的。这算是赌气的呢？还是赌命呢？

由交城撤退至灵石　第二日早上，我到那乡公所探问，知道这里是交城县管辖的地方，离县城不过三十多里。我叫周副官杰

英借了一辆脚踏车到城里，去查询阎伯川驻留的地方，并请派一辆汽车给我，以便到他那里去商量许多军事上的问题。因为临撤退时，他说是退到交城县附近的。过了些时，阎氏派来的车子到了，我到他的驻地见面，把昨夜南桥所见的情形告诉他。他说："北桥的情形也是一样，朱参谋长兰荪的汽车，这时还没有到达呢！"我说："照昨夜的情形看来，太原恐不能久守，希望赶快到较远的后方去作其他的布置。"而他坚信太原城至少防守一月以上，不管外围的部队情形怎样。

因为我的指挥部已由榆次向太谷沿同蒲铁路上撤退，而且汾河以东，同蒲路沿线，都是军事上的要地。那方面没有一个高级长官在那里照料，虽然目前军事重点不在那边，亦须有一个人去处理那些消极的问题。于是我请求到河东去，遂与阎先生分别了。我坐了一辆小包车，在路上走，白天里敌机是时时可以遇到的。我车旁虽派有警戒的人员，但发现敌机时，已经是很近了，我们停了车，赶快避到路旁的凹道里去。仰望天空是九架敌人的战斗机，敌机知道撤退时坐小包车的，一定是高级官长，所以一齐俯冲向汽车扫射。但是我们已经躲到凹道里去了，敌机又来回向凹道扫射了三次，我们见机群向这方飞来，就躲到那方的死角里去。因此不致为枪弹所伤，汽车也未损坏，可云幸事！经过汾县、孝义县，老百姓还是攘往熙来的在那里赶市集，他们好象不知道有战争似的，当然更不知道太原的情形。过了汾河，到了介休县。据说这是介子推退休的地方，因而得名。它是同蒲路上一个大站，刚被敌机轰炸，车站上的设备都炸毁了，几个列车正在燃烧着。站上的人员也星散了，打听不到沿线的消息，在黄昏时候，已经和我失去联络的一个卫士队突然找到了，而指挥部的人员，却已乘火车向南开去，我只好同我的卫队在黑夜里，步行向灵石前进。一路上有很多由前线撤退下来的难民与散兵。那时正是秋高的深夜，残月在天，照着这撤退的行列，大家都是深沉而静默的前进。我在那百无可奈之中，吟了一首诗，结句云："一片孤城

一痕月，几行涕泪几行人！”盖写实也。

在灵石县附近的一个小村驻了下来，从电话上打听各方的消息，知道太谷尚未有敌人到达，因为敌人是向西会攻太原去了。而敌机则终日在铁路线上轰炸，想敌人是恐怕我们会有增援的部队从铁路上开来。其实当时并没有增援的队伍开上去，而由太原撤退下来的伤兵散兵及物资，却布满了铁路沿线各站。这条铁路本来是先天不足的，再加以敌机的破坏，员工的星散，运输力就等于零了。在灵石车站上有两个列车机车没有水，不能开行。列车上挤满了散兵、伤兵，有很多伤兵反而丢在站里不能上车，痛苦呻吟，无医无药，已是二、三日了！我命裘时杰率领卫士队将散兵缴械，驱逐下来，把伤兵抬了上去。同时命县长动员数百民众到河里挑水，把机车灌满了水，升火开行。火车用人工上水，也是我初次遇到的事。

山西当时的民众组训工作，是相当成功的。我在撤退的路上，无论大小村镇都有牺牲大同盟团——简称牺盟团——的组织，那些壮年的男子，都佩着牺盟团的符号集合在一处，等着担任引路、运输或侦察的工作。这是战事发生以后的人民服务组织，好象各省的战时服务队一样。以前山西的乡村中还有一种公道团的组织，揣测他的意义，好象是乡村的评议会。山西当局对于村政素来是很注意的，这个组织特别将公道两字标出，不知是否乡村里还有许多不公道的问题存在着？

在灵石听到太原失守的消息　我在灵石数日后，才与阎伯川联络上，知道他撤退至大麦郊附近（中阳县的市镇），并且知道太原已于我们离开后四、五日就失守了。这次战事，打破了山西军善守的传说。其实并不是山西军不善守，而是现代的火器太厉害了。以我们古旧的城堡与劣势的火器，要作长久的固守是不可能的。不但山西如此，以后的南京、以及各地的防守战都是如此。我们的作战观念，应该有重大的改变才是。后来会到孙方鲁，李默庵等，谈起那天深夜太原撤退的情形，他们说是回到部队里去的情

形，更是混乱。敌人就乘着混乱的时候，向他们进攻，所以没有一个部队能按照原定计划进入阵地，得以从容抵抗，就被敌人压迫到汾河以西的山地里去了。在那个地带，也只有河西的山地是败退的安全地方。这个混乱的大败退，何尝是意外所不及料的呢？

我在灵石住了几天，将应该临时处理的事，已经是处理了，我就乘同蒲铁路的车转到临汾。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山西省自筑的铁路，它的风味与正太路差不多，也竟可以说是完全一样。阎氏费了数年的工夫，辛辛苦苦把它修通了，不意敌人就沿着这条路线作为进攻山西的主要路线！交通便利固然是一个好处，但在国防不能巩固的国家，却是一个害处。张汉卿在东北修了很多的铁路，结果也是便利了日本人。我写到这里，还想起一件事：自太原失陷后，不久正太和同蒲铁路的北段敌人就通车了。原因是石家庄、娘子关及大同撤退的时候，这些铁道都没有彻底的破坏。山西当局以为只要将机车、车卡全数退到太原以南，那些路轨，敌人是无法利用的，因为都是窄轨。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些机车、车卡都是购自日本的，听说天津还有路上购下而未运回的很多机车、车卡，日本人要利用，岂不是更加方便么？

临汾是晋南的重镇，是太原撤退时预定的后方基地，军事、政治、经济的各种机关及人员早就撤到这里来。他们知道了太原失陷的消息，面上表示很懊丧的神气，尤其是那些富有资产的人。因为太原是民国以来，最安全的都会，从未受到内战的蹂躏。他是军政人员及富商大贾的安乐窝，尤其是历史悠久而规模伟大的兵工厂，与近年来新建的工厂，正要为国家的军事、经济上有所贡献的时候，而遭受到毁灭的损失，因此我也为它掬了一把同情的眼泪！

回到南京 我在临汾又住了数日，觉得山西的战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我在那里也没有什么意义，奉大本营许可，回南京去。乘火车到达同蒲路的终点枫陵渡，在初雪方飘的早晨，坐民船渡

过了黄河，而到达历史上有名的潼关。回头望望滔滔东去的黄河，想起它在历史上有很崇高的军事价值，不知在这次的民族神圣抗战当中，又能发挥出一些什么力量呢？

在驻军李及兰师长处吃了一顿早餐，即乘陇海车转津浦路上去。归心是何等的急，但空袭警报是不时的传来，列车在路上屡停屡进的，把时间都误了。离浦口不过二十多公里，还来一次警报，据说有九十多架敌机轰炸南京，为抗战发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那里看见一架我们的战斗机，一歪一斜的向北飞去，想是被打伤了，不知要降落到什么地方以终结它不幸的遭遇？到了浦口，津浦线区司令部的高参谋长义安，已在站上候我。我问他上海和南京的情形。他说："上海的会战结束了，我军已退到镇江附近，南京要作紧急的撤退，路上要准备五百个列车作为撤退之用。"渡过了下关，进入城里，一切的情况，已不是一月以前的样子了。虽然如此，但我仍很幸运的回到首都温暖的怀抱里来。在悲痛寂寞之中，得到莫大的安慰。

十九　重来浙江

奉命重主浙政　我自山西回到南京，这时上海会战已告结束了。国军自锡澄线——无锡至江阴——向西撤退至镇江、丹阳、溧阳之线。南京情势已是十分紧张，统帅部正在筹划如何固守南京，攘击敌人。我在这种情势之下去见蒋先生，（他自上海战事发生，即移住总理陵园苗圃的小屋内，这小屋就是当时发号施令的所在地，我离南京前和蒋先生最后一次见面，也是在那里。）将山西失败的情形向他报告，引咎自请处分。蒋先生说：“那方面——指娘子关——军队太复杂，临时指挥，自有困难。”并不加以责备。我并请示以后的工作，他曾有意要我帮唐孟潇守南京。我因为在山西已尝过他的滋味，再不愿重来一次，向他婉辞了。他亦不勉强。过了两天，又召见我，要我重到浙江当省政府主席。因为当时长江下游各省正当军事要冲，为使军事便利起见，都调换军人充当省主席，江苏的陈果夫换了顾墨三，安徽的蒋雨岩换了李德邻，浙江的朱骝先换了我。这是当时各省人事重大的变动。蒋先生所以要我重回浙江的原因，无非是因为我曾在浙江两年，那里的军事准备，都是我在任内着手规划的，我回去可以驾轻就熟，配合军事需要。而我呢，亦有此感想。同时，以为两越是历史上有名的复兴基地，秉有传统的优点，若加以组织与训练，一定大有可为。我预料中日战争时间，一定是很长的，区域也一定是很广泛的，而且浙江一定首先受到不幸的遭遇。如果能在浙江将民众武力建立起来，与国军联合一致，则于国家民族神圣的抗战，一定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在闻命之下，对于这个危险的环境与艰巨

的任务，不稍踌躇考虑，就毅然的担负起来了。次日，我将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的名单呈上去，即奉批准。省府委员除我之外，计为王先强、程远帆、许绍棣、伍廷飏、朱孔阳、周象贤、许蟠云（八区专员升任）贺扬灵等九人，而以李立民任秘书长。(当时不是委员，周象贤辞职后始任为委员)。王先强为民政厅长（系由一区专员升任）。程远帆为财政厅长（旧任）。许绍棣为教育厅长（旧任）。伍廷飏为建设厅长（新任）。宣铁吾为保安处长（旧任）。这个抗战初期的省政府阵容，虽然加了几个新人，而这些新人与旧人，亦都是我二十四、五年在浙江任内的同事，预料工作的力量，一定很充实的。命令发表之后，朱前任就有电报，催我赶快到杭接事。但是我还有许多人员在湖北，而湖北任内虽然移交了何雪竹(成浚)主席，也仍有很多未了的手续，必要回去料理料理。于是我同朱骝先约定十二月五日赴浙接事，请他多等几天。我大约是十一月二十四、五号离开南京。那时南京的机关人员除了蒋先生及军事指挥机关人员外，全部都已撤退了，船位自然极不容易找到。最后找到兵工署运炸药的专船。这只船装的都是高级的爆炸药和军械，万一发生危险，一定全船化为灰烬，因此许多人都不愿意坐，而主管人员亦不轻易准许人搭乘，以免发生意外。一个大餐间里仅是我和一个同伴，冒险中的景况，要比安全的境界中舒服得多，不是身临其境的人，是不能体验得到的！阴云笼罩的天气里，配合着空袭警报呼呼的悲鸣，下关马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我们的船就悄悄地离开了南京码头。眼望看紫金山总理陵墓慢慢地隐暗而终于不见了。虽然我们的国旗还在那里飘扬，我们的将士还在那里坚守，但是它最后的悲惨的命运，已是预料不可避免的了，心里忽然感到无限的悲哀与眷恋！正如面对一个临死的病人，看他气息奄奄，即要作最后的诀别一样。

船到了汉口，自然有许多应酬及料理准备的工作，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默思到来访我，我对他说："英国对中日的战事是守中

立的，但是日本对英国极不尊重，贵国驻中国的大使许阁森爵士竟为日机扫射而受伤，你的感想怎样？”他说：“我们也明知日本军阀有意的向我们挑衅，英国并不是不准备。相反地现正急急在那里准备着。”“现在每月我们有很多的兵舰下水，但是这个计划要到一九四二年才能完成。”他继续说：“英国人的性格，当自己的力量尚未充实时，只是一声不响，暗地的做准备工作，到了力量充实了，自然会挺身而出，一些也不会放松了敌人的。”他又说：“听见说有人（暗指德国大使陶德曼）想出来调停中日的战争，但是中国切不可上当！中国若长久的支持下去，英国一定出来帮助的，如果中途议和，那时便爱莫能助了。”这个默思领事，他平日很同情中国，痛恨日本，而且好说话，不象其他英国人那样的阴沉。我听了他的话，总认为他有些感情的冲动。我将这些话，曾在行政院的议席上报告过，好些人也是如此看法。现在回忆起来，默思的话也颇正确。他可算是一个直爽的英国人。

到杭州接任　我在武汉逗留了数日，一切的准备都弄好了，就由汉口乘轮赴九江，转南浔铁路到南昌，再乘浙赣铁路专车赴杭州。车过金华，知道这时浙江省政府以及杭州各机关都撤退到金华来了，只是朱骝先主席同少数的人员留在杭州，主持前方要政，配合军事的要求。金华方面，由许厅长绍棣主持，我便在金华停车，与党政人员见面，并问问前方的情形。当时他们假中国旅行社为我准备了接风的筵席，匆匆的吃了，仍旧上火车开行。第二天的早晨，（十二月四日）火车到钱塘江的南岸，玲珑而古旧的六和塔和绵长而伟大的钱江大桥，一横一竖的露在钱江的面上，在晨光熹微中看起来，益觉得其雄奇旖旎得可爱。火车徐徐地通过大桥，临流顾盼，云影波光，心中至为愉快！几已不知战争就在不远的地方正在猛烈进行，这是我在抗战中第一次通过钱江大桥，亦是我在抗战中最后一次通过这座大桥的情景。

钱江大桥，不但是浙赣铁路最大的桥梁，亦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铁路桥梁。全长五千五百九十英尺。（内正桥十六孔共长四

千五百五十英尺，余一千零四十英尺为副桥。）因为钱江的河床都是极深的流砂，桥础的施工，至为不易。然全部的工程都是中国的桥工权威茅以升氏设计的，当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我第一次主持浙政时就开工了，直至我重来浙江的不久以前，——二十六年双十节才初步的完成。经费用去四百万，时间费了两年多，工程的巨大也就可想而知。虽然通车不久，就被破坏，但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将很多的物资尤其是京沪、沪杭各铁路的车辆器材统统运送到安全的大后方，不致遭受很大的损失，它对于抗战的贡献，也就非常伟大了！我曾听说：过去内战时北方军队败退过黄河，总想将平汉路的黄河铁桥炸毁，以阻止南方的进兵，住在黄河铁桥旁边的比国工程师就立在桥上，阻止军队的破坏，他宁愿以身殉桥，不忍目睹他心血构成的建筑物被破坏！因此黄河铁桥在内战期间，得以安全无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晚上，一个惊天动地的爆炸发生了，就是这座钱江大桥最不幸的遭遇！听说茅以升曾痛哭过他这科学的爱子。事后还在科学报上发表它的建筑与破坏的经过。那三个桥墩倒下江里的照片影子，将永远深印在我们的脑际，何况主持桥工的茅先生？茅先生科学素养的深厚以及科学的殉道精神，值得吾人钦佩！然这是国家民族胜败的大问题，有时对于这种小牺牲是顾不到的。况且如上所述，钱江大桥已尽了它伟大的任务。茅先生也可以稍慰了。

我到了杭州，先与朱前任见面，他还请我在他的寓所吃饭，谈谈前方及交代情形。过去数十年的官员交代习惯，都是前任去了，后任才来。好象新旧任在住所见面，是怪难为情似的。可是这次却打破惯例了。朱主席一直等我来才走，这也算是抗战中的一种进步吧！第二日，我到省府去接事，也不过是一个形式。因为事实上省府各机关及人员皆已迁至金华，而且许多都是自己交代自己，加以战争紧迫，大家就简便从事了。我在杭州，除了紧急措施用电话处理之外，很少其他的政务可办理。我们曾在宝俶塔底下的防空洞里，开过一次省府委员会议，这是我二十五年任

内杭市防空重要工程之一，以极坚固的岩石琢成，可以容得二三百人办公，可以受得最重磅的炸弹，一切设备都很完全。可惜我只是用过这一次，以后就敌人接收去了。

杭州沦陷的前夕 这时负杭州军事指挥责任的是刘总司令恢先，部队的前线，东边在临平、海宁一带，北边在吴兴、武康，中间埭溪、德清一带，前线都很平静。因为敌自上海决战进抵上述各地之后，除以一部分兵监视并牵制杭州方面之外，其主力皆去围攻南京，另以一部过宜兴、长兴、广德，威胁南京至芜湖之后路，所以杭州方面就安定下来。在我未到任以前，杭州市民的心理很恐慌，市面很萧条，自我到任之后，又渐渐的热闹起来。这当然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与威望，而是敌人在战略上暂时不来的原故。我在杭州住在背临西湖的中行别野里面，有暇便走走街头，或是坐了艇子游游。一般市民见我安闲无事似的，大家也就拿我当作战争松紧的寒暑表来看，认为战争一时不至有若何重大的变化，有些已经疏散出去的人，又重复回来了。浙省当时沦陷的县分，仅为平湖、嘉善、嘉兴、海盐、桐乡、吴兴、长兴等七县。其余浙东各地如宁波、海门、永嘉等地照样与上海往来不绝，和平时毫无差别。

我以前在乍浦、平湖、嘉善、嘉兴、海盐等地做了很多的国防工事。在杭州也做了几个规模宏伟的防空洞。然而前线的国防工事，未曾守过一天，就放弃了！国防工程处的人员，也就星散四方，等我到了杭州，才又重新集合起来。他们辛辛苦苦做了两年多的工程，落得这样一个结果！当时负责人杨处长澍松听到工事放弃不守，曾经大哭过。他说："这两年多以来，皮都晒脱了好几层，不意结果守也不守，不能发挥一些效力，不但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老百姓，更对不起自己。"这不仅是他，在我也当然同样的希望，那些亲自计划经营过的工事地带，能够发挥一些战果，作为保障杭州的长城，不料当我未到杭州以前，就因不守而放弃了！亦觉得非常痛心！还有一个在工程处工作的同学罗传

英，据张向华说，当情势紧张的时候，他还在嘉善前方工作，竟被敌机炸死了！工程人员不但流汗在工程里面，而且还流血在工程里面，这是工程史上最光荣的一页！他是广西宁明县人，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炮兵毕业，精于技术而勇于负责，又是一个无妻无子的人，竟忠勇的殉职了！我在同学和朋友的责任上，不能不把他这种光荣的事迹表扬出来。

杭州的防空洞，做得也很坚固合理，可惜只开了一次省府会议就不用了。因为敌人对杭州并不十分轰炸，虽常有警报，甚至终日的警报，我在中行别墅里，只是雇一个小艇荡到湖心里就算了。游西湖避警报，回想起来也是一件有趣的事！

杭州最后的命运，我早就料到了。但是那天是最后的一天，就只有敌人才可以知道。因此，我在杭州重要的工作，就是疏散。机关搬去了，还有数十万的老百姓和重要的物资，亟待运送出境。浙赣铁路，及公路、帆船、一齐动员，无不尽力的装载。艟艨船只，胶轮铁轮，连接不断地向西南开行，但是想将偌大一个杭州城所有的物资和人民全部搬走，真是不可能的事！我所最注意的就是那些工厂，希望它们搬到内地去。作为持久抗战物资生产的基础，可是我到各厂去看的时候，知道他们大都停工了，工人也已星散。只剩下一些无用的人，要建设厅召集各厂的负责人来开一个迁厂的会议，也召集不起来了。后来我下命令，如果各工厂不自动搬迁，我就派工兵来炸毁了！有的遵命自动的搬走，有些还是政府硬同他们搬运。然而交通工具太缺乏了，时间又是那样的迫促，好些笨重的机件虽已拆卸下来，仍是搬不走。结果能够搬到金华的，不到十分之一，这少少的一些生产工具，后来竟大有贡献，假使当时能够大量的搬出，其效用就不可胜计了！最可笑的是某一家银行存有十多万元的铜板，因为笨重，亦弃置不要，后来才设法运出，照现在的价格计算，不知道值若干万哩！

首都沦陷与退出杭州 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的首都——南京

陷落了！我在收音机内听到，日军定于十六日举行正式的占领仪式，心中无限的悲痛！不觉流下泪来！自首都陷落之后，杭州最后的命运已可计算得出来，而我们统帅部对此突出前方的杭州，自有一定的打算，在十二月十六、七日的时候，陈辞修（诚）、张向华、黄琪翔诸兄由安徽方面转到浙江来，约我同刘恢先到建德县城去会商，他们是转达最高统帅的意旨，对于杭州的问题有所指示。他们是由淞沪（京芜长途）转战过来的，辛劳固不必说，肚子想也是饿极了，总想痛快一些弄点食物来果腹。而那位姓江的建德县长，却是从容不迫的将酒席三献三让的慢慢送上来，不但是慢，而且又不好，弄得这些急先锋火气上升，叫副官去煮几碗面吃了就算数，弄得那县长非常难为情。的确，一个小小的县长遇到这许多统兵的大员，不知如何小心翼翼必恭必敬的来办差才好？结果是费力不讨好，急惊风遇着慢郎中，不但是把病人误死了，也把旁人急坏了。中国官场及社会上的繁文褥节，不但在战时要不得，即在平时也用不着。这种陋习，不知何日才可以革除呢？他们说完了，吃完了，就走路。我对张向华、黄琪翔说："你两位以后也许不很容易再到杭州来了，你对于临死的西子，也应在她未死之前去看看她。"他们也以我的话为然。同回到杭州，在黄膺白的别庄内，我请他们吃了一顿晚饭，洗了一个澡，他们仍连夜赶回自己的岗位去了。

杭州经昌化到徽州的公路，在那时候奉令破坏了。前方作战地区的公路，为要阻止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前进或迟滞敌人的前进，要破坏是当然的。但就那时说，这条后方的道路也要破坏，心里终有些不以为然，这也许是对于自己曾费心力筑成的产物，有些不忍的感情包含在里面。但是感情是感情，命令是命令，遵从命令，就只好忍痛的把感情牺牲了！这条杭徽公路在这矛盾的心理之下就破坏了去，也可以说这是浙江公路大量破坏的开始。

杭州当京沪侧背，在南京未陷之前，敌军无暇顾及，南京陷

落了，日军必须占有杭州，才可以向西沿长江攻武汉，与向北沿津浦路前进，以会师徐州。所以十二月十六日以前，埭溪、德清、临平、海宁各前线的敌人是很沉寂的，十六日以后，就渐渐的活跃起来了！且另有一路敌人由广德、泗安下安吉、孝丰，其主力由黄湖出余杭，占富阳。一部由孝丰经报福镇，希图越过天目山，占於潜，下分水、桐庐，以切断线江北岸的退路。沪杭铁路正面之敌与京杭国道正面之敌，亦同时进迫。我国军按原定计划抵抗，逐步向南岸撤退。十九日的晚上，我与天目山韦军长云淞，凌师长压西通电话，我问那边的情形？他们说："天目山附近的山太高，不好守，敌人攻击很厉害，恐怕守不住。"我说："广西人只怕水，难道还怕山么？你们一定要守住天目山，不让敌人直下於潜、分水、桐庐，才对得住我。"我这不客气的话，在第二个部队是不能用的，因为那方面的部队都是广西兵，都是我多年共患难的部下，我就很不客气的责备他们。他们也就接受了我的意见，去死守那条岭。结果，敌人死伤很大，不能冲过於潜、临安。当地的人民特为此战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那些阵亡的将士。但是黄湖、横坂一路，攻进至余杭附近，京杭路上之敌，亦已进至瓶窑附近，沪杭线上已到塘栖附近，尤其是余杭方面，横下富阳，则我后路将为其所断，因此我与刘恢先总司令商量，决定准备退出杭州，这已是廿一日的事了。

黄膺白先生在西湖的边上，建筑了一所房子，外面是中国式的，内里则完全是西式，可惜造好之后，他还没有住过，就去世了！交由中国银行保管。我很喜欢这所房子，时常到那里去休息，或请请客。到了二十二日，我到那里去，管房子的也知道就要撤退了。对我说："那两个房间都是字画古玩，是黄先生保存下来的，弃去未免可惜。"请我设法。我说："整个杭州都完了！还顾得这些物件吗？"我很喜欢那两条洋狗，因为在那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它同我最亲昵，便把它们带了走。我回到中行别墅把应该准备的事物料理一番。前方是再没有什么消息可报告了，成

了一个绝望而沉静的状态。我打电话通知刘恢先，说明二十三日黎明以前离开杭州，因为我同他的路线不同，我是向桐庐方面，他是向萧山方面。天一亮，杭富公路就要破坏了！所以我不得不早些离开。他候到二十三日的夜里，才退回南岸，钱江大桥就在二十三日夜里未天亮的时候，轰然一声，沉下去了！这是以后的话。我打完了在杭州最后的一个电话，还上床睡了一霎，心里好象对临死的病人，能多留一刻就是一刻的光景。两点钟起来，检点行李，还把中行别墅里一个席梦思的床褥带上汽车。我由杭州带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一张席梦思床褥、和两条狗。

我在二十六年十月底，很狼狈的离开了太原，十一月底、很凄惨的离开了南京，十二月底又很悲痛的离开了杭州。冷峭的寒风，吹着霏霏的微雨，汽车沿着湖滨驶过，零落不见一个行人。但那街头的路灯好象含着满眶热泪的眼睛，放出惨红的光圈，一明一暗地，在那里闪烁着，湖上的碧水，也象一个困苦颠连的流浪人，在那儿长吁短叹如怨如诉的悲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号称天堂的杭州！天堂天堂，刹时间就要变成地狱了！想起了天堂的快乐，便想到地狱的痛苦，不知何日可以再回天堂哩？我是两任的西湖守主，这种景况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阿！伤感之余，曾填《菩萨蛮》一阕，以志不忘。

越王欲雪稽山耻，越溪送女愁西子。一步一回头，
酒旗楼外楼。　　吴宫人已去，教训谋生聚。期以十年
春，还伊湖上人。

二十三日拂晓，我到了桐庐县政府，将朱县长海槎叫了起来。我同他到离城十多里事先准备好的小村庄里，将电话架设起来，打电话给杭州刘总司令，问问前方的情况，也不过是想知道敌人到底在那个时候进城，并没有什么积极的希望。但是下午的电话就打不通了，只能通到富阳。当日的下午，富阳还没有敌情，但是敌人已由余杭向富阳前进，预料二十四日的下午，就可到达富阳城。当时我手里只有一班卫兵，可是我不愿马上就向金华

退去。二十四日下午，富阳的电话亦叫不通，自然是敌人已经到达了。幸而在那一日里，廖总司令燕农（磊）的兵，有一部从分水方面转过来。张师长淦，徐师长启明（都是广西兵）先已到来。我将杭州、富阳的情形告知他们，要他们立刻布置。我虽然不负指挥的责任，但当时我不能不在那时暂时的负一负责任，而等待廖总司令的到来。还有一团的广西队伍，由团长李本一率领，并奉命守嘉兴，后来转守德清，撤退时，于二十四日黄昏，经过富阳，为日军所截击，乃由东沙洲渡过南岸，被敌击毙或淹死的很多，几乎全军覆灭！

敌人到达富阳之后，亦不再前进，已成相持的态势。我见前方已有人负责，乃转回金华。刚巧是二十七年的元旦，正值兵荒马乱满目凄凉的时候，也就忘记这是一年的开始，更谈不上照例的庆祝了。

此次浙江沦陷的地区，又增加了武康、德清、崇德、余杭、杭县、海宁、富阳及杭州市。安吉、孝丰虽一时陷敌，但随即退去。省会是在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沦陷的，距首都沦陷为时仅十日，我们每年都在这一日举行纪念的仪式，以示不忘这个奇耻大辱。

临时省会由金华迁方岩　当我回到金华的时候，那里的秩序，还很混乱。这固然由于从杭州或上海撤退下来的党政军机关人员尚未安顿就绪，同时敌军占领杭州之后，金华就是敌机第一个轰炸目标，亦为敌军向西进攻的主要目标，所以人心恐慌万状，弄得家家闭户，处处关门。市上连吃食的东西，都不容易找到。顾墨三、白剑生两位，适于这时到金华来，召集刘恢先、廖燕农及其军事重要干部，会商浙江前线的军事部署。决定钱江南岸由刘氏负责，钱江北岸由廖氏负责，前方的军事总算安定下来了。我又陪同顾、白两位到钱江北岸视察了一周。过后，他们到皖南去了，我仍旧回金华来。

临时省会究竟设在什么地方？是当时一个重大问题。因为省

级党政机关虽然撤退到金华，都尚未确实安顿，照常办公。金华这地方，虽然交通便利，足为军事政治经济中心，但就当时的情况，考虑结果，实在有些不相宜。往西去呢？衢县还够得上辟为临时省会的条件。但我预料敌人若沿浙赣路西进，这里便马上要受到威胁，而且到那时再要转移一个地方，就不容易了。往南去呢？丽水在军事上的地位比较差一些，也比较安全，但我觉得太偏南了。而且我那时想配合军事上的需要，也不愿离铁路线太远，于是拿地图来详细研究一下，觉得永康的位置，适居浙东的中心，为公路交通的枢纽，离金华的铁路线亦很近，万一敌向浙赣路西进，再可向丽水转移。我并曾听说离永康城十多公里的一个乡村名叫方岩的，有很多的岩洞，可以躲避空袭，并有许多庙宇与客寓，可以容纳许多机关办公及许多人员居住。我并未亲自前往勘察实情，而向省政府委员会提出了开府永康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党政机关决定设在方岩，普通机关在永康城区，军事机关则仍在金华。可是方岩这地方，并不如传说之大，容纳不了省级党政机关的全部。因此有几个机关如教育厅建设厅等又移驻丽水，也因为这两个机关的业务，比较偏于平时性一些，工作的环境，也更需要安定一些之故。

临时省会之所以确定在永康，除了上面所述的理由以外，恐怕还受有吉利的迷信的暗示。中国人卜居或行动，往往要取一个吉利的兆头。这种习俗，就是西洋人也在所不免。抗战后各省的临时省会，如浙江的永康、福建的永安、江西的泰和、湖北的恩施，都是很吉利很好听的地名。固然被选为临时省会的地点，必须具备相当的条件，如果两个地方的条件大体相似，那么地名吉利的一处，一定是中选的。可是永康并不永康，泰和并不泰和，因此，我想起十七年北伐完成后，将北京改为北平，以为北方就从此平定了。不料这次中日的大战，就从北平附近的芦沟桥发生。命名的吉利与择地的吉利，实际有什么关系呢？

省府迁到方岩好久之后，我才到方岩去。因为我须在金华方

面处理许多的军事问题。我到了方岩，视察一周，大失所望，所谓岩洞，不过是很浅很小的单头石缝，比之桂林任何一个小洞，不知要差多远？但在没有岩洞的地方，就觉得是非常难得了。省府秘书处在五峰书院办公，五峰书院是永康的名胜，宋儒吕东莱曾在此讲过学，院舍傍山依岩，房屋既不见宽敞，环境更觉得局促。其余各厅处办公的房舍，亦不见宽大适用，经济物质条件，更为缺乏。我虽然感到失望，但在战时，只好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宗旨，将就的住下去，不欲多所更张，免得多费人力物力。并且借此亦可锻炼一般公务人员简单的生活与刻苦的精神。

方岩成为省治，达四年许之久，中间虽经三十年之一度迁移松阳，但不久仍旧迁回。直至三十一年五月间，才真正离开。有人说："省政府在方岩四年多的时间内，敌机未曾轰炸过，因为那里的风水好，还有胡公大帝的神力来保护，当敌机飞临方岩上空的时候，胡公大帝就大显威灵，腾云驾雾来遮蔽敌人的视线，使它不能投弹。"一般迷信的愚民，说得更为活龙活现。然而胡公大帝并不能抗拒三十一年敌人的窜扰呀！

临时省会再迁至云和 三十一年五月，敌寇大举窜扰浙东，永康就失去了临时省会的地位，省会各机关迁移松阳；敌人陷龙（游）衢（县），再迁至云和，陷丽水，复迁至景宁龙泉庆元一带。九月初，敌人撤退，迁回云和。三十三年八月，敌重陷丽水，虽又有迁地办公之议，但经过几次的播迁，交通工具，极度缺乏，公私行李，损失不赀，搬迁所需的费用却较前激增了。一谈到应变疏迁，公私都觉得非常困难。因此一般人的心理，反而镇定得多。所以当敌陷丽水，继续南犯，迫近碧湖，离云和只有四十公里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镇静的住在云和，照常办公，而不轻易移动。当时我对我的同僚们说："我们应变是进步了。第一次临时省会——方岩，距离敌人大约是一百五十公里，我们都走了。第二次临时省会——云和，距敌人仅八九十公里，我们也移动了。这次距最前线的敌人不过四十公里，我们还没有退走。"

的确，我们弄得无处可退，无法可走，才有这种镇定的修养阿！

云和这个县名，在战前，不仅外省人不大知道，就是本省人，也有很多也不知道的。旧处属是浙江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俗谚有“处州十县九无城”的话，（十县中仅丽水一座府城，青田半个城。）所谓云和县城，只是一个四百数十家住户的村镇，连一座土围墙都没有，更谈不上坚城了。现在成了临时省会，迁居来此的公务员及眷属，要比土著的人口多得好几倍。吃的用的，固成了问题，住更发生极大的困难，城郭附近村落的破祠堂烂庙宇，就是省会机关办公的地方，人民的厥房毛房，也都修成职员的住所，当三十一年敌人压迫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敌人大肆宣传，说我们在山里吃草根树皮，不久就都要饿死了。可是我们在这里已好好的活过了三个整年。

在这穷僻的山城里，有些人当百无聊赖的时候，曾捏造一些故事来增加它的颜色。有人说：岳武穆《满江红》一词中“八千里路云和月”句，即指云和的月光，由于这种附会的说法，有些做诗填词的人，便借此来发抒他的情感。

云和作了临时省会，虽然增加当地人民许多的负担，或带给他们许多的苦难，但同时也助长它很多的进步。政府在这里建筑了一个水力电厂，使这十几方里以内黑暗的农村，放了光明，开办了几所设备相当完备的学校与医院，使附近的儿童与人民，获得较为丰富的知识，与减少疾病死亡的痛苦，无形中把这里的文化程度，至少提高几十年，我们还在这里建筑了一座民族复兴馆，作为将来回杭以后的永久纪念。

廿　八年来浙江军事

浙境战局演变及宁绍的沦陷　敌人自占领杭、嘉、湖以后，其前线，西边仅进到富阳、余杭、武康、吴兴、长兴一带，南边则未逾钱江一步，大有隔江而守不复向西向南前进的姿态。其实敌军对于杭州的占领，仅是完成京、沪、杭三角地区的第一期军事计划，而第二个目的，则为沿扬子江直上，进攻我当时全国的心脏——武汉。所以杭州占领之后，对于浙赣铁路方面以及浙南方面，就变成静止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延长到二十九年的春天才被打破。中间虽也曾有过好几次小规模的战斗行动，但对于整个局势，并没有多大影响。

迨二十七年冬，武汉沦于敌手，军事的重心仍在长江上游。东南战区，在整个战局上，仍是处于次要的地位，所以浙江的偏安局面，更显得安定起来。当时驻省国军，大都纷纷他调，留在浙江境内的少数部队，仅够担任前哨的防务，我们的兵力自然不免单薄了。二十九年的初春，敌人乘着漫天大雪。我军警戒疏忽的时候，偷渡钱塘江南岸，占领萧山附近的桥头堡阵地。并继续前进，停止于临浦、义桥之线，作为他日后进展的基点。

三十年四月，我率领军政干部巡视前线，八日到达绍兴，闾阎安谧、市况如常。不料当我离绍的第三日——四月十三日敌军骤然蠢动，先攻占绍兴，继复沿浙赣铁路，西进陷诸暨，其先头部队，进达义乌县的苏溪镇，旋为我国军击退。但绍兴从此沦陷了！

敌军于占领绍兴后，复进军窜扰宁波。奉化、慈溪、余姚、

上虞等县，相继沦陷。我军乃退至四明山脉、会稽山脉一带，与敌对峙。另一部敌军，则由海门登陆，陷黄岩、临海，我守备指挥官蒋志英阵亡殉国，不久敌军又退走。

此次敌军由多方面扰窜，影响颇大，金华、永嘉等地，皆受波动，省府曾一度撤退至松阳。后以局势稍定，仍迁回方岩。

德苏战争及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的抗战，是要等到引导世界战争爆发了，才可得到良好的结果。蒋先生于抗战开始时，就这样明白的向我们指示。可是欧洲大战虽于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九月爆发，而那时的同盟国——英、法、波、荷、比——都是节节的失败，法国的贝当政府并在康边森林签订类似无条件投降的停战协定，德国横扫西欧大陆，固然不可一世，而我们的敌人，亦趾高气扬的大步向中国进攻，三十年六月，中央召开财政会议，我也到重庆去参加，六月二十二日，德苏的战争又爆发了，而且德军的进攻，非常顺利，在十几天的工夫，由明斯克而摩棱斯克，沿着拿破仑的旧路，向莫斯科进攻。好些朋友问我："苏联为什么这样懦弱，现在德军距莫斯科仅三百多公里，岂不是快要完了么？"我说："不，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苏联有比中国面积更大的土地，蕴藏更多的物质，组织严密的共产党，我想他一定能支持下去，而获得最后的胜利。"我虽如此说法，而实际情形，却一天坏一天，直到德军迫近莫斯科，才把他堵住。

三十年十二月七日，我接到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是日军解除了英美在上海的武装，接收了英美的租界。次日，又知道日军袭击珍珠港、香港、小吕宋等地方，英美立刻向日本宣战了。那时正在赴渝途中，沿途所听到的，都是这等兴奋的消息。好多人以为美国一参加了对日的战争，在一年至多二年内日本就要屈膝了，而我的看法，却不是这样。在桂林有一次座谈会里，有人要我对于战争的久暂，作一个观察。我说："还要五年"。我有一位老朋友听了我的话，非常失望似的说道："你的观察，如果正

确的话、那我就要死了！”我很惊讶地问他：“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他说：“这四年多来的痛苦，我已经受不了啦，如果加上五年，岂不是要死了么？”我笑道：“你死不死另是一问题，战争的时间一定要这样长久，才得结束呵！”现在我回想起当时的观察，却还不大错误。

盟机初炸敌京我军民救护降落人员 三十一年四月十八日，我正巡视到临海，是日傍晚暮色苍茫的时候，忽然听到空袭警报声，这是过去所未有的。同时接获报告，临海三门沿海各地，以及衢县浙西方面都有飞机在盲目乱飞。我当时心里想，这不像向我们空袭轰炸的样子，一定是敌机因为那日天气非常恶劣，受不了狂风暴雨的袭击，而迷失了方向，觅不到降落的场所。如果它在我们境内强迫降落，我们定可活捉几个他们的空军，稍泄这几年来遭受无情袭击所感遇的种种苦痛和怨气。决然断定不是我们的空军，更不料会有同盟美国的空军，能飞到中国的天空上来！我离开了临海，转赴温岭，才接到报告，那天晚上的飞机，是由太平洋方面起飞的美国飞机，作历史上第一次轰炸东京的壮举。原来预定炸完之后，就飞往中国，在浙省的衢县机场降落的。只因气候恶劣，天又黑了，无法找到机场，乃不得不牺牲飞机，而跳伞下来。后来又陆续接到报告，在三门、江门、遂安、天目山等处，都找到了跳下来的盟友。总计在浙境降落的，有五十余人之多，除了少数受伤之外，其余盟友都安全无恙，经我们护送到后方。这班飞翔太平洋上空英雄的领导者，就是后来驰名欧洲的美国第八航空队的杜立特将军。

当他们降落的时候，不知道那个地方，是日人的占领区，还是中国的自由区，所以他们不能不作自卫的戒备。而在降落地区附近的人民，或地方团队，也以为这些跳降落伞下来的飞行员，一定是日人，而想将他们生擒活捉起来，便用武力去搜索。因为我们军民的脑中，做梦也不会想到这时候就有美国的飞机，在我们的天空上降落的呀！等到见了面，是一班黄头发、高鼻子、蓝

眼睛的人。如果是我见到，自然很容易判别这不是日人，但在当地的人民和团队，却不容易分别是日军或是中国军。有的逃到深山里去躲避了，有的握着手枪准备抵抗。彼此言语不通，用了种种的手势表示，才知道他们是美国的空军。在三门县的南田岛上降落那一批，距离敌人的据点很近，我们的团队很迅速的把他们救护出来，脱离了危险界数小时之后，敌人的搜索队就到来了，但是已不见美国飞行员，所得到的仅是美机的残骸。他们虽然到了我们安全地界——临海，但是对于此行任务及经过详情，仍保守秘密。阮厅长毅成那时正在临海，除了招待他们之外，并用种种方法，询问他们，想知道轰炸东京的详细情况。（直到美国政府公布，我们才明白详细的情形。）但是他们只说从太平洋起飞轰炸东京，预定飞到衢州机场降落，不料一进中国沿海，就遇到恶劣的气候。而且天又黑了，方向迷失，找不着机场降落，以至受到这不幸的挫折。并时时向我们打听降落其他同伴的消息，尤其是杜立特的消息。他们这一行人，没有一个到过中国，他们初次吃到中国饭，还穿上了中国士兵的棉袄，不但在他们感觉得是有趣的事，我看了那个怪模怪样的照片，也觉得可笑，后来我在美国杂志上看到他们将这次轰炸东京及遇险脱险的经过，作成电影片子。其中有一幕是在临海恩泽医院治疗的情形，有个著长袍马褂留长须戴眼镜的中国医生，一望就知道是恩泽医院的陈院长，此外还有几个中国的女护士。

杜立特将军那时还是一个中校，他是在天目山方面降落的。在临海方面降落的人，首先就问起杜立特中校的下落，便引起我们对他的注意。竟料不到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出色的空中英雄呢！他辞别天目山的时候，将他的航空衣服及降落伞赠给浙西行署的贺主任，作为纪念。到了美国，还有信来道谢地方招待的盛意。他们作了这一次伟大而冒险的壮举，回国后，各人都晋升了两级，杜立特由中校一跃而为少将，作了第八航空队的司令。现在又晋升二级上将了。这样迅速的升迁，自然由于杜立特将军的

超人功绩所致，而不是侥幸得来的。我对于美国政府按件计功的奖赏，觉得非常有意义。他们在这次大战中，从草莽里杀出许多英雄好汉来，这正可算是哥伦布冒险开荒的传统精神呵！

他们受到我各地政府与人民竭力的救护和热烈的欢迎，这不但在他们是一个历史上的重要记录，即在我们浙江，亦是美国空军最先到达的地方。我们几年来费了很多的心血与力量，总是希望我国或盟国有飞机到敌国去轰炸东京，使日本人民也尝尝炸弹的滋味，现在是开始见到了！虽然他们受到不幸的挫折，不能接连的作第二次第三次轰炸，然而已经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兴奋。不过，同时亦带给我们浙江人民更大的痛苦！

金华寓居遭炸灾及全村 我继续在沿海一带巡视，由温岭而乐清、永嘉、瑞安、平阳，再由青田、丽水回到永康。这时，我们在金华正筹备一个全省工商展览会，准定于五月十五日正式开幕。而前方的情况，却一日紧似一日。并且知道敌人所用的兵力和行动的规模，要比往前增大。到了五月十五日上午九时，空袭警报又发出来了。据报有飞机九架，由桐庐向金华飞来。我家小虽然避开了去，我却依然留在罗店的寓所，我也料到这次敌机轰炸的目标，或者是罗店，因为我住在那里，而且还有许多的军政机关，散在这一个村庄中。我听到机声，跑出屋外，敌机已飞临我的头顶。本来寓所的前面，相距二三百米突的地方，连接的做好了几个防空坑，当时情势紧急，我只在头一个坑里伏着，静候炸弹的来临。幸而他的航线不很正确，飞到这儿尚未投弹，而向前飞去。但瞧到他飞过了金华城的上空，仍不投弹，又向罗店飞来，我就断定轰炸的目标是在罗店了。同时觉得我避伏的地方，太过危险，马上由第一坑跃进第二坑，更由第二坑跨至第三坑。立足初定，炸弹的声音，已如轰雷般震惊了耳鼓！事后检查，这次敌机所投的弹，大都落在罗店镇上，也有几颗落在我住的房子里，还震死了两个猪。不久，第二批敌机又飞来了，更疯狂似的滥炸罗店附近的村庄。我的秘书潘季东之妻，就在这一批

的轰炸里，丧失了生命。一个小小的村镇，受到两度轰炸，数百栋房舍，几已全毁，人民死伤达一百余人，亦可谓惨绝人寰的灾难了。

浙赣战役的前因后果 全省工商展览会在当天的黄昏时即开幕，许多远地到来参加的人，已是心神不定，草草地举行了一个开幕仪式。这一个开幕典礼，也就是一个闭幕典礼。因为当时风声鹤唳，各个人都有其他应即处理的事务，想不到我们化费了数十万元，筹备几个月的展览会，就这样的结束了！我的家小，因为房屋已炸毁了，就在那晚上离开了罗店，我仍留在那座破屋里，做我应做的事。十七日，我始得到军方的通告，说是我军改变了预定在金华决战的计划。我于是召集当地的中央地方机关人员，关照他们赶快的疏散。永康、方岩方面，亦作同样的处置。我于二十日下午离开金华的时候，看见那些要疏散的人民彷徨踌躇，显露一副焦灼仓皇的神情。他们要车没有车，要船没有船，而那些货物检查的机关，对于疏散的货物，还在那里留难。一个四年来繁荣起来的金华，也可以说是浙东的精华，就在这种情形之下葬送了。说起来，真是万分痛心！

我到了永康，见到几位银行经理金润泉、张忍甫等，正在那里着急。这时嵊县方面的敌人，已到了东阳县属的魏山。我问他们："为什么还不走？公路就要在二十一日晚上破坏了。"他们说："汽车到丽水要检查，回空的车又不许通过。"（因为以前有规定，要利用回空车装载人货，不许空车行驶。）我听了这种话，心里想："这些检查人员即使没有恶意，也就太不近情理了。紧急时候的疏散，那里还要照平时的手续来检查？那时只有出去的东西，哪会再有回来的东西呢？"我于是打了一个电话给驻丽水的雷团长霆，叫他带兵一排到检查站去，制止他们检查与留难。这件事曾引起很大的误会。论理，我这种权宜处理，好似有些越出职权范围之外，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在平时，我同刘总司令的车子经过，他们也装做不认识而要照例检查，我们为尊

重国家法令，表现我们守法精神，也和平常来往的人一般，由他们那样做去。但是在这紧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有这一种权宜处置。因为我负有全省安全的责任，万一这些银行受到了损失，不但经济上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而且要受到中央很大的责备。因为在那个撤退的时候，是要银行第一呀！

敌军各路迫近金华了，我奉最高当局的电令，要我固守缙云通丽水的道路，并要我负责将那段艰难险要的公路彻底破坏。我那时不负军队指挥的责任，手无一兵，我只好自己驻在缙云，一个防空监视哨所，就是我的临时司令部，用电话调集保安第一、第三两团到来。并调傅扬诚、杨长鑫几个人前来计划防务与破坏的工作。等到李总司令云波到丽水，由前方退回的黄师长权到达缙云，我才把这个临时差事卸下。但是那条路的破坏，就很费力了。经派一营工兵，用上三千多公斤的黄色炸药，还不能破得很彻底。因为这段路沿亘于括苍山脉，巉岩险壁，开凿通行，在修筑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工程，破坏的时候，当然也就是最困难一种工作了！

我转退到松阳——预定的临时省会地点，这时，省级各机关人员亦都陆续到达了，而敌人也已攻陷金华，逐步向衢县移动，我看形势不对，如果敌人到了龙游、衢县，松阳定必感受威胁，不得安枕。于是我与省党部吴主任委员挹峰面商，又决定即时撤退到云和。不料敌人的进展，同我们的撤退一样的快，当我们很狼狈的到达云和的时候，敌人也就顺利的占领衢县，并且越过浙江的境内，由江山，常山窥窜上饶，与南昌方面东进的敌军会师。这条残余的浙赣铁路，从此就算是“寿终正寝”！

此次敌军在浙江方面，共分三路进兵：第一路由余杭，临安下新登、分水，趋桐庐、建德，转寿昌。第二路沿浙赣铁路正面，经诸暨、义乌、趋金华、兰溪。第三路由奉化、新昌、上虞经嵊县、东阳、武义趋汤溪，然后会攻衢县，以占领衢县飞机场为初步的目标。也可以说：这次敌人兴师十万，分途的进攻，是

为了报复东京的被炸。敌人为了要掩饰他的颜面，同时为防止以后美机再利用浙江境内的机场，而发动了这个大攻势。由于美机之轰炸东京，打破了东南四年以来的沉静局面，虽然给予我们以莫大的兴奋，同时也加给我们以更大的痛苦与更大的损失。这就是卅一年五月浙赣路战役的前因后果。

敌军自浙赣路会师之后，乃折而向浙南进攻。以一部由江山、广丰攻仙霞岭，希图下浦城，为我国军奋勇击退。另一部由衢县、龙游，下遂昌、松阳，并向龙泉方面之白岩与云和之汤侯门进攻，皆为我军所阻。再一路，则由武义经乌门，陷丽水，复分兵一部向碧湖、大港头进攻，一部则沿瓯江下青田，陷永嘉，与由海面登陆之敌会合。当敌军分路向云和、龙泉进攻的时候，我恐怕云和龙泉亦难立足，乃将省会各机关向景宁、泰顺、庆元等地撤退，而我却留驻龙泉。这时，敌人离龙泉仅八十多里了，各机关人员除必要留至最后才走的几个人之外，龙泉的街道上，仅能看见零零落落由前方退下来三五成群的军队或难民，在那家家闭户的街头巷口，叩门觅食。那种情形，实在凄惨得可怕！加以敌机整日空袭，竟在市区投下许多燃烧弹，城里起了好几个火头。我同崔县长履堃督率军警，施以扑救，因为当时住户已逃走一空，及扑灭时，全部精华地区，已化为灰烬了！我在安清山的古庙里，守着一架电话机，静听各方面最后的消息，长日寂寞，百感交集，想起数年来残余的局面，亦曾尽力支撑，现在一切都快完了，不禁凄然！曾填《临江仙》一词志慨。盖恐龙泉不日亦须别去也。词云：

半壁残余今已矣，五年枉费心肠。宏图宿愿未能偿。个中疑有数，成败待思量。　勋业自来多鬼妒，几番遭遇堪伤。湖山暗淡减容光。实惭勾践地，无语别凄怆。

省党部陈委员贻荪，由方岩退出颇迟，在武义为敌军俘虏，带至龙游附近，才脱险逃出。辗转奔波，历尽艰难困苦，到达龙泉。特来安清山古庙看我，在当时那种情况之下，我不知用什么

话来安慰他才是，就将那首词给他看，他亦黯然！他将被俘时所作的诗，递给我看。两人相对感慨之余，就悄然分别，他即转往庆元去了！

由金华撤退的人中，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商会会长程世榕，他不但在未撤退前，参加各种抗战工作，可以说出了钱，又出了力。临撤退时，将自己很大的财产牺牲了，而把他所主持的救济院几十个儿童，公医院几十箱药品抢救出来，因为他认定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药品是目前抗战的要品，宁愿损失自己私人财产，而保留这班儿童和许多药品。他到龙泉来见我，我向他安慰，他还是很坦然的，并不觉得有什么难过。他已是七十的高龄了！现在仍旧带着儿童教养院数百儿童，终日在一起。他的年纪虽然大了，我觉得他的精神，还是和他带的几百个孩子，一样的勇敢活泼，富有朝气！

还有留在沦陷区里面，始终不肯退出，始终不肯屈服，而能特别表现民族气节者，如新昌张暄初（载阳）先生。他是浙江的军政前辈，自从退隐之后，一向都住在家里，与现实政治不发生什么关系。当新昌快要沦陷的时候，新昌县长请他一同撤退，他拒绝了，仍旧住在家里。不久，新昌沦陷，敌人就去找他，想利用他作个傀儡。因为伪组织的傀儡，多半是以前失意军人政客，或者与现政府不发生关系的人。敌人以同样可鄙的眼光来看张先生，不料张先生以天地正气，把他驱了出去。他对敌人说："我做过中华民国的浙江省长，我这样大年纪，难道还受你们的玩弄么？你们有的是刀枪，尽可以杀我，我的性命可以不要，名节却要保存的。"敌人受了他的教训，不但不敢加害于他，反而对他肃然起敬。新昌沦陷了三年多，他的正气，还是屹立在那里支持着。

敌寇暴行一斑　八月中旬以后，江山、衢县的敌人已撤回金华，松阳的敌人也由宣平退回武义，永嘉的敌人，一部由海上撤退，一部由陆路撤回丽水，随又同丽水之敌，撤回武义、金

华。这次战役经过时间，约一百天左右，然受灾区域之大，地方损失之重，真当得空前二字。兹摘录松阳县长徐雄飞所作“卅一年日寇烧杀松阳记实”文一段，以见倭寇暴行之一斑：

八月二日下午五点钟光景，松阳城沦陷了！——为由龙游及丽水两方面窜来的敌人所占领，敌寇占有了这座山城，给养困难，于是普遍的深入农村，这时全县有四十二个乡镇，敌人竟窜到了二十九个乡镇。

八月廿八日那天，得悉敌人开始经由宣平回窜金华，廿九日拂晓，敌人掩护撤退的队伍，也越过了柴头岭（松宣交界处），政府员警便在那天深夜回到城里。当我们踏进距城十里许地方，显然感到景象凄惨，臭气逼人，原来敌人在盘踞二十八天之内，竭尽烧杀破坏之能事。我们一进城，更觉腥臭难闻，走几步便会踏着尸体，有的已腐臭不堪，有的是鲜血淋漓，至于残缺不全的牛尸、猪尸、羊尸，便是狼藉满地。敌人把它们肥美的鲜肉割去吃了，剩下来的头、脚、皮、骨、便到处弃置，有几株老树上，排列的悬挂着三四个妇女的尸体；有几处水源澄清的水里，倒塞着七八个老弱的尸体，这显然不是自尽而是敌兵弄着玩的。最残酷的，要算是几处集体屠杀场：如南街电灯厂的水池，整个的为敌人杀戮的尸体所填满了！据后来掩埋的人报告，共有一百四十多具，东门的朱山头，溪南的寺岭下等地方，均各有五十多具的尸，堆积在一起。这些地方，敌人都用粉笔标明“死刑场”的字样。这许多尸体，都是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而且大都是些老弱妇女，其中还夹着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们遭此不幸，不知在敌寇的国际法上犯了什么罪？从南门到北门长有里半的大街，两旁店铺，只留了残余的躯壳，所有门窗板壁、一堆堆排列在街道中心。电杆柱子、一根根都被锯断了，倒卧在屋檐底下，这似乎是临时的障碍物。住户十室九空，板壁被拆了去，泥壁上都穿了大洞，饭锅水缸，全被敲得粉碎，桌椅板凳，四

脚截去了半段，都成了废物。端庄的桌面，凿了几个大孔，敌人似乎在表演他破坏的技巧。孔庙和城隍庙均被作为马房，粪便堆积盈尺，污秽得可怕。学校和机关的图书仪器，悉被损毁。尤其是浙江农业改进所的东西，事前移藏乡下，终被敌人搜索到了，除破坏一部分外，多数是被抢劫了去。有几家私人珍藏的善本图书，或撕去几页，或烧去几本，总使残缺不全，以尽其破坏的能事。城内自县政府起，南至太平坊，西至北街，两旁市房，尽付一炬。其为公共建筑如县政府、警察局、司法处、县立中学、农民银行、英士大学农学院等，均全部烧去。他如农业改进所、地方银行、县训练所等，或烧去一部，或将内部捣毁，空存躯壳。县西二十里之古市镇，为昔松州府治，平日市集繁荣，全镇房屋，被炸毁焚毁达三分之二。乡间如洋坑埠、石仓源、港口、源口等处，村舍被焚，几无幸存。"流寇所至，牲畜不留，庐舍为墟，妇女淫辱，老弱惨死，财物被劫，壮丁被俘"，这是敌寇蹂躏松阳以后，所给予我们一个永不磨灭的惨痛印象！这一次空前未有的浩劫，计死亡人数，有家属可查的得一千五百七十一人。被俘壮丁，据各乡镇报告，合计为一千九百五十四名，此外尚有许多外籍被俘壮丁无从调查的。其因避难山林，受毒菌或寒气侵入而病死的，不下二千人。烧毁房屋，除公共建筑外，民房有一千四百四十六所，至于公共财物的损失，可以汇成百页以上的帐册，数字不可胜计，这要留待将来向日寇清算的。

这仅仅是松阳县一个惨酷的镜头，我随后出巡收复各县，情形也相差不多。我在那个期间，由于内心的痛苦，因而填了好些词，词意都是以这次敌人大流窜的惨痛为背景的。在丽水城填了一阕《念奴娇》，词云：

乍闻敌退，知多少人家，悲欢泪滴！道路相逢，争见告劫后家园消息。瓦砾千堆，颓垣半堵，尸骨纵横掷。炊烟

灶绝，蔓草满街黄碧。　　回首四月光阴，年般过了，痛余生锋镝。若个几人今健在，若个几人息寂。暮色凄凉，城郭极目，夜火青磷色。孤星点点，露冷秋色唧唧。

自三十一年秋至三十二年秋，战局复归平靖。三十二年九月间，我巡视浙西，在天目山行署召开行政会议，天目山屹立浙西，数年来好似支撑军事政治的柱石。我已三年不到了，长途垢暑，一入山中，便凉雨相迎，至为愉快！词意油然而起。因填《贺新凉》一词，以赠贺主任培心诸子，虽为写景之作，仍寓慰勉之意。词云：

一别三年矣。想山中，几般物换，几般依似。触目颓垣禅寺烬，院废草离离地，更不复，梵音佛谛。岭上千松行列壮，似生成，执戟资多士。七载里，长城倚。　　远行常觉初行易。最艰辛，百程未尽，半程十里。在望云山今不远，再过一山便是。喜重认，旧游山水题记。日日尘劳今且息，谢来迎阵深秋雨，消郁暑，新凉洗。

但一时情势又稍紧张起来，敌人发动流窜，攻占安吉，进迫孝丰，旋又告平安。惟安吉之敌，仍久据不退，三十三年五月间，粤汉、湘桂方面，战争相继爆发，浙境敌人，发动响应。六月间，武义之敌，向宣平佯攻，被我军击退。乃转向汤溪、龙游以南地区挺进，会合金、兰正面之敌，进陷龙游、衢县。旋被我军击败，仍退回金华、兰溪。复由武义、永康进陷丽水，再下青田，陷永康、乐清。其后丽水之敌，虽已退走，但永嘉、乐清则久占未退，到今年（卅四年）六月，始会合由福州经霞浦、寿宁、平阳撤退下来的敌人，向台州方面退去。这股敌人窜抵临海后，又分两路溃退：一路经三门抵宁海，与奉化窜来之敌会合，有久据宁海态势。一路经天台、抵新昌，与嵊县之敌会合。新昌之敌，曾于今年五月一度克复，至此又告沦陷。总计抗战八年来，浙省被敌占领相当时日或现在尚盘踞中的县市，有杭州市、杭县、海宁、海盐、平湖、嘉善、嘉兴、桐乡、崇德、吴

兴、德清、武康、长兴、安吉、馀杭、富阳、萧山、绍兴、上虞、余姚、慈溪、鄞县、镇海、定海、奉化、新昌、嵊县、诸暨、象山、东阳、义乌、金华、兰溪、浦江、武义、永嘉、乐清、宁海等三十七县一市，县境被敌一次或数次窜扰者，有孝丰、临安、分水、於潜、新登、桐庐、建德、寿昌、汤溪、龙游、衢县、江山、常山、开化、淳安、永康、缙云、丽水、青田、松阳、遂昌、宣平、瑞安、平阳、玉环、临海、温岭、三门、黄岩、天台等三十县，县境完全未被敌窜扰者仅昌化、遂安、仙居、泰顺、龙泉、庆元、云和、景宁等九县，兹将各县沦陷及克复日期，列表附志如次：

浙江省各县沦陷及克复日期一览表

县名	沦陷日期				克复日期				备考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杭县	26.12.24.								
余杭	26.12.23.								卅年二月六日克复后，又沦陷，卅二年十月六日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新登	29.10.10.	31.5.17.			29.10.12.	31.7.20.			
临安	26.12.30.	29.10.8.	31.5.21.		26.12.31.	29.10.11	32.7.24.		

续上表

安吉	26.12.21.	27.2.21.	27.3.19.	32.10.7	26.12.24.	27.2.24.	27.3.25.		
孝丰	27.12.23.	32.10.2.			27.12.24.	32.11.2.			廿九年十月曾一度沦陷，即克复。
长兴	26.11.25.								
吴兴	26.11.24.								
德清	26.12.22.	34.4.4.			32.8.4.				
武康	26.12.21.				32.8.27.				
绍兴	29.10.26.	30.4.							
萧山	30.1.22.								
诸暨	31.5.16.								
余姚	30.4.25.								
嵊县	31.5.16.	31.7.14.			31.5.26.				
上虞	30.4.				32.7.6.				

新昌	31.7.14.	34.7.2.			34.5.10.				
东阳	31.5.20.	31.6.30.	31.9.4.		31.6.5.	31.7.12.			
义乌	31.5.20.								
金华	31.5.29.								
兰溪	31.5.28.								
永康	31.5.21.	31.5.29.	31.6.28.	33.9.18.	31.5.25.	31.6.10.	31.9.1.	33.4.21.	卅四年五月十六日敌全部退出永康境
宜平	31.8.29.				31.8.30.				
汤溪	31.5.26.	33.6.10.			31.8.30.	33.6.30.			
武义	31.5.23.	31.6.18.	31.7.4.		31.5.27.	31.6.26.	31.5.16.		
衢县	31.6.6.	33.6.26.			31.8.28.	33.6.29.			
江山	31.6.10.				31.8.23.				
常山	31.6.9.	31.7.12.			31.6.12.	31.8.22.			

续上表

龙游	31.5.27.	33.6.12.			31.8.29.	33.7.1.			
鄞县	30.4.19.								
慈溪	30.4.22.								
定海	28.6.23.								
镇海	29.7.17.	30.4.19.			29.7.21.				
奉化	31.4.23.								
象山	31.3.11.								
宁海	34.6.29.								
天台	34.6.29.	34.7.3.			34.7.1.	34.7.5.			
临海	34.6.25.				34.6.29.				
黄岩	34.6.22.				34.6.26.				
三门	34.7.4.				34.7.5.				

永嘉	30.4.19.	31.7.11.	33.9.9.		30.5.4.	31.8.15.	34.6.18.		
平阳	34.5.27.				34.6.10.				
瑞安	31.7.13.	34.1.21.	34.5.26.		31.7.17.	34.1.23.	34.6.12.		
乐清	33.9.10.				34.6.23.				
玉环	31.5.30.	34.5.1.			31.5.31.	34.5.13.			三十四年四月二十日敌一度窜据县城，当日退去
丽水	31.6.24.	33.8.26.			31.8.28.	33.9.16.			
遂昌	31.8.1.	33.8.15.			31.8.3.	33.8.19.			
青田	31.7.9.	31.7.27.	31.8.5.	31.8.18.	31.7.13.	31.7.30.	31.8.13.	31.8.19.	
缙云	33.9.21.				33.9.22.				
松阳	31.8.2.				31.8.28.				
嘉兴	26.11.29.								
嘉善	26.11.11.								

海盐	26.12.20.	27.8.26	28.2.26.		27.3.30.	27.9.30.			廿八年三月九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海宁	27.11.8.								廿七年三月卅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平湖	26.11.18.								廿七年七月廿五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崇德	26.12.21.								廿七年九月十九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桐乡	26.11.21.								廿八年一月七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富阳	26.12.24.								廿八年三月廿三日曾一度克复，继又沦陷。
桐庐	31.5.18.				31.7.16.				
建德	31.5.22.				31.7.19.				
寿昌	31.5.28.	31.7.21.			31.6.1.	31.7.24.			
浦江	31.5.21.	31.8.27.			31.5.27.	34.7.5.			

附注：（一）本表所指沦陷及克复，以县城为准。

（二）时间截止三十四年七月底止。

还有敌机空袭浙境，计一千一百五十六次，投弹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三枚，好些城市几乎都夷为平地！政府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大数目，也就无法估计了！

三十二年三月杪，日机大炸丽水，自早晨到黄昏，连续轰炸了五次。我在云和，听到这个消息，不知被炸的损害如何重大，心中颇为焦急！当晚偕同方处长青儒乘车到丽水去视察，并带一些款项去急赈。到达时已是深夜了，十多里外就见到烛天的火光。到了城里，即赴火场巡视。余专员森文、朱县长毅生、正督同团警在那里抢救，大火仍燃烧着，火舌由窗门壁缝里不断的伸出来，全城只有见燃烧的火光，而不见住户的灯光。燃烧的爆炸声与围墙的倒塌声，相间而作，更显得恐怖！抗战以来，丽水城不断的遭受敌机的轰炸，城里的精华地区，已被毁损过半，再经这次的大轰炸，真是满目凄凉了！由金华分迁来丽水江南的东南日报社，这次大轰炸中，也被殃及。屹立在前方的文化壁垒，虽然一时受了损害，但很迅速的又恢复起来，他们的工作毅力，是值得称道的！

后来，我在敌人的广播里听到他们要不断轰炸丽水、建瓯（闽境）的原因，是侦知这两处都驻有美国空军，以为美军将利用这两处的机场，作为前进基地来轰炸日本。并且说："这种轰炸并不是对中国人民敌视的意思，而是要把驻在那里的美国空军驱逐出去，使他没有驻足的地方。"其实据我所知，这两个地方，当时都没有美国的飞机及地面工作人员。虽然有英国的军事代表团（由副团长骆克睦领导约数十人）在李默庵总司令部里工作，也并不在丽水，而是驻在离丽水十七八公里的圆头，却未为敌机所发现。日军对于少数的盟军，就这样的恐怖起来，岂不是怪事么？

民国三十二年以前，美国的军事人员在浙江并未设立什么固定的办事机关，但是他们的军事准备工作，却进行得非常积极。卅一年六月间，正当浙赣路军事吃紧的时候，戴雨农（笠）兄同一

个美国的海军中校到温州去工作，这是美海军来浙工作的第一人。此后，就渐渐的多起来了，陆、海、空军各方面的人员都有，但没有统一联系的机关，而是各做各的事，这也许是为保守秘密的原故。卅三年春，美国驻华陆军总部才在浙江的临时省会云和设置救济机关，由凯莱君主持，名义虽为救济上海的美侨，及海空军遇难人员，其实搜集军事情报是重要的任务。此外，在昌化及瑞安的玉壶镇，还有训练中国部队（忠义救国军）特种技术的机构，为以后配合美国军队在浙江沿海登陆之用。这些美国的工作人员中，除了陆海空人员之外，还有很多技术人员，如气象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工程学家、昆虫学家、病理学家，这些都是由国内征调来服务的。由此可见美国动员的彻底，并可表示科学战争的轮廓。他们对于责任范围的工作，就我们看是很小的事，而他们却各尽其最大的努力，这是值得钦佩的！在这交通不便的地方，由高山峻岭而海港岛屿，都有他们的踪迹。有的不带译员，单身行动，也能达成任务。这固然是我们曾于事前招呼过地方注意招待，但也亏他们有这种勇气，打破种种的困难，而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美国人是轻视金钱而重视生命的，我曾同一个海军少校舒美克闲谈，问他对于日本的自杀飞机作何感想？他说："自然，它可以予美国海军很大的伤害，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防御的方法。有效的防御方法，不久即可研究成功，付诸实施。"我又问："美国可否仿照日本自杀飞机的方法，来对付日本的海军呢？"他笑道："如果美国人有这样想法，大家一定当他是个疯子。我们美国有的是飞机，有的是炸弹。一架坏了，可以换两架三架，一次投弹不中，可以再投两次三次，为什么要将有用的人去牺牲！自杀不算是勇敢的行为，而是愚笨的行为。"他这种说法是相当正确的。有一次，一个盟友得了急病，云和没有医疗机关，他们就由福建的建阳，连夜专车派医生来救治，我有一次翻车受伤，他们的主持人马尔将军曾与我有一面之交，知道了这个消息，也专派医生来替我医治。由这些地方，充分表示美国

人对于生命的重视与救护同类的热忱。但是我以为这必须有科学发达物质丰富的条件，方能实践这种良好的道德。

在这次抗战期中，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有英国的军事代表团，有美国的各种工作人员，还有苏联的军事顾问。这三国的民族性，各有不同。英国人是绅士派头而兼有商人的风味（因为英国在东南的军事代表团，除了一二个军人之外，其余都是在中国经商的人征集起来，而临时赋与军事工作的）。美国人则活泼而天真，苏联人则拘束而严谨，也许是因为都是军人，要受到军纪与党纪严格制裁的原故。这三个国家的人，我们不能从某一个角度来批评他们的长短，他们之所以形成此种不同的性格，是基于他们祖国的历史与地理的原故。

我国因为没有大量的驱逐机及高射炮来作积极的防空，所以防空工作仅限于消极方面。防空情报及防护团是消极防空的双环。浙江的防空情报网，在廿五年我第一次主政时就准备好了的。因为那时航空、防空两校，都设在杭州。开战以来，防空情报非常灵活，充分表演出他的功能。在这八年当中，敌机到了我们的上空才发出警报的事情，只遇到一二次。而这班防空工作人员，亦颇能尽职，在最前线工作的人员，非至敌人十分接近，不肯撤退，因而被俘或被炸而殉职者，亦有数人。因防空情报的确实，而予人民生命以很大的保障，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各地的防护团，组织并不健全。全省防空司令虽然由我兼任，但是实际负责的，是张副司令咸宜。我时常称道防空在抗战当中，是有很大的消极贡献，这不仅是单就浙江而言，全国都是如此。

全省各县，除了泰顺、景宁、庆元、磐安四县之外，就没有一县不遭敌机的轰炸。在一个空防薄弱的地方，敌机真是为所欲为，一架或数架很低飞的轰炸，机上日军的面貌，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心中恨恨，无奈他何！但是三十二年之后，情形就不同了。敌机再不敢低飞，原因是美国的飞虎队及十四航空队在中国成立了，虽然它的基地，还远在西南，而它的声威，却已到达东

南。就那敌机轰炸丽水建瓯的情形，可以表示敌人对于美空军恐惧的心理。

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与游击战的展开 我们在“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口号之下，虽然有了国军在阵地上与敌人作正规的战斗，而发动地方的武力在敌后作游击战，以牵制敌人或帮助国军作战，亦是很需要的。当我初到任的时候，上峰就任命我为第三战区的游击总司令。这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军人，平时又喜欢谈谈游击战术的原故。（我曾写了一本游击战的理论与实际的小册子。）但是要以一省的行政首长来总领战区各省的游击工作，那里可以做得到。而且我又没有一个兵，所以这不过是一个虚挂衔头而毫无内容的东西。后来中央颁布了国民抗敌自卫团的组织法，每一沦陷区的省主席，都得兼国民抗敌自卫总司令，以统一指挥全省抗敌自卫的工作。浙江沦陷得最早，所以这个组织也就成立得最早。我兼总司令，宣铁吾兼副总司令，后来又加派俞济时为副总司令，张谓文当参谋长，石楚琛当秘书处长，傅扬诚当参谋处长，杨长鑫当工程处长，孙璸当军法处长，杨义当总务处长，谭计全当政训处长，魏思统当经理处长，这个机关设在金华的成美中学里面，其所隶的部队，则编为八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赵龙文（省会警察队改编），第二支队司令王梦、韩治（由各社训总队改编），第三支队司令黄权（由带来之卫士营扩编），第四支队司令徐图远（新编），第五支队司令郑器光（绍兴地方部队改编），第六支队司令徐志余（余姚地方部队改编），第七支队司令朱炳熙（内河水警改编），第八支队司令胡云飞（广西部队改编）。此外尚有各区自卫总队，第一区自卫总队长蒙志，第二区自卫总队长邱玉林，第三区自卫总队长徐志余，第四区自卫总队长罗杰，第五区自卫总队长王云沛，第六区自卫总队长尹锡和（后由六区保安副司令张感尘兼），第七区自卫总队长魏思统，第八区自卫总队长钟炎兴，第九区自卫总队长杜克良。各区的自卫总队，皆由原来区有之武力改编，在县则为县自卫队。各

县按地方需要及可能，编成的自卫队，自两大队、一大队、至两中队、一中队不等。到了三十年，自卫支队与区自卫总队共约十六七个团，再加原有四个保安团，省属的武力，共为二十一个团，县自卫武力，亦有二万余人。这省直属保安团及自卫团，除一部份担任地方治安之外、其余皆配合国军，担任国防工作，而第五支队郑器光首先渡过钱塘江，进入杭嘉湖，展开敌后之斗争。随后过江杀敌者，有六支队徐志余、三支队黄权等部队。我们第一个目的，是在建立及掩护沦陷区的政权，以维系沦陷区的民心，免致都作顺民，为敌所利用。第二个目的就是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消耗他的兵力，使他不能以全力向我们内地进攻。游击战在国际斗争中的价值怎样，还未得到正确的估计，但至少可以说，它可增加敌人后方许多的顾虑，而予正规军以一个有力的帮助。它可使作战的时间延长，而等待国际机会的转变。它可使作战的空间扩大，而消耗敌人的兵力。我们抗战的八年当中，敌人因占领地区愈广，使用的兵力愈多，综计他在中国全部的兵力使用到三十几个师团以上，而用在最前线的不足半数，其余大都用在控制游击区内。假使敌人自开战到现在，对游击区毫无顾虑，而将卅几个师团完全集中在一点或一线上，向我们攻击、战争的局面应该是如何的变化？战争的时间能不能支持到八年之久？自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即就浙江一省而论：当杭嘉湖沦陷之初，我们的军队后撤了，我们各部的政权也随着瓦解了！自从我政府人员同自卫团队重新进入陷区，始把政权重新建立起来，敌人就不能在占领的地方，建立许多的据点。数年以来，敌人每年都作一次或两次以上的“扫荡”，企图摧毁我们的政权，并肃清我游击部队，以祛其后顾之忧。同时可以一往无前的将全部军力，移到前线去进攻，但这结果都未能达到目的，反而增加了他自已的负担与消耗，我们虽或一时受了挫折与损失，但旋即很快的恢复起来。所以浙西陷区的政权一直维持到现在，重要政令仍能照常的推行。甚至在敌人的据点里，我们仍旧能够募债与收税。我们本着

以往的经验与教训，现在陷区的县政工作人员，对敌斗争与应变，很能从容不迫，肆应裕如。固然，沦陷区内的老百姓因为游击队对敌作战，不免要受到无限的痛苦，但这不是游击队本身的价值问题，而是我们在这种形势之下，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会发生的。第一是散兵游勇的滋扰。每一个战役失败之后，一定有很多不能归队的官兵与散失的武器，他们以游击的名义聚合起来，成为一个力量。有时也打打敌人，但大半都是纪律不佳足以骚扰百姓的。第二是土豪和土匪的猖獗。这班人平日惯行鱼肉人民，劫财越货，到了军队和政府撤退的时候，就更要肆无忌惮，假借游击名义，来发挥他们劫掠的技俩。第三是游击部队的收编与本质。游击部队如以正规国军或正规自卫团队改编，因其本质的健全，自不会发生上述的不良现象。无如好些游击队，都是就当地的散兵游勇土豪土匪收编而成的，遂至他们得以游击的名义，做出种种不法的勾当来。而且在沦陷区那种变乱恶劣的环境之中，即使平日纪律很好的国军或团队，时间一久，本质也会变坏，何况本来不是正式的队伍。所以弄到后来，游击队的名义，就变成万恶渊薮，游击队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然而游击战术本身价值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

一省的区域里面增加了这许多队伍，自然要增加财政上的负担，地方人士不免有所批评。也有些人以为一省里面不应拥有这许多武力，甚或至于怀疑到会造成私人的武力。当二十九年春天，钱江战役发生，萧山失守，因防守钱江南岸的都是本省自卫团队，这些闲话越传越多起来；都以为这是自卫团队应负的责任，也就是说这是我个人应负的责任。于是我受到各方的责难。并且在省临时参议会里受到公开的质问。我对于这个责任问题，虽然不能完全推诿，但亦不能完全担负。因为地方团队只能担负一些军事补助的任务，一切指挥计划，都是军事长官直接负责。我只是一个团队的建立者，而不是军事的指挥者。如果说我建立的团队，一定要守必固，攻必克，否则，这个失败的责任，就要

我完全负起来，则对我的责难，就未免过分了。在整个战争中，各方面的失败责任，又应该如何去评定呢？我感到这个责任太重，问题也太复杂了，于是呈请中央派员协助我整理。结果改编为四个纵队，以黄权、萧冀勉、裘时杰、劳冠英任纵队司令。旋又改编为暂九军（辖三个师）及一个独立师，归中央直接负责指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亦于三十年冬撤销，我的责任就解除了。经过的情形就是这样，为功为罪，留待后人去评定吧！

兵器的制造与研究 我扩充了许多自卫团队，那里能得到这许多的武器来试用呢？实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也曾将省县及地方旧有的武器集中起来，不过数量还差得很远。于是我就计划自己设厂制造，将以前在广西由造土枪土药而建立兵工厂的经验重新表演一下。我的计划，不但想单单补充浙江省的团队，而且想补充外省的团队或国军。因为我认为武器制造是抗战期间一个重要的工作，亦是个人对抗战的重大贡献。所以我毫无踌躇，毅然决定便开始进行，当廿六年十二月杭州快要撤退的时候，我就下令要将杭州的工厂机器搬到金华，但以时间及运输的问题，搬出的不到十分之一，这些残缺不全的机器，最初还想不到一定的用途，只是搬出来再说。迨我决定制造兵器之后，就派黄祝民为铁工厂厂长，将这些机器搬到丽水的大港头安顿起来。但是一经检查，可用的机器，仅有二三十部，以之造兵器，还差得很远。黄祝民对于机器制造很有经验，而且随杭州工厂退出的，还有许多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于是全部集合起来，设立一个浙江省铁工厂。为了制造兵器，感到机器的不够，除了向上海（那时上海货物尚可进口）福建及本省各地搜购若干零件之外，自己也仿制了许多工作母机及应用机械，并且继续的向上海、汉口等地搜购铜、铁、五金、焦煤等必需材料，数量相当的多。可是自厂长以至技术员工，对于兵器制造都是毫无经验，只是各有一些普通机械的知识和技能而已。我在一群散兵手里，缴了一支捷克式的

轻机枪和一支比利时式的步枪同一个手榴弹，给他们看看，问他们能否仿造？他们为了抗战的需要与热忱的驱使，当时毫不畏缩的齐声答道：“能”，“能”。于是我就叫他们照样的仿造起来。话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就不是那样容易了。经过三个月时间的试验，才造出一支步枪与一挺轻机关枪，说起来也真可笑！那头一次造出来的东西，不但形式上土头土脑，十分难看，就是实弹射击的结果，机关枪不能继续的连发，步枪瞄准不正确，手榴弹发生过早爆炸或过迟爆炸的危险，离实用的可能，距离相差得很远。所幸这一班人，上自厂长，下至工人，并不因此而灰心，反而增加了他们研究的热心与兴趣。一个工厂好似一个学校，大家都在那里细心的研究，精求改进。他们——厂长以及员工虽然有些机器制造的知能，但对于兵器制造，确是外行。我对于兵器制造，虽然也是外行，但对于兵器的使用和性能，却能了解一些。他们造出来的东西，就根据我粗浅的经验，作为改进的指导。学术研究是没有阶级的，是极民主的。很多的时候，我同厂长技术员工人，大家坐在一起，各人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争执得很厉害，决不因地位的关系而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理由牺牲或缄默。经过了多次辩论的结果，正确的见解是最后决定的权威，而不是阶级高的人就是最后决定的权威。我在这些场合里，也增加了不少的技术和知识，并更了解民主的意义。我觉得民主就是讨论自由的形式，必须经过很自由的讨论，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真理。然而，正确的真理，最初不一定是为大众所了解或注意，或拥护的。必须经过许多辩论解释或实验，才可得到大众的明瞭与折服，然后可能得到他们衷心的拥护。民主固然不能违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决不能因为大多数不正确的意见而掩灭了真理。这不仅在学术上往往如此，即在政治上亦莫不如此。所以真正的民主精神，是在求正确的理论如何，并能使正确的理论为大众所了解。这也是民主政治中最重要的一课。

众志成城 二十七年的七八月里，我们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

之制造，可以算得初步成功了。但是数量是那么少，怎样供应部队的大量补充呢？而且在一个厂房里，要制造许多部门的东西，不但是困难重重，而且很不合理。扩充和分工的计划就随而发生。我们便在小顺（距大港头约二十公里）建造了一个新厂，专造步枪，在石塘（距大港头约十五公里）建一个新厂，专造轻机枪，在玉溪（距大港头二公里）新建一厂，专造手榴弹，枪榴弹筒，及各种爆炸品。大港头厂则专造各种工作母机。这种计划，于二十八年冬就先后完成了。此外还成立一个实验室，专门做研究与实验的工作。自此之后，规模相当完备，生产力量亦就逐日的增加了。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满足，在制造方面，我们仍旧是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良。中间因材料的困难与制造机器的不便，我们想不再仿制捷克式的轻机枪，另外创造一种合于我们的原料与机器式样，（因为我们没有很多大的方钢来作节套，而且因机器的关系，工作困难，想利用铁路钢轨作节套，并适于机器的工作）以省工省料。由黄渭川担任设计，可是试验结果，并不很佳。后来又由胡四兴，彭益楚设计一种，试验的结果很好，就采用了，正式的制造起来。我定名为“七七式轻机枪”。与以前国内外的形式，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后来又有谭世义等设计一种漏斗式的，但未采用。步枪也设计过好几种，均不满意，仍旧仿照比式而略加改良，亦名为“七七式步枪”。手榴弹亦大加改良，使能投远而便于携带。枪榴弹筒，本来是想仿造意大利式或日本式的，后来由我设计一种，试验的结果很好，亦定名为“七七式枪榴弹筒”。此外，我还设计各种地雷的发火器及各种地雷爆炸药等，内中有两种地雷发火器是很理想的，可惜尚未把它大量的应用，发挥其效能。我们这几个厂虽不很大，但是我创造的胆量却是很大的。我们起初虽是仿造人家的东西，但我们并不因此而满足与畏缩，总是就环境的需要与可能，而尽力加以改造与创造。这些创造与改造的东西，虽不能算得尽善尽美，但亦可以在制造兵器上另树一格的了。

工厂的机器不断的怒吼着！员工也不断的工作着！轧轧的声音，震动附近的山谷，小小的村落里满住了工作员工。到卅一年的春天，各厂拥有四千多的员工，上万的眷属。那一处的方言，都可听得到，寂寞和闭塞的山村，顿时显现种种不同的热烈情调。机器由二三十部增至一千多部，每月可产一千多枝步枪，五十多挺的轻机枪，五六万发手榴弹，枪榴弹，还有许多零零碎碎的东西。它的产品，西边销到广西、贵州，南边到了福建、广东，北边到了安徽，一直销到西北的甘肃。在战区与本省的销场，更是普遍，名声随着销路一日甚似一日宣扬出去。有些不知道内幕的人，以为我是如何神秘的举动。二十九年南岳会议的时候，我带了许多的样品到那里去试验，邀请到会的许多高级将领与参谋来参观，当时有人对我说笑话："黄季宽，你已经变成军火商人了，你是不是想要向我们推销生意么？"我说："在抗战时期，自己能制造一些军火来卖卖，不要再买外国货，也是一件值得做的买卖呀！"我曾经将这个情形向蒋先生报告过。他说："好！好！你就这样做去！"所以我就更放胆的做起来了。

浙江的兵器制造工业，除我之外，还有浙赣路的副局长吴竞清。他见我做得很有趣味，就将浙赣路上多余的机器都搬到龙泉去，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工厂，并且利用火车上的轴钢，来制造迫击炮，也算得是抗战期中很大的创造，出品也很精良，此外并做重机枪及各种机械。在瓯江的上游，无形中就变成了一个军事工业区。我们在那时候，并没有什么其他的念头，只是想着，多制造一件武器，即可以增多一分抗战的力量。产品虽不很精良，赶不上外国货，但比没有总要好得多。时间一日一日的延长下去，名声也一日一日的扩大起来。敌人首先知道了，时常派飞机到那一带去搜索。终于被它发现了！塘头机厂首先受到轰炸，但损失并不大。我们照常工作，照常出品。三十年的夏天，中央兵工署派了好几位委员到来考察，认为尚有相当价值。于是同我商量，打算收归中央办理。理由：第一、是地方政府不宜办理兵工

事业。第二、我们的出品，尚不能合中央的规格。在“兵工统一”，“制式统一”的正大理由下，我自然很愿意交出，以减轻我的负担。于是在三十年的三月，就把造兵器的三个厂交出去，而只留大港头一个厂，为本省地方制造一些应用的机械。交出去的员工，在感情上自然有些依依不舍的样子。我对他们说：“女儿长大了，总是要出嫁的。能嫁得一个好门户，不但女儿是喜欢的，就是作父母的心里也是很安慰的呵！”

三十一年五月，敌军陷金华，下丽水，交出中央的几个厂，都要搬迁到外省去。尚未动手，敌人已到大港头来了。军队方面要将那附近的工厂，全部破坏，理由是恐怕资敌。我对他们说：“这些破旧粗糙的机器，在我们视为至宝，在敌人则视为废铁。难道敌人还要用我们这些粗旧的机器来造兵器么？假使敌人不来，岂不是一个错误的损失？”果然，攻到大港头附近的敌人，为我三十二师官兵英勇击退。然先行破坏的，已不可修复了。只有大港头一个厂，我愿负资敌的责任，不许他们破坏。敌人退去后不久，这个厂的引擎又动起来，一直动到现在，没有停止过。而搬迁破坏的厂呢？两年之后，才能重新建立起来。单就本身的损失来讲，已经难以计算了！

我在那几年，对于这几个工厂，的确用了一番心思。差不多每月都有两次或三次以上住在那里。它在抗战上有什么价值和贡献，不必再估计，对我自己，确实得了它很大的益处。我以前对于兵器学根本就厌恶，不肯用心去研究。但从此之后，它能使我发生很大的兴趣。不但在技术上使我得到了解，还有一些粗浅的创造，更能使我对于科学物质的创造，与国家社会的认识，得到更进一步的了解。它不但是我愉快的工作园地，亦是我研究实验的场所。这是我极有兴趣的回忆。

军事工程与军需供应　在“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之下，地方的行政工作，都要离开了平时的常轨，而从事与军事胜利有关的特种工作。我并不因乍、平、嘉一带费了两年多工夫

构筑的工事弃置不守而稍有灰心，我对于国防工事构筑的热忱，还是和以前一样。当我初到杭州的时候，重新把国防工程处组织起来。这种组织，后来成为抗敌自卫团总司令部里很重要的一处，也是很重要工作中的一环，一直到抗敌自卫团总部结束以后，才随之结束。

本省对于军事工程的建筑经过情形，大略有如下述：

廿七年的春天，我们就开始构筑诸暨县安华、牌头、建德及瓯江洋湾附近的国防工事。这些，都是永久性的工事。虽然它的强度比不上乍、平、嘉，但在抗战后物力极度困难的情形下，也就不顾一切的去完成了这个工作。至其他部队随时随地需要地方民众构筑的防御工事，可以说差不多遍布于全省各县。所耗的民力、财力、物力，的确难以计算。

三十年的冬天，太平洋的战争爆发了！美国加入了我们的战团。军事当局预备将来美国的空军到中国来作战，浙江就是一个轰炸日本本土最好的空军基地。于是建筑飞机场的重大工程又开始发动，不上半年的工夫，衢县飞机场在我伟大的人力下告成了。前线的人民饱受敌机无情的轰炸，都以为我们的机场筑好了，就会有飞机来保护自己。并且飞去轰炸东京，使日本人也尝尝炸弹的滋味。所以飞机场的工作，他们是万分高兴的，不但日里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努力的工作，即是晚上也点起大光灯或火炬，继续的工作，所以工程能够很快的完成。为了要确保这个重要机场，防备敌人的进攻与扰乱，就要巩固衢县以东，以至金华、兰溪、义乌、诸暨沿线的工事。从而国防工事的构筑，也就随着机场的完成而大量的开展起来。那一线上，一时麇集了成千成万的劳动民众，与堆积如山的构筑材料。而尤以衢县附近为最后坚守的核心。军事当局的计划确定了，就在衢县召集附近各县的县长会议。我亦去参加，将所需要的材料数量，迅速要他们如期如数的征到。但是数量太大了，时间也过迫切。各专员县长听了，都觉得有些为难，恐怕不能如期如数的办到，而贻误了军事，面面相觑，

不敢答应。然而军事计划已经决定，要改变是不可能的。我当时含泪忍痛的对他们说："我们负地方责任，固然有我们的困难；但军队方面的困难，比我们还要厉害，上官的命令要怎样办，就得绝对服从的去办，流血牺牲，就是他们最后的责任，我们及人民不过是劳些心，劳些力，流些汗，贡献一部份的时间与一部份的材料而已。我知道这事的困难，但我们只得照这样办去。"同时我对军事当局方面要求，要节省材料，节省人力，切不可故意挑剔与浪费。大家见我这样说，也就很高兴负责的办去了。可是工作的确是巨大而繁重。试想，单就所需的大木（二十公分中径）就要三百六十万根，竹子九十万根。这许多的木头竹子，都不是邻近几县所能办到的，必须到很远的县份征运，才可以办齐。所以征购木竹的县份，北边到了遂安、淳安、建德、桐庐，东边到了武义、永康、缙云。南边到了遂昌、松阳。附近那几县，就不必说了。最远的地方，将近二百公里。从数十里以至数百里远的地方，要把这几百万根木竹搬运到衢州来，不要计算竹木的成本，单就人工一项来说，也就不易估计。那时正是隆冬大雪，要过旧历年了。几十万人因为运木头而不能回家过年！寿昌的林县长与党部的书记长为鼓励民众工作起见，在大雪底下，同民众一样的去背木头，以身作则，来鼓舞民气。

这些东西，在短短的一个月内，都集中到了衢县城的附近。有些因为是验收的时候，中径小了些，又得重新换过，或是两根算一根，所以实在的数目，还不止三百六十万根。唉！乡下的老百姓，他身上那里得许多的米达尺。他也不知道二十公分究竟是多少长？他所知道的是旧尺寸。辛辛苦苦地把木头砍下来，自己又送上很远的地方去，还要受到尺度不合的挑剔。他所希望的代价是什么呢？"胜利"两个字！或是"多打几天"，而不是那微小的代金。这一场大工程，人民茹苦含辛，终于如期完成，政府所能给予他们的代金，不过两百多万元，而地方人民种种的损失，恐怕要加上二十倍以上。四百五十万根木竹，数目是何等的

惊人？衢县城的人口，不过四万多，然堆在城区附近的竹木，就比它的人口数多出十倍以上。我到那里去巡视，只见竹木，少见人头，真不胜其沉痛与悲感哩！

另外，还有一个消极的军事工程，就是破路。自然啰！以我们劣势装备的部队，同优势装备的部队作战，如果能够在交通上予敌人以极大的阻碍，使其不能发挥优势装备的效能，亦可获得胜利。即就消极方面而言，退却的时候，亦可迟滞敌骑的迅速进展。所以破路，就成为我们抗战时期的经常工作。不但铁路要破、公路要破，即连乡村乃至山头的羊肠小道也要破。浙江战前公路有三千七百十七公里，破至现在，仅剩七百五十九公里了。（由大港头至富岭街及由枫岭至威坪）内中还有一大半是已经破坏又重新修复起来的呢！至于接近前方的乡村小道，究竟破坏了多少？还不能得到正确的统计数字。我想，它的数量，如果统计起来，必然超过公路的数量若干倍，是可以断言的呵！

单纯的防御，不能收到良好的战果，在旧的战术里，已有这种启示。整个中国抗战期中，由太原的不守，而南京，而武汉，而洛阳，而衡阳，而宝庆，而桂林，而柳州，都未收到一次良好的守势效果。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由法国的马奇诺防线的崩溃，而至德国齐格菲防线的崩溃，更足以证明单纯防御战，必归于失败，中间虽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史太林格勒的例外，但我们要知道，这几处地方，苏军并不是单纯的防守，而是由各方不断的反攻，然后才能够反败为胜。我们过去的作战观念，总认为一个古旧的城池，在历史上曾经有过防守的战绩，到了现在，认为仍旧有同样的价值。殊不知近代武器进步之后，一切的战略战术，都随着改变了。亦可以说，以往的防御方法与防御物，都失去它的价值。我们想以千数百年残余的城墙或简单的防御工事，来抵抗现代新式武器的攻击，岂不是太落伍太错误了吗？我们受到这种铁一般事实的教训，我认为要从近代物质价值的基本观念上来改正战略战术上观念的错误，更在物质方面努力，作为建军的基

础，然后才可以发挥新的攻击防御精神与方法。如果不此之图，仍照旧的方法做去，不但民众是一种无谓的浪费，即军队的本身，亦是一样无谓的浪费。

道路的破坏，固然有暂时的迟滞敌人进展的功效，但只是很短的时间。我们浙江境内，无论道路破坏得如何彻底，敌人占领后修复的时间，从未超过三个月以上。也可以说，从未因道路的破坏而能中止敌人进攻的企图。而且即使破坏不象过去的那样彻底，敌人的进展亦不致超过了过去的速度。反之，敌人是逐步进展，逐步修复，并不妨碍它第二次的进攻。而我们呢，事前破坏，反先受到交通的困难，而影响当前的作战，尤其是我们已养成倚赖道路破坏为阻止敌人唯一方法，而不知我可以通过，敌人何尝不可以通过？以这种暧昧倚赖的心理，在任何地形之下，恐怕都不能拒止敌人的进展。此外，更有低估敌人修复力量的错误。往往一种破坏工作，皆以自己为标准。认为足以妨碍自己交通者，亦足以妨碍敌人交通。殊不知足以妨碍自己者，未必即足以妨碍敌人，故此种破坏工作，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损失，实远大于敌人所受的妨碍。太平洋这宏无际涯的海洋，应该是天堑不能飞渡了，又何曾限止了海空军的活动呢？

军队副食的供应 三十年四月间，我到绍兴去巡视，同前方的部队长官谈到士兵的营养问题。当时士兵的副食费，仅有二十余元。他们说："士兵每日除了二十四两米之外，只是拿开水煮些青菜来伴食，月中见不到一些肉与一些油。"天气很热了，某团长要士兵将棉衣脱下来，士兵皆怕冷，不肯脱下。那团长就自己将上衣通通卸下，赤膊露臂，表示不怕冷，以鼓励士兵。然而士兵确是怕冷，并不因团长的以身作则而有所感动。他们说："不料士兵的精神体力衰退到这个地步。"我听了他们的话，内心惨然不安！我想士兵平日没有一些足以发生热力的营养料，不但是没有勇气与敌人作战，就是要抵抗气候的寒暑，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个团长以身作则的表演，未尝不是精神鼓励

的方法，但是他不了解物质的缺乏是会影响精神，同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敢打赤膊不怕冷，是由于每日吃得好一些，营养好一些，而忘记了士兵终日是喝开水，煮青菜。我又在路上遇到了一队输送兵，一个个都是瘦弱不堪，病态毕现的样子，东西由老百姓挑，他们徒手陪着走，好象还跑不上。我心里想，输送兵自己不能输送，要老百姓帮他输送，又何必有此输送队？象这样下去，恐怕他们自己的身体，都要老百姓同他们输送了！我于怜悯这班老百姓之际，同时也对他们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士兵的营养问题，确是严重极了，这不仅是对敌的战斗力问题，而简直是本身生命的生存问题，然而我只有同情而已，不能替他们解决这个重大的问题。时间一年年的过去，三十年的作战能力，已不如二十九年，三十一年的作战能力，更不如三十年！固然，其中还有许多的复杂原因，不过官兵营养不足，体力减退，确是最重要的原因呵！三十一年浙赣路战役，不但部队战斗力减退，就是纪律亦大不如前。我尝拟了一个电报，想将这种情形向当局者陈述，但后来因种种关系，未敢发出。原文中有这几句话："平时要士兵上山砍柴，则战时必折窗户烧门板，平时士兵荤腥不着口，则战时必捉鸡杀猪，"盖以平时士兵的生活太苦了，要自己上山砍柴，才可烧饭，一到作战，就连砍柴的工夫都没有了，只有将村庄里的窗门板壁折来烧火。他们每月不知肉味，在打仗的时候，官兵监督不到，老百姓逃光了，剩下来的鸡猪，杀几个来尝尝滋味，亦实在是很平常的事！

我还记得，二十九年在金华的时候，有极少数的士兵不很规矩，社会上有许多非议。我同东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谈到军队的纪律问题。他说："就现在的情形来论，自然是一种极不好的现象，但过两年再回头看现在，则现在已是黄金时代了。"果然不出他的所料，自二十九年而三十年，而三十一年，一年不如一年的下去，我倒很佩服他的先见。因为物质是行动的基本要件。古人说："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军队的纪律，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十一年的秋天，浙赣路的军事已经平定下来了。军事当局在建阳举行一个检讨会议，我也被邀参加。大家都感觉到，官兵营养不足，体力、战斗力以及军纪、风纪，都不易维持。我同本战区各省的当局，发起了一个募捐慰劳的运动。一共募了六百万元，来慰劳全战区的官兵。然而人数太多了！六百万元的数目，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平均支配起来，仅能打一次“牙祭”。对于整个官兵的营养问题，依然不能解决。

三十二年的情形，越加严重了！我为同情心所驱使，首先对军队副食的供应，命令当地的县政府切实负责办理。自五月份起，每月供应每个士兵青菜三十斤，黄豆一斤，猪肉一斤、食油一斤，那时士兵的副食费，每月还是三十多元。即使全数交给地方政府代办，这些实量的物品价格，相差得很远。尚有一些部队，还不全数交付的，无形中地方人民对于士兵副食，就要全部负担起来，实行之后，人民负担，自然加重，地方政府亦就增加了一个极繁重的工作。但是我觉得为国家保持作战的力量，为士兵保持身体的健康，虽然人民加了一些负担，政府多了一些工作，也是值得的事！所以我勉励人民，当作保养自己子弟一样，并告诫地方政府，作为政绩考成之一。办理以来，尚属顺利。是年的秋天，我到江山一带去视察，李总司令云波集合驻在附近的二十六师弟兄，要我检阅。他报告，自副食供给后，逃兵减少了若干，死亡减少了若干，都有很正确的数目字。他们对于地方及我，表示了许多的谢意。我见士饱马腾，不如以前面黄骨瘦的样子，衷心也比较安慰了些！

三十三年春天，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各军事长官都觉得军队副食的严重，同时亦顾虑到地方负担的困难。于是由最高统帅决定盐斤加价，每百斤增加一千元，专作为增加军队官兵副食之用，由中央统筹。当讨论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假定浙江每年销盐一百万担，即是副食费负担十万万元，而就当时的物价，就地供应实物，至多不过一万万元。即使照后来第一次规定，每兵增

加一百五十元，以全省十万人估计，所需不过两万万元。所以盐斤加价统筹副食的办法，表面上看来，好似减轻了浙江人民的负担，实际上则普遍的增加了五倍的负担。至于因食盐加价而刺激一般物价的上涨，间接而普遍的增加了人民负担，就无法估计了。同时，在盐税收入方面，并不能按照预算增加的数目收到。因此，士兵副食费增加的数量，亦不能照物价的指数一样，在各地仍旧有很大的差价。这部分的差价，仍旧需要地方另筹弥补，或是照平价征购，又加重了地方政府办理军队副食的困难。这种现象，虽然是实施后才表现出来，但我在当时的会议席上，亦提供过这种意见，而未为大众所注意，真是一个遗憾！副食问题演变到今日，物价随着盐价增高了！国家的税收，受到重大的损失！人民负担，亦普遍地加重，而士兵副食，仍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演成兵民交困的现象，真是始料所不及的呵！

兵役与国民兵组训　二十五年三月，兵役法公布，那时我正在主持浙江政务。我为确定兵役基础，一面责成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积极规划国民军训之推进——侧重壮丁训练，一面即指定永嘉，金华等五十一县为试行征兵区。四月间、成立金严、温处两师管区，并分设金华、兰溪、衢县、吴兴、永嘉、临海、丽水、云和等八个团管区，由民政厅综理其事，省政府为监督机关。这是本省设立征兵机构的嚆矢。廿六年冬，我重来浙江的时候，主管全省兵役事务的，是兵役管区司令部，将各师管区及国民军训委员会改隶指挥。廿七年三月，兵役管区司令部结束，改组为军管司令部，我兼任司令。三十年中央规定兵役管区由三级制改为二级制，本省原有各师团管区，便一律裁撤，改设永乐、临黄、丽云、金衢、兰嘉、嵊绍、鄞奉七个师管区。后来，嵊绍和鄞奉两师管区，因辖区各县先后沦陷，均告裁撤，改设征兵事务所，划为临黄师管区管辖。县级征兵事务，先由县政府设置兵役科办理。本省二十七年七月起在后方二十四县县政府均设置兵役科。三十三年兵役科裁撤并于国民兵团。各县国民兵团是二十八

年十二月成立的，他的前身社训总队，早于民国二十五年就成立了，由县长兼总队长，中央分发来县的社训教官兼副总队长，专司壮丁训练的任务。现在本省的国民兵团分为战地和后方两种，战地兵团三十三县，后方兵团四十三县，同负征募国民兵组训和警卫的责任。

本省征兵开始的时候，中央并无配额，而是随征随拨的。廿五年的实征数是五千一百多名，我们在今日看来，这个数目太微小了，可是在当时要打破一千多年来"好男不当兵"的旧观念，而把这些壮丁从田间征送到兵营里去，也确实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抗战开始，兵员的补充自然有大量的需要。廿七年中央配赋本省的兵额数字，相当庞大。那时杭、嘉、湖人口最稠密的十五个县市已经沦陷了，兵役的基础，又还未建立，兵役的工作，确有相当的困难。可是经全省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尤其是那些政工队的青年同志们，不辞辛苦的普遍深入乡间，不论是宣传、征募、征属慰问，都出了很大的力，流了很多的汗。这个兵役的难关，总算很顺利的打破了。廿八年后，配额虽继续增加，而征拨的数字，却是每年都超过了的。直到三十一年敌人大举窜扰浙东，陷区扩大以后，征兵的工作，才遭遇新的难关。

陷区照常征兵，这是我坚定的主张。我的理由，可分四方面来说：第一、"以华制华"是敌寇最险毒的阴谋。他占领了我们的土地，还要驱使我们的壮丁同胞，做他冲锋陷阵的炮灰。因此，陷区的壮丁，如不为我们征集以负荷杀敌卫国的神圣使命，即将为敌人役使来残杀同胞，危害祖国，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剧情！第二，这次对日抗战是长期的全面的，战争的时期愈延长，战争的地区愈扩大，兵员的补充愈迫切。如果我们放弃沦陷区的征兵工作，则兵源日稀，部队补充困难，势必影响战争的进行。第三，陷区人民直接受到敌人的蹂躏，同仇敌忾的精神，至为旺炽。如能依法征集，在国家的正规训练与统一指挥之下，必能成为最精良的战斗员。第四，后方人员因不良的传统思想所禁锢，

对于当兵，大多视为畏途，莫不想尽方法以求逃避。如果沦陷区域可以不征兵，则后方地区的壮丁，将视陷区为逃役之渊薮，而相率以去。所以本省自廿七年七月起，即开始陷区征兵，虽然征募的数目比后方要少，成绩不如后方的县份，但也有若干县份，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尤其是萧山。

征兵工作，在长期抗战的过程中，是极重要的一环，因为这是国家要求人民贡献生命的事。而我国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来，已养成了积重难返的文弱风气。自廿五年兵役法公布至廿七年大量征兵，中间不到两年的时间，一切兵役的基本工作，都没有做好。是以八年来的兵役工作，发生了很多的流弊。这不仅浙江一省如此，而是全国普遍的情形。这些情弊，我不愿在这里一一列举出来。我们要求改善，固然不是短期内所能办到，也不是枝枝节节的办法所能达到目的，而必须从下列两方面作根本的努力。第一，教育方面：应迅求国民教育的普及，廓清“重文轻武”的落伍思想，矫正卑视军人——“好男不当兵”的错误观念。培养强烈的民族意识，并普遍提倡国民体育活动，锻炼国民坚强的体魄，使人人都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壮志豪气。第二，行政设施与兵役制度方面：应力求基层政治的健全，特别要严格实施户籍管理。基层政治健全，则民主精神充沛，兵役监察制度，才能发挥其效能。户籍登记妥善，则壮丁管制严密，征兵才有确实的根据。国民兵组训工作必须确实认真，并改善其训练方法，使及龄壮丁在军事部勒之下，接受严格的军事基本训练，养成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习惯。国民兵组训干部和各级兵役干部，必须遴选有经验有理想的优秀军官充任，俾能发生新军人的典范作用，克尽建立兵役基础的职责。免缓役的范围，应尽量缩小，以防止浮滥取巧，影响兵源。在实施征兵制度的先进国家，征集新兵，只要发一道某年次壮丁的征集令，规定报到时间和地点，所有同年次的壮丁，便都遵令如期入营。我们的征兵工作，要达到这个程度，为期还很远。在目前的过渡时期，新兵的征集费用，必须

充足，俾可优遇新兵，使在入营前获得良好的“第一印象”。入营以后的保育，尤须切实注意。此外，官兵待遇的提高，征属的优待等，都是于改善役政有密切关系的问题，而必须绝对做到。能如此，则目前所发生的征兵困难与流弊，均可迎刃而解或杜绝。坚强的国防新军之建立，亦指日可期了。

廿一　几个政治问题

全省士绅会谈　如果一国的首都或一省的省会沦陷了，在旧的眼光看起来，好似这一个国或这一省就算完了。所以当南京和杭州相继失守之后，有些人就感觉到亡省亡国之恐谎！有些人则索性继续他醉生梦死的生活而一切不理，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现象！我回到金华以后，就觉到有急速召集全省各县有名望的士绅会谈的必要。事前与省党部及省府各委员面商，某县应召某人，或由县里自已推选，自然这些人包含各县党部负责的同志在里面。那时候，除已经沦陷的县份外，交通还很便利，被召集的人，都如期赶到。他们抱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热诚，并想来省探听时局的消息，及省政府当局对于以后如何应变设施，以尽他们以后的责任，决定他们以后的行动。

会谈的地点，在永康城内的县立中学，也就在那里作为他们的招待所，使他们首先尝到简单而集体的战时生活，是没有平时生活的舒适了。这次集会，不采用会议的方式，因为要商谈的问题太大了，不能将各种问题分别提出，一一商讨，作成决议。同时这不是一个法定的会议，所以不能制定各种方案。也因为时间匆促，大家都没有准备的原故，只是彼此约略的交换意见，而没有详细讨论。首先由我将受命来浙的经过，及我所知道的军事概况以及杭州撤退的情形，向他们报告。同时将我对于抗战军事的见解，及对于地方士绅的期望，向他们说明。比较重要的意见有三点：第一、这次抗战是长期的。在国家方面言，决不因首都

的沦陷，而对抗战国策有所变更。在省的方面言，也决不因省会的沦陷，政府随而瓦解。我们的政权，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是一样的健全和行使，决不致陷于无政府的状态。而且战事的胜负，不决定于目前一城一市的得失，最后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第二、此次抗战是全面性的，也是全体性的。作战的区域，不仅限于前方的一点一线，而且包括前方和后方的全面。战斗的人员，不仅限于军队，而是包括人民的全体。第三、战时的政治，自然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前提。一切设施，都要配合军事，争取胜利。我希望他们格外镇定，益加努力，以他们的地位来领导全体人民，参加这个持久的全面战争，效法先贤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光荣史实，以恢复既失的土地，争取最后的胜利。并且希望他们多多发表意见，以供政府政治改革的参考。这些论调在现在看来，好象非常平凡。但在当时却是一番很新颖而极动人的言论，也是必须使大家明瞭的道理。他们自然也有许多慷慨激昂的陈词和意见，但也多半是很抽象很笼统的。所以这次集会，在形式与实质上，并不见得有什么收获，但在精神上，却起极大的作用，并沟通了政府与地方士绅的意见。也可以说是战前未有过的事。它在本省政治史上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大约是廿七年一月中旬的事。

订颁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 自从全省士绅会议之后，我总觉得在一个局势大变动的时期，政治上必须有一个崭新而为大众所拥护的主张，公布社会，才可以作为政府与人民共守共行之准绳。本来这应该是中央政府决定的，但当时中央各关机正在西迁中，还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而浙江最先为敌骑所侵入，处在前方动荡而艰苦的环境之下，为安定人心，振奋精神，动员民众，培养实力，以贯彻中央抗敌自卫的国策，似乎有即时决定一个省单位的政治主张必要。于是我审度实际的情形，再三考虑，亲自拟订"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十条。那时我适在丽水工作，一时不能回到方岩去。乃召集省府各委员到丽水，举行第九八八次委

员会议，并邀请省党部各委员及高等法院的郑院长烈荪（文礼）参加商讨。在会议席上，大家都认为有此必要，将我所拟的原稿加以修正通过，正式颁布各县，并呈报中央备案。那是二十七年二月九日的事。兹将这个富有历史性的“浙江战时政治纲领”原文附录如下，以供读者的参考。

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

一、浙江省为贯彻中央抗敌自卫之国策，在现阶段之政治设施，以动员全省民众、参加抗战，创造新的政治及军事力量，保卫浙江，收复沦陷土地，争取最后胜利，为一切努力之总方向。

二、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及地方抗战自卫组织，培养民主精神，领导民众运动。并绝对澄清吏治，铲除贪污，提高各级军政人员之战斗意志与技能，厉行战时严格的自觉的新风纪。

三、对战时人民的负担，以有钱出钱务求公平为原则，严禁一切借名苛派。设法减轻地租，改善平民生活，减免战区田赋，另筹战时费用，并节减行政经费至最低限度。

四、调整物产，保证战时生产品自给，活泼社会金融，逐步推行公营及管理贸易。振兴民间手工业，以救济失业，增加生产，禁绝日货，取缔奸商投机操纵。

五、健全交通组织，实行水陆联运，并负责军运民运，严禁拉夫、扣车、扣船等情事。

六、实施战时青年及政治工作人员训练，提高其民族意识，强化其战斗精神与技术，养成政治及军事上之新干部。

七、国民兵役之推进，当改良其方法，严厉惩办借抽征壮丁枉法舞弊之各级人员。出征军人家属之赡养与保护，伤亡将士之抚恤，地方政府应予切实执行。

八、发动并统一全省文化界救亡工作，号召文化人回乡服务，推广战时民众教育，普遍提高人民之政治认识及文化水准。

九、以国民抗日自卫军之统一组织与领导，动员及武装民

众，坚强人民之抗战精神与自卫力量。

十、巩固抗日阵线，加紧肃清汉奸，凡背叛或脱离抗日阵线者，政府得征发或没收其财产，佃户对之得不纳租，债户对之得不偿债。

政治纲领公布后的社会影响　自从这个政治纲领颁布之后，社会耳目，为之一新，而政府的一切设施，也依据这个纲领，逐步展开。不仅在省内起了很重大的影响和作用，即当时国家政治中心所在之武汉的各报，亦都以显著的地位来登载，并作为重要的问题来评论。固然这个纲领的内容，今日看来，已经是很平淡的了，但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富于刺激性的东西。因而一方面虽然博得很多人的赞同与拥护，而另一方面，却引起很多的批评。尤其是在中央，对战时政治尚未有具体的方针决定以前，浙江以一省的地位，首先来这一套，名称用"政治纲领"，而不用施政纲领或行政纲领的字样，就好象有逾越职权的样子。其实中央对这个纲领，并不觉得有什么悖谬的地方，不过有些反对的人，喜欢这样吹毛求疵的在旁边指责。我曾听说，有人曾将这个纲领录呈最高当局察阅，最高当局一条一条看完之后，说："这并没有什么，只是末尾一条：'巩固抗日阵线，加紧肃清汉奸，凡背叛或脱离抗日阵线者，政府得征发或没收其财产，佃户对之得不纳租，债户对之得不偿债'，欠斟酌一些"。我在当时，只是一心一意的按着这个纲领去实施，对于外间的批评指责，不加置理。到了四月间，中央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以为我们施政的最高准绳，以前单行的浙江战时政治纲领，就等于废弃了。但是这个政治的暗礁伏下了，仍然酝酿成以后种种的复杂问题。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组织　当杭、嘉、湖沦陷，杭州放弃之后，陷区里的学校都停办了。那些不甘心做亡国奴做顺民的教师学生，都跟着军队或政府撤退到后方。省立嘉兴中学校长张印通，带着数百个学生，由首先沦陷的嘉兴，屡停屡进的跟着军队行动。我由杭州退出，在桐庐芝厦镇附近遇见了他们，对于

这些可敬爱的先生与学生，除了内心上对他们予以同情之外，因为那时政府自身也正在行动中，尚未有妥善的安顿办法。我到了金华，退集在那里的知识青年，就更多了。不但是本省的，还有江苏的，上海的。有些是有组织的，有些是无组织的，有些是迁地复课，有些则欲找事谋生，有些已投入军队的政治工作队里去工作，有些是自己组织服务队，从事各种宣传与战时服务。不仅金华如此，其他各地也多如此。我想，如果将这些青年好好组织起来，不但对于安顿的问题得到解决，同时对于抗战工作，也有许多帮助。否则，必致流离失所，不仅酿成社会不安，抑且有损国家元气，这在政府方面是不能辞卸其责任的。我于是决定以战时政治工作队的组织，来统一他们的行动与工作。首先到兰溪去召集撤退到那里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谈话，将我这个意思对他们说了，他们自然都很愿意加入这个新的组织。我并要各人写一篇自传，测验他们的学识与意向，以资甄别取舍。二十七年一月下旬，兰溪县战时政治工作队正式成立，这便是本省政工队的创始。接着金华、义乌、永康等县的政工队，也相继成立，并逐渐推广到其他各县。这些青年群中，有男有女，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大学生，有中学教师，也有大学教授，王耘庄就是担任过暨南大学教授的一个。多数人固因战事影响，失学失业，而来参加这个工作。但也有很多放弃原来优越的工作岗位，而来参加这个工作的，姚旦就是远从香港汇丰银行辞职，来浙江当政工队员的一个。

政工队的组织系统及其内容　这个组织自兰溪创始之后，发展非常迅速，二月下旬，浙江省抗日自卫委员会便陆续订颁了四种重要法规：（一）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二）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队员守则，（三）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工作实施纲领，（四）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作工队补充规则。从此政工队的组织，是制度化系统化了。到了九月间，全省七十五县，不论自由区和游击区，普遍成立了政工队。这个时期，县政工队隶属于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与县政府，由省抗

卫会负全省各县政工队的领导责任。（按省抗卫会由我兼主任委员，县抗卫会由县长兼主任委员）十月间，我为使战时政治工作与行政密切配合，并加强其领导起见，规定各县政工队，直隶于县政府，并将政工指导的任务，由省抗卫会移转于省政府，即在秘书处内设置战时政工指导室，专管其事。二十八年一月起，并在各区专员公署各县政府，分别设置政工指导室，建立政工指导的系统。我们就上面所举的四种政工法规中，可以提出三个要点来说明政工队的内容：第一、是民主的组织。政工队的队长副队长和其他干部，都由队员选举的。第二、是士兵的待遇，政工队的干部与队员待遇完全一样。最初规定每人月支生活费十元，生活费用较低的山僻县份，有减支八元的。二十八年以后，随物价的上涨，随时予以调整，以足够维持个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为标准。他们下乡工作，仅支必需的膳宿费，不给交通费。第三、是工作与教育并重。他们于工作之外，随时举行各种检讨会、研究会，并规定队员按月作文一篇，缴省批改，评定优劣后，仍予发还。省抗卫会创办周刊一种，名曰《新力》，（后来改由省政府政工室编行）指定为各县政工队员必读刊物。

政工队的主要任务　自各县政工队普遍成立以后，我每到一县，必召集这些青年开座谈会，指示他们的工作，鼓励他们的精神。在抗战以前，一个省的行政首长，每到一县，所接触的都是那些老年——商会会长地方绅耆等，在抗战以后，我就特别注重这些青年。因此便听到很多人评论，说我看不起地方耆老，将他们置诸脑后。其实我并不是不重视老年，而是以前太不重视青年，现在不过稍加注意了一些。这样就会引起人们的批评，这也可以说是新旧观念的不同吧！我之所以要组织这些青年，在消极方面，固然是安置他们，而在积极方面，却有极大的作用。因为我觉得抗战的烽火，虽然已燃得很高，但全省两千多万人民，能确实知道抗战的意义与战局的演变的实在是少数，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应尽的义务，能了解能实践的更为少数，必须有很多人作传声扩音的喇叭，才

可以使这千千万万睡着做梦的人们清醒过来，负起他们应尽的责任。我更觉得以前政府发布的政令只是在衙门里面兜圈子，或是只能到达乡镇公所为止，政府人民间保持着一个很大的距离。人民不但不知他应尽的义务是什么而不能尽到，应享的权利是什么而不能享受到，他们在黑暗的社会里所受的鱼肉痛苦，也就无人知道。政工队的主要任务，是要将抗战时期政府的政令宣达到民众的内层，使人人能自动的尽他应尽的义务，同时要将民间的黑幕揭发出来，使能享受应享受的权利，而不致为贪污豪强所鱼肉。因此在政工法令里特规定政工队员不是公务员的身分，他是政府与人民间的桥梁，用以沟通政府与人民的意志。

政工队在二十七、二十八这两年内，不但数量上发展极为迅速，（全省计七十五个县政工队、二个区政工队、五个省政工队，合计干部及队员三千余人。）在工作方面亦有极良好的表现。为鼓舞工作情绪，统一工作步骤，以提高其工作效能起见，曾举行分区集训及调省集训。后方县队的工作，以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为重心。前方县队及省队则以深入陷区，展开对敌伪的斗争，为最高之要求。二十七年三月七日，三区战地政工队及省政工队员十三人，由绍兴沥海所渡江至海盐、海宁一带，协助军队作战，不幸在茶院附近（海盐境内）与敌搏斗，全部殉难。这是政工队同志对敌斗争最先牺牲一批人，也是本省知识青年为国殉难的急先锋！从此前仆后继陆续深入敌后工作因而牺牲者达七十四人(其中男同志六十一人，女同志十三人)之多，其事迹之壮烈，实多可歌可泣！要之：本省敌后政权之维持，我后方工作之展开，得力于政工队同志们的艰苦奋斗不少，实为不可磨灭的事实。但青年的幼稚病，是不可免的，有些地方，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指摘与不好的批评。而且这种紧张的工作，时间长久之后，有些因不能忍耐而离开了，有些因不能随着时代进步，以致工作情绪与工作效能都降低了。到二十九年夏，干部与队员的流动性愈大，素质日渐下降，以前那种奋发蓬勃的朝气，已逐渐消沉下

去。这时适值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支团筹备处成立，为统一青年组训及其领导起见，即将后方各区县政工队划隶青年团，再加统一训练后，改组为战时青年服务队，仍在各县服务，受所在地县长的指导，协助推行战时政令，但数量已大为减少了。三十一年以后，游击区各县政工队及省政工队，也以敌后行政基础业已确实建立，分别结束。

设置训练团训练青年干部 廿六年十二月初，我在杭州接事的时候，鉴于地方政治因军事形势的剧变，几濒于崩溃的状态，认为这其间的主要原因，便是旧的干部不能适应新的环境，而必须加以新的训练。同时为收容由战区撤退下来的学校青年社会青年，并加以适当的训练，使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基层干部。于是在接事后的首次省府会议上，便决定设置两个训练团，一为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一为战时青年训练团。前者以造就刻苦耐劳的战时政治干部为目标，受训学员由各县保送，并经过考试而录取的，计五百余人，程度较为整齐；后者的性质，以偏于消极的收容，训练的目标，不甚鲜明具体，受训学员计一千五百余人，大多是浙西后退各中学校的学生。间有若干失业的社会青年，没有经过保送和考试，只是简单的甄别口试而已，故程度高下与年龄大小，相差甚大。两团团址同在丽水碧湖镇，均由我自兼团长；政训团设副团长二人，由民政、教育两厅长兼任；青年团设副团长一人，由教育厅长兼任。统于廿七年一月间着手筹备，二月初开始训练，采用严格的军事管理，实行军事训练。政训团设一个大队，辖三中队，其政治教官，多为省政府各厅处的高级职员兼任的。因为训练目标比较清楚，训练的实施亦较为顺利。青年团设一个总队，下分三个大队、九个中队，及一个独立分队。（独立分队完全是女学员，军事教官政治教官均是女同志担任的。）其政治教官多为当时由战区撤退之中等学校校长与教职员。因为创设之初，未明白规定训练的性质与内容，究竟是属于军事，抑或属于政治，或仍是普通的学生训练。完毕之后，作

何用途，亦未确定，因此训练就发生困难了。在军事干部方面，以为这是完全军事性质，一切皆应以军事为主，而在政治教官方面，则以为仍是学校，不过加重军事的管训而已。于是两方面就发生意见。而受训的学生，亦各有各的志愿与主张，相持不下的，几致酿成风潮。政府为解决这个困难，并鉴于局势又趋于安定，于是将政训团与青训团合并而为战时工作训练团，将两团学员，重加测验甄别，并各就其志愿，分为区政人员、县政服务员、乡村建设人员、财务人员、合作金融人员、会计人员、贸易管理人员、自卫干部人员、自卫训政人员、电讯人员等班次，实施专业训练，并调现任各区署各县府秘书入团受训，为佐治人员班，其中电讯人员由大港头的省抗卫总司令部的电讯训练队训练，自卫干部人员改送入武义军事干部训练班训练。七月，训练期满，分发各机关部队工作，愿意继续求学的，则按其学力分别送入新设的联立高中、联立初中、联立师范等校肄业。本省抗战初期的干部训练工作，于是亦告结束。当碧湖训练团开办之后，亦有许多不明内容的人，作恶意的揣测，与政工队同样为掀起政潮的原因。

新四军离浙的经过　自民国十六年国共分裂，至十七年叶、贺回粤，开始武装冲突，而进入江西的长期战争，这一番悲惨的战事，一直到廿六年七月卢沟桥战事爆发，朱德、周恩来等到南京来商谈团结抗敌，才停止下来。但这仅是延安方面的中共主力，参加了山西各处的战役，而闽浙边区的局部问题，尚未有完全解决。在抗敌团结伟大号召之下，双方都似乎要设法解决这个局部的问题。我到浙江之后，也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才可以使后方安定，专心一致去对付敌人。这时，中央已准许东南各省边区的中共武装，编成部队，到敌后去担任游击的工作。闽浙边区方面，是以刘英、粟裕为首脑的，他们主要的基地，就在平阳的北港附近。虽然冲突是停止了，但彼此还是武装对峙着。廿七年四月间，我出席武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与周恩来等相晤，曾谈过

这个问题，我返浙之后，他们就派代表吴毓、黄昂到金华来同我接洽。我商得军方同意，由我去解决，于是巡视温州，到了平阳，在平阳县政府里再同吴毓、黄昂商定数点：一、所有他们的武装，完全离开浙境，到苏皖的敌后去担任游击的工作，并确定由浙赴皖的路线。二、他们的部队通过时，国军及地方团队不予为难，并予以补给上之方便。三、他们留在地方的家属，政府保护其安全，但不能再有政治活动。四、准许他们在丽水或温州设立办事处。这些约定未有明文的签订，而只是口头上彼此的同意而已。他们并请我到北港去同他们的部队说话，我因急于回来而谢绝了。

正是麦子金黄的时候，他们的部队，由平、瑞、青、丽各县的边界，到了大港头集中。这时我适在碧湖训练团。粟裕同吴毓到来找我，商洽沿途经过的问题，并要我去同他们的部队说话，我再不推却，而且我也想看看他们的队伍到底是怎样的情形。我留他们在训练团内吃了一顿午饭，大家随便谈谈，据说刘英已离开部队，队内事务由粟裕一个人主持。他们奉中央命令，编为新四军底下的一个支队，军长是叶挺、副军长项英，也许是因为叶挺曾在老四军当过师长，所以才挂出新四军的招牌来。粟裕是一个矮小的个子，说得一口江西音的普通话，使你一听就知道他是江西人。午饭后，我同他们及许厅长一同乘车到大港头，队伍集合在大港头的一个庙旁边的空地上，总数大约是五六百人，其中还有许多年纪很小的小孩子，武器是不完全的，各式的杂枪都有，还有许多是徒手的，执着一支矛子。我对他们说的，无非是统一团结共同抗敌的话。在讲话之前，及说完之后，他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并且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拥护民族统一战线”！“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拥护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这是他们一贯作风。讲完话之后，我同许厅长到村里粟裕的司令部去访问，同时送了几条猪作为慰劳的礼物。这也可以算是富有历史性的事件了。

周恩来由桂来浙 自从浙南的中共武装余部离境后，大许多足以引起地方不安的严重问题，暂时总算得了一个解决。大家在团结抗敌的口号之下，也确曾有过表面上的“合作”，正为“合作”仅做到表面的程度，而新的磨擦便继续发生起来了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主张，暗地里安排他们自己的工作，不但是在地方上起了一种不安的心理和斗争的事实，就是中央方面也为此而担忧！这时周恩来正在担任中央政治部的副部长，特地到浙江来视察，不知是中央派他来调处这方面的问题，抑是他自己要来这方面走走，或是有他自己的工作？那就不得而知了！

廿七年底，我赴重庆出席中央会议，顺便到香港家里走了一趟。廿八年一月回到桂林，就遇到他，说是要到浙江来，于是同他由桂林乘湘桂浙联运的火车回浙江。①同行的还有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在衡阳停留的时候，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教育长汤恩伯和副教育长叶剑英到来会面。以往中共似乎以游击战为他们的亮牌子，所以游击训练班就聘十八集团军中共部队的参谋长叶剑英来当副教育长。此外还有一些教官是中共分子，我所知的彭雪枫也是其中之一。在衡阳中央银行的阳台上，叶挺曾为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

火车继续东进，叶挺中途下去了，经过江西横峰，那是中共当年占据很久的地方。目睹荒芜的田地，残破的房屋，以往的遗迹，还历历在目，不知他们见了，心里发生一种如何的感想呢？我同周氏同车来浙，他当时也算是中央的一个大员，我为尽地主之谊，自然要加以招待。他要到大港头去参观兵工厂，我也得陪他去，于是引起各方面非常的注意，报纸上特为登载“黄周同车赴某地”等刺目字样。好似黄、周的同行，是一个特别的新闻似的。我当时觉得有些气，现在想来，又觉得好笑。他在金华逗留不

---

①据《周恩来传》载，周恩来是2月18日与黄绍竑离开桂林赴浙江的。

久就到绍兴去了。他是绍兴人，据说是要回家扫墓，这也许是中国人的宗法观念吧！那时省政府浙西行署刚在天目山成立，行署主任尚未有人，由李处长楚狂代行职务，我得亲自到那边去部署一切。

我到天目山，周恩来也由绍兴转到天目山，又在那里盘桓了好几日。这是我第二次上天目山。第一次是抗战前到的，但并未上西天目的最高峰金顶。这次我同周氏一同攀登，东望钱塘，烟波迷茫，西子湖若隐若显，似含有无限之羞辱。因填《满江红》一词以志感。词云：

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迤逦。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波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年来守土负初心，生犹死。　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惊鸡鸣，扶桑指。

在天目山，就与周氏分别了，他怎样的回去，我也记不清楚了。我回到金华，中央曾有电报问我周恩来商谈的经过。其实我并未奉到明令与他作正式的商谈，而签订了甚么彼此同意的字据。仅是私人交换意见，或解决一些问题。口头上决定的有三点：一、由他指定一个代表人，遇有问题发生时，可同他商量解决。（当时他指定的代表就是吴毓。）二、中共分子参加地方政治工作的人员，只是在本身工作上努力，才能发展组织上的关系。（我要他将在浙江从事政治工作的中共分子名单开给我，他不肯答应。）三、中共在我后的地方，不许发展武装组织。这几点口头的约定，固然知道不会发生很大或很久的效果，但在当时也只好如此，因为不是签订甚么合同与条约呵！

中共武装侵入浙江及其发展的概略　自从延安方面的十大纲领发表之后，中共分子显然的是照着他们的主张积极从事宣传和行动，问题就一日一日的严重起来。由廿九年而三十年，渐渐地达到很尖锐程度了，但这时候他们的组织还是潜伏的、秘密

的，未能公开的发展。就是沦陷数年的杭、嘉、湖一带，直到三十三年的上半年，它的武装力量，尚不能入侵。这就因为那个沦陷区我们的工作人员及武装力量相当坚强的原故。中共在浙省最先建立武装的地方是浙东的三北（姚北、慈北、镇北）地区，这些地方，于三十年夏间沦陷以后，自然有许多游击队乘机兴起，薛天白的淞沪游击支队，就由浦东方面转移到“三北”。他在淞沪的时候，虽然是受某军的名义，但是只是一个名义而已。到了“三化”，又接受另一军的收编。他得到了掩护之后，就积极的扩充势力，并逐渐暴露他的真面目。地方党政机关，虽很明显知道他的阴谋，但格于情势，无法制止。三十一年敌人在浙赣的大举进攻，我军事力量后移，浙东问题更兼顾不到，以致任其坐大，得寸进尺，甚至公开的袭击我县政府及自卫武力，更把他的真面目，完全透露出来。他和领导者何静，是延安方面派来的。三十二年底，中共的武装，开始由苏南侵入长兴边界上的砚山，他的口号是“三山一湖”，即是要占领黄山、茅山、天目山和太湖地区。三十年冬，向长兴、安吉、孝丰进犯，并续陷临安、迫新登，欲渡过富春江，与浙东敌连成一起，他的口号是“打通浙东浙西的走廊”。由苏南过来的中共部队，是粟裕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师”（新四军这个番号中央已于三十一年一月明令撤销）。粟裕是二十七年和平的离开浙江，他现在要武装的回来了，前后相隔是整整的七年，上面所述，是这七年中演变的经过概略。

中共阴谋种种 我最近看到一张粟裕发的布告，一则说：“要在敌后建立抗敌政权”，再则说：“要团结抗战”，我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在本省敌后，我们的政权，始终屹立未动，天天在那里打击敌伪，无须他们再去建立。而他们的枪口不朝“敌后”，反指向“我后”来了，孝丰、临安都是没有敌踪的地方啊！他们到处破坏行政，篡夺政权，并袭击地方团队，攻击国军。行动如此，而偏偏要高谈“抗战团结”的废话，真是滑天下的大稽！中

央素本相忍为国之旨，不愿将这种事实公布，最近（三十四年五月）本党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仍希望就政治途径，觅取和平解决。可是中共不知憬悟，仍一意孤行。我就地方的立场和责任，特于五月廿五日，对于此事向报馆记者发表谈话，宣布中共在浙江武装活动的真相，和表明我们应有的态度，因为中共部队在浙境明目张胆的攻城略地，已不是局部的问题，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阴谋。不能不使地方人民一致了解其真相，以免受其利用，扰乱地方的秩序，破坏国家的统一。中共煽惑人民，从事破坏行动，每以政府为应付战争而必需之征课，如征兵、征实、募债等为借口，而尤惯于摘发战时政治设施之缺漏，以为攻击政府离间人民之工具，实则中共虽善以小恩小惠为钓饵，欺骗民众，要其最后目的，不过在笼络人心而已。如果民众一旦堕其彀中，他们的态度，即随而改变，掠夺、压迫、驱挞，几无所不用其极。我最近巡视浙西途中，有许多自孝丰等地逃出来的人说：中共于掌握地方权力后，征兵则一甲一丁，于是壮丁男子皆成为彼等之部卒。征课则多方巧取豪夺，于是民间之仓廪，皆颗粒无存。我政府八年来从事艰难困苦之战争，所需民间人力、物力、财力之供应，自必甚伙。又以战争情势之紧张，需要程度之迫急。故不论征兵、征粮、募债，办理之际，不免有若干弊病发生，自属无可讳言。彼辈因得以搜索瑕疵，作为攻击的资料，可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国家政令的推行。我们一面仍应力求政令的贯彻，另一方面当努力改善行政的方法，而尤须力矫行政人员一切违法乱纪的行动。我之所以定今年为法纪年，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以为国内的政治斗争，固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也是很平常的事。如果隐讳不说，不但于事无补，或反增加事态的严重性。我的声明，并不妨碍中央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决策，甚或于政治解决有所补益。我叙述这事的经过和事实，并没有一些架空捏造，不但想使各方得到一个真相和谅解，就在中共方面，我也想得到他一个自反与批评，使大家都本着政治斗争的公

式，而得到政治上合理的解决。

省政府与省党部的关系 在省境内与省政府同级的机关，可分为党务、军事、民意、司法四种。系统虽是各别，而关系却非常密切。先就党务机关来说，与省政府同级的是省党部。中国目前是在"以党治国"的时期，国家一切的政纲政策，都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再透过各级政府，分别执行。省政府一切的行政措施，皆秉承中央的政策与法令办理，与同级的省党部，似乎不发生什么直接的关系。而中央对于省政府与省党部的关系，亦未尝有明文的规定，县党部与县政府的关系亦是如此。因此省县各级的党政关系，就仅在党政合作的口号之下，而各自进行各别的工作。所谓各别，其实尚有许多相关而不能分清或尚未分清的地方。合作是基于两方面的，假使有一方发生了意见，便不能合作而终于发生党政磨擦与冲突的问题。抗战以来，中央因为要加强各省的党政合作，很多的省份，因为合作容易发生问题，甚至进一步而为党政的合一，即是省政府主席兼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使党政同在一个人主持之下，而得到更密切的合作。但是实行党政合一的省份，到底得了什么良好的成绩，还不能有明确的比较。浙江省党政关系，在我们前后将近十年的期间内，彼此都是客客气气的，从来就没有发生大的磨擦与冲突，但小的问题则也所难免，尤其在县级。抗战八年来，有些省份，虽然是实行党政合一的办法，而浙江却仍旧维持过去的样子，而在党政工作的表现方面来看，却并不见得比实行党政合一的差得多。且我个人的见解，中央的党政关系，是一个表与里的作用，国民政府是表，中央党部是里。表面的一切表现，都是由里面决定的。地方的党政关系，是一体的两个面，两个面虽然在一体上，但中间总必须保持着若干的距离，才能发生两面的效用。若果中间的距离，完全没有了，即是等于一面，就没有两面的作用，也即违反进步的原理。我认为一个人要担任两面的工作，不但是件难事，而且是件苦事。在个人打算，何苦去讨这些苦难来吃？不过这是我未

曾尝过这种苦难的想法，不知道那些过来人，又是如何的想法呢？上面说过，浙江的党政关系，一向都是客客气气的，也就是说，有关党的事务，政府尊重党部，有关行政的事务，党部尊重政府。彼此间不是没有问题发生，而是有问题发生的时候，彼此照着上面的原则来商量，自然可以得到一个结果。不过我觉得这种相处的办法，还嫌于消极了一点。

省党部的实行主任委员制，是抗战以后党的组织上的改变，主任委员居于执监委员之上，是由中央命令派任的。浙江第一任主任委员是谷正纲，第二任是李敬斋，第三任是吴挹峰，第四任是罗霞天。这个改变，也许是中央感到委员制在战时有些不合宜的原故。中央复规定省党部主任委员须出席省政府会议，想来是为的加强党政的联系。但本省历任的主任委员，在会议席上仍旧是客客气气，没有积极的提出行政上的意见。彼此间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会外商量。

省政府与同级的军事机关的关系　省境内与省政府同级的军事机关，有战时的指挥机关，与平时的行政机关。战时的指挥机关多没有经常性的，此外还有临时到来的作战部队。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之下，省政府对军政的合作、军民合作的要求，特别加强。那合作的事实，在另一篇已有比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必费词。而在合作的理论上，我仍认为是双方的同意，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以前中央曾经颁布过军民合作公约，所谓公约，自然是大家同意的东西，而且是要大家一致遵守实行的。可是大家对于公约的意义，因为时间久了，而渐渐的模糊了。有好多的问题，渐渐变为单方的要求，而不是双方的合作了。我时常以男女恋爱与强奸来作比方，恋爱是合作，强奸是单方面的要求，恋爱与强奸，实质上是没有什么分别，而只是形式上的差别，强奸会使双方的精神上受到非常的痛苦，而且成为一个犯罪的行为。在浙江军政民军的合作，还算是好的。但这是比较的问题。长久同处在一个地方，彼此无论如何的努力，有时也会感到不十分满意

的。恐怕以后还得在形式上方法上加以改善，使双方更加愉快一些。

平时的军事行政机关，有全省保安司令部、军管区司令部、防空司令部。这三个军事机关的首长，规定均由省政府主席兼任的。也因为它与省政府及行政方面的关系太密切了，虽然表面上是平行的关系，而实质上却好似有些隶属的关系。象这种关系的军事机关，虽然由省政府主席兼任首长，在形式方面是联系得很密切的，但实际上仍有相当隔阂的地方。因为长官虽然是一人，机关仍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人的精力究属有限，尤其是在战时，各机关不能集中在一处办公，那里能处处照料得到？所以兼职的结果，并不见得加强了行政的统一与效能。往往一件公事，仍旧往来的签商，有时彼此意见相左，亦不免在纸面上打笔墨官司。彼此行文都是用某人的名义，而竟有矛盾冲突之处，岂不可笑？所以照我十数年来的经验，如果认为某一种业务，有它的独立性，则不如干脆独立，直属于中央。在民十四年以前，各省省长皆兼司法监督，但并不见得司法在行政首长监督的时期，就有什么好处。现在司法完全独立了，也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某种业务与省政府的一般行政有密切关系，决难分开，也就干脆隶属于省政府之下，与其他各厅处同样的为构成省政府组织的一个单位，由专任的首长——处长或司令来负责任，使责任分明，功过易见。省政府主席不必再兼什么名义，而有统率各部门业务的实权。这样行政的统一与效能，一定要比以前同级并行而兼职时好很多。我这意见不是今日才有的，二十八年参加中央全会的时候，我曾有过建议，呈给蒋先生，并在最高国防委员会通过，而未能见诸实施。这个建议的要点：是在省政府之下增加一个军事厅，厅长之下设保安、防空、兵役等处，或是将这三个处同隶于省政府，另加设一个参谋长来赞襄省主席对于军事方面的设施，他的地位与秘书长相同，不过一个佐理普通行政事务，一个佐理军事行政事务而已。现在我仍旧是这样的

主张，并希望我的主张能够实现。

省政府与省临时参议会　浙江的民意机关一省议会——自民国十六年以后，就中断了。抗战开始，中央为发扬民意勤求民隐并集思广益起见，于二十七年成立国民参政会。这好象是含有代替因战事而不能召集的国民大会的意思。各省临时参议会亦继国民参政会之后而陆续成立了。浙江的省临时参议会是在廿八年一月成立的。议长副议长由中央就参议员中指派，参议员则是由省党政双方会同推选加倍人数，报请中央圈定。因为现在一时尚不能由选民直接选举，所以采用这种过渡的办法，这也就是“临时”的意思。参议会的秘书长是中央简派的，他没有参议员的身分，而好象是政府派在民意机关服务的职员。本省临时参议会第一届的议长是徐青甫，副议长陈屺怀；第二届的议长是陈屺怀、副议长余绍宋；后来陈议长因病出缺，改派朱献文担任。临时参议会参议员本来是一年一选的，但是成立到现在已有七年，仅仅改选过一次。这固然是因为选举的实际上有困难，而因选举会引起许多问题亦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第一届参议员的任期延长了二年，而第二届参议员的任期更是一再的延长，希望展延到各县能直接选举省参议员，成立省参议会的那个时候。这不仅浙江如此，其他各省市也有同样的情形。

在省临时参议会初成立的时候，政方与会方在神经上似乎都不免有些过度的敏感，但是后来这些敏感就渐渐消失了。这也许是因为在战时有许多问题，都失去了常态，不是经常的办法可能解决的，彼此就相忍相让的敷衍下来。政府遇到了许多实际困难的问题，我只是坦白的承认或陈述。参议员都是地方上的领导人士，对于地方情形自然熟悉，所以许多问题，只是在彼此间获得一个谅解，而并不是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我尝感到我们负责行政的人员，对于民主精神的修养是太不够了，人家多说几句话，就觉得难为情，甚至弄成意气，酿成风潮，而缺乏接受与辩论的勇气。自然对方亦不免有同样的缺点。自从中央财政收支系统改变

之后，省政府的地位，在实质方面好似已不复存在，因而有人怀疑到省参议会是否仍有存在之可能。因为省参议会的对象是省政府，如果省政府的地位或实质消失时，它的地位自然也随着发生问题。直到卅三年十二月中央公布了省参议会组织条例，这种怀疑才算没有了。

省政府与高等法院　高等法院是省内最高的司法机关，司法独立是现代国家的通例。但是我记得大约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之后，才完全独立。并又规定高等法院院长出席省政府委员会议，这无非是使行政与司法保持密切联系，也就是由行政首长监督司法这个制度演变下来的形式。我想这种形式，至少在以前是有此需要，以后有无保留的必要，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浙江高等法院郑院长烈荪是浙江司法界任事最长久的人物，他自民国十七年就任高等法院院长一直到现在。他一向是出席省政府委员会议的，也可以说，他是出席省府会议历史最长久的一人，他好象是省府长期的义务法律顾问似的。所以浙江的行政和司法两者之间所发生的问题虽少，而行政方面得到司法首长的益处则不少。

我国现行的民刑法律，起草的时候，大多是以泰西各先进的法治国家的现行法典为蓝本，而现在我国尚在建国时期，情形特殊，好多地方是行不通，或不能适应需要，于是就制定了许多特种的法律来补救它。同时又产生了执行此项特种法律的机关——军事机关。所谓军法，并不是单独惩治有军人身分的法律，而尚包含了：中华民国战时军律，军机防护法，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汉奸条例，惩治盗匪条例，禁烟禁毒治罪暂行条例，惩治贪污条例，妨害国家总动员惩罚暂行条例等。尤其在战时这种罪犯非常之多，所以抗战以后，军法机关的组织，也成为全省普遍性的了。行政首长皆兼军法官，或是省内最后的裁判者，这样行政首长职权加重，自易滋生物议。我在前几年就同司法界的人士谈过，我认为废除特种法律，一时是不可能的，甚至有延长相当时期的必要。但是废除执行特种法律的机关，是可以的。就是

将这些特种的案件，由法院里面加设一个特种法庭来审理。但是司法界的人士，以为普通法院，仅能办普通法律的案件，特种的法律案件，不宜加入他们的责任之内。好了，中央于三十三年一月公布了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规定有关特种刑事案件，除军人为被告者外，均由司法机关审理，这个条例已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起实施，这正同我以前的意见完全一样。

在人民法律知识尚未普及的社会中，行政官吏的被控，一定是很多的。如果每次都要传他去审讯，即使他的罪案不成立，而对于工作的时间上与政府的威信上，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未得到妥善的解决。据我的意见，如果是关于公务执行上面发生控案，在某一级的政府，可以指定一个律师或代表人去出庭答辩，不必要行政首长亲自到庭，则司法与行政双方都可以顾到，但这仅是限于罪案未成立的初次审讯。如果罪证确实，或者其罪行是由本人负责，而与公务不相关的，当然不在此例。大多数行政首长，都以出庭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也有人主张亲自出庭的。前衢县县长梁济康，他以为县长如果亲自出庭，则案件一定容易剖白，而且可以使控告者心理上有所戒惧，并可减少诬告的发生，这也未尝没有相当的见地。

几次政治上的暗潮　政治上的暗潮，随处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恐怕再没有比战时的浙江发生得这样离奇了。我第二次来浙江，是廿六年的十二月，自从省政府由杭州撤退以后，在廿七年二月间，公布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并从事青年的组织与训练，团队的扩编，希望发动全民的力量，来保护这残余的省境。政府同人都是终日不停的在工作，决想不到会引起什么政治上的风潮。二十七年六月间，忽然接到中央方面的电报，说本任政府声名狼藉，要我切实注意。我接到这个电报，愤慨极了！因为我从政十几年，从来就未受过这样严重的责备口气。中央责备既然是这样严重，自然一定是我在私的方面或公的方面有什么重大的罪过。但是我自己检讨，到任仅有半年，所做的不仅仅是上面那

几件事，而且刚刚开始，尚谈不到任何的好坏。在抗战的头半年里，即使平日是个坏人，因为受到国家民族意识伟大的驱使，到那时候也要学学好。我自问并且检讨我们省府的同仁，都不致如此，那自然是另外的作用了。我将这个电报提出府会报告，大家都觉得有些奇异与难过，主张全体向中央辞职。我则以为这个责任，应由我个人担负，即由个人去电辞职。而得到的回电，却是慰留。内中有句："耳有所闻，乃以之告"。象是并没有谴责的意思。那一下冷一下暖的电文，弄得我啼笑皆非。我再去电请准到武昌面陈衷曲，并蒙允许了。我由金华坐汽车经南昌、长沙到武昌，作了上千公里新路线的长途旅行。在武昌晋见蒋先生，我仍旧将辞意陈述解释，但仍是慰留。有一日，我到东湖（武昌城东的一个大湖）武汉疗养院去访问李任潮先生，碰到院长米勒（美国人），他是我在湖北任内就认识的。那时他刚由上海来武昌筹建武汉疗养院。他说建筑经费大部份是张汉卿捐助的，不足之数，要到美国或在我国内地设法，要我帮助他的忙。因为武昌是我管辖的地方。经过一年多的工夫，这个疗养院的建筑完成了，其中的设备，也很完善。李任潮就住在那里疗养。我顺便请他检验身体，据说血压高了许多，但并不是生理上的变化，而是精神过度的紧张，或是受了刺激的原故，能够休养一些时间就好了。他欢迎我到院里住住，我很有这个意思。

东湖是武昌的新风景区，有清洁而幽静的湖水，武汉大学的西藏喇嘛庙式建筑与武汉疗养院的美国式建筑两岸对峙着，更增加它的美丽。沿湖已有很多富商大贾达官贵人在那里买地皮，建房屋。在湖北人的眼光中，将来的东湖要比浙江的西湖为好，它已把"东施效颦"那句成语，转变为正面的形容词了。

不久，李德邻亦因病由前方回来住在那里，白剑生有时来住住玩玩。那时正是武汉的夏天，热得可怕。我们终日乘小艇去乘凉，或是到湖水里游泳，心里颇为畅快，几不知前方的炮火声，和日夜的空袭，反觉得增加了不少旁观的兴趣。有一日，陈

辞修部长到来看我。他笑说："我来赶你出院，你们几个广西佬住在一起，外面滋生很多闲话，听起来有些刺耳。"的确，我们也接到香港方面的电报，有人造我们的谣言。因为李任潮闲着无事，我是呈请辞职，李德邻也许有人怀疑他是政治病。不久以前，我同陈辞修兄还闲话起这段趣事。他问我："你也把它写入五十回忆里面么？"我说："也写进去了，这也是值得回忆的笑话呀！"大家哈哈大笑。

我的妻子蔡凤珍，也由金华赶到武汉来，我本有电报给他，说我是不日就要回去的，但是耽搁的时候太久了，那方面的谣言很多，都是说我不再回浙江了。她在金华便住得不安，而自动的离开。我因辞职不准，终于要回到浙江来。但是我为便以后办事容易起见，把在浙江想办的事与应该解决的问题，作了一个节略，呈请蒋先生核批，大多数的要求都批准了。其中也有加指示或限制的，我自然是一一照办。这次风潮总算平息了，而民政厅长王先强却因而去职了，继任的是阮毅成。

事后，我才明白这次的风潮发生的原因，在表面上是为了我宣布那十条浙江战时政治纲领与组织青年的问题。而骨子里，则因有好些人见我太不顾一切的猛进，并与共产党的几个人太接近了，除了政工队收容若干中共分子之外，还有我在三月间出席本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曾访问周恩来。因为我曾在山西同他们一起作战过，我想知道些山西方面的情形。又有一次在李任潮的寓所会见了陈绍禹、秦邦宪、周恩来、叶剑英等。李德邻、白剑生也在座。此外。还有好多人。这次偶然的会见，好似事前约好了的样子。在那全国统一团结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的时候，同他们会面谈谈，本来是很平常的事，而他们的行动是时时有人注意的。因此我们的行动也被注意了。我想：许多谣言就从这里发生出来的，与王先强有什么相干？

我回到金华，工作仍照常进行，尤其是兵工与编练自卫团队，是更加积极了。在军方也希望地方多有些武力来补助他们的

不足。因为那时候，驻在浙江的国军，仅有几个师。在浙东的前哨，除了宁波驻有国军之外，其余的防务，自钱塘江南岸以迄平阳的沿海，都是地方团队担任的。所以每处的兵力，都少得可怜，装备和训练更谈不上。往往一个部队才编成，就要调到前方使用了。而我呢，仅是负建立团队的责任，作战指挥，都由军方主持的。设厂制造兵器，和编练团队，在地方人士直觉的眼光看起来，是浪费财力，增加地方负担。而在另一方面的想法，更容易引起恶意的误会——造成私人武力，破坏中央法令。

廿九年的春天，杭州的敌人乘着漫天大雪，我方部队戒备疏忽的时候，偷渡钱江，进袭南岸，占领萧山附近的桥头堡阵地，而担任守备钱江南岸的部队，正是抗战自卫团的第五支队，仅有一团的兵力，而且后方也没有支援的部队。不要说是地方部队无法守住一个敌人必攻的要点，就是更多一些有力的正规军，也未必就能守得住。不然的话，我们何必撤出杭州，退至金华？这并不是我为地方团队诿卸作战的责任，而是在整个战局中，都是一样的情形。作战的责任，自有军事指挥长官。要事后检讨，而判给部队长以应得之惩罚，在我个人自不能负这个责任。

同年五月间，省临时参议会开会的时候，萧山失守的责任问题，就成为那次会议的中心目标。好多人对此向我提出严重的质问。我除了答复他们所问的团队数目经费数字之外，对于战事失利的责任问题，我不好说什么，希望他们在实际上得到了解。因为我如果辩论起来，要暴露我们整个军事上的弱点，同时还要弄得各方面不能和谐。“萧山事变”是当时本省新闻上的一个大题材。而失陷者仅是钱江南岸桥头堡，南至湄池，东至广安桥的一个三角地区。这要名之曰“事变”，作为军事上一件大事来看，那么杭州之失守，又叫做什么呢？若果作为政治上的问题看，就可大可小了！据我所知，有人很想利用这个题材，作为有组织的政治暗斗，我也知道政治暗潮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既负了政治的责任，也想设法将一个波浪消灭，使它不致继续演变

下去，使国家和地方不致遭遇无谓的损害。在廿九年底，我就将本省的团队改编为四个师，由国军来接收指挥。三十一年又将兵工厂交由中央接收。这些次等装备的部队，及次等设备的工厂，能否增加一些国防的力量，抑或是徒然增加了国家的负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

三十年夏天，浙赣路的战事发生，敌人攻占绍兴、诸暨而到达义乌的苏溪。金华虽未有敌人到达，但是已经非常危险了。战事平定之后，有些人就以政治不能配合军事为题目，而大做文章。好象一切的失败，都要地方政府去负责。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就在这种涛浪之下，而受到了"文武同科"的刑罚。实在他并不负有指挥作战和防守警备的责任，（警备司令另有人负责同驻绍兴城）而仅是一个行政督察专员。有人说："他在绍兴被占领的那上半夜，还在戏院里听戏。"听戏或者是的确的。能不能成为他责任上的罪名，又是另一个问题。的确，我于绍兴沦陷前三日，才离开绍兴。我在那里，也曾经看过某军的"八六剧团"所排演的"绯色网"，你想，军方尚好整以暇的在那里演戏，行政人员自然可以放胆的去看看戏。我这种说法，并不是赞成前方毫无戒备的演戏，而是借此说明军政的责任问题。三十一年敌人的大流窜，受灾的地方更大了。事后对于行政方面的责难也很多。我也很坦白承认军事上的失败，基于政治上的因素很多，尤其是在战时行政上的缺点到处都有。但这是两方面的，若果单纯责备一方面，未免失之公平。我曾为此而引咎辞职，未获邀准。我想：若彼此都能严于责己，必能化怨怼为祥和，一定可以增加彼此间的谅解，所以三十一年之后，行政方面日渐得各方面的谅解。我当时去意甚坚，曾填有一首《兰陵王词》，倾吐我的抑郁。词云：

归鞭直，东望钱江碧。古越地，沦陷年年，西子湖山怎颜色？忠诚用报国，早识一官非客。疚心处，建树无从，江水绵绵愧千尺。　　频年按巡迹，记踏遍寰区，寝未安席。几曾杯酒手欢食，睹灾沴盈路，流亡载

道，何人宵寝有馆驿？骨肉隔南北。

恻恻，别离积，愿浙水澄清，风鹤声寂，远怀得慰浑无极！任桂岭樵采，牧牛横笛。满腔热绪，化万点夜雨滴。

有人以为这八年来的政潮起伏，由于我想把一个省的行政当一个国家来做。有些国家尚未公布或尚未进行的政策和政令，在省的范围之内，就不应该先中央而进行的。比如浙江战时政治纲领，虽然内容与抗战建国纲领没有多大的差别，但浙江先行颁布，就会引起很多的误会。走路打先锋的人，一定容易碰壁或倾跌，这道理是容易明白的。但是我想这是我一向的作风，有好多地方，即使我受了挫折，后来者还是可以得到成功。政治上的浪潮，总是有的，未必因为去了这些原因，就永远不会发生政潮。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中央及战区与邻省间的政治问题 以上所述，多为省内的政治问题，而中央及战区与省之间的种种政治问题，就我亲自经历的，也附带陈述一下：廿七年四月，在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我前往参加，到了武汉，想去看看汪精卫，先打一个电话给汪公馆，接电话的是陈璧君，她问我到山西去作战的情形怎样？并且说："如果打了胜仗，我好送花篮。"我说："自然啰，是打了败仗回来的啰！"我听了她的话，真有些莫明其妙，也许因为我在南京将要出发的时候，她们曾在陵园的公馆内为我饯行，并且送我一副望远镜。我打了败仗回来，她自然早已知道，现在拿这些话来奚落我，如果我到她那边去，也没有好话说，因此就不去了。从此我就没有同汪当面谈过话。这次临全大会有两大收获：第一是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确定抗战建国的最高国策。这个纲领固然是本党革命建国史上划时代的重要文献，亦为全国一致拥护与共同努力的明确指标。第二是修改党的总章，重建领袖制，蒋先生被全体出席人员一致选举为总裁，汪先生也被举为副总裁。选举完毕之后，蒋先生及汪先生都出来致词。汪穿了一件蓝色的纺绸长衫，一条白裤，和一双便鞋，样子非常尴尬，面部表

情非常沉闷，充分表示其内心的痛苦！他只说了一句话："此后当追随蒋先生与大家共同努力！"就退下去了。我觉得非常奇怪，汪氏一向动人的风度，今天忽然完全失去，而变成这个样子，不知他内心发生什么感触。同时我想到自总理逝世之后，汪在党内，一向不以第二人自居，是不是和这事有关系呢？等到二十八年十二月，他逃到河内，发表背叛党国通电，才知道临全大会选举总裁这一件事，便是最大的伏因。

二十八年春天，我同顾长官墨三、熊主席天翼等正在南昌集会，蒋先生忽然到来了，我们事前并未知道，当时对于军事政治均有所指示。有一天早上，我同熊天翼随他散步到励志社休息，趁便把浙江一年来工作情形，向他报告，大部分是表示首肯，有的还加以指正，最后我对于抗战建国这个大问题提出了一些意见。我说："中国的抗战，一时既未得国际实力的援助，唯有尽我们的全力与敌人周旋，使敌人能知难而退。然后再休养生息，彻底整顿，把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若果单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想把敌人完全击败，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他对于我所说"知难而退"那句话，非常注意，并且问我："知难而退？在我们，在敌人，是如何的限度？"我不能作具体的答复。而他却很明确的指示，使我们知道在那个环境之下，我们在军事上政治上的目的及其努力的方针。自然现在的情形和那时完全不同了。

三十三年我到重庆去开会，随处可以听到不满政治现状的言论，不但社会上如此，即党政内部，也是如此。有一日，蒋先生请各省主席吃饭，他问对于政治上的意见。我说："民众的意识多半是盲动的。这七年来，因为抗战的关系，国家所要求于人民者太重太多，他们积闷在心，稍有机会，即求发泄。这种发泄是无轨道的，无理由的，若果有人从中利用，则可酿成很大的风潮。举一个例，浙江的平阳县对于征兵征粮及推行各种政令，成绩都算最优等的，因为如此，无知的老百姓，就被人利用，在短时间里聚集了好多人，以抗兵抗粮为口号，而实行轨外的暴动。

国内类此的问题很多，都得善为处理，然后政治才能安定，否则亦可因此而成为更大的横决。”他对我的意见，颇以为然。

在一个战区里，或省与省之间，这些政治问题也很多，都得去奔走疏通。因为有许多涉及战区各省的政治问题，不是中央的法令所能解决的。尤其是军方与政方的立场和看法，不免有不同之点，容易发生纠纷。以前在本区最高军事机关设在皖南，就得时常到那里去走走。其实见了面，也没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中国向来注重公文书，在公文往来上，往往为了一个字或一句话的欠斟酌，生出许多无谓的枝节，这都是承办人员没有了解主官意旨所发生的毛病，如果双方主官见了面，则事事都易解决了。在屯溪，我们时常爱到上官纪青（云相）总司令的小房子里盘桓。那里有很多合抱不交的大树，阴凉得可爱！我问他："在这童山濯濯的地方，为什么还能够留存这许多大树？"他反问我："这是什么树？"我说："不知道。"他说："这叫樗树，这叫栎树，古人说'樗栎庸材'，就是指没有用的意思。这种树既不能作建筑材料，又不能作燃料，就是因为没有用，才能保留下来，不然早被人砍光了。"我听了他的话，憬然彻悟中国黄老学说之所以盛行的缘故。消极的人生观，固然是明哲保身的好办法，然而毕竟不是值得提倡的民族精神呵！

省与省之间，数年来最苦的莫过于粮食封锁，与边区治安这两个问题。浙江是缺粮的省份，自然希望余粮的邻省粮食的开放。但虽有中央的明令及我们人民的请求，都不易达到目的。原因是邻省虽有余粮，但他们要存储备荒，而且怕粮食外运以后，会刺激本地粮价的高涨。纵然省方已交涉好了，县里仍旧封锁。并且用人民团体的名义来抵挡，所以弄得一方面快要饿死人，而另一方面的米却没人要。龙泉的米价比浦城高出三倍，可是除了龙泉人迁移就食之外，就不易吃到便宜的浦城米。所谓刺激粮价，自然是一个说法，但这是办公文和没有粮食生产者的话，而大多数的农民，何尝不想他的生产品多卖几个钱呢？边区治安，

向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原因是相邻的各省政府，对其边区，均有鞭长莫及的情形。亦可以说是彼此都有不十分负责的情形。所以一旦发生了治安问题，就要在边区专设一个机构来负绥靖之责。其实这种机构，能否达成任务，亦很难说。我以为这完全是相邻各省治安当局的责任问题，中央如果责成双方切实负责，自可协同解决。若是另设机构，专管其事，不仅浪费公帑，于事无补，而且重床叠架，愈增纠纷，也是不合理的事情。这些省际间的政治问题，随时随处都会发生，这里不过略举几个例子而已。

廿二　战时行政举要

两个三年计划　“战时应作平时看，平时应作战时的准备。”这是蒋先生自抗战军兴以来屡经告诫全国军民的两句名言。这次民族自卫的对日抗战开始时，我们就预测到不是三年五年可能结束的。廿七年中央颁布抗战建国纲领，诏示一面抗战一面建国的双重任务。廿八年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揭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三大目标，基此所述，我们的工作不仅要配合军事需要，争取最后胜利，并且要积极从事军事性的各级建设，俾在长期抗战中奠定建国的基础。同时又鉴于抗战以来地方政治表现的一般缺点，为临时应付者多，而有整个计划者少，驯致任何事情，只为消极的被动的措置，鲜作积极的主动的筹划，以致事业进展迂缓，工作效率低微。因此我于廿八年十一月，召开全省专员县长会议时，特提出“制订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一案。计划的内容，包涵转移社会风气之精神部分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之实际设施部分两大体系，并以（一）民主精神之培护，（二）民生主义之实施，（三）攻势政治之展开，为政治总动向上必须遵守之原则。俾以新的政治，转移社会的风气，以新的社会风气促进政治的成功，根据这些方针，制定纲领十二条，以为确定计划的准则。兹将这十二条纲领附录于下：

（一）以建设浙东、收复浙西，完成抗战建国之各项基本工作，实现三民主义之新浙江，为本省三年施政计划之总目标。

（二）转移社会风气，创造新的政治环境，强化人民之国家民族意识，使共同了解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真义，为完成三年计划之基本精神。

（三）根据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原则，一切政策措施，以配合军事需要为主；同时运用民主方式，力求意志之集中；运用科学方法，力求力量之集中。

（四）从人民之日常生活上，加以科学经济之指导与管制，使养成卫生科学知识，以保育民族之健康，破除迷信倚赖观念，提高创造奋斗精神，实践战时生活，以适合于现代之生存竞争。

（五）政治建设，以实施县各级组织纲要，完成地方自治，实现民权主义为中心；首谋基层政治机构之充实与各级民意机关之健全，在三年期内，政府须克尽训政责任，以树立宪政规模。

（六）经济建设，以发展国民经济，实现民生主义为依归；首先完成本省自给自足之目的，以准备长期抗战之需要，一面积极采用政府管理统制办法，完成国家资本之创造，以谋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之实现。

（七）军事建设，以完成征兵，自卫、充实国防为目的；以提倡社会尚武奋斗精神，促进军民切实合作与完成国民兵组训，为基础工作。

（八）教育文化之建设，以扫除文盲，普及国民基础教育为中心，并针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之各项需要，力求普遍发展与一般水准之提高，为确立三民主义之建国思想而努力。

（九）财政建设，首将省县财政之基础，清理公款公产，以增加地方收入，举办公营公卖事业，以裕库收，发展地方经济，以培养税源。

（十）游击区域各项设施，应针对敌伪一切阴谋，运用

全力，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予以有效之打击，以争取民众，收复失地。

（十一）严格实施人事管理，规定行政人员异动时期，以保障事业进展，并收人尽其才之实效。

（十二）按照实施三年计划之实际需要，培养必需之人才，分期训练，以提高各级干部质量。

这一个三年施政计划于二十九年一月订定颁布，至三十一年年底届满。在这三年中，敌寇流窜频繁，在沦陷地区，并不断的“扫荡”“清乡”，以致预定的各项目标，未能一一见诸实行，日积月累的工作成果，亦遭受摧残。但纲领中规定的重要节目，经全省工作同志的共同努力，无不循序进行，且已收获若干效果。可是原定计划的优点和缺点，究属如何？执行的成败如何？尚未实现的事项是什么？必须有坦白率直的检讨，以为以后改进的张本。三十二年二月召开的全省行政会议，对于这个检讨工作尝列为会议的中心之一，经聚会同志的缜密审查，提出详尽的报告，其政治设施部分，并列举各项确实数字，全文冗长，这里只摘录其结论，以见一斑。

三年计划之实施，虽未完全成功，已有若干收获，其未实现之工作，半由于环境之变迁，半由于人事之未尽，而一般行政人员，尚未深切体会计划之重要，着力奉行，尤为重要之原因。夫以今日省县行政工作之繁杂与责任之重大，已千百倍于往昔，乌可漫无计划，因循将事，更乌可浅视计划而掉以轻心。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亡羊补牢，当为未晚。际此最后胜利接近之时，亦为极大难关待度之日，亟宜依据以往种种经验，接续三年之成绩，重新拟订三年计划，并重视其实施，以竟前计划未竟之功，而成省县应兴应革之大业。

根据这个检讨的结论，决定续订第二个三年计划，当时曾有人说：中央修正财政收支系统法后，省的地位，已有变更，省地方之行政设施，一唯中央的政策与法令为依归，而不容有歧异的倾向。

现在再来订一个省单位的计划，不免失之多余。这话，表面看来，似亦有理，但省地方的施政，因处处不能脱离中央整个政策与法令之范畴，而审酌地方特殊情况，规定办法进度，亦自有其因时因地制宜的必要。况且战时省行政的繁杂与其责任的艰巨，已甚于往昔，倘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循应付，又宁有不覆馃贻饥之理？

这个第二次三年计划的拟订，仍是一本本党主义与中央政策及配合本省现阶段在地理上军事上之情况与要求，并继续第一次三年计划有关精神与政治建设各部分未完成之理想，确定为下列十一项中心工作：

（一）建设乡镇，充实组织，发展造产，以巩固新县制之基础。

（二）整理地方税捐款产，以充实自治财政。

（三）普及国民教育，加强师范及职业教育，注意社会教育，使人人识字明理，知礼守法，服从领袖，爱护国家。

（四）灌输人民之科学知识，提倡研究，奖励发明。

（五）垦殖荒地，推广良种良法，力求粮食之自足自给。

（六）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掌握物资，合理分配，以达到物价管理之实效。

（七）强化运输组织，增加交通工具，以增进运输之力量。

（八）充实自卫武力，加强民众组织，以确保社会之安宁。

（九）普及卫生常识，改善人民营养，以保证健康而促进其生存乐趣。

（十）鼓励出征，优待征属，以充裕抗战之兵源。

（十一）赈恤灾难，抢救游击区青年壮丁儿童。

十二项施政原则 三十三年七月，长衡战事失利，日寇大举向粤汉湘桂线进犯，企图打通所谓“大陆交通线”，遮断我东南各省与中央的交通。当时我默察情势的严重，特邀集党政军民意金融税务机关的首长，在云和举行座谈会。我首先说明当前军事形势，判断以后演变的趋向，并郑重宣述：万一敌寇占领了粤汉路湘桂路，使我东南地区与中央交通隔绝，我们对于中央的向

心力必须加强，绝对不许有利用恶化的形势而作遂行个人意志与个人利益之行动。对于中央的政策政令，尤须贯彻实施，不容稍有瞻顾敷衍之情事。对于驻省之中央税收金融机关，遇有困难，必须予以协助，使税收旺盛，金融稳定，而无碍各项费用之支付。我们在省的党政军民各首脑部，必须密切联系，组成一坚强的战斗体，以加强领导力量，渡过当前难关，静候有利形势的到来。我说完了这一番话，就提出亲拟的十二项施政原则，大家都表赞同，即由省政府命令公布。兹附录如后：

（一）浙江省在抗战建国现阶段之一切措施，确定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争取军事最后胜利为最高准则，故省境内之党政军各首脑部门，必须密切配合，使组成一坚强之战斗体。

（二）凡有利用因交通阻滞致中央政令未能普及深入之新形势，而冀图作遂行其个人意志与个人利益之蠢动者，党政机关不特对于此种行动应加绝对之镇压制止，尤须对于今日最艰苦时期之情况及中央之方针，与人民应有之负担，加强宣导，使其明瞭当前形势，与本身责任，以杜绝此种离心心理之发生，进而巩固其对中央之向心力量。

（三）党政机关之行动，必须轻便敏捷，俾与军事行动相配合，尤须领导人民，加强其对于军队物质之供应与精神之鼓励，俾由军民之密切合作，以期民气发扬，士气旺盛，作共同最后之奋斗。彻底消灭省境内之敌人。

（四）党政军各级机关，对于本身业务之责任，与应守之纪律，必须更加注意，随时检讨，尤贵彼此互相督责，养成自动自发自立自强之风气。切不可因中央或上级机关监督未周而不尽责任，或违法乱纪，并须积极提高最后斗争之精神，根绝玩法渎职贪污之事件，其由人民舆论负责检举者，必须彻底查究，依法惩处。

（五）各级政府人员，对于中央饬办之兵役、粮食、

储蓄、公债等战事要政，务须深体中央意旨，国家需要，及本身责任，加强其努力，以期政令贯彻，成绩进步。

（六）各级民意机关，在此艰难时期，对于人民，须尽其积极领导之责任，并积极匡正政府之措施。

（七）中央驻省之税收金融等机关，除加强其本身应有之努力外，遇有困难时，地方各级政府与人民，必须尽力为之协助，并予监督，使税收旺盛，金融稳定。

（八）各级行政机关，对于本身机构，须加调整，组织力求简单，人员力求减少，俾能适存于最艰困之环境。上级对下级之指挥监督，必须执简御繁，减除不必要之手续，注重实际上之考察，以增进行政效率，下级对上级功令之奉行，在上级授权范围内，可因地制宜，如有超越妄为，加重其处分。

（九）各级行政干部之选用，以具有行政经验富于冒险斗争精神而体格健全能耐劳苦者为上，除现任干部须力加锻练外，尤须鼓励并训练青年奋发向上，任最后斗争之工作。政府对于各级工作人员，不仅要求其服务之成绩，并须严密防制其在工作程序上有苛扰事件之发生。

（十）政府为改善各级公务人员之生活，必须掌握实物，作合理之分配，以免受物价之影响，而减低其工作效能，尤须实行集体生活，集团生产，以减轻其担负。

（十一）各级政府对于税捐之征收，须注意不苛扰，不中饱，款项之开支，须注意不浪费，能公开。

（十二）省县区之团队武力，须力加充实，认真训练，以期素质坚强，切合实用。军风纪之整饬，尤须特别注意，各区自卫武力，并应统一指挥。

这个施政原则公布以后，我为使全省工作同志及全体人民深切了解其意义，又亲自撰文阐释。当时的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敌人于占领衡阳后，继续西进，一度冲进贵州大门，粤汉路南段亦被打

通，并占领赣州，使东西交通，发生极大障碍。在浙江方面，敌人由武义窜丽水进占永嘉、乐清，使偏安的浙东陷于支离破碎的局面。而在这种艰危的局势之下，地方秩序尚能维持常态，各项战时政令，尚能循序进行，前述这十二项原则，可说是发生了相当的安定作用。

行政督察制度之演变 本省的行政督察区，建立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间。我重来浙江之初，浙西各县，大部沦陷，为适应新形势之需要，特制订“浙江省战时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保安司令部合并组织暂行办法”九项，其中规定专员公署，区保安司令部统一组织合并办公，称为“第几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保安司令部”。所有公文政令，均以专员兼司令名义行之。预算亦合并编造。并将原来第一、第二、第三三区辖县重行划分：第一区辖余杭、新登、分水、临安、於潜、昌化、孝丰、安吉、长兴九县，专署驻於潜。第二区辖杭县、嘉兴、嘉善、崇德、桐乡、吴兴、德清、武康八县，专署驻德清。第三区辖绍兴、萧山、诸暨、富阳、余姚、上虞、嵊县、新昌、海宁、海盐，平湖十一县，专署驻绍兴。二十八年冬、复将这三区的辖县变更；划於潜、昌化、分水、临安、杭县、余杭、新登、富阳、桐庐为第一区，专署仍设於潜。划吴兴、长兴、德清、武康、安吉、孝丰为第二区，专署设安吉。划绍兴、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为第三区，专署设绍兴。并新辟一区为第十区，辖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海宁、崇德、桐乡等七县。三十一年一月中央颁发各省专员公署及保安司令部合并暂行办法，其规定与本省前订九项办法完全符合，不过署部名称改为“第几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公署”而已。是年夏，敌寇大举流窜浙东以后，陷区扩大，各区辖县复加调整。三十二年五月又增设第十一区。现在的行政区域，列举如次：第一区杭县、余杭、临安、於潜、昌化、新登、分水，署址设於潜。第二区：安吉、孝丰、吴兴、嘉兴、德清、武康，署址设德清。第三区：绍兴、萧山、诸

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东阳、义乌、磐安，署址设新昌。第四区：金华、兰溪、永康、宣平、汤溪、武义，署址设宣平。第五区：衢县、开化、遂安、江山、常山、龙游，署址设宁海。第七区临海、黄岩、仙居、温岭、三门，署址设临海。第八区：永嘉、平阳、瑞安、乐清、泰顺、玉环，署址设永嘉。第九区：丽水、龙泉、遂昌、青田、缙云、嘉宁、庆元、松阳、云和，署址设丽水。第十区：嘉兴、嘉善、海宁、海盐、平湖、崇德、桐乡，署址设海盐。第十一区：富阳、桐庐、建德、淳安、寿昌、浦江，署址设淳安。

行政督察专员制，始行于二十一年南昌行营所辖的军事区域。二十五年三月行政院通过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暂行条例，始成定制，普行于全国各省。创行这个制度的主要意旨，在补救省政府监督指挥的不周，以加强行政效率。因为我国现行的省区，范围太大，以一个省政府监督全省各县。其他各省姑置不论，即面积最小的浙江，亦有很大的困难，我们体会创制的精神，认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的任务，关于军事方面，固应统一调遣区内的自卫武力，以确保地方的治安。而关于行政方面，应以辅导督察为重点。换言之，专员对于区辖各县的施政情形，要随时严加督察。推行政令如有困难者，应辅导解决；如发生瑕疵者，应即予纠正。务使区内各县政治均能遵循国家法令齐头前进，不致参差过甚，或发生其他不良情形。同时，对于区辖各县的社会情形，要随时缜密考察，尤贵能深入民间，探求民隐，搜集各种资料，详为分析研究，以供各级施政之参考。抗战军兴以来，行政督察专员制度虽屡经演变，但制度的精神，并没有逾越这个范围。我每次出巡，必指示各区专员本着上述的意旨做去，并以此为考核的准则。因为这个制度实施上如稍不注意，很容易发生两种不良的倾向：（一）不愿多做事的专员，必使专员公署成为一个消极的公文承转机关，不仅不能促进行政效率，反因公文承转关系，使工作愈加迁缓，虚糜公帑，犹为小事。（二）勇于负责的专员，必运用其职权，建立本身的事业，形成省县之间的一个

行政实体，与国家创制的原意大相迳庭。

新县制的实施 二十八年九月，国民政府颁布了县各级组织纲要，重新确定了县的制度，在我国地方行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般都简称它为新县制。新县制的产生，由萌芽到公布实施，经过一年半的时间，自二十七年四月，蒋先生在本党五届四中全会发表“调整党政关系与下级机构改造案”的演讲之后，我们对于县的组织之调整，即着手研究，并决定调整原则，指定新昌、永康、龙游三县先行试办。纲要颁行后不久，即召开全省专员县长会议，对于新县制的实施，曾经详细讨论，决定遵照中央规定自廿九年起，无分敌后、前方、后方，同时普遍施行。中央原定新县制实施的完成期限是六年，后来又改为三年。三年的期限早已过去，第二个三年又快届满。其他各省实施的成果如何，不知其详。就浙江说，我们考查的结果，在表面上看来，虽勉可交卷；但严格说来，与国防最高委员会曾规定的地方自治实施方案中十四项地方自治条件及其完成标准，还有着相当的距离。除了本省地处前线，常受军事动荡影响，为其重要原因之外，也还有其他的因素存在。

新县制实施成效不著的几个原因 第一是财政问题。实行新县制，完成地方自治，在在需要大量的经费。县各级组织纲要中对于县财政，规定有八项收入，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土地税之一部（即在土地法未实施之县各种属于县有之田赋附加金额）。本省各县田赋附加额，原来占全部赋额（正附合计）百分之六十八，为县预算之大宗收入。在田赋未由中央接管以前，要推进地方自治，经费仍感极大困难，于是另辟两大来源：（一）比照田赋标准，代收四成自治经费。（二）比照营业税标准，代收二成自治经费。由省统筹分配，总算勉足应付。各县自治工作，也能循序进展。可是从三十年以后，田赋由中央接管，并改征实物，这四成自治经费，虽仍在改征之列，但已被统盘收支，而中央拨补各县的只有全部赋额百分之十五，并且不是实物而是

按官价折给法币（按今已请准自三十四年起改拨实物）。至于加收二成之营业税，亦因营业税法修正，不能再行代收。因此浙江各县的自治经费大受打击，一切自治工作，亦无法按照预定计划做去，这还是就财政本身而说的。至于工作方面，照纲要规定，县的职权，分为自治事务与中央及省委办事务两项，前者所需经费当由县自行负担，后者所需经费自应由国库负担。在地处前线的浙江各县，承办的国家事务至为繁重。举凡破修道路机场，建筑国防工事，运输军粮军实，乃至征兵、征实、募债等，支出费用极为浩繁，实际得到上级补助的款项为数甚少，大部分均为地方临时筹派。各县一方面因忙于国家委办事务的处理，另一方面又因负担此项巨额之经费，自治财源大受影响，以致地方财政隐伏极严重的危机。乡镇为法人，这是新县制的特色之一，乡镇既取得了法人的资格，自应有独立的财政，以便兴办各项自治事务。纲要中规定的五项乡镇财政收入，自治基础还没有巩固，自治事业还没有发展以前，这五项来源也都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央便有乡镇造产办法的公布。本省根据这个办法，订定实施细则一种。规定造产事业十二项：（一）公有农场，（二）公有林场，（三）公营小工业，（四）公有厕所粪寮，（五）公有畜牧场，（六）公有市场，（七）公有屠场，（八）公有水车、水碾、水磨、水坝，（九）公有池塘，（十）公营小矿业，（十一）公营交通事业，（十二）其他公共事业。我到各地巡视的时候，对于乡镇造产事业极为注意，考查的结果，没有可以使我满意的。我想这不能完全责备办理的人，因为在土地政策没有彻底实行和乡村没有工业化以前，要谈到乡镇公共造产以建立乡镇财政基础，是不大可能的事。

第二是干部问题。实施新县制，首先要使县的各级干部对于新县制的意义与实施方法有深切的认识与充分的了解。中央为配合这个要求，特建立干部训练制度：各省均设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由省主席兼团主任，以调训各县高级干部为主体；各县均设

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由县长兼所长，以调训乡镇以下的自治干部为主体。这原是很合理的措施。可是考诸实际，因为我国教育文化落后，尤其是战时各级干部资质水准的普遍低落，一个月或二个月的短期训练，并不能收获显著的效果，这还得从教育上作根本的努力。就是说，我们一方面要以全力谋国民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应在各县普设中等学校，造就中下级的自治干部（管、教、养、卫各种干部均可包括在内）。此外尤须切实建立人事制度，提高县各级干部之待遇。我对于各县人事，素主安定，不轻易更动。二十八年以后正式实行县长定期异动的制度，非有过失或其他原因，不在年度中间更动，并奖励久任。因为各级机关的主管每经一次更易，其业务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县的事务，真是千头万绪，县长的更调，于县政上的损失更为重大。分水县长钟诗杰是二十一年六月到任的，到现在已整整的十四年了。恐怕是全国县长中任期最久的一个吧！有人说笑话："分水全县的老百姓家里，每天有什么婚丧喜庆，钟县长都可以说得出来。"这固然是一句戏言，而他因为对于县境情形的熟悉，与地方人民相处的长久，县政工作的推行上确实减少了很多的困难，可是由于县各级干部待遇的微薄，其人事流动性之大，与素质的欠整齐，也和其他各地相似，因此仍不能有卓越的成就。现在本省各县县级公务员的待遇，一般不及省级待遇四分之一，县以下的乡镇保各级自治干部，更不堪言状了。今年浙江各县预算上，乡镇公社办公费最高的每月不过一千二百元，保办公处办公费每月不过五百元。在战前有人形容保长待遇之苦："管、教、养、卫四件事，纸墨笔砚一块钱。"现在保长要做的事更多更苦了，而所得的还不及战前的一块钱（照物价八百倍申算，战前一元，现在应是八百元）。县级干部待遇微薄如此，县以下的各级组织经费困难如此，有德有能的人，岂能安心于位？又怎能要求他们把国家事务办得很好，又把自治事务也办得很好呢？

第三是组织问题，县各级组织纲要第十三条："县政府组织

规程由各省省政府订定报内政部转呈行政院核定，县政府组织规程所无之机关，不得设置。”这是统一组织、集中事权的一个重要规定，也可以说是新县制的精髓所在。可是纲要颁行不久，县政府以外的组织，又陆续增设，而不是省政府订定报经中央核定的县政府组织规程所能否定的。以浙江今日的实际情形来说，与县政府并行的机关，有国民兵团、田赋粮食管理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所、补给分会、军民合作站指导分处、优待出征抗敌军人家属委员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及各种临时性的委员会，多至不下一二十个。往往在一个县政府的门前，形形色色，挂满了各种长短不一的招牌。虽然这些机关的首长，多由县长兼任，但在行政的系统上说，是破坏了县政的统一性。而且有时候，这同一个人担任首长的各个机关，仍不免发生意见上的冲突，这正与我在“省政府与同级机关的关系”一节上所说的情形一样。我的意见，上面所举的骈枝机关的业务，通统可以归并到县政府有关各科，或另行设科去办理；如果县政府另设专科还办不了的，那也可以仿照警察局的情形，在县政府之下，设置专管机关来办理。有些临时性的特种事务，必须运用群力组织委员会来办理的，一俟事务办毕，立将机构撤销。这种委员会的首长，非十分必要，不应由县长兼任，以免分散他的精力。至于尚有若干事务的进行，必须随时公诸地方人士知道，或征询地方意见的，现在各县已普遍成立民意机关，只要随时提出报告就是了，也不必专设机构。务使全盘县政，纳于县政府的一个系统之下，由县长统率起来，以达成组织统一事权集中的要求。

战时财政的困难及其解决的办法 浙江财政，战前素来是困难的。在朱主席骝先任内，曾经一度的整理。主要的办法是借新债，还旧债，借大债、还小债，减轻利息，延长还期，总算得到一时的宽裕。但自抗战军兴，杭、嘉、湖是浙江的财库，这三属的赋税收入，在总收入上要占到半数。也就是说：杭州失守之后，省财政的收入，减少了半数。而支出呢？因军事的关系，反而

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形之下，将来怎样支持下去？财政的负责者，自然感觉得万分的困难。于是财政厅长程远帆辞职了，继任的是黄祖培。整理财政的办法，一向是“开源节流”四个大字。他接事后，自然也只是照这四个字的原则做去。省府撤退到方岩之后，在首次省政会议席上，我就提出：不论文武官吏，最高的薪水，不能超过一百四十元。当时大家体念时艰，贡献抗战，无异议的一致通过了。同时各机关对于不必要之开支，亦竭力节省，这算是节流的工作。固然在这一方面收到了相当的效果，但来源减短得太厉害，而军事上的支出，又陆续的增加，事实上仍多困难，于是不得不在开源方面积极设法了。

办理食盐运销 浙江沿海是产盐的地方。散在沿海的盐场，如余姚、黄岩、乐清、永嘉、瑞安、平阳、玉环等，平时管理食盐的产销，已经不易。往往因走私缉私，盐务当局与人民之间，起了不少的纠纷，政府亦增加不少的麻烦。军事发生之后，缉私更属不易。而且盐商停运了，盐场所产的盐，无法销售，盐民因失业而发生生计的恐慌，内地各省因无盐而感受淡食的痛苦。盐务机关的税收更大大的减少。这种情况若延长下去，国计民生，都要受到很大的影响，我与两浙盐务局长周三农商定，由省府与盐务局，合资五百万元（两机关各半）设一食盐运销处，将各场所产的盐尽量收购，负责运输，由本府许委员蟠云主持其事。这样一来，盐的税收增加了，盐的产销畅旺了，但是问题也随而发生。以前运销食盐的盐商，在局势困难的时候，裹足不前，保存他的资本。盐民失业，人民淡食，他是不负责任的。到了时局稍定，有利可图，他又出来为他私人的利益而来争夺和破坏了。在财政部方面呢，则以为这是中央的业务，地方不应该参预办理，亦表示不满之意。但已成的事实，一时又不能即刻撤销。于是将食盐运销处改组为食盐收运处，由部派两浙盐务局长当处长，省方派石楚琛充当副处长，处长是部方委任，省方加委；副处长是省方委任，部方加委，弄成一个欲分而勉合的组织。我也知道这个组积

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但是收运的业务仍可很顺利的进行。不久双方的资本，都收回来了，业务仍不断的发展，不但解决了浙江盐民的生计问题，而且还救济了江西、湖南一部分的盐荒。而盐的销量及税收的增加，都打破了以前的纪录。到了三十年，盐务总局缪总办特地到浙江来同我商量，提出结束分伙收回自办的意见。当时我考虑之余，认为若坚持下去，地方与中央必加深误会，而且本钱已经收回了，剩下的盈余及财产，还值数千万元，若永不分拆，于省方财政，亦无多大好处，好似养一个大肥猪，若不杀了它，终归得不到猪肉吃。于是我就决定杀猪吃肉的办法，同意他结束分家的提议。拆伙结果，省方除得了二千多万元现金，还有许多财产与工具。我对盐务当局说："你们上当了"。

实施专卖制度 专卖制度各国早已实行，我在广西也举办过卷烟专卖，曾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也是战时财政开源的好办法，于是就从火柴、卷烟两项先行着手举办，将进口或土制的火柴和卷烟，由省政府统制起来，将商人或工厂贩卖或制造的成本计算出来，再加上他们应得的利润，把成本和利润给予商人，这些商品——火柴、卷烟就算是政府的了。政府加上专卖费，并指定零售商去销售，自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收入。其实专卖制度，不过是政府财政上两面刀的办法：一方面把制造厂商或第一次的贩卖商的利益限制了，不使他们获得过分的利益。一方面把消费者的负担增加了，使他们在这必须的消费品里面，不能不增加一些支出。政府就在这两方面获得大量的收入，这就是专卖制度的内容。如果专卖机关对于专卖品的生产成本及第一次贩卖成本计算不精确，则厂商和贩卖商仍有法子将"假成本"增加上去，而得到他们所希望的满足利益。结果，一切的负担，都增加在消费者的身上了。所以专卖事业办得不好，就无异变相的增税。或者比增税的效果还要不好。当我们初办的时候，自然有很多人反对，尤其外国的烟厂或烟商，反对最为厉害，他们并请求其大使馆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议。中央对我们也打了不少的官话。但是外商的特

殊势力，因为中国的抗战而大大的减少了，也许他们因为同情我们抗战，而退让了。抗议尽管抗议，专卖依旧专卖。这两项专卖事业举办以后，浙省的财政自然得到很大的帮助。我在武汉，曾将浙江办理专卖的成效，向在中央负税务责任的朋友吴君说过，并询问他："中央为什么不实行专卖呢？"他说："战事一二年内就可结束，多发行些钞票就可应付，何必多找这些零零碎碎的麻烦。"我听了不觉愕然。三十一年中央财政当局亦决定实行专卖政策，我又觉得专卖事业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不会得到很好的效果。果然，实行不过二三年，现在又把它取销了。不知是不是犯了我前面所述成本计算不精确的原因而得不到良果的，那我就无从知道了。

实行田赋征实 战事延长，货币的价值日渐低落，物价日渐上涨。其他的税收，可以采用从价征税的办法，以为补偿，但田赋则仍是照税额征课，不但政府的收入减少，而地主在战时的负担，反比战前减轻了。这真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我在二十九年赴重庆出席中央全会的时候，就提出田赋征实的议案，当时在审查会里争论了很久，才把原则通过了。我回来之后，就想把这个决议案付诸实施。但是因为种种的准备——如仓储、运输、配给等——来不及，只是将赋额折米，又将赋米照市价折征法币。可以说当时浙江的田赋征实，是征实价，不是征实物。而福建倒是最先实行征实的省份。我想他们一定遇到很多开创的困难。三十年，这个征实案中央规定全国普遍实行（沦陷地区折征法币），开始的困难，各省自都不免。而时间愈久，积弊愈多，好多人都归咎在制度上人事上的不良，而忽略了物质设备的缺陷。如仓储问题、衡量问题、包装容器问题、运输配给问题，都是予经手者以舞弊的主因。这几年来人民在这几个问题上面，不知受了多少苦痛？"当娼不如从良"的谚语，好似都从粮制粮人发生出来。而我的见解，凡是一种良好的制度，若没有良好的物质设备为之辅助，是无法彻底实现的，岂但粮政而已？

其他各项税收，无一不予积极整理。尤其是对人民纳税的宣传，与税务人员的调整——遴选高中以上的知识青年办理税务。我们的口号是："纳税是人民抗战中重大的贡献！""多一分收入，即多一分力量！"大家在这两个口号之下，尽其最大的努力。所以自廿七年而至三十年间的省财政收入，是年年增加的。战前（廿六年）预算是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廿七年是一千八百另六万，廿八年是四千二百四十三万，廿九年是六千二百六十五万，三十年是八千另六十一万。所以当时的财政，并不觉得困难，反较战前为充裕。这也是战时地方财政稀有的现象。

财政收支系统变更后的财政情形 三十年夏，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我也前往参加。这次会议，对于财政有重大的决策，即是改订财政收支系统法，划整个财政为国家财政与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国家财政，除以往原有的范围以外，并包括省级财政在内。换言之，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系统里面而不复单独存在了。省的赋税收入，全部由中央接管，省的支出，由中央统盘支配。此种决策，不但在战时有此需要，即在平时亦属合理的制度。因为战时各省的财政，尤其是沦陷的省份，已陷于崩溃的状态。而支出浩繁，若不设法补救，则旷日持久，势将无法维持。即使战争结束以后，由于各省富力的不均，其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部门的进度，必参差不齐，在今后建国的过程中，似不宜再有此等畸形的现象，而应力求平衡的发展。所以中央此种根本大计，是很正确的。只是改制后，中央核定各省预算额，于实际上不免有不甚合理的地方。试以浙江而论，廿六年的预算是二千四百余万元。若以币值五百倍来伸计（本省目前的物价一般已达千倍左右），本年度（卅四年）应为一百二十亿元；即以一百倍来伸算，亦须二十四亿元。可是卅四年度的浙江预算，中央核定仅为四亿五千万元，较廿六年度增加不到十九倍。而本省同年度各县预算总额，则较战前增加一百六十倍以上（战前——廿六年度全省各县预算总额为一千九百八十余万元，卅四年度为三

十四亿六千八百余万元）。据我所知，全国各省政府预算合计起来，尚不及中央一部或一局之多。以分管全国四亿五千万人的各省政府，只此微薄的支出，而且战后工作人员增加了，事务繁重了，怎能应付裕如？

县级财政——即自治财政——形式上虽没有改变，但实质上已远不如前，而岌岌可危！因以前各县的大宗税源，都是田赋的附加。过去本省田赋正附总额的百分之六十八即为各县所有，自中央接管田赋改征实物以后，每年就实征数提拨百分之十五补助各县，数量较前减少百分之五十三。加以拨给各县者非实物，而为法币，实物折币的价格又极低（今年以谷每市石四百五十元计算，而各县市价最低额则为二千元）。拨付的时间又常拖延，现在县里唯一可靠的税收，就是屠宰税，其余的都是零星的收入，而是极易取怨于人民的税收。此外则还有一种"人民捐献及赠与"（这是财政收支系统法上规定的自治财政科目之一）的收入，既非抽税，又非募债，简直就是摊派，捐献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现在各县预算，就以捐献的收入作弥补，中央则严禁摊派，而事实上各县则不能不变相摊派，县府遂变至为怨府，距亲民爱民之道远矣！无论省预算县财政，在手续上应该改善的还很多，以上所说，不过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几点。

会计审计制度的实际问题 会计制度，在消极方面，自然收到相当的效果。举例来说：浙江沦陷的县份，虽然情形特殊，因会计独立，尚有账目可查，不致为不肖者混水摸鱼，但是会计本身需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我常有他本身计算不清或变成从前的钱谷师爷那个样子的忧虑。拿出一盘帐来，只有他自己才知道，或在里面玩弄花样，故意和主官为难。审计制度也是同样有好处有缺点。好处固可不谈，举其不合理之点来说，战前必须价值一千元以上的购置或建筑物，才要事前送审。现在如果照一千倍的币值伸算，就要一百万元，始须办理事前审计。虽然后来

改为三万元，与一千倍的物价比例起来。不过三十元。这三十元的小数，要按手续去审计，人力、物力和时间的损失，不知多少。我记得从前某机关要购置价值五千元的一部无线电报机，起初审计机关因为五千元的价格太大，不肯核定。货物涨价了，第二次送上来的预算一万元，又不核准。因为事属必需，再而三的送上去，最后是二万五千元核准了，岂不可笑？在物价狂涨环境变动剧烈的战时，若斤斤于手续的争执，或拘泥于法令的规定，而不顾全事实，真是莫大的浪费。其实若认真照手续办去，就非得开假账，造假单据不可。听说审计机关的经费报销，有时也要作些假才可以送得出去。人家吃上苦，或者不知道；自己吃了苦，亦不想法改良，这又何苦来呢？

民族健康问题的严重及其原因　中国人的体格与白种人相比，显然觉得我们是矮小而孱弱，与其说是他们得天独厚，毋宁说是我们后天失调，不外是疾病的戕害与营养的不足，这种现象由后天而变为先天，一代代的遗传下去，而成为现在的状态，记得我的故乡——容县，在广西也算比较富裕的一县，但是十家之中，终年有三餐饱饭吃的，不到三四家，他们终年都是在饥饿线上挣扎，果腹的食粮，已成问题，其他的营养品，自然更谈不到了。浙江算是中国比较富庶的省份，但也只限于杭、嘉、湖及沿海一带。多山的地区，也穷苦得可怜！甚且富庶地区在同一县之中，情形也不一致：一部分是相当富庶的，一部分是贫苦的，余姚就是一个例子：沿海的平原，就可丰衣足食，而近山的乡镇，就衣不蔽体，以草根树皮作为维持生命的食粮了！处州有句流行的话："鱼龙鸡凤菜灵芝"。鱼和鸡因不容易吃到，就是青菜，都和灵芝那样的稀罕。我住在小顺(云和县属的一个小镇)，附近的一二百户人家，就没有一整片的菜园，即使偶然见到，也是避难来此的客民种的。我们临时省会初迁到云和的时候，固然苦得没有肉吃，更苦的是没有青菜吃。这里出产米麦甚少，杂粮是本地老百姓活命的主要品，甚至连草根树皮也占着重要的地位。他

们佐膳的是生笋干笋或野菜，这并不是这些地方不能栽种蔬菜，而是他们缺少了营养的常识，与种植的技术。至于疾病的戕害，更可惊人了。这些地方，壮健的男子，或健美的女子，不易见到，无论男女，都表现出一副病态。疾病流行最普遍的是疟疾——恶性疟疾。这一带地方的人，已不当它是一种可怕的疾病，而认为这是一种人人必然要患的病。固然他们没有特效的医药，亦不想去求医药，或是无钱来医治，万不得已时，请个巫师来打打鬼，就算尽了最后的人事。战前，政治重心在杭州，那里是鱼米之乡，疾病自然少得多，医药设施也相当完备，所以对于这个民族健康问题，政府并不觉得十分严重。而对边远地区的实际情形，知之既少，遂也不甚关心。战后省会南迁云和，目见浙南人民死亡率之高，而且自身也受了疾病的痛苦，卫生设施便日以加强，但仍是杯水车薪，相差甚远。加以医药来源缺乏，人民贫困，无力求医，死亡率日见增加。汤溪是十二万人口的县份，三十二年罹恶性疟疾而死的，就有六千八百余人之多。龙游希唐乡，人口不过八千多人，在三十三年一年中，就死去九百十三人。三十二年冬天，我在浙西的昌化县，曾亲自访问过廿份人家，家家都有病人，每家二人三人不等，甚至有全家人都挨次害过病的，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家，并受到死亡的不幸！他们病了，只凭着自己的生命，与病魔挣扎，除了少数富有的人，得到有效的科学救治之外，其余都是听由造化的决定，即幸而不死，他们的体力损失与经济损失，就难以计算了。一般人都知道鼠疫、霍乱和脑膜炎的可怕，对于疟疾则不甚重视。照我看来，疟疾给予人民的打击——生命的损失经济的损失——最为重大，我常说：鼠疫、霍乱、脑膜炎等急性传染病，只是流行一次，或死亡一次，而疟疾却是年年流行，年年死亡。鼠疫等病犹如烈火，人民不敢接近，而易于防范；疟疾则如缓水，人民容易接近，而易于玩忽。鼠疫、霍乱、脑膜炎等，虽亦屡有发现，但由于卫生人员的努力，扑灭较易，而疟疾一直到现在，尚没有有效的绝对预防方

法，其原因就在于此。贫困无知的人民，一方面因为营养不足，妨碍其身体之发育，与减退对疾病之抵抗力，同时因疾病之侵害，而更伤残其不健全的身体，与减少其疾病之抵抗力，以致普遍形成神经衰弱，生理机能萎缩的病态。我初到处属各县，见一般人民，除了真正抱病在身之外，其余的都是浑浑噩噩，既不能运用脑力，又不肯运用劳力，好象他们没有了人生的乐趣与欲望一般。有人以为这是愚是懒，实则此不过是表面上的看法，形成这种情形的主因，却是营养不足，与疾病的戕害。我时常就两三岁的孩子来观察，一旦有了病，便失去他的活泼；病愈之后，马上就活动起来，或是笑，或是跳，或是想。因为小孩子天真无邪，不会作假。俗语所谓"小孩无假病"。他失去活泼的病态表示，是由于质受了损害，能（指机能）不能发挥；他病愈后的活动，即由于质与能的恢复。一个壮健的孩子或成人，他一定是活泼的，或是劳动，或是思索，以表示他本质的能的程度。所以处州各属，许多人的浑浑噩噩，不思索，不劳动，完全是由于他的本质受了先天及后天的损害之故。愚与懒那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真正的原因。

两种可怕的地方病 开化的蛀血虫病①，是浙江可怕的地方病，至今还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离开化城三十多里的某乡，那里有三千多亩的良田，都荒芜了，因为这种可怕的寄生虫——蛀血虫，就繁殖在那片广漠的水田里面。那附近村庄的人民，差不多都因患这种病而死绝了，并且还有向外蔓延之势。今年（三十四年）五月间，我在那附近停车，见到一个六七岁的小孩子，聪明活泼，可是染了这种病已经两年多，而是大腹便便的样子了。我问他的祖父："他的病是怎样传染来的？有没有医治的药方？还能活得多少时候？"他说："我们是外路人，因为三十一年避难到这个蛀血虫病最多的地方，因此传染到了。也曾用各种

①即血吸虫病。

土方医治过，但是终没有效果，而且家里很穷，那得许多钱来医他。照这样下去，至多还有两三年，这小生命就要完了！”他说时老泪纵横，不胜其悲痛。我也明知现在还没有医治这种疾病的特效药，如能早点医治，或有治愈可能。但是想用试验的方法，把这可爱的小孩子，从死神手里打救出来。我对他说：“你肯不肯把这小孩子交我带去医治，横直二三年内，他就死了，你就当他现在已经死了就是。”起初，这老人不知道我的身分，不愿接受我的意思。后来我对他说明而答应了，但是孩子的母亲一定不肯。那孩子听说我要把他带走，尤其痛哭得厉害。他们明知迟早都不免一死，但是犹恋恋不舍这未死前的短聚，而演出一幕母子爱的悲剧，真是惨绝人寰的事！我虽然想在没有希望中救治这一个可怜的孩子，但在这种情形之下，也只好作罢了！

浙江沿海一带的象皮病，也是一种尚无特效方法医治的地方病。我尝到沿海巡视，见到那些小腿肿大的农人，还在田间操作。他不知他的病就得之于田间操作的时候，起初是足部受了一些创伤，丝状虫就由创口侵入。劳苦的农民有时连晚上洗脚的时间都没有，还说得上卫生消毒么？于是足部一天天肿大起来，虽然不觉得很大的痛苦，但是肿胀不已，最后腿部的皮肉，如同象皮样的坚厚，连脚踵与脚板都分不出来。这也是象皮病得名的由来，可是他们仍旧是不断的工作着，一直到全身的肌肉都消瘦了，而那脚部却就此溃烂而终于死亡。患这种病的人，从来就未有得过救治！听说曾经有过一个外国医生，将这种丝状虫移种在他自己的脚上，带回他国内去试医，因为外国是没有这种病的，但是这个医生终因不能医治而死了。外国人的以身作科学的试验，与身入地狱救人的勇敢精神，真是值得钦佩的。

为增进国民健康今后行政上应有的努力 世界上医学及药物学的进步，对于各种病症的医治，差不多都有了医治的方法与特效的药品。我在三十二年曾经患了鼠疫，因福建刘主席连夜用专车送来特效药，使我得到救治。我对于这种友情的关切，是十分

感谢的。同时我以前也曾患过许多危险的病症，也因为我的地位而得到救治。但是我想：假使患这种病的不是我，而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就只好听天由命的任他死活，没有什么保障了。我又见到一个美国人，在山僻的玉壶（瑞安县属）患了重病，回到云和来，建阳方面的美国人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派医生携带特效的药品专车漏夜赶到云和，把他治好了。这就表示美国人对于生命的重视，而他们所以能如此，是因为有了特效的药品和高明的医生，还有了迅速的交通工具以争取时间。这种健全的卫生组织——医生和药与现代的交通，我们目前还没有普遍发展，一般人的健康，怎能有保障呢？

近年以来，我国的卫生行政机构，也渐渐由建立而充实起来。由于这些卫生人员的努力，所以曾经发现的鼠疫、霍乱、脑膜炎以及其他的急性传染病，在医疗预防上，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这仅限对局部的而不能遍及全面。同时我想到外国虽有了磺硫安类各种制剂，及般尼西林的圣药，把以前不易治的病，大多数都能作有效的治疗。然而这些进步的药品，都是外国的产物。它医得了我们的病，医不了我们的弱，更医不了我们的贫与愚，而且因此而致我们更弱、更贫、更愚。所以为增进国民健康，光就卫生方面言，医疗不如预防。就全盘行政言，如何力求生产的建设，使其有所养而且日益健康；如何增进卫生教育，使其知道预防，这是医国医民的两个重要方剂，而是今后行政上必须加强努力的两个课题。

社会赈济　一提起赈济，就会想起抗战以前每一次兵灾，或天灾，都有许多慈善人士，在各地募捐，或在报纸上大登其征信录，好象是大灾之后的一幕喜剧。中国的灾难，似乎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重，往往弄得外国人也来参加这一幕灾后的喜剧。我对以前的赈灾，有两点感想：第一，中国的善士，赈灾是消极的，他们只要将募得来的款散放完了，就算尽了他的善心，结了一次善缘。外国人的赈灾，就含有部分的积极性及建设性。我所到过的民生

渠（绥远省）及所知道的泾惠渠(陕西省)，都是由华洋义赈会以工代赈的办法完成的。我认为外国善士的办法，要比中国善士高明得多。若果中国老是消极的赈济，一定弄到赈不胜赈的地步。

抗战以后，兵灾、天灾是不断来临。尤其是浙江，敌人一度的流窜就遭一次灾难。省政府除尽可能筹款施赈之外，就得向中央请赈，向各方呼吁。中央对于各省的灾情，是非常关心的。主持全国账济的机关，是中央赈济委员会，各省则有省赈济会，县有县赈济会，这种赈济机构，好象和行政机构一样的重要。后来中央将党的社会部归入国家行政系统，省增设社会处，县增设社会科，赈济工作，即划归这个新机构主管。虽然这些社会行政机构所主管业务，不仅是赈济，而赈济工作却是最繁重的一部门。（社会行政机构设置后，中央的赈济行政，仍由赈济委员会办理，但到最近这个委员会也裁并了。）本省每经一次灾歉，向中央请赈，都有款拨下来，但施赈的办法都是消极的。只有廿八年省府决议在赈款内提拨拾万元办理难民工厂，这一件事，是带有积极的建设性的。

难民工厂由吕将军戴之（公望）主持，当初是设有纺纱（手纺)织布两部门，收容由沦陷区退出的难民，从事生产工作。后来又经营炼油、榨油等小型工业，一共有二千多员工，连他们的家属在内，就救济了数千难民。纺织部分规模相当的大，有织布机近千架，每日可出布数百匹，对于军服及平民衣料之供应是有相当之贡献。自三十一年敌人大流窜后，乃由永康、芝英迁移云和、龙泉一带，情形就日益困难。最重要的是原料来源的缺乏，其次则是粮食困难。到了三十三年，每况愈下，终于难以维持，而不能不停工结束。这个难民工厂，就经营上讲，是失败的；但就赈济上讲，是成功的，它以十万元的资金，养活了数千难民至六七年之久，而且还生产了许多物资，其收效之大，是任何一笔赈济巨款所难比拟的。

三十一年的敌人大流窜，兵灾几遍全省，灾情之重，为前此

所未有。当时除省府筹拨五百万元施行急赈之外，中央的赈款也比任何一次多。但仍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十一月间我赴重庆出席十中全会，旅渝的同乡先生，对于这次灾情非常关切。于是由我同党部的吴主任委员挹峰，省临时参议会徐议长青甫具名邀旅渝同乡会谈，向他们作灾情的报告。除了蒋先生外，其余的重要人物全部到了。我除提出了书面报告之外，后加口头补充。各位同乡先生听了，非常感动，当场由戴季陶先生等发起组织浙灾筹赈会，以筹集赈款三千万元为目标。戴先生并说："以前各省的灾情，浙省人士无不踊跃捐助，现在对于桑梓的灾害，自然是更加关切，三千万元的数目，看起来似乎很大，如果折合战前的币值，不过二十万元，或者还不到二十万元。在战前，国内无论那一次灾歉的募赈，浙人所捐的款，都要超过这个数目，所以这三千万元并不算多。"继续发言的如褚慧僧、陈果夫、王晓籁、屈文六诸先生，都是非常诚挚恳切的来赞助。并立即决定由各方先垫拨一千万元济急，这是我那次在重庆最大的收获。后来又筹汇二批，合共筹集二千二百余万元，嘉惠浙民，确非浅鲜。

三十一年的寇灾，逼得浙省好多的人到外省去度流浪生活，尤其是福建、江西，为浙江灾民流浪的两个目的地。那年初冬，我由浦城、建阳、南平转赣州而重庆，中途车子坏了，在水吉的小站上停留吃晚饭，那里的小饭店，都是流浪的浙江人开设的。他们知道我是浙江省的主席，特别表示欢迎和优待。我心里觉得非常难过，这些避难出来的同胞，我不能救济他们，反而受到他们的欢迎和优待，内心是如何惭愧！后来我又到了南平，那里很多的商行，也都是浙江人开的，他们从困苦颠连中挣扎起来，不但解决了本身的生活，而且对于社会上也尽了很多的贡献，是值得欣慰的！三十三年又同顾长官墨三、刘主席恢先，在鹰潭（是浙赣铁路因战事破坏后赣境的终点站）休息，那时的鹰潭，已不是三十一年以前的样子了，只有数十间残破的房屋，供过境的人停息，好多贩卖香烟的小孩子，向我们兜揽生意。我详细问他们是

那里人，这个说是绍兴，那个说是杭州，又有的说是金华。总之，这一群流浪儿童，通统都是浙江人，他们是一徙再徙的流浪到那里，没有父兄长辈维持他们的生活；相反的，老母幼弟的生活，就由他们来维持。他们失了家庭和学校的教育，习染了社会上最不良好的习惯。他们流浪的生活，不知到什么时候，才可终止？而他们的恶习惯，却是长此增长下去！他们完好的家庭破坏了，他们可爱的天真也丧失了。这真是一幅目不忍睹的流民图！

发放赈款，为防备经手人的舞弊，往往将手续订得非常周密，要调查、登记、签名盖章，或打指模的种种程序，才可以领到五元至五十元的赈款。其实要舞弊，一切都可以做假，要查也查不出来。况且又有何人去详细查呢？因此，为了办这些手续，赈款的发放便迁缓了，非要好几个月不能发到灾民手里，而时过境迁，饥的已饿死了，寒的已冻死了，未死的实在也不必赈济了。我说：中国的赈济，是"赈意"而不是赈济，然而不照此办法，就有人讲闲话。照此办法，就等于向死人送饭，不但吃不到，连见也见不到。中国的赈济工作，真是需要彻底的改良，尤其需要建设性的积极赈济，庶可一赈而不赈。否则，必至永远发生灾歉，永远办理赈济，并且容易养成人民倚赖赈济的劣性，与赈济时所发生的种种纠纷与弊端。

县政检阅 第一次三年施政计划颁行满了一年以后，我为明瞭各县实际执行的情形，打算亲往各县实地考核。可是县政工作头绪纷繁，要想在短期内作普遍精密的考查，事实上是很难办到的。过去各厅处虽亦经常派遣外勤人员至各县视察，但其视察的对象，仅限于其主管的范围，在同一时间内，无法明瞭县政各部门的进展情形，并进而作一综合的比较。而且各主管机关对于县级工作之视察指导，疏密亦颇不一致，各主管长官又很少到各地巡视。是以各县的工作，往往有畸轻畸重之弊，很少能达到齐头并进的要求。我为补救过去个别视察制度的缺点，决定组织县

政检阅团，由我以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的身分亲自率领，省政府各厅处各调派高级职员一人或二人充任团员，并由省党部、省训练团、省田粮处、高等法院及军管区司令部等机关派员参加。检阅二字，原是军营中常用的名词，一个部队的纪律是否良好？军事动作是否确实？均可从短期的检阅中明其大概。我之所以将这个军事上的术语用到行政考核方面来，用意亦正相同。检阅项目，分为行政管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兵役、田赋、粮政、治安、卫生、社会、会计、国民兵组训、军法、行政干部训练、军民合作等。凡县级全盘行政活动，均在检阅范围之内。我们每到一县，通常先举行座谈会，参加人员为县长、县政府各单位主管人员（专员公署所在地专员、区保安副司令同时参加），县长兼附各机关主管人员、区长、中学校长、县党部书记长、青年团干事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各法团负责人、地方士绅及部分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在座谈会中听取县长县府各单位主管人员及兼附各机关主管人员工作报告（专员公署所在地，有专员、副司令之报告。）接续征询党部、青年团、法院、各法团及地方士绅、乡镇长、校长，对于县政兴革之意见。第二步工作，便是由各检阅人员按照预定检阅纲要，分组详细检阅，如发现错误及缺点，即予指导改正。我在这期间，亲赴县城附近各机关巡视，接见工作人员及地方人士，考询工作情形，探问民间疾苦，并检阅团警，酌予犒赏；复派员警携带款项会同乡镇保长赴城厢附近，选择出征军人家属之赤贫者，发给特别优待费，并加慰问。（有伤兵医院亦照此办理）检阅完毕后，我即就检阅所得及参酌各检阅人员之报告，作综合的讲评，并对地方各项特殊问题及今后工作予以扼要的指示。乡镇自治人员、学校校长等，以其职务重要，工作辛劳，生活清苦，成绩优良有特殊表现者，特于讲评后，颁发奖状，用昭激励。至于各级干部人员中，如有贪赃枉法，一经查明属实，即予扣押法办，以明赏罚。并公宴党政各机关法团首长及地方士绅，以示慰劳。三十年二月一日第一次出发检阅，至三

月一日回程，为时一个月，计检阅永康、武义、金华、兰溪，汤溪、龙游、衢县、江山、常山、开化、遂安、淳安、寿昌等十三县及第四 第五 两区专员公署。平均每县留驻的时间不过二天，工作非常紧张。这种行政考核的方法，是我新的尝试，结果颇为圆满。因为经过公开的报告，分组的检阅与综合的讲评，不仅我们检阅者对于被检阅县份全盘的工作情形得到深刻的认识，即地方机关法团及士绅等，也明白了政府工作的全貌；不仅我们省行政当局知道了地方的特殊情形及民间的疾苦隐患，县行政当局更清楚的听到了地方人士对于县政兴革的意见与要求。至于工作上所发生的错误缺点，因检阅而获得矫正与改进，从而刺激县政的进步，更是显然可见的事。因此我回省不久，又率同检阅人员再度出发，检阅了义乌、浦江、诸暨、萧山、绍兴、嵊县、东阳等七县及第三区专员公署。原定继续检阅上虞、余姚及第六区各县，以敌寇流窜宁绍之警讯频传，乃告中止。返省后的第三天，杭州的敌人由萧山向绍兴诸暨进犯，宁绍两区便在这次事变中沦陷了。卅一年春天，我和阮厅长毅成又率领检阅团赴七八两区检阅。卅二年秋以全省行政会议分在天目山、衢县、临海、丽水四区举行，省政府为考核各县行政实施状况，俾在会议中提出商讨与改进，便分组四个县政检阅团，由我和省府各厅长委员分别率领，先后经过二个多月，接近游击区各县，都已检阅一遍。这种集体的综合的县政检阅制度，是我们的创制，前后施行四次。就方法上说，一次比一次进步，而交通方面，则一次比一次困难，故所费的时间与经费，亦一次比一次增多。就我个人检讨的结果，认为在行政考核方面说，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在交通恢复常态以后的平时，是值得推广的。

年度交代　机关长官的交代，也是行政上不可轻视的一个问题，一个机关长官交卸以后，应行移交的事项，在三年五年之内还没有结案的，极为寻常。虽然公务员交代条例明白规定："至迟应于一个月内造具清册报表，悉数移交后任接收，非经取得

交代清结证明书后，不得擅自离去任地。”但事实上能照这个规定切实做到的是很少见，而且也不大容易，尤其是行政事务繁杂的县长，要在一个月的限期内结束交代，取得清结证明书更为困难。因为交代需时，有的机关便一任挨一任的拖下去，就是说：甲任移交乙任的事项，还没有清楚，乙任却又奉命交卸下了，丙任接收前任交代还没有结案，丁任又来向他接收了。浙江某县一连七任交代没有结案的，这真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就以我自己做例子吧！我接朱骝先主席的任，已经三四年了，朱任的移交案中，还有一些零星事项被审计机关指摘的，于是公文往返，费了不少的手续，才算办理结束。省政府主席的交代，实在比县长交代要简单得多，尚且如此麻烦，怪不得有人要说“上任容易交代难办”的笑话了。其实交代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在任的时候，对于各项经办事项经费出纳，手续上都是合理合法，有条不紊，并随时注意检查补正，即使任期久长，交代也可在很短的期限内办了的。可是一般当机关主管的，对此都不甚注意。以为只要做事用钱，问心无愧，交代总是容易的事，何必在这些细微末节上用功夫呢？如此大意的结果，日积月累，任期愈长，业务愈发展，经费收支愈浩大，交代的困难也愈多了，公私都吃了很大的亏。

一般所谓交代案，多注意于经费财产各部门，后任盘查前任的交代案，置重点于此，上级机关审核卸任人员的交代案之重点也在此。审计机关更不必说了。好象只要你在任内的经费收支情形、财产保管数量交代清楚之后，即使平日是吃饭睡觉不做事，贻误地方，贻误国家，也没有什么责任了。这真是我们一般人对于交代观念的重大错误。公务员交代条例第二条规定前后任应交代之事项，第一款就是“施政方案，工作计划及其执行情形之详细报告。”其次才是经费、票据、债券、财产等项。蒋先生在“行政三联制大纲”中，对于行政考核，提出了三种新的重要的办法：（一）年度政绩比较表；（二）政绩交代比较表；（三）

某种事业进度表。“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这是我国行政史上的良规。可见公务员的交代，应以业务为主，财物为辅。现在大家都偏重于财物的交代，忽视事业的交代，真是舍本逐末的做法。此种错误，如不亟予纠正过来，不免阻碍政治的进步。

机关主管的更调与交代，乃机关责任的转移，就个人说：这个重大责任的起卸，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在交代开始的时候，自应有个公开的隆重的仪式，以昭郑重，并促起社会的注意。可是以往一般机关的主官奉到上级更调的命令以后，不待后任到来，前任就离开了任所，将交代的任务，付托于一二幕僚或亲信，能等待后任到来亲自移交印信，然后再离去的，已是凤毛麟角。至于庄严隆重举行交代仪式的，更是绝无仅有了。此次我重来浙江，在杭州接事，正是漫天烽火，抗城岌岌可危的时候，朱主席还在那里等候，两人见面晤谈之后，他才离去，这种负责的精神，便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我在“重来浙江”这一章上已提及过。所以我们要使一般从政的公务人员重视责任，注意交代，必必切实建立起交代上应有的规模。

我重来浙江的第四周年——三十年年底，想把四年来施政的得失，作一番彻底的自我检讨，连带想起了前述交代上的种种问题。于是和李秘书长立民，商定由秘书处来办理一次假交代，假定我是奉命交卸了，由另一个来接收，视同真的交代一样来办理。三十一年一月便照这个计划实施，指定秘书处的高级职员一人为总移交人，一人为总接收人，由各科室主管人员为移交人，另行指定其他人员为各部门的接收人，唯经费财产部分，则由会计处派员接收。交代的项目为：（一）政绩移交（前任所遗政绩，以及自本人到任后至卸任为止之政绩，相互对比，依照中央订颁之政绩交代比较表式，逐项填列。）；(二)专案移交（如印信、章戳、职员名册、档案、密电本，以及其他应行专案移交之件。)；(三）重要案件移交（内分：1性质较为重要者，2正在

进行尚未办结者，汇列清册，分别摘叙案由，记明办理经过及如何继续情形。)；（四）经管款项移交（机关经费暨现金结存以及折据表簿等）；（五）财产移交（房屋器物等）；（六）例报及定期工作案件移交（各项例行表报及按期办理之工作，叙明案由及造报或办理日期，办理经过等，汇列清册。)。交代开始，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

这次假交代，虽属初次办理，并且也是一个尝试，而指定办理交接的人员，点交接收盘查都非常认真，结果至为满意。很多为我们平日所忽略或遗忘了的事情，因交代盘查而发现，使我们获得一一补救矫正改进的机会。因此，省政府便根据这次秘书处办理假交代的经验，订定“浙江省各机关办理假交代办法”，规定本省各机关每届年度终了两个月内，均必办理假交代一次（该机关长官到任未满三个月者并入下年度办理)，由各该管直接上级机关派员监交，施行一年，收效甚大。我认为这种假交代的办法，便是行政三联制大纲中，所指的机关自身考核，自有制度化的必要。于是将浙江创办假交代的动机与施行情形呈报行政院，并建议“嗣后关于假交代内之经费财产部份，请再由中央驻省审计机关审核确定后转报备案，准予视同正式交代。至该机关长官交卸时，即可自曾办假交代截止之日起办理移交，不必再自到任之日追溯汇办，以省手继，而免重复。”院方指令回来：“准予试办”。从此，假交代制度正式建立起来，浙江省各机关非有特殊情形，均能一年一度认真办理。外省亦有来索取办法参照施行的。三十三年中央召开行政三联制检讨会议，对于这个制度曾列为议题之一，而认为可行。假交代的“假”字，原为假定的意思，可是一般往往看做真假的假，这种字义上的误会，影响制度施行的效率匪浅，于是又将这个名称改为“年度交代”。并将前定假交代办法，自三十四年起，一律照修正办法办理。至于这种制度施行的成效究属如何，自不能列举数字来证验。但我可举出两个例子，以见其梗概。（一）某个新创的机关，数年之后，负

责人交卸了，其所应行交代的事项，以往固无成例，而他本人已奉命远离，不能亲自造册移交，因为曾经办过一次假交代，卷册清楚可稽，即以此假交代的册据作为移交的张本，使这个交代案顺利办结。（二）某机关长官在任已有八年之久，职掌事务既繁，经费财物的出纳又多，加以战兴以还，变迁甚大，而平日未尝清理。迨本省施行假交代制度，即遵照办理。将到任以来所有经办的事务及经管财物经费，作了一番彻底的检查与稽核，使各项事务整理得有条有理。假交代办理不久，奉命调任，要办真交代了。本来一个到任八年的主官，一旦交卸，办理交代，不知要费多少人力与时间，可是因他刚办理过假交代，真交代便很轻松的办清了。

行政效率低落的原因　因为战事持久的关系，行政效率是无疑的会逐渐降低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会发生两种不良的现象。第一是办事迟缓，不能争取时间；第二是贪污事件的发生，与风纪的日渐败坏。这两种现象，实为目前政治上极严重的问题！但考其发生的原因，决不是一方面的，若是单单责备地方行政人员，就不免失之公平。就我数年来实际的观察与体会所得，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多方面去努力，而不是单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目的的。就拿第一点办事迟缓来说，一般人总以为是工作人员的精神渐形疲惫，比之战事初期，工作要差得多。因而所得到的效率，也比例的减退，然而这仅是表面的现象，而不是根本的原因。我们要追究这种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就要从多方面来探讨，才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造成这种不良现象的原因，概括的说：可分为内在的与外在的两端，而这种原因又是互为因果，不能截然的分开。内在的原因，自然由于他的本身——即每一个行政工作人员的本身——这八年来各级行政人员的待遇，实在太微薄了，微薄的程度，几乎使每一工作者不能维持他个人必需的生活的水准，更谈不到仰事俯蓄了。在战事初起的时候，本省曾实行减薪，规定全省公务人

员，由主席、厅长、委员起至雇员为止，最高的薪俸，不能超过一百四十元，最低不得少于三十元。在当时一般物价和平时差不多，而且后方生活简朴，消费的机会较少，大家并不觉得十分困难，现在省级待遇，虽经中央提高到数千元，或万余元，但是比之当时的一百四十元或三十元，要差得很多。因为照现时币值以八百倍伸算起来，当时的一百四十元，就是十一万余元，当时的三十元也就是二万四千元。现在全省的公务人员，就最高的主席说：连薪俸特别办公费等统统合计在内，到不了十万元的数目，遑论其他的小职员？他们终日为自己的生活而分心而愁闷，他们或亲自去经营副业，或由他的家属去经营副业（在云和我知道有很多小职员的眷属，在摆香烟摊子、青菜摊子。）赚几个钱来弥补他们一家生活费用的不足，这比较是最正当的。有些不肖的人，就会利用机会与职务上的便利，去违法牟利。他们的精神是分散了，他们的身体，也弄成歇斯的里的样子。要他们精神振作，要他们工作迅速有效，又何从谈起呢？

外在的原因，自然更多了！我们要使行政效能达到迅速确实的要求，电讯、交通及制度，是三个主要的条件。就电讯一项说，在战前或抗战的初期，我只要拿起一个电话筒，无论那一个偏僻的县分，都可以直接同他们说话，指示他们立刻照我的意思去做。县以下的机关，依此都可以迅速的取得密切的联络。现在呢，除了邻近省会的区县，及战区长官部与几个重要的军事机关之外，简直就无法与他们直接通话了！县以下的机关，自更不必说，电报虽然可通达，但也缓慢得可怜。电信机关收了电费，先来一个“战时情形特殊，不能负责按时到达”的声明。多数的电报，往往被积压在局里凑空再行拍发，或是加封付邮寄递，不管它那天到达。我最近在淳安发了几封电报到云和，等我回到云和四五日之后，方始收到，而且我在归途中，还耽搁了好多日，几乎现在的电讯，仅是应付几个军事政治重要长官，已差不多尽了它可能的力量，其余的就象蜗牛一样的缓慢。我们知道，蒋先生

有些紧急的电报，可以限数小时内到达，那是将其余的电报都积压下来，专门发这一个电报，所以有此效力。此外省府与中央院部的电报，往往是一月半月，得不到回音。邮政回复了原始的邮差递送，虽然是慢一些，但还可计算一个确实的日期，电讯碰得不巧，就无法计算了！其次，说到交通。自从公路、铁路大量的破坏之后，要由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非要步行不可。以前数小时可达的地方，现在非十天半个月不可。有人计算过，由桂林到重庆，最经济的是坐飞机，不但时间迅速，同时费用也节省。其次是坐汽车，若是坐轿子，再加上一挑行李，就不知要费多少金钱与时间，川旅费之大，恐怕要比坐飞机增加数十倍。省际的交通困难如此，在一省之内，情形也是一样。浙江省内，虽然还有一二段仅余的公路，但是汽车隔日才有一班，或是数日才有一班，候车的人是那样多，未必一等就可等到，候车的费用，固不必说，也许候车的时间，会超过步行来回的时间。但是旅行的人，除了根本不通汽车的地方，总是候着而不肯步行。省里要派一个人到各地去查案，或各区县要派一个人来省报告政情，动不动就是半个月一个月，这便是电讯和交通困难的缘故。

说到制度，可分职权与手续两方面来说：抗战以来，因为要求国家统一的巩固，一切都趋向于集权。不但中央对各省要集权，省对各县的监督，也要加以强化。层层束缚，到了最后一层，就丝毫不能转动了。在抗战以前，各省政府的权限，还比较大些，自三十一年财政收支系统改变之后，各省政府的权限，真小得可怜了！以一个省政府之大，尤其在战时前方的省份，它可自由动用的经费，只有六七十万元的第一预备金。（就浙江而言）此外要动用一些钱，就得造预算作计划，去请示中央，准与不准是另一个问题，即使准了，也许要一月或两月，才能得到回音，而实际的需要与价值，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行政效率，自然要受到很大的影响。再说六七十万元的数字，听去好象惊人，实际照币值折算起来，在战前不到千元，假定一省最多的是五万

万元，合战前也不过五十万或一百万元，那是多么微小的一个数目，而值得中央和地方斤斤计较！我差不多当了十五年的省政府主席，并不见得以前（收支系统改变以前）便违法乱用，以后就发生了很高的行政效率。而事实正相反。记得有一次，我要到重庆去，秘书长请示以后重大问题的处理。我说："事事请示中央，不必问我。"因为许多比较重要的事，中央已经有很详细的规定了，省里只要照着规定去办就是，若果超过规定以外的重要事件，即使我在省内，亦只有请示中央，照这样办，决不会发生权限上的错误。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只能够如此办去，效率的好坏，就不必去管它！一个曾经在浙江省办事好多年的工作同志，他在省里的时候，本是为所欲为，不但没有受到中央很大的束缚，就是省政府对他的束缚也极少，他在公路建筑上的确有了很显著的成绩。不久以前，他在中央担任主管交通的职务，如果省里要建筑一条路，或是一座桥梁，计划预算必须呈部核准，才能动工，甚至连公路的行车牌照，都要由部里直接发给，好象一经过省的手，国家就不统一，弊病就会发生似的。我曾经同另外一个熟朋友谈过这类问题，我说："某君恐怕是忘记了过去在省工作的一切，或是否认他过去在省工作的一切，不然，为什么前后颠倒得这样厉害呢？"那位朋友说："这就是制度及由制度中间产生出来的必要手续呀！"

一个机关的职掌范围应该明白的规定在它的组织条文里。应属于这机关的事务，不能稍有遗漏，不应属于这机关掌管的事务，绝对不许订入，这样才是符合名实一致，权责分明的原则。可是我们一般机关拟订组织规程的时候，总想面面都顾到，以致内容繁杂，发生权责不清的流弊。譬如这件事，本来是某一个机关本身职掌的范围，而在机关的组织条文上看去，又好象与其他机关有关系似的。所以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得先与那个机关签商，有的案件，要与好多个机关发生关系，于是签来签去，一件公文上，贴了好几个机关的签条，签得不好，还要再签。这

件公文，就象排球一样的打来打去，不容易落到地面。我曾发现有一件案子。来文是电报，收文机关因为不明案情，向有关机关签询，这个机关也不清楚，又签询另一个机关，如此你签我签，经过半年之久，电报纸上粘了十三个机关所签的二十七张签条，还是落得一个“无案可稽”的结果，岂非滑稽奇谈？这等签来签去的办法，好象是为了完成彼此共同负责的手续，借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我则以为看是一种彼此消极而不负责任的无聊办法，与讲求行政效率的目的，正是南辕北辙，倒不如由一方面积极的负责办理，较为迅速而有效。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有趣的笑话来：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盟友，住在某县的招待所里面，有一天的晚上，他要带一个女性进来同住，他问那招待所管理员：“可不可以？”管理员说：“要请示县长。”他气急起来了！说道：“这是即时可否的问题，我等不及你去请示！”结果，请示尚未下来，人家的问题，就在请示的时间解决了！这是权责不清手续繁复影响效率的一个例子。这种政治上的缺点，不知何日才可以改善呢？

怎样才能根除贪污　　贪污为法所不许，人所痛恨的事。但是现在恐怕还没有杜绝贪污的良好办法，也可以说还有很多没有明白贪污的理由。贪污会有理由么？假使贪污的理由可以成立，那么贪污就变成正当的行为，至少是可以原谅的行为。记得儿时父亲对我说：“当大荒的时候，饥民开仓吃大户，县官是不能治罪的。”他虽不说出什么理由，照我推想，这是人类生活最后的正当防卫，亦即是生活的最后权利。这话，我在“广西政治”篇中已提过了。中国的士大夫，素来以“失节事大，饥死事小”来号召社会，讲求气节。但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宁死而不失节的，究竟数得出几个人？也可以说最大多数人，到了饥饿迫近死亡线的时候，就会转变其他的方法，以求得到他生存必需的条件。为了此种条件的取得，可能生出两种不同的行为。第一是积极反抗的革命行为，第二是消极自私的贪污行为。第一种行为是想推翻

目前的制度，即是推翻当时的统治阶级，求得大众的解放。第二种行为是想在目前的制度内，用自私的方法，来破坏制度，求他个人的利益与生存。所以这两种行为，在公的观点上看，第一种是革命，第二种是贪污。但是无论那一种行为，他的始因多半是由于现实制度发生缺点而演变出来的。所以我们要铲除贪污，还得从现行制度去检讨改进。本党五届十一中全会的时候，大家对官吏的贪污问题，非常注意。某委员会说了一个惨痛的故事：某部的科长，每日下办公的时候，必挟一大包东西出来，被守卫的人怀疑了，将他检查，发见包在里面的都是公共食堂吃剩的冷饭残菜。（这是前几年的事，在今日的公共食堂里，是不会有冷饭残菜的。）有人问他："为什么把这东西带回家去？"他说："一家大小十多口，光靠一石公粮和数千元的薪俸补助费，实在不能生活下去，所以将公共食堂剩下来的东西，带些回去，养养家口！"这个故事，就有各个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是贪污行为，至少是盗窃公物。"也有人痛心公务人员生活的没有保障，认为这是人类求生存的微末行为而予以同情。因为他既不能铤而走险，亦不能或不愿作违法贪污的行为，乃迫而出此无可如何的下策，若果一定当他是贪污或盗窃的行为看待，而予以一种相当的刑罚，至少是陷于"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错误。我之要把这件事情叙述出来，并不是同情贪污，因为类似这种情形，各地不知道有多少，而不为人们注意罢了！我们想杜绝贪污，若不从社会制度改革着手，或最小限度将官吏俸给制度予以改革，恐怕贪污的事实，是不容易根除的！

三十四年是浙江的法纪年　我鉴于官吏的贪污问题，在战争的末期，越趋严重，特规定三十四年为浙江的法纪年。我所谓法纪，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指官吏的一面，因为现在的贪污行为都是受授两方共同的，所以要检举发觉，就很不容易。例如兵役上的贪污，必先是有人不愿意去当兵，才肯以很多的钱，贿赂兵役人员，然后这个事实，才能成立。自然也有先由官吏不按手

续，将许多的壮丁都捆来了，然后受了贿赂而把他放了的，但这比较的属于少数。此外种种类似的事实，不胜枚举。而一般的责备，却都集中在官吏身上，而轻视了受授同科的法律意义，有人希望我在法纪年的口号之下，先杀几个人头来示众，然后法纪才可以树立。其实照法律的规定，省政府对于所属行政人员，违犯法纪者，只有撤职查办的行政处分权，其余都是司法方面的责任，杀头不杀头，是不与省政府相干的。同时我又觉得中国人一般的头脑中，还深印着封建的旧观念，一个当地方官的人，或是中央派到地方来的人，总是想有背着上方宝剑先斩后奏的特权，才可以显出自己的威权，使人民畏威而慑服。在社会方面，也以为今日需要包龙图复生，把他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威风凛凛的摆在大堂上，好象这三把铡刀，就是构成青天老爷的必要条件。其实包龙图是否真如小说上说的日断阳夜断阴的特殊能力？他老人家是否真有那种严酷的作风？我们不得而知。但这种严酷的作风，一定要具有他那日断阳夜断阴的神察，才成其为理想的包龙图。否则“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而况是三铡之下，还不能造出多少罪恶来么？二十三四年的时候，韩复渠在山东，颇有些仿效包龙图的作风，也有一些人，称道他为“韩青天”，岂不可笑！窃以为中国人已在历史上造成一种重刑观念与一种轻法观念。因为重刑，就会轻法；因为轻法，就不能不用重刑，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所以我以为要完成中国的法治，建立良好的法纪，须得从各方面加以法教，而不是一方面执法，可以达到目的。太史公“划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义不可对。”便是法教最好的见解。

有人问我：“为什么在战争的末期，一般人——行政官吏部队官兵社会人民——的精神，都不如初期那样好，行政的效率减低了，战争的力量减少了，民气的发扬与民力的贡献，都不如以前，而违法贪污败坏法纪的事情，则一日多似一日呢？”我的答案是：“主要原因，由于物质的缺乏，就他们本身来说，营养不

足，生活不能维持。就他们身外来说，一切应用的物质，都极度缺乏，那里会有优异的行政效率？那里能杜绝败坏法纪的行为？须知战争初期比较良好的精神表现，是由于战前留下来的一些物质——本身的与身外的——的原故。现在这些仅有的物质，已经消耗完了，也可以说效能发挥完了，一切的现象，都是表现减退甚至消灭。中国人素来是重精神的，以为一切都是精神的作用，而忽视物质乃是一切的基本条件。德国人的精神不能算不好，然而结果不能不出于无条件投降，因为他的物质最后是太劣势了。一般的精神论者，宜可得到很正确的反证吧！”

法纪年的意义及其推行要点 我对于行政效率与法纪问题，写了很多好似题外的意见，其实这并不是题外的文字，而是题内应有的文章呵！关于法纪年的意义及其推行的要点，我已有文字发表，那是正面的说法。因为意有未尽，不能不在此加以补充说明。并将法纪年开始时所发表的那篇文字，附录于后，以备参考。

> 元首在《中国之命运》中指示我们说：“合群是人类的天性，个人离开人群，便没有生存的办法。”又说：“在人群的里面，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体与全体之间，自然有其共守的规则，而后群的生命才可以维持和发展。这种规则，在一方面是道德，在别一方面就是法律。”我们可以再引伸说，道德是辨别善恶的标准，法律则是判定是非的标准。在近代的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应当从是非上去辨别，不应当从利害得失上去维持，这是不容置疑的。
>
> 自从不平等条约废除以后，元首屡次诰诫我们要注重法治，方可以与盟邦真正立于平等的地位。本席因鉴于近年来社会风纪的败坏，影响抗战的力量与建国的前途，所以在上年夏季手订本省十二施政原则的时候，也特别提出注重法纪。今年元旦日我又曾在所写的专文中，再加以恳切的说明。

法纪是什么？说来并不如何深奥，国有法律，党有纪纲，这是各国所共同的，假如人群的结合体——国家没有了法律纪纲，这就等于没有组织，更谈不到结合体的维持和发展。本党的基础在党史党德党魂与党纪，我国的革命，即是要达成法治。所以说在军政时期行军法之治，训政时期行约法之治，宪政时期行宪法之治，也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期都脱离不了法治。

国父将政权与治权分开，政权中的选举、罢免二权是对人的，创制与复决二权是对法的；治权中的考试、监察二权是对人的，立法、司法二权是对法的，而行政权处于其中，一面以人行法，一面也以法治人。足见国父对于法的重视，而国父所设计的中华民国建设图案，整个的就是以法治为目标的。

有人说法律就是规则、规律、轨道都不错。我们知道世界上凡是愈高的学问，愈注重规则，一切的自然科学都是从一定的公式出发，数学是最具规则性的学问，所以它最有正确性而为一切科学的基本。我们又知道，凡是最具有规律的文化产品，也是最好的，音乐有律，诗词有律，戏剧有律，假如不合于律，便不成为文学或艺术，我们更知道凡是一切自然的运行与科学机械的效率，都是从轨道得来。天空中星球的运行有轨道，地上的车辆来往也需要有轨道。一旦出了轨，便可以肇成大祸。法律是人类意思的规则，生活的规律，行为的轨道。因为文化愈高的民族，就应当愈成为法治的国家。

过去有一般人说，我们在革命时代，革命注重破坏。又说我们在抗战时期打仗不择手段，又说我们要求民主，民主所要的是人民的自由，这些话都似是而非，但都足以影响一般人对法纪的观念。革命是吊民伐罪的大智大仁大勇的行为，如其一个革命团体没有了纪律，绝对不能达成他的任

务，也决不能获得人民的拥戴。抗战是将国家民族转危为安的空前伟业，本来战时也有战时的国际公法，足见战争仍不能离开法律。而我国的抗战，并且还是与建国并重的，如其国家没有了法纪，意志力量当然只有分散不能集中，则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又何从达到？至于谈到民主，实在就是宪法之治。其所注重的是使政府与人民都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将人民仍行分散成一片散沙，只知个人，而忘记了国家的法纪。

我国过去所以不注重法纪的原因，不外几种：（一）权利义务的观念不明白，个人权利的被侵犯，不知道请求保护。侵犯了他人的权利，不知道这是不应该，对于个人的义务只知道避免，不知道首先去尽；而对于他人的义务，则要求得很苛刻。（二）个人与国家间的关系不清楚，自己破坏国家的法律，而要求国家的法律保护，自己不守法律而批评政府不重视法治。（三）在执行国家法令的人，得了法令所赋与的权力，而忘记了赋与其权力的法令，这等于是忘本。（四）在封建思想遗留下来的毒素中，许多人仍以遵守法纪为愚鲁无能，而以能毁法乱纪为光荣。因以人与人之间都讲情感，讲关系，讲利害，而不讲是非。

我现在郑重地宣布：今年是本省的法纪年，这是遵照元首迭次的指示与上年宣布的十二原则一贯而来的，我不是说本省过去完全没有法纪，但显然的是不够。我希望全省的党政军教人员及全省同胞不可再蹈着过去的覆辙，此后必须更进一步地去认识法纪，认识时代，认识国家的需要，认识盟邦的企望，认识民主的基础，也更认识多多少少因为法纪不张而蒙到损失受着侵害人的呼声，时代不许我们再玩忽，国家不许我们再凌乱，社会不许我们再因循。

至于要使法纪年推行有效，我特别提供下列十点，为我全省人士奉行的准则：

一、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于法外享受权利，亦不得于法内避免义务，此后全省人士，务必人人以此自勉勉人，并且随时互相督促，互相检讨。

二、法律的常识是民主国家公民所必备的，在党、政、军、机关的纪念周，国民月会或小组会议，都要以讲解法令为重要课题，不但要了解条文，并且要了解立法的原旨，执行的方法，而于执行后的效果与反应，也当随时注意提出意见贡献上级作为修订的参考。

三、全省的学校，除公民课程中已有的部分外，对于法律的知识还要多多讲授。尤其是关系人民权利义务的基本法律。至于现行的各种政令也当随时约请党政工作人员到校讲解，务使学生能以协助推行为已责。

四、各级训练机关，都应当加授法律课程，主要的是要熔法治精神于军事管理之中，使其养成法治的习惯。

五、个人的身体自由以及依法保障的权利应当尊重，中央已有详细的保护法令。此后人人必须以尊人自尊为主，不可轻易侵犯他人的身体自由与各种权利，致蹈法网。凡是执行公务的人员，对于法令所要求的目的，必须依照法令所规定的手续去办理。不可以为目的而不择手段，也不可以予人民法令外的负担或损失，更不可以拘打逮捕禁闭为执行的唯一方法，否则定要受到法律上的处分，而上级对下级的考核，此后除注重效果外，同时也要注意到其达到效果的方法，以及有无副作用的发生。

六、在法纪年中，对于贪污的铲除，也是一项重要节目，中央所设的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此后定能负起其应负的责任，中央所订定的各项检举控告办法都也已很完备。大家不可再作苟且侥幸的心理，也不可再存天下滔滔，我又何必众醉独醒的错觉，更不可自以为大事不糊涂，细目末节可随便。所以因文武公务人员贪污致受损害的人民，应当实行检

举，不必怕会被人报复，也不必怕上级政府或司法机关不严办，人民尤其不可再将公职人员视作为昔日的官僚，认为无不可以用钱商量，耗损国家，败坏风气，贪小失大，自害害人。

（七）、保障人民，惩治贪污，都是法院的职权，各级法院此后一定能积极执行职务，各方面要遵重法院，协助法院，每一件案件在未判决之前，各方面不可随便批评，致影响判决的公正。已判决之后，法院应当将办案的经过及最后的判决向社会公布，这可以使民众了解事实，获得是非。英美二国民间法律常识的普及与是非观念的明白，说者很归功于法院判例的经常宣布。

八、法院询问案件，原则上是公开的，看守所以及监狱，原则上也是任人参观的。一般人士尤其是各级公务人员，学校学生应当随时到法院去旁听，到监狱中去参观。这不但可以增进各人的法律知识，也可以增高一般人士对司法机关的尊重心与司法人员的改进心。

九、在一般人民法律知识尚未完全普遍的时候，凡是具有法律知识的人，都应当以扶助他人为快乐的服务，律师是人民法律的先生，尤其要注意是非，指导人民。不可完全以公费多少为办案的标准，更不可故意引导人民入于法律的迷津，颠倒社会上的是非，增加了人民间的讼累。其他有法律知识而现在并不以律师为业的人，也不可以法律作为自有的秘宝，应当随时出其所学，为无辜无告的人效劳。

十、古人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尤其是在此训政时期，党政人员的一言一行，动为人民的表率，此后务须口非法不道，身非法不行。风行草偃，视听一新。而在抗战时期，军事第一的口号之下，军职人员尤当处处以法律为重。御下临民，都必须依乎法律。此后不得再有骄矜跋扈妨碍他人奴辱人民捆绑勒索乡保长、壮丁、士兵、民伕等情事。最近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扩大组织，提高职权，任何人均可告诉

检举，终难逃军法的制裁。

总之，法纪是国家的纲常，也是社会生活的规律。本省同胞文化优秀，对法治之重要素有认识。值兹反攻前夕胜利在望，宪政将终，复员可期的时候，希望人人以守法奉公为荣，以败治乱纪为耻，各级民意机关及舆论界，一方面是政府的耳目，另一方面是民众的喉舌，负有宣导的责任，享有检举的力量，尤希博采周咨，毋偏毋枉。则社会风气立可转移，政府吏治立可澄清，民间疾苦立可减轻，而现在新流行的悲观、烦闷、幼稚、妒嫉、堕落、腐化的各种现象，也均可立除，我们将眼看有秩序，有规律，上轨道的新浙江的各部门，均可迅速地建立并充实起来，这是抗战的新生力量，也就是建国的新琢基石。

廿三　教育年

浙西沦陷后教育设施之一斑　杭、嘉、湖是浙江教育文化的中心区域，那里有大学校（浙江大学、之江大学）专科学校（艺专、医专）及各种职业学校（工、农、商、蚕桑、助产等）师范学校。至于普通中学及中等以下的学校亦比浙东各地发达。学校的设备，也要完善得多。自从沦陷之后，这些公私立中等以上的学校，大多随着军队与政府撤退了。可以说，二十六年的年底及二十七年的上半年，是浙西各市县学校的搬迁时期，除了少数迁移省外之外，到了二十七年的下半年，大都已在本省的自由区内复课。但是各学校原有的设备损失了，原有的教职员星散了，学生的数目也减少了，于是不能不将这三属的几个省立中学、师范分别归并起来，成为联合高中、联合初中、联合师范。所谓联合，就是将几个学校暂时联合为一个学校，以表示他们原来的名义仍旧保留着，等到胜利复员之后，再行恢复的意思。那些私立学校，如宗文中学、安定中学、清波中学等，都是由陷区里挣扎出来，尤其是吴山聋哑学校也由杭州迁移淳安，他们在不言中表示出民族的气节和抗战的热忱！

在当时未及退出的学生，都回到家乡去躲避，但经敌人的压迫侮辱，这些有血性不甘做顺民的青年，仍旧陆续的退出来，政府不能不在陷区邻近的地方，设校收容。于是又有临时中学、临时师范的设置，不但浙西如此，浙东也是如此。最先成立的是浙西第一临中，这些在沦陷之后才退出来的学生和先生，他们都是

亲身尝过了敌国统治蹂躏的酸辣滋味，千辛万苦的跑回祖国自由的怀抱，所以他们的精神和生活都比最先撤退或原来在后方的要紧张刻苦得多。除了这些由政府设立临时中学之外，私人创办专门收容陷区青年的学校也不少。如嘉区联立中学便是嘉属的士绅张天方、陆初觉、戴文珍办理的，他们在陷区里辛辛苦苦筹钱筹米收容嘉属的青年。我见到他们的师生，虽然还保持着文质彬彬的嘉属风度，但在精神上则充分表现着同仇敌忾的情绪。我对他们以及他们留在陷区里的父老颠沛流离的景况，起了恻悯的同情心，而对他们坚忍苦斗的意志，更是十分佩慰，这就是越人传统的特性呵！

创办英士大学 二十八年战事局势稍定，我觉得大学教育在接近战区的省份，还有继续的必要。省政府曾经有电报给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欢迎他们回来。浙大虽已改为国立，但就他的历史及名义来说，同浙江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我们是竭诚的希望他们回来，可是因为事实的困难，不能实现，校方只答应以后在浙江设一个分校，只办一二两个年级。就是说，分校的学生修毕二年的课程，就要送到本校去。我觉得此次战事，为期必定很长，说不定会拖延五年、十年的，若果省境内没有一个大学，省内每年毕业的高中学生就没有升学的机会。但是在战时交通的困难，汇兑的不便，用费的浩大，又有多少学生可以到大后方去读书呢？于是我在省政府提议由省另外创办一个大学，当时也有人曾这样的顾虑：第一、战事结束的久暂，姑不置论，但在动荡的战时环境中，是否可由我们安心去办大学？第二、在人材物质与财力困难的战时，是否能创办一个完善的大学？但是我的见解是战事决不能遍及全境，只要尚有一块比较安全的地方，就可以而且应该办理。同时抗战的时期，一定很长，能在战时坚苦的环境中挣扎出来，锻炼起来的学生，一定有很大的成就，所谓"明耻教战"，就是这个意思。至于战时人力、物力、财力的困难，自所不免，但是并非绝对不可能解决的。我们做事，应以需

要为前提，决不能因困难而停止。提案通过了，并立即拨款筹备，我当选为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而实际的负责者，是教育厅许厅长，二十八年八月①，这个婴儿落地了，奉蒋先生的意旨，命名为英士大学，是纪念浙江革命先烈陈英士先生的意思。校址起初设在丽水，后来因为军事的影响而迁至景宁、泰顺。三十二年又迁回云和、小顺。翌年再迁泰顺。这个大学的婴儿时期，是由浙江省政府及一个校务委员会来负责保育的，它在艰难困苦中长大了，现在已有了好儿班毕业的学生。二十八年所种下来的桃李，现在已是绿叶成荫子满枝了。三十二年九月，改为国立，并派杜佐周为第一任校长。我重来浙江之初，决心要在抗战期中创办一个大学，至今已偿我的宿愿，这便是我手创的第二个大学（第一个是广西大学）。

战时浙江教育的发展 浙江教育，抗战初期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但到二十八年，又逐渐恢复起来，并随战时的延长而继续发展，这里举出几个统计数字，以见其一斑：中学校（包括中学、师范、职业）由二十六年的六十八校，到三十三年增至一百八十二校；中学生由二十六年的一万七千零八十七名，到三十三年增至六万四千七百十七名。小学校由二十六年的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九校，到三十三年增至一万五千七百四十校；小学生由二十六年八十九万三千九百四十二名，至三十三年增至一百零一万四千五百零九名。各县教育经费，由二十六年二百八十一万二千四百三十二元，至三十三年增至五千七百六十一万四千六百零二元。这里所指的数字，学校与学生增加数是实的，而教育经费的增加数却是虚的。因为战前的一百万元，到三十三年，应是五千万元以上了。所以教育经费表面虽是增加，实际价值，却是减少。而学校数学生数的增加，更显示出教育经费的困难。因经费的困难再加上战事的影响，教育的效果，学生的程度，就免不了降低

①据《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第306页英士大学于1939年10月22日在云和开学。

了，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啊！有人说：中等学生的增加，是受了兵役的刺激。因为以前的兵役法，规定中学以上的学生是可以缓役的。我记得三十二年教育部长陈立夫到浙江来视察，在某次集会里，他特别提出这个问题来说："为逃避兵役而进中学的情形诚然是难免的，但是全国适龄的壮丁，至少有三四千万人，而全国的中大学生不过是五十多万，即使全数都是逃役的壮丁，也不过总数百分之一二，兵役机关既有这许多可征的壮丁，就让我教育机关拉去这五十多万，于抗战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呀！"他的话说得很委婉而动听，但是我只赞成一半。因为发展教育是一件事，征兵又是一件事，两者是并行不背的，而两者都要认真办理，才能满足国家的要求。

战时学校人的条件与物的条件均感缺乏 在战争期中，物质的缺乏是必然的，尤其是在生产落后的中国。三十一年，我对于前方作战的士兵生活，起了同情的呼吁，并且想尽我的力量予他们以帮助，同时我也不忘记为国家未来柱石的数万学校青年。我每巡视到一个地方，都要到学校里面去看看他们的生活状况。由沦陷区退出或临时成立的学校，固然没有完好的校舍；即是后方的学校，原来的校舍，也多半成为敌机轰炸的目标。如省立处州中学、衢州中学、台州中学等校都已化为颓垣瓦砾了。即幸而保存未受损毁的，亦因空袭频繁不易安心研读而搬迁至隐蔽的乡下去上课了。因此乡下荒凉沉寂的祠堂庙宇，就成为战时弦歌不断的黉舍。至于教育仪器图书等设备，少数学校还保存着旧有的东西，多数的学校或沦陷了，或被敌机炸毁了，或在搬迁中散失了，不仅无力补添，抑也无从补添。尤以新设的临中临师最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形之下，即使资历很高学识很好的教师，也未必有很好的教育成绩。何况好的教师，在战时也不容易请到。甚至有些科目，还根本请不到教师呢？我对于现在担任校长及教师的先生们，衷心至表敬佩！他们都是苦心孤诣的在那里维持学校垂死的生命，为国家培养未来的人材，希望渡过这一个难关，仍

旧恢复以前的光明与健康。他们的待遇，虽与省级或县级的公务员一样，但因为环境的困苦，设备的简陋，他们的生活，总是特别枯燥，而容易引起苦闷。总括的说：现在的学校是黑的黑板与白的粉笔，黑的房屋与白的天窗，以及白纸黑字的讲义，其余真是贫乏得可怜，教育的人的条件与物的条件困难如此，那里会有好的学校与好的成绩？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战争时期呀！

战时学生的营养问题 讲到学生的营养问题，更严重了。我曾考查一个拥有九百多学生的中学，他们每日吃的食油，不到三斤。那些青菜就是用白水加些盐煮熟就算了，他们不但是三月不知肉味，就是油味闻到的也不多，膳食的管理是由学生组织一个膳食委员会主持的，学校当局不大负责任。学生方面，以为出诸自己的手，一切都是尽善尽美的了。因为膳食由学生自己管理，就可以免得被人家揩油。我在浙西某临中的厨房里面，见到学生食的饭，有砂有谷，难以下咽，那个厨房是与灰房厕所联在一起的，苍蝇满室乱飞，肮脏不堪，我问那几个管膳食的学生，为什么不将厨房打扫清洁？他们说："我们只是管帐，不负清洁的责任。"我说："你们只知管金钱的小帐，那些卫生的大帐，就不会管了。"他们为的想多吃到一些食物，恐怕连沙子、谷子、苍蝇、细菌，都要吃下肚里去，这样有碍卫生的饮食，是容易致病的，如果害了一场大病，不知要受多少的损失？万一医护不当心，连性命也可以断送了的。中国人往往重视金钱，轻视卫生，其实这些清洁卫生的问题，学校当局应该负责。即使膳食归学生自理，学校当局也要时常监督，指导他们要做到清洁卫生的要求；否则，徒美其名曰训练学生自治的能力，又何从得到良好的成绩呢？学生的营养不足，大家都已知道，我主张要提高收取学生的膳食费用，以增加学生的营养。但是学校当局总以为膳费数额提高了，贫苦子弟便无力缴纳，而有失学之虞，我则以为国家既尚不能解决清寒学生的求学问题，在这过渡时期，宁可忍痛将这些不能缴费的学生退学，不可因为少数人不能缴费，而妨碍多数

人的营养。中国素来以俭为美德，不但比较贫困的人要节俭，即使小康的人，也是讲节俭，以致学生家庭，不欲多缴费，学校当局亦不愿要他们多缴费。因为俭是中国固有的美德呀！其实俭为美德，乃指不奢侈而言，若果俭到生活水准以下，不但不是美德，而是戕害身体的不道德行为。这种道理，很多人还未了解。多数学校为补救这个学生营养问题，通常的办法，就是准许学生带私菜。我有一次到英士大学去，曾同杜校长去参观学生们的膳食情形，其中有一个桌子上，八个人在吃饭，有三种不同的菜，有两三个人是吃学校里的公菜，有两个人自己添了一些咸菜、咸鸭蛋之类佐膳，另外有三个吃的是鱼和肉。在一个桌子上情形，就这样的不调和，我见了也觉得为他们难为情，不知道他们同桌食饭的人又作何感想？我对杜校长说："这样会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啊！"

尊师重道和培养师资 "尊师重道"是中国的古训，一般老百姓的香火堂上多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于此可见"师"在中国社会上地位崇高的一斑。韩愈有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中国对于师的传统观念，以为有了师，教育的问题，就完全可以解决了。但是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知识范围日渐广大，师资仅是教育上主要的一个因素而已。有一次浙大龙泉分校要我去讲演，讨论到现在学校的成绩问题时，我说："学校成绩的良否，完全看物质的设备情形怎样？因为我认为人类的知识，完全以环境的物质设备与本身——即指受教育者的本质——的资料如何而决定的。所谓物质的设备，不单指普通所谓图书仪器及校舍环境等种种物质，就是你们的校长教授也是物质，不过他们是动物就是了。"说时，全堂哄然大笑，那些校长教授也有些难为情起来。因为我将校长教授当做动物看待。好像我对于"尊师重道"的古训，有些违背的意思。其实在我们的教育意识中，我只认定分为两种质，一是受的质，即学生的本质，如身体生理的健全等等；二是授的质，如校长教授图书仪器

校舍环境设备等等。受的质是先天的，暂且不去谈它。授的质是后天的，必须使它完备，才可以得到良好的成绩。过去总以为有了师，教育上的一切都解决了，而不知师仅是我所谓授的物质之一种，此外所需要的物质，还是同样重要而为数更多。并不是我对于师道不尊不重，而是我的解释师道，包括了一切授的物质，一切都要同样的尊重，而不仅仅是几个校长和先生。

尽管我们古训今训如何的尊师重道，但是就浙江来讲，师资是何等的缺乏？也不仅浙江，恐怕全国其他各省也是同样的缺乏。根据浙省教育厅三十三年的统计，现在全省的小学教师，合格的仅占百分之三十八，而代用及不合格的教师却占了百分之六十二。若果要普及全省的国民教育，需要的师资照现在的数量（二万六千余人，包括合格与不合格）还要增加二倍半，即六万三千余人。培养师资，真是目前一桩极繁重的工作。固然充实各级学校的其他物质设备，也同样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这几年来，教育行政当局，对于师资的培养，极为注意，不仅创办各种师范学校，提高师范生待遇，并且限制普通中学的设置，引导多数小学或初中毕业的学生升入师范学校。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可是现任的教师们和社会一般的观感，总以为学师范，当教师，是没有很大的前途，除了一些贫苦的学生，被迫的走到这条路上去，此外立志投考师范学校的学生，却不很多见。就是已经养成的师资，又很多弃其所学而转移到别的工作岗位上去。因为中国现在举办的新兴事业甚多，不论公的私的，都需要很多的普通工作人员，不必有一定的出身和专门的技术，而任何部门的待遇，都比当教师为优。在抗战初起的时候，教育厅的调查报告，本省很多地方的小学教师，每月待遇仅有十多块钱，在当时已感觉得很苦，所以溜走的很多，但是以现在的币值来伸算，已是一万多元了；而现在的小学教师，连一切的待遇都计算在内，还没有超过一万元，固然在战争的末期，一切各部门工作人员的待遇，都大量降低，但是小学教师的待遇，本来就很微薄，即使能恢复到

战前的待遇，也是清苦得很，何况相差还很远呢？在这种情形之下，怎能得到良好的教师？教育事业，又怎能迅速的发展？

教育和军事还不能配合　在战争的期间，自应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一切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说，战时的人力、物力、财力，一切都为了军事，一切为了胜利。可是我们检讨现在的教育，真能够和军事配合了吗？我们无可讳言，现在的教育与军事，不免有脱节之处，试看一般学校对于军事意识是何等的消沉？虽然蔡孑民先生有过“读书不忘救国”的嘉言，现在也有“读书不忘军事”的口号，但总不能用军事和胜利的意识来刺激教育的前进。现在一般学校好像有些厌闻军事了。现在学校里的学生，不知是否真与以前说的有逃避兵役的人在内。

战时教育第二平时教育第一　我见到以上所说教育上的种种缺点与危机，因此提出了战时教育第二战后教育第一的口号，我认为这种种不良的现象，都是战前尤其是军兴以来政府与社会不认识教育不注意教育的原故，若果从此认识起来，注意起来，未尝不可以作末流的挽救，尤其是在战后的建国，非是在教育上有积极的努力和彻底的改革，是不会成功的。在这一次世界大战当中，我们认识了“物质决定一切”的道理，而这些物质，都是由高度的科学发展而来的。教育是发展科学创造物质的工具，也就是说，一切都要透过了教育，才可以达到目的。我认为“有教无类”的道理是正确的，不管那一个民族，过去有如何悠久的历史，有如何古旧的文化，若是离开了现代的科学教育，便有落伍而至被淘汰的危险！这次决定世界战争同盟胜利的重要国家，如美国，如苏联，都是一般人认为没有悠久的历史和古旧文化的民族，然而他们却表现了非常强大的决定力量，这是他们近代科学的成功呀！我也可由此推断，现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蛮族或落后的民族，假使先进国家能够帮助他们，发展现代科学教育，那末数十年之后，他必定也能跻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因为科学教育，可以将他的一切加以改造起来。反之，不论那一个有悠久历史与

古旧文化的民族，若果还是想保留他腐旧的躯壳，而夜郎自大，故步自封，不思及时改革，必至因落伍而被淘汰。因为他的悠久历史与古旧文明，是适应当时环境的教育造成功的。环境改变了，这种古旧的文化，已经失了时代的价值，还值得去保存它么？

三十三年为浙江的教育年 我在三十二年冬，本省分区举行行政会议的时候，为唤起全省人士及行政人员对于教育事业的注意，就决定三十三年为浙江的教育年，并亲拟一个“推进本省教育实施方案”提付讨论，获得一致的通过。三十三年春，省府会议复决议提拨各县积谷八万石，作为教育年扩充教育所需的经费。这个决议，三十四年仍延续有效。并希望以后永久的或更扩大的执行这个决议，以促进教育的发展。当教育年开始的时候，我曾发表过一篇文字，以说明其意义。

首先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提倡教育：“简单的说一句话，因为教育是建国的基本工作，抗战的胜利在望，建国工作亟须加紧努力。在目前任何地方，任何机关，任何部门，无不感到人才的缺乏，干部的恐慌。今后加强建国工作，百事待举，更需要大量的干部，来担负这个艰巨的任务。元首在《中国之命运》中指出实行实业计划，最初十年内，所需各级干部人才，计二百六十七万二千五百人。这样大宗的人才，从那里来呢？当然要以教育的方法来积极培养。这个培养干部人才的教育责任，严格的说起来，不在中央，也不在省，而要由各县来担负。换言之，县以下各机关学校需要人才，不能求之于省或中央。反之，中央或省需要人才，可以责成地方供应。这话怎么讲呢？我们知道，不论是大学生或中学生，均必先受毕基础的国民教育，国民教育的普遍实施，那便是县地方的责任。如果国民教育不发达，国家虽创办多少大学专科学校，也无法培养多少人才，以适应事实的需要”。

“本省的教育，就质量上说，素列全国的前茅，就是抗战迄今，依然保持着这个地位。可是就数量上说，与中央所规定的要求，相差还很远。多数县份国民学校还没有达到二保一校的第二

期标准，入学儿童，不及学龄儿童百分之四十，中学生平均不到五百分之一。近几年来，各县固有了显著的进步，浙西前线如孝丰、昌化等县，进步更为迅速。但是我们不能在一省中，以此一时与彼一时比，这一县与那一县比，有了进步以自足，也不能在全中国与别省比，占了前锋以自慰。我们既欲跻于现代强国之林，国民教育水准之高下，足以代表国力之强弱，我们目下的教育状况，若与欧美各先进国相比较，真是瞠乎其后，不知落于何地了。设不急谋发展，迎头赶上，即使抗战胜利，我们在国际上还是不能获得真正自由平等的地位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今后自应积极提倡教育，并迅求其普及。”

其次指出教育的目的与内容：“国家兴办教育的目的，总括的说，一为适应国家生存的需要，一为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现代国家的行政，可以分为管教养卫四大部门，而以教为枢纽。教的目的，即是教人民具备管理国家，管理自己，养活国家，养活自己，保卫国家，保卫自己的知能，要达成这个目的，教育的实施，必须具有科学的内容，因为管、养、卫三者，俱离不了科学的法则，兹分别说明如次：

“管——管的意义是科学的组织，科学的管理。无论国家或社会的组织，一定要合乎科学的法则，才能实行科学的管理，发挥最伟大的力量。举例来说：管理一万个士兵，比管理一万个老百姓要容易得多。带兵官下一道命令，一万个士兵无不服从实行，因为军队的组织，由师、旅、团、营、连、排、班一个系统下来，层层节制，纪律森严，合乎科学的法则，而一个乡镇长管理一万个老百姓，要做到说东就东，说西就西，谈何容易？乡以下虽有保甲的编制，但组织未健全，管理未严密。这是就人的管理而言。再以物的管理作比喻：现在晚上大家都点用油灯，假使实行灯火管制，要在同一时间内把一个学校或一个机关的灯光，完全熄灭，已属不易，要将全村全镇各家的灯光同时熄灭，

是深难办到的。如果改装电灯，那末只要把发电厂里的总开关一按，所有几千几万盏的电灯，便可一齐放光，一齐熄灭。因为电灯有科学的组织，所以能实行科学的管理。由此可见国家的组织，如果合乎科学，管理严密，如机器一样，推行政令，必可达成迅速有效的理想”。

“养——养的意义，是科学的创造，科学的生活。原始时代，人口稀少，生活简单，天然的物产丰阜，靠天吃饭，不致有什么困难。可是现是人口日增，欲望日高，天然的物产既不足享用，人力的生产，亦不足供应需求，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大量的创造物质，才能养活人群。旧法种植稻谷，每亩田年可产谷三石，如以科学的新法耕耘，可增产二分之一乃至一倍以上，所增的收获量，便是科学的创造。山地种树木，过去的用途，或造房屋，或制家具，或充燃料，而今日科学昌明，可以作为造纸打丝的原料。过去丝识的衣服，都是蚕丝制成的。现在不仅利用木头可做成人造丝，还可以用玻璃矿石抽成玻璃丝。过去的交通，或用车，或用舟，都是利用人力或兽力，现在陆上有汽车火车，水上有轮船，空中有飞机，既省人力又节时间。这些都应归功于科学家的创造。所谓科学的生活，就食而论，个人日常生活需要能发多少卡罗里的脂肪、蛋白质、含水炭素？那些食品中含有那些营养素？科学家都有很明细的研究。就衣说：季节的转移，气候的变化，与衣服调节，都要合乎科学，使保持一定的体温。再以居住来说：多少人住的房子需要多少空气？光线强度如何？都有一定的标准，过多过少、过强过弱，都不合卫生，也就是不合科学家的要求。目前物质缺乏，我们一般的生活，离开科学的标准甚远，今后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以创造物质，才能改善我们的生活，才能谈上有所‘养’”。

“卫——卫的意义，是科学的国防，科学的战争。我们要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必先有现代的国防建设。现代的国防建设，没有那一项可以离开科学。国防有三个要素：第一是国民的体格

强健。我国一般青年的体格多不能合于国防建设的要求，大中学生报考空军，百人中没有几人体格是够得上标准的。'无空防即无国防'，飞机本身已是科学的产物，驾驶飞机作战的空军，必须是体格强健而有科学素养的青年，才配担任。空军如此，其他如坦克车潜水艇等机械化的陆海部队的战斗员，又何尝不如此？第二是兵器。现代战争使用兵器，如大炮、飞机、潜水艇、坦克车等，无一不是科学的产物，大刀、长矛、弓箭等，还能在现代的战场上发生威力吗？第三是交通。近代最迅速的交通工具，不论是属于运输的，通讯的，也都是科学的结晶品，运输与通讯，在现代战争中，居于极重要地位。由这三个问题要素分析起来，可知现代的国防建设，与科学息息相关。元首告诉我们：'无科学即无国防'真是至理名言。有了科学的国防，才能参与科学的战争，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我们对日抗战，全国军民，既有百折不挠的牺牲精神，为什么不能迅获胜利？推究原因，即为我们的国防缺乏科学的基础。"

"管、养、卫三者的意义既已明白，教育的责任，即是要运用科学的方法，达成这三大目标，使全国国民人人具有自治治事，自养养人，自卫卫国的技能，所以教育虽为行政的一部门，而其内涵实包括政治的全部。"

最后指出目前教育上一般的缺点及其补救的方法，因为大部分已在前面提到过，不再摘录了。

教育年于三十四年的三月闭幕了，根据教育厅的统计报告，总算收到一些形式上及数字上的效果，自然这种效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尤其是我自己，更不觉得有可以满意的地方。因此我又在教育年结束的时候，发表了自拟的对于教育年以后的意见。特附录于此：

> "我在教育年开始的时候，曾说过教育年乃浙江教育复兴之开始，因为浙江教育受了战事的种种摧残，才有这个复兴运动。现在教育年虽告结束，仅是一个开始的年度结束，

而不是教育年事业的结束。教育事业必须永久不断的进行着，且在今日战事尚未结束，胜利尚未来临之前。教育所受之各种威胁，不但没有解除，甚至比以前更加厉害。故本省教育决不能就以往之仅有成绩，便认为满意，而必须随时警惕重大威胁之再度降临，确定坚忍不拔之方针，与适应环境之计划，以渡过目前之难关，企求今后之发展。这是在教育年结束的时候，吾浙人士应有共同感觉。我更不能不提出下面的几个方针与办法，作为浙江省教育继往开来的工作动向：

第一、对于教育年的实施方案，尚有许多未曾达到要求的地方，务于本年度内，力求其全部完成。这不仅在量的方面如此，更须在质的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务使名实相符，质量并重。省政府对于以往各县所报告之成绩，尤须切实派员考核，以杜假报敷衍之流弊。对于实施方案之内容，尚有未尽未备，或实施之后，有须修正者，皆宜分别检讨，予以补正，使臻完美。

第二、省府今年仍继续提拨各县积谷八万石，变价为复兴本省教育三十四年度经费之用，此种办法，以后如果实际上许可，并将作为永久之定案，或更酌量增加其数额。此事在初实行的时候，颇引起中央主管机关或少数人的误会，我曾经当面报告元首，而深蒙其赞许。我想以地方之财物，用之于地方教育，乃是天经地义。积谷与其用于消极之救荒赈济，实毋宁用于积极的教育事业，亦唯有在积极的教育建设之下，才可以解决饥荒问题。所以积谷积极的提用于地方教育建设，虽达全部二分之一，也不为过量，但政府对于计划用途，及收支数目，务须力求公开，以祛除社会之误会。

第三、青年学生之保养，应成为今后教育上的严重问题与重大的责任。抗战以来，因为物质的缺乏，在节约口号之下，而致学生身体，受到重大的打击，我对于战时物质缺乏

的事实，固不能完全否认，而对于这几年来在节约口号之下，节到人体生理需要的水准以下，实认为至不合理之事。中国数千年来，都是以俭为美德。照我的见解，俭的意义是指不浪费而言，若果俭到生理需要水准以下，则不但不是美德，而是戕害身体的不道德行为，所以除了政府方面尽其应尽的责任以外，尤须要求学生家庭，尽其应尽的责任，如果学生父兄对其子弟在学校中必需之营养费用不肯负担，或不能负担时，学校宁可忍痛拒绝其入学，而不可因为少数人之不肯负担或负担不起，而致将大多数人的营养分量减低，至同受残忍的戕害生活。故对今后青年之保养，政府须确定方针，妥为规划，列为极重要的工作之一。

第四、教育的目的，是以科学的知识，改造社会的风俗，推动社会的进步。浙江的迷信风俗，比任何一省来得厉害，迷信用途的锡箔税，战前一年就有数百万元之巨。各处的名山古刹，都是以迷信为中心，而非常兴盛，即使以全部的锡箔税来办理教育，其效果仍等于扬汤止沸，于事无补。所以我们必须展开破除迷信的政治运动，同时更须展开社会的科学运动，然后教育之目的乃可达到。现在迷信与教育，在并肩竞争，数千年来雄厚的迷信势力，与数千年来的脆弱教育势力相比，不知要多少年代，才可以把迷信革除？故今后必须展开破除迷信的政治运动，与展开更大的科学运动才能贯彻国家的教育宗旨，达到教育发达科学昌明的目的。

第五、中国旧文化的价值，实在使人感到太空虚了，经过了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更使我们深刻的认识科学物质，是决定一个国家民族存亡的主要条件，因此我们对于中国旧文化，应重估定其价值，而热烈地展开战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战后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无疑的是建设在‘生活’‘科学’‘物质’的三个基石上面，否则中国在战后必不能与列强作和平的竞争。换句话说：今后是‘生活’‘科学’‘物质’

决定国家民族的命运，教育是文化推动者，要负起这个推动责任，必须在本身上作进一步的检讨，作更进一步的努力，而决定不是故步自封，就可以达到目的的”。

在教育年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些意见提出来作为我们对于浙江教育的方针与祈望，但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工作，决非个人与少数人可以毕事，不能不望全省人士一致了解，共同努力。

有人问我：“浙江的教育经你提倡以后，在短期内可能收获怎样的成果？”我的答复：在目前的环境之下，虽然会发生若干的效果，但决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而我也决不因不能立刻收到所期的效果而失望。我现在是希望我所认识的教育意义，能得多数人的了解，从多数人的了解中，在最近的将来，达到我的期望。成功固不一定在我的任内或我的手上，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可见成效的，不过在我的任内，如果事实许可的话，我一定尽我的力量，甚至全省人士的力量，改进教育设施，推广教育事业，以实现我所说的“战时教育第二，战后教育第一”的主张。

资助公教团警子女入学 在长期抗战中，公、教、团、警人员，以薪饷收入，来维持其日常生活，已极困苦，若再有子弟上学，负担更重，情形更困难了。生活与教育，固同样重要，但到了经济力量极度薄弱的时候，子女的教育，只好暂且牺牲。在省级机关中，也有许多高级职员不能负担子女教育费而忍痛使子女辍学的。我一方面提倡教育，而另一方面，眼见自己的僚属，竟有不能送子女上学的凄凉情形，心里非常难受。于是在宣布三十三年为本省教育年之后，决定另订一个资助公务员教职员子女入学办法，规定本省省县及乡镇保依法任用之公务员，本省省县所属军警团队之官佐，本省省公立及立案之私立各级学校专任教职员，本省省县立及已立案之私立社教机关职员，其子女肄业各级学校者，均可申请资助。省级人员之资助金由省款负担，县级人员之资助金由县款负担，乡镇人员之资助金由乡镇款负担，资助金的给与，

以一个学期为一期，并按申请人在同一机关的服务年资及其子女的教育程度，而异其数额，所以此项资助金的给与，实包含奖励公教团警人员久任，及其子女上进的两重意思在内。这个办法，自三十三年一月份起实施，资助金额并根据物价的增涨情形，每个学期调整一次，以适合实际的需要。三十三年九月，本省奉到中央颁发战时公教人员子女就学中等学校补助办法，其立法用意，和本省所行的资助办法，完全一致。不过中央规定补助的范围，仅限于中等学校，并除子女一人外，始得申请补助，较本省之凡属肄业各级学校而子女每人均可申请资助者为小。中央补助金系国库支出，补助对象，限于中央及省级公教人员。本省资助金之来源，系各级另行筹集，资助对象为省、县、乡镇全体公教人员。所以两项办法不相抵触，仍同时施行。本省公教人员的子女教育，因此两项办法之实施，而解决了很多的困难，尤其是省级人员。

科学奖金与科学研究费之设置　二十世纪是科学的时代，现代的国家，没有进步的科学，是不能存在的，谈民生固需要科学，谈国防更离不了科学。所以现代的战争，可名之为科学的战争。由科学所创造的物质（包括兵器及国防器材民生必需品等），是否精良，是否众多，决定战争的胜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亦然。固然科学的发明与物质的创造，有赖于平时的修养与努力，但是战争也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刺激了物质的生产。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看见了很多的新发明与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当然是更多了。在这种观点之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长期战争中，竭力倡导科学的研究与发明。其实，不仅在战时应该如此努力，在平时尤应如此不断的努力。因为我国的科学发明与物质创造，是太落后太贫乏了。我们必须趁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来发展科学，建立现代强国的基础。是以我在二十九年度的省预算里，加列了科学奖金十二万元，三十年复增列科学研究费五十万元，科学奖金增列十四万元。这是浙江省预算新增的项目，数字虽然很少，意

义却是很大，尤其是在财政困难军费支出浩繁的战时。这两项经费，既同属新增，为什么数字不一样——科学研究费多，科学奖金少，而且多少相差这么大呢？因为必须先有很多人研究科学，然后才有科学的发明。在中国今日的社会环境里，要研究科学，是不容易的，既没有科学馆的设备，又很少蒐藏丰富的图书馆，足供科学研究者的研究参考。一项科学的发明，往往须经过长期的研究试验。在研究试验的过程中，总有极大的消耗，不论其结果是成功或失败。在国人的普通眼光看来，认为这种耗费，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值得的。殊不知值得不值得，那是事后成功失败的评价，有时大得难以计算，有时小得等于零。若就研究试验的本身来说，即使是失败，亦不能完全否认其价值。因为失败为成功之母，尝试错误的纪录，可供后来者参考。一个要想从事某项研究的人，如果没有或不足或不肯化用这笔研究试验费，就无从知道这个研究试验的真正价值的。所以研究试验费，是决定某个问题价值的必需用费，而不是某个问题的本身价值。也可以说，研究试验费，在科学的研究试验过程中，完全是一种消费，而须与研究试验所得的结果的价值，截然分开，然后方能符合其意义。而这些费用，为数是不可预计的。所以我们于二十九年度预算上，新列了科学奖金，以后三十年度，又增列科学研究费一项，其数字几乎三倍于科学奖金，因为科学奖金是发明和创造者荣誉的报酬，列数不须和研究费那样多。而且我们将这笔科学奖金每年只拨发半数，其余半数存储起来，作为科学奖金的永久基金。我希望这基金能积聚成一个相当大的数目，而成为浙江省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奖金。省政府为这个奖金，曾制定下列各种章则：（一）浙江省科学奖金暂行办法。（二）浙江省科学奖金暂行办法实施细则。（三）浙江省科学奖金保管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四）浙江省科学奖金审查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

第一次给奖情形　自从这几种章则公布之后，我们一面组织科学奖金保管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一面公告科学发明物申请审

查日期，使省内的科学研究者，将他们所发明和创造的东西送来审查。二十九年度申请审查的，共三十三件，经审查决定给予奖金者，计十一件，共发奖金二万零七百五十元。兹将得奖者的姓名及其种级录志如下：王挺文，经济植物油灯头，给予丙种五级奖金五百元。黄渭川，水平测高仪，给予丙种五级奖金五百元。李振民，度量衡折合计算尺，给予丙种五级奖金五百元。朱寿康，中国印花纸，给予丙种五级奖金五百元。胡四兴，弹计机关枪，给予丙种五级奖金五百元。黄季宽，七七式枪榴弹筒，给予丙种一级奖金四千元。黄季宽，各种地雷发火机，给予丙种二级奖金三千一百五十元。黄季宽，万变密码译电机，给予乙种四级奖金六千二百五十元。许蟠云等，二十九年式耐火瓷灶，给予丙种四级奖金一千四百五十元。黄渭川等，木装水管及接头方法，给予丙种四级奖金一千四百五十元。文佑彦，蒸汽发蓝法，给予丙种四级奖金一千四百五十元。这个奖金的授与典礼，是三十一年元旦在方岩临时省会举行的。受奖的数目，虽仅数百元或数千元，比不上诺贝尔奖金或其他世界性奖金那样名贵，但在浙江尤其是战时，却是破天荒第一次具有历史的意义和价值的。

这是浙江"科学考试"的第一科，自然得不到好文章，但希望以后陆续有好文章发现。我在这次考试中，也得到了三种奖金。当初，我有些不好意思接受。因为：第一，我那几样东西，算不上什么。第二，我是一个发起人，自己反得了许多奖金。后来再细细想想，这是审查委员会公开的公正的评定的结果，他们不能因为是我的东西，而含糊给奖，我亦不能因为是发起人或省主席，而放弃我应得的权利。我是一个应考的学生，考试所得的奖品，当然是受之无愧。于是也就接受下来，但仍移赠奖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我的特别奖金，以奖励以后对这些东西更有研究的人。

自从设置科学研究费与科学奖金之后，省内科学研究的风气，为之大振。本来科学发明物的审查给奖，应该逐年办理的，因为敌人三十一年的大流窜和以后不断窜扰，省境动荡不定，奖

金审查委员会的委员，都星散了，无法召集开会。而各方送来审查的文件，还有二十七件之多。人家辛辛苦苦研究所得的产物，政府竟束之高阁，不但使研究的人失望，而我本人尤其耿耿于心，深感不安。并不是因为我也有东西送去审查，而是觉得我们对于科学太不重视了。中国科学不发达，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未审查决定的文件中，我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杨德俊所创作的“化学元素行列表”。初审的化学专家，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他们不敢决定，这是他抄袭前人的呢，还是自己的创作呢？因为在浙江负审查责任的人，在这长期抗战当中，尤其是僻处在这山角落里，与目前世界科学，隔得太久太远了。他们很虚心，不敢武断的审定。适值教育部陈部长立夫到浙江来，我便将这件东西请他带回重庆，交中央研究院去审查。结果得到教育部的奖金六千元。但对杨德俊这个表，好像还未作科学价值的评定。

在省政府当初所颁的科学奖金暂行办法中，规定以发明科学原理的,列为甲等,以有关国计民生的发明或创造，列为乙等。我觉得这个规格过高了。科学原理的发明，自然重要，但在中国，尤其是在浙江，不是不可能，而是太稀少，太困难了。而且以中国今日的情形而论，能够利用世界已有之科学原理来发明或创造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是最需要的。悬格过高，或反有碍这方面的发展。所以我们后来把这个办法修改了，以有关国计民生的列为甲等，是取实用并适合于地方性的意思。

在第一次得奖的案件中，虽没有很大价值的东西，而且在那些未得奖的案件中，还有极可笑的东西。然而我认为这是倡导科学研究的初期所免不了的。中国有句古话：“千金买马骨。”不管它有否价值，是否可笑，我们都一样重视。希望多买几副死马骨，然后千里马就会随之而来。

廿四　战时经济种种

物价货币与生活　当我们初退到金华的时候，一元钱可买猪肉五斤，可买米二十五斤，可买盐十斤。除了一些工业品或舶来品价格稍涨之外，其余的并没有波动。这就是指明战争的初期，物价与货币尚呈平衡状态，亦即是说物价并没有上涨，货币并没有贬值。后来物价逐渐的高涨了，也就是货币价值逐渐低落下来。但我听得财政当局说过："货币价格并未低落，因为法币的准备是充分的。现在的情形，是物价高涨，而不是法币贬值。"这种说法，也自然有他的理由，至少是另一种看法。但究竟是物价高涨还是货币贬值，很难得到一个确定的论断。我以为物价与货币，决不能各自分开，而应作综合的研究。现在的法币已离开金本位或银本位的关系，它本身已无实质的价值可言。而所谓价值是虚的信用的，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亦是如此。中国法币虚的信用的价值是存在的。但是虚的信用价值，战前与战时相比，有个差额，这个差额，就是法币贬值的数字。

物价的涨落，无论在平时在战时，都不外是供求的原因。我们离开货币价值的标准，也可测定一个物价涨落的标准，即供过于求的，价格低落，求过于供的，价格高涨，这都是失常的物价，唯有供求相等，才是物价的水准，也即是真正的物价。如果将这种真正的物价作为标准，来衡量法币，就可得到战前与战时的比较价值，同时也可以衡量其他物价的涨落差数。

先就目前浙江市场上的物品，照前述的原则分三类来研究：

第一类是供求相应的。如米、猪肉、食油，皆是本省出产，本省销费。对于省外，无论战前战后，都不发生很大的供求关系，也可以说，它的真价值并没有什么涨落。而它的价值高涨，乃是货币贬值的结果，今假定米、肉、油在浙境内，或某县内，没有供求上的关系。在战前，米价每百斤是四元，现在每百斤二千二百元（各地平均数），比较涨了八百倍。猪肉战前是二角钱一斤，现在是一百六十元一斤（各地平均数），亦是涨了八百倍。食油战前是三角钱一斤，现在是二百六十元（各地平均数）一斤，比较涨了八百五十余倍。也就是说，货币的贬值，在浙江平均是八百多倍。第二类是供过于求的。如木材、茶叶、纸(迷信纸)、水果，都是浙江的特产。战前它的销场,不仅是本地,而是大量的销到省外，战后省外的销场减少了，本地的销场有限，所以它的价值,虽比战前表面上是涨了一百倍至两百倍,而实际的价值，不但没有增,反而是减低。即是等于战前的一角二分至二角四分,也即是它的实价比较战前低了八倍至四倍。第三类是求过于供的，如纱布五金以及一切外来品。它表面上的价值,有涨四五千倍者,但要除去货币贬值的倍数，才是真正的涨价倍数。比如某种布，战前是一角钱一尺，现在是二百元一尺，表面上是涨了二千倍，但要除去货币贬值之八百倍，那么真正的涨价，乃是一千二百倍。

币值与物价的情形如此,所以社会的生活,亦同样形成各别的变态。以薪俸收入为生活的公教人员，他们是受了双重的剥夺——货币贬值与物价高涨，政府虽每年都给他们增加薪俸或补助费，但无论如何，也跟不上币值的低落，与物价的上涨。就拿二十七年省政府规定各级公务人员最高薪一百四十元来说，那时候是想减少一些薪俸的支出，使战争能永久维持，而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币值与物价没有变动，自然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但是到现在照币值八百多倍来伸算，就需有十一万多元的收入，才抵得上二十七年一百四十元的币值；物价额外的高涨，尚未计算入内，所以在长长的八年当中，这些薪俸阶级的生活，实在是苦

到极点！然而直接支持抗战局面的，却是这些公教人员。如果拿货物来作比例，他们真要算是战时价最廉物最美的了！

至于以粮食为生产的农民，他们的生活，在三十年以前并没有什么变动。因为他们生产的粮食及其他副产的价值，与货币的价值尚称平衡。虽然也受到其他工业品涨价的影响，但在三十年以前，田赋尚未征实，实际上赋额是减轻了。假定三十年币值低落到一百倍，他们对于政府的负担，比之战前还在十分之一以下。他们可以从这方面得到补偿，直到田赋征实之后，才渐渐感到负担的加重。不过这种负担，并不比战前增加得许多，而仅仅是受到工业品的影响。至于以木材、茶叶、土纸出产为生活的农民，情形就大大的不同了！他们的生产品是低落得厉害，同时他们的消费品，却涨得厉害！所以从事这种生产的农民，简直都有破产或失业的危险！但是这些生产者，仅是少数，而且大半还是副业的性质，所以还能勉强支撑下去。而且中国的农民，一向以忍耐见称的，他们只要有一碗饭吃，其他日用的东西节省一点，甚至没有都可以的。

直接间接支持抗战的两大主力——公务人员、士兵与农民，他们的生活，就这样的艰苦支持了八年之久，这是一般经济学上说不通的道理，而中国却是这样平稳的度过去了，这就是中国人的精神，欧美人所未必能够了解的。至于那些商人及工人的生活，他们都是水涨船高，受到币值和物价的影响很少，而且从业工商的人，在中国究竟是很少的数目。

实行粮食管理 浙江的粮食，素来总是不能自给的。在战前要由上海各地输入很多的粮食到宁波、绍兴等地，同时温州、台州，也有许多粮食运往上海，这一出一入的数目，到底有多少，实在没有正确的统计。战后上海的来源断绝了，而由浙赣铁路输入很多江西的粮食。依据二十八年浙赣路局的统计报告：全年运浙的赣米，为五六,四九七,一００吨（即一，一二九，九四二市担）。后来赣米的来源受了限制，浙江的米价，也就日渐高涨

起来，二十九年金华的米价，高到每元十五斤，宁绍比金华还要高一些，于是社会上就恐慌起来，同时粮食管理的呼声，遍及各地。省府乃设置粮食管理处，我自任处长①，朱惠清任副处长，这种粮食行政工作，在中国过去就没有前例，而在外国已经是很普遍，尤其是在战时。恐怕除了美国，没有那一国不采用这种配给制的。

粮管处成立之后，首要的工作，则为如何觅取粮源与管制价格。这时，江西的粮食，亦因价格高涨而实行禁运。于是更造成浙粮的恐慌，米价扶摇直上，一块钱只买到米五斤。这要拿今日粮价来比，已经便宜的惊人，而在那时，大家都骇为古今未有的现象。而热切希望的，仍是赣粮的开禁运济。一时党政机关，民意团体，旅渝同乡，无不齐声呼吁，结果仍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省外既无可望，乃不得不从省内想办法。于是冬耕运动，糙米运动，实行禁酒，稻麦改良，都随而进行。在这几种工作中，我以为冬耕运动，收效最大，以前有好多地方，不种冬作的，都普遍种起来了。这一方面固由于政府功令的限制与提倡，亦由于粮价的刺激与实际的需要，使它自然的发展。我在三十年春，巡视绍兴各县，路经浦江县，据金县长平欧报告，他对于冬耕，做得很普遍而彻底。的确，自郑家坞(浦江县属)至浦江县城，沿公路二十多公里，几乎没有一块土地是不种麦子的。这种现象，不仅浦江如此，其他县份也差不多，我不过拿浦江作个例子来说明。

糙米运动，也是我当时提倡最力的。因为如果能由食熟米改食糙米，每百斤里可以多出四五斤米，以全省来计算，这个节省下来的数目，极为可观，于粮荒问题的解决，一定得到很大的帮助。可是这个效果，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而且或要得到一些相反的结果。因为糙米实在太没有标准了，甚至把谷子砂子都参杂在里面，使人吃了发生妨碍消化，营养分不能吸收的毛病。据我

①据《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940年3月条下，作“徐桴任处长”，与黄绍竑此处所记有出入。

的经验，吃饭的时候，如果咬着一粒砂或一粒谷子，随着它吐出来的米，一定比沙子、谷子多得数倍。如果一担米里一斤沙或一斤谷，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牺牲数倍的米。至于有碍卫生，又是另一问题。现在的公粮、军粮，糙得不成样子，这自然不是提倡糙米的原故。而是粮政机关只要求数量的满足，并没有想到损失方面与卫生方面的重大性。这实在是一桩很不合理的事情，而不是提倡糙米时始料所及的呵！

酿酒自然是可以消耗大量的粮食。尤其绍兴酒是风行全国的。战前，浙江酒税的收入，约有二三百万元，其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当二十九年饥荒时候，曾下过全省禁酒令，但是这事很不容易彻底办到。因为酒税是国家正常的收入，禁了酒，就妨碍国家的税收，而且绍兴酒业的人很多，也要顾虑到他们失业问题。所以不久也就废止了。可是因交通的关系，绍兴酒也无法销到省内各地或省外去，产量自然减少。现在省内外各重要的都市，都有一种仿绍酒出产，味道也不比真绍酒差得许多，战后绍兴酒的销路，恐怕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吧！

稻麦改良，是浙江农业建设的重要工作。先说育种部分，开始于十九年秋季。到二十七八年，此种工作仍旧不断，而且更加觉得重要。最优良的稻种，要算中籼一号、十号、六五0六号、五四四一号和晚籼九号、晚粳一二九号、晚糯二0四等号。麦种要算第十七号。这些纯系品种不但产量多，而且抗旱、抗风、抗病的力量，都比普通种为强。也可以说因为能抗旱、抗风、抗病，而产量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一些。据报告优良的稻种，每亩要比普通种产量增加百分之二十以上，优良麦种每亩要增加百分之十五左右。所以人民极乐于推广。遂昌县推行得最力，成绩亦最著。这一个缺粮的县份，就以推广改良种，来解决它粮食不足的问题。

物种改良，要有很长的时间，工作人员，尤要有持久的耐性，农业改进所所长莫定森，他是主持这个工作的人，可以说浙江稻

麦改良工作的历史，就是他个人的历史。在战时立功而不见功的人，是值得赞美的。战后还需要这些人来努力，国民经济建设才有希望。此外还有许委员蟠云，是在战时研究畦田与区田的。这是种植方法的改良，据实验的结果，收入量亦增加很多，但是现在还不易推广。

在农作物的改良上，尚有一个值得介绍的人，这就是黄岩的朱文劭（信勤）。前清末年，他曾任广西道员，而是接近革命方面的人物。他于退休后，专心研究橘子的改良。黄岩是浙江产橘最多的地方，但品质平凡，多而不贵，他把美国加州的橘子移植到黄岩来，听说美国加州的橘种，原来是由中国带去的，那末他可算是替橘子做了归宗的工作了。二十九年冬，朋友送我一些橘子，色味兼美，我总以为这是他从上海购来的美国橘子，但细看它的商标，却有“朱氏宜园抱子橘”的字样，才知道这是黄岩出产的。“朱氏宜园”就是朱先生自己经营的园圃，他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与时间的研究栽培，才得到这种美满的结果。但是那时仅生产一些样品，或者说是赠品，而并没有大量的生产商品，现在却已逐渐推广，一般人都可以尝到这种美味了，我想将来一定有很大的成就。这种园艺作物的改良，虽与粮食无关，但就发展农村经济的立场说，是有很大的价值，而值得介绍的。

浙江粮食的增产，耕地的开辟，是当前切要的工作，但内地的垦殖已达到饱和点了。在山岳地区，有的并已垦殖到山上去了，这不但有碍水源，淤塞河道，而且减少森林，恶化气候，是得是失，很易计算。而沿海区域，则少有人去注意，沿海的海涂，是不断的增涨，以前政府方面，曾有沙田管理局的设置，但目的只是管理新垦成的沙田，以增加财政收入，却没有积极的垦殖计划，以增加农业生产。据我所到沿海的地方，可开垦一千数百亩的海涂，是随处都有的，我所到过的狼机山一带（黄岩、温岭的沿海地区），若果加以经营，数年之内，就可成为七八万亩的良田。其余如桃渚区、三门湾，则更不必说了。省内盛行一句

话："山上十年，不如海上一季。"这固然是指渔业方面而言，但何尝不可形容到农业方面来？故今后浙省农业之增加，必须在沿海着手。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是需要相当的时间与相当的经费。

以上所说，是粮食开源节流的工作。至粮食分配工作，也在二十九年五月七日，首先在金华城作计口授粮的实验，事先动员了专员公署县政府的全部人员，及政工队警察保甲长等六百余人，作人口的精确调查。在上午三时半开始，将全城交通断绝了，并禁止每一人家的人出入，由工作的人员按家按户把人口调查表照实有的人口填写，至上午六时后，全部的工作都已完成。这次金华的人口调查不但在浙江省内，就是全国，也算是最迅速最确实的一次。有了人口正确的数字，然后才能够作粮食配给的准备。我们把全城的粮食登记了，粮食商店都停止了营业。其实他们因为闹米荒，根本无法供应，已自动停业了。我们按照市区人口，分设若干粮食公店，把准备好了的粮食，在公店里供应。市民都发有购粮的凭证，大口每日一市斤，小口每日半市斤，乳口不计，最多每次可购取五日的分量。这种办法实行之后，金华城区的米风潮，就平息了。乡村方面的民食，原有自然调节的机能，不成很大的问题，如果乡村民食也发生严重问题，则城区更不得了了！这种情形，不但中国如此，恐外国也都有同样情形。这事起初办理，并不见得如何棘手，但后来困难就渐渐的发生了：第一、是粮食准备与周转不易。政府并没有很大资本准备大宗的粮食，往往周转不灵，弄得不能接气，而为人所指责。第二、对于价格的稳定看得太重，总是想维持一定的价格，而不敢轻易变更，但是粮的来价却高涨了，按平价收购，则取怨于乡农，不按平价收购，而按平价出售，则补贴不起这许多亏耗，两方都遭遇到极度的困难。第三、是那些业务人员都是调用的，一时工作虽很紧张，日子久了，就没有恒心，而且影响其他的工作。因为县政府并没有这笔业务预算，而又不欲在供应方面收取

业务费用。这件事自二十九年五月起，至十一月止，一共办理了七个月。那年的粮荒既已过去，就把这个计口授粮的业务结束了。这是金华城区的情形。其他各县，也有仿行的，但没有金华实施的彻底。而各县为取缔囤积居奇的大户，也尽了极大的力量。有些县长报告我：凡是可以藏匿的地方，都去搜查过，甚至棺材里也有米谷搜出来。因此渡过了二十九年的粮荒。三十年粮政机关改组了，中央设粮食部，省设粮政管理局，任命徐桴为局长，斯烈、魏思诚为副局长，同时实行田赋征实。

田赋征实得到良效 田赋征实在抗战期中，自然是财政上一个极大的改革。我过去曾提过案，并且在浙江首先实施折征实额。中央决定征实，自为我所衷心拥护的政策。这个政策的确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控制军粮公粮。全国有几百万军队，和百余万公教人员，在粮价日渐上涨，刺激人民心理恐慌的情形之下，不但预算的数字要大量的增加，就是有了钞票，又何处去购买这大宗的粮食？这种控制粮食政策，真是支持抗战的一支生力军。第二是调剂民食，虽然现在征实所得的粮，仅敷军粮，公粮之用，能够用来调剂民食的，数量很少。但是军公粮有了着落，恐慌的情形，就大大减少了，粮价就不至过度的高涨。而且有许多地方，就靠多余的军粮公粮抛出来，以压平市价。云和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虽然没有拿大量的粮食来调剂民食，而民食自然得到调剂，这是预想不到的效力。

田赋征实以后，在办理方面，自然增加许多行政上的麻烦。同时还予办理人员一种舞弊的机会，而加重了人民额外的负担。比之征收钞票，实在是弊多利少。但这都是政策实施上的表面问题，而不是政策的基本问题。照我的意见，这种弊端表面上虽是人的关系，而实际上是物的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物质设备，不能控制人的舞弊，如衡量工具的不准确，仓廒建造的不完全，容器包装的缺乏与不注意，以及不合理的运价与不合理的运输，以致人民增加了赋谷的缴纳量，并负担了保管损失的赔偿，

运耗的赔偿，劳力的损失，运费的补偿。而承办人员，乃得从中渔利。如果这些物的设备都得了合理的解决，则人的作弊机会，自可减少。征实的政策，就可得到良好的结果。所以今日粮政的弊端，就在不肯化本钱与措施的不合理上面，人的问题，还在其次。

物价管制政策的实施 三十一年，跟着就有物价管制政策的决定，这自然是为适应战事演进的需要。在本党五届十次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多人考虑到政府既没有实物，又没有本钱，光凭几条法令与一纸文告，物价管制是不是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会中最高当局曾指示以粮盐价格为标准，来限定其他货物的价格，并且还指定预算收入百分之三为物价管制基金。但是粮盐，因为我们有实物在手，所以能得到相当稳定的价格。至于其他货物，种类太多，那得样样都有实物控制在手里。而且百分之三的管制基金，在一省的总预算合起来，不过是千余万，而且还办不到。至于各项日用消费量的无法调查，与无法得到确实统计，犹在其次。当时我就感觉到这事恐怕行不通，但是国家的政策既经决定，是必须戮力奉行的，目前事实上虽有困难，且到了行不通的时候再说！

为实施物价管制，政府并规定设置各级专管机构。在省设有物价管制会议，直隶于中央的动员会议，省政府主席当主任委员，省党部主任委员当副主任委员，有关的各厅处长当委员，此外还委派地方士绅，尤其商会会长来参加。省以下的组织，大概也是如此。这个机构于三十二年一月成立了。省以下亦次第成立。主要的工作，就货品的登记，规定价格，并举行商民宣誓，要他们衷心遵守法令和规定的价格。举行认真的，要算温州。但他们的誓言，转背就忘了！于是商品隐藏了，黑市发生了，政府自然要照法令处罚他们。有些地方，实行所谓社会制裁，拿违反限价的人，来游街或站木笼，但是法令总敌不过私意，羞耻总敌不过血本，同时求的人太多了，他们希望私自得到一些东西。于是消

费者先破坏政府的法令，为满足个人的欲望，多花几个钱，满不在乎，只要货物到手。卖方也愈因此而施其操纵手段。不是熟人，不讲人情，就出了高价，还买不到东西。因为他恐怕你是政府派来的侦探，不敢随便卖给你。反正不做生意是不违法的，而且货物一日一日的涨价，又何必急急于把它卖出去呢？这个政策渐渐行不通了！于是中央将限价改为议价，由政府召集各行业，由他们自己议定各种货物的价格，这无异把政策的实质变更了。有些地方议定的价格，比市价还高，于是每商店的门口，都贴了"本店遵奉限价"的广告，而他门市的价目，还可以照标价打一个折扣。这种把戏，据说重庆市玩得最妙，想起来实在有些可笑！限价政策，就如此演变到现在，好像已无人过问了！不论政府与人民，都是如此，到现在连物管会的名义也取消了，物价管制政策，也就无形中宣告结束。

粮管与物管的结果 粮食管理与物价管制，这两个政策的重要性是一样的。浙省粮食管理，总算得到相当的成功。至于物价管制，尤其省以下的管制，则完全失败了。这自然由于中国工商管理没有基础，一向都是自由买卖，比不得粮食，它有数千年来人民纳粮的习惯（指以前的丁漕），可以从农民征到许多的实物。也就是说管制一定要有本钱、有实物，并且要直接管理生产，才能够生效，否则就会变成空话。我认为不能因为此次管制的失败，就认这种制度在中国不能实行，而是因为中国实行的条件不够的原故；尤其是中国人民生活太低，物质太缺乏。即使就世界上最低限度的分配量作标准，一方面穷人还是购不起，一方面仍旧供应不够，而变成少数人的供应与操纵，这是中国经济问题中严重的病象，必须就经济制度上作根本的改革。同时增加物质的生产，才可以达到成功的目的。这次失败的教训，正可供将来改革的参考。

两个地方供应机构 地方供应机构，这里也值得一述。浙江省的供应机构有两个：一个是省营贸易公司。这种组织，在各省

是很普遍的，而且包含的部门很多，但浙江的范围却是很小。以前，本来是想借他做些物资的交换，而从那里得到财政上的补助。后来因为省公务员生活困难，必须有一个机关办理物品的供应，以减轻他们的负担。因此这种公务员日用品的供应，便成了贸易公司近年来的主要业务，他们办理的供应品，虽不能达到全部公务人员必需数量的要求，但是价格方面，要比市价低廉得多，甚至一半以上。因为数量的不足，只好实行定量配给制度。拿食油和猪肉来作例子，每人每月仅可得到十二两茶油，和一斤猪肉，有时还不能按期的供应，自然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而且因为人多的缘故，在配给的时候，要排起队来，按顺序去配购。于是又有好多人感觉手续麻烦，同时因不能按期供应，而对供应机关起了好多的责难。但客观的说，那一个国家办理日用品的配给不要站队，而可现成的得到东西？至于能不能按期供应，那与物品的来源，交通的情形，资本的大小，有连带的关系。尤其在这山城里，遭遇的困难更多，求全责难，是很不应该的。一般人在这个有供应的地方，总觉得供应得不满足，但离开了有供应的地方，又感觉没有供应的吃亏了！第二个供应机关，是省合作社物品供销处。它是由前省合作批发部改组而成，是省合作社的前身，其职责在运用业务的实效，来引发合作精神，辅导县各级合作社的联合组织，使产、制、运、销等经济行为，在民主的合作经营下，能有计划的进行。这种工作，在中国实在非常需要。我在三十年十一月，全省合作会议时就说："目前我国经济上所以发生许多反常的不合理的现象，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国没有健全的经济组织的缘故。"因之，物资就不易集中配给，生产与消费不易取得协调适应。"假使我们合作事业办理得很好，合作组织能够普遍健全树立的话，经济上的许多困难问题，都可得到解决。"所以在物价管制工作开始以后，为了要确立公平的价格，顾到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的合法的利益，我在建厅召开的三十二年合作事业中心工作讨论会上，主张"运用合作社组织来

控制物资，管理物资，是顶好的也是顶合理的办法。”这在英国办得很好，如上次大战中，英国就靠了各地合作组织来定量配给食物，大奏奇效。据曼彻斯脱的《合作新闻》所载：“在食物线上，合作运动自始即保护主妇们及她们的家庭得免剥削，并保持可资利用的货物之公平分配。”可见国民的经济生活，如果有了整个的组织，对抗战建国均能发挥很大的功能。可惜这几年来合作事业受了贷款紧缩，财政与经济之未能配合，军事动荡与经营干部缺乏等影响，合作的实效，尚未能充分发挥。不过，值得告慰的，浙省的合作干部的服务精神，都比较旺盛，一般的舆论，也颇多称许。也正因为有了这点可宝贵的精神，浙省的合作事业，在全国评价起来，还是算前进和较有成绩的一省。省会供处，也能一反一般业务机关的积弊。它自三十年成立以来，如对于九区各县的计口授盐，四、五、九区各县的肥料种子，实物贷放，以及淳遂区茶叶和五区油棉的合作运销，都尽过相当的力量。三十一年省会迁云和后，对省级员工按月办理日用品的定量分配，同时辅助了省会员工合作社的成长。它自己并还附设有几个小型工厂，在极少的资金运用中，尚能起相当供应作用。

物产调整与特产收购 在战时，尤其在正临前线的地方，经济的畸形，是必然的现象，浙江自然首先发现了这个现象。建设厅于二十七年一月向省政府提案，设置战时物产调整处。我到重庆去开会，遇到中央主管的长官谈起这件事来，他们也以为有此需要。所以后来这个组织就透过中央，而改组为油、茶、棉、丝管理处，并设立战时合作工作队，配合油、茶、棉、丝管理机构，协助抢收特产及统制指导省内的物资。油、茶、棉、丝要算浙江的大宗特产，所以要把它管理起来。浙江可算得是产油的省份，单就用油说，桐油，柏油的出产，都很可观。桐油据查年产有二十余万担，与国内其他产桐油省份来比较，自然比不上川、湘两省，但并不少于广西，或者还多些。这等桐油，除本地消耗一小部份外，大多数都是外销到上海或美国。所以桐油在浙省出口货物

中，占了最重要的地位。自从战事发生，交通阻塞，运输不便，销路受了影响，价格就非常惨落了。柏油也是浙江特产的油，它不像桐油在山上成林的种植，而是在阡陌上或村落旁零星的种植，但是非常普遍。我在南京（未到浙江以前）的时候，有人约去栖霞山看红叶，见到山上疏疏落落的那些红柏叶，觉得很有趣，好些人甚至把它当作吟咏的题材。我一到浙江，尤其是金华兰溪一带，在秋冬之交，满野都是红叶，虽然不觉得讨厌，但是太多了，就觉得平凡。柏油分皮油、青油两种，青油系柏子仁榨出来的，可供点灯之用；皮油系柏子壳上附着白色的硬脂肪。一到冬深，红叶落下来了，就剩下这丛丛的白粒在树枝上，亦可点缀冬天的景致。皮油在战前，多数用作制造土蜡烛，战后兼成为制肥皂主要的原料。据查共有二十多万担，亦为浙省重要的出品。

龙井茶谁都知道是西湖的特产，它不但代表杭州的茶叶，而好像是代表浙江的珍品。虎跑泉水龙井茶，可算是杭州西湖的双绝。但是浙江的茶叶，除了龙井绿茶之外，还有绍兴平水之绿茶，和温区及玉山之红茶。两者分布的区域，都很广大，除了沿海的水乡，有山的地方，差不多都产茶。据查战前每年绿茶有二四五，三〇〇箱，合一四二，二〇〇市担，红茶有一八，三〇〇箱，合一一，二〇〇市担，自然浙江人自己用不了这许多，而是大量的销到省外及欧美，乃至北非洲等国去。我自退出杭州之后，就没有饮过龙井茶。但是各地山上茶叶，年年还是照样生产着，价格也特别的低落。据说现在茶的价格，还不到战前的一百倍。所以我历年所到各地，充耳所闻，都是一片救济茶农的呼声。这便是要把它列入调整的范围的一个理由。

余姚，是浙江最大的棉花产地，也可以说是东南各省最大的产棉区。据查每年的生产量达五十余万担，产盐与产棉是相连的，余姚是浙江最大的盐场——年产三百馀万担——产盐的海滩逐渐向海边移动，距海远一些的盐滩，因不能产盐，而废弃了。

这些废弃的盐滩，经养淡垦殖后，唯一适宜的作物就是植棉。所以余姚产盐多，产棉也多。余姚的棉花，以前曾经过相当时间的改良，而成为他特有的品种。虽则纤维短，不大好纺细纱，但纺粗纱，织土布和作棉胎，是服用品极重要的原料。故在上海市场上，姚棉也有它单独的行价，自从华北、华中，产棉地区相继沦陷后，余姚棉的地位，自然更加重要。如何的管理？如何的运用？自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浙江的蚕丝，在中国占着首要的地位。二十六年产丝最多的杭、嘉、湖首先沦陷，剩下绍属萧、嵊、新各县所产鲜茧数量，尚有一八，九〇〇市担，仍是可观。而且敌人对于蚕丝的统制，着着进行，不遗余力。在太平洋战争未爆发前，敌人想利用江、浙出口的蚕丝，向欧美换取战争的必需品，来反打击我们。他们的手段，是如何的毒辣？更加杭、嘉、湖一带数百万的人民，他的生活基础，就建筑在蚕丝上面，政府怎样去救济他，使他生活不至濒于绝境，也都成为战时的重大问题。

省政府根据以上所述的情况，而决定了调整的办法。自然地方见得到的，中央也一定见到，而且以地方的财力、人力，要解决这重要的经济问题，是不容易甚或不可能。所以在省府创办的初期，除了订定一些管理的规章之外，很多的重要工作，都未能进行。二十八年春初，中央主管机关参加了这个机构，好像是中央与省合作的性质。到了三十年春初，前项特产的收购工作，奉令划归财政部的贸易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中茶公司等直接办理。主要的目的，是要将油、茶、丝来换取外汇，设了些专办的商业机构，以前的行政机构就取销了。收丝的有富华公司，收油的有复兴公司，收茶的有中茶公司，收棉的有福生庄，可是商业化的性质太重了，救济的性质就无形减低。

余姚的棉，在二十八年的时候，贱到四角钱一斤，都没有人要。收购的机关，总想再便宜一些，方大量收买，也许因为没有资金的原故。如果在二十八九年，多用资金，大量收购，现在的

被服问题，也许不会闹到这样的严重。三十年余姚失陷了，敌人对于棉花的管制，十分注意。他们真是见得到，做得到。他们不但控制了华北、华中的产棉大区域，而对于这小小的余姚，也控制得十分严密。他们所定的收价，相当的高，使农民不至隐匿走私，并且给协办的伪地方政府以相当的好处，使他乐为协助。伪余姚县府号称为伪组织中的模范政府，对于此事之协办得力，甚有关系。这是我们可作为经济斗争的好资料。

油、茶、丝到现在可说是不管了。在前几年，我所知道的，是规定收价太低，而且又不能尽量收购。我所听到的是一片呼吁救济的声音。际此百物昂贵的时候，农民自然希望他的生产品，同样的涨价，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可是因为禁止出口，或即使准许出口，也没有这样大的销场，所以价格总是涨不起来。而在收购方面，恐怕有两种前后不同的观念：在前以为这是国家禁止出口的东西，在内地既无大量的销路，即使给价低些，农民亦无可如何，而总得忍受下去，他们的劳力与成本，尽可不必十分顾虑。在后则以为政府尽可能的收购一些，聊尽救济的责任。殊不知他们因积年的亏耗，已陷于崩溃的绝境，救济已来不及了。所以弄到养蚕的人，都把桑树砍了，改种粮食，以维持他的生命。植桐的人，都把桐树砍了，当作柴烧；未砍的，桐子亦不去采摘，任它在山上自生自落，因为桐油的价格，还抵偿不了采子榨油的工本。种茶的人，也都不去采茶，不去整枝，让茶树自生自灭。这几种特产，可说都在战时被迫上毁灭的途径，今后的恢复，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能做到的吧！

我对于这个特产收购问题，认为首先应确定两项原则：第一、应知这几种特产，在战前于国家对外贸易上，占着相当重要的地位，战后将负起换取建国必需品的重要任务。战时国际贸易停顿，这些特产滞销，农村经济发生极大的困难，政府自应尽力救济维护，使它渡过这个难关，俾于将来仍可继续发挥其力量。否则，农民虽然只有自怨命运的不济，而不敢埋怨政府，但是未

来政府需要特产出口的时候，他们又有什么力量可以贡献给国家呢？第二、政府战时的经济政策到底是为谋利的呢？还是为维护国民救济的呢？如果以谋利为目的，自然以贱收贵卖为原则，如果不是以谋利为目的，那便应根据农民生产成本以决定收购的价格，并且要尽量收购，以维持这几种特产的生存，而使在战后仍可以发展。我觉得以前对于这两个原则，都没有注意到，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我也明知道就是以中央的力量，也未必就能将战时特殊的情形打破，不过在事理上应该作如是的看法，而不是含有批评的恶意。

工厂内迁的失败　说到战时的工业，就得先将战前浙江的工业情形，略为叙述一下。中国的工业，自海外通商以来，就建筑在沿海、沿江的重要口岸上，内地除了一些手工业外，简直是没有一些机器工业。浙江距离上海太近了，它的工业也就依上海为中心。从前杭州、宁波、温州等处，虽然也有若干具备相当规模的工厂，因为战争的演进，不断的受打击，也终于消灭了！

当杭州快要沦陷的时候，我曾对各工厂下过命令，要他们搬到内地来。但是除了强制的拆了若干机器之外，能自动迁移内地开厂的，实不多见。自然有很多的原因在里面，而不是那样简单的问题。规模比较大一些的工厂，生产与消耗，都不是限于一省或一县的。就消耗来说吧，它所需要的燃料及原料，或者要取之外省，或者要取之外国；再说它的生产品，或是要销省外，或是要销国外。若果勉强把它搬进来，一定会困死。至于搬迁的损失，与内地能不能找到许多熟练的技工，还是另一问题。所以工厂内迁，在浙江是失败的，也可说合理的失败。我二十九年到重庆，参观过西迁工厂的出品展览会。林继镛君是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处长，他当时将办理工厂西迁时的困难情形告诉我，并且将入川后成功的情形也对我讲了。那些厂商呼他做“工厂之母”，因为没有他竭力主张和强制，这百数家工厂，都要沦入敌手了！他对于国家工业，自然有很大贡献，“工厂之母”的称呼，是颇

恰当的！但我想想四川是天府之国，是陪都的所在地，容纳得下这些工厂的消费与生产的条件的。而且那些内迁的，都是上海或汉口三四等的工厂，若果换了头二等的工厂，或者是换了不如四川的地方，就成问题了。

战时经营的几个工厂 大工厂不能内迁，小工厂就随着战争，而在内地渐渐的发达起来。里面有些是政府办的，有些是私人办的。政府办的要算铁工厂、化学工厂、造纸厂、纺织厂、洋灰厂规模比较大些。铁工厂起初仅是由杭州拆下来的几十种机件，后来逐年扩充发展，分为三个兵器厂，一个造船厂，一个炼油厂和一个工作母机厂。铁工厂之所以能在很短时间内这样的发展，完全因为造兵器的关系。在战时兵器不怕没有销路，它的产品，南至闽粤，西至桂筑，北至皖甘，本省自然仍是一个大销场。它的消耗曾经用到萍乡的煤，上海、香港、福建的铜铁和五金。本省的烂铜烂铁，也都搜罗一空。因为它有这样大量的消耗和广大的销路，才能造成这个地位。后来兵工部分，拨归中央，炼油造船，就关门大吉。工作母机厂也就岌岌可危，但是我仍旧多方设法，把它维持着。因为它与我有很长久的历史，我是这厂的董事长，并且是我研究的乐园，不忍它生命的断绝！并且虑及有很多机械问题，无法解决。现在它正努力创造它的新生命，亦希望为战后内地工业创造新生命。在浙江方面已经开始的，就是研究制造水动力机。这种研究，在二十九年的时候，就计划进行，主持研究设计的人，是厂里的黄工程师渭川。头一部水动机，完成于三十三年的春天，就装置在云和的惠云渠，利用灌溉农田的水，来发动电力，成为云和水电厂。三十三年四月间，开始放电，使这黑暗的山城，得到了光明。现正在装置中的，还有龙泉和龙泉县属的安仁镇、遂昌等三处。正在筹备中的，有松阳、庆元、缙云等三处。在云和已经使用了一年多，成绩非常良好。在制造的技术上，以后当然不成什么问题。这一种工业新生命的前途，真是光明而远大的！

浙江的地质上，缺少了良好的煤矿，是工业上一个大缺点。但是在内地的河流，多是滩高水急的，尤其是浙南的瓯江。如能充分利用起来，不但可以解决工业上的动力问题——是最低廉的动力，而且同时可以解决很多的灌溉问题与航行问题，真是一举而数得的事。我曾就瓯江来估计，由下游的温溪至龙泉，约莫是二百四十公里，中间就有一百多条滩，全江平均的坡度，估定为千分之三，则由龙泉至温溪，就有七百二十公尺的水位差。如果按二十公里筑一个水坝，可以筑二十二个水坝，在每一段里的水位差，就有二十公尺，瓯江流量之大，加以这样高的水位差，发出来的动力，就可以估计出来了！我在报纸上看到美国人正在计划扬子江上游的水电工程，这真是长江流域的一个福音，我希望这种福音，能播到浙江来。

三酸工业是化学工业之母，我们的化学工厂，就是根据这种需要而建设的。创办的是薛济明博士，他战前在上海办了好多年的化学工业，要他来办这小小的厂，自然是驾轻就熟的了。可是中间经过了不少的困难，不能如期的开工。他说："战前在上海办理工厂，当厂长的只要计划的不错，照着计划里所需要的东西，开单到洋行里去要，或者承包出去，就没有问题了。一切都可以按照计划顺利的进行。现当抗战时期，又在内地办厂，有了那样没有这样，一切都要厂长自己去设法，或自己制造，或是找寻代用的东西。一个厂长，要具有泥水木匠烧窑铁工一切的知识。当了这个厂长，等于进了全部工程大学，个人在战时的锻炼，虽然有价值，但工作却迂缓得多了！"后来工厂开工了，出品有了，但每二十四小时，要制出两吨的酸，这样开工不到一月，就停顿下来。因为这几十吨酸，在工业发达的地方，真是西江一勺，为数太少，但是在内地，就一年都销不了。统计自开厂以来，一共只销售四十吨的硫酸，那工厂就这样的长久停顿下去。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些酸，很多的小工业，就成问题。政府为维持社会上可怜的幼稚工业，亦只好这样维持下去，那里谈得上发展与

赚钱？记得我在广西（十七年）也办过一个硫酸厂，厂长是德国人，他起初的计划，每日生产五十吨，我要他改小一些，他就改为二十吨，我仍嫌太大，他说："这是最小的了，如果再要小，在德国就买不到这样小的机器！"但是后来销路果然大成问题。经设法减到每日十吨，还是销售不了。平时尚且如此，战时工业，又将从何说起呢？

造纸厂是我们大胆的尝试，浙江产纸除战前在杭州、嘉兴曾设有机器造纸厂两所外，其余尽是用人工造纸。以前上海新闻界的闻人史量才等，曾拟在瓯江下游的温溪，设立一个大规模的造纸厂，供给上海各报所用的报纸，原因是浙南多木，可以制造木浆，并且想利用瓯江急流的水力来发电，后来没有成功。照我的观察，这个计划，好似空阔了一些，但是浙江要设造纸厂的观念，就深印在一般工业人的脑中了。钱子宁、朱尊民、毛乃粮，他们是中国造纸界里面所谓中原派（即中原造纸公司），他们对于这事，非常热心，总希望政府设立一个造纸厂，来实现他们的计划与运用他们技术。但是机器由那里来呢，外国买不到，只好自己设法制造，我问铁工厂厂长黄祝民："能不能制造这种机器？"他说："只要计划图样打得好，制造的技术我可以负责。"我当时心中对于彼此两方尚有些怀疑，但是必须由他们去做做，这个怀疑才可以解决；万一失败，亦是一种宝贵的经验。那些机器，还可以当作废铁用，只是化费一些工钱，也不致有多大损失。经了相当长的时间，遇了不少的困难，终于成功了。试验的结果，还很满意。三十一年，敌人由丽水西进，打到离纸厂五百公尺的山上，军队要将纸厂破坏了，那守厂的职员，对暂编三十二师的团长关震东说："团长，请你多顶一顶，黄师长（权）的援兵就会到了，这是浙江唯一自己设计的纸厂，亦是黄主席的心血啊！"那团长听了这话，认为很有道理，便率领队伍在那山头上与敌人死拼，黄师长亦亲自到来，将敌人击退，纸厂赖以保存。这都是抗战中难得的人员，虽然是一件小事，亦是值得称道

的，战争平定了，想正式开工，但是政府没有很多的流动资金，想同主管工业的金融机关借款，他们以为太近前方，危险太大，说是没有头寸，这已成功的纸厂，就这样差不多停顿了三年。最近出租商人，制造钞票纸，现在用这厂制造的纸，印成的钞票，已流通在市面了。那些银行界的人们对我说："亏得有这个造纸厂。"我想想，不免有些好笑，因为他们眼中只见到钞票纸，并未见到纸厂！

浙省近年来的民营工业 近年来浙江的民营工业，尚称发达，比较有规模而新颖的，要算吴百亨的牛奶厂，与瓷器厂。牛奶厂战前就开办了，战后仍继续经营，据说战前他的制成品如奶油、炼乳、淡乳等，在上海市场上，极有地位，而予鹰牌炼乳以重大的打击。奶油更是中国厂家的独步，而没有人同他竞争的，战后上海的销路虽然断绝了，但他的营业仍能维持。因为他用尽种种方法来解决厂的困难，支持厂的生命，他利用制奶油剩下来的奶清，提炼乳糖，奶渣提炼干酪素。精糖没有了，他自己利用当地所产的甘蔗来提炼糖精，使他这厂内没有废弃的东西，没有缺乏的东西，不为环境条件所束缚，真是难能可贵的。这个厂中，还有两种特色：第一、它的机器设备很新，一切都是自动记录，不易发生人为的错误。化验室及图书设备，亦相当完全。第二、牛奶的来源完全用中国水牛，并且采用民间合作饲养的方式，无须自己饲养。据说以前自己养外国牛，因为天候与饲料的关系，完全失败了，乃改用中国水牛。经过数年的保育，改良饲料，不令耕田。每头乳牛最多每日可出乳二十五斤，平均在十五斤左右。农民饲养一头乳牛，在战前奶期每日有六七角钱的收入，每年可得一百多元，利益甚为优厚。而且水牛对于肺结核病抵抗力特强，并易于饲养，这种育牛计划，可说是成功了！西山瓷器厂是战后才创办的。据说："宋代西山（温州城西），曾出过瓷器，故以此命名。"起初是请几个江西人来当技工，一切都是照江西的老办法来制造。后来觉得太落伍了，乃将原始的斜形

遂道窑，改为新式的圆窑，用机器炼泥，用机器及模形做坯，工作效能大为提高，形式质地也精美了。他具有很大的野心，想争取上海和江浙瓷业的市场，将江西瓷器压倒。此外，还制电用瓷器及耐火砖。照我所见，这是中国最新式而机械化的瓷器工厂。

说起瓷器，就会联想到龙泉宋代的哥窑。这种东西现在已成为历史上的遗迹。而剩下来的残骸破片，还引起许多人研究的兴趣。徐县长渊若，曾写了一本《哥窑与弟窑》，专门研究这些残余的东西。这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残物，价钱却是很贵，创造的人，竟贻惠于八九百年以后，使无知的贫民，终年在发掘坟墓，发掘废墟，以寻求这种残物，供考古者的鉴赏，而赖以生活，亦可痛可笑之事！龙泉现在的瓷业不知退化衰落至若何程度，产品粗俗得不可耐。有一个过去在洋灰厂当烧窑的班长，他主持一个窑的工作，而稍加以改良。我问他："出品比其他的窑怎样？"他很得意的说："自然啰！要算我们第一了。"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你就可算第一，若果换一个更有研究的人来改良，不是更好了么？"但是有研究的人，就不肯到那里去工作，中国残余的工业生产，可以说都是操在一班最无知识的人手里，中国的工业，那里能够复兴和发达呵！龙泉近来有一个姓陈的乡长，他专门研究仿宋的瓷器，看起来亦很好，外行的人就被他骗过。但无非是一些玩赏的东西，于现代生活上，不发生什么关系。

浙江还有一种特产的纸业，即油印用的腊纸。此种东西，原来是日本的特产，因为真笔板是它首先发明的，所以这种纸业，亦为其所独有。高洛腊纸，就是日本货的代表品。但中国人并不甘落后，勤业公司的风筝牌腊纸，首先起而与之争雄长了，勤业厂本来在上海，但他所用的原料如楮树皮、三桠皮等，都是出产在浙江的寿昌、龙游、遂昌、衢县一带，其他各地，也都有出产。抗战之后，这厂就搬到衢县城不远的乡下，我曾去参观过。据说："自从风筝牌腊纸出世，日本的高洛腊纸，已经败退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的原料，没有中国的好。"战前中

国全年要销用这种纸约四十万筒（每筒九十八张）大部分都由勤业供给，那时正是它营业鼎盛的时代。我出了几个关于改良造纸的问题，要他研究试办。那厂长说："现在的工作忙不过来，不能做这些研究工作。"他所说的忙，也许是事实，但他的意思是：现在的利益，很可以满足了，何必多找这些麻烦与多所耗费。我想：中国的私营事业，就完全以赚钱为目的，对于研究改进，向来很少注意。这就是一个例子。后来新兴的腊纸厂很不少，温州一处，大小就有数家之多，警钟牌便是一个代表者。

李毓蒙是毓蒙铁工厂的老板，毓蒙铁工厂，就以他的名字来纪念他的事业。他是一个富于铁工经验而又肯研究的人。他由机工出身，而到达现在的地位，这成就决不是偶然的。他这铁工厂规模虽不算很大，但是历史很长久，各地分厂很多。所出毓蒙弹花机，发明很早，已成为民间普遍使用的机器。他现已老了，但是他的精神并不老！他在瑞安的家乡，办了一个毓蒙职业学校。有机器的工场，引擎不断的转着，学生就是工人，先生就是工头。他想把这个学校当作他永久的替身。唯有未曾受过完全教育的人，更加知道教育的可贵，而热心提倡教育。好多人知道毓蒙工厂，而不知道厂主李毓蒙是一个勤恳而诚实的晚年人！

我在临海乡间，参观过一个乡下人面粉厂，并没有工厂应有机器设备，而只是一个古旧的水磨，经过某小学校长王君参照科学的原理，稍为改良一下，能使面粉的产量增加了一些，品质的精粗，也分得很清楚，而且面粉纯净，不致掺杂细砂。这种改良的粉磨，临海县差不多普遍采用了。所以临海的面粉，非常之好。到过临海的人，一定会想到洁白疏软的馒头，而垂涎欲滴。这面粉运到旁的地方去，海关当它是洋面粉，而照洋面粉征税，理由是"为什么土面粉也有这样的好？"

余姚、黄岩、温岭草帽业是有名的。战前销到美国，就有几百万顶，原料是菲律宾特产的蕉麻，不是普通的草类。太平洋战事未发生前，温、黄城乡老太婆、女孩子，每个人手里，都拿着

一把草，坐在门口编织。收入虽然很微，但是太普遍了，在一个地方统计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收入。天台县长梁济康想把这种手工业移到天台去，聘请技师开设训练班。正在训练而快到成熟的时候，我刚到天台，曾经检阅过一千多手里拿着未编成草帽的妇女行列。但是因为太平洋战事爆发，原料断绝，销路阻塞而失败了。黄岩、温岭也同样陷于不幸的命运！

受到战争摧残的手工业，除草帽业外，就算绍兴的锡箔业了。据说："操此业的人，有十多万，因为锡没有来源，而大半失业。"在绍兴未沦陷以前，我曾经设法由广西及大庾运到多量的锡，来维持他们的生计，绍兴沦陷以后，情形更为悽惨。而与他连带有关的纸业，亦同时受到影响。但锡箔究是迷信者的消耗，如果从此消灭了，未始不可减少社会之损失，铲除进步的障碍。虽然十多万人，一时受到失业的痛苦，但也可以转入其他行业里去。这种工业，根本是不必维持的。

制盐是沿海特有的工业，自馀姚沦陷之后，台州、温州沿海各县的小盐场，就兴盛起来。未曾到过盐场的人，总以为产盐的地方是何等富裕，因为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不知所谓富裕，仅是剥削阶级的盐商及拥有盐场的人，所谓盐民，可说是有史以来，就处在人间地狱里，未曾见过天日。盐民所住的地方，就没有一个学校，他们的知识，永远被封闭着，虽然受到重重的剥削，也不知反抗。他们终年受海风、海潮的袭击，与强烈日光的薰蒸，而不觉得痛苦。至于生产工作，都是数千年来的原始方法，并没有政府或资本家、科学家设法去改良。谁也料不到每人每日所必需的盐，与国家最大的收入——盐税，是出在这些最无知识最无幸福者的手上！

从战争中得到的工业经验　战争是经济激变的动力，有些是受到好处，有些是受到害处。但在中国，尤其是在浙江工业上所受到的害处是太大了。我这里所举述的例子，两方面都有，无非是想拿来作以后的参考，因此我再就从战争中得到的工业经验，

作以下各点的结论。

第一、抗战自然使工业受了极度的摧残与磨难，但亦如整个国家民族一样，在长长的八年中，养成了独立自尊的精神。它的牺牲与损失，固然很大，亦唯其如此，乃弥觉其珍贵。

第二、战时工业无论质与量的方面，都比不到战前，尤其是这种战时工业，在战后是不能生存的。因为政府在战前与战时，对于工业，都未有确定的方针与计划，而是听其自生自灭的。如果战后仍是如此，不但无法与战后各国的工业竞争，连恢复以前的规模，都不易办到，所以国家对工业的复员，要有周密的计划，对于制度、设备、管理、扶助各方面，都要有彻底的研究和改革。

第三、一个企业的成功者，都是笃实坚忍而富有经验的人。而这些人，往往是出身微末，在工作中陶冶出来，很少见到是学校出身有理论研究而并具备上述条件的人，因此我觉得要发展中国工业，固然要从发展教育培养人材方面着手，但关于工业人材的教育方法，就得大大的加以改善，不但学校的设备要完善，而学校对于学生的德性陶冶，要特别注意，使成为笃实、坚毅，富于创造性而无官僚习气的工业人员。

战时交通的演变 自二十六年十二月杭州失守之后，只有富阳、馀杭以北至吴兴、长兴前线，和南边隔着一条钱塘江，是壁垒森严，交通不便的。其余如宁波、海门、温州，差不多每日都有轮船到上海。上海好像是杭州敌人的后方，又好像是我们的后方。彼此往来，金吾不禁，似乎战事就只限于杭州的一隅，其他没什么关系一般。在我们的境内，浙赣铁路还可以通至萧山，公路更是脉络贯通，随处可到。我曾经坐汽车到过宁波，到过温州，以及沿海各地。到了二十七年的下半年，才奉令将沿海一百公里以内的公路、铁路彻底破坏。这时铁路仅通至诸暨，至于公路，北边仅通至白沙，建德、桐庐这一段，已经破坏了；昱岭关至临安一线，破坏的更早，东边通至嵊县的仙岩、奉化的溪口，及天台

的县城，南边通至青田。依此以东的沿海地带，各段良好的公路，都破坏了。对于大后方的交通，在南昌未沦陷以前，浙赣铁路可直达衡阳，接上湘桂铁路而至桂林。它把不少的浙江情调，带到桂林去。公路更是西通湘赣，南通闽粤。所以在抗战的头一两年内，并不见得因战事而觉得交通困难，反而觉得因抗战而交通比战前便利得多。金华到重庆，约莫是三千一百多公里，不要说在浙桂有直通火车的时候，就是铁路断了，我去重庆出席会议，也是三天到了桂林，如果飞机便当的话，第四天的早上，就到了我们的陪都。我在二十九年以前，亦曾三次到了香港，只是浙渝路上绕了一个小弯，并费不了很多的时间与遭遇何种困难。

战事随着时间进展，交通路线却随着战争而缩短！到了三十年，浙江的公路仅剩下江山、金华、丽水、浦城的一圈，及金华、寿昌、淳安通徽州的一线。中间虽加筑了遂昌、龙游及开化、淳安的两线，但比之以前是差得太远了。三十一年敌寇大流窜，全省的公路，又有几段被破坏，只剩了云和赤石至浦城枫岭的一百九十五公里。事后虽然修复了江山至浦城一段，及常山至淳安通皖南一段，但由临时省会的云和到淳安去，须经过福建的浦城，江西的广丰、上饶、玉山，才可以到达。省内的公路和县乡道路，无不一破再破。铁路仅恢复了江山到上饶的一小段，浙赣铁路总算还留存一个模型。三十三年，湘桂、粤汉两路的战事发生，扩展至于赣州。浙江与大后方的交通断绝了，好像变成东南一个孤岛！

浙江的公路交通工具——汽车，在战事一开始，就受到重大的损失。一部分是在淞沪会战的时候，被征调而牺牲了，一部分是撤退到后方，不愿意回来。到了最近，省交通处能行驶的汽车，不到二十辆，私人的货车，也不过二三十辆。汽车虽这样少，而以现在的路线与经济状况，好像还勉可应付。在初期因为交通汽车突然的减少，而社会所存的物资，还是很多，须要代替的工具来运输。于是手拖的双轮车，就应运而兴了！当时政府将

它编制管理，负运输的责任。而食盐收运处因运盐的关系，数量更多（据说有二千余辆），组织更为庞大。在金华、丽水的公路上，穿梭似地不绝来往，尤其是缙云到丽水这一段单行线上拥挤不堪，那时来往的汽车仍不少，在那些转弯抹角的地方，实在是危险得很。我时常坐汽车经过这条路上，汽车必须慢慢的行，才可通过。深恐稍一不慎，就会将手车碰坏，车夫撞死，或碰下河里去！但这种事件，始终没有发生，真是彼此的幸运！粤汉铁路局长陈地球，曾对此种手车队的组织与应用，作一番详细考察，他想在广东照样仿办。但是后来又觉得广东的公路，不大相宜，而且又不易得到这许多的车辆，就作罢了。

胶轮手车的时代慢慢过去了，原因是旧有的车身渐渐损坏，而它的胶胎，钢轮，都要从上海方面补充。自从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爆发，日本人占领了上海租界，对于这些东西，禁运得特别严厉，也许那时上海本身，就很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来源断绝了，就无法补充。在路上行走的手车，所有车胎，都是千疮百孔的。甚至没有胶胎，就用两个钢轮在路上辘着走。后来两浙盐务局又造一种木轮的板车，木轮上加了一条破汽车胎的橡皮，也就算是一种的发明！近来更有江西方面到来好些独轮的手推车——又叫羊角车，它是江西原始的陆上交通工具，他们不想改良，但是也不易损坏，除车轮上一条铁圈是来路品之外，其余都是土货，即使损坏，也容易修理或再造，实在也有它的好处。尝读史，秦二世驾羊角车游行，宫人欲求幸者，沿途洒盐水以引羊到来，因为羊是喜欢吃盐的。江西羊角车的到来，也就因为浙江有盐的原故，这是浙江交通史上一件有趣的事！

除了这些破旧的车辆之外，陆上一切的运输，就靠老百姓的两个肩膀了！我在壶镇（缙云属）至仙居的路上，见挑盐的民夫，不下二三千人，络绎道上。每担盐的面上，都盖有一个盐务机关的印形，挑的人就要小心翼翼的，顾着这个印形，不要将它弄坏，否则就要罚挑力，或罚赔偿。我在苍岭上，见到一个挑

夫，将盐倾倒了，印形也弄坏了，他正在一面收拾地上的残盐，一面很伤心地哭泣着。我问他："哭什么呢？"他说："印形弄坏了，即使重量不差，也就得不到挑力钱。两天往来的辛苦，不但得不到报酬，还要赔上伙食，若果再要受罚，就更不堪想了，那得不哭呢？"我想：这种防备的方法，固然相当周密，但是只顾到本身有利的一方，而毫不顾到劳力的一方，真是一件惨酷的刑罚。你想那样高的苍岭，我们徒手上下，都觉困难，他们还要把这样的重担，负在肩上，再加以印形的注意力，就等于双重的负担。这种困难的道路上，即使有一些损失，也应该加以原谅的啊！中国老话"骥马盐车"，是形容人们不幸的苦事，这种"牛马盐人"，不更是人间不幸惨事么？我很希望各机关当局，对于人力的运用，要同时顾到生理和人道。对于此事，当时本要请盐务当局加以改良，后来竟忘记了，因此把他写在这里，借以唤起一般使用民力者的注意！

几样汽车代用燃料　陆路机力交通运输除了工具之外，燃料的供给，自然是重要的问题，而且是消耗量最大的东西。以前汽车用的燃料，都是汽油，在二十八年我们就顾虑到以后燃料补充，要成最重大的问题，就开始研究代替的东西。最先试用的是火油（即点灯用的矿物油），这是交通处的技术员及工人共同设计的。它的方法，只是在机的旁边，装一个加热器，将火油的温度增高，然后导入发动机内，即可开动。但使用的结果，并不良好。据说："容易损坏机器。而且那时火油还是民间点灯唯一的原料，价钱也并不见得便宜。它和汽油同是外国的产品，来源亦不能长久。"这话当然很有理由，但在那时候只能说"头痛医头"，未来的一切，也就顾不到了。我当时对于这班创造的人，奖赏了五千元，以资鼓励。后来在报上看见一个美国人向经济部拟改用火油行驶汽车的建议，理由是大致相同，但是我们已经行驶很久了！

第二种代替汽油是樟脑油。也是在二十八年就开始使用了。

它不须增加什么设备，只是将油管稍加改动，即可行驶。但它与火油一样，必须要用汽油点火。使用的结果，据说比任何代替品都好。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是使用着。樟脑油系提炼樟脑同时所得之油，是一种药用油。浙江各地以前都有人提炼，产量也颇多，因为可用作汽车燃料，就大量生产起来。各地的樟树颇多，有人估计过，全省约有一万多株（这数字是原书说的——编者）每株可炼油三担至四担，这数字就很可观了。本地人对于樟树是迷信的，说每株都有神灵寄住。这是否民间传说的樟柳神，却无从考据了。因为有了这种迷信，所以无论木材如何缺乏的地方，樟树是没有人敢砍伐的。每一村镇附近，苍茏可爱的大树，就是樟树。想不到百数十年用神道保护下来的东西，在一个战争中，竟把迷信打破，而把它利用起来。迷信的结果，居然有一些好处，也是一件滑稽的事情。现在交通便利的地方，樟树差不多砍完了。我的云和住宅附近有两株大樟树，他们也要来砍，我对他们说："宁可不开汽车，不许砍我这两棵树。因为它实在可爱，再要培植起来，非百数十年不可啊！"

用松香提炼汽油，是铁工厂化验室江工程师世伦创造的。铁工厂为它本身所需之燃料——柴油——及供应交通上的需要而设厂制造，起初成绩很好，后来觉得不甚经济，也许是因为收购的松香储藏太久了，可供作汽油用的挥发物，已经挥发去了，所以质地与产量，都比初时为差。这种油并未大量的使用。用桐油制造汽油，在浙江最先是丽水的植物油料厂，规模相当大，当初是部省合办，后来改为私人经营，桐油是浙江大量的出产，全年约有二十多万担，因为禁止出口，价格甚廉，所以炼制起来，比较的经济，在效率方面亦甚好，这等规模大小不等的炼油厂，在省内有好几家，有些现在还能够维持。酒精自然也是比较适用的汽车替代燃料，在外国及后方各省，都大量的设厂制造。但在浙江，因为缺乏制造的原料——粮食和糖，所以制造起来，不甚经济，并无大量的出产。

提起炼油，我就联想到江山的酸性白土。正在研究替代汽油的时候，我就注意到酸性白土是炼油时候重要的触媒剂及漂净剂。这种土，在兰溪附近曾发现过，但是成分并不很好，而且产量不多。后来我命李振民到江山去筹备水泥厂，他在江山青湖镇附近，发现了大量而良好的酸性白土。他如获至宝似的来报告我，并且作初步炼油试验，而得到良好的成绩。后来铁工厂的工程师苏步皋又继续研究，著了一本《江山白土》的书，我为他作了一篇序言。这个江山白土的发现与研究，在抗战时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政府为此而拨给发现者与研究者一部分的科学奖金。

汤仲铭氏的木炭汽车，民国十八九年，就在广西的公路上行驶起来了。二十五年，我在杭州，他驾驶一架用木炭的小包车到来，给我参观试坐。他的国防经济眼光很远，认为不但战时中国的汽油没有来源，就是平时在国家经济上，也不合算。他希望全部的汽车，都改用木炭。但是在平时，有价廉物美的汽油使用，谁肯用粗笨肮脏的木炭呢？所以木炭车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很多国家使用过，但是战事一了，也就很自然的被摈弃了，仍旧改用汽油。在中国，随着抗战的演进，木炭汽车，乃应运而兴。除了加装一部化炭炉之外，一切都比其他燃料的供给，来得简单而便宜。自然也有它本身许多的缺点。但在战时，它是普遍应用的东西，不但浙江，现在却已风行全国，虽然经过好多的改进，已不是汤氏原来的设计，但一见到木炭车，就会想起汤氏来。我在桂林，曾经参观过他的工厂，他还在那里不断的努力。虽然桂林的失陷会把它一切都牺牲了，但他的主张，在抗战期内，是有重大贡献的啊！

水路交通 水路交通运输的原始价值是不变的，尤其是战时，这原始的运输力，更得到高度的发挥。浙江水运交通，向恃沿海，自海疆不保，内河交通运输，更居重要地位。浙江东南的内河，除了衢江比较水深而平坦，易于畅行外，其余都是水急滩多的小河流。但是浙人利用水运的精神，是可佩服的。在瓯江及其

他的小河内，我们见到满河棕梭式的小船。一人或二人，或推或挽的，在与天然争胜利。好些在外省认为不能通船的地方，居然也有船只航行。此外竹筏的应用，比这些小船更大，因为小船不能到达的地方，它们亦能到达。二十九年冬，中央鉴于机力交通运输的缺乏，而想到这些原始的人力上面来，于是有全国驿运总处的设立，省则设立驿运管理处，想把这些人力与工具管理起来，使它发挥更大的效力。其实它的可能的力量，已经发挥净尽，但因种种的关系，对于他们要求太苛，或是摧残太甚，同时对于他们的动力，又不加培养，所以效力反见减少。举一个例来说吧，瓯江的小船，据查有四千多艘，若能善于使用，它的运量，自然很巨大的。但是军运或公运，或是有些非法的军运、公运，所给的代价，非常微薄，那极度劳力的船夫，一饱都成问题，遑论赡养家室？更谈不到图些微利。以致船身坏了，无法修理，只好由它坏去。甚至自己把船凿沉了，另图其他生计。也有辛苦多日，不但得不到应得的酬报，而且要负额外的赔偿。我曾见过船户出卖妻子，来赔偿军粮损耗的事情。我虽负地方行政的责任，我虽然同情他们，但也没有办法。因为制度和其他的关系，使我的力量不能替他们解除这等痛苦啊！

一切的替代品都比不了原来的好。一切的落伍东西，都比不了进步的好，但是在战时，你就不能不由最好的而至最不好的，一一应用上去，这种现象，是战争的进步呢？还是退步呢？有许多人以为这是中国特有的潜力，而不是外国所能办到的。中国的抗战，中国的胜利，就寄托在这上面，这是自己解嘲的说话，如果我们还是迷恋这些旧东西，而不知急求进步改良，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一段战时的交通运输演变史，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啊！

廿五　所谓游击区

点线沦陷与名称的确定　沦陷区，是指被敌人占领的地区而言。但是以往中国文字上，对于设定一种名词，多半是概括性的和代表性的。往往一个县城，因被攻占而沦陷敌手，文书记载，就说是某县沦陷，好象整个县份都遭沦陷似的。例如浙江杭、嘉、湖的各县县城最先沦陷，文字上就说杭、嘉、湖沦陷了，其实沦陷的仅是那几个县城，或是重要的各据点。此外广大的地区，并没有被敌人占领，还有我们的军队在那里保卫，还有我们的政府在那里执行政令。中央为了要分清这种名称的界说，所以规定凡是有敌人占领点线的区域，不许称为沦陷区，而称为游击区。游击区的范围，是包含已被占领的点线与未被占领的面。“游击”是战术上的名词，虽然以上所说的区域，合于游击战，或已实行游击战，但是以作战上的行动，来确定某一区的名词，究竟还欠斟酌。否则，我们未沦陷的地区，就该名为正规区了。因为未沦陷的地区，万一敌人侵入，是要从事正规战的啊！但尽管文字上如此规定，而一般人还是叫做沦陷区，甚至政府的公文上，往往也写成陷沦区。

战地党政委员会　抗战开始不久，我国就失陷了很多的土地。所以许多人都认为我国军队，以劣势的装备，光是同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争胜负，一定得不到很好的结果。于是“全面战”与“全体战”的论调，就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术语。而游击区的如何控制，游击战的如何展开，遂亦成为当时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二十七年夏天，我因省内政治的暗潮，而到武昌去，曾对蒋先生报告，自愿将浙江省政府主席的职务辞去，请求带兵一军或一师，到游击区里，从事全面战的游击工作。虽然那时候多少含有政潮上的冲动，目的在于辞职，可是我的确对此感有兴趣，并且自信对此还有些研究。但蒋先生拒绝我的请求。他说："浙江现在仅有少数的县份沦陷，你果将未沦陷的地区，切实巩固，再从事沦陷区的游击战，收效一定比单独带兵到沦陷区去大得多。你以一省主席的地位，要指挥一军或一师人，当然不成问题。"他这番话，当然含有不许我辞职的意思，但这个指示的道理是非常正确的，我的辞意，于是打消，回到浙江来，希望本着他的指示，而展开以后的工作。

二十七年冬天，武汉失守了，我们奉召到长沙去开会。那次会议里对于如何控制广大的沦陷区，发动敌后的全面战争，是重要讨论题目之一，大家对此都非常注意。我在会里，也发表好些理论，于是决定中央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来统一主持这个重大的工作，并在各战区设立分会。当时有人征询我："愿不愿意到中央去担任党政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蒋先生自兼）我婉辞了。这并不是我对于这个工作，一时又不感兴趣，与我以前的主张有矛盾出入的地方；而是认为那时所决定的组织与职权，是办不通的。因为那时所决定的组织，是中央有关各部门的混合体，在地方则为战区与各省之混合体。因为职权不容易划分清楚，若果认真执行起来，在中央，首先就与各院及行政院有关系各部门发生权责上的冲突，在地方，则与战区及省政府的职权发生冲突。不但得不到良好的结果，反而会引起许多纠纷。我是主张沦陷区与非沦陷区截然划分的。这个组织，(党政委员会）应该设在沦陷区里面，它不但是沦陷区党政一元化的最高机关，而且要进而为沦陷区党政军一元化的最高机关。它只对中央党部行政院、军事委员会负责，而暂时与后方其他部门不发生横的关系，如此方能因应机宜，发生迅速而伟大的效力。否则不

但是一种无益的浪费，而且会增加沦陷区内工作的困难，还不如不设的好。我的主张是如此，后来这个责任是李任潮来负责，最初他是很热烈的做去，后来逐渐发生困难，甚至愈久愈不易应付了，不由他不冷淡下来。这机构，亦就于三十年取消了。

浙江初期沦陷的情形 当杭、嘉、湖首先沦陷的时候，各县的县政府，都以为县城失守了，整个的县就算完了。那时县长及各机关的人员，都随着军队撤退到后方，只有长兴县长王文贵还能在县境内支撑。省政府觉得平时县政府的组织，不能应付战时的变态，于是将县政府改为行动委员会，网罗地方士绅当委员，以主任委员行使县长的职权，这是二十七年二月所决定的办法。但是委员会的组织，在平时已觉运用不灵，在战时，尤其在沦陷区，自然更不适用。不久，仍把它取销而恢复县政府组织，不过机关简单了些，人员亦减少许多。不久，中央颁布陷区县政府的组织。同时还颁发了一个地方官吏战时不能擅离辖境的命令，规定战地各省，省政府不能离开省境，专员公署不能离开区境，县政府不能离开县境。如果擅自离境，按军法治罪。而首先受到极刑的是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固然韩复榘之处极刑，尚有其他重要的原因，而擅离省境，却算是处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自从这个命令发布，及韩之被处极刑，政治军心，为之一振，把政治上军事上闻敌退走意志颓丧的风气，为之一变，这真是抗战初期的重要关键。在浙江也惩办了一个海宁县长田稷丰。因为他被敌人压迫，而退驻绍兴，把他判处了十年的徒刑。自此之后，陷区的政权，乃重新建设起来。此中原因，自然为了有很多冒险犯难的同志，自动在那里奋斗，而这个命令的颁布和执行，使那些投机取巧的人，就不敢轻于到沦陷区里面去尝试，收效自匪浅鲜。

敌人在初期因为情形不熟悉，而且为兵力所限，在沦陷区完全是取守势，只是在占领的据点内困守。据点以外，就不敢过问了。而且以为他能控制这些要点，或要线，就可以控制全面，与我们以全面控制点线的原则，刚刚相反。所以我们在敌人据点以

外，一切行动都很自由，行政的设施，和以前差不多。纵然有时敌人会发动一种"扫荡"的工作，希望用武力来肃清我们的政权，但亦只是一时的予我们以障碍，而不能长久如此。所以在二十七年是我们游击区政权的恢复时期，二十八二十九两年，则为游击政权的发展时期。省政府为加强游击区的行政工作，特于二十八年一月在天目山设立浙西行署，后来（三十二年秋）又在天台设立浙东行署。这两个行署，就是指挥浙东浙西游击区行政的前方基地。省政府赋与行署主任的权力相当大，组织亦相当的健全，这是因我认为游击区里许多问题，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来处理。唯其如此，方能迅速而获得比较良好的效果。省府远处后方，交通通讯都不便利，若还要象平时一样处理游击区前方的问题，一定有不能因应机宜、与发生种种牵制的地方。也曾有些人评论赋予行署的权限，未免太大。但自实行以来，也不见有越权越分的地方。因为过份防止下级的越权越分，是容易使下级受到消极的束缚，而不能发挥他的力量。而我所希望于下级机关的积极的发挥力量，是在不越权不越分的限度之内。这种限度的遵守，是当事者应当自己斟酌的分寸，上级机关不必为之硬性规定的。

游击区政权的确保，自然要有相当的武力来掩护。在二十六年冬浙江各地开始沦陷的时期，各县的原有武力，多半崩溃了！因为以前各县的武力，如警察队，保安队等，没有经过这样的涛浪，而且当大军撤退的时候，有些失了队伍的官兵，都麇集在游击区内，度他们自由优裕的生活。还有国军遗失的武器被地方上的莠民，搜集起来，另成为一种武力。这两种人都是打着游击队的旗号，盘聚在游击区内。虽然有时他们也会打打敌人，但是妨碍行政，扰乱治安，是经常的事。政府想树立政权，保障人民，就先得将这些游击杂军，加以处理，但是空口说白话是不行的，而必须有武力作为后盾，才可使他们就范。我与刘总司令恢先商量，决定将一部分国军及省的自卫团队，开入游击区

里去。其目的：第一是打击敌人，第二是整顿那些游杂部队，计前前后后，由杭、嘉、湖地区编出的，有李泉笙等数千人，分别在昌化、绍兴等地整训。在那时，这些游击部队，对民族抗战的意识，还相当的高，所以他们还易于就范。实际上亦不由他们不就范。因为有国军及省自卫团队在那里监视他。自从经过这番大整顿后，游击区政权，才能确立。同时各县亦重新建立地方的自卫武力，以保障自己的安全，或从事对敌的战斗。

行政的表现，第一是整理乡镇保甲，实行全面的控制。在大军及政府撤退的时候，乡镇保甲，无疑的也同样的崩溃了。但是人民对于国家政府的向心力量，是暗地存在的，县政府一经恢复，乡镇保甲也就首先恢复。所以那时候游击区各县，除了沦在敌手的县城，及各据点之外，其余的乡镇都是服从政府的政令，与后方各县，并没有什么分别。第二是整理财政，游击区的县份，都是浙江最富庶的地方，尤其是以田赋占大多数，当初中央对于游击区是免赋免税的，这种政策，为收拾民心，或有若干作用，但为确保政权，展开斗争，则极有困难。因为中国及省都不能有大宗的款项来贴补游击区的经费，除非放弃了政权和斗争，否则就要就地筹款。田亩捐，就是最可靠最大的收入，于是省府准各县收田亩捐。但是当时（二十七、二十八年）因没有中央法令，引起各方之责难与误会，而事实上则不能不如此做去。否则，政权就无法维持。后来中央有了规定，才算是合法化了。游击区人民对于政府的税捐，是极踊跃缴纳的。我们收税，可以收到敌人所占领的据点里面，募债亦比较后方的县份更来得容易。因为他们身受敌人蹂躏的惨痛，比后方的人民要厉害。第三是建设的工作，游击区还谈什么建设！相反的，只是在那里破坏建设，如破路和阻塞河道等；但是亦有例外，海宁的海塘是要逐年修理的。抗战以来，自不能照平时那样岁修，因而倒塌的地方很多，情形非常危险！而海宁县长郭兆丰，顾达一，更能在敌伪盘据下，发动人民去抢修，使这一方的人民，不至沦为鱼鳖，是一件

难能可贵的事！固然人民是为他切身的利益，敌伪亦认为是一件善事，而不来干扰，亦是战争中一件有趣的事。第四是教育的工作。这是我们所注意的事，我们不但要恢复以前的乡村小学教育，同时有多数县份，还在本县的境内或比较安全的邻县境内创办中学。日伪组织在他的控制区内，也办有各种学校，希望以教育的方法，来奴化这批幼小者，使他们都成了驯善的顺民。但是人民的国家民族观念，不是一朝一夕可能消灭的。很多的青年，不愿受奴化教育，而千辛万苦的跑到后方来，所以伪学校的学生，为数都很少，而且那些学校里的学生先生，心内是明白的，表面虽不能不表示屈服，暗地里却在为我们做地下的工作。此外如会计制度、人事制度，还是维持着，尤其是人员控制调动，都能贯彻政府的命令。各种会议照常的开，到会的人都很踊跃，干部训练也不断的举行。有一次在天目山的浙西干训团，就调训上千的乡镇长，小学校长或教师，他们历尽艰苦，不顾一切，回到后方，领受精神或学术的训练，回去之后，更能展开他们的救国工作！

总之：在游击区内，一切都是从斗争中求生存，没有斗争就不能生存的道理，在游击区内，见之最确。因为要斗争，一切为了军事，一切都针对着敌人，所以一切的问题，也就简单起来。有些在后方容易发生的事，如党政不能协调等，在游击区内部，却很少听到，原因是敌人就在前面。

汉奸及伪组织　当敌军占据一个地方，自然要招致一些为虎作伥的汉奸，组织一种伪机构，来实行他所谓“以华制华”的毒辣政策。日本对于汉奸的豢养，是有长久历史的。可以说自他的大陆政策决定之后，培植汉奸，就是其中的主要工作之一。驻在中国的使馆领事馆、特务机关、学校、工厂、商店，无一不是培植汉奸的机构。甚至对于中国在日本留学的学生，都被认为日后可利用作汉奸的可能。他们所用的方法，无论直接间接，真是无孔不入的。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内乱，许多政治上失意的人，无一不是他

尽力拉拢勾结的对象，希望得以接近，或是感激他的援手，而为所利用。下一等的人，则平时出价收买，使他们作种种间谍工作。所以在未开战之前，汉奸间谍，已遍布国内，战端一开，这些大大小小的汉奸，自然大露头角，更加活跃起来。照我的分析，汉奸的来源，可分下述几种：第一是主张中日亲善的高等人士。这些人由于自己认识的错误，而被敌人"大东亚主义"、"共存共荣"的歪曲论调所欺骗。因为他们主张对日亲善，所以敌人也同他们亲近，这样一个有野心有力量的对手，从亲近着手，而实行奸骗。管你自己当初真心不真心，事后愿意不愿意。你还有什么方法，摆脱他的牢笼？第二是政治上的失意者。这些人对于政治上有野心的，虽经过了失败，但不甘雌伏，而思乘机再起，他们只有个人的利害，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尤其是本党执政之后，以前那些因反对本党而失意的人，中央虽宽大为怀，或予罗致，或既往不究，但总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时常憧憬于他已往权势的煊赫，而思重整旗鼓，再度登场。敌人乃视此等人为最好利用之工具，他们亦甘心为所利用，而恬不为怪，即在本党政府之下，因贪污犯法而失意的人，也都是一样。第三是日本洋行的买办阶级，和由日本人培养的学生如同文书院等。这些人久仰敌人的鼻息，受着敌人的豢养。他们早忘了民族的本性，失却国家的意识，不管他现在或过去是否曾受敌人的薰陶，或为敌人做过工作，一到战时，他们都得走上这条路子，而敌人也一定去招致或胁迫他们走上这条路子，这是日本人最忠实的同志。第四是社会上失意的种种色色的人。如投机失败，信用不好的商人，生活不好的律师，以及行为为社会所不齿的人。这些人在抗战以前，已失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必在另一个社会的环境，才有他出头的机会。在敌人占领之下，社会环境改变了，他们出头的机会也到了。第五是当地无可奈何的人。有些人是富有资产的，他没有勇气抛弃他的产业，迁到后方来，他为保存自己的财产，而甘心为敌人利用，或和敌人亲近。有些是没有财产的人，为生活

所迫，或想利用这个机会，而得到优裕的生活，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人，他无法逃避，亦无法抵抗，遂走到汉奸的路上去。以上所说的五种汉奸来源，虽然不能说这五种人里面个个都是汉奸，但我可以断定个个汉奸都离不了这五种路线。而敌人之罗致运用，亦各尽其妙。比如他要罗致第一类的汉奸，就利用近卫文磨的宣言，堂堂皇皇的，说出许多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使那班主张亲日的人，也提出他们的平日主张热烈附和，以表示他们不是向敌投降，而是为了“和平救国”。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这班人，竟从我们的阵营里投到敌人的怀抱。敌人是利用亲善二字，来实行奸骗，而汪、陈、周却偏说是自由平等的恋爱。敌人对东北及华北，就不用这种方法，溥仪之被土肥原弄到东北去当傀儡，与其说是强绑，毋宁说是同意的拐逃，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王荫泰等华北伪组织，更是送上门去出卖，丝毫用不到那些做作。这些第二类的人物，自然要与第一类的人物有所分别。第三第四第五各类的汉奸，就是用来充实第一第二两类大汉奸的爪牙，随时随地，都可供利用，以发挥其上下一致的效力。这就是抗战以来国内汉奸的概况。我要写浙江省沦陷区里的汉奸伪组织情形，不能不先将汉奸的全貌，作一个轮廓的素描。

敌人于二十六年冬初，占领杭、嘉、湖，那时南京的伪组织，尚未成立，在各地要马上组织一个省或县的伪政府，尚有相当的困难。第一是还没有这许多合于汉奸资格的人。第二是恐怕马上组织，会引起当时想利用的人或当地人民的反感。所以在占领地区，仅仅成立一个“维持会”。维持会好象是暂时性的，也好似社会性的，使这些受利用的人及老百姓起了一种模糊不清的观念，来掩护他以后的渐进手段，时间渐久，这些被奸骗的人，虽然有所感觉，但已失身匪人，无可自脱，只好甘心忍心的做下去。以后就随他为所欲为了。所以维持会的名目，表面上是汉奸伪组织的过渡时期，其实乃是制造汉奸伪组织的准备时期；唯其是这样，所以入彀的人，会一日多似一日。这初期的情形，到处

都是如此，不独浙江为然。自从二十八年，近卫“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宣言发表，汪精卫由出走而出卖，而到南京去组织伪政府。敌人找到了汉奸的中心，于是由上而下的伪政府，由下而上的维持会，遂合而为一，而伪浙江省政府主席汪瑞闿亦应运而出现了。但他并不是汪精卫的亲信，而是敌人临时拉出来的，终于为汪逆所更换，而以傅式说继任，这就是浙江省正式的第一任伪官。从而杭州伪市长各区伪行政督察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各县伪县长，都相继出现。这一批伪组织伪官的名目，与我们中央的组织官制是一模一样的，就表面看，真有难分真伪之感。记得我曾收到一封公事，外面写的是“浙江省政府主席钧启”，是某某县政府的呈文，但拆开来一看，里面都是“谨呈主席傅”。那个署名的县长，也不是我政府委派的，而是一个伪县长。这些鱼目混珠的事，已数见不鲜。我揣汪逆精卫之所以要将伪政府组织官制，全部照抄，也就是收鱼目混珠以伪乱真的效用。但是鱼目是鱼目，真珠是真珠，终究是混不过去的啊！

傅逆式说是上海大夏大学的要员，我也担任过那个大学的校董，以前颇有过从。我得知他投入伪组织当汉奸，当时甚为惊异，而且他又在浙江当伪省主席。我当时真想写封信问问他，为什么一个在最高学府当过要员的人，一些国家民族思想都没有？竟肯把清白之身，投到那永远不能洗涤的烂污窝里去？但是后来想想，何必多此一举？汪、陈、周等，以他们的历史地位与学问知识，在国内也可说是上流的了，而竟作卖身投靠的勾当，岂不是比他更无意义得多么？这些高等的汉奸，更比不上下等的汉奸，可以用理智使他悔悟。他们是迷失了本性，正在那里倒行逆施，亦只有剑及履及把他们铲除，才能使一般人有所戒惧！不久，伪杭州市长何瓒就被我们爱国志士击毙了，他可算是与伪上海市长傅筱庵是先后并臭的两个东西，但是便宜了他。使他不能受到现在比杀身还厉害的精神痛苦，及未来的刑罚！

二十九年以后，敌人得了汉奸伪组织的帮凶，在陷区里就活

跃得多！初起是“扫荡”，继之以“清乡”，再起之以“封锁”，希望将我方游击区内的政权及武力，一概肃清，以实现他们预期的计划。然而这种阴谋，都失败了！先说扫荡，当沦陷的初期，敌人挟他优势装备，占领我们的点线之后，就龟缩在据点内，不敢轻于举步，尤其是夜间，简直不敢出门。二十九年以后就改变了，不但一年内有二次或三次的定期扫荡，而且还随时不定期的窜扰，并且敢于在夜间进行偷袭。当初我们自然受到很多的打击，但是终于在打击中，得到应付的方法。我们化整为零，可在很小的区域内活动，使敌人的扫荡工作，得不到很大的效果。他们乃随而进行清乡的工作。清乡是中国内政上的名词，必须有县的基本组织，才可进行，单靠军事力量是办不通的。敌人自得了伪组织的帮凶，始能着手进行清乡，这是伪组织对国家民族最大罪行之一。在伪中央，设有清乡事务总局，各省设清乡总办，皆有汉奸的主要头目来充当。各县办理保甲，实行联保切结，在公路铁路线上，更组织爱路团。如果有我们的政府人员及部队到达某一地点，或通过某一路线，保甲长及爱路团必须报告，否则要受到敌伪极刑的处罚。同时将以前在占领据点内所实行的良民证，扩展到乡村里面来，敌军对我政府人员及部队所到的地方，则实行烧杀的恐怖政策，陷区人民，虽存心向国，但处在这种淫威之下，亦就无可如何！我们的政府及部队所到的地方，人民顶香跪在前面，希望我们不要进去，或在那里做破坏的工作与作战，以免他们受到惨重的损害。我们也深体人民的痛苦，有些地方，非必要的时候，也不轻易进去。但是有些地方的人民，也有两全的办法，一面使我们便利的通过，或停留，一面去报告敌人，以解除他的责任。良民证也就成为我们工作人员的护身符。这些良民证，都是他们替我们代办的。在这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和行动，虽受了一时的限制，但日子久了，我们仍旧一样暗地的活动，而且能使那些下级伪组织的汉奸，变为我们掩护的工具。往往我们的工作人员，被敌俘虏了，伪组织的汉奸就得尽力

的为我们营救。这些汉奸，一方面怕我们当时的严厉处分，一方面也想留一以后下台的地步，因为他们也明知敌人日后是必败的啊！清乡的结果，就是这样。敌人乃再进而实行封锁，先把交通要点控制了，再将各县的据点，大事扩展，主要的据点用敌人，次要的据点用伪军，或是敌伪混合扼守。同时将沪杭铁路及京杭国道的两侧，都用竹篱围起来，主要的路口，都用兵把守。河道的桥梁，用不着的，都加以破坏，剩下来的，也都派兵把守。自然，这样可以予我们行动上以许多困难，但是我们仍有法子行动。敌人对游击区的三部曲——扫荡、清乡、封锁——是相间相助的运用。由二十九年一直到三十二年，不断的进行着。三十二年以后，已成了强弩之末。然而我们敌后的政权及武装，仍是屹然的存在，到了三十二年之后，复大见活跃起来。原因是敌人已无更进一步的办法，他亦知道整个胜败的因素，并不在这一个区域之内，而逐渐松懈下来了！

在游击区内应付斗争的人事调动　敌伪在游击区的情形，既是这样，我们自然是针对他的种种，而随时改变我们斗争的作风。自二十六年终的仓皇撤退，我们知道以前那班工作人员及组织，是不能适应这个非常的环境，随即改变组织，并另外换了一批新的县长及工作人员。二十七年七月以后，政权日渐的恢复，二十八、九年就逐渐的展开；但是到了二十九、三十年遭受敌伪“扫荡”“清乡”的打击，这批人又应付不下来了！不但人员要调整，而且武力亦须补充，方法亦须改变，然后才可以打开新环境，重新树立新的力量。到了三十三年，加了一番调整补充，始能维持到今日。统计在这八年的当中，因为环境情况的不同，而影响到人事的更变。在大体上看，八年之中，人事调整了四次，也可以说是斗争方法的转变。因为某一种人，仅适合于某一阶段的斗争，过了某个阶段，就得另换新人，始能应付新的环境。所谓新人，其实都是旧的青年，或下级干部，在陷区内经过长期锻炼出来的人。只有一个杭州市长兼余杭县长陈纯白，他是

始终没有退出过，他年纪已相当的老大，但是他是老而益壮，长久保持青年斗争的勇气！

在这八年的陷区斗争中，县长殉职的，有慈溪县长章驹，桐乡县长李挺、及萧石父。桐乡是环境最困难的县份，所以他们的遭遇，也最不幸。此外还有绍兴县长邓讱，于绍兴城沦陷时殉职，当初因为得不到真确的消息，有人怀疑他有偷生的情事。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查，并不见他在那一方露面过，而且他是一个有血性，好活动的人。如果不死，决不会长期蛰伏，而久不出头，所以我得特别提出，以前的怀疑，实是错误，我们不应该怀疑一个壮烈的殉职者，使他含冤地下，而须将他旌表出来。县长被俘虏的，也有好几个，如嘉兴县长郑器光，平湖县长许敏中，海盐县长吕师扬，都是被俘不屈，设法脱险的。但是也有不肖的败类，如海宁县长谢叔锐，馀姚县长蒋先启，是被俘而屈服的。其他各级工作人员因对敌斗争而殉职的则更多了，统计先后死难的达六十六人（连政工同志在内计一百三十九人）。兹将抗战期中本省对敌斗争殉难之各级工作人员数名及事迹列表如左，借资表扬。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赵光文化名沈耀	浙西行署杭州情报组行动员		男		杭县	29.3.5.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在三墩被敌宪兵拘捕经营救未能释放至二十九年三月五日遭敌惨杀
应清池	浙西行署特击队队员		男			29.10.	敌寇流窜执行突击及间谍任务被俘殉职
金剑平	浙区战时食盐派运处漓渚办事处事务员		男		斗门	30.5.21.	因派至漓渚看盐堆搬运公物在斗门被敌杀害
黄景照	浙区战时食盐收运处股长		男				以有病之身于浙东事变时仍镇定应付迨敌临城下始逃致受惊病故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　难 地　点	殉难 日期	殉　难　经　过
齐金福	浙区战时食盐收运处临海办事处会计佐理员		男		诸暨	30. 4. 21.	因敌寇进犯宁绍护运盐斤被敌冲散旋又被敌便衣队追及杀害
吴士相	电话局第二管理处主任兼鄞县分局主任	30	男	桐乡	嵊县两头门	30. 4. 23.	因浙东事变率同属员赶赴前线指挥军事通讯不幸身陷敌围被害
陈炎燮	高级话务员	26	男	杭县	嵊县两头门	30. 4. 23.	随吴主任赶赴前线指挥军事通讯身陷重围被击受伤不治毙命
王思明	话务员	24	男	诸暨	嵊县两头门	30. 4. 23.	随吴主任赶赴前线指挥军事通讯身陷重围当场殉职
董绍坤	报务员	20	男	鄞县	嵊县两头门	30. 4. 23.	同上
宋一新	宁波警察总队主办会计员		男		杜岙	30. 5. 31.	被敌包围携带现款被难中途失足坠伤殒命
钟　巍	驿运诸暨站调派员		男		诸暨	30. 4. 29.	因公出差在诸暨雨宜乡与敌相遇被捕枪杀
凌醉泉	浙江省第二区对敌经济封锁处安武分处会计员	40	男	安徽	安　武	29. 10. 10.	因敌人进犯安武撤退时抢运公物遇敌中弹殒命
孙元明	第三区专员公署事务员		男		绍　兴	30. 4. 17.	因敌寇窜绍携带公文物件经南门为敌截虏杀害
顾郁斋	杭县调钦区署区长		男		杭　县	30. 5. 19.	正在开会募集飞机捐被敌包围俘虏旋即杀害
陈有德	杭县情报员		男		杭富路村　口	27. 9. 15.	随同军队出发破坏敌军桥梁遇敌中弹殒命
蒋洪宝	杭县周甫乡第三保副保长		男		富　阳	29. 12.	因公出外遇敌绑架旋即被敌严刑拷打坚不吐实致遭杀害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戴湘生	海宁税务分处捐税股长		男			30.4.12.	遭遇敌伪被击殒命
徐淦泉	余杭县税务分处征收员	47	男	余杭		29.10.8.	为复编笠帽潭地方田亩捐底册遇敌失足跌毙
许仲安	嘉兴县新塍区区长	37	男		妙智桥	28.1.23.	为率自卫队会同挺进队出发袭击敌伪遭遇匪伪伏击中弹殒命
柏拔山	嘉兴县军运代办所副所长	37	男	嘉兴	嘉兴新塍镇	26.11.19.	奉命驻新塍守土不屈遭敌戕害
陈毅生	嘉兴县政府科员	27	男	江苏睢宁	嘉兴新塍镇	26.11.19.	奉命驻新塍守土不屈遭敌戕害
范觉先	嘉兴县政府办事员	28	男	安徽潜山	同上	26.11.19.	同上
翁希文	嘉兴县政府事务员	23	男	泰顺	同上	26.11.19.	同上
王维亮	同上	23	男	泰顺	同上	26.11.19.	同上
董仲儒	同上	22	男	泰顺	同上	26.11.19.	同上
陈民敦	嘉兴县政府书记	21	男	青田	同上	26.11.19.	同上
王子通	嘉兴县政府秘书	53	男			28.11.13.	因曾被敌捉去过度惊恐遂致病亡故
戴大镕			男		西塘	30.1.2.	在西塘受敌苛刑威迫不屈殉职
萧石父	桐乡县长		男		陈市	30.9.16.	因出席全省行政会议被敌包围卫士冲杀不出以致死难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张福洲	平湖县情报员		男			30.8.	被敌密捕搜出我方证件为敌所害
华海澄	平湖县情报员		男			30.8.	同上
戈平邦	平湖县政府会计主任	31	男	平湖		28.11.25.	敌伪军三千分六路进犯平湖包围县府被俘嗣许县长脱险后旋即死难
储林甲	平湖县政府科员	29	男	宜兴		28.11.25.	同上
周民安	同上	26	男	绍兴		28.11.25.	同上
孙勉安	同上	39	男	萧山		28.11.25.	同上
李挺	桐乡县长		男		桐乡咐泽乡	29.4.14.	十四日晚在咐泽乡宅廷浜遇敌伪数十人惨被杀害
王菊廷	海宁县突击股员		男			29.4.20.	狙击著名汉奸戴渭生因膂力不胜反被推倒击毙
沈植夫	海宁金库代理主任		男			30.1.31.	敌人进犯海盐被虏杀害
李光杰	海宁县金库办事员		男			30.1.31.	同上
叶泽治	海宁县政府科员		男		海盐	29.	被汉奸虏解刑审逼藏卷地点不供惨遭杀害
刘斐文	崇德县特产管理处土丝督导员	17	男	崇德		30.7.9.	因公被敌虏去不屈就义
王金声	崇德县会计一等佐理员		男			30.8.	因敌来袭机枪炮弹甚紧张于公文移藏后被迫渡河溺毙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余学孔	吴兴县政府科员兼特务股长	29	男		吴兴白龙山	30.3.6.	为争取湖城伪军反正遭敌寇匪徒毒计谋害
王文林	吴兴县行动委员会第二游击队指导员		男		徐家斗	27.3.26.	召集民众组织抗敌同盟会为汉奸率众袭击殉难
曹信如	吴兴县政府事务员		男		吴兴	29.5.28.	奉令下乡公干在下昂朱家坟遇敌杀害
蒋正绥	吴兴县练市区巡官		男				因公被敌便衣队所虏胁迫不从卒以身殉
姚学贤	德清县政府情报员		男				敌犯义头该员返府途中遇敌被击毙命
章 驹	慈溪县长		男		北溪	31.1.30.	敌由相量门进扰北溪时督率队警抵御身先士卒不幸殉职
楼童生	定海洞奥代理区长		男				我军克复大展后敌速援反扑该区长即为此役殉职
胡乾生	定海赋税征收处征收员		男		庄岙	29.4.16.	在乡征收赋税遇敌登陆被捕杀害
杨诚森	萧山衙前卫生分院主任		男			27.7.11.	敌伪流窜被敌俘虏不甘附逆投河而死
杨仁本	浙江省战时政治工作人员训练团团员		男	诸暨	虹霓堰	27.4.28.	奉命过江干政治工作召开乡镇保长会议为汉奸探知途遇预伏敌军杀害
卢叔镇	诸暨县无线电台主任		男		潦溪	30.5.15.	因敌流窜绕道东阳蔡宅因督工抢搬机件遇敌被绑杀害
项民晖	上虞百官区署事务员		男		五夫	30.9.7.	为出席区行政会议路经马曼桥遇敌被俘杀害
邓 训	绍兴县长		男	湖南	绍兴	30.4.17.	绍兴失守时与敌突袭被击殉职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王　英	民政厅科员		男	杭州	松阳	31.8.25.	被敌俘虏不屈杀害
王道一	省政府秘书处科员		男	绍兴	松阳	31.8.25.	同　　上
吴景昆	民政厅科员		男	杭州	松阳	31.8.25.	同　　上
吴慎庆	浦江县政府事务员		男	嵊县	浦江		县城沦陷时撤退下乡遭敌俘虏不屈身殉
杜焯伦	省政府秘书处助理秘书		男	绍兴	松阳	31.8.21.	被敌俘虏惨杀
吕韶美	嵊县合作社联合社长		男	嵊县	嵊县	31.5.18.	协助国军破坏道路被敌俘虏不屈惨杀
高鸿衢	省政府秘书处主任科员		男	萧山	松阳	31.8.25.	被敌俘虏不屈惨杀
陈迺湖	桐乡县政府教育科科员		男		桐乡	31.3.11.	遇敌扫荡惨遭殉难
陈秀贤	慈溪大亭区署指导员		男	临海	慈溪	31.2.23.	敌伪夜袭抵抗中弹死亡
黄　霖	建设厅雇员		男		丽水	32.8.20.	被敌俘虏殴伤医治不愈死亡
赵安农	吴兴织里区署指导员		男	吴兴	吴兴	32.4.14.	敌寇袭区署被刺刀戮毙
蔡雄志	崇德县政府科员		男	崇德	崇德	31.3.23.	被敌俘虏脱险后致病亡故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厉振宗	省政府秘书处科员		男	江苏仪征	松阳	31.8.	被敌俘虏惨遭杀害
戴瑞棠	嵊县县政府行动组组长		男		嵊县		抗敌中弹殉职
黄匡	三区直属政工队副队长	39	男	江苏川沙	海盐茶院	27.7.31.	敌十二路进犯海盐海宁该队协助军队作战在茶院附近与敌搏斗以寡众悬殊该员等仍不退却后壮烈牺牲
吴苏	三区直属政工队干事	29	男	江苏句容	海盐茶院	27.7.31.	同上
林尧磊	三区直属政工队队员	22	男	杭县	同上	27.7.31.	同上
宋之馨	同上	25	男	绍兴	同上	27.7.31.	同上
张怀德	省政府直属政工大队队员	21	男	诸暨	同上	27.7.31.	同上
陈忆姜	三区直属政工队队员	29	女	徐姚	同上	27.7.31.	同上
袁湘君	同上	21	女	海宁	同上	27.7.31.	同上
徐珏英	同上	22	女	上虞	同上	27.7.31.	同上
陆进英	三区直属政工队战地青年服务团团员	17	女	海宁	同上	27.8.31.	同上
朱淑芬	同上	17	女	海宁	同上	27.8.31.	同上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顾丽娟	三区直属政工队战地青年服务团团员	17	女	海宁	海盐茶院	27.8.31.	敌十二路进犯海盐海宁该队协助军队作战在茶院附近与敌搏斗以寡众悬殊该员仍不退却后壮烈牺牲
卢雅芬	同上	17	女	海宁	同上	27.8.31.	同上
陈惠民	三区青年营营员	24	男	海宁	海盐骑塘桥	27.8.31.	敌轮三艘载敌寇经骑塘桥青年营闻讯出击敌以机枪扫击殉难
张安石	吴兴政工队员	19	男	吴兴	吴兴	27.7.	该员担任情报工作曾为敌伪所嫉忌二十七年十二日为其祖母回神之期返家被敌探悉于夜三时捕获受刑逼供不屈与父同被害
陈金奎	三区青年营营员	20	男	海宁	桐乡赵家村	27.12.13.	敌由斜桥开赵家村该营即予抵抗该员中弹殉命
王新民	三区战地政工队队员	30	男	龙游	崇德	28.3.25.	敌二次扫荡海盐时该员由屠甸至海盐与队长商酌公务返屠甸时与敌遭遇以手榴弹掷斗而死
周民安	同上	22	男	绍兴	平湖	28.6.4.	奉令深入平湖县城探取敌情为敌所执以种种严刑逼供被敌割耳挖目断去四肢而死
杨吉臣	同上	26	男	诸暨	海宁奉化	28.6.7.	中弹阵亡
张贻清	同上	18	男	海宁	海盐沈荡	28.7.31.	敌大举进攻海宁海盐该员正奉令去敌后工作闻讯漏夜回队报告行经沈荡为敌所执不屈而死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张泽西	省直属第一政工大队青年团团员		男	长兴	长兴新塘	28.8.25.	该员至新塘搜捕汉奸沈长林被击身死
梅声	定海政工队员	25	男	定海	定海	28.9.25.	该员亲入匪窟刺探匪情被匪生擒遭断臂而死
李文雄	省直属第一政工大队第二队队员	27	男	平阳	吴兴双林	28.10.6.	该员参加该队在双林敌后搜集战利品炸弹爆发伤及要害致死
杨文宝	同上	24	男	吴兴	同上	28.10.6.	同上
姚群	同上	23	男	吴兴	同上	28.10.6.	同上
毕季芳	省直属政工第二大队	22	男	吴兴	武康太平桥	28.11.1.	由武随带赴县请缨之壮丁三名途遇敌军被虏至武康被害
陈元其	省直属第一政工大队第二队队员	22	男	杭州	崇德	28.11.19.	被敌便衣队杀害
姚奇伟	嘉兴政工队队员	22	男	海盐	嘉兴凤桥	29.1.5.	晨五时敌分股突入凤桥时与敌冲杀搏斗而死
钱一祥	嘉兴政工队区队长	22	男	嘉兴	同上	29.1.5.	同上
彭汉玉	嘉兴政工队队员	21	男	嘉兴	同上	29.1.5.	同上
陈云华	同上	24	女	平湖	同上	29.1.5.	同上
戴蕴芬	嘉兴政工队区队长	26	女	嘉兴	同上	29.1.5.	同上
唐悌	嘉兴政工队队员	22	女	嘉兴	嘉兴凤桥	29.1.5.	晨五时敌分股突入凤桥时与敌冲杀搏斗而死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张文华	嘉兴政工队队员		女	嘉兴	同上	29．1．5．	晨五时敌分股突入凤桥时与敌冲杀搏斗而死
任渔乐	同　　上		女	嘉兴	同上	29．1．5．	同　　上
郑品铣	嘉兴政工队区队长	27	男	嘉兴	同上	29．1．5．	同　　上
钱学能	同　　上	20	男	嘉兴	同上	29．1．5．	同　　上
林连生	杭县政工队队员	32	男	杭县	杭县	29．1．19．	遇敌殉难
孔　坚	萧山政工队员	19	男	萧山	萧山	29．1．22．	县城沦陷时遇敌被害
陈天柱	同　　上	19	男	萧山	萧山	29．1．22．	同　　上
孙弼莽	省直属第三政工大队队员	24	男	海宁	武康杨坟	29．1．27．	奉令推进海北建立工作据点一月二十七日因公归队途遇敌寇被虏枪杀
王勉之	三区政工队员	25	男	绍兴	平湖南门外	29．2．	由城厢工作回队遇敌被害
郑建华	定海政工队长		男		上海	29．2．24．	在舟山合门工作被敌三面包围虏赴上海严刑逼供不屈殉命
冯孟华	吴兴政工队员	18	男	吴兴	吴兴张雨伞	29．4．	敌伪大扫荡时被包围击毙
吴文鸿	省直属第三政工大队杭市组长	35	男	分水	湖墅	29．6．5．	该员驻杭设计狙击伪高级职员通奸逆赴湖墅购米即配备同志二人预伏击毙伪逆后被敌包围以机枪扫射而死

姓　名	职　　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沈阿毛	省直属第一政工大队义务队员		男		长兴鸿桥	29．5．31．	我军焚烧敌鸿桥茧行时被敌伪乘机惨杀
孙乃莘	同　　上		男		同上	29．5．31．	同　　上
朱　益	海宁政工队分队长	23	男	桐乡	路仲	29．6．4．	遇敌殉难
丁寿祺	杭县政工队长	36	男	杭县	杭县纤石乡年家桥	29．6．20．	在战地被暴徒狙击殉命
莫长润	萧山政工队员	28	男	萧山	江边	28．6．30．	探取敌情被执不屈被绑至江边用刀戮毙
来诵华	萧山政工队员	23	男	萧山	江边	29．6．30．	同　　上
凌　云	同　　上	19	男	萧山	江边	29．6．30．	同　　上
谢　勃	第二政工队队员	23	男	镇海	武康	29．9．21．	九月十六日自崇德至后坞留守处过京杭国道时被敌伪俘去解至武康敌司令部斩首
沈庆昌	德清政工队长	27	男	德清	德清张哈斗	29．11．29．	敌二百余三面包围被击毙
程道生	德清政工队副队长	24	男		同上	29．11．29．	同　　上
王维垣	德清政工队员	24	男	吴兴	同上	29．11．29．	同　　上
高　基	海宁政工队员	24	男	绍兴	海宁鄞镇	30．1．13．	在鄞镇扁梁桥遇敌百余互击殉难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杨逢春	平湖政工队员	22	男	平湖	平湖克城	30.2.	该员派在克城区南圩乡工作时适逢敌伪窜扰致遭捕去搜出我方证件时即被枪刺戮毙途中
张玉田	平湖政工队区队长	30	男	海盐	平乍公路	30.2.	由克城区工作回队途经平乍公路虹野段遇敌被俘不屈而死
施正金	海宁政工队义务队员	25	男	江苏溧阳	海宁鄞镇	30.1.13.	在鄞镇扁梁桥遇敌百余互击殉职
张明达	桐乡政工队员	21	男	慈溪	江苏吴江	30.1.16.	赴财政科领取经费途经紫云塘朱家渡遇敌被害
郑熙	余杭政工队员	22	男	江苏无锡	余杭	30.3.4.	该员于二月二十六日奉派赴苕北召开乡保会议商讨对敌封锁办法公毕复潜入石濑敌据点侦察敌情被敌俘获先以警犬咬去其耳鼻手指生殖器及腹肉后以刺刀戮毙
夏建奋	定海政工队员	21	男	鄞县	定海	30.3.8.	三十年二月被俘三月八日遇害
胡中峰	同上	20	男	慈溪	定海	30.3.8.	同上
杨芳琴	同上	17	女	定海	定海	30.3.8.	同上
徐世奎	嘉善政工队员						被敌邓仪部队杀害
史志高	长兴政工队分队长	25	男	长兴	长兴大西门外	30.5.15.	三月计杀伪自卫团宗逆金毛归途被俘不屈被杀

姓名	职别	年龄	性别	籍贯	殉难地点	殉难日期	殉难经过
柏森锠	桐乡政工队员	21	男	桐乡	桐乡	30.7.30.	因赴青乌购公物遇敌便衣队被敌杀害
陆银生	省直属第三政工队员	30	男	江苏吴县	嘉兴王店	30.8.1.	八月一日晚赴沪杭公路敌据点王店进行工作为敌所俘即遭枪杀
钱鑫森	同上	25	男	上海	嘉兴王店	30.8.1.	同上
翁坚	省直属第三政工大队队员	23	男	慈溪	桐乡	30.8.20.	奉派担任锄奸大队商酌先部政训工作人员八月二十日在桐乡亭子桥与敌遭遇率队激战壮烈牺牲
谢鼎贵	长兴政工队员	26	男	平阳	长兴五里桥	30.22.15.	因公自河桥埠至吴家潭中途为敌虏去志坚不屈星夜被枪杀于五里桥
成崇益	同上	20	男	长兴	同上	30.12.25.	同上
吴隐	长兴县反敌行动工作队第四队队员	25	男	长兴	长兴县城	31.1.26.	奉命在敌区仓前街开店设计狙击奸伪事机不密惨遭杀戮

殉职被俘人员之多，就可表示斗争的勇敢与激烈，浙江的陷区政权，始终能维持不替，就是这班工作人员的汗血造成的！我写到这里，对于他们表示无上的敬意，虽然其中有极少数的失节者，但终不能掩没大多数人的灿烂光芒！

游击区的恶势力　游击区除了敌伪以外，还有许多的恶势力。这种恶势力，名目是太繁多了，总括名之曰“游杂”，不但妨碍对敌伪的斗争，而且是增加人民痛苦的仇敌。他们是挂着抗战的招牌，作戕害老百姓的事实。他们是从某一方面得到一个名目，或是自己假借一个名目，而在那里聚众横行。他们没有一定的编制，可以任意扩充；没有饷项的来源，可以就地搜刮；没有

一定的任务，可以到处转移；没有长官的管束，可以任意胡为。人民既受敌伪的蹂躏，复受这种恶势力的剥削，真可谓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而国军及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挂有名义，不晓得他们的背景，就不便干涉，或是他们的力量很大，而无法干涉。三十一年以后，此种情形，更加恶化，原因是国军后撤，地方政府不为彼等所忌惮，而时时受到他们的威胁骚扰。所以三十一年以后，陷区政权，不但要单独与敌伪斗争，而且同时要与游杂部队斗争。一个区境内，弄得有三个专员，一个县境内，弄得有三个县长（本省专员、县长，外省专员、县长，伪专员、县长）的现象。各有各的部队，各有各的势力，我们也同他们交涉过。他们的答复是：“同是国家的土地，任何人都能进驻。”他们已经把国家划分的行政区打破，国家的法令更不在他们的眼内，自然更不把我们地方的政府，放在眼中。以前国军及地方政府也曾切实整理过，把初期的游杂数千人调到后方，加以整理。但是他们好似“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莠草，不断的在那里剪除，也不断的在那里生长，也就因为陷区是最适宜他们生长的地方。

游击区民众的负担　游击区的民众，虽然没有征兵征实的负担，但是他们的负担，要比后方重得多。至少他们有三重负担，(一)敌伪的。(二)游杂的。(三)我方政府的。这三重负担之下，都有很多苛细复杂的名目。那些县份都是浙江最富庶的地方，起初不觉怎样，后来负担日重，而人民所赖为生活基础的蚕桑，根本是崩溃了，而日常开门七件事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却有三四件不能自给。他们生固不易，死亦困难。听说杭、嘉、湖的人死了，起初是拆用房屋里的木材来作棺材，后来就用稻草裹着去葬，甚至有连稻草的殓葬也不可得的。势将达到生无可居，死无以葬的地步！这种情形，尤其是在“阴阳界”的地方为最甚。所谓“阴阳界”，就是间于敌我的地方，敌人的势力可以到达，我们的势力也可以到达；或者是敌我势力都不能到达，而是游杂势力可以溷集的地方。敌我势力的一来一往，直接间接都要使他

们遭到痛苦与损失，再加以游杂的无厌诛求，就更不堪设想了。也有人这样说过："地方政府与其这样去维持沦陷区政权，而增加人民负担的痛苦，毋宁放弃沦陷区政权，既可减轻人民负担的痛苦，反得到人民的怀念。"这种见解，乍然听来，多少有些理由，而我的答复是：若果放弃我们的政权，又何必抗战？抗战就是想在千难万苦中维持自己的政权。而且人民对自己政权的负担是有限度的，伪政权及游杂的负担是无限度的。因为不忍人民无限度的负担，才想极力维持自己的政权，若果放弃自己的政权，就无异使人民永陷无限负担的地步！但在维持政权的斗争中，加重一些负担，自所不免，若因此而放弃政权的斗争，则无异于因噎而废食，相反的，地方政权若能确实建立，则其他的额外负担，自可减轻。这本末的道理，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能一概而论的。至于地方政府，所加于民众不合理的负担，自须切实整顿，又不仅游击区为然了。这是我对于游击区第一个意见。其次，我觉得我们对游击区是太放任了，因为放任而敌伪及游杂才能如此长久盘踞，不但使敌人有向我后方地区压迫进攻的机会，而且使游击区的民众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复次，浙江的游击区由工作人员之艰苦奋斗，省政府之极力支持，到现在政权还能勉强支持，同邻省比较起来，是尚可自慰的一件事。但是演变到现在的情形，只能说是力之未逮，不能说事不当为，而将他放弃。我对于牺牲的工作人员，及现在还在努力的工作同志，实表示衷心之钦敬，同时对陷区人民之痛苦，更是刻不敢忘怀！

关于陷区和接近陷区受游杂骚扰的情形，第一区专员吴寿彭，曾写了一篇《冷暑秋思》，描写得非常真切，兹节抄一段作为补苴：

……我们境内有两个国家存在。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言语，行不同的法令，用不同的币制，奉不同的领袖，从不同的宗教，过不同的生活。

这不是说在中国境内有日本的存在。……

这也不是说在中国境内有伪组织的存在。……

这也不是说在中国境内有“边区政府”的存在。……

我们所说的另外一个国，只是没有旗子，他除了挂我们的旗子而外，其他的典章文物是都具备了的。

这一个国家的士兵，木壳枪上挂着红的丝带，这一个国家的子弹是用来打放生潭中的大鱼的。这一个国家的机关，印信与公事文书，只是用来蒙混，或遮眼的。这一个国家的生活，不是生产与消费，是征派与享用，艺术的权威是髦儿戏班。这个国家的刑法，只有两种：一帮人运上去盐；也许又记错了，那是运下去的木材，遭遇缉私或海关，就摆出一叠十万元的钞票，同若干出壳的木壳枪，拷问是这样进行的（被拷问的是缉私或海关）；你要钞票还是要性命？意思是你在这两种刑罚里面捡一个较轻的吧。没有死刑与徒刑。譬如打死一个人，若是老百姓，就该死无疑，若发现那是一个口袋里有番字的友军，则赔款五万元。这个国家的经济学，是吃了公粮去派夫子来种芭萝，再用芭萝来喂猪；或是派柴火，因而人民不得不砍桑树。至于挑来的桑树，则用来烧空锅子，因为烧到没有时，可以再派的。自己省却用火柴做生火的麻烦工作。这个国家的组织，是非常严密的，运用非常灵便，譬如一些退伍文武，一些贩夫走卒，一些真机关与伪机关有牵连的人，一些流氓地痞，合伙经营出口贸易，这些都能够在极困难的、破了路、坏了车的环境中，达到目的，在枪林弹雨刁斗森严、有战争危险的区域完成任务。这个国家的钞票是关金券，这是二十当一的关金券。所以我们这一国吃四百元一月伙食的人，常常诧异说，听得有些地方一席酒要一万元，实在那是二十五元一席。……新近有一个“大队长”出丧，用了五十万元，排场是极简单的；实际这并

不比我们国民政府发给“蒋作宾”“治丧费”五千元为多，这个国家的养生送死就如此。这个国家的都会或城市常常迁移，譬如小小的浙西一隅，就是三墩、渌渚、南涧、深坞、场口等，一连串吓人的名胜古迹。所以这个国家的课本历史是薄薄的，地理是厚厚的。“从前”的深坞，或者“现在”别的赌场，则早已实行金本位，台面上以金戒指做单位，有些人串着金戒指象古钱用绳串着一样。实在我们这里说的只是这个国家的下层组织及社会之小部分，要说完全是没有办法的。只是有一件事非常普遍而透彻，这个国家以赌神为上帝，钞票拿来赌，金戒指拿来赌，木壳枪拿来赌，甚至生命也拿来赌，如同我们的国家要求人民以死报国，那一个国家的人民也常不惜牺牲，以效命于赌神的。这国的宗教信条，是物质重于生命，为着搜集一袋谷子，不惜杀死三个百姓。公益只是用以喂给私利的麦麸而已。总之：是这国家有与我们不同的生命观念与物质观念。

廿六　业余生活的兴趣

我对于“六艺”的新认识　以上所写许多回忆的往事，大都是我求学、从军、从政的正面生活。虽然其中也附带描述了若干生活的侧影，究竟是太简略了。我想一个人的生活，除了在事业上正面表现之外，业余的成份还很多。这种业余的生活，不但关系个人的事业，亦足以影响整个的社会，所以有把它写出来的必要。

周礼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如果以新的观念把它补充起来，可以包括人的生活全貌。不过这个生活的全貌，是随时代而演进的。中国现时有许多人，对于六艺，不是缺少这一门，便是缺少那一门，有些人更以复古的眼光衡量这个六艺，不知道随时代演进扩展，以充实生活的内容。我以为饮食、男女，及一切社交，都可包括在礼、乐里面；平时战时一切战争方法及战争工具之运用，都可包括在射、御里面；文艺科学，都可包括在书、数里面。我们如从时代的透光镜的正面看去，一切都可以得到正确的认识，与合理的解决。若果从透光镜的反面看去，则一切都比原始的形态渺小而狭隘了。所以我们的生活，必须跟着时代进步。否则，便要受到种种的束缚与烦懑！

求学时代爱好闲谈　我在叙述少年生活时，已将我的个性描写出来了。我是一个没有受过严亲严师与旧观念束缚的孩子，心目中没有偶像和迷信。在那乡村的自然环境里，随我耳之所闻，目之所见，而决定自己的活动；也就是说自己怎样想就怎样做，活泼天

真，很少受到身外的干涉。到了外出求学，在陆小、陆中，乃至军官学校，我都是好自由批评——批评时事和批评人。在陆军中学的时候，我有两个朋友：尹作翰、秦镜，也是好批评的人。我们时常相聚在僻静的角落里谈天，有时谈到深夜十二点钟，被师长干涉了，才散去就寝。那些师长们，认为我们是爱说大话，而不勤学业的坏学生。到了保定军官学校，我们还是如此。的确，因为我们在讨论批评中，认为某种功课应该彻底的研究，某种功课，不应该多费心思；尤其是在考试方面，我觉得不必过于重视分数，而应另有自己的心得——某种功课的心得与功课以外之心得，以致有很多门功课都很荒疏。这不是我要掩饰自己功课不好的说法，而当时确是如此做法。这观念，在学生时代应不应该如此，及与我以后事业的影响怎样，我现在还不敢作肯定的断语。我只可说是得失兼半，和因人而异。后来到军队里去当下级军官，才觉得不但以前空阔的批评论调要不得，而且连以前所认为有心得的一二门功课，一时也用不着。因为在军队里，尤其当下级军官，一切须崇尚实际，不容夸大，不须高深。因此我得在工作中另做一番研究学习的工夫，即所谓边做边学，这不是我真正为学的起点，也成为我以后事业的起点。

食色两事应有正确的认识与合理的解决　一个正当廿四五岁的青年，除了他本身职务上的活动之外，总还有其他的活动。谈到异性往还交际的问题，古人有“食色性也”之语，可见人生对于异性的需要和进食同样重要。我们初到部队里，见到那些官长好饮花酒，叫妓女，认为太腐败了。初来的时候，自己还是很矜持着，久而久之，遂与之合流，而恬不为怪。这与其说受了人家的引诱而堕落自己，毋宁说是基于自己天性的需要，而自然走上这条路。可以说在那个时期的人，大都是如此，固然有少数人不必出此一途，但亦有其解决的方法，而并非完全与此道绝缘。我现在回想这种活动，在旁人或以后的人看来，一定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而在其时其人的心理，总以为正当的。纵然因为受到旁人

的批评而感觉不安，但不安的心理，总敌不过生理机能上的冲动。我想今后对于这个问题，不应作虚伪的掩饰，而应有公开的认识，与正当的解决。我之所以要明白的写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其次，说到食字。食是一般人所认为极正当的事，我和白剑生与其他若干下级军官同驻湖南的时候，大家都是饕餮者，虽不一定吃得很讲究，只是分量多一些而已。但在勤俭的湖南人眼中看起来，是吃得太丰富了，而觉得惊讶！中国人素以俭为美德，一般人只是知道节俭的目的是在省钱，而不知道人类求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生活的享受。节俭到仅能维持生命的最低限度，把生活的乐趣，都牺牲了，那是不合理的。有些人由牺牲毕生生活乐趣而积下来一些钱，在临死前还不知享用一些，真是莫名其妙。我之所谓享用，不是过度的浪费，而觉得社会上所谓节俭，已减至生活水准以下，而妨碍其生理之发育及意志的进取。我认为食与色过度的抑制，或不正当的发展，皆足以妨碍身心之健康，因而影响及整个社会与国家。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与合理的解决。

我爱好的几项运动　我是生长在乡下的孩子，觉得乡下的孩子活动的范围，比城市里要大得多。上山爬树，潜水捉鱼，以及农工百艺，都有天然的学习机会。不比城市的儿童，只能到学校里去学习，或更没有机会来学习。我大多数的运动基础，都是乡下养成的，后来到了学校里，都市里，又获得补充与改进。当十一二岁时，就学会了射击与打猎。到了军事学校里实弹射击，成绩就很不错。自然啰，这不仅是到了军事学校才学习，而是在未入学校以前，就有了这种知识与经验。记得二十五年杭州骑射会成立，推我首先射击，我发了第一枪，那看靶兵把一个零分的旗号摇出来，我觉得非常惊异！我想："恐怕是这杆枪有极大的偏差，或者是弹药变了性。否则，在这个短距离之内，决不至于不中的。"第二枪我仍按着瞄准的射击，结果中了十一分，（最多是十二分）第三、四、五枪，都是十一分。我走到靶上去检查第

一枪偏到什么地方，原来正射在第十二圈的黑点中心，看靶兵一时大意，没有看出来，这次射击五枪，一共得了五十六分。我对打猎也非常有兴趣，打飞鸟也相当的准，但是近年身体胖了，目力差了，兴趣也随之減退，甚至于完全没有兴趣！

中国传说："北人善骑马，南人善乘船。"不是人的生性如此，而是社会环境如此。因为北方多马，南方多水的原故。但是嗜好是每人都有的，不过嗜好因环境而异就是了！我虽是南方人，而在军队，却有骑马的机会，并且成为一种嗜好，对于良马，好似良友一般，我闲住在香港，也加入香港的马会。有一个姓江的朋友，他是一个富商，每年都化了很多钱去买马，养马。我问他："你化这许多钱，养这许多马，是不是为赢钱？"他说："不是的，一个人总有若干嗜好，嗜好大半是消费的。若果想在嗜好里赚钱，就不成为嗜好了！我嗜好养马，我的消耗，亦就在此，但我觉得这于我是乐得的！"我觉得他这话，很有些道理，若人的嗜好能于身心有益，或者于国家有益，就消耗一些金钱，也是值得的啊！周礼把御列为六艺之一，是很有道理的。廿四年以后，蒋先生提倡六艺，要各省都设骑射会，那时我在杭州，就养了好多匹马，后来到湖北，与重来浙江，都带着它们走。后来在金华，又从军队方面得到好几匹俘获的日本马，当廿七八年，我在马上的运动很多。立马吴山驰骋中原的壮志，在马上更表示出来！现在还留有好些骑马的照片。三十四年，东南日报的刘湘女同志，要我在送给她的一张骑马的照片上题字。我题了两首《減字木兰花》，其一云：

七年前事，戎装立马纵横意，驰骋金兰，胜日扬鞭上北山。　前尘如昨，顿添揽照心情恶，避伏云和，谁识伊人感慨多！

我在这词中，固然有着环境的慨叹，而身体生理上的变化，使我不能再有乘骑驰骋的机会，是感慨的主因。现在我寓内还养着两匹老马，闲常对它望望，恐怕彼此都有迟暮的感想！

民国十六年，我已成为“汽车阶级”了！我那时这样想：一个人坐在汽车上，不会开汽车，就等于坐在马上，不能执马缰一样，实是最无趣味的事！我在广州时，就决意学开汽车。曾在大校场内学习了两点钟，就开入市里去，坐在旁边的司机，捏着一把汗，时时照料着我，怕我闯出乱子来。但是出于意料之外，我开入市里去，还能开回家里来，一些乱子没有闹，从此我就常常自己开车。我有两句开车的要诀是：“注意路上的人，控制自己的车。”和“车不避人，人会避车。只要车的速度，不超过人躲避的速度。”后来，我在公路上驾驶速度就很快了，很多人都说我开得太快，要出危险。但是我却从来没有出过危险，也没有使行人受过危险。我闲住在香港，因为没有开车的执照，都是在子夜后，等警察收班了，自己开开快车来取乐。有一日，香港总督请我吃饭，他对我说：“听说你很喜欢在深夜驾驶汽车。”我听了，深觉他们耳目的周密。有人劝我去领一张开车执照，我就不敢去考试，因为我只能开前进的车，开倒车却并不很好，恐怕要当场出丑。抗战后，我在金华的头几年——廿七、廿八、廿九各年，要到桂林这些地方去，都喜欢帮助司机开车，分分他的劳，多走一些路，所以人家需要三日的行程，我只要两日就到了。不但节省时间，而且觉得写意。三十年后，开车的兴趣就减退下来，原因是目力较差，注意力不能集中，恐怕要闯大祸。

我回忆这种运动的兴趣，得到这样的结论：一个人的技术的成功，与成功后的退步，都是由于环境及本体（即本身）物质的关系。因为有马，便易于会骑马；因为有船，便易于会划船，因为有汽车，就易于会开汽车。据说美国平均五个人有一辆汽车，也就是五个人中至少有一个人是能驾驶汽车的。十多岁的孩子很多会开汽车。他们的驾驶技术完全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陶冶成功，而并不是汽车驾驶训练班训练出来的。我又听得一个美国人说：“关于航空人员的大量补充，任何一国都比不上美国的容易，这不是美国因为参加了战争才加紧训练出来的，而是美国平时的环

境造成功的。”他这话的确是事实，亦是至理。我想起启蒙时候，读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那几句话，性本善的“善”字，我以为应作“无”字解。习相远的“习”字，就是指环境。性的变迁，是由环境之由近而远。古人又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两句话，所谓朱与墨，都是环境的种种。近某一种环境，即染某一种色彩，也就是说性的本身，当初是没有的。后来的有，就是环境的有，是由近而远，学习得来的。所以我以为社会的改造，应着重环境的改造，而不是单由人心的改造可以成功的。这是说明环境与本体的关系。至于本身体质的关系，是决定对于环境的种种所能接受空间的程度，与保持时间的程度。就我本体的素质，也只能接受我过去的一切，虽然我不能决定我以后能不能再接受更大的空间所授与我的东西，但我可以决定一个人能接受的空间，是有一定的。所谓一定，是对某一个人而言。即是某人有某人一定的空间范围，而不是勉强得来的。这都是受了本体素质的限制，时间保持的限度，也同样受到各人本体素质的限制。比如我是一个好运动的人，但是我不能成为一个有名的运动家。因为我本体的质，不合乎有名运动家的要求。又如我现在对于种种运动的兴趣都减少了，这不是我没有精神，而是我的体质发生了变化，已不适于已往那些运动。我现在时时有“髀肉复生”之感，并不是我没有马骑与没有精神去骑马，而是我的本质已不适于骑马，其他一切，都是如此。这就是证明人的一切习惯、兴趣、知识、能力、事功，都是基于本质，并限于环境，而不是以唯心为出发，以精神为决定的。所以要改进人类，改进社会，必须由本质的改进，与环境的改进着手。这是我由本身的经验而得到的结论。

堪舆和命相　三十四年五月间，我和东南气象局长石延汉君谈了许多关于宇宙的问题。我对于这一方面的书籍，虽也看过一些，但只能算是一知半解。有好多不了解的问题，我想趁此机会向他领益，因为他对此有专门研究的。在闲谈中，谈及看相、算

命、风水等各种迷信问题。他问我信不信这些东西，我说："有些是信的，有些是不信的。"我的信和不信，有我的解释，而不是一般的迷信。比如看风水，我所看的是美的风水，或是实用的风水。就阳宅来说吧，一家人长久居住的地方，环境一定要有美感。因为有了美感，就会使你一家人愉快、健康，由愉快健康而自己可以建立功业或发财长寿，或是生出好的儿女，一代一代的发达下去，否则你若住在极不美的地方，就会烦闷、疾病而死亡，而破财；生出的儿女，也要受到不美的影响，而不发达或灭绝。在住宅的方向或水、或山、或树，都是环境美的条件。自然这都是天然的条件，而人为的条件亦是重要的。如布置一个花园草地，或栽种一些树木，开辟一个池塘，沟引一泓小水，都足以增加环境的美，也都在美的风水范围。但我不相信方向或沙水五行的相生相克，而是相信美感与非美感的影响。我近年来运气不好，自己病了，大儿子死了，我的精神自然感受到很大的痛苦。好多人都说我以前在云和住的那间屋子风水太不好了，后来我搬到云和民族复兴纪念馆的新屋，余越园先生就对我说："你搬了，我才对你说。你住的旧屋，风水太不好了，长久住下去，恐怕不利。"我笑说："我很知道那间屋，不但天然的环境不美，后面紧靠住一个山，前面闭塞得很，望不出去，地面更潮湿得不堪。人为的美亦谈不上，屋是旧货翻新，没有一些新的技术，一条旧围墙像监牢一般的围着，园林花木，更是缺乏，而且我早就知道那是一个绝户。当兴工的时候，好多工人就在那里病了，但是已经动了工，不便停止。造好了又不能不住。因为云和的住屋是不易得到的呀！而且在战时，生活不能怎样讲究，谁知道能住得多久呢？所以我就住下去了。结果一家人，你病我病，轮流不已。精神更感到不愉快。我想以前这家人的灭绝，自然因为疾病过多的原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亚的平''扑疟母星'等特效药呀！我们在那里住，虽然不至如此，但是精神总不痛快。我不是相信风水的相克，而是觉得那里的环境是太不美了，而且是易于

发生疾病的地方。”至于就阴宅说，一个人想把死者葬在美的地方，这是对死者的感情作用，而生者每年到那里登临祭扫，也感觉得愉快。我想这就是阴宅风水的起源，后来渐渐走到迷信的途上去了。希望死者未朽的骨头，作为子孙兴家立业的根源，而失去了原来的初意。所谓地理风水，实在是无稽的迷信。

我所说的应用风水，亦可以说是形势的风水。举个例来说吧！香港是一个商业繁盛的港埠，在那里居住的人，都是富商大贾，或是军人富翁，可以说他们都受到了风水的好处。因为香港位在珠江口外，珠江流域的货物，都在那里集散，它是世界航行的要口，各国的货物到远东来，都要经过那里。它有深水的港湾，可以停泊数万吨的大汽轮，它有很好的山陵环绕着，可以避免狂风的袭击。这都是良好的地理形势，也就是良好的风水，而使它成为一个最良好的港埠，商业自然不断的发展起来了。加以英人不断的整理布置，维多利亚山上青翠的树木，点缀着闪烁的灯光；一尘不染的街道，与良好的治安，使你住在那里，又美丽，又安乐。已住在那里的人，固然因身心愉快而健康发达，别的地方的富翁，亦因仰慕这个愉快的天地，迁到那里去住，而益形成它的繁荣。这就是形势风水良好的结果。可是住在那里的人，尤其是开辟香港的人，却不是迷信中国人所谓的风水，而是知道地理形势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上海、青岛、汉口、天津、广州等等大都市，都有良好的形势风水。

看相我是相当相信的，因为这是实质的表现，从实质的表现，可以决定这种物质功能的程度。相书上的术语，有很多都是观察事物而得到的结论，这种结论，是相当正确的。比如我们把面前的数种不同的木头，或是各种不同的金属，用眼看看，用手摸摸或颠颠，就可知道它的硬度和重量用途。后来科学发达了，就用各种机械来测验，则其结论更为正确。又如某样的马，何以知其善走；某样的牛，何以知其善耕，都是由于牛马实质的表现，和观察者经历多时的观察所得到的经验。古传伯乐会相马，宁戚会

贩牛，他两人一定是对马牛有经验的观察家，而不是迷信的星相家。看人的道理，也同看马看牛是一样的。某型人是聪明，某型人是愚笨，是很易从他的实质表现上判断出来的。壮健与孱弱，就更不必说。由于他智、愚、强、弱，而可以决定他的工作与前途，也是很浅近的事理。不过现在中国一般的看相，又走上阴阳五行的路上去，并以推测他的往事与后事，以眩其神奇，则殊可不必。好多市上的相士，更以“科学相法”为号召，殊不知他正走上反科学的路子，而想以科学来骗人，真是可笑！

我对于看相的见解是如此。我对于市上骗人的相士，也颇想研究他们的骗术。三十年六月，我在桂林，那里有一个摸骨相士，人们都说他的相术很高明，我想他既是一个瞎子，根本就不能看，难道摸一摸骨就会知道了么？如果真是如此，就是神乎其技矣！我终不信天下会有这样的事。于是我也去给他摸一摸，看他怎样骗法。我到了那里，瞎子并不在场，而是一个开眼的同我谈话。他先要我以五块钱买一根筹码，然后再到里面去摸骨，我持筹进去，就叫那瞎子摸骨。他说：“你先交筹码。”我说：“摸了再交不可以吗？”他坚持要先交了筹码再摸骨。我也只好依从他。他接了过去，把筹码摸了再摸，才替我摸骨，他开口批评了，自然是一番恭维的话。他说我文武全才，文官可做到简任以上，武官可做到将官以上，我说：“我根本就不文不武，而是一个商人。”他说：“如果真的话，我的一双瞎眼睛，任由你挖了去，并且情愿退回那五块钱。”我因为还要看他以后的把戏，不好同他争辩，要他再详细的摸，详细的评。问他：“再要多少钱？”他说：“三百元。”并说“这是在桂林摸到的第一块好骨头一定要这个价钱。”我心里想：再拿三百元来看一出戏也好。便答应他，请他再摸。摸后他就信口雌黄的乱恭维了一顿，我大笑起来。我说：“文官我早当了特任。武官我早当了上将。”他说：“是呀！我不是说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么？”我的次儿行方在旁边，手舞足蹈的作势要打他。并且说：“爸爸上当

了，三百元不如买一只鸡来吃。”我同他笑着出来。

我后来想他这骗术相当高明。起初所见那个开眼的，就是瞎子的眼睛，他对于来看相的人，已决定了等级，再给你一根有暗号的筹码。瞎子所以先要交筹码，然后肯摸骨，就是要先知道筹码的等级，才好决定来人的身份。摸后再抽象的笼统的说几句，以试探你的口锋，并按情形开一个价钱。如果他试探是对的，你一定愿接受他的价钱而任他再摸；他就将以前抽象的说法说得具体一些，你的钱就是他的囊中物了。如果不对，就各走各的路，而不相干。反正中国人一般的性格，只要他说准了几句，就会加油添醋的宣扬开去。如果说错了，决不会去宣传，所以他的名声，就一日一日的传开去。尤其是我在桂林，认识的人太多了，焉知没有人预先关照了他呢？现在想起来，真是上当。但是化了三百元，看穿一面西洋镜，也是值得的！

算命排八字，我是不相信的，即使是有个玄妙深奥的道理在里面。因为中国的时辰，尤其是五十年以前的时辰，根本就不可靠，他又何从推算呢？而且第一个甲子，又是从何年、何月、何日、何时算起才算标准呢？阴阳五行的道理，我也不相信，但是我还没有科学的正确解释。石延汉君接着说道："这很容易，就以太阳系来解释好了。以前的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的五个行星，阴阳是指太阴、太阳，合起来称为七曜。这完全以地球为主的旧天文学，所谓七曜（阴、阳、金、木、水、火、土），是绕着地球走的。自从哥白尼发明了日主的学说，金、木、水、火、土及地球皆是太阳系的行星，七曜现在已变有九曜了。我们在科学上已经承认哥白尼太阳系的发明是正确的，则阴阳五行的邪说，就不攻自破了。”我听了他的说法，不禁恍然大悟。因此，我就联想到我们如果有正确的宇宙观，则一切人生观都会正确的了。谁说天文学是空虚无用的呢？

科学技术的研究　我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二十八年起的。因为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发生了兵器制造的兴趣，在全面战

与全体战的号召之下，总是想把可以武装的人民全体武装起来，但是武器那里得来呢？我也曾化了十数万块钱，向外国买武器，但是累月经年，才得到手，且数目有限，后继为难。于是我转到自己设厂制造的念头。因为我以前（民国十四——十六年）在广西也曾由土制枪弹，进而为机制枪弹。广西统一事业的成功，与参加革命的力量，自己能制造武器，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人也富于仿造的技术天才，只要有相当的机器设备与材料，就能仿造出来，虽然比不上外国货那样精巧，也还可以应付一时的用处。而且我认为制品的精粗，是时间过程上的问题，若能在长时间中不断的努力，自然可以得到不断的进步。世界闻名的德国克虏伯厂，起初仅是一家打马蹄铁的打铁铺。开始的简陋，怎能限制以后的进步呢？我在《八年来的浙江军事》一章上，已叙述设厂制枪的经过，我自己也是参加研究兵器制造的一员，这完全由时势的需要，使我走上这条路上去的。"需要是发明之母"，这是科学界的一句名言。我现在将研究科学技术的经过，自我的介绍出来，当然是很幼稚可笑的，而这些创造的细小东西，对于国计民生，也不能说是有很大的贡献。而且在研究创造的过程中，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失败为成功之母"，这些失败的经验，倒是值得叙述，以供同好者的参考。所以我仍不愿藏拙，而将我的研究科学技术的幼稚可笑的史实，写在里面，因为这实在是我抗战八年业余生活最重要的一环呀！

七七枪榴弹筒制造经过 廿七年上半年，我在柳州参观四十厂的枪榴弹筒的制造。据那厂主赖瑞麟说："这种枪榴弹是意大利的。前几年有个意大利的军火商到广西兜生意，把样品拿来试验，觉得效力很好。当时想了种种方法，把这个样品留下来。尽一夜的时间，拆开研究，并且把图样绘了下来，次日仍交还他。我们研究的结果，认为要有材料，很容易仿造，成本又便宜。如果用高价向他购买，未免太不合算了。于是回复他，说这些东西要不得，不愿承购。那个意大利人生意做不成，反把制造

的秘密泄漏了。这就是四十厂枪榴筒制造的起始。”他说得非常得意，我心中虽然想到这等作风，未免近于无赖，但是国际上探取人家的军事秘密，本来是不讲道义的呵！赖瑞麟也是我在广西时期帮同造土枪造炸弹的主要角色。我对他说：“你真可谓花样翻新了！”他笑道：“这是你老领导出来的呵！”我参观之后，就转了一个念头，向他要了一副样品，带回来想自己仿造。但研究结果，觉得不甚满意。第一、所有原料、都是外国货，而且制造的机器，也不易办到。第二、射程太近，只有一百五十公尺。我希望至少要有四百公尺的射程。同时我发现达到四百公尺的射程是可能的，因为意大利式的枪榴筒，仅是利用步枪射击时二分之一不到的瓦斯。我若把步枪射击时全部的瓦斯都用上，一定可以达到四百公尺的要求，于是我决心进行试验。先是用弹管套在枪口上、管内装一个与意式同样重的弹，将步枪子弹头去了，加以封闭。我便教工厂的技术员照这个意思去做。他们都不明白我的作用，虽经我说明用意，而他们都认为得不到好效果，暗笑我是个外行。但是我既要这样做，他们也只好照样去做。等到做好了，拿去试验，射程最远的只有一百多公尺。他们皆哈哈大笑。我说：“笑什么？我的初步已经成功了！你们想：以这样粗糙的筒，这样笨的弹子，弹的封闭，又不严密，尚且得到这样的成绩；若将这些因素再加研究改良，一定可以达到目的。”于是继续研究改良弹筒，由短而长，由长而短，经了很多的试验，才决定他的长度为九英寸。榴弹的形状则由圆而尖，或由尖而改为略圆。为减少在筒内的磨阻力，而加了一条弹带为确定飞行的方向，而在尾上加了四片翼子。弹体的形状，一共改了十三次，最后决定采用第十二次的形状。发射弹的堵塞物，最费脑筋，用硬的东西，会撞击弹尾，以致飞行不规则，甚至有损伤弹翼的危险。用软的东西，则膛压力不够，火药燃烧不完全，以致药力不足，射程减少。于是我出了一个问题，要技术员去研究，我说：“发射弹的堵塞物，在膛内时，要有与真正子弹头一样的膛压

力，但是一到枪口，这个堵塞物就要变成灰烬，不能有一些撞击榴弹尾的作用。”我只能出题目，自己却不能作文章，怎样来解答我这题目，则是技术员的事，我一概不管。其实我对这个题目的解决办法，一些也不懂，出题目是易的，作答案却很难。我当时以为未必做得到，但是他们居然做到了，使我喜出望外！这是最后的难关。其余如瞄准器，射距离，调节器装簧上的美观，都费了很多研究与改良，才作最后的决定。我现在叙述这种经过，仅费了一、二小时和千百个字，而我当时制造研究改良的工作，却是经年累月不停的做，尤其是种种相互的复因，非得时常详细的观察，不能研究出来，往往很细微的现象，就是极主要的原因，好些技术人员，经种种的失败，有时不免有放弃的表示，但是我总是坚持着，一定要获得成功而后已。这个七七式的枪榴弹筒，最后是成功了，纵然不能超过日本的昭和十四年式，但比他们旧式的却好得多。凡是用过的人，都觉得相当满意，可惜还不能通行于全国。我则因此而获军事委员会颁给的一等金质奖章，我觉得这个奖章，比我以前所得的二等云麾勋章，还要宝贵。因为这是我完全用心血创造得来的！

几种爆破武器的改良　现在的战争，是爆炸的战争。在战场上，那一方拥有较大的爆炸力，那一方就可以得到胜利，这种爆炸力分为三种：第一是空军所用的高度爆炸弹；第二是陆军用的大炮弹及地雷；第三是海军用的大炮弹及鱼雷、水雷。这种种的爆炸力，不但要以威力，而且要以数量胜，这种趋势，在化学战——即细菌战或毒气战——未实现以前，实是战争中最大的威力。即使化学战实行以后，它的威力也同样的重要。我对于空军作战，曾经作过两种研究。第一是想用高度的空炸弹来对付上空的敌人空军。现时的空防，一是用驱逐机在上空将敌机击落，但必须有优势而优良的驱逐机，才可以达到目的。二是用高射炮由地面将敌机击落，但是高射炮队活动的范围受了限制，而且炮弹的重量及射击的高度，也受相当的限制，所以高射炮队防空，不但在

中国不见得有很大的效力，就是在外国有很多精确而口径较大的高射炮，也未见得有如何了不得的作用。所以我想，如果有速度很大升得很高的飞机，飞到敌人机群上面，将高度爆炸弹向敌人机群作空中轰炸，在爆炸威力圈内的敌机，虽不必被破片杀伤，亦可以将它震坏。要是能命中的话，不但爆炸的威力比高射炮弹大得多，而活动范围也广阔得多。并且可以少数的飞机，打击敌人的大机群。我对于这种空炸的炸弹，曾经研究设计过，但是要有飞机作实地的试验，而且是需要高速度与能特别升高的飞机，才可达到目的。我个人固然做不到，中国目前也还做不到。此种想像的办法，这次战争中，好像也曾用过，成绩怎样，不得而详，但总算是一种方法，可惜我们没有机会来实验，仅是一种想像的研究而已。第二、对付敌人的燃烧弹。如果像美国用很多的飞机，投下很多的燃烧弹，自然也可达到烧夷的目的。但这实在太不经济了，尤其在中国，我想最好每一飞机投下的燃烧弹，在每一区域内，都分布得很匀，而能到处发火，不致集中在某一地点上面，致使许多的弹，仅能发生少数的火头。我曾看见苏联空军用的“莫洛托夫面包篮”，把好多的小炸弹，装在大炸弹里，投下时，乃各个分开。这样，散布的范围，自然广大得多。但我觉得这种散布力量还是不够，而须将大炸弹内的小炸弹，各有抛射的角度，而且要用火器喷射，使放射得更远，分布得更广，才合我的经济要求。我曾作过这种炸弹的设计，替它定出一个名字，叫“中国的香蕉”，因为它像一丛香蕉的样子。也因不能试验，而为空想。

地雷是防御和阻止敌人进攻的利器，尤其是坦克车，在进攻中，最畏惧的就是这东西。稍一不慎，即致全车炸为糜粉。所以地雷虽然不能攻坚克敌，却是防敌进攻的有效武器。在中国的防守战中，敌人受我们地雷的损害很少。这不是地雷的本身没有效力，而是我们用得太少。使用的方法，也欠研究。我觉得地雷的本身，并无须乎很大的改良，而地雷发火的装置，尚须加以改

进。我时常听到我们的部队说："埋在公路上或铁路上的地雷，不是被敌人发掘，便是没有触发。"其实我们所用的地雷，多半是触发的，因为在公路上埋雷的地点，往往不一定是汽车轮所辗过的地点，即使不为敌人所发掘，其效果也等于零。因此我研究有两点问题：第一、雷不可埋在地面，以致易于被敌发掘。但是离了路面，就没有机会与汽车轮胎接触。因为雷的触发，只有极小的一点。第二、须把雷的触发点扩大到全路面，车轮在任何一点上滑过，都可以触发，但这不是很容易办得到的事。起初我曾设计一种拉发式的，但并不是用人力拉，而是用汽车自然拉发。其法：在路面上放置很多锐利的钢钩，每钩都有一条绳子，连到地雷的发火器上面，汽车从路面经过，车轮的橡胶被钢钩扣着，因而向前拉动，遂致发火爆炸。但这设计需很多的钢钩，而且不一定能将胶轮扣着，仍旧认为不满意，乃改用电发式——不是制发式而是自动的电发。我想，可以将电池和地雷上的两条导线，结连起来，这在平常是不接触的，电流并不接通，但在汽车过去时，自然使电流接通而爆炸，设计虽如此，结构却非常困难，总是不能满意。但这种方法，确实安全，又不易为敌人发觉。我同一班技术人员研究了很久，都未得到结果。有一日，我在机枪厂内，将一条机枪弹簧，用手随意弯弄，当时并没有什么目的，但在动作时，忽然觉得弹簧本身，除非用大力压迫，随你怎样弯弄，每一环节内，都不致接触。我喜欢得跳起来！于是召集那些技术员，说要做一条两条钢线缠成的弹簧——即双弹簧，问他们："能否做到？"他们说："可以做到。"并反问我："作什么用？"我说："你们不要管，做好了，我再对你们说。"做好之后，我把道理解释出来，他们才恍然大悟。随后更加改良，可以分为好多节，一节一节接起来，可有二三十尺长，或一二百尺长，都可以拿它放在公路面上。好像一条绳子，将它伪装起来，就好像一条小蛇，那边连上电池及地雷。如果车辆压在上面，通过任何一点，弹簧被压，电流接触地雷，立刻爆发。屡经试验，百发百中，我名它为

“火蛇”。

炸火车的方法，比较容易，但是敌人防备的方法亦容易，多半是用压道车在前头走，装兵的列车随后才过去，或是前头若干个车辆不装人，即被炸，后面的人，也不致受害。我曾经设计过一个地雷发火器，可以指定它炸任何一辆火车，比如我们预知他用压道车，大约有若干辆，在那发火机上，就可等待压道车过后，第二列车到时，再行爆炸。或是算定爆炸任何一辆，无须人的控制，而是自动控制。这也经过实验，非常准确，我名之为“火车节炸器”。此外我还觉得如果一个地雷在防御的阵地上，为敌人一个散兵触发，能够杀伤的，仅是少数人，甚至仅是一个人，代价未免太小。于是设计一种小雷爆炸，威力圈仅有十多公尺，一个人触发，固可把他杀害，若十多个人密集在一起，也同样可以杀伤。我所消耗的，仅是一个很小的雷，比之用一个大雷仅杀伤少数敌人，要经济得多。而许多小雷可以布置一个很大的区域，被敌人触发的机会很多。但是如果战争停止，要把它取回来，就很不容易，而易成为自己的危险物，我名之为“小雷弹”。我又觉得埋在地下的雷，爆炸时，地面成为一个漏斗孔，因而对周围的杀伤圈，并不很大。若将雷触发后，能自动升高一公尺半——约等于一人的高度——再行爆炸，则杀伤圈可比埋在地下爆炸，大得三四倍，也曾经设计完成，我名之为“空炸地雷”。三十三年，我在浦城参观英国的军事代表团演习，就有这种空炸的地雷。但我觉得他的设计，有好些地方，还值得改良。我所见到的英国爆炸技术，并不见得件件比我们高明，不过他们材料多，能不断的试验，不断的改良，而且他们做事很认真，很尽职。我在旁参观，他们当我是小学生一样，尽心的解释，尽力的表演，没有一些苟且的地方。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对于这些杀人武器的研究，非常有兴趣，有时废寝忘餐的在那里想。记得有一次，在天台路上，想起了一件以前好久没有解决的东西，一时想通了，连夜开车赶回大港头工厂内，指示他们如何的做，而居

然成功。因为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日夜盘旋在脑中，一时灵机触发，突然得到解决，一种得意的情形，简直形容不出来！并且怕马上会遗忘了去，非得急急赶回作绘图设计工作不可。但有时想到以为可以解决的，到了实验起来，仍是做不通，或是过一时间，自己又把以前思索的推翻了。遇到这等情形，心中总不免有些懊丧。但我并不因此而灰心，仍旧继续去研究，而希望最后的成功。最可惜的，是费了许多脑筋研究成功的几样东西，都未能实地应用，来发挥他的能力。原因是本身不担负军事责任。应用的机会太少。而且在科学落后的中国，一向不相信中国人也会有科学的发明，因而这些东西，也未被人重视，而把它束之高阁。我曾对陈立夫先生谈过，他对此亦感觉兴趣，但未有时间去实做，他说："最好我们两人把现职摆脱不干了，去当破坏司令，一定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

无线电密码机初步设计成功 密电码的应用，在平时可以保持国家的秘密，在战时用来保持军事的秘密，是非常重要的事。往往因国防外交秘密的泄漏，而影响国家的安危，因军事秘密的泄漏，而影响战事的胜败，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事。固然秘密之泄漏，有很多原因，而由密电码泄漏，尤其是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的密电码，是太不秘密了！以前多半是用普通的明码本，只是在每页的角上，编列角码，在每页的横直方向，编列横码直码，就算是一本密码。比较进步一些的，也只另印电本，将明码本里的字，另行排列过，而角码及横直码的编列次序，亦较为不规则而已。现时认为最机密者，不过在已编之密码外，再加上一种不同的数字，使原来的密码，再发生一种不同的变化，就是现时所常用的加码法（又名二重作业）。总之：现时中国所用的密电码，仍旧脱离不了密电本的范围，它仅具备编列上的秘密，这种秘密的程度，是有限的，很容易推算得出来。而尚未达运用机械的秘密，与数理的秘密也。而且密电码基本的要求有三种：就是除了"秘密"之外，还须"迅速"和"经济"。中国以

往的密电本，秘密性已很有限，因为欲求秘密性之增加，或在编列之次序上，使其复杂。或用加码法，因而译发及译收，就费了很大的时间。往往一件极重要而须迅速处理的问题，就在译电的时间里耽误了。任何一种密电本用久了，都会不秘密，而须时常更换，尤其是很多方面通用的密本，一处遗失，即须全部更换。现在各机关密码本之多，与时时更换，都是极不经济的事。所以我认为现时所用的密码本，都不合这三种基本的要求，而须加以改进。

中国过去对于他人密电之推译——即偷译——尚有若干人去研究，但是对于自己密电之码，应如何研究改良，却没有很大的成就。也无异说中国一般的密电码，都是易于推译的。在十八九年内战的时期，我们所用的密电本，都是很幼稚的。往往我们用无线电所发出的电报，都被中央方面推译出来。我到中央谈起已往的经过，贺元敬（国光）对我说："十九年在湖南作战，你和李德邻、白健生来往的电报，我们都完全知道。有一通好象你的手笔，我念给你听听，对不对？"他念出来，的确是我亲拟的电稿，一个字也不差。令我非常诧异！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如何推译得来，与自己所用密本，有什么缺陷。二十六年冬，我在山西作战，太原绥靖公署的译电室，收到各战场情况，以及各军行动的电报很多。我问他们："是否每处都有联络员，或是各军都向太原报告？"他们说："不是的，是由无线电偷听推译出来的。"的确，以前中央及太原，对于这种工作，都非常注意，而养有这种技术人员。我更想起二十二年长城战役，下达榆关部队撤回滦河西岸的命令。第二天早上，日本的报纸，就登出来了。三十年在浙赣路作战，刘总司令下达各部队的命令，也是第二第三日敌人就全部知道了。其他各处的情形，想也都是如此。可见敌人对于电报密码的推译技术，要比我们高明得多。所以我们大本营就有禁止用无线电拍发军事及重要电报的命令。但是我想，这是"因噎废食"的办法。无线电本来是最新的通讯的方法，我们舍而不用，即使在陆地上可以用有线电，但是海战与空战，又怎样

呢？与其在通讯器具方面作退步的避免，倒不如在密码的技术方面，作进步的研求。我之所以要研究密码机的原因，就在乎此。我认为这虽然是一些很小的技术，而关系到国家政策的推行与军事的胜败，实在太大了。因此用了五年工夫，化了不少的钱，才得了一些成功。现在把我研究的过程，叙述一下：

我起初仅是想如何将现在所用的密本，变成一副机器。第一个观念，就想将电码本内的页，变成活动的。第二个观念，是想将每页上的码——角码横直码——也变成活动的。在这机器的结构上，装置这些活动的页，及活动的码，使用时，双方约定变动的方法，而时常变动的使用，也就是要避免长用一种密码的毛病。机器只是一部，变化却是万端，因此我叫做"万变密码机"。由廿九年开始研究，经过种种困难，到三十年始告完成，当时颇觉沾沾自喜。到重庆去开会，特地带着去，想同那方面的人，共加研讨。在那里会见对密码机极有研究的魏大铭君，大家研讨结果，认为仍不能满意。他并出示他所设计的用电示法的密码机，就比我的好得多，但是也未到实用的程度。他所提供的"同码不同字，同字不同码"的原则，是密码最重要的条件。使我在失败之中，更增加许多认识，不但不因此灰心，而且更增加我的勇气。三十年浙江科学奖金委员会，竟因我发明这部密码机，而给予六千元的奖金，我心中非常之惭愧！因为这部机既未到实用的地步，必须更加改良。因此不愿领这奖金，而将它转移作特别奖金，以为助我完成这工作者的奖金。

我将已成而未实用的东西抛弃，另外扩充我研究的范围。因为如果不将不合理的观念舍弃，就会受它的束缚，而不能自由。所以决心把它舍弃，另创一个自由的境地。在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年的中间，继续设计三种式样的密码机。称曰（一）季宽甲式——炼式加码法，(二)季宽乙式——变位代替法，（三）季宽丙式——电示变位代替法。而电示变位代替法的季宽丙式，实得力于田子炎君之襄助。因为我只知道密码的原理，对于电学的

原理，是外行的。所以我把以前所得之奖金，转赠与他。这三种东西，要做起来,却不容易。不是普通工厂,可以做得到。于是带到桂林中央无线电器材厂去制造，因为只有那里才有很熟练的工人与很好的材料。而颜任光君对此特别热心，由其监制而得以完成。但是工作上，也还需要改良，才可应用。我为此事一共化了八十多万元，亦可算是一笔大浪费，但我觉得这是值得的。我并不以此为满意，而时时想求进步与改良。三十三年，我在浙桂途上，又想出了一种直译式的电码机。因为以前的无论那一种，都要将电文变成明码，然后再变成密码，如果无须将电文变明码，译电的时间，一定要省很多。这种设计，已经完成了，正在制造之中。我又想将炼式加码法与变位替代法两种连成一起，则应用更广。这种设计，亦已完成，正在制造。对密码的设计制造，铁工厂的黄工程师渭川帮助的力量最多，是不可少的助手。他所最感觉得麻烦的，就是正要着手制造，我的方法，又要改变了。所以有些我要他赶做的工作，他都有些迟疑，恐怕我临时又要变更。事实上我只要想着更好的方法，就不能不变更，因为这是试验的过程呀！

制造水泥的研究　水泥是国防建设的必需品。在中国过去，这种水泥厂，几乎全部集中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如上海、龙潭、广州、唐山、大冶等处。像浙江这样的省份，过去根本没有一个水泥厂，所用的水泥，多数是从上海运来的。现在战时国防上需用水泥很多，而过去的各大水泥厂,又都沦陷了,本省各方需要用水泥，很难买到。其价格由几元一筒，渐增至五六百元一筒（廿九年价格）。我觉得这个问题，亟待解决，就从事研究如何制造水泥，并不断向工业技术员领教。但是他们的答复，都是说并非不会制造，而是没有大动力和大机器。同时介绍我一本关于制造水泥的书，依照书本所述，以及他们对我所说的话，确实很难做到。这使我非常失望！可是我决心要做。并不因他们及书上所说的困难而罢手，仍旧继续想办法。

但是摆在眼前的困难，确是很多！第一个问题，便是动力。如果没有大动力，如何使石灰粉碎？于是使我想起了我们数千年来祖宗所习用的老法，先将石灰石烧成石灰，用水一泡，就成粉了。这样比用大动力机械轧碎的还要细。其次我觉得不用旋转锻烧炉，可用别的锻烧炉，只要能够烧到一千四百度，也可以有同样功效，就决定以改良窑代替旋转锻烧炉。这两个大症结解决了，在机械方面，只要打风的设备与熔块的磨碎设备就行，其他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很有把握的放胆进行。

再讲到研究时间，和初次试验。我开始研究，是廿八年下半年，那时天天画图研究各种设备。这些图案现在想起来，实在太幼稚，那时也都没有采用。廿九年春季，就在科学研究费里，拨了数千元，着手试验。直到廿九年底，才觉得照我理想制造水泥，已完全没有问题了！

我起初看书，是看近代水泥最新式的制造方法，觉得技术人员所告诉我的困难，是不容易解决的。后来我再从头看起，从水泥历史的演进着眼，得到一个见解，认为用大动力大机械的新式设备，是生产方法的进步，并不是制造的必要条件。因为需要大量生产，才要这种设备，假如不需要这种大量的生产，就无须乎这种设备了。我又在另一本书里，看到一点证据。据云：在第一次欧战时期，多有改用石灰窑来烧水泥，他的理由，是燃料困难、销路不大。平时的大量生产，为的是经济的倾销，战时的小量生产，为的是本身的需要。所以我就主张：（一）不求大量生产，（二）避免使用大动力及笨重之机械，（三）但求得次级之产品。

我在试验成功之后，就大胆筹备设厂制造，这时已经是三十年了。摆在眼前又有几个问题：（一）地点之选择。水泥厂的地址，必须“三位一体”。怎样叫做“三位一体”呢？就是石灰石，粘土和煤炭三件东西，要在厂址附近。如不能三件都有，至少要同时具备两件。如果这三件东西，都要从别处运来，那就太

不合算。结果，找到江山清湖镇这个地方，不仅石灰石、粘土、燃料三件都具备，并且还有许多其他的好处。这是本省制造水泥最有希望的一个地方。（二）耐火砖如何得到？我们制造水泥，要烧到一千四百度，才能成功。那末，筑窑的火砖，至少要耐烧一千六百度，才不会熔化。并且还须自己先来制造。因为市上没有这种火砖原料，在清湖镇附近，都可以找到。（三）人才如何罗致？起初还没有做水泥的专门人才，有些懂得做水泥的人，觉得这种方法，非失败不可，反而不肯来。我只找到一位刚由大学出来学化工的学生李振民。“初生之犊不怕虎”，他居然敢冒险担任这种工作。（四）机械如何制造？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机械，就是球磨机打风机两种。经我鼓励和督促后，浙江铁工厂，也已经能够制造了。（五）经费如何筹集，万一失败，如何处置？我先在某项经费内，挪借廿万元，我固然决心进行，但是也担心失败。筹备进行中，无时不提心吊胆。因为万一试验失败，不但名誉不好听，赔累也成问题。所以时常亲自去监督指导。从筹备到制造，刚刚一年，可以说是很快。那末，究竟用了多少钱呢？除借用廿万元外，又向某机关借用了二十万元，这四十万元，是从开始筹备到完成，所有机器用具置备等费用，全部包括在内。

上面已说过波特兰水泥制造之程序，及在现时环境之下，水泥制造研究所得的结论。那末，浙江水泥制造之程序，又是怎样呢？“浙江水泥”制造之程序，在理论上与波特兰水泥的制造程序，是差不多的。不过在设备上，减省了原料磨碎的机械设备，与锻烧时旋转炉的设备，所以第一步原料配合的手续，要将石灰石烧成石灰，将石灰加水消化，使成为氢氧化钙，干燥后，除去水份，筛过后，便成极细的熟石灰粉。再将研细的粘土及氧化铁，照规定的百分比加入混和，做成坯料，待其干燥。石灰的来源，要自己筑窑大量的烧成，收用民间的石灰，亦未始不可。第二步，烧成的手续，是将原料(即坯料)与燃料（煤炭或木炭）混杂，放入自己设计之竖窑内打风锻烧，大约烧至六小时，温度达

到一千四百度，即可烧成一窑，俟其冷却，即可卸出，再装入第二窑，继续锻烧。原料与燃料之比例，目前尚难得到最低之数字，大约燃料为原料的百分之四十强，如再进一步，或尚可望其减少。第三步熔块磨筛的手续，烧成之熔块，俟其冷却若干时候，将未能烧透之部份拣出，然后将其逐次加入石膏百分之二，装入球磨机内磨碎。再经过规定之筛机，所得之细粉，按定量包装后，水泥制造工作，即告完成。在目前因为机械困难，许多地方，要用人工，在经济上，自不合算。如能逐步机械化，当然不成问题。

我起初说过，我们制造的波特兰水泥，一定有许多人怀疑用这种设备制造出来的成品，是否比得上市上的水泥呢？关于这，我可以分为三点来说：第一、我们的制品，在原料的配合，与烧成的温度，及粉碎的程度，皆按照波特兰水泥的规格，成品是不会很差。第二、在成品试验上虽然无精密设备，但在拉力已至七百磅，不至断裂。抗力虽未试验，但拉力好，抗力一定不差。第三、成品在试用上亦已得使用者之好评。至于成本方面，当然要比大生产之价格为高，但一定比市价为低。

瓷质保温器的试验 此外我还有好些研究和试验，成功的当然也有几样，而失败的也不少。现在把一桩失败的事，叙述一下。现在所用的热水瓶，给我们很多的好处。我想：如果把它扩大起来，成为一种很大的热藏或冷藏器，则效用自然更大。比如我们一日的三餐饭，现在要分三次煮，人工燃料，都不经济。若果有很大热藏器，则三餐饭，可作一次煮。放在热藏器内，可以保持它的温度，即可以随时食用。同时亦可以作冷藏用，使藏在里面的物品，不致霉坏，岂不是很经济的事？但是玻璃的制品，就很难做到，于是我想用瓷质来制造这种大型的保温器。因为瓷质的导热与密度，都比玻璃差不多，而且可以大量的取用，价格亦不贵。我怀了这个理想，很久都不能实验，因为尚未有适合这种制造的场所与技术。有一次，到温州去参观吴百亨的西山瓷厂，觉得它的设备很新，技术亦不坏。特将我的理想向他说，并

画了一个图形，希望他替我试验。他对此亦认为很有价值，而感到兴趣。于是立刻制成坯型。经过几次的试验，才把它烧成。但是真空问题，无法解决。因为没有很好而适用的抽气机，就不能知道它保温的程度怎样。吴君也曾试用过烧空自动封闭法，在理想上，当那保温器正在窑内燃烧的时候，高热会把夹层内的空气排出，而成为比较的真空。到达某一温度时，放在出气孔旁边，易熔的物质就熔化了，把那出气孔封闭起来，里面就可成为比较的真空。烧成之后，他自己拿来试验。把开水冲下去，那瓶子马上破裂起来。他研究不出破裂的原因，写信来问我。后来我亲自试验结果，亦是如此。我认为夹层的空气，尚未排清，因受热而膨胀，所以把瓶身炸裂。于是拿一个完好的瓶，不冲开水，而把它打破，并没有发出同打破电灯泡那样的声音。这可以证明夹层里并不是真空。三十三年九月，温州再度失陷，这种试验工作就不能进行。以前试验未成的样品，却已有百数十件，可算是西山瓷器厂的额外损失。但我并不承认这就是失败，而希望不久得到最后的成功。

研究科学技术的几点见解　我对于研究科学技术，有我自己的几点见解：

第一、我不是一个科学有素养的人，我是想学习，并且拿研究学习，作为我的娱乐兴趣。在旁人看起来，或者以为费脑筋，伤身体，而我觉得即使如此，也是值得的。因为人类都是把精神脑力向他爱好和兴趣方面牺牲的呵！

第二、我对于科学技术，自认是外行。但是我并不怕旁人笑我外行而不加研究，并且希望由外行而成为内行。一个问题的研究，只要不断的研究，这外行就可变为专家。专家不是全能的，他所成就的，只有一部份。我不重视书本上的全能专家，而重视实行上的局部专家。

第三、我认为研究题材的估价，是极重要的事。因为这不是纯科学的研究，纯科学的研究，只是探讨某一种的真理，而无须

顾及本身价值的问题。科学技术的研究，是以利用厚生为目的。因此，就要估计它在人类、社会国家的价值如何，所以必须认识人类社会和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然后可以得到价值的题材，因此出题与研究创造发明，都同样的重要，甚或出题更为重要。有了重大价值的题目，以后的好文章，自然可用科学的技术写出来。

第四、西谚有云："失败为成功之母"，我认为应该添上一句："浪费——指研究试验的浪费——是经济之母"。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往往恐怕失败，失败就是浪费，不但个人不能负担这种浪费，就是团体与政府，如果看不透这个关键，也不肯负担这种浪费。但我以为在百件研究试验当中，能有一件成功，则九十九件失败，不算得是浪费。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人成功，九十九个人失败，也不算得失败。能有更大的失败，才有更大的成功，能有更多的浪费，才有更经济的收获！

第五、一件事物的创造发明，包括很多的专门学问，而不是个人可以完全了解与精到，必须若干人共同努力，方可完成。谚云："三个臭皮匠，凑成诸葛亮。"这句话很有道理。因为从事现代的科学研究，必须有研究的组织。拿我自己经验来说，我只能出题目，或是决定一些重要的原则及要求。如果这个题目里面有关数理的工作，要请教数理的人材，有关电气的工作，要请教电工的人才，有关机械的工作，要请教机械的人才，有关绘图的工作，要请教绘图的人才。类此种种有关的工作都非得请教他人不可。这些人材，与其说是我的助手，毋宁说是我的先生。不管助手也好，先生也好。总之，这些人都是不能缺少，否则，就难以成功！

第六、"神秘"二字，是阻碍中国科学昌明物质发达的绊脚石。什么"祖传""秘制"这一类的话，在中国社会是很流行的。往往一种研究的工作，因为秘不公开，使旁人不能参加意见，而至于失败。甚至自己永远在那不通的路上走，而不知回头。我以为这种传统的不良习俗，一定要加以改正。在国家，要

设置研究的指导顾问机关与人员，来补救与协助，然后才可以不致虚费时间脑力与金钱。此外实验设备的设置，研究费的补助。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如此才能使研究公开，而得有良好的结果。

第七、中国科学技术落后，无可讳言。迎头赶上，只是一种口号，而不是一种方法。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近，是行动的定律。我们固然要有赶上人家的勇气，但是要想赶上人家，总得在后面努力，才可达到目的。我们必须有基础的训练，才可以升高及远。所谓基础的训练，一方面是科学理论之修习，一方面是工作经验的养成。我们现在对科学的理论修养，固然非常幼稚，工作经验，也是万分浅薄。甚至有些人有了一些理论，而轻视经验，或是有了一些经验，而忽视理论，都是要不得的偏见。现在世界上虽然有许多人家造成的新机械工具，我们可以用金钱把它买来，但是理论与经验，是买不来的，必须自己去学习与历练。尤其是创造与发明，非是完全求诸自己不可的呵！我本着自己经验得到的一些意见，抒述于此，以就正比我更有经验的人士。

我对于词的见解和学填的动机 诗词在中国旧文学中，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唐宋两朝的诗词，好像已经登峰造极，以后的人都以它为圭臬，很少能别创一格的。唐宋的诗词有两个特色：第一、外景写得真；第二、内情抒得畅。令人读了，犹如身历其景而引起共鸣。又因各个诗人词人的心境环境，各有不同，于是蔚为各种不同的风格和情调。后来的人虽极力揣摩仿效，纵然在格调方面能练得纯熟，毕竟因时代不同，处境各异，总难产生同样韵味的作品。所以要拿唐宋或某一代诗词来衡量现代的诗词，未免有削足就履的困难。古人的遗墨，容易引起后人好奇的学习与崇拜，我想他们当初写作的时候，是不会存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意念，而是用来发抒个人当时的情感的。这些作品，因为有它自身的价值，遂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遵奉的圭臬。古人无意中留下来的诗词规格，使后人穷年累月去追求，而终不能

脱离他的窠臼，不知是古人无心的罪过，仰或是一种有益人类生活的东西，那就很难说了，因为它不是科学的真理，可以演绎为人类福利的源泉。但诗词在唐宋时代，到底有了什么益处，现在又有了什么益处，这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我对于词，虽然一时有所好，但我认为这是历史上留下来的文人无益的嗜好，在个人，或者可借以发抒情感，在国家则是无关隆替的东西。

然而这是我最近的想法，在往昔仍不免受古人无意的引诱。当我在保定读书的时候，天天受军事训练，极感枯燥。莲花池是保定的名胜区，那里有戏馆、酒菜馆，也有图书馆。在闲暇的星期日，都得到那里去逛逛，以调剂生活。在那个旧的图书馆里，所搜藏的，都是旧的书籍。其中有很多我是看不懂的，而且觉得没有趣味。有一次，我找到一部欧阳修的全集，里面有很多诗和词，我对于诗的体味，觉得太刻板了，不是五言，便是七言，不是古诗，就是绝律。而且太正面化了，不能滋润我枯燥的情绪。而对于他的长短句——词，却觉得细腻活泼。当时我最爱的是他那首《浪淘沙》："五岭麦秋残，荔子初丹，绛纱囊里水精丸。可惜天教生处远，不近长安。　　往事忆开元，妃子偏怜，一从魂散马嵬关。只有红尘迷驿路，满眼骊山。"

他能以一点小东西，烘托出一个国破家亡，人亡物在的凄凉景况，真是文学上的杰作。因为我是岭南人，读了之后，感受尤为深切，而使我对他的词发生了兴趣。固然他的词是以柔和细腻见称的，在全部宋词中不能说是翘楚，亦能自成一格，使初读的人感觉满意。当时我并没有学习填词的意思，而是借此来润润口舌。后来阅读的范围虽扩大了一些，仍不外是以前的作用，从未执笔试填过一首。也因为离开学校之后，经常过着紧张的军事生活的缘故。廿二年秋，奉命巡视内蒙，接触那种广漠寂寞的塞外风光，目睹方燃未尽的北国烽烟，即使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会发生无限的感慨！我曾读辛幼安寄陈同甫的《破阵子》一词云："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

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似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生后名，可怜白发生！”这种悲壮的词句，在那种情景中吟诵起来，是分外的逼真动人，容易挑起旅人的愁思，而想借此一洗自己胸中的积郁。于是执笔学填一首《满江红》，固然不工，亦求一时的快意而已。词云：

汉代雄图，堪慨叹，华疆日蹙。试披阅舆图依旧，惨变颜色。长白山前箕子地，而今遍树仇雠帜，洒沙场，热血似春潮，荒郊碧。　　怀壮志，愁无益；迈前驱，何顾惜。说甚穷荒能把英豪隔，白骨敷成千里辙，长车直驾无停息。看旗扬，绝塞卷阴霾，青天白。

这是我填词的处女作。从此每当有兴致的时候，也随便填作。这种粗犷的词句，只是聊以发抒自己的情感，和作为一二友好的谈助，实不能登大雅之堂。李立民兄说我以往所填的词，有些“怒发冲冠”的样子，近年以来，火气渐脱。他的意思，怒发冲冠是要不得的，炉火纯青，温柔细腻，规格严谨，才是词人之词。岳武穆的《满江红》，并不是词选中的第一流作品。苏东坡的《铜琵铁板》，也嫌过于粗放。我对于这种论调，颇不以为然。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其心境，而心境是随年龄环境而变迁的。在某一种心境之下所填的词，不是其他的人所能模仿，也不是他自己后来所能再写的。所以论词只能就作者当时的心境着眼，而不能就论者的主观来评定的。因为这是作者真情的吐露，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不易知道的呀！就我个人来说吧，十几年前的词，现在我已填不出来了，这不是我觉得那时的词填不好而不肯再填，而是我的心境已随时代而改变了，实在填不出从前所填的词句来。反过来说，假使我现在还是一个三十多岁好勇斗狠的人，来评定我自己前后所作的词，我想一定是认为以前的豪放合口味，以后的就未免觉得颓唐无味了。因为立民兄已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是以现在的心境，看我以前的词呀！质之立民兄，未知以为然否？

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好象诗词之类，都是用来发抒自己的怀抱的，同时又是娱情作乐的方法。而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尽到这些作用。我们填词，往往为了一字一句的推敲，费了多少功夫与心血，而所得到的字句，未必即是由衷之言。甚至有的是违心之论，或是雕琢之作。我常觉得通常写一二千字的散文，费二三小时，就可完篇，而填一首词，有时用了二三日的工夫，还得不到好句，何苦耗费这种时间与心力呢？这真是生活上的矛盾现象！自从我们几个人好以填词作消遣之后，引起许多人对于词的爱好，而亦步趋的来学习。我们自己已中了前人的遗毒，而不愿再遗留给别人，可是却在不知不觉中流传开去了。我在这本《五十回忆》中，有若干处均附上一二首词，我的本意是想用抽象的方法，来表示我的心境和环境，并不认为这是我的文艺创作。

在云和与各词友的唱和 我对于诗词的和韵，曾以"屈打成招"和"借尸还魂"这两句话来形容其意义。好好的一首词意，因为要硬凑成几个韵脚而把词意变更了。好象一个犯人被压迫在三木之下，逼他照审判官的意思来招供。这些屈打所成的供词，并不是自己的意思呀！借尸还魂，是借人家的躯壳来接续自己的生命。和韵便是要借人家已成诗词的韵脚，一字不易的来重做。中国的字义，好多是相同或相通的，也可以说有好多字的意义是大同小异的。和韵的诗词，就用这些大同小异的文字，套上人家已成诗词的形式，也就是备着人家的原韵原意，稍为改变一下，就算是自己的作品。真正能超脱原作者的意思的，是难乎其难。所以和韵愈多，则格调愈下，就如借尸还魂一样，虽然仍是一个人，而躯壳却是人家的。我对于和韵，虽持如此的见解，但也不能避免这个陈套。卅二年六月间与孙养癯、江眉仲两兄在小顺别墅盘桓了两天，彼此唱和颇多。因天不作美，连日多雨，夜间无月，大煞风景。临别时，我填了《临江仙》一阕，以志其事。词云：

乱世不迷山里路，溪 声 日 夜潺潺。可怜水浅更多滩，桃花浮不住，留客雨风残。　　翘首吟怀无皓月，云烟堆满千山，这回应觉兴阑珊。再期文酒会，秋思句生寒。

养耀和词云：

来似白云杳杳，去如流水潺潺。千重烟树万重滩，檐花如有恨，偏照鬓丝残。　　寄兴只应好鸟，排愁不碍青山，莫因无月意阑珊。初更窗外雨，词味比清寒。

眉仲和词云：

莫道当头难见月，溪声雨后潺潺。忽听幽咽水流滩，多情翻别调，肯惜烛花残。　　岁月万楼留小住，云烟爱此屏山，美人环珮去珊珊，暮将修竹倚，翠袖怯生寒。

卅三年冬，云和大雪兼旬，冰冻不解。与余越园、李立民、胡颖之、薛好楼、邓冶欧、徐渊若诸子又有和韵之作。那些被屈打出来的招供，大家不但不以为苦，好象久上刑庭的老犯，不要屈打而顺利的供出来。有的更和作至六七韵之多。兹选辑几阕如下，以博读者一粲：

烛影摇红

新年大雪　　　　　　　　　　　　绍　竑

残腊山城，雪严镇日封檐雀。谁将苦酒当屠苏，长夜消寒酌，隔岁浑如隔昨。道新年，儿童最乐。彩衫人俊，爆竹红残，街头踱踱。　　八载韶光，峰尘半壁沦飘泊。湖山一片尽敷棉，冷远征衣薄，递报鱼更三跃。独闺人，难眠泪落。梅芳有讯，鸿雁捎书，别时曾约。

前调

和季公韵，兼谢棠梨馆主人招宴　　　余绍宋

不道新年，门庭阒寂堪罗雀。雪深三尺断行人，有酒和谁酌？矫首西南非昨。细思量，已殊苦乐。窜身穷谷，茧足荒山，冲寒徒踱。　　莫漫多愁，天涯何处容安泊。已能高卧复何求。奚事嗔衾薄，蓦地开缄欢跃。又生憎，缤纷洒落。青樽红烛，孤负居停，难酬佳约。

前调

和季公韵　　　李立民

十里黄云，惊寒阵阵归林雀。八荒同色了无尘，映雪迎年酌，那得情怀似昨，喜今朝，侍声共乐。春风词笔，吟到空山，翛然闲踱。　　剪水裁冰，尊前不用多评泊。（成句）几家爆竹响穷檐，争奈欢衷薄，好访山阴蓦跃。数枝斜，小园篱落。素妆初褪，花信渐催，旧游重约。

前调

奉和季公韵　　　邓治欧

顷刻花开，漫天误认投林雀。熏笼绣幌翠屏遮，细把银瓶酌，是际心情异昨。算年来，都无此乐。香泥软美，路暗前村，履艰还踱。　　身世如舟，偶然遇胜时停泊。依稀寻向灞桥东，冻忘衣裳薄，度引词情闪跃。便归吟，胸怀洒落。明朝来否，更待明朝，向东风约。

前调

敬和季公韵 胡颖之

寒透帘垂，檐前飞噪寻巢雀。煎茶煮酒爇泥炉，却自劳斟酌，玉戏依然似昨。感天意，人心共乐。故教傲冷，有脚阳春，欲行还踱。　溪涧流澌，归舟暂向汀洲泊。骑驴待去探梅开，未觉毡裘薄，蓦想云阴龙跃。战争罢，败鳞纷落。擘笺呵冻，好待结盟，重联游约。

前调

敬和季公韵 薛元燕

群玉岩峣，依稀更见西飞雀。销金作帐未销寒，扶醉还重酌，漫道心情胜昨。趁风絮，霎时恣乐。江山无限，此意谁知，循榈频踱。　歌管迎年，沧洲何事愁羁泊。一瓯清冽出陶家，不比春醪薄，早晚昆仑骑跃。好安排，珠灯错落。断桥孤屿，霁雪繁花，犹堪酬约。

风入松

绍　竑

冒雪过立民兄寓所，见越园先生画松巨轴，率题索和。

一枝苍劲倚天参，拔地挺岩巉。千秋溪壑仍如旧，群芳尽，底事凋残，风雨漫来西北，涛声荡动东南。

昨宵云阵拥高寒，飞雪掩重山。枝头白了犹凝翠，难低首，满压冰丸。孤傲又谁伴我，几人另眼相看？

前调

李立民

盘空夭矫碧天参，独立俯重峣。风雷挟笔纵横意，留余日，雪满云残。壁上龙蛇飞动，槎枒东北西南。　托根高处不胜寒，曲曲拥屏山。疑闻清籁凭挥尘，新词叠，如走珠丸。消受一年腊尽，好拼浊酒同看。

前调

胡颖之

酒酣还自画禅参，老干耸嵌峣。墨痕滴翠余枝叶，同消受，雪虐风残。移向寒柯堂畔，栽来水碓村南。记曾逾岭共消寒，万树拥湖山。老鳞待化龙飞去，空筛影，冷月如丸。逸韵且将琴听，秾姿漫把花看。

前调

薛元燕

风高欲抱素琴参，一曲动苍峣。绝尘标格成孤往，任岩阿，日冷雪残。百劫宁惊岁晚，万株漫忆湖南（西湖万松岭有季公旧邸）。　似闻尧鹤讶巢寒，霏雪正弥山。楂枒张盖为谁伫，待相伴，凝绿梅丸。解识擎天笔意，几回负手重看。

前调

邓治欧

龙蛇飞动势相参，千尺耸危巉。玉簪翠盖幢幢立，探忘却，岁暮冬残。且共持觞醉盏，恰当霏雪东南。

满堂动色气犹寒，烟雾起江山。长风压铁精灵聚，定来岁，松子如丸。旁有梅花为伴，霜禽欲下偷看。

满江红

云龙旅中杂感　　绍　竑

日暖云和，沿江湖，龙渊剑迹。回头望，路盘穷峪，渡横赤石。流水顿添春意满，飞香已见梅花翼。照斜阳，残雪万峰尖，参天白。　团圆月，悬霄碧。华灯影，重重色。算人天此夜，乐奢愁啬。歌舞声中还带酒，阵时欢笑殊今昔。蓦惊心，大陆走龙蛇，狮鼾息。

前调

李立民

老去心情，回首处，相如倦迹。但托兴，夷由今古，膏肓泉石。野哭千家闻战伐，仳离忍见分飞翼。惜年光，细雨湿梨花，惊头白。　把酒盏，沾痕碧。染衣袂，征尘色。尽春光烂漫，疏狂犹啬。姹紫嫣红依旧是，韶华人事都非昔。等闲来，随意学寻芳，迟消息。

前调

薛元燕

上苑春风，多少梦，欲寻无迹。山郭外，清晖寒翠，泉声咽石。不断花枝纷照眼，相逢燕侣皆连翼。趁裙腰，一道入云深，千岩白。　南浦水，悠悠碧。芳草地，萋萋色。尽长吟低唱，慢愁才啬。鸡塞乡心知几处，龙渊剑气应犹昔。料衣冠，此会安定危，烟尘息。

前调

邓治欧

猎骑春骄，扬鞭处，都成奇迹。人道是，歌摇山岳，声摧金石。烟起似添貔虎灶，云开待展鲲鹏翼。漫回头，落日看郊原，荒荒白。　阳阳水，粼粼碧。离离草，油油色。岂天能解语，春丰秋啬。宇宙几番风更雨，河山两戒今犹昔。便明朝，牙帐捷书回，肩难息。

前调

徐渊若

五彩龙文，摩挲处，已成陈迹。空见说，生公妙法，点头顽石。玉树犹歌商女曲，云天待展春风翼。倚黄昏，吹笛琐窗前，梅花白。　春衫薄，离痕碧。团圆月，凄凉色。问画堂谁念，岁时丰啬。火树银花灯似昼，玉簪琼佩人犹昔。漫呻吟，按盏问何时，烽烟息。

减字木兰花

绍　竑

越园先生为立民先生作棠梨馆图，咏此志庆。

梅桃已谢，万树梨云笼昼夜。夕照明霞，静待风摇数落花。　莫嫌花落，嫩绿娇黄春不薄。月又东墙，凉动繁阴味细香。

前调

和季公韵　　李立民

俊惭诸谢，肯让芳园春宴夜。绮烂余霞，纷白披红共坐花。　秋千院落，料峭风来寒薄薄。月影过墙，冷艳输梅细细香。

廿七　五十的一年

才过四九寿辰又临不幸年头　三十二年秋天，我在云和度四十九岁生辰，省府秘书处同仁填了一首《庄椿岁》词为我祝贺。词云：

龙飞凤舞名区，振衣直上风烟表。出郊小队，八州士女，相迎夹道。指点安危，一枰错落，几番谈笑。料驻车坐爱，青山红树，凭打叠，吟秋藁。　　江国驰声偏早，识旌旗，旧林猿鸟。长安日近，武昌鱼美，频烦梦绕。重下钱塘，甲兵十万，待舒胸抱。喜吴霜鬓浅，隔篱唤酒，与花同好。

我和他们一首，就借用“八千里路云和月”这个典故为起句。词云：

八千里路云和，月圆今夕光天表。狮醒未睡，鱼苍隐约，宾来远道。两浙机枢，一时际会，相逢欢笑！想鄂王豪气，功名尘土，都当作，狂吟藁。　五十人生犹早，正中天，奋飞鹏鸟。渡江万楫，投鞭填海，扶桑遍绕。整顿湖山，那时愿了，共舒怀抱。作长虹痛饮，鉴湖美酒，寿吾同好。

时光一天一天的过去，转瞬又是民国三十三年！这一年，在整个的国家，临到了抗战八年中最严重的阶段；而我个人呢，也是逢到了最不幸的一个关头。我的大儿德芳，在这年的春天，患病曲江，我夫妻二人，都在浙江，一个十七岁的学生，病倒他

乡，是多么痛苦的事！虽然那里也有很多亲友，很热心的照料他，但是我们心理，总时时刻刻的远念着。我的妻子，实在放心不下，便从云和赶到曲江。但从她到了那边，很久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好的消息报导给我，使我更加焦急！到了三月间，我奉召赴南岳开会，便绕道到曲江去看他，病况虽然没有什么大变化，但是也不见得有什么起色。我回来的时候，他伸出骨瘦如柴的手，与我握别，却没有一句言语，只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我，也许他也知道这是最后的一别了！同时我呢，也这样想着。这个死别般的生离，是如何的悲痛啊！我回到浙江，时常有电话给我妻子，问她："为什么不时常有电报或电话给我？"她的回答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呀！"无论什么事情，到了无言可说的时候，总不会有好现象，这是无可疑义的。五月间，我又奉召到重庆开会，道经曲江，汽车一直驰进医院里去，见到我的妻子，开口就问她：情形怎样了？她说："今日清醒一些，他时常念着你快要到来了。"我同次儿行方去看他，神气果然很清醒，除了问候我之外，还同他的弟弟说了两句笑话。我们见到这种情形，也相当的安慰！便上街去走走。在一个朋友家里，忽然接到医院的电话，说是病情突变得厉害！急忙赶回去，见他的神情惨变得可怕极了。我也知道先前的清醒，就是俗间所谓"回光反照"，实在是一种危险的景象，果然，他从此就昏迷下去，而终于不救了！父母爱子之心，是无所不至的。何况这孩子确是算一个好孩子，不但平时孝友勤奋，没有一些纨袴的习气，并且在学校里自己很节俭，而把节省下来的钱，帮助朋友，尤其周济沦陷区的小朋友。他死了以后，那些朋友，还有信来请他救济。在病中，据看护的人说："死前半个月，就昏迷乱语，但是他的母亲一进他的卧室，就停止了，好象立刻清醒的样子。"他从小就没有逆过他母亲的意思，到病危的时候，还是不欲使他母亲时常受过度的痛苦而溘然死去，真是一个值得宝爱的孩子啊！我最后看他一次，医生告诉我："只是数小时的问题了！"我忍痛的离开病房，含泪写

下一首挽联，预备刻在他的墓碑上：

忠孝志难成，日落河西流永恨！死生犹在眼，春残粤北恸殇儿！

他死在曲江的河西医院，其时正是春末也。以后我总想为他写一两首挽词，但是一执笔起来，情绪悲乱，无法遏止，延了好久，才填了一首《鹧鸪天》，词虽不佳，意极沉痛，从此我就把他渐渐淡忘下去。那首词也就是想作痛极而忘的意思。

我在重庆，开完了十二中全会，继续又参加第一次全国行政会议。那时湘北的战事已发动了，就情报判断，知道敌人的企图，不仅在长沙，而是要打通粤汉、湘桂两条铁路线。情况一日紧张一日，开会的情绪，也一日淡一日。东南的军政首长，不等会议终了，就离渝东回。我到了桂林，对于我住在桂林的家小，应该准备迁到什么地方，当时煞费踌躇。我既判断敌人企图先打通湘桂线，再打粤汉线，同时判断敌人以后对于粤汉路东（浙、赣、闽）要实行扫荡，并且可能的还再打通浙赣线，完成他在南中国对盟军登陆的作战交通体系。这样，浙江的处境，比三十一年五月间的大流窜，还要困难。我个人责任在身，无论如何，不能离开省境。但是一家老幼，在那种局势之下，总不能不预先想一个安顿的办法。我想了再想，仍旧以不要家小东来为合宜。同时我也作万一的希冀：敌人终将成为“银样蜡枪头”，深刺不到桂林，而会自己退回去的。所以我决定仍教他们留在桂林，看看情形再说。我临行告诉他们说：“万一敌人占领衡阳，就得赶紧准备撤退。”并指示他们两条路：一是回到容县的乡下，那是偏僻所在，不是军事政治的目标，从来就未受过军事的影响。抗战后也没有敌机轰炸过，比较是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这次出乎意料之外，广州湾的敌人会由化州高州、经容县而平南，使这个我认为洞天福地的地方，也受到蹂躏。）第二条路是走黔桂路，先在广西的边地上看看，而贵阳、而重庆、一步一步的退去。结果他们是走的第二条路。你想一家二十口，单凭一个女人作主，

虽然自己也还有一些交通工具，但在数十万军民涌退之下，情形是何等的困难！她到了桂黔边境之后，就没有消息了，这时，我因为身体不好，到南平去养病。自己的身体是那样不好，而家属又是在颠沛流离中，心里的焦急难受，真非言语所能形容！在无聊烦闷之中，填了几首词，其中一首《菩萨蛮》云：

客身远去心仍住，焦思每共秋云聚。烽火阻衡阳，鹧鸪啼断肠！　　山中桐叶落，月在疏林角。山外剑津声，铮铮鸣不平。

我在南平病稍痊可，仍回云和，不久又因事到铅山去。这时已是十一月了。在那里才得我家小的消息，知道他们尚滞留在贵阳，心中为之稍慰！由铅山转赴衢州、龙游去视察，一则我已有一年多未到那里，同时我的五十生辰快到。一般人对于五十寿辰是很重视的。不但自己，还有一般朋友亲戚也一定要替你热闹热闹。事先，我已听到有许多僚友，希望在我生日这一天，大家欢聚一番，也算是替我庆祝的意思。这等深厚情意，我是很感动的，但是我那时的环境，和个人的心境，实在太坏了。西南方面，正是烽烟遍地的时候，敌骑已迫近贵州独山，甚至重庆方面，也相当震动。而我自己呢，在这一年之内，真有些象家散人亡的光景！（抗战以来，我所私幸的是有限的一点薄产，尚未遭到损失。但这次却吃了一个大亏。我一向不知从事家人生产，尤其抱有一种"无房主义"。觉得住人家的房子，反比住自己的房子，更自由些。在内地，如南宁、上海、南京、杭州、武昌，虽然住得很久，总未购置一点房屋。过去只有在香港买了几间小屋，供闲散时歇足之地。后来因时常经过桂林，每次扰累朋友，心里很觉不安。又因桂林是一般人所认为后方安全区域，那时正在日渐繁荣中。经许多朋友的劝说，一时转了个"欲把桂林作桃源"的念头。便于三十一年的春天，在那里也买了一所住宅。因为有了这所房子，所以三十一年受浙敌的压迫，便把家小送回桂林。更想不到这次疯狂的敌人，竟会施出困兽之智，侵陷桂林。

我这一所小小的房子，连带一部分家私，都断送在里面。我买这所房子，代价是八万块钱，虽然这个数目，在战前才抵得三四千元，在那时却终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且这三年来，桂林的房价又涨了不少，加以附带着家私的损失，总使我有些未能免俗的耿耿于心！固然，偌大的桂林，损失千万数千万的，不晓得有多少，我这一点损失，又算得什么？可是我为什么不坚持我的“无房主义”，而冤遭这种损失呢？这也算的是宗旨不定自取其咎吧！）那里还有心情做这等强为欢笑的事情？于是想到中国社会有一个避寿的办法，在我这环境心境两不痛快的时候，这个办法，倒颇可采用。这样一想，便定了个出巡避寿的主意，而出巡的目的地，则在衢江一带。因为衢州正在召开五区行政会议，亲往参加，倒是一举数得的办法。在生日的前几天，乘汽车到了江山，才乘民船到衢州。在船上填了好几首词，都是以江山为背景的。因为江山船娘，是以前文人名士口吟的资料，现时虽然是船破人空，但也不妨借它来作为吟咏的想象资料，而与大自然的环境配合起来。其中有《临江仙》一阕云：

烟雨迷濛江渚隐，剪波双桨横斜。船移如入万重纱，一层看未了，又把逻层遮。竟日行行终不尽，离离乱草平沙。江山几姓此浮家。八旗名士笔，错写美人麻。

这词末段的意思，是因为以前满洲名士祝宝廷，曾有过“宗室八旗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之句，我想把他翻翻案，亦是一时无聊之作。

到了衢州，参加了那第五区的行政会议。住了数日，又乘船到龙游去视察，旋复回来。那日正是十月小阳春的天气，风和日丽，温暖异常，把大地的春意都挠起来了，但隔日又恢复那严冬的景象。我在船上，就把小阳春作为起句，填了一首《多丽》。词云：

小阳春，一番春意宜人。莽东流，烟迷红树，连天云水相亲。下钱塘，几疑路阻；西湖好，待扫胡尘！异

地情怀，临流极目，七年期待而今。想堤上柳残人静，叶落度黄昏。只剩得照空孤月，深夜钟闻。　挂归帆暂停征棹，更须逆溯关津。鹭鸥飞声喧舟子，残阳隐寂寞渔村。默念行舟，往来顺逆，个中劳逸平分。看隔日乾坤幻变，冷暖亦前因。闲情绪尽堪收拾，聊付词存。

我回到衢县，次日正是我的生辰，姜专员心白（卿云），要留我在那里住，并且为我祝寿，我拒绝了。我说："我要在旅途中度过这一日。"次日清晨三四点钟，就乘船到江山去。那天早上，我们的船，在风雨交加中解缆了，洪涛滚滚北流，朔风萧萧南吹，正象征人们在五十关头挣扎的情形，中间有顺利的地方，也有逆转的地方。谁能努力挣扎，谁就得到最后的胜利。起初，舟子们有些畏缩，恐柔软的顺风，敌不过汹涌的逆流，我鼓励他们努力前进，人定可以胜天，洪流及时的退缩了，朔风却不断的吹来，在这种情景之下，词思蓦地起来，我当时即填了一阕《破阵子》出示姜专员。用写实的笔调，来形容我的内心，他也为之叹赏。词云：

五十年来身世，鸡鸣风雨江山。回首处，半程虽过，念来兹，时事方艰。凌寒鬓就斑。　击楫中流破，扬帆逆上千滩。愿与洪流争进退，聊把芜词祝寿筵。篙声破晓颜。

船终于黄昏时候，顺利的到了江山，程县长运啓招待我们进晚餐，旁的都没有什么，就是饭堂内点了两枝红色的大蜡烛，桌子上面，还备了两盘染了红色的包子，我想这就是他们为我祝寿的仪式了。我既不言做寿，他们亦不敢替我祝寿，那对红蜡烛，一直点到天明。而我的五十寿辰，就是这样悄悄的度过去。次日，继续冒着风雨，回到龙泉。

我在这五十年当中，幼小的时候，受到父亲伟大的爱护与启示，十三岁，我离开了家庭，以后的三十六个年头中，我在家乡，居留的时间，统共算起来，不到六个月。我追随着中华民国三十四年的变乱的历史，载沉载浮的在那波涛里挣扎，中间不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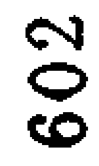
牺牲了多少不幸者的性命！而我呢？一滴血也未流过，而今依然健在。想起来，实在是幸运得很！在我过去五十年的历史，自我的批评，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但是历史总是教训人的，它不但不断的教训我自己，而且是每个人都要受到他自己的历史的教训。我受了自己历史的教训，应该如何的改进自己，以求在今后的未尽余年中，再写下光明灿烂的新页。所以我要写这篇《五十回忆》的主意，是要以自己的历史，来教训自己的将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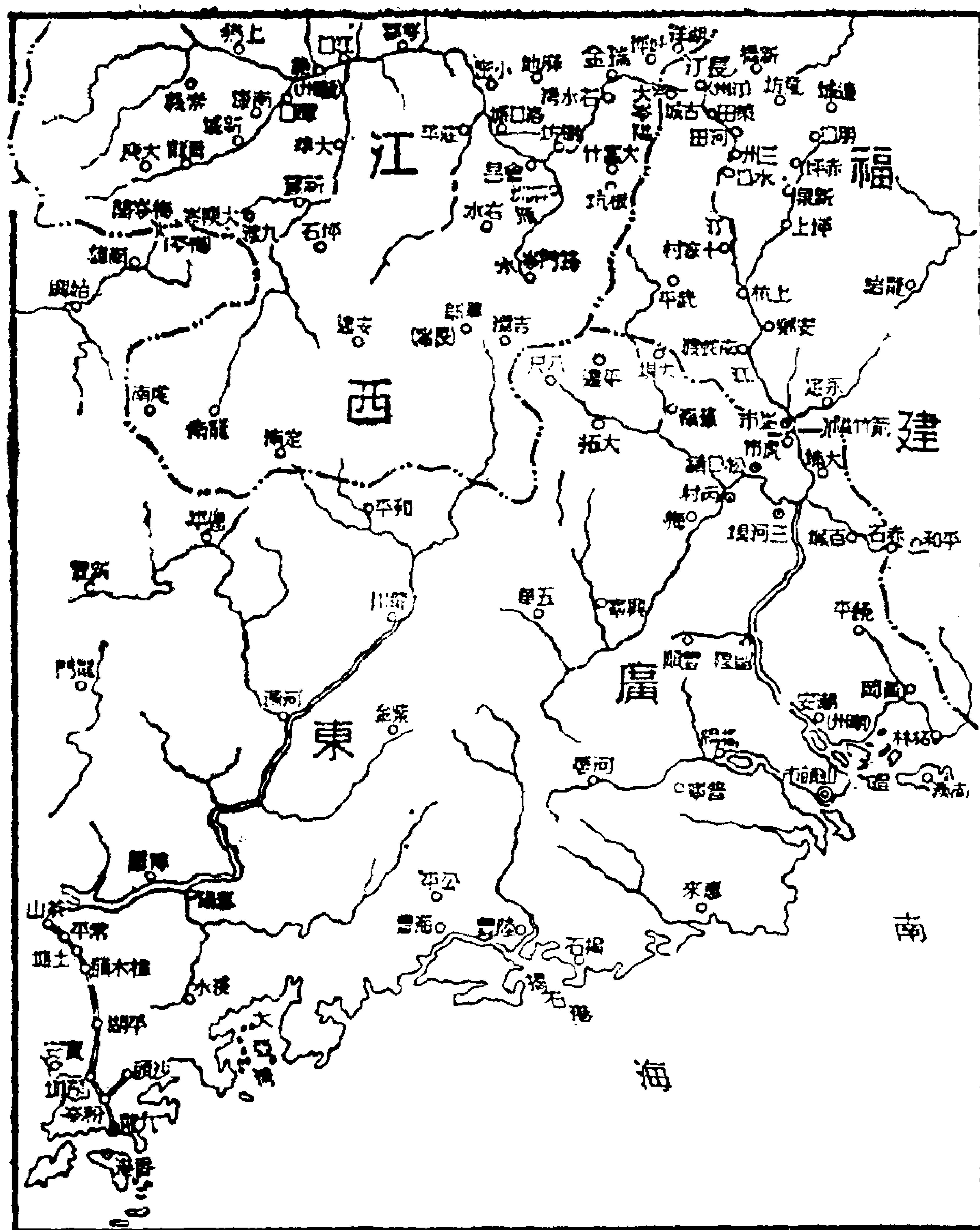
我的人生观和宇宙观 好多人都以为到了这个年纪，大可以养尊处优，居移气养移体的过下半世的享受生活。或者以为剩余的日子无多，大可不必爱惜而任它消磨过去。我见到好些以前的人物，都是如此下场，而我的意见却正与此相反。我检讨自己的以往，侥幸尝试的场合实在太多了，整个三十四年的民国历史，可说就是象我这一班人在侥幸尝试中演出来的。国家民族所冒的危险，和所受损失是太大了！若这班侥幸过尝试过了的人，就此转变到消极的方面而丢下不干，岂不是再要来一班人，重新经过同样侥幸和尝试，甚或永远的侥幸尝试下去么？国家民族能不能经得起再度三次的侥幸尝试，国际环境，能不能容许我们再次三次的侥幸尝试，就成很大的问题了。我自己觉得每经过一次侥幸和一番尝试，无疑是进步了许多。到了现在，才是将要成熟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自己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固属可惜，国家放弃了一个将磨炼成熟的人，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所以我以后还得努力去追求自己更大的进步，除非我的身体本质是不能进步了。我很恐慌，我到了老年会盘旋而不进步，或是走到一条很糊涂退化的道路上去。我希望到生命最后的一日，头脑仍旧是清醒的，行动仍旧是轻松的，而不愿糊糊涂涂的生存和死去，我对于社会上的人，也都是如此希望。我认为科学是人类正确的认识，要想不走错误，一定要在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上加以认识。我的科学根底固然很差，但在科学的概念上，是不至于摸不到门路。在我这本《五十回忆》当中，由我的本身体验而发

为我的感想，我认为“物质”是宇宙间一切现象的表现，没有物质，就是没有宇宙和各种现象。但是中间的关系非常复杂，非从科学的探讨，不能明了宇宙的真象，与物和物间的关系。无数的物质与其发出无数量的能，就是形成宇宙种种现象的因素。人类是宇宙万物的一种，因人类知识技术的发展，对于宇宙的一切，已相当的了解。人类与宇宙万物，只有类属的分别，并没有超物类的区别。人类要将自己当作普通的物看待，用一般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然后才能得到人的真理。同时，明了人与物的关系——即物与物的关系，然后可以运用物质创造物质，而增加人类的知识技能，和生活的幸福。这就是我个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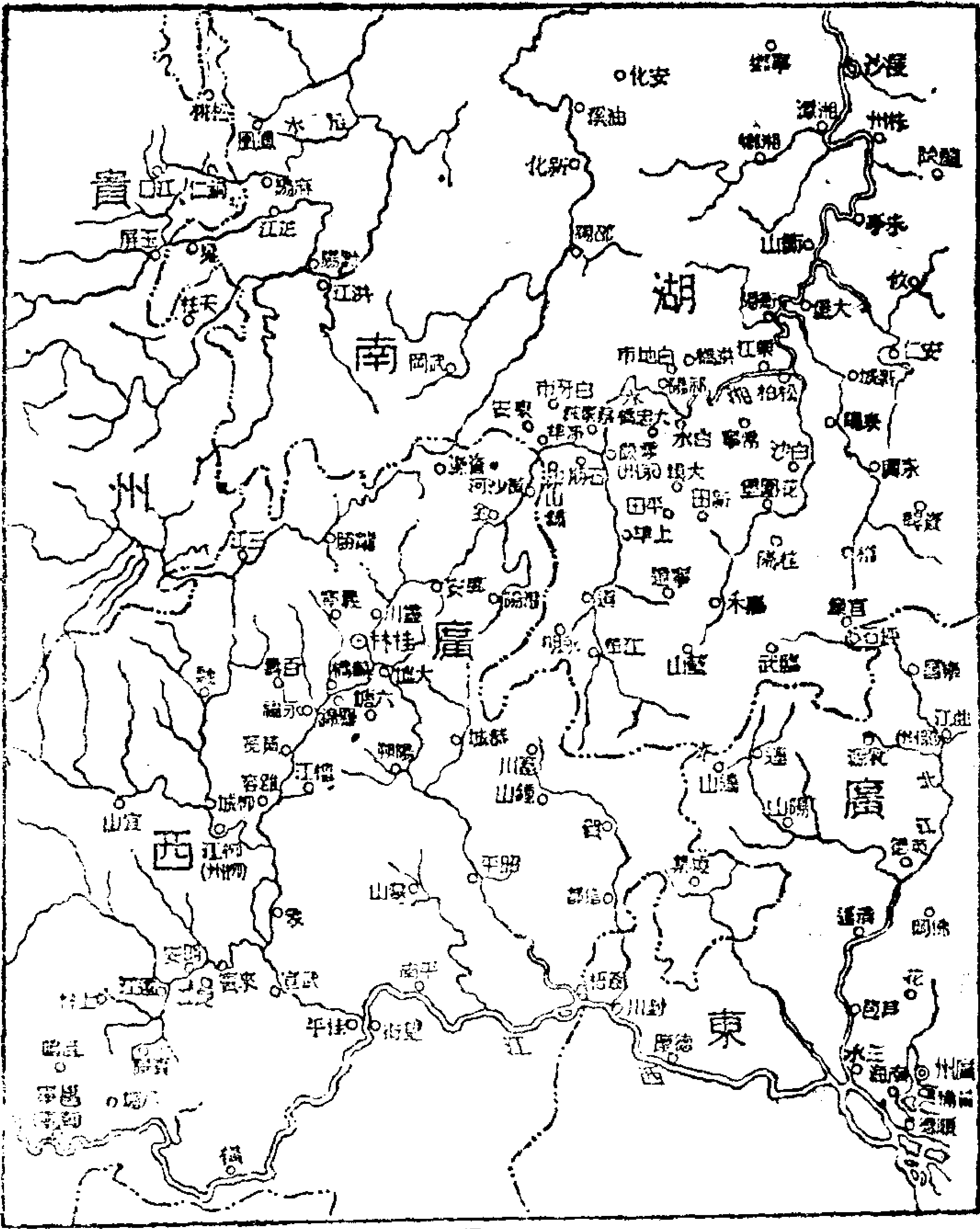
附地图七幅

图一　　统一广西各战役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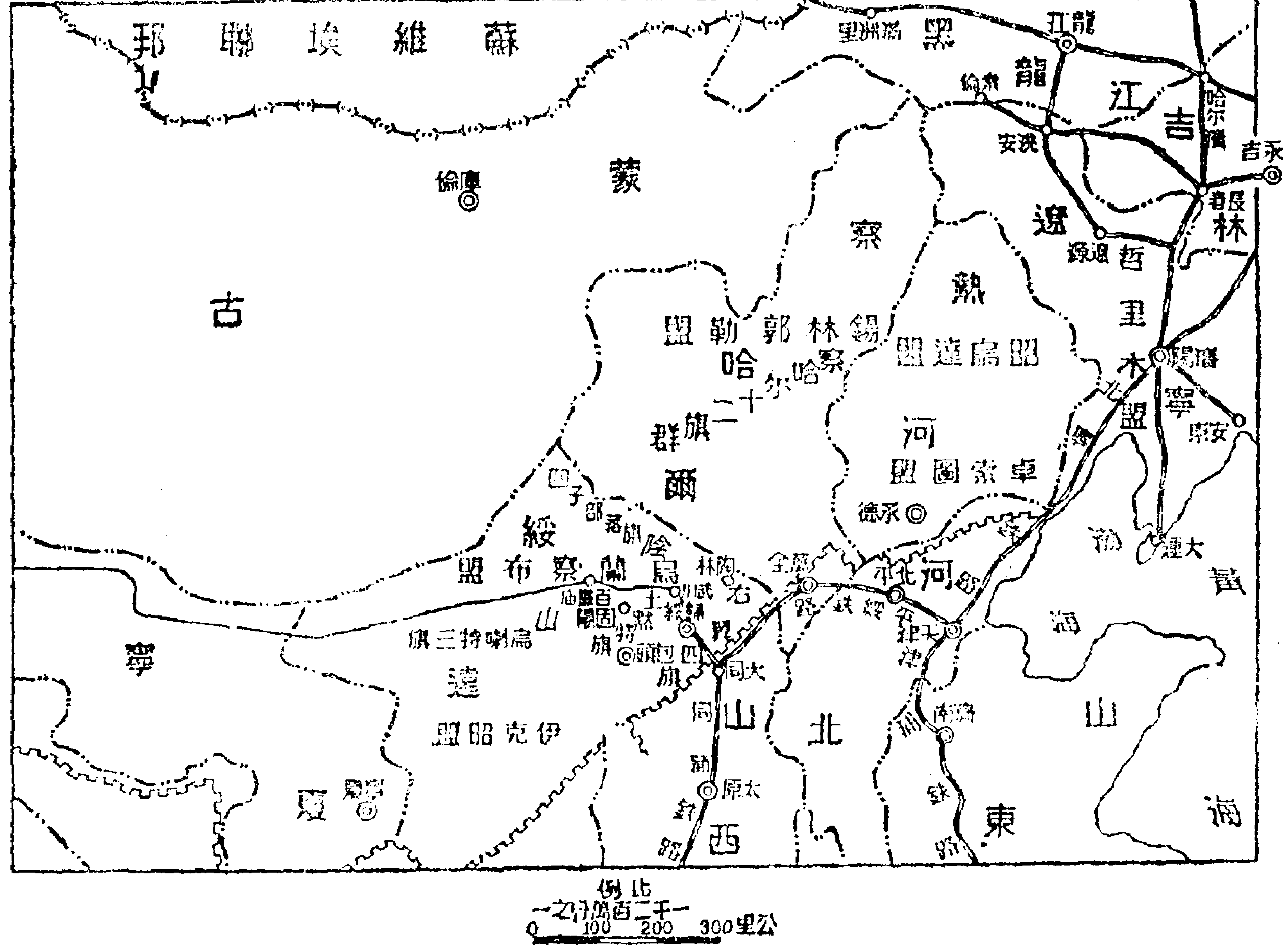


图二 新粤桂战争附图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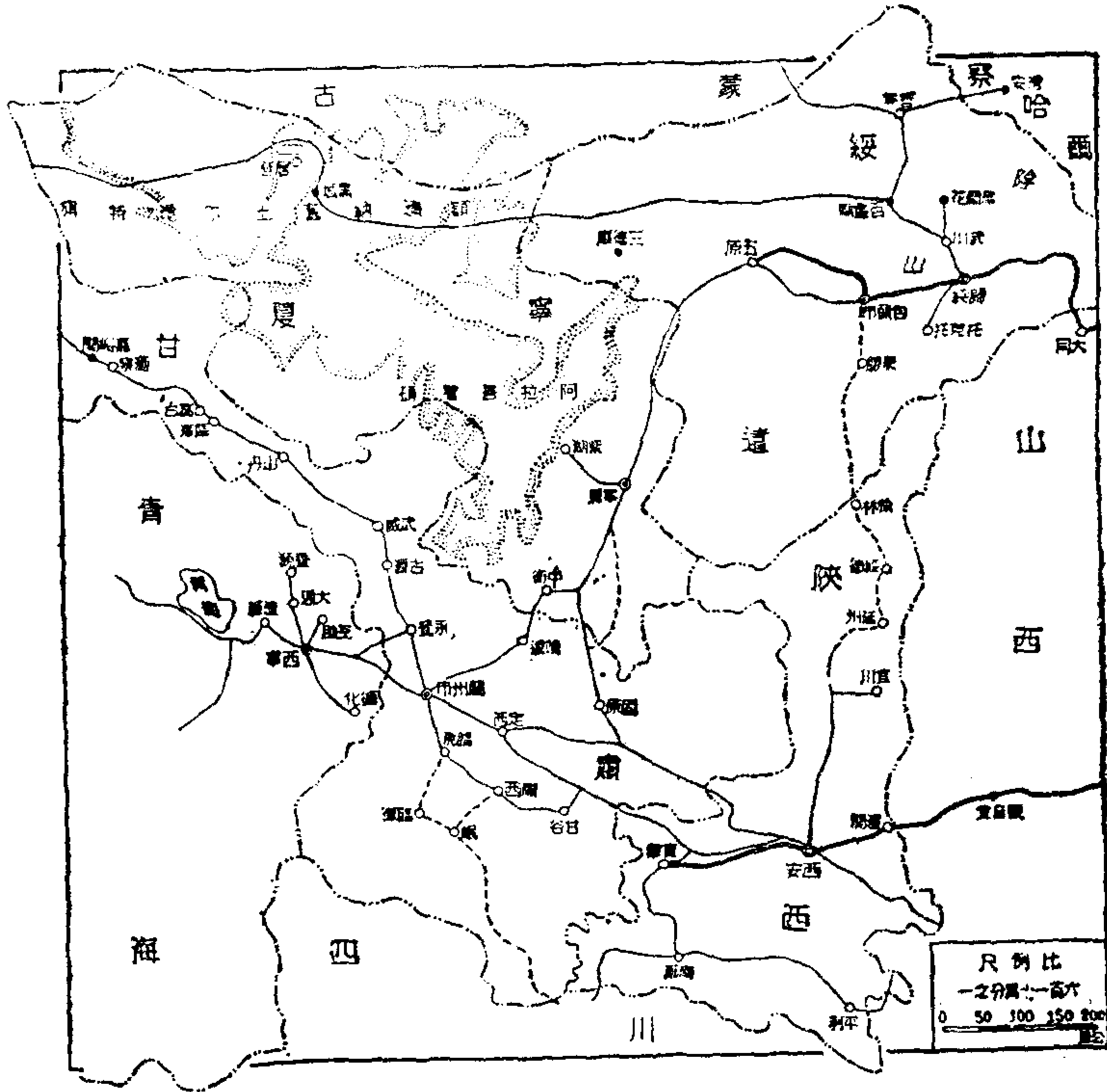
图三　新粤桂战争附图之二

图四　内蒙各盟族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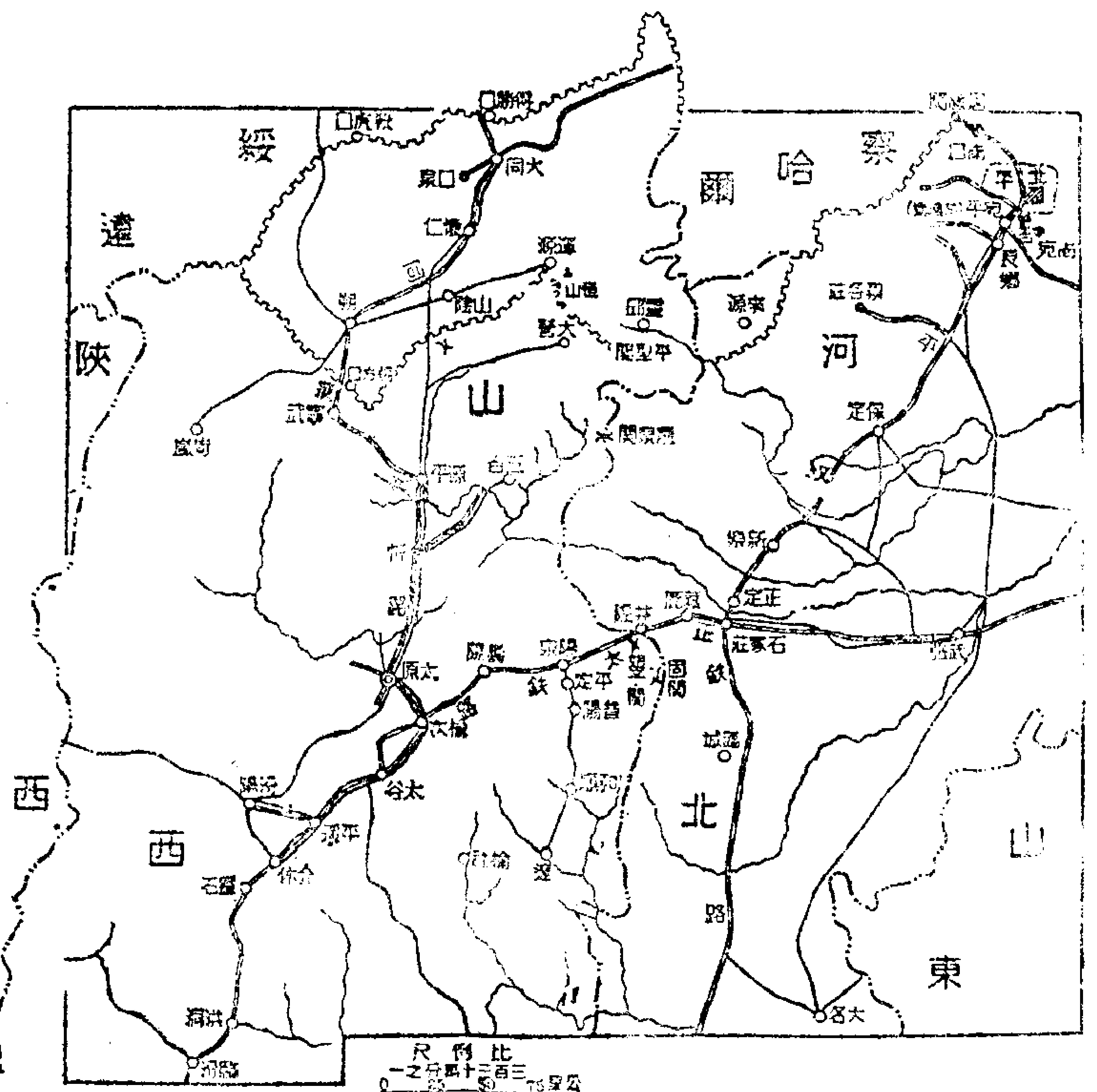
蘇維埃聯邦
蒙
古
庫倫
黑
龍
江
吉
林
察
哈爾
錫林郭勒盟
察哈爾十二旗群
熱
河
昭烏達盟
卓索圖盟
承德
遼
寧
哲
里
木
盟
綏
遠
烏蘭察布盟
伊克昭盟
寧
夏
山
西
河
北
山
東
渤
海
太原
大同
天津
大連
遼陽
長春
哈爾濱
齊齊哈爾
洮安
滿洲里
永吉
比例
0　100　200　300公里

图五　　筹备远征新疆路线图之一



图六　筹备远征新疆路线图之二

图七 山西战役图


綏遠
察哈爾
河北
山西
陝西
山東
大同
口泉
渾源
廣靈
靈邱
平型關
五台
寧武
太原
陽泉
娘子關
平定
石家莊
正定
新樂
保定
北平
榆次
太谷
介休
平遙
臨汾
洪洞
大名
比例尺
三百三十萬分之一
0 25 50 75 公里

写后的话

民国三十年，广西的朋友要编广西统一的战史，有信来要我将亲自见闻的事迹叙述出来，并附寄他们所编的初稿，要我校阅补正。我看了那个初稿，认为在史实方面，固然有许多错误脱漏之处，而在体裁方面，亦觉未尽妥善。同时我又觉得那时我所经过的事实，也实在太多了，有好多重要的事情，那位执笔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如果在他们的初稿上，作片段的补正，下笔甚为困难，而且仍是挂一漏万的。于是我想自己写一本《广西统一始末记》，把我在广西从事革命的情形，作有系统的叙述。目录拟好了，由我口述，晏忠承同志为我笔记，这是三十一年的事。后来晏同志离开省府，我又没有继续下去，就耽搁下来。但是我想这事终于要做，而且想把它扩大成为我以往全部经历的叙述。这年（三十二年）刚巧渡过四十九岁的生辰，五十岁快到来了。五十岁是人生重要的关键，要是把五十岁以前自己所经过的事迹，全盘叙述出来，既可供自己的反省，亦可资社会的参考，比光写广西统一的一段事实范围更广，涵义较深，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于是我把以前所述的《广西统一始末记》的名词废去，而改为《五十回忆》。

在引言中，我已把我的用意及立场申明，我想照此思索、照此着笔，但是隔了很久，还是不易着笔。三十三年六月中旬，我由重庆回浙江，在赣州、宁都的途中，为大水所阻，只得在银坑一个幽静的招待所内休息两日。这是江西公路处的招待所，似乎

他们早就知道战时的旅途是不很舒适的，而在这僻静的中途，准备旅客意外栖息的地方。江西公路处虽然招待得十分周到，但我还是感觉得非常寂寞。停滞在这寂寞的中途，会把个人以往经过的一切，翻腾到脑海里来。尤其是最近过去的一年，是我遭遇最坏的一年。我自己染了危险的鼠疫，虽然得救，而我的大儿子德芳，却在一个月前死亡！我觉得人生的修短，是没有一定的。“及时行乐”，是消极的爱惜生命，而“及时做事”，却是积极的光大生命，在这种感想之下，于是将我要写的“五十回忆”就在那里着笔起来。

这是我生平启蒙的写述。当着笔的时候，心里总有些惶恐，好象小学生开始作文章，拿起笔来，东也不是，西也不是，但是也不能顾虑得许多。心里想什么就写什么，横直不是学术的著作，无须要正确的理论，亦不是文艺的创作，无须要美丽的词句。这仅是我个人生活过程的叙述，只要叙事忠实，写得清楚，使读者明白就算了。自己也没有决定采用那一种体裁，及篇幅的长短，而是照着生活的顺序，随便的写下去。起初以为写十多万字就够了，但逐步的增加，由二十万而三十万，还不能将五十年来自己所经过的事实完全写出。中间自然有许多冗长的地方，但也有好些脱漏的地方，这都是随记忆所及，与兴之所至，而不暇去剪裁补缀。全部的初稿，于三十四年七月底才告完成，共分为二十七章。各章虽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但是时间方面，只能说大致不错，不能记得十分清楚。事的方面，也仅能就自己所知道所想到的，为叙述的范围，误漏之处，当然亦所难免，但决不致有很大的出入。在每章的叙述里面，由于自己的经验，而发为个人的感想，正确与否，是另外的问题，但决没有批评人与攻击人的意思在里面，也很少引经据典的地方，而完全是照自己的意见坦白的写出。因为我的脑海里，根本就没有那些经典，假使我的见解是正确的话，就不引经据典，也不会失了它的价值。这价值亦只有任由读者去评定，自己并没有认为有价值的意念存在。

在一年当中，写三十多万字，自然很迟慢的了。因为我不能连续不断的写，而是有余暇有兴趣的时候才能写，但是写的时候仍旧是很匆忙，写下来的稿子，也没有功夫复看一遍。无庸讳言，这是一种粗制滥造的工作。因此又请许廑父、应占先两同志替我担任校补之责。可以说我这《五十回忆》的完成，他们两位是帮我出了很多的心力，顺便在此致谢。

黄绍竑

三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于浙江云和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到代总统[1]

黄绍竑

新桂系于一九二九年被蒋介石打败以后，局处广西一隅，然蒋桂之间的明争暗斗，时起时伏，交替上演，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前后，矛盾激化，争斗达于高潮。我在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过程中是策划人之一，现将这一时期的亲身经历追记于下。

一、李宗仁与我的秘密谈话

在记述这一时期的史料之前，先得谈谈我在那几年的活动简况以及所见所闻，俾可更清楚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正当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节节失败之时，我采取"等着瞧"的态度坐在一旁观望风向。张群当行政院院长时，极力保荐我当粮食部部长，要蒋介石亲自下手令。蒋说："季宽（我的别号）近来有些变样了，我看他不定会干的，最好先征求他的同意，免得把任命状退回来不好看。"于是张群派徐堪来征求我的意见。我本着旁观的主意，随他怎么说，我坚决不干，他只好拂袖而去。

一九四七年年底，据说明年定为"行宪年"。所谓"行宪"，就是要选举大总统，实行总统制。这样，我想用来观望风向的地位（那时我任监察院副院长）不复存在了，我又作什么打算呢？

我既不是"国大代表"，又不想当部长，干什么好呢？那

---

①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题目是《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本篇标题为编者所加，并删去部分与主题无关的叙事。

时，正值要选立法委员，我想当个立法委员很好，既不要负责，又便于观望风向，还可以“放大炮”攻击别人。于是，我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乘飞机先到广州。在那里过了一九四八年元旦，我随即坐飞机去桂林。不久，我由桂林经梧州回我的老家容县，后来，到了北流、玉林、博白，忽接黄旭初由桂林打来电报，说李宗仁要我立即回南京有要事相商。我停止了竞选活动回到桂林，在桂林，我遇见主持广西选举的韦贽唐，韦当过我的秘书，他私自对我说：“季公想当立法委员，只须吩咐我们一声就得了，准能选上，用不着亲自出马。费那么大气力同他们竞选，反会降低你的身份，真不值得。”我说：“不这样做做，美国佬不是要笑我们不民主吗！”彼此一笑。

我由桂林乘飞机到广州，本想去香港看看李济深，听听他的意见。他大约在两个月前由上海去到香港，在港组织国民党同志会进行反蒋。他在上海临行时与我约定，必要时我也去香港共同策划。由于这时李宗仁催我趱行，加之蒋帮特务历来把香港当作“疫埠”看待，对出进香港的人都严密注视，因此，为了避免嫌疑，我就不去香港而迳自返回上海。横直我与李济深已有约定，我要混到最后才到他那里去。

我刚回到南京，李宗仁由北平派专使李杨送来密信。李杨这时是李宗仁的机要处处长，以前曾当过我的密电室主任。由此可见，李宗仁把这信看得十分重要机密，才派这样彼此信得过的人来送这信。李宗仁在信里说，他要竞选副总统的理由有：第一，李在北伐初期就当了第七军军长（八个军长之一），后来又当了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当时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要做大总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在国外，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宣布不参加竞选，此外就没人有资格同他竞选副总统了（阎锡山并答应帮他的忙）；第二、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必然失败。竞选如成功，遇有机会即可同中国共产党和谈收拾残局；第三、他判断北平一定守不住，不愿束手当俘虏，即使竞选副总统不成功

也好借口离开北平。

我看信后，李杨还对我说："李主任再过几天就回来。请季公多多考虑，当面再商量。"后李宗仁由北平回到上海，到我家里来商量。我说："李杨带来的信收到了。你信里所说的三条理由，我相当赞成。第二条有问题，老蒋如果真是垮台或死了，那倒好办；但也要考虑到他不死不垮台，那你就得当六年的大副官，实在没有什么意思。我倒欣赏你提出的第三条理由，借此离开北平，不论回广西或到香港等着看，再作下一步的打算。这个时候靠得太近了，实在不合算。"他说："你的意见很对。我的打算，积极与消极都有，不过总得先从积极方面着想"。

我说："这回副总统的竞选，老蒋以全力支持孙科，加上孙太子的招牌，当选的可能性不亚于你。你说你有把握，那就请你谈谈你的把握在那里？"他说："广西、安徽是我们自己的基本力量，就不必说了。华北方面，阎伯川不参加，而且答应尽力帮忙。这样，晋绥两省就有把握了。北平是文化中心，教育界对我的印象还不坏，而且胡适也答应帮忙，则教育界方面也有若干把握。上海银行界有陈光甫、张公权、奚伦、傅汝霖。傅是东北人，可在东北拉票。帮会方面有杨虎带头。律师界有石超庸（广西人）和周一志等，这些人都肯帮忙。其他各大省，如四川当局同学最多，那里总可以拉上一些关系；尤其是范绍增，帮会势力不小，已肯帮忙。湖北方面，胡宗铎、陶钧尚有一些潜势力，旧属当专员、县长的还有不少人，可以利用。广东方面，张发奎系统如薛岳、黄镇球、李汉魂等，过去也有关系，请他们帮帮忙，他们也不好完全拒绝。此外，健生（白崇禧）现在是国防部部长，与各省军人都有联系。尤其他是回教协会会长，与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关系更深。如果再加上你近几年来在蒋方的关系，拉一些票，胜利就有把握了。因此我请你来主持竞选，计划一切。这是我们（指桂系）一着大棋，不可错过了。要用钱，黄旭初、李鹤龄（李品仙）在广西、安徽两省内早有准备。"我听

了他这番话，使我想起赤壁之战的故事，周瑜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似乎只要我这诸葛亮肯上南屏山法坛借东风，副总统准能到手似的。

我向李宗仁说：“人家答应的话，只可信一半，取得胜利还要靠自己努力。要知道，老蒋既然支持孙科，难道他的力量不比你的强吗？我对你这回的事有两句评语：要末成功，也就是失败；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他听了我的这两句话很惊讶，问我怎么解？我说：“若竞选成功，老蒋的江山稳固，你岂不是跟老蒋当六年的大副官吗？这岂不是成功的失败吗？第二句话说的是要末失败也就是成功，就是说你如果竞选失败，不但要离开北平，而且还要离开南京，回到广西或香港去，仍然树起反蒋的旗帜。这样，你就是国民党内最大的反对派，你今后在政治上的作用不比做一个副总统还强吗？”他听了我的解释，说：“老蒋是一定要失败的。我做了副总统，决不是他的大副官，我有我的做法。”当时我很清楚他的目的是要做副总统，以后如何又是以后的问题。我也就不再说什么，答应他主持竞选。但我声明：“用钱的事我不管，只管计划问题。”他说：“那些事有人管，不用你费心。”

二、我在选举前的活动

我作为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的参谋长，首先就要了解一下选举前的形势；其次，就我的可能，分头拉选票。

当时，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共有六人，除李宗仁外，孙科、于右任、程潜都是国民党内的；此外有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中国青年党没有人参加竞选。中国青年党所以不参加竞选，第一可能没有钱，第二因为参加竞选最后也是毫无希望的，倒不如把属于它的选票作为买卖待价而沽。莫德惠和徐傅霖也明知没有当选的希望，也许是应邀出来作陪客，凑成民主的场面，

来骗骗美国主子；再则，选一次不行就退出，它的选票就更可抬高市价。因此他们的选票就成为李、孙、于、程争取的目标。因为李、孙、于、程都有自己的基本力量，开始的时候谁都不肯轻易放弃机会。

我首先去拜会中国青年党的曾琦、李璜、左舜生。他们与李宗仁和我都熟识，余家菊更是我的旧同事。他们对李宗仁表面上是称赞他北伐时期的功绩，抗战时期台儿庄的胜利和他为人的爽直老实，没有官架子。但他们也搬出一套政治主张所谓“责任内阁制”，希望李宗仁当选后赞同他们的主张，不要使蒋的总统制集权得太厉害，似乎答应有条件的帮忙。他们要待价而沽是可以想象的。我也去拜会徐傅霖。他也是竞选人之一，要他帮李宗仁的忙，岂不是当面奚落他吗？但他很老实。他说：“所以出来竞选，无非是凑凑场面，等选后再看吧！至于民主党的选票，以后投向那一个，要由代表自己决定。”他的这个答复倒是圆滑周到。

我还通过刘哲拉东北的票。刘哲以前同我是四方桌上的朋友。西安事变时，我同刘哲、莫德惠、王维宙一起乘飞机去太原找阎锡山，想跟张学良商量把蒋介石放出来以便“团结抗战”。当我向刘哲拉票时，他说：“东北的情形很复杂，就是柳臣（莫德惠的别号）也不能得到东北的全票。等初选后看情形如何吧！但你还要作其他方面的努力。”

作为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我不得不放下面皮来为他拉票，有些明知是钉子也只得去碰。洪兰友是国大代表会议的秘书长，是CC的骨干分子，是帮会的次等头子（杜月笙的徒弟）。我明知他决不肯帮忙，而且是站在相反的方面，但我还是去拜会他请他帮忙。他不能当面拒绝，只好拿一番虚假的话来敷衍我。

有两个很有趣的例子。我也想挖挖孙科的“墙脚”，摘些广东的选票。我就去找张发奎。张发奎虽然过去同我们打过仗，但后来又和好了，同他一起去打陈济棠，出师湖南（即所谓援湘之

役。（他的第四军屡次失败，都是驻广西休养整理。他同李、白合作很久，总有一些感情。李为他的旧日上司（李宗仁作总司令，我是副总司令，他当军长），他一定帮助李。我说明了来意。他开口就说："季公，请你原谅，并请报告德公，论关系我应该帮德公的忙。但我有一个地方的责任，即我是广东人，要投广东人的票。其他如薛岳、黄镇球都是一样，你不要同他们说了。"这个莽张飞说话真痛快，开门见山没有半句敷衍的话。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说我体谅你，我们以后合作的机会还有呢！

我又去见山西、绥远代表的领头人梁化之。李宗仁对我说过，阎锡山已经答应帮忙，但为表示礼貌起见，不能不去拜会他。我在抗战时期在山西当第二战区副长官时就认识他。他见我时很客气，口称副长官何必客气，这事阎伯公（锡山）已经吩咐过，我们一定照办。请副长官放心吧！但事后知道阎锡山玩了一个两面光的手法，把晋绥的选票分作两下，两边各半，都不得罪。

除我奔走活动外，当然李宗仁也亲自出马，白崇禧也分别活动。李宗仁以候选人的身份，在南京、上海各种场合上发表竞选演说。他在南京的安乐酒家开丰盛的流水席，宴请各省的国大代表，在那里作竞选演说，拉选票。其他的竞选者也同样做，而以孙科做得比较象样（以龙门酒家作大本营）。当时南京有句话："安乐龙门，代表最盘桓。"

白崇禧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回教协会的会长，他在暗地里活动，以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为对象。他的老婆马佩璋以回教身份对马鸿逵、马步芳的老婆进行内线活动。

三、变被动为主动

在竞选前活动紧张的时候，忽然传来消息说，副总统候选人

要由国民党中央提名①，只提孙科一个人。这个传说可能是孙科方面放出来的，并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李宗仁和我知道这个消息，等于当头泼了一盆冰水。我们虽然反对国民党中央提名，但提不出理由来。中常会过几日就要开会讨论，若那时果真提出，我们都不是中常委（都是监委），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办呢？

我想，六个参加竞选的人，除孙科外，没有不反对的。不但理由不充分，而且联合也有困难，时间更是迫不及待。李宗仁也未必有反对中央提名的勇气。我想了又想，这也许是蒋方故意放出来的试探气球。如果反对的浪涛不大，就真的由国民党中央提名，如果大家都反对，也就不提了。这是一个斗争的重要关键，我怎能等闲视之呢！

根据上面的判断，我认为必须先发制人，打消由国民党中央提名的办法。我的计划就是直接了当反对由中央提名，否则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我还考虑过，这样一来，要末取消中央提名的拟议，要末就真正破裂。如果没有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参加仍然选出了副总统，我们就公开表示不承认。那时，不但蒋介石难以下台，而桂系反蒋的旗帜岂不是又高高地举起来了吗？这对桂系是有利的。我同李宗仁说的那句话，要末失败的成功，岂不是兑现了吗？

我又想，这个计划，如果事前同李宗仁商量，他未必同意。何况，据我估计，那时的安徽代表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倾向于蒋方的，即广西代表也有极少数是倾向于蒋方的，因此行动起来未必能一致。但是，我认为打出两个省的旗号，还是可以起到恫吓作用的。此外，于、程、莫、徐必定也是共鸣的，可以为我声援。这样，国民党中央就不能不考虑了。

---

①据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页：李宗仁于3月22日由北平飞抵上海发表竞选言论。他反复陈述这样的意见：如果当选副总统，当尽力所能及在政治上实行民主政策。……蒋介石发现这种情况，特决定总统、副总统的候选人，应由国民党中央提名。

我的主意既定，遂于某日的下午三、四点钟坐车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吴、陈都不在，我就找副秘书长郑彦棻。我马上告诉他说："既然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都不在，对郑副秘书长说也是一样。"接着我问："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是吗？"不等他回答，我又说："如果是真的话，广西和安徽的代表就要退出，不再参加选举。我要见吴秘书长和陈部长，就是要说明这两句话，没有其他事情。他们如回来，请郑副秘书长转告他们。"他听了我的话很吃惊，说："我不知道有中央提名的事呀！季宽先生那里得来的消息？"我说："南京城里传遍了，何必问那里得来的呢！"他又说："我马上打电话给吴秘书长、陈部长，把季宽先生得来的传说和意见告诉他们。"我离开中央党部回到方家巷李宗仁公馆，把经过情形告诉了李宗仁。他说："对呀！我正想找你商量。我完全同意你这样做。如果中常会开会，他们提出来，我们就来不及了。"他又说："中央提孙科，各方面都反对。你来这一下，我想他们就不敢提名了。"次日早，仆人就送上吴铁城、陈立夫两个大人物的名片，不久又送上余井塘（内政部长）、洪兰友（国大秘书长）两人的名片。我想，昨日那炮打得真准，把他们都打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在那卧室兼客厅里接见他们。大家见面后，吴铁城首先道歉，说："昨日不在中央党部，有失迎候。"接着他又说："季宽先生昨日对郑副秘书长所说的消息，都是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党内团结而散布的谣言，希望季宽先生不要轻信。立夫先生和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决没有中央提名的事。希望季宽先生以党国大局为重，不要轻信谣言，团结一致，使国民代表大会顺利完成伟大历史使命。"陈立夫接着说："这次国大的召开，是经过同共产党长期的艰苦斗争得来的，共产党无时不想方设法破坏。季宽先生过去在地方工作，当然不知道其中的经过，这次国大是行宪的开始，除了选举大总统、副总统外，主要任务是团结全国的意志进行'戡乱'。现在'戡

乱'军事正在进行，如果我们内部闹分裂，就正中了反动派的奸计。”陈立夫的这番话固然是骂中国共产党，也是骂我和桂系的。我不与他们辩论，只是说："我只希望副总统能按照宪法自由竞选，既然你们各位保证中央不提名，我还有什么意见呢！"我在树德里的房子，汽车是开不到门口的。我笑着送他们出来行了一段路，大家一笑握手相别。这就是我当头一个空炮得来的效果。

四、再一次以退为进

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希望一下就当选，但开票的结果，李宗仁得了七百多票，独占鳌头。以下是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但是李的票数距法定（三分之二）还远得很，不过"小考"作了案首，也是大考得中的好兆头，他心中很高兴。

依法还要再选。照规定只有前三名可以参加。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的选票，就为李宗仁、孙科、程潜等争夺的目标了。那些为李宗仁、孙科、程潜助选的人，不是去拜访落选的本人或助选人，就是直接拜访他们的代表，请把他们的票投在自己拥护的人名下。但是尽管你怎样拉拢，那些票却分到三方面去了。所以再选的结果，仍然是李宗仁、孙科、程潜的次序，就不得不进行三选。三选仍没有得到法定的票数，还要进行决选。按照规定，决选只有李宗仁、孙科两人，不要够法定的三分之二的票数，只要比较多数就当选了。这是最后的一关，彼此无不全力以赴。而蒋介石为支持孙科，也就露面出动他一切主要人物为孙科拉票。宋美龄宴请那些女代表，及那些地方上掌握军政大权的太太，要他们投孙科的票，或用他们的关系为孙科拉票。我也当然要努力争取，半夜到各大饭店敲代表的房门，有些代表已经睡了，起来见我，我匆匆说了几句话就走到另一个房间去，他们都是睡眼惺松地向我敷衍几句。我由中央饭店出来，已经是夜里两

点钟了，还碰见吴铁城、陈立夫和另一些蒋方的人，大家见面，只是点点头，彼此各做各的事。

正在这时，我们接到对李宗仁私人攻击的传单，说什么“戡乱不力”、“台儿庄胜利是假的”等等。我回家想了一夜，认识到蒋方这样出力为孙科捧场，是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能做出来的。我们同他们硬碰下去，不但副总统选不上，还会弄得一身脏。因此必须定出个计划，使他扑个空，然后向他反扑，这样才可能成功。

次早九点多钟，韦永成来看我。韦永成是李宗仁的表亲，又是蒋介石的侄女婿（蒋介卿的女婿）。他把所知道的情形告诉了我，比我所知道的还详细。他说：“他们（指蒋方）还准备对李宗仁进行人身攻击和迫害。尤其是要把李宗仁老婆郭德洁作为攻击中心，说她在北平贪污要钱。还要以‘戡乱’不力或通共的大帽子套在李宗仁的头上。”他问我怎样应付？我说：“你说的与我所知和所想的一样，我正想把我的计划同你商量一下。”我对韦永成说：“照此情形硬拼下去，不但副总统弄不到手，还要弄得一身脏。我主持竞选的时候，就总结了两句话：要未成功的失败；要未失败的成功。照现在情形看起来，最后是要失败的。但切不可等最后失败才收场。好在四个回合的战斗我们已胜三回合，就此退出战场，我们岂不是仍然是胜者吗？何必再打没有胜利希望的回合呢！如果我们中途罢选，国大又怎样收场呢？文章就更好做了。”韦永成很同意我的办法，我就邀他一同去白崇禧的公馆，并请李宗仁来商量。

我说明了我的计划，他们（指李、白）都愕然，尤其李宗仁极不赞同。他说：“你不要为他们（指蒋方人员）的行动或放出的空气所吓倒，各国的竞选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赢了三场，最后一场打下去一定会赢的。”他说话时有些气愤。我说：“打牌（麻将）我是老手，往往前三圈赢了，第四圈输得精光。我第三圈站起来不打了，也不收人家的钱（照例不打完四圈

是不能收钱的），我岂不是赢家吗？何必打完四圈又变成输家呢！”他说：“打牌为了赢钱，竞选为了当选，为什么要在胜利的中途退出呢！你打牌的时候肯这样做吗？”我说：“打牌的时候，我当然不能这样做，因为四家是约定要打四圈或打八圈、十二圈的。中途退出，除非发生了什么事故，否则其余三家就不答应。竞选是没有约定的呀！你退出了，我们的代表都不入场参加决选，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呢？老蒋、孙科怎样收场呢？这就是我的妙棋。”

白崇禧起初也不同意，只在旁边摸着下巴，一面想一面听我们辩论，一言不发。我说到国民代表大会怎样收场那段话时，他也同意了。他说：“这倒是一个好办法。好似下棋一样，将他们几军，缓和一下局势，虽然将不死，打乱他们的阵脚，办法就好想了。我同意宣布退出选举。”

桂系的事素来都是三头会议决定的。黄、白同意了，李没有不同意的。但这回是例外，李宗仁仍不同意。他说：“煮熟快到口的饭不吃，还要等什么？你们要知道那些轿夫佬（指所有助选的人和我们方面的代表）是等着要吃饭的呀！”我说：“退不退出，德公作决定。我的计划就是这样。不采用，我就趁十一点钟的快车去上海不管了。横直明天就见分晓，不论胜败我都不愿看见，免得神经紧张，血压又高起来。我实在太累了，要回上海去休息。”李宗仁见我如此，连忙说：“忙什么。等我考虑考虑。下午还要约我们的干部来谈一谈，听取情况和他们的意见，不能光由我们三人完全作主呀！”他这几句话倒很有道理，我只好留下来。李要韦永成分头打电话，要桂系的重要干部下午三时到白公馆来开会。

当日下午三时（大约是四月二十几日①，我记不清楚），在

①据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第8页：4月24日晚饭后，李宗仁召集白崇禧、黄绍竑、黄旭初、邱昌渭、程思远等到大悲巷雍园一号白崇禧寓所举行讨论会。

南京白公馆里，桂系开了紧急的秘密会议。在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个头子主持之下，有黄旭初、李品仙、夏威以及主要的骨干都到会。首先是听取各方面关于竞选的情报，那些情报都反映蒋介石如何全力支持孙科，与以前三次选举的情况不同，对我们不利。其次是我把退出竞选的计划加以说明。会上议论分歧，而李宗仁仍坚持要参加决选。他说："最后的决战不参加就自行退却，岂不是自己认输了吗？不管胜或败都不退却，最后胜利才有可能得到。退了出来，以后还有什么文章可做呢！"我说："德公！这不是战场打仗，就是打仗，有时候也要退一下，才能反攻胜利。"于是我举北伐时期第七军攻占南浔路上的德安为例，说明孤军深入，眼看要被孙传芳包围歼灭时，连忙退到箬溪，吸引孙传芳的一部深入，反把它歼灭了，然后仍然占领了德安。接着，我说："打文仗也是一样，你同人家抢副总统这把交椅，你若死抱着不放，手脚都被人家封住了，有本事也施展不出来，最后交椅仍然被人家抢去。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你暂时放手，等他扑个空，然后反扑过去，打倒他们，这把椅子就有可能抢到手。我要你退出，并不是没有文章可做，正好借着这个题目好做文章。"（当然我以前说过失败后就回桂林或到香港反蒋的话，并不敢当大众讲。）

我这番话讲完之后，已是夜里十点多钟了。我就起立拿着帽子，说要趁十一点钟的夜车去上海。白崇禧连忙把我拦住说："季宽的话是有道理的。蒋方的确使用全力支持孙科。三选彼此的票数相差有限，若再加上蒋方的压力，则孙科反败为胜是可能的。我们决选是很难胜利的。现在最要紧的是，先将蒋方的压力打退，退出是一个办法。但以后怎样办呢？仍要靠季宽在这里策划。你（指我）决不能走。这是我们团体的胜败问题，你能不管吗！"

本来会场上是赞成和反对各半的，白的话一说，就几乎全场都赞成我的主张。但李宗仁仍然默不作声，会场顿然静下来。正

在这时，有人送来两种传单，一是对李宗仁人身攻击，说他的老婆郭德洁在北平如何贪污，用金钱收买代表；一是攻击李宗仁“戡乱”不力，还说他在竞选中提出一些同共产党一样的口语。静默的会场又紧张嘈杂起来。李宗仁终于同意退出了。他问怎样退出有利呢？总要做出一个名堂来给对方看看，不能无声无息的退出呀！他说完了这几句话，把眼睛看看我又看看大家。

大家于是商议，决定由李宗仁以候选人的名义写一封信给大会主席团。这信由黄雪村和邱昌渭起草。信的主要内容是：“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竞选。”这封信一面送大会主席团，一面送南京各报登载；并立刻分头通知我方代表明早概不出席，还派一些人到会场门口作纠察，劝阻那些来不及通知的代表。

这事决定之后，已是午夜两点钟了。李宗仁很不愉快地回他的公馆。

我回到家里倒是好好地睡了一觉，好似已经得到胜利那样。次晨八点钟，我还打了一个电话给孙科的助选人。我说，李德邻已经放弃竞选，没有人同孙院长竞争了。他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我的用意是，如果他知道的话，就不用自己到会场去扑空，这样岂不是我们的计划更完满了吗！殊不知他竟然去到会场，看见代表的席位疏疏落落，只有他自己方面的代表，不足法定的出席人数，不能选举。大会主席团见此情形，只好请示蒋介石宣布暂时停选。我们的计划实现了，成为当日（二十五日）全国各报最重要的新闻。

五、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我们于二十五晨二时才决定罢选计划，对各方发出通知已是三点多钟了，二十五日清晨就弄得举国皆知。事情闹大了，国大

怎样收场呢？而且也牵涉到蒋介石大总统身上，老蒋又怎样下台呢？这问题旁人是解决不了的。中国有句老话："解铃还须系铃人"。蒋介石当日（二十五日）就召见白崇禧，说明他并没有袒护、支持任何一方。他把那些谣言和传单都说成是反动分子希图破坏我们党内团结的东西，说一定要追究，要白崇禧劝李宗仁仍然参加决选。白崇禧也就顺风收帆答应了。不知是否得到老蒋的许可，他把老蒋的话向报馆记者发表了。这一下就等于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弄得老蒋啼笑皆非。

大会延到四月二十九日进行决选。有了三天时间，我们的文章就好做了。于是，我趁着这个风波进行"挖墙脚"的工作。浙江，人们一向认为是CC坚固的堡垒，是不易攻破的。我在竞选开始的时候，虽然做了一些拉拢工作，现在趁老蒋表示不支持任何一方的时候，我再做一些工作。浙江的国大代表绝大多数是我熟识的，而且许多做过我的部下。我在浙江做了十年的主席，彼此相处也不坏。更有些人以为我做过两次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次，自然乐于同我接近，投李宗仁的票。据事后所知，浙江代表投李宗仁的票就有三分之二。李宗仁当选后，陈布雷集会浙江代表把他们大骂了一顿。

孙科继胡汉民之后一直当立法院院长，并以太子的身份组织三民主义学会，网罗一些社会人士，在这次竞选中除蒋介石给以支持外，旧立法委员的大多数是支持他的，为他竞选奔走。以前有些进步人士想推动孙科同蒋介石对峙，以进行反蒋活动。蒋介石素以继承孙中山自命，他见孙科这样，他想极力支持孙科做他的副总统，使蒋、孙成为一体。我去挖孙的墙脚，是通过旧立委谭惕吾找另一个立委于振瀛谈话。我向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我很佩服，但是现在蒋、孙合一了，你们捧孙做副总统，岂不是反而增加蒋的反动力量吗？我这段话把于振瀛说动了。我又向他说，陕西方面你是有影响的（他是陕西人），请把其他方面的票也拉过来。他答应了。他并说，山东代表唯王

法勤的马首是瞻。旧立委范予遂是王法勤手下的大将，他也是进步的。于是又通过于振瀛去向范予遂拉山东的票。我这样一“挖”，虽然不能确知挖得多少票，想来可以抵销蒋方施加的一部分压力，李宗仁失去一些票也是必然的。

罢选后的第二日，程潜的助选人贺耀祖（贵严）到我那里，见面就说：“这着棋很厉害！是你出的主意吧？”我说：“这盘棋眼看就要输了，只能猛将几军打乱对方的阵脚，再想妙着。”他说：“将得好！你们的文章好极了。”这时程潜已没有参加决选的资格，我便趁机请贺帮忙，把票子拉过来。他说，情形很复杂，他不能单独作主。他介绍我去找邓介松、邓飞黄。

按宪法规定，三次选举都没有人得到法定的多数选票时，就要进行决选。决选时，只有第三次当选的票较多的前两名能够参加，也就是只有在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之中进行决选。因此李孙双方无不全力以赴。我们得到四天的准备时间，感到更有把握了。

决选那日，我打开收音机听唱票。每唱孙科的票，孙派代表就来一阵掌声；唱李宗仁的票，李派代表照样也来一阵掌声。此起彼伏，成了会场悦耳的旋律。起初，彼此票数相差不多，到末了，李宗仁的票唱到一千四百，孙科及其代表知道大势已去，也就相率离开会场。李宗仁及其代表则在会场更加活跃，直到将选票唱完为止。

结果，李宗仁共得一千四百三十八票，比较多数（孙得一千二百九十五票），当选副总统了。李宗仁夫妇当即坐车到蒋介石那里表示感谢，并且还说以后一定追随大总统之后进行“戡乱”，弄得蒋介石啼笑皆非。蒋只是说“好、好、好”，也向李宗仁道喜，并且说我们大家今后共同努力为党国服务。

白公馆（李常在那里会客和决定重大问题）自然贺客盈门，应接不暇。我随后也到那里向李宗仁道喜。我说：“好险呀！相差只有一百四十三票。如果不是罢选，把老蒋的压力松一下，多得几天准备功夫，情形就不是如此了。即以今日的票数来看，老蒋

的压力并没有松了多少。主要是在陕西、山东、浙江拉得一些票子来补上。”李宗仁夫妇自然是春风满面，那班抬轿佬也喜气洋洋，好似马上就有什么好处似的。而我呢，辛苦了若干日子，希望得到什么呢？我当即回上海休息，也再没有人阻拦我了。

当大总统、副总统举行就职典礼时，据说李宗仁曾问典礼处着什么服装？典礼处没有肯定的答复。届时，大总统着起长袍马褂，显得很斯文的样子；而李宗仁则着上将军服（也许李没有长袍马褂，准备来不及）的确象一个大副官，形像十分难看。大总统、副总统就职后，蒋介石照例邀那些国府委员一起照相留念，但有些委员觉得前途茫茫，都不来参加，景象很是凄惨。

六、蒋介石开始向桂系反扑

蒋、桂在竞选副总统的斗争里，蒋介石被桂系打了一闷棍。这一棍表面虽然打在孙科身上，却疼在蒋介石心里。他怎能就此善罢甘休，因此随即向桂系反攻了。

（一）安徽省主席李品仙是一个糊涂蛋，蒋方就集中火力向他进攻，不但说他贪污舞弊，还说他挖掘安徽寿县楚王古墓，强买民间古画。他们不但在报纸上大肆攻击，而且由监察院提出弹劾动议。李品仙托病躲到上海。白崇禧也到上海。一日，白约我谈话。他说：“鹤龄（李品仙号）在安徽弄得很糟，再难做下去了。老蒋有意请你去接任安徽省政府主席，把李调任广西省主席，把黄旭初调中央（不指定什么职务）。德公（李宗仁）要我同你商量一下，听听你的意见。”我说：“这是老蒋的毒计呀！我们千万不要上当。”他说：“不见得吧！”我说：“你读过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吗？虽然实际情况不同，但也颇相似。桂系统治下的两个省——安徽、广西，李品仙在安徽弄得很坏，现在把他调回广西，岂不也要把广西弄成安徽那样吗？黄旭初虽然没有什么才干，但守成是有余的。我是广西人，我反对把李品仙调回广

西。这回蒋恨我到了极点，他要我去安徽是好意吗？无非是要我到'戡乱'前线上去试试，再来整我，这个当我坚决不上。我提醒你也不要上当。李品仙做不下去，另换一个广西佬好了，或另换一个接近我们的外江佬也好。"白崇禧听了，只得扫兴而去。

在这个同时，老蒋也指使办《东南日报》的CC中坚分子胡健中来见我。他把李品仙大骂之后，对我则表示欢迎。他说："季宽先生在浙江搞了十年，我们是知道的。此次若到安徽去，地方人士（包括我自己在内）必能通力合作，把安徽搞好。安徽比浙江好搞得多。"此外，以前任浙江省府秘书长的李立民，也以地方人士的身分（李系皖人）劝我去，都被我谢绝了。蒋的毒计乃不得售。

果然不久蒋介石就用夏威（广西佬）接替了李品仙。老蒋这次反攻的计划，只算实现了一半，他那肯就此罢手呢！

（二）古人有句话："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李宗仁的副总统是国大代表选出来的，蒋虽不中意，但也无可奈何，于是就把矛头转到白崇禧的国防部长身上了。

抗战初期，白原是军训部部长兼副参谋总长。大约是一九四〇年调桂林行营主任，几乎长江以南都归他指挥。

一九四八年六月一日①，蒋介石突然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并任陈诚为国防部部长。这一下把小诸葛气坏了，坚辞不干，赌气走去上海。白崇禧做国防部长是由于他答应合作进行"剿共"的，以为蒋能言听计从，可以充分发展他的才干。但蒋无论对外或对内，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更加以陈诚又是蒋的灵魂，事事与白作对。因此白崇禧的国防部长仍然是一个空头官，不为蒋所重用。白曾对我发牢骚说："东北四平街战役，如果肯照我的计划乘胜直追，占领哈尔滨，就可以把共军根本击

①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出版）第498页，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总"的日期为1948年5月31日。

败。”白对蒋的其他措施也多不满，加以李宗仁竞选副总统，他也极其卖力，当然蒋的第二个打击目标就轮到他的头上了。白崇禧被任为“华中剿总”，他坚决不干，到了上海，也使桂系内部发生混乱。郭德洁固然洋洋得意，而白崇禧的老婆马佩璋则是满口牢骚，说：“你的老公做了副总统，我的老公却把国防部长丢了。”彼此互相攻讦。

在选副总统之前，蒋的某些重要会议或宴会，我也有份参加，好似仍是他范围内的高级干部，在那以后他就不理我了。端午节，蒋忽然邀我到他家里吃午饭。在座除他夫妇之外，只有蒋经国、张群、吴忠信，连我共是六个人。我很诧异，心想这样的家庭式便饭，为什么也要我来参加，可能又有什么为难问题要我跑腿了。吃午饭时，蒋很客气，他素不饮酒，可这次却举杯向我们敬酒，祝节日快乐，这在他是少见的。吃完午饭，他对我说：“想请季宽先生去劝劝健生兄，以党国大计为重，打消辞意，快去武汉就职。”我问他派人去劝过没有？他说：“礼卿先生（吴忠信号）刚劝过回来，他仍坚辞不去就职。现在‘戡乱’正在进行，武汉地方最为重要，所以才任命他去当华中‘剿总’，这完全是党国的需要和将士的渴望，并没有其他的意思。你与他历史关系很深，请去劝劝他。”我答应晚上坐夜车去上海。他说：“经国有专机飞上海，就与他同机去好了。”说完，我就同蒋经国一起到南京军用飞机场飞去上海。

我在机上想，用什么话来劝白崇禧呢？难道还有比吴忠信更能代表老蒋说话么？难道我还用“党国为重”、“戡乱”为重那套话来劝他吗？我答应老蒋时就想到只有用相反的话，用桂系本身的利害才能说动他。白崇禧到上海十多日，蒋就暗示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上海闻人杜月笙、顾家棠来捧他，请他吃酒看戏。他在虹口有大公馆，在沪西还有别墅，真是快乐极了。

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到了上海，我就打电话约白崇禧来我家里谈谈。他说：“谈什么呢？你的来意早知道了。”我说：“你可

能只知道一半，不当面谈，你不会知道。”于是他来到霞飞路我的家里。

一见面，他就说你的来意我知道。你想想，陈小鬼（陈诚）同我是死对头，他在中央当国防部长，我这个仗怎么打！这不明明要整我们（指桂系）吗？先整了李鹤龄，这回轮到我了。他还引了一句“岂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乎”的古话。我听了笑笑说，你还想把仗打好吗？他很惊异地望着我。我说，这次来并不是用蒋的话劝你去就职为他好好打仗，正是相反，因为早就看到蒋的仗是打不好的，才想来同你谈谈赶快到武汉就职，掌握一些队伍，尤其要抓回广西那点军队，不要把本钱陪着人家一起输光了。我见他有点心动，便进一步说：“你和德公在南京高高在上做副总统和国防部长，不是等于关在笼中的鸟一样吗？现在蒋把笼门打开放你出去，还不快快远走高飞？难道你躲在上海，他就肯收回成命吗？他正开始要整我们，我们就要借此机会出去。到了外面，再反过来整他。”我又说：“武汉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地方。机会到的时候，就可以同共产党妥协言和。蒋到了无法应付的时候，必定下野，德公就可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吗！”他对我这些话听的很入耳，小诸葛的决心也下得真快，他说：“对！我明天回南京到武汉去就职。”

白回到南京，蒋当然高兴，白就趁机要求扩大华中“剿总”职权和区域，而最重要的则是华中“剿匪”总部直接向蒋负责，不受国防部及参谋总长的节制。这样，他就摆脱了陈诚（国防部长）、顾祝同（参谋总长）两顶帽子。这是他跑到上海撒娇半个月的最大收获，是其他“剿总”所没有的，也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蒋介石素来是爱直接指挥作战的，白崇禧这样的要求正合其的脾胃，所以他也不管破坏什么制度，竟然答应了。这一出戏足足唱了半个月，六月十六日白崇禧飞汉口

就职。①

七、蒋介石被迫下野　李宗仁代理总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②，上海忽传武汉方面白崇禧发电致蒋，谓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国共产党再行和平谈判（原电我未看到，据说语气尚和缓）。这无异胁迫蒋介石下野，由桂系李宗仁出面收拾。据说蒋接电后匆匆地开了一次紧急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表示他要回溪口休息，也即是要下野的意思，当日就飞回溪口去了。蒋所以采取这个步骤，不外乎是没有弄清白崇禧的底细，怕白单独同共产党联合起来向他进攻，以致影响淮海战役。其时淮海战役正在胶着，胜负未分。如蒋胜了再收拾白崇禧和桂系，易如反掌。他在溪口和在南京一样，都可直接指挥部队。当时指挥全军的总参谋长是他的亲信顾祝同，他所倚靠的空军总司令则是他的同乡亲信周至柔，国防部则是他最亲信的继承人陈诚，他回溪口也就十分放心了。

我在上海得知白崇禧逼宫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害怕极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同白崇禧的历史关系，白去汉口就职是我劝驾的，他这次的举动难道我不知道，不是共同预谋吗？说老实话，自从我劝白崇禧任华中"剿总"之后，没有同他通过信和电报电话。现在我说来恐怕都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日的蒋帮人员呢？在那几日内，我真是象被赶急了的鸵鸟，一时躲到医院，一时又躲到朋友家里，不敢在自己家里住，怕的是蒋特务不分皂白

---

①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15页：6月28日白崇禧在汉口任华中"剿总"职务。

②据《刘斐将军传略》第106页：12月24日，白崇禧忽从汉口发出"亥敬"电，请张治中、张群转蒋，要求与中共和谈，逼蒋下野……12月30日，白崇禧又对蒋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

把我抓起来马上杀了。但是随后一想，躲是躲不住的。上海公安局长是我在浙江时候的保安处长宣铁吾，他手下的特务头目也是保安处的原班人马。我这彪形外貌和我在上海的行径都是他们所熟透了的。这样一想我又安心回到自己家里，听天由命等候他们摆布吧。

李宗仁频频打电话来，要我去南京，说有要事商量。李宗仁自当选副总统后，就回北平办理行营的结束，只是阴历八月中旬约我同去游西湖，并同到海宁观潮，从未谈过什么政治问题。我对南京，尤其武汉的情形，都是茫茫然的。当时我想，在上海固然不安全，去南京更是危险，但又无法逃出蒋帮特务的魔爪。他们如要杀桂系的头目，就大家同死在一起也好。于是我就毅然去南京，看看情况再说。这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八、九日的时候。

我到南京住在李宗仁家里，我问武汉情形，他也不甚清楚，只是说："蒋回溪口去了，表示要下野，指定我暂代总统。他临走又指定张群和吴忠信同我商谈他下野后的善后问题，所以要你来一同商量。"我心里想，要下野就走好了，还有什么善后问题要商量，难道后任不会办吗？这其中大有文章，不可不注意。

张群、吴忠信来了，他们代表蒋方。李宗仁和我代表桂系，成为谈判的对手。吴忠信首先提出文告的字眼问题。他主张用"暂代"两字。他说："蒋总统因身体的关系暂时离职，随时可以复职的，只能算是暂代，连代理的字眼都是不相宜的。"而李宗仁则至少要得到"代理"两字。因为"暂代"与"代理"两个字就往返磋商了好几天，并未解决，其他问题尚未提出。据我所料，最重要的是淮海战役必须进行到底，不能中途更换他的亲信军政大员。

这时，徐州以南的津浦铁路，已被人民解放军切断，被包围的蒋军无法获得支援。蒋出动全部空军空投接济。他还亲自飞到前线上空同那些指挥官讲话，要他们努力突围。那时，从早到晚

每隔十多分钟就有一架蒋机起落，南京上空飞机往来不绝。而李宗仁公馆每日都忙于蒋下野后的谈判。我心里想，万一蒋军胜利，谈判也就停止，李宗仁和我及桂系的一些头目都要成为阶下囚了。我时常想离开那个危险地方，但又有什么方法呢？

在武汉的白崇禧见“逼宫”尚未完全成功，双方正在拖着不能解决，也着急了。大约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二日①，他打电报来，邀请张群和我到他那里谈谈。他邀我们去有两个目的：一是希望张群对蒋为他解释“有电”（指白崇禧发“亥敬”、“亥全”电）。不过是暂时为挽救危局着想，并无心同中国共产党勾结；二是因为同我久不见面，当面谈谈有什么好的对策。这正符合我要设法离开南京的目的。我同张群坐“自由”号飞机前往汉口（因那时宁汉陆空已停航）。白崇禧对张群自有一番敷衍应酬的话。张群在汉口住了一夜，次日乘原机回南京。白留我暂住汉口。

八、武汉秘密会议与我飞港活动

白崇禧送走张群之后，立刻在他卧室内召开桂系的秘密会议。除黄旭初尚留桂林之外，在武汉的桂系文武大头目都参加。白崇禧首先发言。他说：“这回同老蒋闹翻了。淮海战役一结束，他（指蒋）迟早一定来收拾我们。南京的中国国民党部是他的御用工具。我们一向是搞军事的，对于党务（指中国国民党）没有什么经验，以前我们屡次失败，都是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全靠枪杆来干。这回就大大不同了，不但要对付国民党内部，还要同中国共产党打交道。你们看怎样行呢？”接着他又说：“我的意见，李任公（济深）一向反蒋，他团结有一些民主力量，与共产

---

①据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0页：白崇禧获知张群9日飞汉的消息后，7日晚，连打四次电话到南京找程思远，设法通知当时在上海过隐居生活的黄绍竑，立即回到南京，以便与张群同机飞汉。当晚程打电话到林森路115号找黄绍竑，适黄外出，直到8日晨，程才同黄通话，次日凌晨黄抵京，偕张群飞汉。

党也有交情，不如请他到武汉来主持政治，我们就专管军事，这样就不怕了。你们看好吗？”

我与参加会议的众人都赞成，于是推人起草用白的名义写信给李任公，易稿两次，都不满意。我说最好派与李任公有关系的人去香港，当面说明这里的情形，比写信好得多。但李任公在上海临走时同我说过，到香港一有机会就要到解放区去。如果李不在香港，同什么人接头呢？难道就空手回来吗？白想了一想说：“这个重要使命只好请你负担。”我答应了，并问：“如果李任公已离开香港，我可否同中共驻港负责人接头呢？”他也答应了。我还说，现在火车飞机都不通，恐怕时间上来不及，怎么办呢？他说，他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很有交情，陈纳德现在办民航，即刻打电报给他，请他派专机来①。次日（大约一月四日），陈纳德的飞机直到下午三时多才到汉口起飞。五点到桂林，黄旭初已在机场等候。我拉他到僻静处密谈了十几分钟，把南京、汉口和我要到香港去的情况告诉了他②。然后继续飞行，到达广州已是八点多钟了，因陈纳德的飞机不能直飞香港，我要在广州停一夜，便到张发奎家住宿。次日，张发奎给买了飞机票，并派他的随从参谋陪我到机场，我上了英国飞机，一个多钟头就到香港③。

---

①据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2页：白崇禧以八万港元的代价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于一月十二日从汉口送黄绍竑去广州。

②据黄旭初《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详情》：黄绍竑对黄旭初说：一、蒋介石一心一意打到底，不愿下野谋和。二、白健生两电蒋介石劝其改采和平措施，不料蒋反疑白和桂系要造他的反。

③据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33、34页：蒋介石对黄绍竑之行极为重视。蒋经国在1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黄绍竑由南京飞汉口，与白崇禧晤谈后，即转香港，续与共产党代表洽商和谈步骤，并提出两项具体意见：一、蒋总统下野后，一致对蒋，以防其再起。二、共党与李代总统进行全面和平谈判。

我一到香港家里（白的机要秘书海岱禄也住在我家里），立刻打电话给黄琪翔，邀他到我家面谈。这是在上海分手时预先约好的。他立刻来了，我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概要告诉了他。他说："很可惜，你来迟了几天，李任公已于前几天动身到北方去了。我不知道民革留下什么人在香港负责。但是，你要同中共负责人接头，我还有办法。"他立刻打电话给杨建平先生，约定下午四时在杨家见面会谈。我同黄琪翔下午到香港山顶上坚尼地台十号杨宅，殊不知杨先生竟是熟人，他在陈铭枢交通部长任内当过全国邮政储金储汇局局长。不久中共驻港负责人到来，我又把南京和武汉的情形重述一遍。中共驻港负责人说，他也知道一些情况，白崇禧可能反蒋，但这样的大事他不能作主，必须打电报给延安党中央请示，复电三、四天才能回来，请等候几日吧。

过了三日，杨先生又约我到他家，我料想是延安回电到了。果然中共驻港负责人也来了。他说，党中央已有回电，要白崇禧派刘仲容（刘当时是白的参议）为代表，由信阳到郑州沿途去找刘伯承接头。我立即回家叫海岱禄打电报报告白崇禧。但未见回电，不知派刘仲容去了没有。

我虽向汉口去了一些电报，但回电却很少，我心里很着急。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战役结束，蒋军全被歼灭。同月十四日毛主席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毛主席的这一声明，给蒋党和李宗仁等当头一棒。同月二十

二日①蒋介石宣布下野；二十六日②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

九、李宗仁代理总统后进行的“和谈”

李宗仁给我来电，并未答复已否派刘仲容北上，却强调淮海战役结束后，蒋要他代理总统，催我回去商量内部问题。于是我乘飞机先到汉口。见到白崇禧，即问刘仲容去了没有，情形如何？白说因交通关系，刘仲容尚留上海。他又说德公屡电要我们去，因为等你才候至今日。当天我们就一同乘运输舰去南京。

到了南京，我找白崇禧面谈，问刘仲容为什么还没有北上？他说因为交通关系耽误了，交通问题一解决，马上就可以去。其实，他用意却不在此。我问前方的情形怎么样？他说津浦线上你知道，我们除了在长江北岸尚有一些警戒部队之外，都撤到南岸布防。我们有海空军的掩护，长江天堑，共军是过不来的。武汉方面仍然对峙着，但中共的四野部队绕出襄阳直趋武汉上游，似有在武昌上游渡江的模样，我军正加紧防备。

白崇禧还说，共军行动并不因老蒋下野而缓和。我说，当然啰！叫你派代表接头，指定的代表尚未派出，双方仍然是敌对的，决不能因为老蒋一走，和平就可以实现的呀！我问他到底是怎样的主意。他说：“如果迫我太甚，仍然还是打。你知道我们以前是草鞋出身的，最后还可以上山打游击，同他们（指中共）拚一下。”我听了他这番话，心头有气，于是说：“打正规战已经输了，还打什么游击战？要知道人家是打游击战的老祖宗。”接着又说：“全国人都希望和平，而蒋又屡战屡败，他才不得不暂时宣布下野，缓和一下人心，准备再战。这种用意难道你不知

---

①据《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职官人物志》第214页蒋介石宣布下野时间为1月21日。

②《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654页李宗仁宣布代理总统是1月24日。

道吗？你一个月前主张和平，迫老蒋退回溪口，示意要下野。如果淮海战役是他胜利了，难道他真的下野不进而收拾我们吗？你怎能在一个月之间出尔反尔呢？”我真气极了，他也生气，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大争论。我说：“现在要打，只是老蒋有资格。他暂时下野，你可亲自到溪口负荆请罪，请他出来，因为他是一贯主战的。我们以主和起家，只有和平才有出路，再主张战争，就是死路一条。”白崇禧说：“算了吧，谈旁的事好了。”

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刘仲容进来了。我们就问刘仲容上海的情况。他说：“在上海已同对方主持人接过头，但北上的飞机轮船都没有，所以我才回来请示。好在老蒋已经下野，李德公代理总统，要和就全盘的和，也不争个人去的先后呀！”

后来我想，白崇禧态度的所以突变，也许是由于他认为蒋已下野，目的已达到。李宗仁代理总统，江南半壁已是桂系的天下。再则是毛主席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白崇禧等人不能接受。

李宗仁既已登上代理总统的宝座，就忘乎所以了。起初是“暂代”二字，后来改用“代理”二字，李宗仁得到“代理”也就够过瘾的了。那时社会上一片和平之声，如上海名流颜惠庆等四人以社会人士奔走和平，到北平走了一遭。我去首都饭店走访他们一次，只是说了些面子上的话，并未谈到什么实质问题。随后又有两个立法委员，自告奋勇北上，自称和平人士，中共也不拒绝。他们到了北平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也没有下文。在这之前，行政院长翁文灏已下台，蒋以孙科出来组阁。

李宗仁既提出所谓“和平谈判”来，就不能不由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孙科来主持。于是孙科就派出他的亲信钟天心为首的代表团，也包括李宗仁的亲信亲美分子甘介候。甘介候在报纸上发表谈话，大嚷要敲中国共产党和平之门，以为可以为中共接受而开始谈判了。

我参加和谈代表团经过[1]

黄绍竑

一九四九年四月，国共两党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会议，我是李宗仁所派和谈代表之一，现将这段亲历记述如下：

一、美帝拉拢李宗仁和孙科的下台

李宗仁代理总统后，甘介侯俨然以未来的外交部长自居。他在北平行营的时候，早就与司徒雷登搭上了线（当时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学校长）。李宗仁代理总统后，司徒雷登改任美国驻华大使，驻在南京。这时，甘介侯勾搭美帝的活动就更频繁了。我记得有一日，甘介绍美国大使秘书傅泾波来见我。大家寒暄之后，我问有何见教？傅说，司徒雷登大使不便来，要他为代表，有些话要对我说。他说，美国对国民党一向是尽力支持的，在蒋总统任内给了几十亿美元，几万吨军械，和各种设备。蒋之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善于利用美援，而官吏将领又贪污无能。现在蒋总统下野，美国对李总统仍愿尽力援助。据他所知，现在还有十几条船的军火在途中，将陆续起运，美国愿意把这些军火直接交给

---

①本文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题目是《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本篇标题为编者所加，并删去与标题无关的叙事。

李代总统，用来“戡乱”，以后的援助仍将源源不断。但如果同共产党和谈，则美国的态度就要作别的考虑了。他这番话，明明是想利用美援作钓饵，使新桂系继续同中共作战；也是威胁新桂系，如果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谈判，美国仍然支持蒋介石。甘介侯素来知道我是主张和平的，所以介绍傅来把这番话说给我听，其实他们早与李、白谈过了。我说，这是国家大事，上有李代总统和行政院长作主，我是个闲人，不敢有什么意见。他说黄先生太谦虚了。

次晚，美国大使馆请李宗仁夫妇吃晚饭，当然也有白崇禧夫妇，并请我和李公馆稍露头面的人作陪。饭后，看了一场美国电影。我见南京情形很糟很复杂，和平空气很冷淡，过了两天就飞回香港。

我飞回香港大约是二月下旬，几天之后就看到孙科派的和谈代表团钟天心在省港各报发表的谈话，说对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有某些不能接受；又说，已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如何磋商。其实，对和平谈判八项条件，南京的顽固反动分子（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在内）都是反对的。钟天心发表的谈话，就是代表这些人的，中共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代表团进行和谈。过了几日，中共就授权香港《华商日报》发表声明，拒绝与这样的代表团和谈，并否认在香港有什么磋商。

孙科的内阁，当时以和平谈判为首要任务，所派代表团既被中共拒绝，而李宗仁又不愿意让他继续担任行政院长，立法院委员亦有责难。在内外交迫之下，孙不得不呈请辞职。李宗仁对继任人选，提不出人来，事实上仍不得不由退驻溪口的蒋介石作主。

三月十二日正式发表何应钦为行政院院长。何内阁成立后，和平谈判仍是首要的任务。于是派张治中为和谈首席代表，代表为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刘斐、李蒸等六人，以卢郁文为秘书长。此外有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作顾问，都由行政院

会议通过发表，所有代表还允许各带秘书一人。这次改派的代表，人们不难理解他们在南京各方面的代表性，六个代表向来多是主张和平的。李宗仁并发表宣言，愿意根据中共所提八项条件进行谈判，于是不再遭到中共的拒绝。

三月下旬，中共方面发表周恩来、叶剑英、李维汉等为代表①，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齐燕铭为秘书长（后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毛主席所提八项和平条件的基础上，定四月一日起在北平谈判，要南京代表如期北上。

我前因南京和平空气冷淡，想置身事外，飞往香港暂住，后李宗仁屡发电报促我回南京充当代表北上，我于三月二十九日才回到南京同他们见面②。在这期间，有些什么情况，我并不清楚。李宗仁对我说："一切都商议好了，不用你费心，只是同他们北上就是了。"我当时心想，要我当个糊涂代表，只好随同前往，成功与否，横直当个和谈代表没有什么亏可吃的。其实我早看透蒋介石想利用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来喘一口气，他那里会同意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呢！至于李宗仁，虽对八项条件发表了声明，又何尝是真正同意呢？不过想利用和谈讨价还价，骗取主张和平的虚名。至于白崇禧，早就把"汉曹不两立"的口气向我说过了。总之，和谈代表的主张，和南京政府的主张并不是一致的。

---

①见《张治中回忆录》第791页：中共正式发表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四月一日加派聂荣臻做代表）。

②见1949年3月30日广西日报：黄绍竑今（29）日抵京后，当即接见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通货膨胀时不能继续内战，因此，政府仍应人民之要求，早日获致和平。黄氏称：目前中国最困难的问题是整军问题，而且中国经济，已面临崩溃阶段，数百万士兵生活无法维持，即使有好的武器亦打不下去。又称：在和谈未开始前，不能表示悲观或乐观。

二、和平谈判代表团飞北平

代表团于四月一日上午乘专机由南京起飞，十一点到青岛，并在青岛机场着陆加油，午餐后，再行北飞，一个多钟头后就到达北平，专机在西苑机场着陆，中共方面派人来接。他们穿的服装都是一样，事后才知道其中有徐冰副部长和一些高级人员，但我一个也不认识。随后有个姓汪（王）的科长，出来引导乘坐汽车，一直来到旧日的六国饭店。入门时，看见一条“欢迎真和平代表”的标语，心里自然体会到如果是假和平代表，当然不受欢迎。次日，中共代表团设宴款待我们。

和谈开始时，先是个别交谈作为预备，然后正式谈判。我曾与林伯渠、叶剑英代表分别谈过一次话。其他代表与中共哪一位代表谈过几次话，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素有心脏间歇病，到北平后又复发了。有一天，我外出回来，适值六国饭店电梯停了，步行上到三楼（我住五楼）就上不去了，在楼梯上坐了好一会才上去。汪科长于当晚就把我送入北京医院。

使我终身不能忘记的是毛主席召见南京各个代表。同我们一起被召见的有刘斐，地点是在香山旧慈幼院。那里除毛主席外，还有朱总司令，并在那里同吃一顿午饭。

大凡南京代表，不论与中共代表分别交谈，或竭见毛主席，总不免要将南京方面的情况和对和平的意见阐述一番，希望和平谈判获得成功①。记得中央某代表问起李宗仁在南京有多少自己

---

①见《刘斐将军传略》第130页：黄绍竑在北平商谈时，填两首《好事近》词、表现作者希望和谈成功的心情。

其　一

翘首睇长天，人定淡烟笼碧。待晚一弦新月，欲问几时圆得。

的队伍，我回答说只有一个卫士队时，中共代表立即指出：“这是很危险的呀！万一蒋介石或其部下反对和平，岂不马上可以把李宗仁捆起来吗？”为此，我曾打电报给李宗仁，要他增强自己的实力。其实中共代表这个担心，就是暗中指出李宗仁的和平谈判是没有诚意的，即使李本人有诚意，最后也是不能作主的。

在双方代表个别交谈的期间，我曾拜访过民革的李济深，民建的黄炎培，民进的马叙伦，还有傅作义。这日，中共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设宴颐和园招待南京代表团全体游春。我因同以上那些先生早有预约不能赴宴。晚饭是在傅作义家里吃的。同座只有邓宝珊一人，彼此都是旧相知，无话不谈。我觉得北平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宽大的，而傅先生的贡献也是很大的。

四月十日②晚召开双方代表全体正式会议，我虽病在医院，也不得不出席。双方代表全体会议是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的。中共代表以周恩来为首由勤政殿东向进入会场。南京代表以张治中为首由勤政殿西向进入会场。会场情况是十分严肃的。首先由中共代表周恩来把拟好的和平条款向南京代表宣读一遍，然后把条款发给南京代表，希望我们回去加以讨论，再作答复。这个全体正式会议在不长的时间就结束了。南京代表团回到六国饭店，就由首席代表张治中召开会议，除代表参加外，所有的顾问和秘书都列

昨宵小睡梦江南，野火烧寒食。愿得一帆风送，报燕云消息。

其　二

北国正花开，已是江南花落。剩有墙边红杏，客里漫愁寂寞。

些时为着这冤家，误了寻春约。但祝东君仔细，莫任多飘泊。

②见《张治中回忆录》、《刘斐将军传略》、《李宗仁先生晚年》所载全体会议日期为4月13日。

席，把中共代表交给的和平条款加以研究①。全体一致认为和平条款的具体内容是与一月十四日中共毛主席所发表的和谈八项条件的内容是一致的。而李代总统又已发表声明承认那八项条件，则和平条款自然是可以接受的，但仍须派人请示南京。于是即席推举我同屈武顾问携带中共的和平条款，次日②专机飞南京请示。那时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了。

他们推举我带条款回南京，自然认为我是桂系中人，对李、白说得动。但这回的事适得其反，李、白的态度早就变了；即使未变，又何能作主，岂不是仍要溪口（指蒋）作最后决定。我心里明白，但又不好推辞。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知道我被推举回南京请示，乃于当晚二时左右在六国饭店召见我，勉励我努力完成这个任务。我说，照我看至多五十对五十的希望，或者还要少一些，我总努力去进行就是了。我回到北京医院已是夜里三点多钟了。我心脏间歇得更厉害，我请求派一个医生同到南京，以免在飞机上发生问题。次早八时，我同北京医院派去的赵大夫坐汽车到西苑飞机场。不料周恩来首席代表和其他代表都到机场送行，可见中共方面对达成和平谈判的诚意，因而益发增加我的责任感。周首席代表并释放

①据《刘斐将军传略》第128页：这个协定，内分八条二十四款。在这次正式会议以前的商谈过程中，南京代表团对此协定所提修改意见四十余处，半数以上已被采纳，但对于所谓“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两点则被否决。四月十五日举行第二次会议时，中共代表团提出了“最后修正案”，同时指出：谈判以四月二十日为期限，南京代表团需于二十日以前表示态度，并定四月二十日为签定日期。

②见《张治中回忆录》第843页，为十六日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白接受。

在山东莱芜战役被俘的桂军师长海竞强，同我乘机回南京。海竞强是白崇禧的亲戚和骨干，这是中共对被俘人员的宽大和对新桂系好感的表示，也希望海竞强回去做些有益于和平的工作。但我在机上一直没有同他（指海）谈话，到南京以后就没有再见他的面，不知他到南京与白崇禧见面之后说些什么。

三、南京破坏和平谈判的经过

飞机由北平起飞沿着津浦路直飞南京，四月十一日①下午两点多钟到了南京。我同顾问屈武一同回到傅厚岗李宗仁的公馆，派来的赵大夫住到首都饭店。当日下午四点多钟就在李公馆开了一个小型报告会，有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参加。我把北平会谈的情形作了概略报告②，并把和平条款的文件交给他们。他们听了我的报告和看了文件，大家都默然久之。何应钦说，这个重大文件要拿回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好答复，好在距离答复期限还有几天。我看当场情形不妙，不但何应钦、白崇禧的神色不好，就是李宗仁也默默无言。当晚我挂了一个北平的电话给南京首席代表张治中，报告抵达南京的情形，只是说和平条款还要由行政院开会研究讨论才能答复。

我在李宗仁公馆住了两日，他们对我都闭口不谈此事。我觉得无聊而心脏病又复发，就搬到中央医院去养病。不料中央医院

---

①同643页注②为16日。

②见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第76页：黄绍竑在会上说：吾人迫于形势，绝不能与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可以自保。还说：德公如同意签字，将来还可为联合政府副主席，广西部队因此可得到安全保障。

住满了伤兵，闹的乱糟糟的，于是又搬到鼓楼美国人医院。医生和护士知道我是和谈代表，刚由北平回来，大家东问西问，尤其是问共产党对北平的美国人怎样，和平前途怎样，弄得我很难答复。后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通知我，说次日行政院开秘密会议，要我去作报告，地点在军校国防部会议厅。我想，为什么隔这许多天才开会呢？当然他们避开我不知谈了多少次。何应钦必定带了和平条款飞溪口请示蒋作最后决定，飞回南京才召集开会的。

那次行政院的秘密会议是何应钦主持的。会议的形式是很奇怪的。作为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也列席了会议。吴铁城是以中央党部秘书长身份，由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已迁广州）飞来参加，可能已去溪口请示过蒋介石，也就是代表总裁的意见。阎锡山也也被邀请参加，因他是反共最力的，不久前才由太原飞逃出来住在南京。何应钦要他来参加，是想要他来作破坏和谈的楔子。参谋总长顾祝同也被邀参加。行政院除秘书长黄少谷之外，还有其他的几个部长。白崇禧没有参加，想是他早就决定要破裂，已飞回汉口去指挥部署了。这种会议形式，好似蒋未下野以前的最高党政军联席会议，但李代总统坐在一边旁听。其他各院院长也未到会，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何应钦讲了几句开场白之后，就要我作关于北平和平谈判的经过报告。我讲了大约一小时，最后我说："代表团的全体代表认为中共这个和平条款与一月十四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没有什么出入，李代总统以前也曾发表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所以全体代表认为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是可以接受的。

我报告之后，何应钦就请到会的人发表意见。吴铁城首先以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发言。他说：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的最高决策机关，中常会并未承认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他的话表面似为李宗仁开脱责任，而实际上也是责备李宗仁。他说：李代总统的声明，也只是说可以商谈，并不是完全承认。他指责代表团应随时请示中央，何能遽然认为可以完全承

认。他尤其指出废除宪法和法统那两项最要不得。他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法统是实行宪法的表征，如果都废除了，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呢！他说的话很长，无非是对一月十四日中共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根本的否定。黄少谷当然是代表行政院发言的。他把我带回的中共提出的和平条款，逐条分析驳斥，认为万不能接受。参谋总长顾祝同把前方情报，人民解放军的调动情形说了一番。照他的判断，人民解放军正在部署渡江攻击，中共和谈决无诚意。

何应钦最后问阎锡山有什么意见？阎锡山低声地说了几句。他说这个条款实质上是难以完全接受的，即使接受了，以后也很难解决问题。他短短几句话，好似楔子一样深深地打入反共人们的心坎中。

李宗仁坐在那里很为难，一句话也不说。他如反对和平条款，等于自食其言，因为他以前发表过声明，承认中共提出的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然而他内心却觉得那个和平条款于他既得的利益（指代理总统）是有矛盾的。当然，他还有更大的顾虑，如果表示赞成代表的意见，就要与党方（中国国民党）、军方发生冲突，很可能被拘禁或被哄下台，所以他坐在那里没有一句话支持代表的意见。

最后何应钦宣布，这个和平条款是不能接受的，由行政院作答复，也就是破坏和谈的答复。

散会已是十二点钟，就在那里吃了顿午饭。我同李宗仁回他的公馆，我挂了一个电话给首席代表张治中。张先生接到我的电话，问情形怎么样？我说详细情形不便在电话里谈，只说行政院今晚或明日就有书面声明答复，到时你就知道了。我还说，我今日下午就飞香港。他听了，停了一会就说：“呵，呵，呵。”当然他知道和谈是决裂了。

我打完电话对李宗仁说，我在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放我快些回香港①。他问参军长刘士毅有什么便机。刘说有两趟便机，

一是飞上海的客机，一是直飞广州的专机。我想，到上海要停一夜，那里特务太多，不知要出什么事，不如直飞广州，飞得快的话，当晚就可搭船到香港。于是我就叫车直奔明故宫飞机场，连北平同来的赵大夫也来不及妥为安顿就走了，真对不起。刘士毅给我送来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说是代表总统送的旅费。我笑笑，心想不知还值几块钱呢？

四、我由南京飞香港转赴北平

上了飞机，见吴铁城等坐在机舱前面的好位置上，我与他点点头，自己溜到机仓后面的位置上坐下，一声不响。

午后八点多钟，飞机才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自有广州当局许多人来接吴铁城。我是没人理睬的。广州市长欧阳驹见了我，问我在什么地方住？我说还没有一定住所。他说，就到他家里住。我到欧阳家里就倒在床上，要他请医生来看病，连他设的夜宴也不参加。广西驻粤代表来见我，我把一百五十万元金元券托他换港币。他说金元券今日下午已没有行市，当然市面上知道和平谈判已经破裂了。

晚上十点多钟，忽然国民党中央来电话通知，要我到中常会作报告。我答实在有病不能到会。不久副秘书长郑彦棻坐汽车来接，我仍以有病推辞。他说在粤各位中委（包括执监委）都希望季宽先生到会作报告，就是有病少讲几句也好。我见推辞不脱，只好硬着头皮去。在路上我想好了脱身的办法。迁粤中央党部在某路的四层楼上，没有电梯，我走了三楼，实在上不去了，坐在

---

①见1949年4月22日广西日报：政府和谈代表黄绍竑以身体不适，拟小作休憩，不愿作任何政治活动，渠已向李代总统及何院长提出辞呈，坚辞和谈代表职务并即转港一行。

楼梯上休息一会。以前孙中山先生的侍卫长马湘扶我继续走到四楼会议厅，孙科等都候在那里。我首先发言，说我实在有病不能作报告，好在吴秘书长（铁城）今日下午在南京始终参加了会议，一切情形他都知道，就请他作报告。我说完了这几句话就离席向他们告辞，安然回到欧阳家里，好似脱了一场大难。我托欧阳驹代买了飞机票次早即飞香港。

回到香港不几日，南京就解放了，不久上海也解放了。我只在报上知道李宗仁一时飞桂林，一时飞重庆，一时又飞广州。广州是国民党最初发源之地，也成为最后埋葬它的地方。如果李、白及早觉悟，尚可签字得到局部和平解决。我同李、白自小同学，相处数十年，知交最深，尤其最后的和平谈判的真正用意也知得最深，所以当初我就不愿充当代表。俗话说："不见棺材不流泪，他们是见了棺材也不流泪呵！我去作最后劝告有什么用呢？相反，即使他们没有害我的恶意，但蒋介石的特务仍布满各地，难道他们不会暗下毒手吗？所以我一直住在香港，不到内地来。

刘斐代表不久回到香港，后来去广州见李宗仁和白崇禧作最后的劝告，但是没有效果，只得仍回香港。我们就纠合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和其他人士，联合发表通电与蒋介石断绝关系①。在开会的时候，也有些蒋帮死硬分子来参加，如上海新闻报社社长程中行就是一个。我们是来者不拒，越多越好，不怕他们知道，也不怕他们捣乱，因为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统治范围。会后，蒋帮死硬分子有些在中途就退出了，有些列名通电后又不敢回国，如刘建绪、李默庵等就去巴西作富翁了，有些去台湾的仍为蒋帮效力。

---

①据张潜华《国民党立法委员香港起义》（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70辑）及1949年9月2日《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黄绍竑、贺耀祖、罗翼群、刘日斐、周一志、张潜华等六人在九龙窝打老道黄绍竑寓所举行港澳记者招待会，并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

上海解放后，中共驻港负责人调去上海，继任的负责人请我同刘斐到《华商日报》总经理的家里（似乎是姓邓）吃晚饭。他说周副主席（恩来）有电邀我同刘斐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征求我们两人的同意。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竟然实现了。我们两人欣然同意。

过不多日，中共驻港负责人通知我，说有船北上，要我在某地等候。我匆忙回家收拾行李，老婆问我到什么地方去？我说要坐船去北平。她说，你奔走大半年，还不够累的。刚刚回来不久，在家好好休息不好吗！她又说，和谈既已破裂，还有什么可奔走的呀！我说，这回去北平是应邀参加共产党召集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她听了默然不作声。

我到集合地点见了其他人，有的不认识，也有认识的（刘斐和黄祖培）。我们到一个小酒家吃午饭，受到嘱咐行动要秘密，预防台湾方面破坏阻挠。午饭后，坐一只小汽艇，驶到香港禁海（禁海是香港政府指定运载危险物品船只停泊的海面，周围挂了红旗），然后上一艘载重一千多吨的挂葡萄牙国旗的轮船。那艘船又驶往澳门办手续，在月色光芒下，就向汉城北驶了。那艘船在海关注册是开往汉城的，这是一种掩护计划，到山东半岛外就向西入青岛停泊。我们在青岛登陆，乘胶济路到济南转北平。

在船上我填了一首词《木兰花》，最后一联是："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这一面是写当晚海上的景色，一面是写我内心感谢中国共产党、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的关怀，宽宥我过去的一切罪恶，最后从深坑里把我救出来，回到人民的怀抱里。

附录一

关于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事先商定的谈判腹案

中共通知和谈地点与时间前，对于如何进行商谈，有过四次集会研究，都由何应钦主席。出席的除代表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外（黄绍竑在赴平前才赶到，刘斐在代表团启程赴平前才发表），翁文灏、彭昭贤、贺耀祖都参加，黄少谷也以行政院秘书长资格参加。

经过这几次研究后，决定：

（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改在南京开会（这时国民党已迁往广州）；

（二）为指导和谈进行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公推委员三人，共同组织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提八项做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一个腹案，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全文如下：

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

一、双方既确认以和平商谈解决国是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题。

二、同意重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的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号，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之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对外签订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惟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人士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即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商谈开始之前，就地停战，并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预定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可能让步之原则性的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以上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示核夺。

国防部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

做空军之侦察及空中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持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通信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见《张治中回忆录》第791页）

附录二

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

黄绍竑　贺耀祖　龙　云　罗翼群　刘　斐　刘建绪
李任仁　胡庶华　舒宗鎏　李　觉　周一志　李默庵
潘裕昆　覃异之　张潜华　湛小岑　李荐廷　朱惠清
黄　统　金绍先　高宗禹　陈汝舟　李宗理　杨玉清
唐鸿烈　麦朝枢　林式增　黄　翔　骆介子　毛健吾
祝　平　骆美轮　李　炯　朱　敬　瞿绥如　罗大凡
郭汉鸣　徐天深　刘绍武　王慧民　郭威白　黄　耀
彭觉之　杨德昭

孙中山先生所创造的中国国民党与三民主义及其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完全是适应世界思潮的正确发展与符合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之客观要求，他领导人民的力量，把满清专制政体推翻了，而他的思想与行动，仍一直不断的依据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向前进步，从不停滞。自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发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宣言，并倡导三大政策以后，更确立了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性，奠定了中国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把中国其他方面的革命力量汇合于中国国民党的革命力量之内，把中国革命联系于世界革命之中。他是要一次的彻底的摧毁国内封建与国际帝国主义两种势力，以结束中国数千年的旧历史，创造一个民族独立，国际合作，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现代化的新国家。中国国民党果能遵循他所指示的这一康庄大道，继续前进，必然会缩短中国革命过程，早日完成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

不幸，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近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高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于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高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于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改善，这是何等的讽刺，何等的荒谬！这一切反动政权之所以招致了今日这种政治腐烂，经济崩溃与军事惨败，实为其必然的结果。

由于中国国民党的被劫持，使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中，而且使全国人民的处境如水益深，如火益热，这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悲剧。但，人民所受的痛苦愈深切，人民革命的要求也就愈强烈，以此，中国共产党壮大了，新民主主义产生了，这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社会的本质没有变，人民革命的基本要求就不会变。毛泽东先生针对这一客观形势，倡导新民主主义，一面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一面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且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

进步的路上去。这正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所以获得了人民大众普遍支持，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如就革命过程分析，毛泽东先生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延续的发展与彻底的实施。

中国人民，在黑暗统治与长期战乱中，已经濒于死亡的边缘，要求革命，也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被反动派破坏了以后，在他们的军事力量已经居于优势的时候，仍于本年一月接受反动政权的和平建议，这可以看出他们对人民要求和平的重视。因此，破坏和平的责任者，实是妄想保持反动力量的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他们在破坏和平以后，为了极少数人既得利益的保持，仍图作最后的垂死的挣扎，并不惜进一步的疯狂的倒行逆施，置大多数人民的生命财产于不顾；轰炸城市，封锁海港，滥发银元券及捕杀和平民主人士教授学生等种种罪愆，无一不为人民为敌。尤其是蒋介石亲飞碧瑶南韩，卑贱地自沦于殖民地的行列，妄想成立太平洋同盟，以求苟延喘于帝国主义卵翼之下，更为可耻的罪行。

我们，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于反动集团，曾经不断予以评击。而对于其最近不顾人民利益的倒行逆施，更不能不表示坚决的反对与谴责！同时我们并愿郑重声明：自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劫持党权政权以后，一切反革命的责任，完全应由他们负担，与大多数被压迫被排挤的党员无关。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该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从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

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对于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党的新生。

我们深知道在各地，尤其是未解放区域内，一定有许多国民党同志具有这种同样的主张，我们希望大一家致起来蔚成普遍的共鸣，并参加这个划时代的伟大革命运动。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十三日

（见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五日《香港华商报》）

又：

8月25日，又有邓召荫等十一人发表了《我们响应黄绍竑等‘八、一三’声明》的书面讲话，决意参加这一立即与蒋介石党权政权决绝的政治运动。后来，还有王普涵等十三人也表示拥护黄绍竑等的政治主张。

黄绍竑年谱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

12月1日（农历10月15日） 黄绍竑（字季宽）出生于广西省容县黎村镇山咀村。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

是年 黄绍竑八岁，入黄氏家族办的珊萃学堂启蒙。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戊申）

是年 黄绍竑十三岁，随四兄黄天择（绍竦）赴桂林投考广西陆军小学堂。因陆小考期已过，遂考入桂林兑泽高等小学。

1910年（清宣统二年，庚戌）

春 黄绍竑投考广西陆军小学堂，被录取为第四期学生。

1911年（清宣统三年，辛亥）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

11月17日 广西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咨议局议长甘德蕃合议响应武昌起义，宣布广西独立。

12月初 黄绍竑参加广西当局组织的北伐军学生军敢死队，由广西开拔增援武昌，任班长。

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

年初 广西北伐军学生军抵武昌，不久奉命调南京。学生军解散，黄绍竑入南京入伍生队骑兵科；未几退学，到湖北都督府投依任参谋之族兄黄剑鸣。

秋 南京入伍生队迁至武昌改为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经黄剑鸣等人说情，黄绍竑得以复学。

1913年（中华民国2年）

是年 黄绍竑仍就读于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

1914年（中华民国3年）

是年 黄绍竑毕业于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奉命赴北京入伍（实习），分发到驻北苑之陆军第十师。

1915年（中华民国4年）

6月 黄绍竑入伍（实习）期满，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1916年（中华民国5年）

冬 黄绍竑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回籍省亲后，即到省会南宁入广西陆军第一师充见习军官。

1917年（中华民国6年）

是年 广西陆军当局建陆军模范营，黄绍竑任该营之第三连

连附。

10月24日 模范营随“两广护法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开赴湖南。驻永州时，模范营增设机枪队，调黄绍竑任队附。不久，三、四连移驻祁阳，黄绍竑仍回三连任连附。

1918年（中华民国7年）

3月25日 谭浩明退出长沙。桂军向湘桂边界退却，卫队第一营（模范营改称）驻黄姑岭。四、五月间，黄绍竑升任卫队第一营第三连连长。

1919年（中华民国8年）

5月 黄绍竑随卫队一营回桂林、南宁。不久，卫队一营奉命进剿左江流域同正、扶南、左县、崇善、绥渌等县的土匪。

冬 卫队一营编入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二团，马晓军为团长，开赴柳州驻防训练。

1920年（中华民国9年）

夏 黄绍竑所在部队开赴广东肇庆接替林虎部防务。秋，部队奉命调广州东郊警戒，半月后复退回肇庆。年底，又随部队调驻百色。

1921年（中华民国10年）

7月28日 孙中山任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

8月 马君武任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马晓军以原部及由南宁退来之部队改编为三个营。黄绍竑升任第一营营长，奉命率

本营往东兰进剿陆荣廷、谭浩明旧部。

冬 陆、谭旧部刘日福将驻百色的马晓军部包围缴械，黄绍竑被俘，后经烟帮头子疏通得释。逃出百色城后，黄绍竑在黄兰附近获凌云、西林两县豪绅支持，又组织一支队伍，在凌云、百色一带活动。

1922年（中华民国11年）

春 粤军占百色。马君武改委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军司令，调驻平马。黄绍竑任第一统领。

4月 陈炯明为阻止孙中山北伐，撤回入桂粤军，广西各地"自治军"蜂起。马君武调马晓军部回守南宁，黄绍竑亦率所部自平马沿江而下。抵南宁郊区西乡塘，黄绍竑陪马晓军入城见刘震寰，见南宁将不守，便率所部渡邕江往灵山撤退，不久抵玉林与李宗仁部会合。李宗仁任黄绍竑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第三支队司令，分驻容县、岑溪两县整训、剿匪。

1923年（中华民国12年）

2月16日 黄绍竑派支队参谋陈雄赴广州与白崇禧（时在广州治疗腿伤）商量投向孙中山参加革命事宜。

2月 黄绍竑到玉林与李宗仁密商伪受沈鸿英桂军第八旅旅长名义。

5月 白崇禧、陈雄经廖仲恺介绍谒见孙中山。孙中山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第一军军长"（后改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并应允予以军事协助和弹药接济。

6月 黄绍竑于梧州戎圩，将沈鸿英部旅长黄炳勋部包围缴械，正式打出"广西讨贼军"旗帜。

7月18日 粤军第一师、第三师进入梧州与黄绍竑部会合。

19日，孙中山特派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兼梧州善后处处长（不久改为西江善后督办）。

7月27（28）日 黄绍竑以饯别粤军将领回师东征为名，于花舫宴席中将原沈鸿英部旅长冯葆初拘捕，并将冯部全部缴械。

8月初 粤军第一师和其他入桂部队奉命赴东江参加讨伐陈炯明，留广东江防舰队驻梧州协防。黄绍竑正式成立“广西讨贼军总指挥部”，自任总指挥，以白崇禧为参谋长。

8月 黄绍竑在粤军海军配合下，攻占由自治军控制的藤县，自治军卢得洋旅被歼，黄超武部投降，改编为第四团。

8月—10月 （1）黄绍竑派伍廷飏为代表与李宗仁商量今后合作问题。李宗仁改称所部为“定桂军”，自任总指挥，并派参谋张任民及钟祖培到梧共商作战计划。旋即“定桂”“讨贼”两军互相配合，攻下了平南、贵县、桂平等县，消灭自治军陆云高部，拥有了广西最富庶的梧州、浔州、玉林府属。（2）黄绍竑到广州谒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报告讨贼经过，请示工作方针和请求补充接济。孙中山勉励黄绍竑学习“革命主义”，并送《三民主义浅说》、《知难行易学说》二书，指示廖仲恺拨给黄绍竑经费二万元（毫洋）和二万发子弹。

1924年（中华民国13年）

1月30日 曹锟特派陆荣廷暂署督理广西善后事宜。

2月26日 陆荣廷派部将韩彩凤进攻梧州。黄绍竑奉孙中山之命调兵堵截。

3月30日 黄绍竑、李济深等部在都城将桂军刘玉山部陈天泰之第三师包围缴械，陈天泰被俘。

4月2日 孙中山命黄绍竑、李济深回驻原防并悉数交还桂军枪枝，释放陈天泰等人。

6月11日　黄绍竑"讨贼军"二千余人由梧州赴贵县，会合李宗仁之"定桂军"进攻南宁。

6月24日　黄绍竑之"讨贼军"与李宗仁之"定桂军"联合攻下南宁。

7月12日　黄绍竑、李宗仁通电推广西省议长张一气为广西临时省长。16日，张一气就职。

7月16日　"定桂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在南宁成立，李宗仁任总指挥，黄绍竑为副总指挥，白崇禧为总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总司令部成立后即制定"联沈讨陆"、"先（灭）陆后（灭）沈"为统一广西的策略。

7月22日　"定桂讨贼联军"分兵三路：右路军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联合沈鸿英军进攻柳州，8月11日占领柳州；中路军由俞作柏指挥肃清右江之敌；左路军由胡宗铎指挥溯左江而上直捣龙州。至8月底，"定桂讨贼联军"已占领广西全境的三分之二。

10月9日　陆荣廷在全州湘山寺通电下野。

10月23—29日　李宗仁、黄绍竑、沈鸿英在浔州（今桂平）开全省善后会议。

11月5日　孙中山特任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为拒绝刘震寰长桂，李宗仁、黄绍竑于11日自任广西军务善后督办，会办，并由黄绍竑赴广州与大本营商议。

11月23日　黄绍竑到达广州，住东亚饭店，夜间遭陈天泰派人袭击，黄与陈济棠由先施公司工人宿舍逃脱。

11月24日　孙中山特任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处督办，黄绍竑为会办。

11月26日　黄绍竑在广州之中央党部礼堂宣誓加入中国国民党，介绍人为廖仲恺、许崇智，监誓人为胡汉民。

12月1日　李宗仁、黄绍竑在南宁就任广西绥靖督办、会办职务。

1925年（中华民国14年）

1月3日 沈鸿英以四师之兵力分三路进攻柳州、桂平、梧州。李宗仁、黄绍竑电请李济深派得力部队支援，李济深派陈济棠旅为援军。

1月10日 沈鸿英致电李宗仁、李济深，谓此次行动“讨伐目标在黄绍竑，余皆袍泽，断不侵犯，前线请撤二十里，免致误会。”

1月 黄绍竑由梧州到南宁与李宗仁商议应付云南唐继尧假道桂境入粤就副元帅职的对策。

1月29日 黄绍竑和李宗仁，白崇禧于桂平会议，制定以速战速决解决沈鸿英的战略计划。

2月4日 黄绍竑部占领蒙山，次日占领荔浦，7日三路围攻柳州。沈鸿英部放弃柳州向桂林撤退，黄绍竑部占柳州。

2月14日 桂粤联军占领桂林。沈军将领邓右文通电宣布脱离沈鸿英，李宗仁、黄绍竑委其为第一师师长。

2月18日 桂粤联军李宗仁、黄绍竑部进占全州，沈鸿英残部逃向湘粤边境。沈鸿英由长沙转道上海赴香港。

3月2日 李济深、黄绍竑在梧州联衔发布讨唐继尧布告。为阻止唐继尧东下，桂粤联军连日在横县、贵县、桂平布置三道防线。

5月9日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范石生等人联名通电声讨唐继尧。

5月15日 黄绍竑、范石生部合围南宁并发起总攻击，唐军龙云部闭城待援。

6月4—5日 黄绍竑于柳州附近之沙浦以中央突破战术击败唐继虞部。唐继虞部受重创后向西沿黔桂边境撤回云南。

7月7日 龙云部放弃南宁，沿左江逃回云南。8日，桂军

收复南宁。22日，唐继尧之滇军全部退入滇境，广西形成统一的局面。

8月6日 国民政府明令裁撤广西总司令暨省长，令李宗仁、黄绍竑暂以广西全省绥靖处名义办理全省军政、民政、财政。

8月上旬 李济深到南宁与李宗仁、黄绍竑商议广西协同出兵解决广东南路邓本殷、申葆藩部问题，并商议两广统一，广西按国民政府颁布法令组织省政府及建立广西省党部等问题。

9月15日 黄绍竑就任“广西民政长”职，主持广西政务，并分别任命内务、财政、教育、建设四厅厅长。

9月29日 黄绍竑发表《训令》，谓省局底定，亟应力谋恢复广西银行，以利金融；同时任命黄钟岳为广西省银行南宁分行行长。

10月12日 汪精卫、谭延闿到梧州晤李宗仁和黄绍竑，讨论两广统一等问题。

是年 国民党中央指派黄绍竑、李宗仁为党务特派员，负责指导广西的党务工作。

1926年（中华民国15年）

1月7日 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县农民武装攻破县城。黄绍竑令旅长刘日福、团长龚寿仪和县长黄守先带兵镇压。

1月16日 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月27日 汪精卫、谭延闿、甘乃光在梧州与李宗仁、黄绍竑及湖南、贵州、云南代表会谈，议决：一、到会各省服从国民政府指挥；二、实行党治；三、预备北伐；四、与冯玉祥等国民军合作。是日，梧州各界六万余人在东学寺开欢迎会，汪精卫、黄绍竑先后演说。

1月　中国国民党广西省代表大会召开，黄绍竑当选为广西省党部第一届执行委员，兼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2月1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推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

2月19日　国民政府召开统一两广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两广军政、民政、财政统一事宜，并核定广西军队改编训练方案。特委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白崇禧六人组成。

3月初　黄绍竑赴广州参加两广统一会议。

3月12日　黄绍竑出席广州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会，并作关于统一广西的报告。

3月19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两广统一案"：广西省政府接受国民政府之命令，处理全省政务；广西军队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两广之财政机关及财政计划均受国民政府财政部之指导监督。

3月24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李宗仁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以黄绍竑为党代表。

5月　广西省银行成立并开业。

6月1日　广西省政府成立，黄绍竑任省政府主席、省务会议主席兼财政厅厅长。

6月18日　李宗仁、黄绍竑在南宁开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任俞作柏为校长。

7月6日　李宗仁率第七军部分参加北伐，黄绍竑留守广西，以"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名义统率第七军后方部队，并防云南唐继尧乘虚入境。

秋　黄绍竑因病到广州治疗，住珠江颐养园，晤国民政府的苏联总顾问鲍罗廷。

是年　黄绍竑将缉获的七十万两"私土"（鸦片）作价七十万元（毫洋），拨给广西银行作经费。

1927年（中华民国16年）

2月 国民政府将广西省务会议改组为委员制，任命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为委员，黄绍竑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兼军事厅厅长。

3月10—11日 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选黄绍竑任国民政府委员。

3月15日 国民党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下旬，选举黄绍竑等十一人为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黄蓟等五人为监察委员。

4月2日 黄绍竑与李济深应蒋介石电召到达上海。是日下午七时与李宗仁、李济深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秘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清党反共，建都南京等主张，吴稚晖提出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会议决定通知军警机关对197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实行“看管监视”。

4月5日 黄绍竑参加蒋介石在上海市政府开的秘密谈话会，由在沪的国民党中监委委员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请中执委和蒋介石及地方国民党军事当局作“非常紧急处置”，实行反共和驱逐苏联顾问。

4月9（8）日 黄绍竑由上海电广西黄旭初，指示广西“清党”事宜，并命令部队进攻东兰县城。

4月9日 黄绍竑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吴稚晖等联名通电“护党救国”。

4月16—17日 黄绍竑应蒋介石之邀同车到南京，旋赴芜湖第七军处理“清党”事宜。

4月29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组广州分会，任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竑等13人为委员。

5月28日 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任黄绍竑等人为

"广西省清党委员会"委员。

6月20日 黄绍竑参加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李宗仁等人召开的徐州会议。

7月6日 南京国民政府特任黄绍竑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8月10日 李济深、黄绍竑联名通电，分别就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及代理总指挥职，宣布进军湘、赣"讨赤"（指南昌起义后南下的部队）。

9月8日 黄绍竑抵广东韶关，以第八路军代总指挥名义指挥各军入赣堵截南昌起义南下的叶挺、贺龙部队。

9月16日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改组国民政府，任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

9月17日 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留守广西后方之第三师改编为第十五军，黄绍竑任军长。

10月3日 黄绍竑抵广东汕头召集军事会议，布置薛岳部继续向澄海、揭阳追击南昌起义部队。

10月11日 广州政治分会拒绝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取销该分会的命令，并决定在该分会下设临时军事委员会。18日，临时军事委员会成立，任李济深为主席，任黄绍竑为副总参谋长。

10月中旬 黄绍竑将所部调回广西，东江防务交由张发奎之第二方面军接替。

10月31日 黄绍竑决定由桂入湘讨伐唐生智。11月6日，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委会决议派黄绍竑为北路总指挥，率师讨伐唐生智。

11月上旬 黄绍竑到柳州一带巡视，接汪精卫署名电报，谓有要事商量，希黄即到广州面谈。

11月14日 李济深因与汪精卫赴沪出席国民党中央执委全会预备会，将所任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及临时军委会主席的职务，交黄绍竑来穗代理。

11月16日 黄绍竑抵广州并往葵园访汪精卫。是日晚，张发

奎派兵包围黄绍竑住所。黄因事先得冯祝万的通知而逃脱。17日，张发奎将李济深、黄绍竑驻广州的部队包围缴械，黄绍竑化妆逃往香港。21日，黄绍竑由香港经越南回到梧州，策划进攻广州。

11月18日 张发奎以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的名义通缉黄绍竑；29日，广州政治分会通过决议，遣责“新桂系军阀”在广东乱政和危害国民党，表示要解除李济深的一切军事职务，“推翻和惩办”白崇禧、李宗仁和黄绍竑。

12月11日 中共广东省委领导革命群众举行广州起义，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13日，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令李济深率黄绍竑等部迅即“讨伐”广州共产党。

12月29日 黄绍竑部由西江进入广州。30日，黄绍竑抵广州。

是年冬 黄绍竑因广西子弟负笈省外大学攻读，每所不便，于是筹设省立广西大学，聘请马君武、盘珠祁、雷沛鸿、邓植仪等为筹备委员，自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于梧州蝴蝶山建筑校舍。

是年底 英国驻广州总领事在广州葵园公馆拜会黄绍竑，表示愿将梧州领事馆交还中国，但要广西省政府贴回建筑费用25000元港币。

1928年（中华民国17年）

1月1日 国民政府决定，在李济深未返粤前，由黄绍竑维持广州秩序。4日，李济深抵广州复职，黄绍竑下令裁撤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并亲往惠州督师追击张发奎部。

1月15日 黄绍竑率部大败张发奎第四军（时由缪培南掌握）于河源的潭下圩，第四军撤往赣南。

1月28日 李济深、黄绍竑派冯祝万到香港致函胡汉民，征

询胡关于军事、政治、党国的意见。

2月1日 黄绍竑在汕头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所部入赣追击第四军。

2月3日 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决议递补黄绍竑为中央监察委员。

3月9日 李济深、黄绍竑等联名发表时局宣言。

3月28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任命李济深、戴季陶、黄绍竑等人为广州政治分会委员。

3月3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黄绍竑等9人为广西党务指导委员。

8月2日 英国驻广州领事毕礼敦到梧州拜访黄绍竑，询问广西省政府对改订中英新商约的意见。

9月24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补黄绍竑等17人为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12月4日 国民政府特任黄绍竑为两粤赈灾委员会委员。

12月5日 黄绍竑到广州参加李济深召集的"缩军"会议。

1929年（中华民国18年）

1月1—25日 国军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因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派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而削弱他人，会议无结果而散。

2月19日 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时在南京）改组湖南省政府，以亲桂系的何键代亲蒋介石的鲁涤平为省政府主席。为免遭蒋介石迫害，李宗仁于21日化妆离南京到上海躲藏。

3月7日 国民党中常会会议圈定黄绍竑等9人为广西省党部执行委员。

3月15日 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开幕，广

西、湖北两省代表均未出席。

3月17日 白崇禧由天津唐沽口乘日轮取道香港回广西。（一说白是3月6日夜间离北平赴唐山，然后辗转回广西的。）

3月19日 李宗仁密电黄绍竑，谓“时局紧急，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希黄急速动员兵力。

3月21日 蒋介石软禁李济深于南京汤山。是日，黄绍竑于广州召集第八路军将领讨论应付时局及布防问题。会议决定下动员令，并推黄绍竑为第八路军代总指挥。

3月23日 李宗仁抵广州。25日，李宗仁、黄绍竑由粤返桂策划军事，27日抵南宁。

3月26日 国民政府下令讨伐新桂系，免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各职；任黄绍竑为中央区广西部队编遣特派员。

4月1日 桂系将领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将桂军改称“靖难军”，决定全力救武汉，以白崇禧为总指挥。

4月7—22日 黄绍竑先后收到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等人联名发电或信函，呼吁黄绍竑等人“服从中央”。

4月底 蒋介石电令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等递解中央；不准收留由武汉退回部队；广西境内军队改编为两个师，其余解交中央。上述三事遵办后，得任两广编遣副主任。

5月4日 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黄绍竑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各部队编遣特派员职务。

5月5日 李宗仁通电组织“护党讨贼军”，斥蒋介石为党贼，声称只驱逐蒋氏一人。李自任“护党讨贼军”南路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同日，陈济棠就任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职，发表《讨逆宣言》。两广分成反蒋与拥蒋两派，爆发粤桂战争。21日，桂军于广东花县白泥、国泰等地被粤军击败，全线溃退。

6月12日 国民政府令：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部队编遣特派员。

6月17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决开除黄绍竑党籍，交

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执行。

6月20日 黄绍竑由南宁赴龙州，通电因事离邕，由粟威和郑承典暂代省府及军部事务。24日，黄绍竑、白崇禧出镇南关由越南转赴香港。

8月13日 国民政府下令通缉黄绍竑。

8月底 黄绍竑派张任民由香港回广西柳州活动旧部梁朝玑、杨腾辉反俞作柏。

9月17日 第四师师长张发奎解除蒋介石派往宜昌接防之曹万顺部武装，通电反蒋，要求汪精卫回国主政。27日，俞作柏、李明瑞等通电响应张发奎，宣布独立。俞作柏在南宁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率部与粤军陈济棠部作战。

10月2日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免俞作柏广西省政府主席职，由吕焕炎继任。同日，国民政府电令陈济棠、吕焕炎率部讨伐俞作柏、李明瑞。

10月初 黄绍竑由香港回到容县，中旬到宾阳与梁朝玑、杨腾辉等人会议，决定乘机东山再起。会后，黄绍竑与张任民等到梧州筹措经费。

11月 黄绍竑等人重组护党救国军。李宗仁为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上旬，李宗仁、黄绍竑就任国民党改组派中央委任的护党救国军第八路总司令、副总司令职。

11月17日 李宗仁、黄绍竑与张发奎共同发出反蒋通电。

12月9日 桂、张联军分兵三路进军广州，黄绍竑任右路指挥。12日前后，联军在花县与陈铭枢、陈济棠部激战数日，战败退回广西。

12月11日 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

1930年（中华民国19年）

1月 桂、张联军退回广西，集结于平乐、荔浦一带，梧州被粤军占领。下旬，黄绍竑由南宁到北流亲自指挥北流战役，为粤军及吕焕炎部大败。

2月1日 龙州起义成功，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

2月15日 黄绍竑与李宗仁、张发奎、白崇禧致电阎锡山，“望以武装迫其（指蒋介石——编者）引退，和平初衷，始能确保；南部义师，当为公继。”

2月21日 黄绍竑与李宗仁、张发奎等人通电请蒋介石下野，以谢国人；并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3月14日 黄绍竑列名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等57人通电。通电历数蒋介石指派圈定国民党三全大会代表，增加新不平等条约，托编遣之名厚殖一己之实力等十端罪状，劝蒋介石自省引退。15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53人通电讨蒋，并加推李宗仁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3月 黄绍竑兼任广西剿共总指挥，采用分区“围剿”办法加紧进攻红七军、红八军。

4月1日 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广西军队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李宗仁兼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兼第三路指挥官。

4月11日 李宗仁、张发奎等人商议，以为局蹙于广西一省终非善策，决定北进与中原之冯玉祥、阎锡山联成一片。

4月 广西民团总指挥部成立，黄绍竑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副总指挥。

5月 黄绍竑率部进攻右江革命根据地。李宗仁等挥师入

湘，李宗仁要黄绍竑放弃对红七军、红八军的进攻，率部为后续北上。

5月28日　桂、张联军攻下衡阳。6月3日占领长沙，8日占领岳阳。

6月9日　蒋光鼐、蔡廷锴部攻占衡阳。时黄绍竑部前锋在零陵，黄急电长沙李宗仁回师破敌。

6月27日　桂、张联军回师在衡阳激战两昼夜后失利，放弃北进计划，退回广西境内。

7月13日　国民党改组派、西山派于北平召开中央扩大会议，黄绍竑列名于是日发表的《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宣言》。

8月21日　黄绍竑"决心退出内战的漩涡"，在桂林发出"马电"，辞去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职；又另电蒋介石呼吁"和平息事"。

11月3日　黄绍竑派出商谈和平条件的代表在梧州与陈济棠会晤后，抵达广州晤古应芬。

11月8日　古应芬电请国民党中央予黄绍竑以广西善后督办名义。

12月1日　黄绍竑即将赴香港，李宗仁等于南宁设宴饯别并祝其37岁生日。次日，黄绍竑取经道龙州越南赴香港。

12月7日　李宗仁等电古应芬、陈济棠、陈铭枢提出解决桂局的初步条件：(一)中央给黄绍竑主持广西军政名义；(二)从新指定张、桂联军集中地点。古应芬、陈济棠等转电南京请示，南京复电谓以上述二事决定之后，李、白、张即须出洋，第二步由黄绍竑与粤方接洽。

12月21日　黄绍竑在香港晤古应芬。时古应芬已被委为接洽广西和平全权代表。

12月23日　黄绍竑的代表伍廷飏奉蒋介石电赴庐山面商桂局和平后，于是日由上海赴香港迎黄绍竑进南京。

1931年（中华民国20年）

1月20日 黄绍竑离香港赴南京。行前，黄绍竑托人告陈济棠等人：本人及桂省各将领均愿和平，现已停止军事行动。又另致函陈济棠、陈铭枢，请恢复广西水陆交通，停止轰炸南宁、柳州，缩小警戒范围等。

1月30日 黄绍竑与蒋介石、陈济棠，何应钦等共商广西善后问题。

1月 黄绍竑到京后，有人多次在其旅馆门前贴标语，说黄是“破坏统一的祸首”，“实行苦肉计”，“实行缓兵计”，要求中央惩办。后经由警察弹压才告平息。

2月14日 国民政府特派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伍廷飏为会办。

3月19日 黄绍竑到达广州晤陈济棠、陈铭枢商谈广西善后事宜。

4月21日 黄绍竑的代表陈适向蒋介石报告广西情况及黄绍竑拟编遣广西军队的计划，请求蒋介石拨给经费。蒋允诺，并要黄绍竑速就督办职。

5月27日 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宣布要推倒蒋介石独裁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并决议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6月9日，广州“国民政府”任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

6月 李宗仁、白崇禧到广州开会，复往香港看黄绍竑并邀一同返桂。返桂后，李宗仁要黄绍竑任广西经济督办，黄坚辞，复回香港居住，再往菲律宾考察。

10月19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恢复党籍案”。黄绍竑得恢复国民党党籍。

11月12—23日 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

会，黄绍竑当选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12月30日　黄绍竑与胡汉民、孙科、冯玉祥、李济深等24人联名在《申报》刊登《为发起筹备邓演达同志追悼会启事》。

1932年（中华民国21年）

2月18日　黄绍竑任国民政府委员。

2月21日　黄绍竑致电白崇禧转全桂将领，促桂军援沪抗战。

3月10日　黄绍竑、白崇禧离邕到粤商量两广联合抗日、"剿共"问题。

4月24日　黄绍竑到达南京并向蒋介石报告粤赣联合防共事。

5月3日　国民政府特任黄绍竑为内政部部长。

6月15日　黄绍竑在庐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鄂、豫、皖、赣、湘五省"清剿"会议，商议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计划。

7月1日　行政院准交通部部长陈铭枢休养假三个月，由黄绍竑兼代交通部部长。

7月23日　代交通部部长黄绍竑发表宣言，谴责日本指使叛逆攫夺邮政，业务不能执行，被迫封锁东北邮务，以致影响公众交通，一切责任应由日政府负之。同日，交通部令邮政总局封锁东北各邮务，邮件、兑汇均停寄发。

7月27日　蒋介石派飞机到南京接汪精卫、宋子文、黄绍竑等人到汉口，共商财政、封锁东北海关及废两改元等问题。

9月12日　黄绍竑与李宗仁由香港抵广州与陈济棠、邓泽如、萧佛成讨论时局。

9月28日　黄绍竑奉蒋介石之命赴莫干山探视养病的汪精卫，并商要政。

11月27日　黄绍竑与李济深电邀两广中委陈济棠、李宗仁、

白崇禧等人出席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

1933年（中华民国22年）

1月2日 黄绍竑奉国民党中央派遣赴广州，向西南政务会传达“安内攘外”的方针，动员两广出兵江西“剿共”。

1月21日 黄绍竑奉蒋介石命再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等举行会商，决定两广抗日、反共双管齐下：抽部分兵力北上抗日，粤、桂、闽三省增兵入赣“剿共”。

2月23日 黄绍竑到南昌向蒋介石报告西南之行的经过。

3月3日 蒋介石派黄绍竑、何应钦、李烈钧赴北平应付华北局势。5日抵北平，黄绍竑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团参谋长职。

3月28日 黄绍竑往石家庄访冯玉祥，促冯玉祥赴南京晤蒋介石。4月4日，黄绍竑携冯玉祥抗日办法十二条函返南京向蒋介石复命。

4月11—14日 黄绍竑在南昌参加蒋介石召开的赣、豫、陕、苏、浙、皖、鄂七省治安会议。

5月4日 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黄绍竑为委员。

5月25日 北平当局派黄绍竑赴庐山向蒋介石报告与日方商谈停战情况及条件。黄27日抵庐山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

6月16日 黄绍竑、李烈钧受国民党中央派遣抵香港向西南当局解释华北停战，促西南当局一致“剿共”，分别晤胡汉民、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留港期间，黄绍竑与李济深、陈铭枢秘密组织“农工生产党”，并为该党起草“纲领”。

7月20日 黄绍竑赴庐山参加蒋介石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会议策划了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及镇压长城抗日同盟军等措施。

9月1日 国民政府令组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派宋子文、

黄绍竑等9人为常务委员。

10月12日 国民政府派黄绍竑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

10月17日 国民政府令派黄绍竑巡视内蒙各盟旗。20日，黄绍竑一行离南京赴内蒙视察。

10月29日 黄绍竑一行抵归绥，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商议内蒙自治问题。

11月10日 黄绍竑一行在装甲车队卫护下由归绥到达百灵庙，受到内蒙云王（云栋旺楚克）、德王（德穆楚克栋普鲁）及其他王公代表以上宾礼节招待。

11月12—18日 黄绍竑与云王、德王等会谈内蒙自治方案。16日谈判曾濒破裂。后经云王挽班禅出面疏通，黄绍竑才允以自治办法十一条转呈中央鉴核。

12月16日 黄绍竑回到南京，向汪精卫报告赴内蒙经过。29日，黄绍竑向行政院呈交内蒙问题报告书及建议大纲。

1934年（中华民国23年）

1月19日 内蒙云王、德王电黄绍竑，质问何故改变所商定的自治办法，要求促请国民党中央照原案通过。

3月13日 行政院改组北平故宫博物院，聘黄绍竑任理事。4月4日，第一次理事会举黄绍竑为常务理事。

7月14日 黄绍竑和白崇禧在香港晤胡汉民，共商时局。

10月1日 中国红十字会召开第一次监理事会，举黄绍竑为名誉副会长。

10月3日 第九届远东热带国际医学会在南京开会。孔祥熙、黄绍竑为大会正副会长。会议对防止远东霍乱、鼠疫、虐疾等流行病作出了重要决议。

10月8日 蒋介石在庐山召见黄绍竑，要黄绍竑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表示同意。

12月7日 国民政府准免黄绍竑内政部部长职。10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浙江省政府，任黄绍竑为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

12月21日 黄绍竑抵杭州就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兼民政厅长）。

12月 因浙江省库入不敷出，收入仅1500万元，而支出达1900万元，黄绍竑到任伊始，即呈中央核准发行赈灾公债。

1935年（中华民国24年）

1月1日 黄绍竑在杭州宣誓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蒋介石亲到杭州监誓，并宣布今年为“新生活运动年”。

3月 黄绍竑到兰溪视察，值红军正由遂昌、龙游进逼汤溪、武义，急调随行卫队前往参加堵截。

春 黄绍竑在浙江推行人民义务劳动运动，亲自参加公务员劳动服务队，将杭州市内的运司河填平，辟为“劳动路”。

4月 黄绍竑呈请国民党中央停办自治，办理保甲。

4月 黄绍竑指定永嘉、金华等51县为试行征兵区，并成立金严、温处两师管区及金华等八个团管区。

5月 黄绍竑呈准国民政府发行地方公债2000万元。

上旬 黄绍竑陪同何应钦等巡视浙江海防，至乍浦水场检阅驻军。

国民党中央政府拨款100万元，浙江省政府自筹150万元，建筑苏浙国防工程。

6月14日 黄绍竑到金华及杭江（浙赣）铁路沿线视察，其所率领的士官教育团一个中队及一个分队为红军所歼灭。

6月28日 黄绍竑、张群等在南京晤汪精卫商讨对日外交及政局；30日，推黄绍竑入川向蒋介石报告情况。

7月12日 黄绍竑和驻日大使蒋作宾飞成都向蒋介石请示汪

精卫辞职及缔结中日航空协定等事。

8月7日 黄绍竑由沪赴粤疏解南京与西南政务当局的隔阂。12日抵广州晤陈济棠，谈南京与广东的合作。13日赴桂，15日抵南宁晤李宗仁、白崇禧。30日黄绍竑回到上海，对记者称："西南对于时局无特殊意见，唯盼与中央共谋解决办法。"

9月4日 黄绍竑由上海飞往成都，向蒋介石报告粤桂行的情形。

9月14日 黄绍竑到南京向汪精卫报告赴川见蒋的经过。

10月 浙赣铁路南昌至杭州全线通车，黄绍竑率浙江省党政绅商往南昌访问。

11月23日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黄绍竑当选监察委员。

12月7日 黄绍竑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是年 黄绍竑在浙江实施战时动员准备工作，实行国民军事训练，举办"省会公务人员训练团"，自任团长；又在全省实行壮丁训练及义务警察训练。10月10日，对已受训的公务员和壮丁、义务警察进行检阅。冬，又举行防空演习及水陆运输演习。

1936年（中华民国25年）

2月28日 黄绍竑辞去浙江省民政厅厅长兼职，由徐青甫继任。

6月1日 广东、广西当局发动"六一运动"，李宗仁、陈济棠以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局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发出通电，要求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全国抗日。

6月5日 黄绍竑到南京见蒋介石。7日，去沪晤陈济棠代表杨德昭。8日复回南京，并拟近期返桂省亲，调停中央与西南

方面的纠纷。

7月18日 李宗仁、白崇禧分别致电黄绍竑等人，表示广西抗日主张不变，如中央真抗日，广西竭诚拥护，盼将此意转达。

7月25日 国民政府特派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广西善后。26日黄绍竑抵庐山见蒋介石，坚辞广西绥靖主任职。

8月7日 李宗仁、白崇禧电蒋介石请派黄绍竑来桂谈判。

8月14日 黄绍竑抵香港同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张任民晤谈；16日抵广州，即分别与蒋介石、余汉谋等商议解决办法，又与李、白的代表李品仙磋商。19日，蒋介石在广州又同黄绍竑等商议处置桂局的新办法。

8月20日 黄绍竑之代表舒宗鎏、程潜之代表唐星、陈诚之代表邓世增赴南宁重申南京谋和诚意。

9月6日 国民政府免黄绍竑广西绥靖主任职，重新任命为浙江省政府主席。

9月13日 黄绍竑和程潜由广州飞南宁商谈桂局整理。

9月17日 黄绍竑和李宗仁等飞抵广州，与蒋介石商讨桂局善后办法。

12月1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任命黄绍竑为湖北省政府主席。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13日，何应钦邀黄绍竑到南京晤谈赴晋与阎锡山商救蒋介石事。14日（一作21日）黄绍竑抵太原晤阎锡山，请阎锡山电张学良、杨虎城解救蒋介石。

12月23日 国民政府令免黄绍竑浙江全省保安司令职。

1937年（中华民国26年）

1月16日 黄绍竑就湖北省政府主席职。20日，兼任湖北省保安司令。

3月22日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往广州祭扫黄花岗烈士墓，途经武汉，黄绍竑组织盛大迎送仪式。

6月20日 黄绍竑到庐山任暑期训练团第二总队队长。

7月16日 黄绍竑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会后，黄绍竑返武汉筹建信阳、田家镇、黄石岗国防工事。

8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于军委会内设六部，以黄绍竑为第一部部长，主管作战计划与作战命令。15日，国防最高会议改第一部为作战部。

9月2日 国民政府授予黄绍竑中将军衔加上将衔。

9月13日 侵华日军陷山西大同。黄绍竑衔蒋介石之命到山西视察战况。20日前后，黄绍竑抵太原，因阎锡山已赴雁门关前线，便与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赴雁门关。

9月22日 黄绍竑、阎锡山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商议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游击战争事宜。

10月1日前后 黄绍竑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名义再赴山西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

10月10日 黄绍竑赴娘子关前线指挥。10月26日，娘子关陷敌。

10月31日 黄绍竑在山西寿县半月村又晤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任弼时。

11月4日 黄绍竑于深夜退出太原。不久在临汾又晤周恩来，研究华北游击战争问题。

11月26日 国民政府明令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在武汉交代工作时，又晤周恩来请教关于发动、组织、团结民众

的方法。

12月6日 黄绍竑到浙江省政府接印视事，并邀尚未迁金华之省政府委员及党政负责人会议。其后，黄绍竑又令杭州各工厂将重要机器一律搬迁金华。

12月16日 陈诚、张发奎、黄琪翔到浙江建德县召开军事会议，邀黄绍竑参加会议。会后，黄绍竑陪同陈诚等人回杭州。

12月23日 黄绍竑退出杭州往桐庐方向行动。24日，杭州为日军占领。

1938年（中华民国27年）

1月1日 黄绍竑抵达浙江省临时省会金华。

1月 顾祝同，白崇禧到浙江部署军事，黄绍竑偕顾祝同、白崇禧往钱塘江北岸视察。

1月中旬 黄绍竑于战时省会永康召集全省士绅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县党部负责人、商会会长和知名士绅，黄绍竑要求他们动员、组织民众进行抗战。

1月 黄绍竑向省府提议成立“战时物产调整处”。

1月 由中共党员倡议，黄绍竑同意，浙江省第一战时政治工作队在兰溪成立。其后，浙江各县陆续成立县政治工作队。

2月9日 黄绍竑主持省府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纲领》计十条，是在中共地下党员影响下起草的。

2月14日 黄绍竑在“总理纪念周”讲话，号召铲除亲日分子，公务员要振奋抗战精神。

2月24日 浙江省政府机关刊物《浙江潮》半月刊在金华创刊。该刊物是黄绍竑找进步文化人严北溟主办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杜国庠等人的文章。

2月 《黄季宽先生抗战言论集》出版。该书是中共地下党

组织为做黄绍竑的统战工作，派人到已沦陷的上海秘密印刷的，由金华“新知书店”发行。

3月初 黄绍竑在金华同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会谈，同意新四军在平阳、温州、丽水设后方留守处、通讯处和办事处，并发给子弹五万发，军衣一千套。

3月10—12日 黄绍竑在《东南日报》发表文章，阐明省政治训练团、省青年训练团及县政工队的使命以及团员应具备的条件。

3月18日 粟裕率浙南挺进师主力赴苏皖前线途经丽水，黄绍竑晤粟裕并应邀到大港头检阅慰问部队。

3月 黄绍竑主持浙江省抗敌自卫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浙江省战时各县政治工作队组织通则》、《浙江省战时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规则》、《战地服务团组织规则》。

3月 浙江省政治训练团、青年训练团同时在丽水成立，黄绍竑兼任两团的团长。

3月 黄绍竑召集各区专员讨论实施《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的原则。

3月29日—4月1日 黄绍竑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汉期间，黄绍竑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晤商闽浙边区中共游击队问题。

6月 黄绍竑因受到CC派攻讦和蒋介石来电谓浙江省政府声名狼藉，向蒋介石辞职，未获准。

8月 黄绍竑到浙江前线各地视察。

9月 黄绍竑对战时政治工作队集训总队训话，阐述政治工作队组织之经过及其性质、任务。

9月 浙江省铁工厂于丽水大港头成立，黄绍竑任董事长。该厂设制造步枪、轻机枪和手榴弹、掷弹筒及各种爆炸品三个分厂。

10月 黄绍竑召开各区专员会议，省政府决定重划各行政督

察区所隶县份，颁布浙江省战时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暨保安司令部合并组织办法。

10月 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组成省战时青年工作团，黄绍竑受聘任名誉团长，谷正纲为团长。

12月 省府会议通过筹备设立浙江战时大学，以满足战时青年入学受教育的需要，黄绍竑为筹委会主任委员（翌年5月，浙江战时大学改名英士大学）。

1939年（中华民国28年）

1月5日 黄绍竑创办的《民族日报》创刊。

1月21—30日 黄绍竑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留渝时，黄绍竑于李济深寓所晤周恩来。周恩来充分肯定浙江未发生国、共摩擦，提出要赴浙看一看，黄绍竑即表示欢迎并相约同行。

1月 浙西行署组织政治工作队，黄绍竑兼任总队长。

1月 在浙西天目山建立浙江省主席兼全省保安司令行署。

2月18日 黄绍竑和周恩来一起离桂林赴浙江，新四军军长叶挺同行至衡阳始别。

3月18日 周恩来赴天目山晤黄绍竑，两人除会商抗战有关问题外，并达成口头协议，中共派代表与黄绍竑联系，以便遇事能及时商议解决。

3月 黄绍竑在南昌励志社向蒋介石报告浙江省政府工作。

4月2日 黄绍竑陪同周恩来参观浙江铁工厂，并请周恩来对全体职工讲话。

9月28日 黄绍竑与顾祝同等第三战区将领联名通电声讨汪精卫。

10月8日 黄绍竑同程潜、李宗仁等电贺湘北大捷。

10月22日 英士大学在云和举行开学典礼，黄绍竑亲自主持

典礼。

11月12日 黄绍竑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黄绍竑向蒋介石建议在省政府下设军事厅，将保安、防空、兵役三处隶属省政府下。蒋介石首肯，但事后并未实施。

11月 黄绍竑召开全省专员、县长会议，提出“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案。

是年 黄绍竑任第三战区游击总司令部司令。

1940年（中华民国29年）

1月 黄绍竑拨款10万元，倡议筹募科学奖金。

1月 颁布《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

3月 黄绍竑到绍兴视察，向报界发表谈话说：要惩办奸商，平价供应大米。

5月6日 浙江省临时参议会在永康召开第三次大会，会上有人以年初日军偷袭萧山一事向黄绍竑提出严重质问。

5月 黄绍竑兼浙江省行政干部训练团主任。

6日3日 浙江各地粮荒严重，米价上涨，奸商乘机走私抬价，引起群众不满，纷纷要求开放米市，平抑米价。为此黄绍竑下令惩办勾结奸商走私资敌的官吏，并调拨一批粮食供应灾区的饥民。

6月 浙江省各县战时政治工作队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省支部所接收并改组为青年服务队。

7月1—8日 黄绍竑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中央五届七中全会，提出“田赋征实”议案。

10月 黄绍竑主办的《浙江潮》停刊。

12月6日 黄绍竑电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报告日寇飞机在浙江金华一带施放鼠疫病菌及疫情，请求赶制大量鼠疫菌苗以供急需。

本年 黄绍竑因发明各种地雷发火装置及万变密码译电机获浙江省科学奖。黄绍竑将所得奖金移赠作特别奖金，以鼓励更多的发明者。

1941年（中华民国30年）

2月1日——3月1日 黄绍竑率县政检查团赴永康、武义、金华、兰溪、汤溪、龙游、衢县、江山、常山、开化、遂安、淳安、寿昌等县及第四、五区专员公署检查县政工作。不久又赴义乌、浦江、萧山、绍兴、嵊县、东阳及第三区专员公署检查工作。

3月 黄绍竑主办的《浙江日报》创刊，由严北溟任社长兼主笔。

4月10日 黄绍竑率浙江省军政干部巡视前线。

6月 黄绍竑到重庆参加中央财政会议。

6月 黄绍竑电令绍兴当局将第三区专员邢震南以渎职罪拘留候审。

10月16—21日 黄绍竑在湖南衡山参加第三次南岳军事会议，向出席会议的高级将领介绍浙江铁工厂所生产的兵器。

12月 黄绍竑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衢县召开专员、县长会议，限期扩建衢州飞机场，以为盟军的空军基地。

1942年（中华民国31年）

1月 黄绍竑在浙江省政府机关办理"假交代"，以促进公务人员工作态度的转变和改进，并在此经验基础上制定《浙江省各机关办理假交代办法》，通饬全省各机关实行。

3月 黄绍竑将浙江铁工厂生产兵器的三个分厂交中央兵工署。不久，三个厂的机器设备拆迁福建。

4月 黄绍竑率县政检查团出巡七区各县，检查县政施行情形。

5月10日 浙江各界在战时省会永康方岩大操场举行追悼抗敌殉难烈士大会，省主席黄绍竑主祭。

5月15日 日寇飞机轰炸金华罗店黄绍竑寓所。

5月20日 金华军民机关团体紧急疏散，黄绍竑离金华赴永康。

9月23日 黄绍竑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11月12—17日 黄绍竑在重庆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并向旅渝浙籍人士报告浙江遭日军破坏情形，募集赈款2200万元（约合战前20万元）。

1943年（中华民国32年）

1月 黄绍竑兼任浙江省物价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省政府召开物价管制会议，决定全省实行限价。

2月 省政府召开全省行政会议，黄绍竑就“浙江省三年施政计划”作总结，决定续订第二个“三年施政计划”。

3月30日 日机狂炸丽水，黄绍竑赴丽水视察并携款进行慰问、赈济难民。

5月 黄绍竑令各县政府自本月起每月供给每个士兵青菜30斤，黄豆、猪肉、食油各1斤，以保证士兵有强壮的体魄应付战斗。

9月 全省行政会议分别在天目山、衢县、临海、丽水四区分片举行，黄绍竑率县政检查团考核县政。

10月10日 蒋介石就任国民政府主席，黄绍竑代表浙江到重庆向蒋介石献剑祝寿。

1944年（中华民国33年）

2月10日 黄绍竑在衡山出席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3月27日 浙江省政府定本年为教育年，黄绍竑亲拟《推进本省教育实施方案》提交全省行政会议通过。

5月20—26日 黄绍竑参加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中执会第十二次会议。

5月29日——6月1日 黄绍竑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全国行政会议。

7月 黄绍竑召开浙江省党政军各界首脑会议，讨论在接近胜利的艰苦阶段，如何突破难关，迎接抗战胜利。黄绍竑亲拟《浙江省十二项施政原则》，由省政府命令公布实行。

11月 黄绍竑为避五十岁寿辰，出巡衢州，参加在衢州召开的五区行政会议。

1945年（中华民国34年）

5月5—21日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黄绍竑当选中央监察委员。

5月21日 黄绍竑由浙西视察回到云和，向报界记者发表谈话，谓将采取措施制止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

9月14日 黄绍竑回到省会杭州，发表讲话说，今后大政方针是发扬科学，促进国家的现代化，与民休养，不容再有纷乱。

10月10日 杭州市各界举行大规模抗战胜利庆祝会，黄绍竑在会上演说。

1946年（中华民国35年）

1月2日 黄绍竑提出"教育第一"口号，定1946年为教育年。并拨征稻谷60万担，作教育补助经费。

2月20日 蒋介石与宋美龄，由宁经沪抵杭州，黄绍竑陪同蒋检阅官兵。后黄向蒋面辞浙江省主席职务。蒋慰留。

3月 黄绍竑飞重庆，再次向蒋介石面辞浙江省主席职务，蒋仍慰留。

3月27日 浙江省政府委员兼主席黄绍竑调离，由沈鸿烈继任。

4月初 黄绍竑办的《浙江日报》，因登载拥护政治协商会议口号，蒋介石见之大怒，命陈布雷斥责报社社长。

1947年（中华民国36年）

4月 张群任行政院长，向蒋介石保荐黄绍竑任粮食部长，蒋派徐堪征求黄的意见，黄拒绝。

夏 黄绍竑在上海为广西西江上游大水灾筹集赈款，并征得宋子文同意，成立两广水灾筹赈委员会。

5月10日 黄绍竑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6月6日 黄绍竑被选为监察院副院长。

7月7日 黄绍竑被选任为中央监察委员。

10月27日 国民政府主席任命黄绍竑为国民政府委员。

1948年（中华民国37年）

元旦 黄绍竑在广州参加宋子文举办的盛大茶会，陈济棠、张发奎等到会。

1月 黄绍竑从广州到桂林、经梧州回家乡容县，赴北流、玉林、博白等地，进行竞选“立法委员”活动。

2～3月间 李宗仁派李扬函告黄绍竑，李要竞选副总统，要黄为他主持竞选，计划一切。

黄绍竑为李宗仁拉选票，专程拜会曾琦、李璜、徐傅霖、刘哲、张发奎、梁化之等人。

3月11日 李宗仁在北平中南海对新闻记者首次发表竞选总统讲话。

3月31日 黄绍竑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找秘书长吴铁城反映，以“外间哄传副总统选举要由中央提名”为由，表示如果属实，广西和安徽代表就退出选举。遂使李宗仁的竞选，由被动变为主动。

4月6日 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决定，本届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党不提名。

4月19日 蒋介石当选为总统。

4月24日 李宗仁在南京召开桂系首脑及骨干秘密会议，黄绍竑提出以退为进的退出竞选计划为大家接受，后由李宗仁以候选人名义上书大会主席团，称：“唯迩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权。以此情形竞选，已失其意义。”李正式声明放弃竞选。

4月25日 蒋介石召见白崇禧，要白劝说李宗仁仍参加决选。

4月25～28日 黄绍竑找浙江旧部、陕西、山东等地代表做疏通工作。

4月29日 国民大会进行第四次选举，李宗仁当选为副总统。黄绍竑遂回上海。

5月17日 立法院选举孙科为院长，陈立夫为副院长。后选举黄绍竑为立法委员。

5月20日 蒋介石、李宗仁分别就任总统、副总统职务。

5月31日 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坚辞不干到上海。

6月上中旬 黄绍竑奉蒋介石命，赴沪劝说白崇禧到武汉就职。白允，于次日回南京，后到武汉就职。

8月 黄绍竑与薛岳等人在宁沪反对政府用金圆券兑换金银。

12月24日 白崇禧致电蒋介石，要求“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李宗仁同时宣布五项和谈要求。

12月下旬 黄绍竑在沪接李宗仁电，要其赴宁，与张群、吴忠信商谈蒋介石下野后的善后问题。

1949年（中华民国38年）

元月1日 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

元月9日 黄绍竑与张群飞抵汉口，桂系首脑人物在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黄绍竑到香港请李济深到武汉主持政治。

元月12日 黄绍竑乘专机由汉赴穗，路经桂林时，向黄旭初讲述宁汉情况及赴港原因。

元月13日 黄绍竑由穗赴港。

元月14日 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平谈判八条意见。

元月中下旬 黄绍竑在港通过“民革”负责人与中共驻港负责人潘汉年联系，请其把白崇禧的意图转报中共中央。后答复要白派刘仲容由信阳到郑州找刘伯承接头。黄即叫秘书电告白崇禧。

元月21日 蒋介石被迫引退，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元月22日 李宗仁发表代总统文告，承认中共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并实行“七大和平措施”。

元月27日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共迅速指定谈判地点，派遣和谈代表进行谈判。

元月31日　华北"剿总"傅作义与中共签定十三项协定，北平和平解放。

2月4日　黄绍竑从香港回到汉口，发现白崇禧主张与蒋介石缓和，认为白谋合而不反蒋是诚意不够，自此，黄、白不和。

2月5日　黄绍竑、黄旭初飞抵南京会晤李宗仁。黄绍竑阐明在强弱悬殊的形势下，要搞一个分治的局面是办不到的。

2月下旬　黄绍竑由宁飞港。

3月8日　孙科辞去行政院职务。

3月12日　何应钦就任行政院长。

3月24日　何应钦召集行政院政务会，重新指定和谈首席代表为张治中，代表是：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后定）。秘书长卢郁文。顾问屈武、李俊龙、金山、刘仲华。并拟定九条"和谈腹稿"。国防部也拟定了"最低限度之要求"。

3月26日　中共决定：周恩来为和谈首席代表。代表是：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后派）。

3月29日　黄绍竑由港飞宁，充当和平谈判代表。

4月1日　黄绍竑随和平谈判代表团飞抵北平。

4月13日　国共双方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谈，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八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说明，后发给南京代表讨论。

4月15日　国共代表举行第二次会谈，中共代表团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共8条24款，限20日为签字日期。

4月中旬　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接见黄绍竑和刘斐，共同商讨《国内和平协定》问题。

4月16日　黄绍竑与顾问屈武，携带《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由平返京。行前周恩来总理勉励其努力完成任务。

4月18日 李宗仁在傅厚岗官邸召集黄绍竑、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夏威、程思远、邱昌渭、韦永成等商讨和议问题。黄绍竑说：吾人迫于形势，决不能同蒋介石共呼吸、同命运，蒋介石还可以退守台湾、苟延残喘，我们形格势禁，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只有和局才足以自保。还说：如果德公同意签字，将来可为联合政府副主席，广西部队因此可得安全保证。

4月19日 李宗仁、何应钦电请中共延长签字期限，再就若干具体问题进行协商。

4月20日 李宗仁、何应钦致电张治中等人，拒绝签字。黄绍竑是日乘吴铁城专机飞穗，次日赴港。

4月21日 毛泽东、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在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

6月8日 黄绍竑在九龙寓所举行第一次集会，张潜华、陈沧波、成舍我、傅汝霖等20多位在港立法委员参加。会上，由黄绍竑报告北平和谈情况及李宗仁拒绝接受中共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修正案》的经过。刘斐阐述了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及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并回答了到会人的提问。最后，大家分别就继续促进国内和平问题和脱离蒋介石政权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8月4日 国民党中央监察会第72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黄绍竑党籍。

8月13日 黄绍竑等44人在香港发表了《我们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号召忠于三民主义、忠于中国人民的国民党员，立即与反动的国民党党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成为一股新的革命力量，坚决向人民靠拢，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8月25日 行政院举行会议，决议将黄绍竑等44人交司法行政及国防部研究，处以应得之罪。

9月上旬 黄绍竑等人在香港又联名公开发表《告国民党海陆空军全体将士书》。号召全体将士效法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弃暗投明，率队来归，实现局部和平。

9月上旬 黄绍竑得中共驻港负责人通知，与刘斐等人一道乘船，从香港赴北平，参加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从此，结束了与蒋介石和新桂系的关系而“走向新生”。填《玉楼青·别香港》词一首，表达当时的心情。

9月14日 国民党南京政府行政院举行第89次会议，决定通缉黄绍竑、邓召荫等55人归案究办。

9月21日 黄绍竑从即日起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一届政协全体会议。

9月22日 黄绍竑任大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

9月23日 黄绍竑与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黄琪翔等二十六人，应邀参加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举行的宴会。席间，毛泽东几次举杯为起义人员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立下的功绩干杯。

9月24日 国民党总统明令通缉黄绍竑、贺耀祖、罗翼群、刘斐及邓召荫、陈剑翛等55人，严密缉捕，归案讯办。

9月25日 黄绍竑在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

9月30日 黄绍竑当选为一届政协委员。

10月1日 黄绍竑参加开国典礼。

10月19日 黄绍竑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

1950年

3月3日 黄绍竑出席政务院第二十二次会议，被推举参加中央救灾委员会。

6月14日——23日 黄绍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

1951年

10月23日——11月1日 黄绍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

是年 黄绍竑作为政务院政务委员，还参加本年内的政务院会议及活动。

1952年

是年 黄绍竑作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继续参加本年内的政务院会议及活动。

1953年

2月4日——7日 黄绍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

是年 黄绍竑作为政务院政务委员，继续参加本年内的政务院会议及活动。

1954年

9月15日——28日 黄绍竑作为广西代表团成员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当选为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

12月21日——25日 黄绍竑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

1955年

7月5日——30日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

7月26日 黄绍竑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发言。

1956年

1月30日——2月7日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2月21日——29日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民革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革中央委员。

3月5日 黄绍竑参加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一次会议，当选为民革中央常委。

3月27日 黄绍竑参加民革三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一次会议，研究重要事项，通过中央委员会各门部负责人名单。

5月12日 黄绍竑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周恩来总理宴请程思远的宴会。

7月3日 黄绍竑出席民革中央常委四次（扩大）会议，座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7月5日、6日 黄绍竑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对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关于解放台湾的讲话感到兴奋、表示拥护。并就台湾的人心所向，及国内对台湾宣传等问题谈了看法。

9月15日 黄绍竑以民革中央领导人身分，与张治中等人应邀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7年

2月18日 黄绍竑参加民革中央常委十次会议，被任命为增设的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

4月——6月 黄绍竑以全国人大代表身分，视察了北京市的检察院、法院、公安局和监狱等政法机构，并召集检察通讯员、陪审员、律师分别举行座谈会。对律师的辩护质量、检察院批准起诉等情况作了了解。

5月16日 黄绍竑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议题为征求对统战工作的意见，帮助中共开展整风运动。黄绍竑在会上发了言。

5月26日 黄绍竑参加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座谈会，就美军当局在台湾滥用外交“豁免权”，释放杀人犯雷诺所触发的反美大示威进行分析研究。

6月26日——7月15日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

12月 黄绍竑被划为右派。

1958年

1月19日——26日 黄绍竑在民革中央召开的第十九次（扩大）会议上，被撤消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月1日 黄绍竑被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罢免全国人大常委和法案委员职务。

11月12日——12月2日 黄绍竑在民革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9年

4月17日——29日 黄绍竑在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委员和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

9月 黄绍竑见李济深，汇报到东北参观的经过和感想，征求李对撰写文史资料的意见。

1960年

3月——12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三、七、十四辑分别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滇桂战争》、《一九二八年粤桂战争》、《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长城抗战概述》。这几篇文章基本上是对原《五十回忆》的补述，作者对自身作了揭露和批判，其中《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尤为详尽地概述了作者与蒋桂之间、各派系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

10月31日 黄绍竑被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1961年

6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六辑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旧桂系的兴灭》全文。

夏 黄绍竑与章伯钧、陈铭枢、龙云等，由全国政协组织到内蒙海拉尔避暑，游览风光。黄喜钓鱼，内蒙河湖中鱼甚多，他收获极丰，十分高兴。归来后，填词数首。

9月15日 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并成立纪念筹备委员会，黄绍竑任该会委员。

秋 黄绍竑光荣出席辛亥革命五十周年招待会，获“辛亥老人”荣誉称号。

本年 黄绍竑撰写《辛亥革命前后的广西局势和广西北伐军》（后载《广西文史资料》第十辑），属广西辛亥革命时期的宝贵史料之一。

1962年

4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四辑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阻击叶贺南征军的战争》全文。

4月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并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

4月20日 黄绍竑出席民革中央委员会第24次（扩大）会议，讨论贯彻全国人大二届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精神。

5月22日 在“五·二四”台湾人民反美爱国大示威五周年前夕，黄绍竑参加民革中央和民革北京市委的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联合举行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7月3日 黄绍竑在北京参加龙云的公祭仪式，填《风入松·挽龙云先生》词一首，以表哀情。

10月23日——11月27日 黄绍竑应民革广西区委会主委吕集义的邀请，回广西了解文史资料的收集、撰写情况。在南宁和桂林期间，审阅了部分文史资料稿件，参加座谈会，并就如何写好文史资料谈了看法。他说：“不要怕丑，要自己动手才写得真实，”“自己丑恶的东西端了出来，本身就是批判，”“最荒谬的作法是写别人的东西，专去批判别人。”此外，游览了风景名胜，考察了自由市场，会见了部分亲朋故旧，并填词多首。

1963年

3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发表黄绍竑撰写的《新桂系与鸦片烟》。

6月 《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也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新桂系与鸦片烟》。

9月 黄绍竑撰写《“四·一二”事变前后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后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78年12月出版）。这篇文章本着批判，求实的态度，补述了《五十回忆》不详之处，纠正了一些重要日期上的差错，并对“四·一二”前后经历的内幕作了自我揭露。与《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四·一二事变广西方面的资料补述》，等文，均为作者对“四·一二”回忆的重要史料。

1964年

4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五辑也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四·一二”政变前的秘密反共会议》一文，与此同时《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亦发表了黄绍竑撰写的《新桂系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

12月 黄绍竑任全国政协四届委员会委员。

1965年

2月 黄绍竑撰写《“四·一二”事变关于广西方面资料的补述》一文（后载《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1978年12月出版）。

3月 黄绍竑撰写《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一文，（后

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1979年4月出版)。文中作者记述了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成功，充当和谈代表，后离走香港、又赴北平的历史过程。是黄绍竑《五十回忆》后的一篇重要史料。

6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二辑发表黄绍竑撰写的《新桂系的崛起》。文章较详细地记述了新桂系的产生，发展过程，与作者所撰写的《旧桂系的兴灭》、《新桂系与鸦片烟》、《新桂系崛起与两广统一及大革命北伐》，均为了解新桂系的重要史料。

7月20日　黄绍竑到北京机场欢迎李宗仁先生和夫人郭德洁从海外归来，填《西江月·欢迎李宗仁先生光荣归依祖国并劝归旧好》词一首。

7月29日　黄绍竑出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宴请李宗仁先生和夫人的宴会。

8月6日　黄绍竑出席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的欢迎李宗仁先生归来的茶话会。

8月7日　黄绍竑出席民革中央欢迎李宗仁先生及夫人的宴会。

10月24日　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明年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黄绍竑任该纪念筹备委员会委员。

12月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四辑发表黄绍竑撰写的《娘子关战役前后》一文。文章对《五十回忆》“娘子关战役”一节作了补述，其中纠正了过去对“平型关战役”的不确看法。

1966年

3月22日　黄绍竑在北京医院参加向郭德洁遗体告别仪式。

5月——6月　黄绍竑与刘斐、陈此生、黄琪翔、程思远等，陪同李宗仁前往华东一带参观游览。到南京、上海、杭州、无锡

等地，拜谒了中山陵和中山故居；凭吊了廖仲恺墓和邓演达墓；游览了雨花台、花港、锡山公园；参观了工厂。所到之处，均受当地领导欢迎。

8月31日　黄绍竑被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迫害致死，终年71岁。

附

黄绍竑追悼会在北京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黄绍竑同志，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黄绍竑追悼会1980年12月31日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

邓小平、彭冲、廖承志等、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及有关单位，送了花圈。乌兰夫、朱蕴山等二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刘澜涛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致悼词。悼词说，黄绍竑同志是广西容县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解放前，他曾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湖北省政府主席，监察院副院长、立法委员、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1949年4月，黄绍竑同志任国民党当局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来到北京。他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希望结束战争，恢复和平，并由和谈代表团推定他回南京，劝告国民党当局接受“和平协定”，终因南京国民党当局拒绝接受“和平协定”，导致和谈破裂。对此，他深为不满，随即去香港、联合44位国民党人士，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与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1949年8月，他由香港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7年，黄绍竑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经过复查，已予改正。

见1981年1月1日《人民日报》

后　记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新桂系主要领导人，曾在我国政坛上联袂驰骋，纵横捭阖，但最后所走的道路却不同。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南京解放，李宗仁离开祖国大陆，饱经沧桑后，于1965年回到祖国怀抱；白崇禧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唯黄绍竑在重大历史转变关头，联合在港44位有识之士发表声明，与国民党决裂，投奔共产党，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宝贵的贡献。解放后，历任政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于1966年逝世。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中共中央统战部、民革中央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及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单位和有关领导的关怀和支持；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先生和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统战部部长黄语扬同志为本书作序；民革中央顾问屈武先生为本书写书名；黄绍竑先生的亲属及程思远先生给我们提供了部分宝贵的照片及资料，在此，均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由唐依麟主编。参加编辑人员有：唐依麟、陆君田、赵大冠、叶春生。

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除将全书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对有错误的时间、地名、人名、部队番号和错漏字作了更正；对其中某些不合史实的记述作了加注以外，其它不作任何变动，以保持原著的本来面目。

我们综合这本回忆录和其它有关资料，编撰了《黄绍竑年谱》，其中：

1895年至1945年为赵大冠执笔；

1946年至1949年8月为唐侬麟执笔；

1949年9月至1966年为叶春生执笔。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到代总统》和《我参加和平谈判代表团的经过》两文由唐侬麟缩写。

编者

1990.10.23于南宁